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戴晴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在抓階級鬥爭的時期，由公安部某局負責偵控的一個政治案件，通過採用技術手段，查獲了被偵察對象的一些可疑活動。因為該對象是個社會名人，須及時向中央報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進展情況公安部只報周總理和毛主席。上報材料不打印，由專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簽名後，以絕密件報周總理辦公室。幾天後、原件退回，上面有毛主席親筆批示：「在如來佛手掌之中。」

——邢俊生：《公安史話．我給徐子榮當秘書》（2007年11月21日）

戴晴

在如來佛掌中
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戴晴 著

國際統一書號（ISBN）：978-962-996-401-6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Zhang Dongsun: The Man and His Era (in Chinese)
By Dai Qing

ISBN: 978-962-996-401-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開篇

投票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以悲憫胸襟，迎接世界大變局。

——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1948年9月）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最後一天。

這一名稱非常重要。之所以選擇這一名稱而非其他，暗含了即將誕生的共和國之合法性。因為，如果國內、國外輿論已經認可了國民政府於1946年召開「老政協」對改組政府與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所具有的合法性，那麼，把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破壞的政協會議接着開下去，就有了不言而喻的正當性。籌備期間，參與者多泛稱其為「新政協」。1949年9月會議正式舉行後，新政協鄭重更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此，毛澤東毫不隱諱。他在開幕詞中說：

> 我們的會議之所以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是因為三年以前我們曾和蔣介石國民黨一道開過一次政治協商會議。那次會議的結果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及其幫兇們破壞了……[1]

按照議程，兩項選舉將在這一天舉行：先以「整個名單」（即「主席團所提名單」）付表決的方法選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80名；然後，全體代表再以無記名聯記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員56名。

宋雲彬在日記中對此有詳盡說明。他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選舉，是依據29日全體會議的決定，以無記名聯記法投票，代表在選舉時有權捨棄名單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選，選票上每一候選

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如代表不願選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在下面另寫上想要選舉的某人姓名；只「×」去某人，不另寫他人也可。[2]

據《人民日報》第二天報道，這項選舉，出任9月30日大會執行主席及選舉總監督的是劉少奇、李立三等五人，周恩來則對選舉辦法作扼要說明。事實上，面對年齡、經歷各異的投票人，為防止出現廢票，周恩來的說明還真不算「扼要」。比如，他簡直像對小學生一樣，就選舉方法對投票人諄諄叮囑：「要用鋼筆，沒有的我們秘書處會送上毛筆。在要選的人名字上打圈，要重重的圈。不要選的打叉，叉要重。折疊的方法是這樣的……」他還特別說明代表們可以圈選自己。[3] 叮囑之後，劉少奇宣佈：「到會有選舉權的代表共576人。」

《人民日報》記者對會議作了如下描述：

> ……如數發下選票後，在我們開國史中最莊嚴的儀式正式開始。每一個人經過一度深思，立刻在選票中表達出自己的希望。其實，代表們都是胸有成竹的。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誰把災難重重的中國人民解放出來，誰一定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他會繼續領導我們，永遠走向勝利。
>
> 大會選出六十個代表作監票人。九個票箱由九個監票人監守着。監票人詳細檢查了票箱，小心謹慎地鎖起來，鑰匙交給執行主席，然後開始投票。整個過程是那麼嚴肅認真，表現着政協會議從始至終的精神。毛主席仔仔細細寫好了自己的票，在四時二十分整，把票投進第三號票箱。
>
> 從開票箱中檢出五百七十六票，與發票數目完全相符。執行主席李立三說：「有選舉權的代表都投票了，我們的投票是有效的。」人民熱烈鼓掌，慶賀投票手續的完美無缺。[4]

投票完畢，檢票人進行檢票時，全體代表沒有閒着：通過了政協會議宣言、給解放軍致敬電、豎立紀念碑決定，還隨即到天安門廣場行紀念碑奠基禮。然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

再看《人民日報》的報道：

七時三十分，執行主席劉少奇宣佈選舉結果。他一字一句地說：「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五百七十五票。」會場代表一致起立，熱烈鼓掌。樂隊奏起「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樂曲。代表們合着樂聲的節拍鼓掌，其中並夾着「毛澤東萬歲」的口號聲。樂聲剛剛停止，有節奏的掌聲又升揚起來。全場情緒沸騰，歡欣鼓舞。這是眾望所歸，每一個人都為自己投了偉大領袖一票而感到光榮、驕傲。[5]

當時的軍隊代表、作家劉白羽的敘述尤為生動：

（從天安門廣場）回到懷仁堂，我忽然感覺到今天的燈光格外明亮。今天在這裏，一個全新的、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就要誕生了，所有的代表都和我一樣，心裏有着一種興奮和激動。

七點三十分，執行主席劉少奇按鈴、開會，隨即宣佈了選舉結果，當宣佈道：「毛澤東以557票（讀者知道，這數字應為575。這一錯誤，不知出於排版工人的疏忽，還是劉作家自己激動得顧不得那許多細節了——著者按）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全體代表都興奮得站起來，一面鼓掌，一面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樂隊奏起「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歷史在這裏翻開了新的篇章。毛主席巍然站立在人海之中，垂手肅立臉上露出嚴肅的表情。大家都知道，他接受的不只是全場的鼓掌與歡呼，在這一刻，他承擔起了中國人民的命運。……

至此，大會執行主席宣佈主席團的工作結束，下面請新選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主持大會閉幕式。毛主席首先走上主席台，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而後主席、副主席一起站在主席台上。宋慶齡站在毛主席左面，朱德在毛主席的右面。

毛主席站了好一陣，等候人們激動的浪潮平息。但浪潮一直沒有平息，他終於提高聲音宣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

一屆大會已經圓滿成功，現在請朱德副主席致閉幕詞。」

當朱德走向台口的麥克風，戴起老花鏡，宣讀閉幕詞時，會場才暫時安靜下來。他宣讀完畢，毛主席站起來正要宣佈散會時，一個夢幻般的奇跡出現了：莊嚴的講台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身後的帷幕上，呼啦啦展開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這是經過全體代表決議通過、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它是那樣莊嚴、美麗，從那一刻起，它就一直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也同時飄揚在每個人的心裏。

毛主席等代表們就坐之後，剛要開口講話，暴風雨般的歡呼、鼓掌聲又一次升騰而起，達到整個會議的高潮，大家都感覺到，從此刻起，在這一片神聖而光明的土地上，人民終於成了主人。

毛主席等待着，一任大家把飽滿的情感宣泄出來……

但時間終於到了，毛主席毅然說出了「散會」兩個字，隨後整個會場的沸騰又一次騰空而起，大家再一次為新的共和國誕生鼓掌歡呼……[6]

可能有人注意到，投票人576名，投毛澤東票的是575人！那時他們一定認為，這是很自然的呀，那沒投的一票當然是毛主席自己的——以偉大領袖的謙虛、自信、豁達，他一定會這麼做。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對此，起碼在當時，在場的人沒有過絲毫懷疑。

但是錯了。因為，就在當時，就在那紅旗翻滾、樂聲嘹亮、熱淚揮灑的當場，起碼有兩個人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兩個人。一個是確實在自己名字上邊鄭重地畫了圈的毛澤東；另一個人就是沒有投他票的那名代表，唯一的一名——本書主人公、時任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

讀者會說，別忘了，那是「無記名聯記」，誰知道哪張票是誰劃的。更何況，就算有一位代表沒有在毛的名字上畫圈，誰有興趣追究？你的結論下得未免過於唐突。

一屆大會已經圓滿成功，現在請朱德副主席致閉幕詞。」

當朱德走向台口的麥克風，戴起老花鏡，宣讀閉幕詞時，會場才暫時安靜下來。他宣讀完畢，毛主席站起來正要宣佈散會時，一個夢幻般的奇跡出現了：莊嚴的講台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身後的帷幕上，呼啦啦展開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這是經過全體代表決議通過、在中國大地上展開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它是那樣莊嚴、美麗，從那一刻起，它就一直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空，也同時飄揚在每個人的心裏。

毛主席等代表們就坐之後，剛要開口講話，暴風雨般的歡呼、鼓掌聲又一次升騰而起，達到整個會議的高潮，大家都感覺到，從此刻起，在這一片神聖而光明的土地上，人民終於成了主人。

毛主席等待着，一任大家把飽滿的情感宣泄出來……

但時間終於到了，毛主席毅然説出了「散會」兩個字，隨後整個會場的沸騰又一次騰空而起，大家再一次為新的共和國誕生鼓掌歡呼……[6]

可能有人注意到，投票人576名，投毛澤東票的是575人！那時他們一定認為，這是很自然的呀，那沒投的一票當然是毛主席自己的——以偉大領袖的謙虛、自信、豁達，他一定會這麼做。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對此，起碼在當時，在場的人沒有過絲毫懷疑。

但是錯了。因為，就在當時，就在那紅旗翻滾、樂聲嘹亮、熱淚揮灑的當場，起碼有兩個人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兩個人。一個是確實在自己名字上邊鄭重地畫了圈的毛澤東；另一個人就是沒有投他票的那名代表，唯一的一名——本書主人公、時任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

讀者會説，別忘了，那是「無記名聯記」，誰知道哪張票是誰劃的。更何況，就算有一位代表沒有在毛的名字上畫圈，誰有興趣追究？你的結論下得未免過於唐突。



毛澤東在1949年9月30日的政協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說得不錯。可惜屬於正常推理。如果我們以此邏輯(而且僅僅以此邏輯)推斷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的行為，那就失之於簡單了。

著者在此提出一個可能已經有相當多共產黨基層骨幹知道的故事：

生於1886年的張東蓀育有四個兒女。長子、北大教授、生物學家張宗炳(1914年生)；次子、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宗燧(1915年生)；三子、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的張宗熲(1920年生)；最小的女兒、高能物理學家張宗燁(1933年生)，如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張宗燁1952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屬於成績優秀的安靜學生。畢業時候填報志願，因為太愛物理而政治上不大開竅，竟填報了「科學院近代物理所」，也即1958年後的原子能研究所。可能因為這女學生

實在是「除了物理，不問其他」，居然皮肉無損地從事高度機密的工作凡五十年。

大約1993、1994年，在一次會議或者工作間隙，張宗燁碰到了五十年代後期從中宣部調到該所，除物理外，一直從事黨的工作——當時是近代物理所的黨支部書記、如今也已是按時交納黨費、一切以黨的利益為上的何祚庥同志。

在和她聊天的時候，忠於科學忠於黨、性情卻是天真又直率的何祚庥，突然很感慨地對他的老部下提起當年「老話兒」：「這麼些年都沒告訴你，當時我們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裏一直是內控使用。……我們給你說了好多好話。其實對你一直就是一種……。剛剛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結果這裏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雖然不能肯定，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

張宗燁沒敢追問何同志這內部信息的來源。她估計是反右期間傳達下來的。當然她也沒敢去想，「他們猜」裏邊的「他們」究竟是誰、以及到底為了什麼、依據哪條規矩，去研究那張反對票。

「何祚庥跟我說，當時他印象非常非常深：那時剛解放啊，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會有人投反對票——敵人這麼快就鑽到這麼小的圈子裏邊來了。」[7]

如果讀者（特別是歷史學界）依舊認為這也屬於不可盡信的「孤證」，我們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別的一些為黨所信賴的好同志站出來作證；[8] 如果他們不肯，而普通人對政協與人民政府檔案的查詢權仍不見任何鬆動……就請讀下邊的故事吧。

主人公的故事將告訴你，那一張連投票者自己都知道絕對不會對結果發生任何作用的、在毛的名下劃了「×」的票，為什麼會在這時刻投出去。

於是，我們將知道，對歷史以及活躍其中的人的命運的闡釋，有沒有板上釘釘的證據，可能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為證據會失落（甚至會篡改或偽造），但由思維主導着的行為，卻會在一個接一個歷史時刻，爆發出耀眼的道德與智慧光彩。

註釋

1. 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42。
2.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170。
3. 龐松：《共和國年輪．1949》(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365–366。
4. 〈「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記人民政協最後一天大會〉，《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日。
5. 同上註。
6. 劉白羽：〈難忘那一天〉，《光明日報》，2004年11月1日。
7. 摘自1996年12月15日著者對張家親屬的採訪。
8. 已經有親歷者撰文敘述開票經過，參見王仲方：〈我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

第一章



1949這一年

1949這一年，多少大事——
歷史走向、家國命運、生死契闊……
竟翻覆於立決的一瞬。

六十四歲的主人公給推上前台，
扮演起不過一介書生義不容辭、
勉為其難、搭補幫襯、勗勵規箴之角色。

但在這年，中國是容不得書生的——
特別是，不諳為政權變、不知審時度勢，
而且，還不肯通融。

本章有關北平和平解放的部分內容，曾以“1948: How Peaceful Was the Liberation of Beiping?”為題，在澳洲國立大學2007年9月5日的第六十八屆George E. Morrison Lecture上發表，演講稿其後由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和閔福德(John Minford)翻譯成英文，在網上期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第十四期(2008年6月)上刊登。

一

年初：軍委來電

1949年1月6日（農曆臘八），北平西郊。

兩名皮帽長袍、學究模樣的人，正冒着凜冽寒風，一路北行。他們是誰？

年序更長、身骨也更弱些的，正是本書主人公、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與他結伴前行的，則是國軍的華北剿總少將處長周北峰[1]。他們將代表守城的傅作義，與圍城之共軍談和。

那天清晨，傅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先接上他，到西城李閣老胡同張東蓀長子張宗炳家會齊，安排出城車輛並通報出城路線及聯絡記號；接着中共地工崔月犁到場，代表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為兩名和平使者安排過火線的路線：出西直門直奔海甸（今稱海淀），在那裏有人接應，聯絡口號「找王東」（往東的意思）。據周北峰1979年撰文：

> 我與張東蓀乘車出發，到西直門後，汽車停下受檢查。這時過來一個（著者注：國軍）軍官，……奉命在西直門接應，說：「出西直門後，直奔萬牲園（即現在的動物園），在前面白石橋拐彎處，有人接你們，請吧！」
>
> 我們坐車一直向頤和園方向駛去。到了白石橋，一個（著者注：國軍）軍官攔住我們的汽車，打開車門看了一下說：「汽車不能向前開了！請下車吧！」他又對我說：「這是第二道防線，

距前沿戰壕只三五百米，你們步行到那裏後，有人指給你們穿越火線的路線和辦法。我認識您，前面那個軍官不認識您，我給您寫個條子，你交給那個人，他是個連長。」接着他開給了我一個紙條。

這樣，我們這兩個夾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學教授打扮的人，持杖步行前進。我與張東蓀一面前進，一面注視着道旁的情況。走了十幾米，後面那個軍官大聲喊道：「請走馬路中間，千萬別走兩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我倆繼續向前，到了前沿戰壕。這時從路旁草棚裏走出一個人，我即將紙條給他。他看後說：「你們過去吧。從昨天到今天這裏很安靜，沒有響槍，你們小心點就是了，聽見打槍就臥倒，等那邊招手再向前走。」我們又走了約一百米，突然聽見有人喊：「站住！」我們順着聲音看到農研所門口的石橋上有六、七個解放軍戰士。我們就搖晃着手中的小白旗向他們走去。到了跟前，他們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說我倆是燕京大學的教授，好久沒有回家了，要回家去。一個班長模樣的戰士像是有點了解我們的情況，便領我倆到了他們的指揮所。

這個指揮所設在海甸鎮西南角的一個大院內，一位幹部和我們談了話。我們說「找王東」，並簡單地說明了來意。他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吃了一頓麵條。飯後讓我倆在一個屋子裏休息一下。看樣子，顯然是預先接到關於我們情況的通知了。

此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圍城解紐」(北平和平移交)之一步。他們搖着的那面旗子，是一條剛從東蓀先生孫子、時年四歲的後來的「X案件」主犯張鶴慈小床上撕下來的床單，旗桿則取自他的玩具紅纓槍。

燕京哲學系主任、年屆六十四歲的張東蓀，怎麼捲進來這赳赳武夫的遊戲中？

讓我們回到1948年底1949年初。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中國正經歷着近代以來最後也是最慘烈的一場大厮殺。兩邊打出的旗



張東蓀中年時期

號，一曰主義，一曰正統。被戰爭蹂躪不堪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兩個曾為「兄弟同志」的武裝政治力量，從1927年反目到此時，談談打打，已有二十一年。

這時已不是1928年。在那一年的北伐之後，城市和國民革命軍中的「赤匪」已幾近殺光，僥倖逃脫的「革命火種」剛剛流竄到國際本部（莫斯科）與偏遠山鄉。

這時也不是1938年。那年，在抵禦外侮的大局之下，四萬六千工農紅軍編入一百七十萬人的國軍序列，接受政府的統轄與供給。

到了1948年冬天的時候，已經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八路軍、新四軍，跟國軍已經打了兩年多。到遼瀋戰役（殲敵四十三萬）接近尾聲、淮海戰役（殲敵五十六萬）合圍已經完成之當口，用毛澤東的話說：

> 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3]

障在他們面前，最主要的就是華北剿總傅作義的領地。這裏有工商重鎮天津，還有集中國文化精粹的五朝古都北平。共產黨雖然志向宏遠，話也說得氣沖牛斗，但從「萬無一失之決勝」的軍事角度，此時共軍不僅人力不足，而且已經相當疲乏。華北的拿下，當然最好少花些氣力，要是同時贏得「文明之師」、「仁義之師」之名聲，就是先哲孫子所謂的上上策了。

我們的主人公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拉到了歷史前台。在這個注定要載入史冊的歷史悲喜劇中，他的作為，至今未見廝殺雙方正式論述。非政界呢？無論在當時與事後都一直關注時局的他的老友，有如下評說：

「調停傅作義功」（張君勱：〈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

「和平解放北京，張東蓀是有功人之一。」（梁漱溟：《這個世界會更好嗎》）

所謂「之一」，是說還有其他關鍵人物，第一個當然要數最後下令獻城的傅作義了。

正式獻城三週後，抗戰名將、前傅司令長官宜生請求前往西柏坡「拜見」毛澤東，開口即稱「我有罪」。毛對這謙恭的降將說的第一句話則是：「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會忘記你。」[4]

後世讀史的人，幾乎無人不將這「大好事」定位於拯救古都於焚毀、免除生靈於塗炭云云，卻不知其所以又「大」又「好」，以毛澤東，還有他攻城略地之戰將林彪、聶榮臻等人的角度，其實是「大好」在「抑留」——得以將傅作義和他轄下的五十多萬軍隊「抑留」在華北，最後接受改編切割到班，以單兵身份加入解放軍，為順利拿下南中國戰場提供最大優勢。

如何才「抑留」得住？毛林聶的部署是「圍而不打，隔而不圍」、「隔斷平津、包圍唐山、殲擊蘆塘」，[5]逼降傅作義。為催促疲憊不堪的東北野戰軍迅速進入，毛對林彪說得最為直白：「你們是早點入關，抓住敵人，把敵人殲滅在平津地區呢，還是等平津的敵人跑了，你們再去追擊，追到很遠的地方去殲滅它？部隊要休整也可以，但休整完後，你們就要到長江以南去打仗了，現在舒服將來吃苦。」[6]

但「殲滅」須動刀動槍。能不能調動軍事以外的力量(政治、經濟、輿論、人情)，爭取不費一兵一卒，達到「穩定傅作義不走」[7]之目的呢？毛本人也不是沒有過和平解決北平的打算——誰不願意兵不血刃而獲勝呢？從已經披露的資料看，第一次是在1948年那次有名的「九月會議」中間，他曾向徐向前偶然提起。吃夠了閻錫山苦頭的徐當即否定。

但這回已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傅作義也不想再打了。

他原先和蔣介石商定的是，撤離北平、固守津沽，萬一不利，立即由海上撤退。到1948年底，無論國民政府還是蔣本人，都已讓他徹底失望。加上李宗仁、司徒雷登與其他黨國故舊的說項，傅作義已經傾向於以自己的實力，聯絡第三方面力量，實現平津地區和平解決，最後在華北成立聯合政府。

我們可以看出，這設想，與共產黨的志在必得——得平津、得華北、得長江和全中國，有多麼大的差距。

差距愈大，和談就愈難，也更具挑戰性。誰來挑這個頭呢？

如果不將北平地下黨在這一階段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無所不包的工作算在內(因為它本是共產黨處於前沿的組織)，作為不同政治勢力，最早介入的，是有「勢」也有「力」，且自以為真正站在國共中間、擔綱「第三勢力」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

他的代表彭澤湘1948年10月抵達北平，通過傅作義心腹兜售最能打動他的言和方案，即「走第三條路線，獨樹一幟，既不追蔣，也不投共。通過談判，宣佈起義，華北獨立，成立聯合政府」。[8] 在察覺傅作義希望中間力量的陣容再強勢一些的時候，立即拉上了民盟、農工民主黨和在他看來有影響的社會賢達。[9]

為把事情做得萬無一失，彭不僅事事通過北平地下黨，還搬動了雖然無黨無派、卻是極有份量的符定一、因為他曾是毛澤東的校長和老師，還從軍閥手裏救過這未來革命領袖的命。

由彭所代表的「第三方面」，將傅「有意言和」的信息，通過與符定一聯絡的地下黨，於11月7日和14日送出去之後，不見回音。傅作義於是通過自己女兒、再用與她有聯絡的北平地下黨的電台直接給毛澤東發電報，希望能派南漢宸來談判。中共依舊沒有搭理。

符老先生自己趕到石家莊(11月18日)。

傅作義這回得到了回音。只是沒有從毛澤東，而是從他在華北的老對頭、也是當時直接與之對峙的將軍聶榮臻處。這封實際由毛澤東自己起草，在他的符老師抵達第二天發出的回電，雖只不鹹不淡地說了一句「希派可靠代表前來接洽」(11月19日電)，[10] 但作為運籌帷幄的主將，當時毛卻是真的「靈光一閃」，而且真的行動起來——他立即將不過一天前的考慮「東北野戰軍按原計劃休整到12月半」，[11] 改為決定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11月18日電)。[12] 而且「行動須十分隱蔽」，又指揮胡喬木編撰假消息，例如林彪如何在瀋陽休息慶功等，以迷惑敵人[13]——「擬利用此機會穩定傅作義不走，以便迅速解決中央軍。」[14]

果然，從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十個縱隊開始入關、華北的兩個兵團進抵平津地區。到了月底，看見等着談判的傅軍「尚是固守計劃，沒有撤退計劃」(11月26日電)，偷偷進關的共軍也樂得從容佈局，間作小小休整。兩週之後，包圍北平、切斷平津之部署完成。[15]

這樣的調動，傅作義不可能全無察覺。雖然對全盤計劃的來龍去脈尚不完全摸底，但也不能再端着架子等。12月中旬，他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下屬報系《平明日報》社長)，姿態低了些，但依舊「嫡系部隊保留，成立聯合政府」。

這邊只接受了「談判」這一說法(上次算是「傳信兒」)，即史稱「第一次正式談判」，但開出傅作義難於接受的高價碼：「全部繳械、接受改編」。目的只為爭取更多的時間：「對平、津、張三敵的正式攻擊，須待部隊休整一時期方能開始。」

在這持續十天的僵持中，固然林聶得以調整部署、小作休整，實際也給了國民政府以機會，以將華北的六十萬軍隊調到南方作最後一搏。

12月中以來，蔣介石連連派出心腹：身邊的軍令部長徐永昌，軍統局長鄭介民；最後是攜帶了總裁親筆信的蔣緯國——連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也出面了，[16] 力勸傅作義火速南撤。而傅轄下的中央系部隊，有的一直在壓他，有的已準備自己起事配合共軍。[17]

在這樣的戰局之下，共產黨是絕對不願意「和」了，立即公佈四十三名最著名的「戰爭罪犯」(國民黨軍政要人)，故意把事情做絕，把沒用的中間人物都打成敵人：誰提和平，誰就符合敵人的「和平陰謀」，就是共產黨自稱所代表的「人民」的敵人(「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 凡是勸和的人，都「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18]

這回有點坐不住的是毛了。他感到應該抓住時機，主動出手。這就是「48/49年尾年頭」那兩天裏的「軍委來電」——本書主人公登場。

12月31日中央軍委覆林彪電：

轉來兩次北平地下黨來的電報[19]已悉。請你覆電北平地下黨，轉告傅作義派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和張東蓀一道出城到你們那裏來談判。

數小時後（1月1日凌晨），又追了一封：

（一）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以後，傅作義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屬之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為我所用，因此你們應認真進行傅作義的工作。

（二）你們應通過北平市委將下列各點直接告訴傅作義：

甲、目前不要發通電。此電一發，他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屬都可能受到蔣系的壓迫，甚至被解決。我們也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些做法，傅氏此種做法是很不實際的，是很危險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將他和劉峙、白崇禧、閻錫山、胡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這樣一宣佈，傅在蔣介石及蔣系軍隊面前的地位加強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堅決打下去，除此以外再無出路；但在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裏應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北平城內全部傅系均可不繳械，並可允許編為一個軍。

丙、傅致毛主席電，毛主席已經收到。[20]毛主席認為傅氏在該電中所取態度不實際，應照上述甲、乙兩項辦法進行方合實際，方能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來談判之代表崔先生態度很好，嗣後崔可再出城來聯絡傳達雙方意旨，唯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對的，今後亦不應去南京，否則有被蔣介石扣留的危險。

己、彭澤湘是中共叛徒，過去有一時期曾為蔣介石做過某些特務工作，其人買空賣空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也不要信任他。

（三）上列六點最好由平市黨委派一可靠同志，經過傅作義親近的人（出城談判之崔某如何）的引進，當面直接告訴傅作義，並告傅保守秘密。如張東蓀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則張可以不出來。[21]

無論當事人還是後世史家，都習慣將這封長電稱為「軍委六點意見」，即電報中的甲、乙、丙、丁、戊、己共六點具體指令。電報的抬頭寫的雖然是「林」，讀者如果仔細揣摩六點中開頭的一句話，這指令竟然是發給談判對手傅作義的。

在古今中外的談判史上，似乎少見這樣的案例。

讓我們再對電文作仔細分析：「六點」中的前三點，針對的是傅作義本人，是在「抑留」他的軍隊已經不成問題的情形下，如何防他本人或隻身投蔣，或「不成功，則成仁」。毛澤東要的是一個活着的、能當招牌為他所用的前國軍三星上將。

接下來的兩點（丁、戊）就是實現規劃的具體安排了，包括人員選定。其中顯得突出的，或者因為史料披露過於零散，而讓後世讀史人覺得蹊蹺的，是在不過數百字的電文中，三次提到粗粗看上去，和戰事沒什麼直接關係的燕京大學教授，也即本書之主人公。似乎不僅毛澤東本人已經認定，和前線將領們也已達成共識：這事就託付他來做吧。

後來事情的發展，果然一環扣一環，按照電報所規定向前推進：一名北平地下黨員李炳泉，將這六點牢記於心之後，返回北平。經電報中指定的崔載之的引薦，李「來到中南海，當面對傅作義『**傳達**』了中央軍委的六條意見」。[22]

1月2日，在地下黨通報消息並帶敦促（包括客人名單擬定）之

下，第一任北平市長何其鞏，出面請傅作義、鄧寶珊（華北勦總副總司令，後來的第三次出城代表）、張東蓀到家中便餐。偶然的老友聚會？何其鞏兒子何嗣珌回憶：

> 傅作義與父親是北伐時期的老朋友，多年來一直保持着聯繫。父親接受黨的指示，長時期地爭取他，從未與地下黨組織隔斷。解放大軍包圍北平城郊後，地下黨傳來黨中央、毛主席爭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戰略意圖，父親約同鄧寶珊、張東蓀等配合行動。
>
> 1949年元旦，父親找傅作義沒有找到；就要鄧寶珊轉告，次日約請傅作義、鄧寶珊、張東蓀等來家吃飯。元月2日，客人到來後，父親首先贈送給傅作義一幅條幅，上面是父親親筆書寫的陸游兩句詩：「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傅笑着道謝收下。賓主坐下邊吃邊談，這頓飯吃了六七個小時，談話始終圍繞着在當前形勢下，傅作義的出路問題，反覆進行研討。
>
> 最後，父親對傅說：「我是北平第一任市長，這座古都，這麼多古建築，能夠完整地保存到現在，多麼的不容易！」「希望你留芳千古，不要做民族罪人。」[23]

席間沒有人提共產黨和軍委電報（或者回憶者不知情），好像一切都出自自己的主張。但起碼四人當中的三人，都已經從不同渠道確知「軍委六點」。

1月5日，措辭強硬的林、聶〈告華北國民黨將領書〉發佈。傅作義再頂不住，遂按照電文中（丁）項的安排，先派政治部主任王克俊把張教授請到居仁堂，得到「同意參加和談、轉達意見」的肯定答覆後，於夜間召見了他的心腹，即電文規定的「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周北峰。讀者此處或許記得1月1日「軍委來電」中毛澤東周到的囑咐：「如張東蓀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則張可以不出來。」但教授還是決定自己走一趟。對這次居仁堂見面，當時讀小學的張飴慈後來聽父親說，爺爺回家告訴爸爸：「氣氛相當緊張，他打着裹腿，槍就放在桌上手邊。」

1月6日，兩位教授在雙方前線部隊的安排下，通過火線。具體情形就是本文開頭時的那一幕。

下午，他們在西山見到了程子華；第二天清晨，坐着大卡車，在一班武裝戰士護送下，下午到了薊縣城東南八里莊。用飯時，聶榮臻出迎。

這顯然不是一頓禮儀性晚餐，聶是來先探虛實的。[24] 將傅作義的「底」摸清後，前線立刻發電報到軍委，明確報告傅的條件：

1）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

2）要平、津以後能有其他報紙（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報）；

3）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

4）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採取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25]

作為在五十年代後即到北京讀書，後來一直在北京生活寫作的人，著者真為這四條中的第二條，即在如此嚴峻時刻，即將獻城的傅將軍，還想着北平的新聞自由，不免心頭一熱。無奈半個世紀過去，北京的報紙直到今天，依舊在中共一家控制之下。

張東蓀和周北峰見到聶榮臻，顯得很激動。周北峰首先表明來意：「傅將軍上次派出的崔載之、李炳泉二位代表，到這裏一個多星期了，談判沒有多少進展，很是着急，就又派我們來了。」張東蓀說：「傅先生這次派我們來，就是希望能盡快達成和平協議，以免北平毀於戰火，二百萬人民遭受塗炭。」[26] ——以他的學問經歷，對軍閥政客的全部心思未必了然。他表達的，是他認為此次使命所在，即他與交戰雙方僅有的共識。

毛的答覆當夜（1月9日凌晨）就到了。雙方久經沙場，在合圍已經完成的情況下，傅作義在軍事上會取什麼態度，本來已在意料之中。所以毛此時的答覆，已將重點轉到政治和經濟的贏局上：如何減少損失、如何獲得民心。即同意1、4兩條，補充「兩軍對峙，軍民糧食均有極大困難，故應迅速解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等。[27]

電報特別強調，「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略」，一定

「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而出此。」「逼傅在12日開始實行」——實行什麼？用林彪的話說，就是「所有軍隊一律解放軍化，所有地區一律解放區化」。時間比毛所定寬限了兩天：1月14日。

對於傅作義所提的第2、第3兩項，毛只一句話：「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為問題。」林彪更提到：「關於出版、信仰自由問題，我們的民主綱領中早有闡述，這裏不多說了。」[28]

手握重兵、殺生無算的雙方，在如此緊急的時刻居然都談到民主政治，是不是因為張東蓀在場？

後來的故事我們已經非常熟悉：

1月9日，雙方在《會談紀要》上簽字。周北峰將文件密藏在衣服夾層，於次日回到北平，立即向傅回覆。傅猶豫着，但眼見時限已到，不得不再派出代表請求延期。周北峰和鄧寶珊到五里橋後，他還在猶豫。直到丟了天津，才最後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協議》上簽了字。

張教授呢？據周北峰回憶，張說：「我不簽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簽字就行了。」對於此後行止，雖然毛主席在電報中特別提到「如張東蓀不願久待，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並派人妥為照料」，[29] 東蓀先生決定還是先回家。前線指揮部遂派車將他送回已經在共軍掌控中的燕京大學。

家裏人見他嚇了一跳：「你什麼時候出來的?!」(指出城)，因為家人都以為他在城裏宗炳家中。到後來知道他人不知鬼不覺地繞過海淀去了趟薊縣，張家後人回憶，奶奶(也就是東蓀夫人吳紹鴻女士)接過教授帶回的對手所贈禮物，一件狐皮袍子，不知是嗔還是讚：「三過家門不入啊！」

共產黨的全勝雖然已在意料之中，但仗其實還沒打完。對於他自己剛剛經歷過的那場冒險，以及那時正進行着的「只要簽字就立即熄火」的第三次和談，「他什麼都沒提，只說在家不能久呆，即將啓程到石家莊見毛澤東。」

2月1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毛澤東起草），[30] 分析了為什麼結局可能更漂亮的「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未能付諸實施：

> 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二十九個鐘頭內十幾萬人解除武裝，陳長捷、林偉儔、杜建時等一齊被俘，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人民解放軍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三位將軍即和傅作義將軍的代表鄧寶珊將軍、周北峰將軍成立了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協議，往後數日又成立了細節方面的許多協議。周北峰將軍是在一月八日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和林彪將軍等談過一次的，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與勝利，難道還不明顯嗎？[31]

張東蓀的名字在一個月內第四次出現在由毛澤東起草的共方文件中。

在這個評論中，毛用「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所傳達的意思似乎是：讀者諸君，請注意和談的主動方不是傅，這名戰犯的代表是由代表民意的教授引出來的——正合了他在1月9日電報裏耿耿於懷的地方：避免僅由「傅作義派人出來具有欺騙作用」。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在傅已經接到周北峰秘密帶回的《會談紀要》，但挨延着不答覆的時候，毛愈來愈不耐煩——這批不識好歹的家伙居然「拒絕我們迫其就範的方針」，妄想「迫我就範」，兩天前曾表現出對民主自由予以優容的「雅量」（也即1953年梁漱溟曾向他要求而吝於給予的），很快就不見了，倒是氣不打一處來：「此外，並提出什麼報紙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們是代表人民說話，向我們要求民主權利。」[32] 這封電報是到二十世紀末才公諸於世的，替傅作義傳達該意圖的張東蓀當時不知道，究其一生也沒有可能知道。

到了1948年12月底，傅作義最終的就範，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無論誰陪（或者「引導」）傅的代表前來，結果都是一樣的。這段時間，到傅將軍面前薦人與自薦，甚至信息已經由地下黨傳到中共中



張東蓀與家人在燕東園34號，攝於1949年

2月1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毛澤東起草），[30] 分析了為什麼結局可能更漂亮的「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未能付諸實施：

> 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二十九個鐘頭內十幾萬人解除武裝，陳長捷、林偉儔、杜建時等一齊被俘，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人民解放軍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三位將軍即和傅作義將軍的代表鄧寶珊將軍、周北峰將軍成立了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協議，往後數日又成立了細節方面的許多協議。周北峰將軍是在一月八日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和林彪將軍等談過一次的，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決北平問題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與勝利，難道還不明顯嗎？[31]

張東蓀的名字在一個月內第四次出現在由毛澤東起草的共方文件中。

在這個評論中，毛用「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所傳達的意思似乎是：讀者諸君，請注意和談的主動方不是傅，這名戰犯的代表是由代表民意的教授引出來的——正合了他在1月9日電報裏耿耿於懷的地方：避免僅由「傅作義派人出來具有欺騙作用」。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在傅已經接到周北峰秘密帶回的《會談紀要》，但挨延着不答覆的時候，毛愈來愈不耐煩——這批不識好歹的家伙居然「拒絕我們迫其就範的方針」，妄想「迫我就範」。兩天前曾表現出對民主自由予以優容的「雅量」（也即1953年梁漱溟曾向他要求而嗇於給予的），很快就不見了，倒是氣不打一處來：「此外，並提出什麼報紙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們是代表人民說話，向我們要求民主權利。」[32] 這封電報是到二十世紀末才公諸於世的，替傅作義傳達該意圖的張東蓀當時不知道，究其一生也沒有可能知道。

到了1948年12月底，傅作義最終的就範，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無論誰陪（或者「引導」）傅的代表前來，結果都是一樣的。這段時間，到傅將軍面前薦人與自薦、甚至信息已經由地下黨傳到中共中

俯覽歸此福山麻學寫　飛高秋未傳書 [illegible]

[illegible] 當此空潮村前病消對樹激與遺跡幾多定危

城歸保此展為諸志流以此所當前具琴琅詩徹事遺風留先生

一笑平安頌

庚寅立秋 [illegible]

讀丈如劇城四面題後

敍述層疊數名翁劇淺楪似馬驚写 [illegible] 己識金字堂

山光宵影陽藏出飛符書遺功不細承時前信賦類上

[illegible]

西山劇城世譚若語傑新批述古雅篇

庚寅四月枝巢夏仁虎拙稿時年七十又七

健將真逼古城陰急景頹年粉筆侵

三十吾猶見真諦署人心靈業究那徽天章寶局

杜祺閑世塵襟辟舊令指看生金夕照賞沈吟

杭州葉云

捧卷倚長歌乎生將何適矣此百年所祕倚毛錐

壯哉吾東觀乃尔奇營造天下士排史奏扶持

數聊往昔民猶蓋識難時不尚墨雅守祗屑田單如行

至民是洗丝出郭歧往步越黄莊望冰積長故夜

宿三家店豆腐寒志在暮冰橋石门八一嗯红旗軍内一

湘鬼李棗吉放群大计逸心定碉陰大如吳国域百嵩

家国戰果卯老兒回租義力日强乳自毅層史與追屋

人物民之歌致所谓是者什比長所牲樓閣君今言快

往為仲思雷絲典李志厥下使人悲則勝如寡嬋高蹈

實己卑大木養将頹一繩不可維根绝足扶數衆志

國以全天唯為群象故国程京郊终留细事可時多

寧至願

庚寅六月北京林崇鍇七十二歲作

猶手戎驻乎国域命之所后周保乃伯郵系撫 [illegible]

表於傳秦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滿庭芳

由數封信箋裝裱起來的「圍城題記」，載有張東蓀的朋友褒揚其斡旋之功的題詠

圍城四章 并序

戊子之冬幽都罹兵城守二十萬人收與或三倍之生命可
慮不自意能全將與寧宜於此因賦矣
吾輩生才殁於偽之後見兩年間動隨動當釋兵解大難
當始蹈晦出于言外
吾輩儒生也儒生論物仁民之功偉業二千年來號言者用愛民為
不能為之以為心默誦其文新以紀義之趣異成此詩數章篇

[illegible]

萬山無迭氣縱橫海淀河環擁舊京閱古應知古樹有人
留說夢前朝于門為聽鶯啼青閑萬戶不辨城外著兵戈
難去息望多少渡鉢臺
寸碁難挽許方一夕鄧原無懈張偉眼婦飾奇材稷御讀
還繞津宮情遠民流共圍城要區條光搖北斗長不遠同夫
喜見街衢風物無物輕飆
未識古難竹林叢衛室富盡寄西軍甲刀斗突長樯序上
瑤瑤韜殺挂一語解紛叔玉貌萬家從容頌無波輪轉奏帳
歸來自仰與學莊論物齊
老病常聞九秋無養生事何有生鄉老來紙筆鄉人評論門
萬花常流能古好心期離體遠古今強力勉加督詩成之是滿年
平回首鬱魂縷未散

庚寅元宵前公后鄧之誠書于成府村居之五石齋

「圍城題記」之一：鄧文如的《圍城四章並序》

滿庭芳

萬姓生靈，五朝都會，千年文物風流。重樓連棟，歌舞不知愁。一旦風雲變色，覆巢下、完卵難留。堪憐見，銅駝荊棘，灑淚對神州。　書生談笑戰，折衝杯酒，慷慨陳謀。頓日消雲霧，瘴淡散浮漚。尚有東園桃李，春風待、還自歸林。何須論，名山青史，一笑付陽秋。

日敵降後，瘡痍未復，蔣氏重為內戰，不惜民命人財，其情可以違
離不旋踵，一敗塗地，兵災迫於睫，邵兩軍角抵，玉石堪虞。
東蘇先生倡議和平，乃冒險入城，奔走之斡旋，以為保全，予則追步驥
尾，聊效贊襄，議定，君更起風雲，縱鋒鏑，以予劉累杯酒之間
化霧瘴為光明，闔城無種萬姓騰歡，動競告。後君乃歸去，更執
教鞭，予亦埋首窗几，更理舊業。書生之事不過如此。從茲干戈
永息，卑書說一得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南宋徐君寶妻有滿庭
芳詞，膾炙人口，因效其體，為贈，惟哀而不過，異而工拙不同耳

庚寅上元後二日中州張伯駒





「圍城題記」之二：張伯駒的《滿庭芳》

望海潮　致鄰子江

鴻圖千載，龍宮萬珠，燕京自古神都。三邊還撤，三軍自退，殘棋著士全輸。霹靂震浮屠。北齊書薛孤延傳　歎鐵圍誰解，玉碎慈予奮起，衝塞踏嶮，豬口疾聲噂。飛鳶稱亦傳書。顛請以方保護父北城及民令直雷廷

當頭對文化團體為義殊對古城　幸風雲衛轉，雲霧潛紆，羽檄朝通，珠盤夕定，危城頓保無虞。萬豬悉散，媒細郎當，舞裏擊壞詩衢事。遍感空先生一笑早忘諸。

庚寅孟陬七十四叟娟淨傅嶽棻倚聲







「圍城題記」之三：傅嶽棻的《望海潮》

讀文如圍城四章題後

[illegible]逸老生教育翁劉扶[illegible]化鳥鸞弓幕篤已識全軍墨

[illegible]光曾知陽識出飛符書運功不細衣時廣信賦難工

[illegible]作最難民賦有所諷喻俟[illegible]抽素書卷去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者

[illegible]閱世淳善語便歡相從策短筇節

庚寅正月枝巢夏仁虎稿時年七十又七

[illegible]運古城陰急景凋年弱筆侵排難惟慰

三寸舌猶危真謂署人心霞巢完卵徵天幸[illegible]局

枯[illegible]閱世深讀罷戲令猶急速令春夕照費沈吟

杭州巢雲



「圍城題記」之四：夏仁虎的《讀文如圍城四章題後》和巢雲的題詠

央總部的，也不在少數。比如最早動議並且一直張羅策劃的彭澤湘；比如毛自己最信賴與親近的老師符定一；比如傅的老師劉厚同（他有女兒在延安）；比如老市長何其鞏和下一任市長何思源，還有更加散淡的侯少白或張伯駒……或者在最緊張的1月16日，應邀出席傅作義「聽意見」西餐會的徐悲鴻、朱光潛、許德珩、楊人楩等。

為什麼單單選張東蓀？

毛澤東要借重的，是張東蓀的份量與社會信譽，顯示共產黨「北平和平交接」用心最光彩的一面：文明與仁義。他要借重張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由他將共產黨形象傳達出。起碼毛當時認為，與新華社的報道相比，張教授親口說將更加服人。

毛的設計完全實現。

1月下旬，傅作義宣佈了北平城內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2月3日軍隊入城。

在《會談紀要》簽訂後回到北平的當天傍晚，張教授在燕京禮堂作了那個著名的「老鼠與花瓶」的演講：

> 北平是個花瓶，傅作義是瓶子裏的老鼠。老鼠是可惡的，人人都想消滅它，但它卻躲在一個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滅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採取和平方式，用和談的辦法解決。

聽眾把禮堂擠得水泄不通。大家一致認同他的比喻：北平攻守雙方力量之比，恰如大漢子和小老鼠。而那滅鼠的人，不但很知道花瓶的價值，更有珍惜之心。張家後人多年之後還記得當時情景：「很多人寫詩吹捧，他自己也有點飄飄然起來。」

飄飄然是家人對他的打趣。他看重的，其實是箇中的奉獻、艱辛，以及歷史上的份量。張家至今保留着一幅由數封八分信箋橫着裝裱起來的「圍城題詠」，記有鄧之誠、張伯駒、林宰平等人詩作，褒揚同為文人之老友的斡旋之功。條幅的最後是東蓀自己寫的幾句話：

> 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厚同、侯少伯、彭岳漁、張藁碧倡議

掩卷倚長歎，吾生將何為。懸懸此百年，所恥惟毛錐。
壯哉吾東蓀，成就乃尔奇。曾為天下士，排患兼扶持。
嗷聊徒苦民，指燕識謝時。不尚墨翟守，詎屑田單知。行
至窮居是，法然出郊歧。徒步越黃莊，堅冰積長陂。夜
宿三家店，呈寂寞志疲。易水插石門，八一飄紅旗。軍門一
相見，聿乘前後辭。大計遂以定，屠險志如夷。圍城百萬
家，遂脫累卵危。君回飛豕力，日結影自移。歷史此進展，
人物從之馳。我所謂是者，作此無所措。伏閱君之言，快
然為伸眉。書賒與李志，厥之使人燕。劉膝如寒蟬，高蹈
實已卑。大木憂將顛，一繩不可維。眾繩足扶顛，眾志
國以支。天唯為群眾，故用旋京師。餘皆細事耳，時名
穿是期。

庚寅六月北雲林志鈞七十二歲作



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后同、侯少伯、彭岳漁、張叢碧倡議罷
兵，以保全人民古物，此余為雙方信使出城接洽之實也。不佞
為懼其事，而一言以解，事後友人戲之者比比，余每自視生平
著七十餘冊矣，不抵此一行也。因繫此幅留示子孫。　東蓀自識

「圍城題記」之五：林宰平（志鈞）的五言長歌和張東蓀自識

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慄慄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誦，余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冊，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斷句標點為著者所加)

對於不覺之中做了共產黨的啦啦隊，張教授既不曾細想，也沒有察覺。他依舊處於巨大的興奮中——為北平、為民眾、也為自己的理念。不少人記得他對自己此舉所作的那個評斷：「北平和平解放，平生第一快事。」

快事之後，就剩下閉門著述了麼？不，作為中共尊貴的客人，他，還有經他推薦的燕京與清華同美國關係密切的教師，將出發趕往西柏坡——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

想來，如果八個月之後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推舉發生在這時候，毛澤東是篤定能得到全票的。因為在出發前往西柏坡的時候，潤之先生在張教授心目裏，是夠格做國家首腦的。

註釋

1. 周北峰(1903–1989)，山東永濟人。曾留學法國，獲碩士學位，歷任哈爾濱法學院及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1938年曾被傅作義派到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後作為傅部代表與八路軍會商。與侯少白並稱為傅系最具學識的將軍。去世前歷任北京市政府參事、綏遠民政廳長、內蒙古自治區水利廳長、區政協副主席、區政府副主席、區人大副主任。
2. 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225–234。引文有刪節。
3. 毛澤東：〈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1948年11月14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360。
4. 董世桂、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頁344。

5. 〈準備隔斷平津包圍唐山殲滅蘆台塘沽之敵〉(1948年12月8日)、〈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1948年12月11日)，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40–343、360–362。
6. 陳伯鈞：〈兵臨城下——回憶解放北平〉，載《紅旗飄飄》，第十四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頁104–120。
7. 194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軍委致林彪、羅榮桓、劉亞樓電。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92–393。
8. 董桂之、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頁71；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頁225–234。
9. 侯少白同傅作義談了以後，告訴彭澤湘，傅認為在當時環境下不能同彭面談，也不便接受李濟深的信，但委託侯少白作他和彭的聯絡人，雙方意見由侯傳達。經過幾次間接交換意見後，傅作義就表示願意考慮彭所提出的問題。這時彭就約民盟在北京的負責人張東蓀及農工黨負責人張雲川共同進行。彭同時找到符定一，由符定一幫助彭和中共取得聯繫。符定一通過中共地下黨的安排，即赴石家莊與中共面談傅作義提出的和談問題。參見馬連儒：〈彭澤湘：輝煌與坎坷伴隨一生〉，《人物》，2001年第7期。
10. 毛起草以聶榮臻名義發出致彭澤湘電文為：「符老先生帶來虞寒(虞寒，即七日、十四日——著者按)兩日大示收到，當即轉呈上峰，弟個人認為某先生既有志於和平事業，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莊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故希轉達某先生。」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95。
11. 「(一)東北野戰軍提前於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關內開動。(二)不管蔣、傅軍是否撤走，仍按原計劃休整到十二月半然後南進。兩個方案何者為宜，望考慮電覆。」(11月17日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92。
12. 「望你們立即令各縱隊以一二天時間完成出發準備，於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軍或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行進……」(11月18日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93。
13. 「部隊行動須十分蔭蔽」，「請令新華社及東北各廣播台在今後兩星期內

多發瀋陽、新民、營口、錦州各地我主力部隊慶功祝捷、練兵開會的消息，以迷惑敵人。」(11月20日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96。

14. 11月18日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93。
15. 具體為：「華北剿總」五十萬軍隊，已經被分割、包圍在五個地塊上，攻擊平、津、張、唐諸敵之作戰業已開始。(12月11日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15–416。
16. 據周北峰回憶，傅作義派他談判前，曾對他說：「前些日子胡適偕司徒雷登來北平，曾談過讓我退守山東沿海一帶。」孤證，暫立此存照。1949年，蔣勻田在華府與魏德邁見面，談到美海軍青島基地——目的在於支持平津三角地帶傅作義的守軍，牽制中共軍隊不得即刻大舉南進。前提是傅作義守軍「恐將犧牲，無法撤出」。參見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頁229。
17. 1948年12月底，劉仁向林、聶作關於北平地下黨工作的全面彙報時說，如果「傅作義不接受和談條件，我軍要攻城的話，有人給我軍當內應，不會費多大力氣，就可以進城的」。參見董世桂、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頁162。12月23日，中共已經決定接受侯鏡如的九十二軍起義，「該軍最大作用是便利我軍攻城，最好該軍能於適當時機在取得傅作義信用的條件下，控制一兩座城門，或於我軍攻城時奪取一兩座城門，或給我軍偽裝部隊以進城的便利。」(12月23日電)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27。
18. 〈將革命進行到底〉，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頁1372、1377、1378。
19. 據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資料》(內部資料)1983年第1期頭條文章〈自述〉，作者彭澤湘講述了從11月中至12月底，他在北平與各方聯絡的情況，特別提到這一工作「直到12月31日傅作義答應派代表出城會商為止」。可見中央軍委電文中所提兩次地下黨來電，與彭的居間工作有直接關係。
20. 指12月23日發給人尚留在平津前線指揮部的他的代表崔載之的那一封。與第一封比較，傅這時已經放棄自己的「建國之道」，表示「絕不保持軍隊，也無任何政治企圖」，但希望給他一個「轉圜時期」，在這一時期，「盼勿以繳械方式責余為難」——即毛在軍委來電(丙)中說的「所取

態度不實際」。崔為傅作義之心腹，傅系《平明日報》社長，第一次前來談判的代表。

21. 「軍委六點意見」目前找到權威機構公佈的全本，為北京市檔案館編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頁54–55所載。引文中粗體字部分為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的新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75)一書引用的版本所有，但《北平和平解放前後》沒有。
22. 董世桂、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頁172。注意該書作者(軍人作家董世桂)這裏的用詞：傳達。
23. 何嗣珌：〈何其鞏：北平第一任市長〉，「千龍新聞網」。
24. 至於聶是怎麼探的，他本人的回憶錄裏沒明講。周北峰說是共方背着張東蓀特別通知他：「聶司令員在東邊的那個院子裏，請你過去談一談。」但在董世桂、張彥之的書裏，聶則與張東蓀單獨談話。
25. 1949年1月8日林聶致軍委電報。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31。
26. 王紅雲：〈北平和平解放和談記〉，《縱橫》，2002年第1期。
2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31。
28. 董世桂、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頁185。
29.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頁59。
30. 該篇評論題為〈面臨全國革命高潮和國民黨大崩潰　偽南京政府被迫同意北平和平解決　全國問題的解決就有理由遵循這一道路〉。
31. 〈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載《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278。
3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32。

二

正月：西柏坡

如今的70後、80後們，很少知道保安與西柏坡了。作為紅色中國之國都，史書上多提北京（1949– ）與延安（1936–1947），間或有人説説瑞金（1932–1934），非黨史行業而知道西柏坡（1948–1949）的，多已達書癡級。

西柏坡其實是中共的驕傲。從計謀疊出、調兵遣將而最終得到江山這一點而言，毛澤東在這裏真是把他的才具發揮到了極緻。正如周恩來後來説：「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裏，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1]

我們的主人公和他的朋友，在國共內戰的第三個戰役接近尾聲的時候，迎着凌厲北風，踏進了這間司令部。

他們大約是1月15日前後出發的。一行四人，全部是「民主人士兼大學教授」。

民進中央理事雷潔瓊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她的夫君犯罪學家嚴景耀，與她同黨派、同大學、同系。另一位是清華大學教授費孝通，當時不僅在業務上已如早晨十一點鐘的太陽，在思想文化界也非常活躍。[2]

為什麼單單邀請他們四人？

據雷潔瓊回憶，他們夫妻是受人在香港的馬敘倫先生之委託，到西柏坡與中共中央共商大計。[3]

民盟費孝通的見解沒這麼籠統，也沒這麼簡單。在晚年（2000

年）回答朱學勤提問「當時去西柏坡是怎麼一個去法」的時候，他只含糊回應：「這個內幕不知道了。被挑的人，我、雷潔瓊〔和她——著者按〕的愛人、張東蓀……他是政治活動家。……首先是張東蓀把我引到西柏坡。他是帶隊的。」[4]

至於張東蓀，我們現在確切知道的，只有數日前，對峙的雙方在薊縣簽訂《會談紀要》時候他說的那句話了：「我不日便到石家莊去，不回北平了。」（周北峰回憶）[5]；「我這次不回城裏了，準備先返回燕京大學，然後啓程去石家莊拜見毛澤東主席。」（聶榮臻回憶）[6]

作為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在北平地下黨的安排下，他們乘坐大卡車，由八名解放軍戰士護送，從西郊八大處出發，途經石家莊，好像在那裏等了幾天，[7] 最後直奔西柏坡。作為後世讀史的人，很少有人不存疑惑：啊，在那幾天！[8] 毛澤東有時間見閒客？

或許不算閒客，因為北平快解放了，共產黨要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了，總得經過一個手續，取得全國（甚至世界）認可吧。他們的應邀，以及隨後享受到的高規格貴賓待遇（以當時的標準），或許就是這大策略中的一環。

據雷潔瓊以官話回憶：

> 周恩來同志把我們介紹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共領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同志和我們夫婦親切握手問好，與我們共進晚餐。他談笑風生，氣氛十分活躍愉快。飯後我們圍坐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徹夜長談，聆聽他關於如何把革命進行到底、知識分子問題、對民主黨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國建設的談話，使我得到一次畢生難忘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9]

費孝通當然也有說套話的時候，[10] 在晚年，並且面對自己出類拔萃的學生，倒沒再浪費讀者時間，說了有實質內容的話，坦承這次前往，是他日後政治生活的起點：

> 我那時是知識分子的頭頭，經常發表政論。符合知識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識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國，我兩

面都有了，所以那時是知識分子的代表。我當時是中國最好的 columnist（專欄作家）……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權。……

我與政治的關係，首先是張東蓀把我引到西柏坡。……一共四個人。

朱學勤插話：「那很奇怪，當時比費先生更有知名度更有影響的人還大有人在啊。」對此，費孝通承認：

多了。……他（張東蓀）對我不錯的，但我不太買他賬。我在燕京大學時旁聽過他的一門哲學課，我聽不出什麼道理，到考試的時候，他給我70分。我沒有70分的記錄的。我是記得他的賬的，他如果給了我90分，我就服了他了。這很有意思。他同我一直不錯的，我到西柏坡去，就是真正成立聯合政府，共同綱領就是這時寫的。他帶我一同到西柏坡。……

儲安平想去沒有去成。他還怪我怎麼不叫上他。他也不知道內幕。但我們知道背後肯定有一套東西在運作。

什麼東西，又如何運作呢？2000年俄羅斯解密的斯大林毛澤東秘密檔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他們這些憂國憂民的學問家，在中共棋盤上的位置。

解密檔案公佈了毛在大約一年前（1947年11月30日）發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在彙報了戰事進展後，毛提到抗戰勝利後如何對待曾一同爭民主、爭自由的盟友：

隨着民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不復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們黨的人，雖然它的多數領導人是動搖分子。他們迫於國民黨的壓力解散了同盟，從而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11]

毛在這裏指的，是1947年11月6日主席張瀾正式宣佈「民盟總部

解散」(意味着共產黨在國統區失掉了有組織的吶喊者)。明明知道民盟解散是出於「國民黨的壓力」(包括軍警特的磨刀霍霍)，卻歸結為受害者的「軟弱性」。此事件當時具體出主意的，即在誰都不肯表態的時候向張瀾遞了一張小條的，實為自詡「內方而外圓」的黃炎培。讀史的人一直弄不大懂，在1957年，毛為什麼毫無道理地對任之(黃炎培)下那樣大的狠手(六個子女，五個被打成右派)。從這封信的口氣，或許能看出些端倪。

不知為什麼，斯大林在拖了幾個月之後(1948年4月20日)，才就此觀點回電。他說：

> 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它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長期存在，中共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要保留自己的領導權，也就是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佈為聯合政府。[12]

其實，「打倒獨裁、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也不用斯大林給他們上課。因為早在半年前，在1947年10月解放軍發佈的宣言和12月為中共中央提交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裏就提出了。

但斯大林4月20日那封回電，可能還是有些作用，因為到了1948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剛剛搬到西柏坡，毛澤東就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擺上首要日程。在他致電中央其他幾個書記，通報即將召開中央會議的時候，列在第一位的，就是「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13]

這「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的甄選特別重要。因為共產黨(包括蘇共)要的，並不是什麼平等聯合，而是一黨絕對領導下的好看場面，雅稱「同舟共濟」。究竟哪些有實力的前同志既請得動、撐出來的場面又最看得過去，就大有學問了。除了宋慶齡必須

擺在適當的地方，毛澤東將李濟深、沈鈞儒定為首位，於5月1日親筆致信。

對方響應熱烈，載入史冊的「五一口號」出籠。[14] 雖然強調「必須由參加會議的每一個單位自願同意，不得強制」，周恩來還是開出共產黨最倚重的二十九人名單。[15] 為後世史家大書特書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從此正式上了軌道。[16]

二十九人中有張東蓀和雷潔瓊，沒有資格尚淺的新星費孝通。

估計就在這前後，北上參與籌備的邀請送到張東蓀手上。去還是不去？或者用毛後來的話，翻成「這賊船，上還是不上？」張家後人記得：共產黨曾請他到哈爾濱參加政協，張東蓀說：課還未完，暑假後即去——但實際上沒有去。他心中的這番猶豫與最後的推託，與他的盟中同志張瀾、羅隆基，其實是一樣的。據葉篤義回憶：

> 1948年，周新民曾幾次寫信給我，勸說張瀾去香港。張瀾先是說：「任之（黃炎培號）去我就去，任之不去我也不去。」後來黃炎培沒有給我們打招呼而獨自離開上海了。張瀾又說：「努生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羅隆基說：「我同他們不一樣。他們的行動是比較自由的，而我是被拘留在療養院裏的。我的行動太不方便。」[17]

後來同為盟內領袖的史良出面規勸羅隆基的時候，羅隆基又抬出一個新的理由：「浦熙修現在被關在監獄裏，我一走就一定連累她。」

張瀾還是說，羅要不去，他也不去。……時間一拖再拖，拖到1949年5月10日，國民黨特務終於把他們扣留起來。

這一扣，反倒成就了共產黨。不久，被中共地下工作者搭救出來的張瀾等人，已經不得不立即前往北平，拜望毛主席了。

扯遠了，再回來講西柏坡的故事。

如果僅從雷、費二人在共產黨中國穩步上攀的高位看，張東蓀這回還真挑對了人——這兩位與中共的關係，可謂善始（於西柏坡）善終（非共產黨人士而長期擔任高官並獲高規格葬儀）。讀史人一般容易忽略嚴景耀。在名額如此珍稀的情況下中選，當然不會僅為陪伴

夫人。嚴本經燕京選派赴美國讀博士，卻在那裏接觸並信仰了馬克思主義，還曾到蘇聯教學並研究。雖然思想左傾，司徒校長對這個自己一手培養的高足（以及杭州「小同鄉」）卻毫無芥蒂。

這對夫婦所在的民進[18]一直保持溫和好乖特色，不大具有鮮明獨立政治見解，此即雷潔瓊仕途順利之奧秘所在；費孝通略有不同：民盟人才濟濟、大佬雲集，張東蓀向毛澤東推薦他，是因為愛才。但要越過諸位大佬，比方說在1949年就當上中央政府副主席，一時也沒那麼容易。所以他的發跡，除了賞識他的共產黨一路護航[19]和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之外，更要靠他盛年之後，只過着中共安排給他過的政治生活，而在極有前途的社會學研究上，幾乎毫無建樹的自我犧牲上。

張東蓀本人呢？

若論他和共產黨的交情，絕非雷、費兩位可望其項背。在這一節，我們先不說他與陳獨秀的私交；不說他早在共黨魁首之先，就會過了真正的中共締造者（共產國際派來的維金斯基）；不說他和早期中共理論鼻祖的論戰；不說《八一宣言》後他怎麼力排眾議，呼籲社會容納共產黨這樣一支民族自救的政治力量；不說他如何與彭大將軍簽訂共同抗日的協議；不說他冒着性命危險為「中共地工」斡旋漢奸；不說他在老政協上的表現；甚至不說共產黨最看重的「是否參加偽國大」上舉足輕重的選擇——這些，我們都會在以後的故事裏從容道來。只說說中共中央書記處遷到西柏坡之後，他作為民盟非「親共左派」的領袖人物之一，究竟做了什麼，使得毛澤東隨後作出一系列頗令人費思量的舉措。

至今未見學界對共產黨在1948年打定主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而不再提「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做出細緻推敲。

「政治協商會議」這幾個字，直到1948年4月還沒出現在當時共產黨的語言裏——或許在他們心中，重慶的那個「政治協商」，自1946年被蔣介石、陳立夫破壞以後，已經成了一件往事，一個歷史詞彙。

4月25日，毛澤東通知他的同志們開會的時候，說的還是「成立

臨時中央政府」，但兩天後的27日，「政協」這一名稱突然出現在毛澤東寫給劉仁（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的信中，請他「經過妥善辦法告訴張東蓀、符定一，感謝他們的來信，對他們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表示熱烈同情，並邀請他們二位及許德珩、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開會時間在今年秋季」。[20]

信中所說的張東蓀、符定一來信，是一封什麼信呢？[21] 毛澤東特別囑咐「上述各點請首先告知張東蓀先生，並和他商量應告知和應邀請的是些什麼人」，在這裏，張、符二位所得到的信賴、倚重，甚至超過了「五一口號」的兩位頭面人物。為什麼？

讀者切不可小看這一名稱的確立，這是共產黨在中國當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據：中央人民政府是由各政黨參加的政協所選出的。共產黨政權不是打下來而是民眾推舉出來的。

如果聯繫到半年後在和平解放北平的拉鋸戰中，對這位燕京大學教授超乎尋常的倚重——召開政協的主意，會不會是來自這位平日說話不多、但將「協商與對抗」看作是現代社會基本要素的老政協會議代表？而把「目擊、協調北平和談」這一歷史榮譽「送」給他，除了信賴，帶不帶點答謝的味道？

其實，在「政協」的主意納入運作、「五一口號」也提出之後，毛澤東還曾有過動作，想將張東蓀拉得再近一些。這就是5月31日致函劉少奇等四書記，考慮將張東蓀等四教授盡快接到共產黨治下的華北政權做官的主意。[22] 這計劃想來沒有得到回應。

不知4月27日那封信劉仁是怎麼傳的。7月間，在符定一率周建人、劉清揚、吳晗、楚圖南、焦菊隱、馬彥祥等民主人士到達華北解放區的時候，沒有張東蓀。後來，在8月成立的華北人民政府裏，僅張東蓀的一位同學、同志、密友外加親戚接受延攬，擔任副主席，即1949年後出任最高檢察院副院長的藍公武。[23]

據雷潔瓊回憶，在他們四人的西柏坡之行（1949年1月）中，毛當時還提到「將革命進行到底」，毛說：「革命勝利後就要召開新政協，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民主黨派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同中國

共產黨採取一致步調，真誠合作，不要半途拆夥，更不要建立『反對派』和走『中間路線』。」[24]

毛說這話，究竟用的是什麼口氣，開玩笑？還是鄭重警告？不具幽默感的雷副委員長，是無法在她的官樣文章中傳達出來的。

據《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誌》一書記載，就在那次，張東蓀送給毛澤東一本封筆之作《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毛澤東回贈一套東北解放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25] 張東蓀向來看重自己嘔心瀝血之著作，也有把新出版著作送給知音的習慣。比如1946年參加老政協的時候，就曾將《理性與民主》贈周恩來和吳玉章。到了親身介入的北平圍城解紐大功告成，他那時或許認為，作為士、作為學者、作為以言論干政的獨立知識分子，他與面前這個相識已久[26]但一直未深交的、如今即將成為一國之首的湖南青年，在未來中國應該怎麼治理這一話題上，是有共同語言的。

張家後人證實了這本《毛澤東選集》的存在：深藍色布封面（可算是當時的精裝書），後來一直保存在張東蓀的長子張宗炳手裏。張飴慈在父親家中見過，只是沒有毛的簽名，為此張宗炳還覺得有點遺憾。這一細節提示我們，第一，互相贈書時，張東蓀沒有要求對方簽字；第二，他並沒有把這書當成手邊案頭讀物——像沈鈞儒那樣（「書桌上滿是毛著」），或是向客人展示的阿物兒——像郭沫若那樣（「他滿牆掛的都是毛詩詞」）。

張鶴慈在六十年代初當大學生的時候，讀過這冊珍本，不僅讀了，還直接導致他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統制的反感。這是贈書者當時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吧：

> 我對毛澤東的反感，源起於讀他的解放前老版的毛選一卷本，那是毛與我祖父的見面禮。我突然發現，〈論聯合政府〉中的許多文字和新版的都不一樣，尤其是提及美國的部分，我當時的感覺就如抓住了小偷：修改可以，但必須有說明。

這部毛著「珍藏版」在文革中被抄走。如果是從張宗炳家抄走，北大生物系63級的同學應該有人知道是誰幹的。

張東蓀帶到西柏坡的，是《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增訂四版。據《觀察》雜誌廣告，該書1948年秋業已付印，到1月份，正是書已寄到北平可以送朋友的時候。之所以稱做「增訂」，是因為將去年7月完稿的「書後結語」，即〈增產與革命〉，正式放到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書裏邊。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沒有像往常一樣一概否定革命，而是認為：「一個社會或國家倘其演變到生產不能再增的地步，則這個國家非革命不可。」

至於革命的對象，針對中國的現實，他指的是完全不事生產的地主和豪門與官僚資本。對於那些「不但沒有把舊有的生產限制的藩籬衝破，並且亦沒有開闢出來增加生產的新天地」的種種「起事」，他認為根本不配稱為革命，無奈「這一類的革命在中國為獨多，我曾名之為換朝代」。

這樣的議論，在1949年1月，正奉行改天換地的毛澤東大概不會覺得被刺傷——不僅「換朝代」對他而言沒什麼負面意義；「開闢增產新天地」——如果不問基礎與制度，他的夢比誰都浪漫。

估計毛有機會讀到他的文字。因為當時北平地下黨設有一個第四室，主要任務是對國統區報紙雜誌進行剪輯整理，並將其中與城市工作有關的內容摘出，編印成簡報送給領導參考。只是不知在西柏坡他們有沒有機會就此深談，否則發表出來又是一篇與「窯洞隆中對」並駕齊驅的「泥房隆中對」了——只不過議論的要點沒放在民主制度，而是放到了普通民眾之物質幸福不可隨意剝奪上。這是因為，雖然張東蓀沒有一概反對革命，但他對革命加了一個限定條件，即「以增產而求平均，並非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他認為：

> 這其間區別甚大，因為均貧富既非增加生產總量，並且同時對於增加生產的努力進行上反是一個妨礙，故必須力避此種過激而有害的舉動。須知凡是一個革命，如果僅是把經濟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辦法來平均一下，其結果並未使生產總量有所增加，這個革命終歸失敗。

此時，距離揪住劉少奇的「剝削有功」還有一年；距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還有七年；對東蓀先生的高見，即將進城的將領們或許還沒有什麼抵觸。

大約也在這前後，太湖林屋山暴方子之孫暴春霆，帶了《林屋山民送米圖》圖卷，到燕東園拜望索題。張東蓀寫道：

> 竊嘗讀史，每當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時期，無是非，無賞罰，固不僅貪婪無能而已。……蓋未有貪污橫行，是非不辨，賞罰不明，而能永臨民上者也。[27]

至於眼下被廣泛引用的《張東蓀傳》中關於張東蓀與毛澤東在外交「一面倒」上的當廷面爭，包括見面的氣氛甚至對話，著者傾向於是後人杜撰。[28]

外交是否「一面倒」，這個已經超越外交範疇的政治選擇，對毛和中共太重大了。那時候，他希望前往蘇聯覲見斯大林的要求一次次被駁回，而斯的代表米高揚要幾天後才到；美國的對華政策，也還沒摸到實處……。面對着四名任教於有美國背景大學的教授（其中三名還是留美生），毛或許會很有意地提個頭，觀察他們的反應。這其實也只能從張家後人的回憶裏得到片面證實。

回到北平之後，對西柏坡一行，張東蓀僅和他的長子有所議論。到文革時候，有感於對劉少奇的批鬥，他又與長孫張飴慈談起西柏坡一行，總的説來，「回來以後非常失望」。祖父對他說：「在石家莊西柏坡見到毛，話不投機。……毛大談梁啓超。並説將來外交上『一面倒』。」

不知在當時，毛有沒有對張東蓀説，讀他和梁的作品，早在青年時代做着「救國夢」的時候就開始了。那是1921年1月1日、2日兩天，毛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啓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

張飴慈記得爺爺還説，他們談話的時候，「劉少奇進來又出去

了。毛在他走後說：『這是我們黨裏犯錯誤最少的人。』」張東蓀甚至沒有告訴自己的親人，共產黨方面曾問過他對做「北京大學校長」的興趣——這都讓他覺得氣悶。而這氣悶，要到遭整肅後的1959年才在他的詞作中抒發，[29] 這我們以後還要談到的。

1月31日半夜，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傳來。周恩來看完電文，當即派幹員連夜出發去北平，以備黨中央遷入。

2月1日，周恩來安排滯留李家莊的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一起進城接收。雷潔瓊夫婦參加進這一隊伍，還在燕京當了一夜東道主。張、費也同車回校（「入城式那天回來」），只不過沒有那麼激動，也沒那麼投入就是了。

同一天，2月1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五十六人聯名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裏邊沒有張東蓀。

他沒有參加致電，毛卻在自己為新華社寫的述評中點了他的名。[30]

2月4日，《人民日報》北平版創刊。清華、燕京教授發表宣言：〈擁護毛主席聲明〉，張東蓀名列其中但沒有領銜。

到2月25日，當林伯渠陪同趕到東北的民主人士乘火車離瀋抵達北平的時候，「到車站歡迎的有中共方面的林彪、羅榮桓、薄一波、葉劍英、彭真，各界民主人士中有張東蓀、胡愈之、楚圖南、千家駒、雷潔瓊、費孝通等及全國學代會代表、鐵路工人代表共百餘人。」在這條消息裏，他的名次排到最前邊。

3月25日，毛澤東一行乘坐汽車從西柏坡出發，到涿縣換火車抵清華園車站，在頤和園稍事休息後進北平。從留下來的照片中我們看到，張東蓀作為「各方民主人士之一」出席了西苑機場的歡迎式。他只穿了一件呢大衣（裏面還是長袍布鞋），站在譚平山與沈鈞儒之間，背後是陸志韋、李維漢和朱德。

當天晚上，毛澤東約他的非共產黨朋友到頤和園樂壽堂吃飯，張東蓀也在應邀之列。晚飯後，即開始座談，一直談到次日清晨。

共產黨拿下了古都北平。毛澤東面臨着一個新的戰場——心靈



1949年3月毛澤東進北平時的情況（圖片來源：新華社）

8. 1月14日，解放軍向天津守敵發起總攻。三十小時後雙方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協議》十四條。21日，傅作義宣佈北平城內守軍接受和平改編。接着，最重頭的：斯大林代表米高揚將於31日到達。估計他們是在協議簽定之後出發的，一直留到重頭戲開場。
9. 雷潔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真理〉，《光明日報》，2001年6月12日。
10. 1998年紀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五十周年之際，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赴西柏坡參觀學習。民盟中央名譽主席費孝通說：「撫今追昔，我認為五十年前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聚集在中國共產黨周圍，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一個正確的歷史選擇，是民主黨派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勝利。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11. 轉引自A．列多夫斯基編，馬貴凡譯：〈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 同上註。
13. 1948年4月25日致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的電報，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04。
14. 「五一口號」非同小可。因為接下來的新政協將以此劃線：各民主黨派凡贊成積極響應者，可以參加新政協，後來者則需審查資格。新政協籌備會關於代表資格的政治標準是嚴肅的。有些黨派、有些個人雖然提出申請，卻沒有被接受；也有些黨派、團體、個人，卻被主動邀請參加。負責擬訂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的是第一小組，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第一小組提出處理意見，再報全體會議決定。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單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開響應「五一口號」的十個民主黨派，又增加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三個黨派單位。
15. 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明確指出：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開出二十九人名單：「擬邀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馬敘倫、章乃器、張炯伯、陳嘉庚、簡玉階、施復亮、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許德珩、吳晗、曾昭掄、符定一、雷潔瓊

征戰。在樂壽堂高高的拱頂下，他是不是在想，在不遠的將來，敗在（或拜倒在）他腳下的，將不再是那些國民黨的上將、中將，而是這批與他推杯換盞、道貌岸然的飽學之士了呢？

註釋

1. 西柏坡位於河北省平山縣。毛澤東在這裏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等二十四場戰役。他在一間僅16.3平方米的舊民房裏，共為前線起草197封電報。有關三大戰役的統計如下：

戰役名稱	時間	天數	殲敵數（萬人）	電報數	共軍與國軍兵力對比
遼瀋戰役	1948年9月12日–11月6日	52	47.2	46	70萬：55萬
淮海戰役	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	66	55.5	64	60萬：80萬
平津戰役	1948年11月29日–1949年1月31日	64	52.1	89	100萬：60萬

2. 在《觀察》第4卷第22期（1948年暮春），有一篇清華教師胡慶鈞介紹費孝通的文字：「一個年紀剛到三十八歲的中年學者，在社會人類學的崗位上努力了十年，享到了如許的盛名，獲得了很高的國際聲譽，這不能不說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件罕見的事。」
3. 「民進的馬敘倫同志從哈爾濱給我們來信，請我的愛人嚴景耀去華北解放區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有關民主黨派的會議。」參見雷潔瓊：〈一次難忘的幸福會見〉，載邵康主編：《毛澤東和黨外朋友們》（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年），頁35。
4. 朱學勤：〈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5. 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225–234。
6. 王紅雲：〈北平和平解放和談記〉，《縱橫》，2002年第1期。
7. 吳黔生等：《肝膽相照》（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頁41。

8. 1月14日，解放軍向天津守敵發起總攻。三十小時後雙方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協議》十四條。21日，傅作義宣佈北平城內守軍接受和平改編。接着，最重頭的：斯大林代表米高揚將於31日到達。估計他們是在協議簽定之後出發的，一直留到重頭戲開場。
9. 雷潔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真理〉，《光明日報》，2001年6月12日。
10. 1998年紀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五十周年之際，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赴西柏坡參觀學習。民盟中央名譽主席費孝通說：「撫今追昔，我認為五十年前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聚集在中國共產黨周圍，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一個正確的歷史選擇，是民主黨派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勝利。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11. 轉引自A．列多夫斯基編，馬貴凡譯：〈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 同上註。
13. 1948年4月25日致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的電報，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04。
14. 「五一口號」非同小可。因為接下來的新政協將以此劃線：各民主黨派凡贊成積極響應者，可以參加新政協，後來者則需審查資格。新政協籌備會關於代表資格的政治標準是嚴肅的。有些黨派、有些個人雖然提出申請，卻沒有被接受；也有些黨派、團體、個人，卻被主動邀請參加。負責擬訂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的是第一小組，組長李維漢、副組長章伯鈞。第一小組提出處理意見，再報全體會議決定。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單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開響應「五一口號」的十個民主黨派，又增加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三個黨派單位。
15. 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上海局，明確指出：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開出二十九人名單：「擬邀請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馬敘倫、章乃器、張炯伯、陳嘉庚、簡玉階、施復亮、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許德珩、吳晗、曾昭掄、符定一、雷潔瓊

及其他民主人士前來解放區參加協商。」周恩來後又親自擬定包括上述人士在內的港滬和江南民主人士七十七人名單、平津民主人士二十四人名單。讀者如果有興趣，可以比較一下上述名單和後來進入政府與政務院的非共產黨官員。

16. 直到1948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才得以覆電香港李濟深等十二人並轉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稱「5月5日電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可見將「蔣介石反動派」之外的各種力量糾合在一起又多麼困難，特別是中間還夾着一場「美帝」對第三勢力的扶持。讀者如果記得我們在第一節中說過的毛對李濟深的代表彭澤湘打算拉傅作義建立第三勢力的憤恨，就知道這拖延了三個月還得不到回音讓他有多焦急。
17.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68–69。
18. 即中國民主促進會，1945年成立，是上海文教界與工商界懇談會的底子。
19. 費孝通對朱學勤說：「我的生命路線的選擇，不是我選擇的，是共產黨決定的。向哪一條路走？當時有好幾條路呢。一條是做教師，在清華是我做事裏面生活最安定的一段時間，待遇啊、條件啊都很好，朋友很多。當時彭真與李維漢爭我，彭真想給我北京市政策研究室的職位，後來李維漢把我要去了，他是統戰部的，他地位很高，在江西南昌起義時被稱為『羅邁』，他權力很大，總理下來就是他，他是總理的秘書長。……我們同李維漢處得很好的。他是賞識我的人，知識分子是要別人賞識的，李維漢是共產黨裏面第一個真正賞識我的人。……回到民族學院，宣佈我是右派了。他們也很複雜，決定我是右派也是很複雜的事情，我一直幫他們的。他們後來也承認，統戰部後來幫我的人不少，李維漢幫我的，到後來也是他把我弄出來。所以我受的罪不多，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的開始。」參見朱學勤：〈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2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04–305。
21. 這封信一定還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根據「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利用部」發佈的文件，中共對其檔案工作，是相當重視的。1945年9月，在中共準備離開延安向東北(和全國)發展的時候，成立了「材料保管委員會」，

「徵集、接收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重要檔案資料並負責轉移」，由中央秘書處處長，也即日後的第一任中央檔案館館長曾三負責。第一次大轉移是從延安到興縣，九十箱，驢馱人背走了一個月。第二次是從興縣到西柏坡，銷毀了一部分（不是蘇區清肅AB團的檔案吧？——新者歎），裝入六十四個鐵皮箱，全部由牲口馱運。第三次是從西柏坡轉向北平，這回裝了兩輛大卡車，周恩來和楊尚昆統一指揮。當時，對於即將成為第一執政大黨，中共頗為自詡，所以在西柏坡時期，有關檔案的規定疊次出台，如〈中央秘書處材料工作細則〉、〈中央辦公廳關於承辦和收發電報及歸檔程序〉等。

22. 毛澤東5月31日致函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請考慮將張東蓀、吳晗、許德珩等盡快從平、津接出來，以便徵得他們同意後，選為華北行政機構的委員，並有一二人任部長，一二人任副部長。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13。
23. 8月7日至19日，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石家莊召開，選舉董必武為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為第一副主席，藍公武為第二副主席，楊秀峰為第三副主席。
24. 雷潔瓊：〈一次難忘的幸福會見〉，載《毛澤東和黨外朋友們》，頁37。
25. 郝在今：《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166。
26. 據記載，1919年11月，張東蓀、毛澤東、舒新城發起創辦《湖南教育月刊》。參見于平凡：《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頁72。
27. 鍾叔河編訂：《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長沙：嶽麓書社，2002），頁175–176。
28. 參見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422–423。
29. 《賀新郎》的前言：「曾有人兩度以北京大學校長向余游說，一在虜獄中，一則在石家莊旅居時。又一九五二年陳某欲余自白，以不得為部長為憾。當時引為侮辱，嗣知人之自視與他人之相視，實有千里相隔，亦不足怪，但可一笑置之耳。偶然憶及，紀之以詞。」
30. 該述評刊於1949年2月3日的《人民日報》（石家莊版）上，收入《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277–280）時改名為〈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

三

炎熱的夏天：「一邊倒」

從西柏坡搬進雙清別墅的毛澤東，穿的雖然還是那身大棉襖，頭腦中的戰場，早已不再是四平街上的殺戮。在客廳、在書房、在握手與交杯換盞中，他將與他想像中的對手進行毫不妥協的較量——心理、性情與智慧。這場他名之為「其樂無窮」的大戰，將覆蓋他1949–1976年（五十六歲至八十三歲）後半生，並從此與希特勒、斯大林、波爾布特、齊奧塞斯庫等比肩列名現代暴君榜。[1]

這場戰爭正式開場於1949年，這改變了幾代中國人命運的、瞬息萬變的一年——雖然腹稿，早在1948年、1947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就開始打了。

不長於交際的張東蓀，[2]在1949年春夏之交的大熱鬧裏，顯得出人意料的孤單。

在這無可與人言，甚至也無從著文排遣的孤單中，有切盼、有焦灼、有追悔……他感到有什麼即將發生，但又不能確切預知，更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比如北平易手之際，這邊氣勢洶洶發佈的那個「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者」的四十三名頭等戰犯名單。前四十一名均為國民黨大員；到了第四十二號和第四十三號，曾琦、張君勱居然也列進去了！

他依舊住在燕京，只在城裏有事的時候，暫時在長子宗炳外交部街的家中歇腳。雖然「收歸國有」的指令要到1951年2月才正式下達，但在1949年的春天，貝公樓一帶已是另一番氣象。身著軍裝、

腰紮皮帶的人進進出出。臨湖軒再不見老校長的身影。

1947年南京最後一面之後，張東蓀再也沒有見到司徒雷登及傅涇波，但書信往來依舊保持——既非禮節性的問候，也不是摯友之間無隔閡的交流。研究西方哲學，並正在構築自己的思想體系[3]的張東蓀，沒有宗教與留學美國的背景。英文水平雖然已達到可在專業領域自如閱讀，聽也過得去，說還是要靠翻譯。僅就私交而言，張東蓀與司徒雷登似乎並不很親密。他太嚴肅、也太專注，專業學問之外的興趣相當有限，對於「行樂須及時」等人生格言不僅無由領悟，反倒常為遠得沒邊的國事、天下事日常着急。他是燕京教師中唯一一名國民參政員（1937年、1938年）、老政協代表（1945–1946年）、國共兩邊首腦都着意籠絡的民盟領袖人物。

司徒雷登1946年改任美國駐華大使之後（仍兼任燕京校務長），不免從新的角度看待這位任系主任的同事。到了1949年，期望通過以峻刻自律、操守嚴謹而聞名學界的張東蓀，與即將成立的新政權建立不露痕跡的聯繫，也就順理成章。另一方面，張東蓀雖然早在老校長大使任命剛剛發表的時候，就已「看透中國政情之複雜，深知此任務（調和兩黨，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難以完成。一旦失敗則勢必有損司徒雷登一世清名」，[4]但對司徒雷登與中共溝通的意向，從他自己的想法或從同事之誼而言，於公於私，也自然願助一臂之力。

這年早春，司徒大使和傅涇波依舊在南京。

對燕京四教授的西柏坡一行，想來他們已有所聞。但他們未必知道，毛澤東已經相當興奮（或曰有意試探）地向他的客人們透露了新中國「一邊倒」的基本國策；更遑論打探到斯大林的特使不日之內即到解放區，並將與中共首腦人物會面這一重大消息。

幾乎就在同時，北平「解放」後的第四天，1949年2月4日初，美國國務院數月前（1948年9月8日）制定的那份《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文件，獲得了杜魯門總統正式批准。文件着重分析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成功的原因，明言美國必須擺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並和中共打交道——不僅必然而且可行。[5]

雖然對蔣介石的評價頗高且私交甚厚，但司徒雷登敬愛此人，更多是出於作為前傳教士，將他看成是中國巨變時期皈依了基督的政治領袖。司徒誠摯地寄予情感與厚望的，是他出生與傾注心血的中國[6]——作為大使，執行本國政府政策更是責無旁貸。所以，對國務院的「新精神」，司徒沒有任何抵觸，立即以基督徒與大使的責任心，打點精神上陣。

動得最快的，是感到自己的機會終於到來的國民黨內反對派（民革）。3月下旬，陳銘樞即開始派自己秘書羅某到南京聯絡美國大使。司徒在羅的陪伴下到上海，託陳向即將建政的共產黨人（比如周恩來先生）致意，說自己將建議美國政府，支援中國的經濟建設二十億元。[7]

在這敏感的、牽一發而動全局的日子，傅涇波盡量保持與燕京舊雨的聯絡。時間急迫、局面微妙，老校長需要與人交換意見：和一個具有學識和歷史感，卻與老的和新的政權都沒有利害牽扯的人交換意見——當然這人最好是意識形態上色彩不濃烈，且公正不阿。

形勢發展很快，快到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1949年4月21日，毛、朱二人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這其實意味着，中共將成為「除了南斯拉夫外唯一真正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不直接依靠蘇聯軍隊而獲得政權的，他們必定會引以自豪並堅持獨立自主」。[8]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次日，入城先頭部隊三十五軍一名偵察科長當街被請上吉普車，駕車的「鬼子」自稱代表美國大使館，說「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請閣下到鄙處一敘」。由此可見司徒與新政權搭線心情之迫切。

接着，就是那已經廣為人知的、意味深長的情節：國民政府「遷都」廣州，美國僅命使館參贊劉易斯．克拉克（Louis Clark）以「代辦」名義赴穗。大使本人居守未動，故宮機場還留下了一架大使專用雙引擎小型運輸機。這一舉措的餘波是：除了蘇聯，西方主要國家的大使館，都沒有隨原國民政府南遷；司徒本人在戰時交通管制環境

下，還能在各個城市往來穿梭。

所有這些，對紅色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政策，我們今天已經可以說，是長在毛的心裏，而非盤旋在腦中——有着怎樣的影響呢？

長久以來，讀史的人大多以為「一邊倒」這一基本國策的確定，一定是出於討好老大哥蘇聯：第一，在冷戰中給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加碼；第二，在中共心目中，只有大哥高興了，方可依賴。用毛的話說：打架，背後站着個大個子，心裏踏實。

而蘇聯，起碼在中共已經渡江拿下上海那一段時間，是不是如人們想像的，正擺出僵硬凜然的冷戰架勢，不許自己的「小兄弟」與美帝有任何勾搭呢？

據大約半個世紀後披露的資料，在1949年中共進入北平，拉開架勢與南京李宗仁政府和談的這段時間裏，斯大林曾多次事無巨細地介入到國共、中美事務中。細究蘇聯這時的態度，確實看不出要在中共與美國之間使壞，加劇二者間之緊張，以為其所用。

斯大林4月間的那份電報，起碼在表面上奠定了後來幾個月裏，毛澤東顛毛直豎地與美國打交道的基礎。歷史學者楊奎松寫道：

> 就在中共決定開始渡江戰役的幾乎同時，針對毛澤東去電徵詢斯大林關於新中國政府建立及其有關政策問題，斯大林給毛澤東回了一封很長的電報。回電中特別說明了他對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建議。他提議：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能夠正式放棄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那麼，中國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絕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因為這樣做將有助於使美國放棄其分裂中國的計劃。[9]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斯大林對新中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所提條件只有一條，即「正式放棄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支持」。而到了6月，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還向司徒雷登表示：蘇聯願意改善美蘇關係，並研究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10]

4月20日，渡江戰役發動之前，黃華就奉周恩來之命，南下鐘

山，擔任為他所負使命而特設的「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直到1999年接受電視台與黨史研究室採訪時，剛剛從副總理位置上退休的黃華，才將當年這一最高機密昭示於眾。原來，是周恩來特意安排他這名燕京肄業生前往南京，「伺機和校長司徒雷登接觸」。司徒在日記中寫的則是：「據說黃華是因為我的關係，才被派到這裏來的。」

4月25日，出了一樁三十五軍擅自派兵入侵大使官邸的事。司徒大使合乎情理地生了氣。毛主席遂親自起草電文過問——這一並非由政治家設計的細節，直接導致中共入滬部隊動人的紀律嚴明。女作家陳渝慶五十年後告訴著者，她的父親、建築學家陳占祥，就是因為見到這些可愛的睡在屋簷下的戰士，而毅然決定留下不走的。[11]

也是在這幾天，與「大兵闖使館」異曲同工，懷着「新中國主人公」之驕傲，還出現了南京電報局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的事情。此節又勞動毛主席於4月30日親自寫下關於「好」、「壞」記者的絕妙電文：

> 我們認為南京、上海兩處暫時均不要停止外國記者發新聞電。南京方面應重新開放，讓外國記者發電，並且不要檢查。待他們發一個時期看其情況如何，再由中央決定或全部停止外國記者發電，或准許好記者發電，停止壞記者發電。[12]

4月20日，長江上發生英國艦艇紫石英號事件。毛澤東為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李濤撰寫了措詞嚴厲的反帝聲明。與預期相反，司徒大使推進「新精神」之決心，不僅沒有因這事受到干擾，反而決定加快步伐：5月6日下午，一直靜待未敢擅動的黃華，接到傅涇波的電話，以老同學的口氣，問什麼時候可以去看他。

在第二天的會面中，傅涇波幾乎將春天批准的國務院文件《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悉數告訴了這位前同班同學。除了「美國一年來漸漸了解了過去對國民黨的認識錯誤，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等，還委婉道出他們長於教育與宗教事務的老校長坐在大使位置上的為難之處：在國外獲得的任命；對外交不在行；對國務院不熟

悉……。傅還談到這次國民黨撤退前，何應欽希望司徒去廣州，而他決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觸。而這點，是獲得了國務卿艾奇遜同意的。

接下來的，當然是安排黃華前往拜望老校長了。致電北平請示之後，5月10日得到毛澤東的回電(細心的讀者此時一定可以注意到，前邊之所為，多出於周恩來的佈置。至此，毛澤東親自介入)：

(一) 黃華可以與司徒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
(二) 見面時多聽司徒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
(三) 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有毛病。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詳見下文——著者按)；
(四) 與司徒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
(五) 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
(六) 談話時如果司徒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
(七) 對於傅涇波所提司徒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13]

對比前文所述斯大林的長電文，第三項「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這一條，毛澤東說得非常詳細，甚至前後語句重複(這絕對不是他寫電報的風格)，已現胸中之氣蓄勢噴湧之前兆。茲將全文謄錄如下：

來電說「空言無補」……(接上)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方式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而不是籠統地要求美國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你們這樣說，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

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說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了若干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只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

望讀者特別注意「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像。飛機大炮？麵粉巧克力？人權觀念與民主制度？

5月13日，有毛主席指示在胸，黃華前往大使官邸。會面時傅涇波在座。楊奎松在他的分析裏說：「人們事實上可以把這次談話看成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美雙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觸。」此言甚是，但是，外交往往對內政發生很大作用。比方說，它對後來毛絕對不許外人干涉「內政」傾向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當然這裏所說的外人，已不僅僅指外國人。比如文化人梁漱溟就是國家農業政策制定的外人；經濟工作也不是彭德懷份內的事。至於這「內」與「外」會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劃定，只能聽憑偉大領袖自己「胸中鴻猷」了。

在會面中，黃華忠實轉達毛的電文「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繫」。對此，司徒書生氣十足地解釋，「只要國民黨政府仍然存在並得到美國承認，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多半不會因為中共的軍事勝利而迅速改變」。

接着說到至關重要的「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作為崇尚自由主義的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表達的——我們後世讀史現在已經清楚看出——是一句多麼要命的話：「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14]

5月17日和31日，傅涇波再見黃華，明確告訴他，在對中共的政策問題上，美國國務院與國會是存在着極大分歧的。形勢緊迫，對於司徒雷登力主與新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望得到中共方面的信任和諒解。

北平方面沒有回音。

陳銘樞就是這個時候作為李濟深的代表，帶着大使館代為收集的美中關係資料，北上專程拜望中共的。

張東蓀也有回信。據司徒5月28日日記，他邀請張東蓀7月20日前到南京面談，張也答應前來——以到上海會見民盟主席張瀾、羅隆基為契機。

為將事情做得更確實，司徒本人再次前往上海，這回是會見民盟的領袖人物羅隆基：

> 司徒約見羅隆基，託其向周恩來傳達這樣的口信：中國如能放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他可以向美國政府建議，給予中國六十億美元的支援，幫助中國經濟建設。羅隆基到達北平之後，在未傳達這個信息之前，聽到民革的陳銘樞已經向周恩來做了相同的傳達，而遭到周的斥責。於是他就放棄了這個念頭。[15]

到了八十年代，在華盛頓傅涇波寓所，燕京老校友、東蓀先生的學生林孟熹曾直接向這位當年不離左右的校長私人助理發問：「司徒校長在中國政局問題上，究竟最聽信誰的意見？」「張東蓀。」傅涇波毫不遲豫地回答。[16] 但張東蓀自己在1952年被逼作「檢討」的時候，說的是：「因為國共談判沒有成功，對美國政府能接受司徒雷登這樣的建議，根本不抱希望，也就沒有任何動作。」

他的這一見解，其實在許多同儕之上。因為他的「不抱希望」指的是正積極活動的司徒、傅涇波背後的「美國政府」，而非北平的態度。他持如此見解的時候，中央情報局秘密檔案還沒有公佈，沒有可能確切知道當時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安全利益要求將中國置於蘇聯的控制之外。」[17] 他這樣想，大約源於1947年7月同當時的總統特使魏德邁會面時，美國方面對民盟切切給出的忠告所持的無知的輕慢。後來事態的發展，包括美國政府自己的自省，都證明了受到雙重理念制約的美國，[18] 與毛澤東這個遊刃於儒、法、道、術，經千年之提煉而成就的「人精兒」打交道，有多麼困難。

雖然處於心情沉重的失望之中，對於老校長的託付，還須有所交

代。到了夏天，在美國已經決定撤回全部外交人員之後，張東蓀、羅隆基、周鯨文前往駐北平總領館，為柯樂博（O. Edmund Clubb）送行。他鄭重地託柯將自己這回「有負重託」的過程轉告司徒先生。這時，他強調的是北平方面。也就是說，司徒，包括他們自己作為「第三勢力」所期望的「以民盟來做美國和中共之間的橋樑」這一「幻想」，在中國已經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

他們的赴約道別，發生在1949年初夏，沒有打算也沒有必要對北平軍管當局隱瞞。而由於南北交通阻隔，他們與司徒間的信件往來都通過美國駐北平總領館，總領館也立即向華府詳細報告，包括司徒所報：「我已要求張前來，並深信他所掌握的情況將來我帶回華府甚為有用。」

這封電文附有總領事柯樂博的說明：

> 張說他已經向周（恩來）提出，佔領上海之後，他需要前去看看。周已經批准張的建議。因此張暫定五月底或六月初動身。他……要求我告訴你如果他去上海的話，隨後他會去南京看望你。

這裏的「前去看看」，指的是在「左派」民盟人物已「緊隨黨的教導」去了香港、去了東北、又來了北平之後，他作為這個圈子之外，但仍受到共產黨倚重的民盟中委，名正言順地到上海聯絡張瀾、羅隆基（其實其時史良等也在上海）。此行得到周的首肯。對此，可以理解為共產黨對當時還具有相當份量與影響力的民盟「非左派」人士的關切，或許也含有周為了「非一面倒」，對他們有所倚重的意味。

後來，由於有國共兩邊的特工戲劇性地介入搶人、救人，張瀾「投向黨的懷抱」已成定局，張東蓀南下已無迫切需要。司徒和傅涇收到張的回覆：「妻子有病，不便遠行。」林孟熹記得，這年夏天，他正聽張教授的課，「並未聞師母有疾。」也就是說，上海解放前後，由於客觀的或者主觀的原因，張已不能或不便與美國駐華大使直接聯絡——雖然到了6月18日，篤信「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19]的司徒，在致電國務院時候還說：

……我推測陳銘樞及其他人已北上參加北平之政治協商籌備會議。在返回華府之前，我將設法取得有關之第一手資料。張東蓀也將是代表，他仍會經上海來南京看望我。

然而，對於司徒希望「帶回華府甚為有用」的「他所掌握的情況」，用不着親自到南京，張東蓀已經對柯樂博談過了：

張昨天見到周恩來，後者特別在與外國貿易的問題上顯示出能夠接受的姿態。他（張）說像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這樣的人，已意識到重建貿易和對外關係的需要，但尚未達到足以將他們的觀念和判斷加到比較下層的頭上的地步。那些人是受另一條路線教育出來的。他強調他的信念：目前在如何對待美國的問題上，已存在一種向調整位置發展的趨勢，但共產黨人行動得很慢。（電文附件）

看來教授對「泥腿子」們已經多少有些領教。但對毛澤東顯然看走了眼，也不了解其下屬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對毛的絕對服從。其實在對美關係這樣重大的題目上，毛、劉和周會是一樣的人麼？「比較下層」的幹部，干涉得了毛麼？「貿易和對外關係」，包括與其息息相關的平民生活，在毛的考量裏，又能佔什麼份量？

對張所說的「行動得很慢」的位置調整，司徒和傅、可能還有張東蓀，都還沒有徹底絕望。

5月底，司徒提出想到剛剛易手的上海。黃華反應相當正面：對「一名普通美國公民」的要求，按照「特殊情況」做了周詳的安排。

6月2日，柯樂博致電國務院：「……張宗炳在三次不同談話中主動表示，相信共產黨人終將會『接受美國援助』——這一重要政治判斷，大家都相信源自張東蓀。」

6月6日，柯樂博致電國務卿：「張宗炳告知，周恩來最近對教授們的演講中，說到中國共產黨人不會走鐵托主義路線。張宗炳說此番解釋不符合情況。據他父親的看法，事實上，共產黨人正在走這條路線。」

讀史人現在已經清楚看出，張教授的判斷，其實是在沒有認清本質前，對「中國共產黨人」書生氣的讚揚：氣節操守，茲事體大，「中共諸公」怎麼會做他人尾巴？

在同一天(6月6日)，黃華在得到批准後，主動約司徒(還有傅涇波)在外事處再度面談，對原先談過的(也就是毛規定的)三原則，不敢有一絲鬆口。司徒則就國際法向他的學生解釋，在「中國沒有一個新政府」的局面下，無所謂承認，也不能與尚有存在條件的舊政權斷絕外交關係。更有甚者，第一次當大使的司徒雷登一點不具外交官常持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practical convenience)的靈活姿態，再次明確告訴黃華，承認與否，將視未來中國的政府裏是否能夠盡量吸收一些民主開明的人士參加而轉移。[20]

讀者此時可以想像，讀到黃華發回去的報告，周與毛的感受——不同的感受。

對比毛此時的「原則性」，和他1944年在延安見美國政府代表謝偉思時候的靈活性，可知他最崇尚的，本是實用主義。至於1949年初夏他所持的具有實用效應的原則性將落實到何處，詳見後文。

在這個時候，蘇聯怎麼想呢？據楊奎松研究，作為冷戰的一方，它相當坐得住，對美中關係能發展到什麼程度，竟沒有絲毫的緊張不安：

> 這時中共代表與美國大使的整個談判過程，幾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關注與建議下進行的。毛澤東不斷地向斯大林詳細地通報這種接觸的最新結果。斯大林甚至明確認為：未來新中國的恢復和建設如果能夠得到美國在經濟上的某種幫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21]

斯大林的這一姿態，決定了毛澤東1949年春夏之交時所持的態度：姑且聽你的，且耐下性子，一邊「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一邊等待轉機。而在南京，勉為其難地當着外交官的教育家司徒雷登，與自己學生王汝梅(黃華在燕京讀書時的名字)之間那場「雞同鴨講」式的接觸，也就一直維持着。這會晤，引起了留在南京各國外交使

節不小的議論。天性樂觀並勇於行動的司徒，決定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繼續向前推進。

6月8日，傅涇波對黃華說：使館接到美國副國務卿魏伯電報，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夠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順便看看燕京大學，獲知中共方面的意見」。這一提議頗具可操作性。因為依照多年慣例，每到6月24日，司徒校長總是在臨湖軒與燕大師生一起「過生日」。傅涇波希望黃華將此意向北平方面傳達。如果成行(即得以赴北平面見周恩來)，校長「返美活動將更有力量」。

估計就在這前後，張東蓀以及燕京其他能使得上勁的人物，如校長、總務長、教務長等也接到傅涇波的信，望大家齊努力，以促成此事。

這時候，還發生了一件至今未能白紙黑字證實的情況：6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總領館轉來的所謂「周恩來密訊」，稱中共高層領導在對蘇對美方針上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華府對此很當回事，不料覆信為周恩來峻拒。後世研究者認為這不過是當時西方報人(兼情報人員)對北平上層「有所聞」(外加猜測)之後掀起的風波。[22]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沒有具體文件對此加以證實，但只要讀過毛氏雄文，就知道在那一階段，他確曾面對過來自「自己陣營」的質疑：「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要做生意」；「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23] 正因為這樣的願望比較普遍地存在於國內國外、官方民間，事情的發展，違背了眾人的期待，反而為以後毛澤東重大的「一面倒」加了碼。

行文至此，著者特別想提醒讀者諸君注意屬於政治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中，常常發生在專權者身上的「偏執」「逆反抗拒」性格：愈遭反對，強行推進的欲望愈強烈。綜觀毛澤東一生，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1959年廬山那次——原本打算反「左」而召開會議，最後以反右大開殺戒。

再回來說1949年的故事。

要求前往北平(循舊例於6月24日在燕京大學過生日)的試探氣

球拋出，卻得不到回音——也就是後來張東蓀（在被迫檢討時候）說的司徒與傅「遲遲不能成行」。

6月11日，有三名人員陪同照顧的司徒雷登趕到剛剛「解放」了的上海，見到三百多位燕京歷屆畢業生，包括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盟友，比如章漢夫。司徒對大家說，在南京見到了王汝梅，他現在是共產黨在南京的外交代表。十三年沒見面了，現在與他見面交談，還是和過去一樣沒有拘束。在後來的日記中，司徒雷登提到周裕康（燕京大學總務長蔡一諤的親戚）告訴他：「毛澤東宣稱，我會被作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

6月18日，黃華主動問傅涇波，司徒訪問北京的時間安排，有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希望讀者特別記住這個日子，因為就在第二天，6月19日，已經起起伏伏拖了半年的「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一事突然公佈。

不僅在當時，就是很久以後，也沒有幾個人將這兩個事件聯起來想。後人知道的是，終於，6月25日，老校長接到現任校長陸志韋十天前發出的邀請信。陸志韋寫道：「昨天（6月15日）上午我見到周先生。……毛澤東已宣稱你有興趣來燕京訪問，我估計當局可能予以同意。」[24]——大家注意到了吧，到這時，北平方面有所介入的人士都在強調，雖然最早的安排是周做出的，但此時的決策者，已經是毛本人。

*然而一封重要函件晚到這麼多天，恐怕不是因為郵路尚未恢復。因為在這十天裏，中共方面有了不少動作，以通俗的政治術語形容，就是一手硬、一手軟，大棒、胡蘿蔔一齊上。在同意司徒北上的同*時，6月19日，中共採取了自春天以來第一個針對美國政府的強硬行動，突然公佈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僅僅公佈而已，依舊留着將來或不了了之、或再度升級的餘地，這我們在後文還要談到）；兩天後，6月21日，毛特別就司徒有意訪問北平一事對南京市委及華東局專門做批示，稱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約十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獲允許，並可望與當局晤談。」[25]

6月28日，黃華正式通報大使館：已獲北平來電，同意校長的燕大行；希望與當局晤面事亦有可能。當傅涇波為搶時間，提出司徒雷登此時已是「衰弱老人」(七十三歲)，無法長時間乘火車時，黃華也很有誠意地表示「如要乘坐(他自己的那架)飛機亦可安排」[26]——處於對立位置上的老同學相當默契，都盡力避免因細節不慎而毀掉全局。而細節安排到這一程度，已經是在重大決策上時時窺測聖意、如履薄冰的周恩來，所能做到的極限了。

據林孟熹在九十年代中期與傅涇波的談話，在接到中共方面傳過來的信息之後，考慮到美國當時的輿論民情，以及院、會之間的分歧，比如不過幾天前(6月25日)，十六位共和黨議員和四名民主黨議員曾聯名致信杜魯門總統，要求他不要承認中共政權等等，依傅涇波的意思，大使應立刻出發，行到半途，也就是想要阻擋也已經來不及的時候，才依照規矩請示。但信奉主，而且終生不打妄語的司徒，愛憐地罵了他這半子、半助手一句："You rascal !"(小玩鬧)，於6月30日，將此局面正式電告國務卿艾奇遜：

> 此行定能推進相互之間的更好了解……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與中共領袖進行非正式談話的唯一機會。此種機會可能從此不再。這將是一個富有想像力和冒險精神的行動，顯示美國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的開明姿態，並將可能令今後中美關係獲益。

歷史機緣往往就是如此不巧，據傅涇波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分析：處置該案，本屬國務卿職權範圍。如果當時美國有一位強勢國務卿，而不是比較弱勢的艾奇遜，在接到司徒報告之後，完全可以立即拍板，不必請示總統，拿到國會去討論。可惜……

*接到司徒雷登的報告後，美府院雙方立即進行緊急磋商，結論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的威信」，造成美國即將承認新中國政權的錯覺，並在國內引起反對派的攻擊。於是，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即將啟程北上的駐華大使，接到國務院的指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

後來的研究也證明，就算不論強勢弱勢，國務卿艾奇遜遠不是一名如英國凱南那樣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得以擇脱「基於意識形態的道德要求」而從「現實主義國家利益」出發考慮問題。[27]

傅涇波不得不將「請示」及駁回一節，如實通報黃華。事實上，根本沒等到美國方面的明確回應，中共中央已明確表示，從我們已經同意之後你還要再請示的6月30日起，對於司徒雷登來北平問題，不再有任何興趣。毛澤東在對他的同僚做了有限讓步之後，等到了自己的機會：難道是我們共產黨人在主動邀請你麼？這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毛澤東以自己的風貌出場——〈論人民民主專政〉在當日發表，[28]「一邊倒」正式出台：別再夢想什麼鐵托的第三條道路！新中國將義無反顧地倒向蘇聯！至於什麼「真正容納民主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對不起了，用不着你們多嘴。我們要的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 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
>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説亂動。如要亂説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29]

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每一位讀者，都可以從自己，以及自己

的長輩、親屬、朋友、熟人的親身經歷中知道，從「人民民主專政」到後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共在代表人民對自己公民「實行專政」的時候，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及其幫兇們」的界定，有多麼的隨意！

將黃華派到南京的周恩來，在這樣重大的時刻，必須顯得更憤怒、更決絕才行。據楊奎松敘述：

> 周恩來電稱：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與當局晤談，均為司徒雷登所提，「決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藉口」。事實上，同意司徒雷登前來，也只為分化美蔣，「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30]

到8月2日，司徒雷登「挾起皮包走路」了。8月5日，就在他抵達珍珠港的當天，《美中關係白皮書》發表。一週後，8月12日，新華社（我們已經知道，其實就是毛澤東）在接下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連撰五篇評論，「對白皮書進行透徹的分析與批判」。其態度之峻刻、用語之刻薄、行文之一瀉千里，為受盡了委屈與蔑視的中國共產黨人吐氣伸冤之酣暢淋漓，外加對美國的仇視、疏離與無知，不僅在政治，甚至從文化與文學層面，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在毛的筆下，司徒雷登，外加張東蓀、羅隆基們，成了這個樣子：

>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着不動，睜起眼睛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31]

綜觀中國外交史，似乎未見有人撰文論述，一個主權國家，應否由筆力雄健的領袖，*如此恣意地抒發鬱悶於胸中的怨與恨——完全不顧如此激揚文字，是否會給他國政府造成「蓄意激怒」的印象，*[32]

而為以後的外交操作造成障礙，乃至悲劇性地改變歷史走向。不錯，一個巴掌拍不響——你美國是怎麼對待我們中國人民的？[33]但綜觀《美中關係白皮書》，其中雖然有對中共的不恭之處，但主要內容還是檢討他們自己錯誤的對華政策，並拿腐敗無能的蔣介石問罪。作為主要靶的，蔣介石反應相當平靜，只例行公事地發表了一個語氣平和的抗議聲明，而本應對這樣的檢討表示歡迎甚至加以利用的中共方，卻是出人意料地激烈。

怎麼回事？

近年來，美國檢討該階段自己作為的文字，以及中國的專家研究美國政策的文字，已如汗牛充棟。但對毛澤東此刻的借題抒發，以著者之有限閱讀，只有他自己的評價與事實最為接近。這就是在國門給關上二十多年終將重新開啟之時，這人半仰在沙發裹，對來訪的尼克松說的那句直將翻譯打翻在地的話：「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34]

從後來被歌頌為「秋收起義驚天地，文家市上軍號響亮」的1927年到中共「七大」，歷經十八年黨內鬥爭的驚濤駭浪，毛澤東在共產黨內正式確立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有了「無法無天」的資本。但是，從本質上講，這名出身農家的師範生，就其心理定勢而言，依然沒有脫出埋藏很深的追逐實利之心機。究竟出於何等樣的實利考慮，使得他不僅不為數十億美元經濟援助所動，連靠山斯大林的勸說也敢置之不顧，堅決與美帝所崇尚的文明決裂？五篇洋洋大評，對他而言，僅為滿足一時之快意？

如果我們將此前此後發生的另一件事，一個看似沒什麼直接相關的案子——「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案」的處置，放在一起想一想，也許能找出破解的線索。這就是始於1948年底，經幾次反覆，拖了近一年方結案的「華德間諜案」。[35]

對於「美帝以金錢為誘餌、打着民主自由的旗號，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國內政」，毛澤東忍到這時候，已經夠了。就算沒有在他看來純屬裝模作樣的「司徒請示」以及《美中關係白皮書》的刺激，他也遲早要與「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國主義徹底翻臉。

6月19日，中國方面奉毛之命，公佈「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的情況。

五天後（6月24日），毛澤東決定將此事件升級，親自批示公開廣播題為〈英美外交——特務外交〉一文。6月30日，按照「好」、「壞」記者的原則，正式批准禁止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活動，並決定對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等一干人進行公開審判。據楊奎松研究，這一決定是在很短的時間裏做出的，短到來不及具體通知中共東北局，短到來不及研究是否應當追究華德等人的間諜罪責——今天的讀史人已經很清楚，這樣做當然有目的：為〈論人民民主專政〉造勢。

細心的讀者此時一定已經注意到了，這正是陸志韋獲得授權發信給司徒，但那信卻可疑地滯留在不知什麼地方的那十天；也是張東蓀說的他「遲遲不能成行」的那十天。

我們知道，從1941年到1949年，美國政府支持的，一直是毛的死敵蔣介石（對毛而言，日本侵略者還在其次）。「迪克西使團」到延安的時候，毛之熱情表現空前絕後：主義可以放在一邊；「共產黨」三個字也可以不要。無奈，寄託了巨大期望的援助依舊未到，希望再次落空。到了1946–47年，美帝國主義兇相畢露，軍事上前所未有地大力援蔣，就差親自放槍了。結果如何？如今我自己搶回了江山！坐在金鑾殿上的，已是我共產黨人！這回，想要用我對付蘇聯了，是麼？

這累積了八年，累積於兩場大戰中的氣，自不待言。但毛什麼人？記在肚子裏幾十年的仇，爆發前一分鐘你都察覺不出來。

他懷着高度戒懼，在蘇聯粗心浮氣的指示、周恩來小心翼翼的慫恿推動下，與美國發生接觸。他牢記曾經受過的創傷，謹守着七屆二中全會（當年3月上旬召開）制定的自衛之底線：儘管美國人想承認我們，我們卻不忙於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建立關係，而要特別警惕帝國主義「內部破壞」的陰謀。用毛的話說，就是防止孫行者鑽入牛魔王的肚子搗亂，而「孫行者即美帝是也」。

有這樣的想法墊底，他同意黃華前往接觸，「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從黃華發回的報告裏，他知道自己的戒心確確不是無

的放矢：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開明的民主分子」參加——這難道不是要干涉中國的內政？南京市委當時就對司徒雷登這段話做了生動解說：「聯合政府內應吸收美帝走狗」。[36]

但廣泛吸收開明的民主分子參加政府，本是1946年馬歇爾特別使華，希望迫使蔣介石政府接受的條件。所針對的，是中國這個大國裏邊的專制獨裁，無所謂國民黨或者共產黨。中共當時對此不但竭誠擁護，還作出若干相當智睿、大度之舉措，以促其成功，很有成熟在野大黨的氣概。而台上的蔣介石，則以或虛與委蛇、或翻臉不認賬，迫使美國政府「知難而退」。

從來國共兩黨，因為同為黨國專制，總是在不同形勢下「反之亦然」。但到了1949年，在冷戰的大背景中，毛澤東心裏清楚，絕對不會再出現一個屬於他的「紅色魏德邁」了。

毛澤東對美帝的警惕，並非始自黃華報告。有據可查的是，早在1948年底（12月4日），正當三大戰役血肉橫飛之際，不知從哪個渠道發回來的一則「談話材料（說是從一個美國記者那裏獲悉）」，引起他嚴重注意：

> 美國國務院現政策之中心，在於如何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國則在某種方式下承認新的聯合政府，恢復與中國貿易，對新中國投資，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美國承認聯合政府的條件是政府的構成須為美國可接受者，聯合政府得承認美國海軍、陸軍在上海、青島等地的基地權。

毛將此「傳聞」批送全體相關中共要員（劉、朱、周、任、彭真、胡喬木）：「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37]

而當被周派到南京「偵察對方意向」的報告發回，美帝「赤裸裸地打算在新中國政府裏支持民主人士，以抵抗共產黨之政治攻勢」這樣一個陰謀坐實之後，毛澤東的基本國策一錘定音：對外，「把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成自己頭號敵人，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並且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對內，則把試圖鑽進牛魔王肚皮的美帝代表，一個個收拾掉。

作為一個大國至高無上的統帥，他正面臨一場新的戰爭。在這場如何「造福」他的子民的戰爭裏，他的敵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新的、淩駕一切之上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脅，已經不再是王明、不再是張國燾、不再是蔣介石和青天白日旗下乘戰機、駕坦克的百萬大軍，而是有帝國主義在後邊撐腰的民主個人主義者。[38]

對這些大小毛猴，偉大領袖自有他的一套。「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麼？管你西裝革履，管你長袍馬褂——他的戰場，不見硝煙、不見升旗降旗、不見合同條款，他將直戳心靈。好名的，好利的，好面子的，好風雅的……你總有一好吧？我就鬥你那一閃念，讓你從此規規矩矩——什麼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清除乾淨，從此絕了你美帝的望！

在1949年炎熱的夏天裏，張東蓀憂慮地注視着自己曾經寄予希望的共產黨人——怎麼突然間換了一副面孔。從西柏坡返回，面對着新中國（同時也包括他自己）的「大好形勢」，張東蓀反倒「消極」、「苦惱」，也從此枉擔一生「反對一邊倒」的名聲。

其實可能連他自己都沒有看透：他不主張「一邊倒」，覺得僅從常識判斷，也不該有這樣的外交方針啊，這不明明加劇冷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麼？他在這裏真是低估了毛。這名將自己列位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上的師範生，想的遠不止此。這雄才大略的共產黨領袖，最討嫌的，是「有人干涉他的內政」：干涉他從農村徵糧，干涉他發動政治運動，干涉他清洗異端……。為什麼要「一邊倒」？套句《紅樓夢》中的名言，人家蘇聯就從來不說這樣的混賬話。

在有可能被看做「孫悟空代表」的人裏面，也有相當明智機巧的。在毛澤東確立「一邊倒」的關鍵時刻，民建[39]表現突出：《白皮書》發表之後，新華社第四篇文章還沒有發出，黃炎培主席已親自撰寫了一篇〈我對於美國這份白皮書的看法〉，接着民建以黨派組織的名義對美帝予以斥責的聲明：〈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出現在《人民日報》上（8月24日）。聲明特別敬告《白皮書》作者：發

展「民主個人主義」的好夢是做不成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國主義在內）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的資本或條件。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澤東極為高興，這正合了他幾天前在〈別了，司徒雷登〉中的斷言：

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40]

毛立即函告胡喬木：這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請予全文文播、口播，並播記錄新聞。他本人則連續（在兩天裏）致信「任之先生」：

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

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41]

美帝若想把民主自由的希望寄在以民建為代表的工商、文教人士身上，是沒什麼戲了。

與美帝決絕後，中共一手包辦了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數量可觀的開明民主人士給安放到直令革命老軍頭跳腳怒罵的高位。1949年10月1日，新政權決定向世界公佈剛剛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單。感到由衷高興的張瀾，建議同時公佈五十六名委員——「讓全世界看看我們的陣容」！當時沒有人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沒有膽子指出，這陣容會持續多久。

「一邊倒」在紅旗與熱淚中收場。開國大典只有四名外國記者到會：蘇聯一位，意大利一位，朝鮮兩位。在緊閉的大門裏，毛澤東完成了他的鎮反、肅反、統購統銷、工商業「改造」、反右、大躍進、

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沒有任何外國政府就此干涉，也沒有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就「反文明」或「反人類」罪對他予以正告。

大門裏邊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呢？

註釋

1. 澳洲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歷史及文化專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有言：如果毛澤東這時候(1949年)得暴病死掉，定列位世界公認優秀領導人物。
2. 林孟熹在《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一書裏，對本書主人公曾有「一向慣於周旋於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定評。此說或許可以看作張東蓀在危難之時介入政治運作時候的風格，而非喜交朋友、愛熱鬧的習性。
3. 1946年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繼出版，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建立起哲學體系的思想家」(郭湛波)。
4. 同註2，頁67。
5. 張偉：〈1949年，司徒雷登差點到北京〉，《環球時報》，2002年7月8日，第十九版；黃正瑞：《台灣問題面面觀》(北京：台海出版社，2004)。
6.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度裏，而且還曾在那裏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裏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裏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參見閻人俊譯：《在中國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香港：求精出版社，1955)。
7. 陳銘樞於上海解放後的6月初啟程，並特請美國駐華使館為他準備一套有關「美中關係及美國援華之事實材料」。陳在北平交流材料，並獲得毛、周等接見——但也就是接見而已。7月，陳銘樞返回南京，帶回毛、周的答覆，稱中共既定原則是美國必須停止援蔣，容忍中共結好蘇

聯，才能同美國進一步談判。參見薛瑞漢：〈1949年司徒雷登滯留南京與中美和解問題淺析〉，《世紀週刊》，2004年8月27日。

8. 埃德加·斯諾：〈中國將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嗎？〉，《密勒氏評論報》，1949年4月19日。轉引自楊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和預測〉，《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6期。
9. 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0. 郝在今：《協商建國—— 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1. 在1949年10月之前，幾乎所有美國在華情報人員和外交官，都懷疑中共建政能力。司徒雷登認為，「國民政府可以給中共造成更多的困難，包括帶走全部檔案和撤退富有管理經驗的政府人員，就足以讓從農村出來的共產黨人員難於適應城市的生存。」參見楊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和預測〉。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92。
1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99–500。
14. 轉引自註9。
15.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57。
16. 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頁166。
17. 參見註11。
18. 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對華政策——以艾奇遜和「承認問題」為中心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19. 此八個字，見《司徒雷登日記》手稿第一冊最後一頁結尾處中文手書。
20. 轉引自註9。
21. 同註9。
22. 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
23.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3–1474。
24. 楊奎松對此節的描述，雖然日期稍有出入，但基本事實並無差異：6月27日，傅涇波攜來陸志韋16日給司徒雷登的信，稱毛澤東已宣佈你來

訪燕京之意，事實上這也確實是毛澤東的意思。參見註9

25. 〈中央給南京市委及華東局的指示〉，轉引自註9。
26. 也有研究說：司徒雷登接信後，以返美行期迫近為由，要求以日去北平，並希望他乘留在南京的美國飛機前往。周恩來指示：允許司徒雷登去燕京一行，彼希望與當局晤面事亦有可能。……他如來京只能掛一臥車，派人護送，不能許其乘美機來平。參見張業賞：〈毛澤東為何寫《別了，司徒雷登》〉，「大眾網」(http://dzrb.dzwww.com/dazk/ws/200403/t20040324_638947.htm)(2006年5月24日)
27. 參見註18。
28. 官方論說披露，6月24日下午六時，毛澤東曾給胡喬木寫信，請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胡喬木的稿子寫出後，毛澤東沒有用，自己重寫了一遍，這就是毛澤東說過要答覆張治中、張瀾等觀點的文章，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
29. 同註23，頁1473、1475。
30. 轉引自註9。
31.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頁1496。
32. 同註18。
33. 此處「中國人民」，在毛的心目裏，最大可能是他自己。參見中美關係史學者們有關1944–1945年「迪克西使團」進駐延安的敘述：迪克西使團「鑒於作戰上的最高需要，……傳統對華政策的原則(即僅支持非共產黨的國府——著者按)，不得不改變，以適應一個前所未有過的局勢」，意欲支持中共這支抗日力量，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受到同志加貴賓之接待，但最後毛澤東期待的訪美面見羅斯福卻終成泡影。
34. 進入七十年代初，中蘇兩國關係的持續惡化和中蘇戰爭的壓力，迫使毛澤東向「萬惡的美帝國主義」伸出了橄欖枝，邀請尼克松訪華，緩和中美關係，意圖結成中美反蘇同盟，來頂住蘇方咄咄逼人的攻勢。1973年2月基辛格第四次訪華期間，毛澤東在會見基辛格時，提出了著名的「一條線」戰略的設想，即按照大致的緯度劃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一條線)，並團結這條線以外的國家(一大片)，整那個「王八蛋」(指蘇修)。可見蘇中兩國的關

係已經與交戰國相差無幾。當時翻譯沒弄懂偉大領袖此處文采風采兼具的調謔，將「無髮（法）無天」直譯為「不見天的光頭」。

35. 1948年11月15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接到瀋陽軍管會通知，令其將電台及其收發報裝置在三十六小時之內送交保管。通過公函往來，華德根據此前中方的符合外交規範、甚至堪稱友好的態度，請求「准予繼續使用」。不料幾天之內，不僅器材被沒收、領事身份不被承認，還失去了人身自由——電燈、電話和自來水供應也被全部切斷。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其實是東北局書記高崗應蘇聯駐軍之請，將美、英、法留在瀋陽的領事館「擠走」的策略。隨後，在中央的開導下，他們又將自己的行動調整為「首先給美國舊領事以限制」，對英、法則稍微緩和些。沒想到軍事形勢的發展，出乎意料地快。到月底，考慮到全國勝利之後可能與美國建交，華德的軟禁狀況好轉。就在這時，一起重大間諜案在東北破獲，據稱全部為美國特務，並直接由美國駐瀋陽領事館提供裝置、經費及領導——雖然至今未見確鑿證據。華德此後依舊被軟禁，但毛澤東手裏多了一張牌。1949年5月中旬，美國政府表示將關閉瀋陽領事館，中共方面也沒有具體考慮是否要追究華德等人的間諜案責任問題。到6月初，東北局對於華德等人的軟禁相當放鬆，華德本人已得到瀋陽當局的認可，並且開始做閉館和撤退的準備。突然，6月中，毛澤東通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向希望到北平的美國大使傳達「可以」之信息的同時，發佈了「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從事間諜活動案」。參見註9楊奎松文。
36. 轉引自註9。
3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410–411。
38. 艾奇遜在《白皮書》中預言「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成為改造社會的有效力量」——「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39. 民盟元老、第一任主席黃炎培，雖然沒有完全退出民盟，但1945年底又成立了自己的活動平台——中國民主建國會。
40. 同註31。
41.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33、335。

四

天涼好個秋：民主個人主義者

《白皮書》提出寄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他們是誰呢？

最容易想到的，可能是經首次「行憲」而當選為副總統的李宗仁。事實上，在《白皮書》發表後，美國公使曾主動拜訪他，李宗仁立即投入實際活動，有意成立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居於國與共之外的「第三勢力」，哪怕暫時在異鄉。不過，這一努力很快就胎死腹中。至於著名的自由派民主人士如胡適、傅斯年、張君勱，也已紛紛離開故土。

留下的民主黨派人士呢？對即將建立的政權，他們會有些什麼作為呢？

綜覽1949年還存在並活動着的「第三勢力」，其成立有早有晚、與新的當政者淵源有深有淺、組織之間也有分有合。組建的初衷，也大都是反對一黨獨裁。究其較有影響力者——青年黨和民社黨，因「立憲和行憲國大」，已經倒向國府；它們之外，有在中共敦促下湊數的；有些口氣雖大，但號召力有限的……；真正居中且成氣候的，似非民盟莫屬了。

1949年的民盟，既不同於1941年作為第三勢力黨派聯盟（名字也是「民主政團同盟」），也不同於1946年政協會議時，有自信、有承擔的民間多元利益代表。那時，它居於國共中間，雖然沒有一槍一卒，卻以言論和無時不在的影響力表現自身份量。究其緣故，第一當推有美國在後邊撐台；第二是國共當時都想拉攏（而非滅掉）他們；第三，他們趕上了古老中國千載難逢的機會：世界性民主潮流的勝

利，大批留洋學子返回並身居要津（他們起碼不會動不動就抄家伙，「給老子兩個連……」）。用我們的主人公張東蓀的話說，他們「接受西方文化雖只有將近五十年，然而卻居然在思想文化界中養成一種所謂『自由胸懷的陶養』。」[1]

這些好不容易彙集在一起的因素，在大戰結束、眾生期盼和平的時刻，居然使得這個千年專制古國，鮮見地透出一絲生氣：正當的言論不僅可以發出，還能讓虎視眈眈地握着槍的豪強坐下來聽。和今日文教名流們相比，其發言人考慮更多的，確是國家民族而非自身得失升遷。

張東蓀一直是民盟中常委兼華北地區總部主委。1946年梁漱溟擔綱調解和平失敗辭去秘書長之後，他還曾勉為其難並且毫無作為地當選充任了幾個月。到1947年夏，國共和談破裂、國府發佈「動員戡亂令」，民盟因為明顯的反獨裁傾向而顯得靠攏在野黨的中共，最終被老蔣定為「亂黨」而且開了殺戒。當此危機時刻，本以為可當作靠山（哪怕精神與輿論支援）的美國使館，明確表示「不便干涉」。為了盟員的人身安全，主席張瀾在11月忍痛宣佈「自動解散」。

1948年1月，沈鈞儒、章伯鈞、周新民[2]等，懷着憤恨與理想，通過中共的鼓勵外加具體安排，逃亡到香港，堅決拒絕蔣幫的反動政令，召開民盟里程碑式的一屆三中全會，成立起了臨時總部——沒有主席參加（張瀾在上海），人員也不夠法定人數。臨總號召盟員「徹底摧毀南京反動獨裁政府」，「堅決驅逐美帝國主義的勢力出中國」，「積極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裝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動的武裝」。[3]如此氣血賁張，毛澤東只淡淡地評說道：

> 將自己處於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國民黨的突然的攻勢之下，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事實證明：經過此教訓，民盟工作由被動變為主動了。[4]

所謂「主動」，以未參加該全會的民盟非左派人士看來，自己的組織，正「從一個走所謂第三條路線的中間派，逐漸轉變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民主黨派」。[5]



1949年張東蓀（第二排右二）與政協民盟代表團於中南海。著長袍的只有張瀾（前排右四）和張東蓀。注意最在意裝束的史良（前排右一）此時著裝——1949年最時髦的列寧裝（對比張瀾身邊的劉王立明）

張瀾是什麼態度呢？民盟文件信誓旦旦，說沈衡老行前曾與他密商。但從表老沒有應他們之請，寫「代表授權信」(同時在上海的史良就寫信請沙千里代、吳晗也請千家駒代)，說明張瀾、羅隆基，估計也包括本書主人公張東蓀，對這一猛打舵轉向之舉措，尚持觀望態度。該全會激烈的反蔣、反美聲明，張瀾似同意前者而對後者有所保留，[6]但在民盟官方出版物上，則有這位主席「提出傾向中共一邊的口號是及時的」一說，可惜未注明出處和時間。[7]不管怎麼樣，作為民盟威望最隆，而且是主要籌款來源的前主席，他還是不止一次，命葉篤義從民盟基金中為臨總諸公匯寄活動經費——這或許是民盟機關最後一次花自己的錢了。

1948年秋天，在周恩來、潘漢年的安排下，這批民盟「左」派領袖，按照黨的計劃(包括共產黨出資、通關節、租賃外國貨輪)，從香港到了東北解放區，「共同籌備新政協會議」。第二年，「民盟總部」搶在共產黨前邊，3月5日就遷到了「人民的北平」。抵達第二天即致函張瀾——沒有這名「聖人」出任主席，別說對絕大多數盟員，就是共產黨那裏，也是說不過去的：「本盟總部臨時工作委員會已於5日在北平宣告成立，盼早日命駕來平，參加領導。」臨時工委二十二位委員中，沒有張東蓀——他本是民盟元老，直至那時為止還是頭面領導，而且當時人也在北平。此中原委，未見民盟官方史家撰文披露。究竟是「左」派們匆忙間的有意疏忽，還是他們邀請(甚至推選)了張東蓀，而這位教授因為意見不同(比方說，臨時工委一成立，即致函中共中央毛澤東「願以至誠接受貴黨領導」)，而予以婉拒？

電報是發出了，可惜「住」在虹橋療養院的表老，已經處於軍統監視之下。

5月下旬，上海被攻克。北平這邊立即通過潘漢年向張瀾等人轉達「請即聯袂北來，主持四中全會，商訂本盟今後決策」之誠意。[8]這回落款人裏有了張東蓀，排在民盟北平五要人中的第四位。張瀾立即回電(6月1日)：「沈衡山、黃任之、章伯鈞兄轉民盟臨工會公鑒：各電敬悉。盟員中有數人遭難，弟等平安脱險。瀾、努、良、沈同叩」——收電人裏沒有前發電人張東蓀。這顯然不是為電報省字，也

不是上海方面的大意。情況可能恰恰相反，以羅隆基之精明，準是刻意將沒有到香港、不是北平「臨時工委」成員、也從未表態同意一屆三中全會聲明的東蓀先生，從「那路人馬」中分出來。

收電人裏也沒有前發電人中的第五位周新民。在羅隆基看來，他算什麼盟員？根本就是一名共產黨員。周則大度地對羅這種無原則的愛恨情緒化不予計較。據章詒和文，反右之後，盟中「左」右兩派（此時章伯鈞已經從「左」派給劃到右邊去了）在一家西餐廳不期而遇，羅與「打手們」怒目相對，「左頭兒」胡愈之（1933年共產黨員，當時的民盟副主席兼常務秘書長——章伯鈞反右前的職務）裝作沒有看見，周新民則踱過來與他們一一握手。[9]

北平上空飄起紅旗，在經過生死的大起落之後，在共產黨打下的地盤上，兩路人馬又走到一起。張東蓀此時的位置，只能用「微妙」二字概括了。比如到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召開的時候，民盟七代表中本有中常委五名。但在真正有點實權的籌備會常委會裏，卻沒有了主席張瀾、羅隆基和張東蓀。榮列常委並與毛主席光榮合影的，是沈鈞儒和章伯鈞（他們在七代表中排名第一、第二，主席張瀾第三，張東蓀第四）。

細究大家在此前一年間的活動，或許可以對上邊説過的「小動作」予以索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後邊有共產黨直接介入的「大動作」。

就在國共內戰的大局基本已定，沈鈞儒等聯袂乘船北上的時候，同樣懷着對新中國的期待，張瀾等留滬中委對即將執政的中共説的，卻是另外一番話。也就是後來幾乎把經手者葉篤義嚇個半死的那封羅隆基執筆的「致中共《建議書》」。[10] 據葉篤義記憶，其主要內容共有四條：

1）內政上實行議會制度；
2）外交上採取協和方針（即對美蘇同樣友好）；
3）民盟有退居為合法的在野黨的自由——著者按：這是相對於國民黨政府以「販毒」、「通共」等罪名，曾對其實施過的政治

壓迫。此處重提，可能意在對即將上台的中共防着一手。不錯，中共後來的確沒拿這種低級手段去消滅民盟。民盟自願置於共產黨絕對領導之下的故事（從1947年至今），只能證明，比之於捧讀《聖經》和《曾文正公家書》的老蔣，毛實在是技高一籌。

4）盟內共產黨員應公開身份，黨員和盟員避免交叉——著者按：這是無論公開還是私底下，都拒絕共產黨或顯或隱的領導。[11]

也是在這前後，在馬寅初離開上海到解放區的時候，張瀾送行，給出兩條意見特別請他轉告中共：

1）用人唯賢而不要用人唯黨；
2）「共」字上面必須還有一個「中」字。言外之意，絕對不同意中國第一執政大黨是哪個國際的支部。[12]

那時候報紙[13]上還出現過這樣的報道：張瀾表示希望毛澤東成為中國的鐵托。[14]

對於革命，包括武裝化的政治，終生竭盡全力保護地方與平民利益的張瀾曾經説：

一旦社會主義之潮流洶湧澎湃而來，盲動盲從，徒襲社會主義之名詞、揭社會主義之旗幟，而肆行其掠奪殺戮之慘，其禍之廣延迅捷，為有十百倍於近年之以土匪而冒護法靖國之名荼毒地方者。[15]

所以，中共奪得政權奠基之舉的「三大戰役」，在表老眼中，無疑以數百萬生命和剛剛得以喘息的民間活力為代價，是不會有什麼好印象的。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僅中共，連他的在滬中委都一直催他，但他一直拖着，不肯去香港，也不肯去哈爾濱，直到軍統毛森把他搶到手，準備塞進駛向台灣的船裏——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周恩來直接策動「戴罪立功」的特務，在最後一分鐘將他奪回黨的懷抱。

被奪回之後兩週，張瀾抵達北平，周恩來、還有「他的學生」朱

德接站。總司令上來就是一個軍禮。毛澤東第二天到他下榻的飯店拜望，當晚家宴恭候。

這是張瀾。張東蓀呢？

從西柏坡回來後，他沒離開過北平。他本該很忙，很張羅，很興奮才是，但是，從春到夏，竟然是從未有過的無精打采。

去西柏坡前，他曾經應邀出席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與會者多為燕京、清華和北大的教授：許德珩、章友江、袁翰青、雷潔瓊、吳晗、嚴景耀、張伯駒、聞家駟、樊弘……。依慣例，東蓀先生為座談會開場，也如往常那樣，對時下大家最關注的題目發言。他沒有迴避，但只說了短得不能再短的幾句——要麼在敷衍，要麼教授自己也正糊塗着：

> 今天知識分子在中國問題並不嚴重。所以有問題，是社會有了變化之後，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上也將有變化。
>
> 以後的問題，不是人家對知識分子怎樣，而是知識分子本身對國家如何貢獻，以及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譬如在心目中想像一下將來的社會，覺得會是一個什麼樣子，自己就決定以哪種知識來貢獻，這樣做自會心安理得。作為發起的話，簡單如此。

不能說通篇無一句肺腑之言（像他慣常那樣），但對照不久以後執政黨把知識分子放在砧板上的架勢，希望他們既跟黨走又「心安理得」，怕是高得離譜的奢求了。

講話記錄發表在當月的《中國建設》，並依慣例出了小冊子《知識分子的新方向》。[16] 封面上，張東蓀名列第二。壓軸的一篇，已經是時新人士對蘇聯的介紹：〈新知識分子的理論與實際〉——自此，上海營造社的《中國建設》遂成絕響，成為北洋時期以來，中國出版自由可憐的尾聲。

而不過三個月前，在他應清華學生之請，到校作題為「雙十談國事」演講的時候，卻是那麼清醒、犀利。那天他談的是革命，不僅因為「雙十」本是革命紀念日，即將到來的共產黨的革命，也讓所有（非地下黨員）的學子既興奮、又好奇。張教授並非一概反對革命。他認

為「社會不公到了一定程度，改良又無法推行的時候，革命必發生。究其所以發生，與其說緣於革命者，毋寧說在於被革命者」。[17]

這回，在「革命勝利」即將到達之時，他希望青年們有清醒的判斷。在列舉了自辛亥以來中國發生的一次次「革命」之後，張教授說：

> 三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換朝代也不知有幾十次。如果這樣的換朝代也算是革命的話，在這三十多年中，命也革過幾次了。袁世凱被革之後，張作霖、吳佩孚不也都被革了嗎？國民黨的革命與歷史上的革命完全一樣，吳稚暉先生就曾說過：革命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幹。我看這是不對的。既然是革命，就要拿得出自己的一套。土地改革也罷、其他也罷，總要拿出自己一套本領來。在這種打倒你、我來幹的政治中，民主是無從談起的。
>
> 對於革命的認識，要打倒假革命，才有真革命。革命就是要使中國走上一條嶄新的路，絕不是歷史上任何的舊路。

盟中之「左」派呢？什麼是他們心目中「嶄新的路」？

沈鈞儒1927年剛參加國民政府工作，就已和中共早期黨員宣中華等密切合作。後世據其做派，贈送給他的那條「比共產黨還左」的雅謔，早在當時就當之無愧了。[18]後來，從1936年的救國會、到1939年的國民參政會（在1941年時跟着共產黨不出席）、1946年的老政協、1947年的國民大會……若說沈鈞儒、史良諸同志之行止，唯借趙樹理之妙言不足達意：「中共說長，盟『左』說不短；中共說方，盟『左』說不圓……」，包括戲劇效果極佳的「交紅心遊行」之類行止。[19]只可惜「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這一確評，直到1963年1月2日，在敬愛的周總理為他做八八米壽的時候才鄭重贈給他。

至於章伯鈞，無論從其青年時代的經歷（惲代英、蕭楚女志同道合的同志，由朱德介紹入黨）、其學養（專攻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其感情色彩濃烈的反蔣、作為國民參議員在延安的表現，[20]四十年代後期與中共之珠聯璧合，[21]還有「建國」之後的名利雙收，包括得知

被定為頭號右派時候所表現出對黨的體貼和諒解（「老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22]），以及「老毛」對他從來沒有像對真正黨外人士那樣「多禮」……僅定位為中共賦予實權的頭號民主人士都不夠了。整個一個「光榮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呀。

至於史良，我們只須對比一下她正式發表的、其八股氣無人企及的著作，與稱她「史阿姨」的章詒和對她音容笑貌之描述，就知道政治將人異化並分割，能到多麼匪夷所思的程度。史良擔任司法部長，正值上百萬人慘遭冤殺的「鎮反」、「肅反」，她有過什麼作為？緊接着，完全違背政協《共同綱領》而且毫無法律程序可言的「五反」（我們權且把「三反」看成中共內部整風），就算不敢抗拒，可曾有過哪怕一、二進言？有明確記載的倒是，在1957年6月14日民盟中央的批判會上，她曾以法學家的資格，認為儲安平的言論「有罪」。作為女性政治家，我們只希望她在對中共政治無甚大礙的《婚姻法》上，有些說得過去的業績（著者眼下還沒找到）。

這些深刻的、融入血液與意念的區別，外人難於區分。李宗仁代行總統之後，積極謀和，最看重的第三方面人物，是李濟深、章伯鈞和張東蓀——特別發出電報，邀請他們三位去南京。[23] 當然為共產黨所阻止。

民盟「左」派來到北平——如今當然用不着張瀾籌款了。經費哪裏來呢？據楊尚昆回憶，關於共產黨黨務活動，可否「依靠黨產收入和黨員黨費，而不吃國家」，還真有過不那麼霸道的提議：

> 當時經營黨產還有一個更長遠的考慮，就是全國勝利後，共產黨就不領國家的錢，自己吃自己的。進北平前，要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了，任弼時同志和朱老總提出：你共產黨不用國家的錢，其他那麼多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這個問題受到大家的重視。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會議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會議結論中明確作了結論：對待民主人士是個重要問題，我們應該公開地坦誠地和他們合作，統統吃國家的。黨產的問題，以後不搞為好，有飯大家吃，向他們說明就是。[24]

不僅吃(共產黨的)國家飯，連辦報的錢黨都打算包辦了[25]——民盟還能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路線麼？在即將召開的新政協，共產黨給了民盟十八個代表名額，大權控制在組織部長章伯鈞手中。論功行賞在即，民盟裏邊的派系紛爭，從原本正當與正常政治見解切磋，滑落到人事糾葛之下流——無權的非左派也得「紮堆兒」了。據章詒和敘述：

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於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沈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着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麼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26]

葉篤義說的也大同小異：

我到北平的第二天晚上，羅隆基就約我同到劉王立明家談話。……張東蓀當時也在劉王立明家。當天晚上羅對我說，我只弄到一個候補代表，還是張東蓀和他力爭出來的。張表老沒有替我說一句話。他還說沈鈞儒和章伯鈞各有一個小圈子，而又互相合作，我們盟內一些無黨派的人應當彼此多聯繫，否則一定處處吃虧。我聽了這一席話非常動容。於是以後經常不斷地到劉王立明家碰頭。……

小圈子第一個集中談的是政協及政府人事安排問題。張東蓀

當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員，心滿意足了，把政協委員讓給曾昭掄。羅隆基看到章伯鈞和史良當了部長，而他沒有當上，滿腹牢騷。周鯨文想當政務院委員，我想當副部長。除了張東蓀而外，其餘的人都為自己的安排不滿意，而認為自己在盟內受了排擠。[27]

張東蓀的確介入了這個「小聚會」，確實將政協委員讓出來，也的確曾為葉篤義的代表資格而力爭；但若說他得了賞賜即「心滿意足」，恐怕是最終成為共產黨員[28]的葉家老五，對這個他曾經出生入死協助工作的盟內前輩最大的誤會了。

其實，在為自己的地位，還有為共產黨是不是「生了我的氣」等憂心的時候，葉篤義對張東蓀還是有觀察的：

羅隆基重視人事，張東蓀卻不感興趣。他對政府和國家中的名位都無所謂，而想的是可能變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戰。[29]

除此以外，張東蓀一直憂心於士或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職責，更為他的同儕難過：

知識分子今天已分化了，直成一個五牛分屍的狀態。所以分化的原因乃是由於各人太思慮自身的利害而把大局的利害置於次要之列，或竟置於腦後。

什麼是大局？除了前邊說的中國將走上嶄新的路、世界大戰等，梗在他胸中的，是私兵傳統深厚的中國軍隊——平民膏血供養、黨酋私倚為至寶的槍桿子。他認為：

中國自有歷史以來，軍隊只是為帝王打天下的，從來很少有替民族全體來抵抗外來的侵略者，即偶有之，也總是戰敗。……中國今後的安全，仍是託命於國際的安全保障理事會之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可以大膽主張中國沒有保留鉅額軍隊之必要。換言之，即中國的軍隊既不能單獨作戰以抗擊侵略者，則其用處至為有限。不妨徹底裁兵，而改為國民徵兵之義務教育，使每個公民皆有軍事知識，一旦有事即聽從國際軍隊之指揮調遣。

> 至於在本國既決定實行民主政治，想從政治上得着一個永絕內戰之道，則決無軍隊分省駐紮之必要。即軍分區亦可不必。……軍人當以其軍事上的學識而見重於社會，不必擁有軍隊。於是軍人便與政治不發生直接關係，使其不為任何人爭地盤與打天下之用，不做擁護某一人某一派的工具。必須如此，中國方能上軌道。

此番言論，在執政者依舊堅持黨指揮槍，明確反對軍隊國家化的今天，不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

後來，葉篤義被任命為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上班拿工資），與黨走得愈來愈近。依曾昭掄看，是「得到了黨的信任」；用羅隆基的話說，是「黨內有人緣」。這名老資格的小字輩則反過來替老夥伴們着急：

> 解放後我一方面在工作崗位上取得了黨的信任，一方面覺得羅隆基、張東蓀同章伯鈞、史良比起來有些像扶不起來的阿斗。……我經常勸羅隆基多同統戰部接觸，借此同章伯鈞、史良競爭。我經常勸張東蓀多寫些表示態度的文章，怕他的消極態度惹起黨的不滿。[30]

但張東蓀不僅扶不起來，還不吃「扶」。

在6月底7月初，文化學術界「組織起來」的時候，隨着新法學、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紛紛成立，新哲學研究會也召開了「發起人」會議，討論籌備會的組織章程和暫行草案。主席是老黨員李達，三十年前「社會主義論戰」的對手，〈張東蓀現原型〉作者；副主席是延安來的艾思奇，十四年前「辯證唯物主義論戰」的對手；此外倒也延攬了一位研究康德的鄭昕。這個「發起人」會議選出了十一人的「籌委常委」，把他、還有金岳霖、湯用彤都算了進去，加上專攻馬列主義的胡繩，卻沒有了怎麼看都應該延攬入局的馮友蘭。

此局面，估計毛的意見起了作用。馮友蘭第一次與毛澤東直接接觸，是在1949年10月。當時有許多人向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他

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那封「取老實態度」的信就是這次回的：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覆。敬頌

教祺！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31]

兩人說的都是實話，雖然不算直白。想來毛對馮在「舊中國」努力靠攏當道的表現略知。今日之靠，態度雖好，總顯得有點酸。況且，對於將此等樣人玩於股掌，毛不僅樂此不疲，心裏也是有數的：對馮友蘭的重用終於到來——在文革中。

新哲學籌備會提出組織中國新哲學研究會的意義：「團結全國哲學工作者傳播馬列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以期正確認識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批判吸收舊哲學遺產，在文化思想戰線上展開對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批判。」

這類「大話」，我們今天已經知道，或騙騙小孩子，或嚇唬沒底氣的。張東蓀什麼人？就算他對這些新、老革命家和他們的「哲學」研究，曾經心懷非比尋常的寬宥，考慮到他不過幾個月前，還曾針對他們對「批判」之喜好而寫過的奉勸，如今在這樣的號令下與他們共事，怎麼打得起精神：

我卻有一個印象，似乎民主人士（此處的民主人士是張教授對正倡言民主的革命者非嘲諷性恭稱——著者夾釋）的言論中很少對

於這一批非偽裝的自由主義者採爭取與聯絡的態度，總是動輒稍見異議，即不問動機，一律加以駁斥。態度尤其是往往流於尖刻毒辣，尤其是對於自由主義一詞不加以分析與剖解，只是一味蒙頭蓋臉，亂罵一陣。這樣實在容易使人誤會，以為民主人士沒有容忍與寬大，亦就不具有自由的胸懷的陶養的風度。我雖然並不承認民主人士是真正如此，但我仍願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語來奉勸民主陣線的一班言論家。[32]

他說的，是1948年底那次超乎尋常地失了分寸乃至風度的批判。據馬逢華回憶：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次年二月一日，北平是一座圍城。黑暗、寒冷、饑餓、骯髒。北京大學的五十周年校慶，原來預備擴大慶祝的，這時因為局勢急轉直下，終於草草了事。校園裏面，除了在「安全委員會」領導之下，有一部分學生在「民主廣場」挖掘避彈壕溝之外，其餘是一片死寂。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先生一天在北樓飯廳裏苦笑着說，「咱們都像是下了鍋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要變紅了。」……

北平圍城的後期，……沉悶了好久的北大「民主牆」上的那些壁報，忽然又熱鬧起來，並且不知道為了什麼，有幾個壁報集中了火力，向沈從文展開攻擊。還有一份壁報把郭沫若從前在香港寫的辱罵沈從文(「粉紅色的作家」)、朱光潛(「藍色的作家」)和蕭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報指責他的作品中的「落伍意識」，有些則痛罵他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妓女作家」。[33]

其實，對「前進陣營中的民主人士」，張東蓀在這裏十分客氣。他不知道，這批「民主陣線言論家」其實是在奉命行事。所謂「命」，即發佈於1947年10月底那個駁斥「和平統一大同盟」的黨內指示。在這則周恩來起草的指示中，毛澤東特別加寫了一段關於「在政治上要

孤立自由資產階級」的話。[34] 張東蓀那時候不知道，郭沫若、邵荃麟輩哪裏是欠缺「自由的胸懷的陶養的風度」，他們當時的地位是「挨了批評的香港地下黨」，必須以過頭的戰鬥風采再度贏得組織信任。他同樣不知道的是，類似具有相當殺傷力的鬧劇，還要在以後三十年不停搬演。

共產黨指揮若定，包括對張東蓀的指揮。作為人所共知的「功臣」，張東蓀不用活動，已經在新局勢下「得到了重用」。

除了即將撤離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在這段時間，與張東蓀有交往的，還有下文將說到的一位名叫王志奇的「小卒子」。[35] 至於大學同事在前地下黨學生的指揮下所作的表演（8月5日《白皮書》發表後，燕京大學124位教職員聯合發表聲明，斥責這一文件），他只有站在一邊冷冷地看了。

但「小圈子」不能光發牢騷。在憲政與法制方面的所長無法發揮，[36] 羅隆基只好另闢蹊徑，組織「聚餐會」以文會友，開展學術報告和討論。諸如《蘇南義田的歷史研究》（潘光旦）、《美日媾和的法律問題》（梅汝璈）等。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共產黨，對這類題目自然毫無興趣。但組織這類研討的「羅隆基、張東蓀小集團」，已然按照共產黨的標準被確認了。

這就是美帝懷着切望、毛澤東忌之極深的「民主個人主義者」？

9月21日，周恩來最後報告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和代表分配情況：張東蓀列位民盟正式代表（共十八名）；任大會主席團成員（民盟五人之一，開會時須登上主席台）；參加「國旗國徽國都紀年方案審查」。

9月30日，他以得票倒數第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37]

緊接着，該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第三次會議任命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副總理——民主人士佔了一半；政務院委員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佔60%；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佔45%。張東蓀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這回，只能借用廣東人的話了：嘩！居然到了這樣的比例——

不僅超過了他們自己的渴想，幾個月前叨叨絮絮的美帝，也不曾料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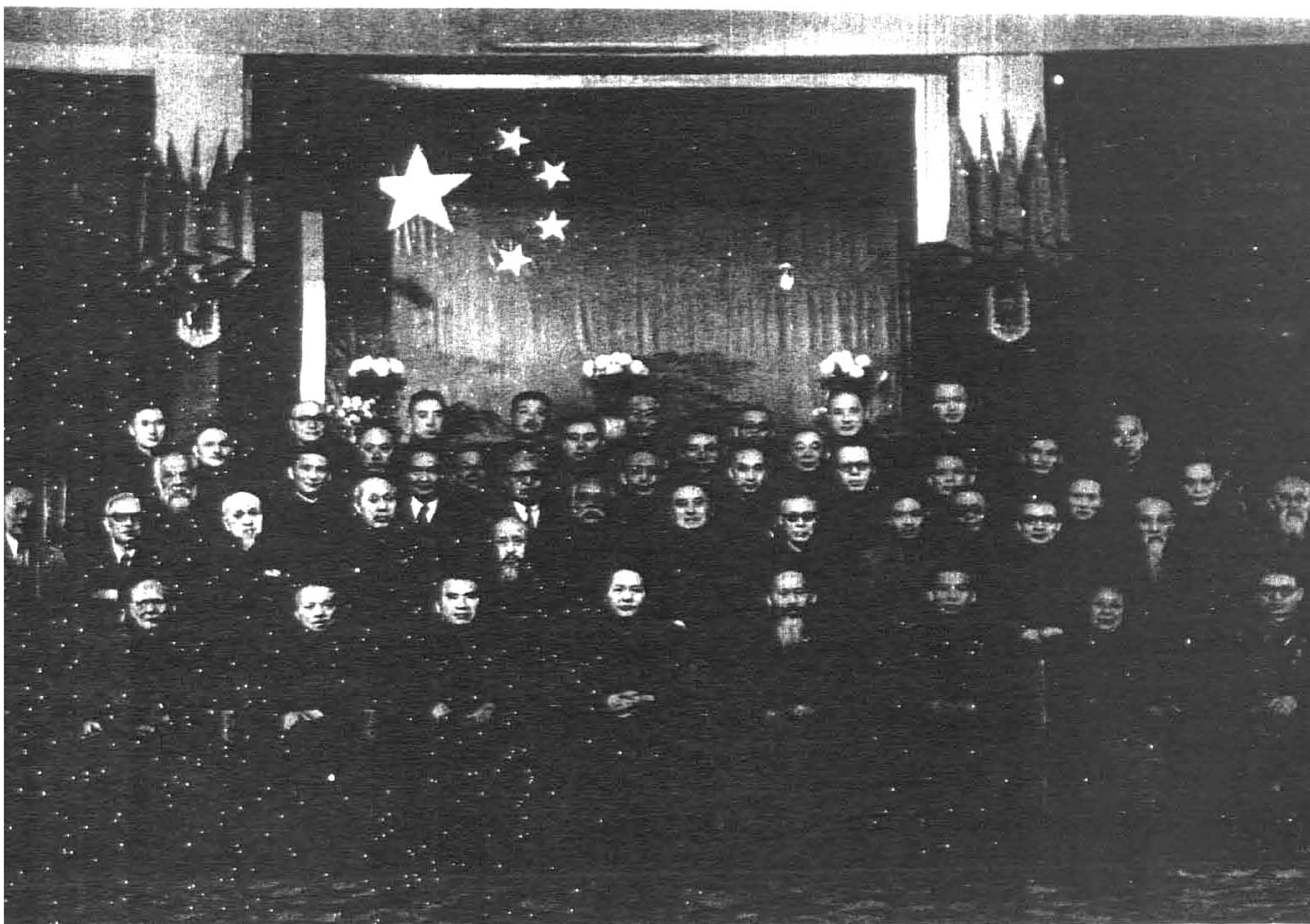
毛澤東笑了：未來中國的政府裏盡量吸收一些民主開明的人士參加，用得着你美帝來干涉麼？至於這樣的比例會在決策中起多大作用、會維持到什麼時候，更是你管不着的了。

做到這一步，也只能出自毛這樣的大手筆。誰都知道，古今中外，革命之後，最難之處，莫過於處置功臣。譚震林在春天裏，就曾經得意洋洋地在市幹部大會上說：「毛主席在北京做皇帝，我們都是封疆大吏。」[38] 到真的建了國，政協會議代表（各黨派、團體）名單一公佈，打天下的英雄們立時炸了鍋：什麼!?老子在戰場上打倒、活捉的敗將，怎麼全混進來了？同志們出生入死，一個月才五塊錢；他們大米加豬肉，我們小米加青菜。有的更形象：「什麼民主黨派，不過是一根頭髮，拔了就拔了！」

但在毛看來，有些人可以「拔了就拔了」，比如北平和談時候的彭澤湘，比如國共和談時候的甘介侯[39]，乃至何其鞏。但有的大角兒，不拿在手上玩玩，不僅不夠意思，其教喻意義（或曰殺雞儆猴效用），也放棄得過於輕易了。

1949年11月中旬，民盟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擴大會議。這是怎樣的一個會呢？葉篤義以為不過是「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的方針。批判的對象集中在羅隆基的親美路線」；[40] 殊不知其更為重大之處，直到八年後的整風反右，才由周新民明確道出：

> 這次全會，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但是他們鑒於大勢所趨，又不敢公開反對，乃借人事安排鬧得四中全會開了一個多月，無法閉幕。羅隆基、張東蓀、潘光旦、范樸齋等四人曾請求周恩來出來幫助和指導。周總理接受他們的請求，約定沈老（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以及其他負責同志於某一日晚間，到國務院（著者按：應為政務院）西花廳商談，沈老和其他負責同志均準時到會。等到深夜十二點鐘，羅隆基和張東蓀仍拒絕不來，四處打電話催促，



中央政府委員合照。前排第三行右數起第三位是張東蓀

羅、張始寫一信派范樸齋送來。經周總理嚴厲批評，范樸齋又倉皇奔回，報告羅、張，到了深夜一點多鐘，羅隆基、張東蓀才狼狽而來。[41]

會議中間，毛澤東到場，給批得灰頭土臉的自由派留了一條活路：

1949年12月5日傍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參加民盟一屆四中全會的全體代表。毛主席和代表們一一握手，關心地問到了開會的情況，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一個政黨是不能不犯錯誤的，總是要有錯誤的。克服的方法就是要多加分析。一個黨內有許多山頭，但是要克服山頭主義。沒有不團結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就會無往而不勝。[42]

周恩來也專門為他們開了招待會，說民盟「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雙方（在共產黨的斡旋與指導下）達成協議——中國民主同盟，作為「參與政權的一分子」終成正果：

「本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之密切配合工作，以期在革命建國的偉大事業中盡其最大的努力。」從此，中國民主同盟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治制度下參政的新型政黨的地位，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43]

這是張東蓀最後一次過問民盟事務，是他打起精神最後的抵抗——以慘敗告終。用羅隆基的話說：「盟章有了這樣一條，民盟的生命就結束了。」[44]

到12月底，安排人事的五中全會接着召開。除了無可搖撼的正副主席張瀾、沈鈞儒，設立了十人「中央政治局」，章伯鈞被挑選為「政治局」秘書長（總排名第三），張東蓀從原先排名第四，落到最後一名。

沒有出局，可能出於統戰部的客氣。但他們這批「曾經犯過錯誤」

的親美分子，在大家都一門心思、一股勁地靠攏黨、爭取進步的時候，也不能說完全沒用。政協民盟代表第十名的周鯨文後來回憶：

> 北京政權成立不久，統治民主黨派的中共統戰部，先把各黨派中的民主人士，分成三類格：一、積極分子；二、中間分子；三、落後分子。我和羅隆基、劉王立明等人被列入「落後分子」這一格。每有發言，就有積極分子攻擊批評。此外，統戰部儼然以民主黨派的太上皇自居，不但遇事指導，而對個別的人又常給以顏色看看。[45]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　府字第 0156 號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通過任命張東蓀為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

員會委員

[redacted]

特此通知

主席

一九四九年



日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張東蓀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的通知書

但在開始的時候(《白皮書》發表和新政協會議之前)，毛澤東確實沒把張東蓀當外人。除去種種場面上的應酬，毛、江伉儷對他的宴請，在同類人中算是多的。這些，正史、野史都未見記載，但張家的人記得「爺爺回家說」，有一次，張東蓀、張奚若[46]在座，毛主席說：「中南海裏蓋了房子，是不是搬進來住？」二人均辭謝。毛沒有生氣，只說了一句：「你們是要自力更生呀。」對此，張奚若好有一評：「宴無好宴，這是對你不放心。」

後來，在別的場合，毛(也許是毛的屬下，曾轉致毛的好意)問起東蓀先生對位置安排、待遇等等「要求」。張東蓀表示，一切職務不要，也不進中南海，只保留燕京大學教授。至於辦公室、秘書、警衛等，他都謝絕了，但接受了司機和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待遇)。張飴慈記得：爺爺什麼職務都不願承當，在盟內也不願。每每開會回來，就一句話：「拍馬屁！」

黃炎培顯然不作如是想。1949年3月毛剛到北平，宴請大家之後的第二天，又單獨設晚宴招待，兩人暢談時局直到深夜。他的傳記作者說「這是其他人士沒有得到的殊榮，使黃心潮澎湃。」——這澎湃幾個月後就落到了實處：民建在《白皮書》上立了大功。至於報答，聲明的起草人孫起孟[47]轉年1月即被接納為光榮的共產黨員，黃本人則在幾個月後被安置在副總理位置上。

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後，張瀾的夫人及兒女從四川遷到北京。表老保持其一貫風格，一次次拒絕國家為他安排的住宅——在他看來，那些院子委實太大了，房屋也委實太好了。後來，終於找到一處小小的舊宅院。[48]開國大典前幾天，按照周恩來指示，有關方面撥了一筆服裝費，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現在天安門城樓。張瀾婉言退回，說：「國家的錢，即人民的錢，我怎麼可以用來做了長袍穿在自己身上。但總理的考慮是對的，我保證著新裝與民同慶。」他自己出錢，趕製了一件布長衫，罩在舊棉袍之外。[49]

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沈鈞儒，據他的女兒回憶：在那時候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說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太優待了——他當時住的房子很寬敞，很漂亮，還有一個警衛排。……他每天都打打太極拳、

還很喜歡打乒乓球。對於時事，父親非常關心，對於當時的書報閱讀得非常認真，在他的書桌上，擺滿了主席的著作。

章伯鈞表現的，無論房舍還是氣概，與中共高官沒什麼差異。章詒和的著作給出了不少細節：

> 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這院子後來）一分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進去住的是萬里，後為段君毅。跨院分給了藝壇領導高占祥。
>
> 新中國成立，我父親在政府和其他部門擔任許多職務，……每年都要出國，參加世界和平代表大會。他春風得意，心情舒暢。[50]

斡旋失敗後就離開民盟的梁漱溟，上邊的熱鬧都沒有參加。他是在1950年1月，「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召」到北京的。毛從蘇聯返回的第二天就在頤年堂設宴招待，問「梁先生」：「這次到北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了吧？」梁遲疑片刻之後的回答是：「像我這樣的人，現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麼？」這前後他一直借住在親戚家，毛得知後，令徐冰先將梁全家安排住頤和園石舫附近一四合院（兩年），隨後在城裏安排了住房。[51] 依照毛的安排「到各處看看」之後，梁漱溟寫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光明日報》1951年10月），以及〈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1952年5月，五萬言，交林伯渠秘書長閱後呈毛澤東）。

比較慘的是民革的柳亞子。自以為必定落到頭上的高官厚祿，不僅須自己開口，竟然在中共、更在民革連連碰釘子——最後寄希望「潤之」能將頤和園「賞賜」給他。在這麼一個小小的願望都不予滿足的大窩火下，這廂裏與當今唱和，那廂裏卻與警衛動起了干戈，終於在歷史上留下那句不大為人所知的主席調侃「醉尉夜行」[52]，還有幾億中國人倒背如流的領袖名句：「牢騷太盛防腸斷」。

細細思索1949年從春到秋，也就是大家湧進北平之後，共產黨（主要是毛澤東）對美帝曾寄予希望的「可能成為鑽進肚皮的孫悟空」——張瀾、陳銘樞、梁漱溟、羅隆基、張東蓀、劉王立明、葉篤

義……的態度和處置，不禁感喟交集。敬誰拒誰，親誰疏誰；什麼時候把哪個拉一下，什麼時候對誰推一把……，毛澤東、周恩來、李維漢諸同志配合得絲絲入扣，把古人「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53]的道理玩得淋漓盡致。

力主階級和諧，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絕對不敢苟同的張瀾，從出任民盟主席之始，就聲言：「共產黨能放棄階級鬥爭，走上民主的道路，民主同盟即與之攜手取友好態度；如共產黨還要蹈襲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民主同盟絕不與之合作。」[54]——說這話是在1945年。那時候，西南地方將領劉文輝、潘文華、龍雲等，還有相當一批實業家，包括國府官員都是民盟的秘密成員，毛澤東當然硬着頭皮聽。進北平之後，雖然被胡耀邦讚為「高尚的精神，這就是他的頑強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優良的氣質，就是他有強烈的正義感」，[55]當年風采已然不再。唯一令人尚感欣慰的，是1953年梁漱溟遭毛訓斥時，他沒有像別的「民主人士」那樣給極峰助威，而是在第二天「上書」毛澤東，說「『反動透頂，一貫反動』，其言重矣，其論失公正矣。」[56]

對陳銘樞的安排，與他的期望值相比，可算是快「說不過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作為軍人政治家，他對國家政治體制沒有什麼建言，批評毛，多集中在執政風格上：「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難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生出了浪潮，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是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可惜這些話直到1957年，遭民革老同志痛批之後才得以披露。1953年的大會上，他是僅有的在發言中沒有對梁漱溟惡言惡語的與會者。

梁漱溟理論修養自成一家，根底深厚。對毛，是無論私下還是公開，無論身處高位還是低位，都能講出自己真見識的人——或許性情使然，或許對領袖的「雅量」及與自己的私交，有不切實際的估計。他1953年在全國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小組討論上說的話，本被

周恩來看好(「很有代表性」)，才建議他第二天到大會上發言的。沒想到多年積聚在毛心裏的不快(估計是從梁那裏總不見阿諛)，驟然爆發。之後梁漱溟鞠躬退場、閉門思過，「政協委員照當，工資照發，也沒有受到任何正式的處分」。因為從此沒了聲音，1957年也用不着再整一次，直到批林批孔的1974年才又見風采。可惜到八十年代接受本著者採訪的時候，對1953年那次令好幾代人欽佩的風骨一現，居然一再說「是我不好，我不該惹主席生氣」。

遭迎頭痛擊之後，羅隆基調整步調，努力適應新社會。雖說給歸到一個小集團，他與張東蓀其實很不同。張傾心自由與獨立，多出自學理思考，而羅隆基推崇民主與現代政治，主要來源於他所受到的訓練——包括他的性情。他當然知道民主政府須基於平等與協商的原理，但從他所發的那個精彩之極的不平——「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57] 可看出他長於運作而缺乏深邃探索，特別是對古老中華君臣將相思維定勢缺乏認同的特徵。行書到此，著者忍不住非引一段可與此相媲美的1957年大會批判詞不可了：

> 誣衊我們的領袖是大獨裁者，……說他「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的」。陳銘樞，你這種歪曲和污蔑連三歲小孩子也能把你駁得體無完膚，也要舉起他們的小拳頭來活活把你打死。[58]

淳厚、賢淑的劉王立明本來最得張瀾信賴。她不大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不料1951年因無城府而說了實話(蘇聯軍人在東北的違紀行為)，給一把抓住，以「反蘇」言論受盟內嚴厲批判。她從此脫離「小集團」，只乖乖地按照黨的要求做無傷大雅的婦女工作了。

公子哥兒出身的葉篤義，當年以自己剛剛繼承的資財辦進步書店，多麼富於朝氣。1949年驚嚇之後被統戰部梳攏，最後從1983年起連任民盟五屆、六屆副主席。靠攏黨幾十年，出生入死、打成右派、坐牢，一樣不少，少年時候自由派底色仍難於抹去。最後出版

了回憶錄《雖九死其猶未悔》，讀者讀到了「九死」，讀到珍貴史料，卻弄不清葉先生究竟為什麼而不悔。

張東蓀在1949年受到的對待最值得思量。

平心而論，他名聲不那麼赫赫、人脈聯絡也不是那麼廣博，沒有四處活動，眷寵卻從天而降。如果不是張瀾的特別堅持，只能看作是毛澤東的安排了。

毛澤東這麼對他，如若不為照顧而是有意延攬，那這回真是打錯了算盤。就理論而言，如果説陳獨秀、李漢俊他們都已經離開，陳伯達、艾思奇畢竟小了一輩，弄得毛對張東蓀早期著述不甚熟悉，但《觀察》他們總會派人看的吧？怎麼會挑上張東蓀（還有更年輕些的張奚若）呢？或許偉大領袖受的奉承已經太多、太甜膩，反倒喜歡湖南辣子？

一直到文革初起，張東蓀才對他的長孫飴慈談起毛澤東的「厲害」。他説，建國前，有一次在頤和園開會，毛站起來蹺起大拇指説，「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讀者可能還記得傅作義到西柏坡去看他的時候，毛説的第一句話：「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會後張找到毛，表示這樣説不合適，因為北平和平解放，盡力者大有人在，「這樣説，我要得罪許多人了」。毛回答説，得罪人是我得罪人，和你無關。飴慈還記得爺爺當時再次提起十六年前西柏坡一幕，説毛這人厲害呀，他大談梁啓超，以崇拜的口氣。對《時事新報》前後那一段，是相當了解的。

張東蓀和張奚若確實以對獨裁政府沒有好感而聞名。徐志摩在1925年説，「奚若這位先生……是個『硬』人。他是一塊岩石，還是一塊長滿着蒼苔的（岩石）」。「他的身體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説，更是硬的」。到了1956年張奚若仍直言：「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對毛澤東的估評，就是那個名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了。

他們過去表現得「硬」、反對專制獨裁、對當局嚴厲批判，這固然給處於困難時期的共產黨幫了大忙，但毛澤東難道不清楚，其中起作用的是學養與誠實，並非投機與投靠。

看走眼一次沒關係。他有的是時間改正。

無論是得意的沈鈞儒、章伯鈞們，還是開始失意的陳銘樞、羅隆基們，可能都不知道，早在若干年前，共產黨對他們這批人的「地位」、「名份」，早有打算。毛澤東說：

安排民主人士好處很多：第一，可以「賺」人，各方面的非黨人物都有當副主席、部長、司令員的，「朝裏有人」，國民黨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賺」來四萬萬人民，賺來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賺」一個社會主義。這叫做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59]

周恩來在1950年也承認：

我們所以承認這些人物，是因為他們有群眾。我們所以要做他們的工作，也是要經過這些人物去教育其群眾。[60]

這些，他們自己知道麼，在1949年9月？

天涼好個秋啊！

註釋

1. 張東蓀：〈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觀察》，第5卷第11期，1948年11月。
2. 周新民(1897–1979)，法學家、政治活動家。安徽廬江人。1926年加入中共，1942年加入民盟，1943年被中共南方局派往昆明，受命擴大愛國統一戰線。1947年底民盟醞釀一屆三中全會期間，中共對他這名最早的跨黨黨／盟員有什麼具體指示，目前尚未見文字披露。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最高檢察署秘書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盟組織部長、中科院法學所副所長等。
3.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頁167–168。
4. 毛澤東：〈關於情況的通報〉，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298。

5.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58。
6. 據葉篤義回憶，參見註5，頁58–59。
7. 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張瀾》(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第15節。
8. 電文：上海市政府潘副市長轉張主席表方暨羅隆基，史良，郭則沈諸同志：世電諒達。諸同志久困滬濱，領導盟務，殊為敬佩。上海現告解放，請即聯袂北來，主持四中全會，商訂本盟今後決策。特電歡迎，並盼告行期。沈鈞儒 章伯鈞 黃炎培 張東蓀 周新民暨臨工會全體同志 1949，5，31。
9.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358–359。
10. 這封《建議書》還在討論的時候，史良、楚圖南、郭則沈等即表示反對，最後以「在滬中委致信沈、章」的名義，由葉篤義交給當時正在上海的吳晗，委託他交沈、章轉中共。1949年8月，葉篤義輾轉到北平後，對照當前局勢，想起這封信，嚇得夜不成寐，只希望吳晗沒有轉。讀者細想，有這個可能麼？沈、章怎麼可能不希望共產黨知道羅隆基輩有過這樣的心思。果不其然，信正在共產黨手裏。只是在1949年那時候，李維漢高姿態地容他「過去的就算過去了，一切從頭學起」。參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信，據吳晗在1957年批判會上揭發，內容略有出入：羅隆基託他帶封信給沈鈞儒，信中羅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幾個條件：(一)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協和外交；(二)民盟成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09–310。
11.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67。
12.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68。
13. 據葉篤義記憶為《申報》。
14. 張氏稱：「我希望毛澤東抱定〈新民主主義論〉裏的理想，而不要服從共產情報局的政策。」轉引自趙錫驊：〈張瀾在開國大典前夕〉，《紅岩春秋》，2004年第5期。
15. 同註7。
16. 《中國建設》北平版第1卷第2期，1949年1月，中國建設出版社。

17. 張東蓀：〈增產與革命〉，《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4期。
18. 1927年4月大清洗中，他最親密的中共戰友宣中華遭殺害，在其遺物中，發現他稱沈鈞儒為「真左派」。參見沈譜口述：〈沈鈞儒：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中國政協新聞網」(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3328444.html)，2005年4月18日。
19. 那是在1958年，北京民主黨派向新疆同儕學習，民盟的遊行隊伍高舉紙糊「紅心」，率隊者沈鈞儒。參見錢鋼：〈紅心的故事〉，「民間歷史」網站(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86)。
20. 赴延安訪問的六位國民參政員之一的傅斯年，對其他五人恭維毛澤東不敢苟同。他形容早年參加共產黨的章伯鈞，在延安的表現，可看做是「由第三黨歸宗」。
21. 1946年底蔣記國大前後，司徒雷登以自己的觀察，曾私下問過與他有師生之誼的葉篤義，「沈鈞儒和章伯鈞是不是共產黨員」。參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60。
22.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04。
23. 李維漢：〈真假和談的鬥爭——記北平和談〉，《中共黨史資料》，第16期。
24.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11。該回憶顯然迴避了黨的經費中蘇聯援助、「打土豪」(劫掠)和其他黑色收入(如鴉片種植和貿易)。精細的研究有待同儕精進努力。
25. 1949年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了民盟總部第十一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統戰部委託其接管敵偽報紙的事。會議決議提及「開辦費請政府撥款」。另外，關於國庫負擔黨費問題，民盟本來概念清晰。章詒和追憶章伯鈞、羅隆基晚年談話稱：1941年的民主政團同盟為政治民主化、要求結束黨治，特別提出：政府一切機關嚴行避免為一黨壟斷及利用政權吸收黨員；不得以國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黨費，包括政黨活動之所需經費。當時這些條款都是針對國民黨的。蔣介石看罷，為此對張瀾大發脾氣。而此前黃炎培怕對國民黨刺激太大，曾明確要求刪去反對國庫負擔黨費等條款。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1、338。
26.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05–306。
27.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78–79。

28. 葉篤義一生三次提出入黨——1953年、1962年和1981年。最後得到批准是在他已經從民盟副主席位置上退下來的1993年，時年八十一歲。葉家兄弟姐妹十幾人，各有所成，個個出類拔萃。
29.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80。
30.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82。
31.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344。
32. 同註1。
33. 馬逢華：〈懷念沈從文教授〉，《傳記文學》(台北)，1963年1月號，首發自《自由中國》(台北)，1957年2月1日。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248。
35. 葉篤義回憶，張曾帶王志奇到民盟總部見張瀾和他，說王想送張瀾一件皮襖。二人見了王，也接受了禮物。
36. 羅隆基的核心政略概括起來有兩項。一是要求政治民主化，另一個是主張軍隊國家化。而政治民主化的內容就是結束黨治……比如嚴行避免任何黨派利用政權在機關、學校推行黨務；政府一切機關嚴行避免一黨壟斷及利用政權吸收黨員；不得以國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黨費；包括政黨活動之所需經費等等。
37. 據新披露的宋雲彬日記，在張的名字下邊劃「×」的，有宋一個。宋先生從專業看，屬於文字學家、教育家。政治傾向(以及待遇)：沈鈞儒麾下救國會；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文聯主席；1957年未能倖免。
38. 武宜三：〈千家駒們的悔恨與徐四民的明白〉，「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2005年10月27日。
39. 甘介侯，李宗仁幕僚。因在「解放戰爭」中曾試圖和緩局勢，毛親自著文臭罵之——「這類從事『和平攻勢』的政治掮客」。參見〈中共發言人聲明拒絕甘介侯來平〉，載《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281–282。後李宗仁回國，提出一個可以動員回國者的名單，其中便有甘氏。周恩來看過，當即劃去甘的名字，並告訴李宗仁，此人不能回來。甘最後客死美國新澤西。
40.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73。
41. 轉引自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12。
42.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頁178。

43. 同註42。
44.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12。
45. 周鯨文：〈與中共領導人談法治〉，載《中國大陸自由化運動——救中國、救亞洲、救世界的鑰匙》（香港：時代批評社，1982），頁275。
46. 政治學和法學教授張奚若在〈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一文中說：「帝國主義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還高唱尊重我們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無緣無故地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帝國主義只能暗中幫助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然明目張膽地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你說它不是我們的敵人是什麼？」徐志摩說：中國對蘇俄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的一個毒瘤，裏面的膿水已經滿了，但是卻沒有獨立見解的人去觸動它。他認為張奚若是這個最無恥的時代裏能夠挺身而出的最知恥的人。參見智效民：〈火燒晨報館事件〉。在國民參政會上，張奚若發言批評國民黨，被蔣介石打斷，張憤然退場。國民黨當局將下次開會車馬費送上門，張說「無政可參」，原費退回。
47. 孫起孟（1911– ），教育家，195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4月後，先後當選為民建第一至三屆中央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副主席。1987年12月後，先後當選為民建第四至六屆中央主席。1996年12月、1997年11月先後被推舉為民建中央名譽主席。他也是第一至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88年4月、1993年3月先後當選為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48. 張瀾並非1949年才如此。他任四川省長期間，不造公館，夫人在家鄉務農。1943年任「慈惠堂」理事長時，住該堂所屬培根火柴廠簡陋車間。
49. 梁曉聲：〈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紀念張瀾先生〉，《出版參考》，2006年第17期。
50. 章詒和的著作也提到，當了右派以後，房子沒有變。雖然失去了在懷仁堂看戲的資格，可以到全國政協參加晚會，去特供的小賣部買肉、蛋，到新僑、聽鸝館等供應首長的內部餐廳就餐。除每日三本的《參考消息》，司機、警衛、勤雜、秘書、保姆一應俱全。更令章伯鈞欣慰的，是得到西方世界的看重。據章詒和文，「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

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參見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67。

51. 吳黔生等：《肝膽相照》(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頁95。
52. 毛澤東1949年5月21日致柳亞子信：「某同志妄評大著，查有實據，我亦不以為然。希望先生出以寬大政策，今後和他們相處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則應進行教導，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發生。」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505。
53. 分別引自《老子》和《戰國策》。
54. 〈民盟的緣起主張與目的〉，原載《新中國日報》，1945年2月26日，第2版，轉引自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張瀾》。
55. 轉引自丁石孫：〈「他有很高尚的精神」——紀念張瀾先生誕辰130周年〉，《中國統一戰線》，2002年第8期。
56. 同註49。
57. 引自《大公報》1957年8月11日吳晗發言，轉引自謝泳：〈政治與學術之間——羅隆基的命運〉，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292。
58. 發言者蔣光鼐，原十九路軍總指揮，淞滬警備司令。時年七十歲。參見《人民日報》，1957年7月15日。
5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4。
60. 周恩來：〈發揮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積極作用的幾個問題〉，載《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77。

第二章



學人·思想者

由洋翰林而現代學人，絕非難事——
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整整一批，
近乎兩、三代。
可見認知上的現代化轉型，
並不如「打倒孔家店」者所溢估。

由現代學人而黨人，竟如江河傾瀉，
多少優秀者裹挾其間。
主人公徒然呼朋引類、擴大陣容，
可憐在覆蓋了全社會的黨人與黨爭裏，
勢孤力單……。

一

洋翰林

張東蓀生於光緒十二年(1886)，逮住了同光期的尾巴——清代末年難得的一段社會尚得休養生息的安定時光。

他的生日是12月29日，按華曆算，屬丙戌年末，比同屬狗、但生於1887年1月的張君勱年長二十天。陳獨秀比他年長七歲，毛澤東則年少七歲。

他的故鄉是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杭州)。這地方近代文化名人出得太多，夏曾佑(1863)、梁實秋(1903)、施蟄存(1905)、高陽(1926)，弄得他們已經沒興趣以自己為家鄉、或以家鄉為自己添光彩。著者與張家子弟接談，很少聽到他們提起「老家」，好像已經忘記自己光風霽月、人文薈萃的故里。

這或許與幼年東蓀一直隨父親住在他河北任上有關？在公開場合(以及對子女)，他講帶上海口音的官話；在家中對髮妻，說的則是蘇杭一帶的吳語。

東蓀屬於從海寧遷到錢塘縣的張家第十世。他的高祖第六世張雲璈，嘉慶時湖南安福、湘潭知縣(其父侍郎、副都御史張映辰，舅父大學士梁詩正，岳父大學士嵇璜)；第七世張裘，泰州知州；第八世張之杲(東甫公)，泰州知州；第九世張上龢，也就是東蓀的父親，一直在直隸偏遠、貧瘠小縣(昌黎、博野、撫寧……)任縣令。東蓀出生的時候，上龢正在內邱任上。到第十世，已經是他這一代了：長兄張爾田曾中舉人，官至刑部主事。所以，東蓀所在的錢塘張家

善詩，從第五世張映辰起，「皆仕宦，代有撰述，稱為清門」。[1]

張東蓀晚年曾續修家譜，[2]屬自己那欄，一直空着。家譜，依傳統須標上「官職」、「業績」。他對自己在國共兩方所獲「官職」，不說不屑一顧，想想也是痛苦多於欣慰吧。但將子孫的名字無遺漏一一親筆寫上，是不是覺得畢竟「張家有後」——自己的遭際一言難盡，孩子們的成績足以告慰先祖了。

還不足八歲(1894)，母親即病逝。時值光緒末，兄弟二人隨父扶柩返籍。錢塘縣家中，三位同父異母的姐姐都已出閣，年齡長他一輪的兄長從此擔負起扶持幼弟、敦促讀書之責。

張爾田(1874–1945)，一名采田，字孟劬，號遁庵、遁庵居士，中國近代史家，詞家。居上海時，與海寧王國維、孫德謙齊名，時人目為「海上三子」。三子之中，國維於史重地下文物，孟劬(即我們主人公的長兄兼啟蒙師傅)於史重「文史互證」，所著《史微》八卷，曾為日本列為大學研究文史者必讀之教科書。時至二十一世紀，還能見到青年學子在網上逐條逐句就《史微．題辭》「疑義相與析」。爾田任刑部主事是在光緒年間，後改官江蘇試用知府。辛亥後，「高隱不仕」，潛心著述。1914年，應趙爾巽之聘，任清史館協修。到後來，雖然沒有如他的摯友王國維那樣「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到民國後還曾擔任北大教授和燕大國學總導師，但終生篤信孔孟，唯求「心安義盡」，「有犯之者，必大聲所呼以斥，雖親舊，無稍假借」。[3]

張爾田藏書巨，著作豐。[4]東蓀也一樣。除此以外，兩兄弟無任何資財。爾田藏的主要是史書，東蓀書架上的，除了中外哲學著述，全是成套的詩書與詞書。

在東蓀成長的年月，清末新政已經開始。張家因世代為官，並一直以文名自詡，頭腦中難免根深蒂固地重文輕商，這對張東蓀內心深處(或曰下意識)的價值抉擇，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從少年時候，對當時正蓬勃生成的自由經濟，以及這一階層對法制的要求，他一直沒有特別關注——直到1920年陪羅素到湖南鄉下，才驚呼「中國唯一的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聯想到他們整整一批呼嘯於當時的啟蒙學者，耗費大量心血於國體、政體、立憲、組黨，而對

第八世 之杲

原名曾保字汝為號東甫裘媽三子生於乾隆
壬子五月二十三日卯時歿於咸豐癸丑八月初一日
中時年六十二歲葬海寧州許村鎮南鄉千
金橋
錢塘縣附貢生遵酌增常例報捐知縣分發江
蘇道光庚寅署華亭縣知縣辛卯護理松江
府事壬辰補嘉定縣知縣調署吳江縣知縣乙未
以嘉定任內勸捐賑濟出力奉
旨賞加州銜是年丁母憂丁酉服闋己亥署蘇州府
督糧同知庚子補陽湖縣知縣辛丑調署長洲

縣知縣兼理元和縣事癸卯升授泰州知州咸
豐癸丑粵匪陷江寧揚鎮相繼不守泰州戒嚴
積勞成疾丁巳奉
旨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恤追贈道銜
賜祭葬恩廕一子以知縣歸部候選
誥授奉直大夫著有初日山房詩集六卷泰州保衛記一卷
晉贈中憲大夫光緒丙戌奉
旨崇祀泰州名宦祠
娶沈氏國學生同里諱嘉字獻臣公次女生於嘉
慶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時歿於嘉慶己卯

七月初一日子時年二十四歲合葬海寧州許
村千金橋
誥贈宜人
晉贈恭人
妾潘氏生於嘉慶壬戌二月十七日丑時歿於道
光壬寅八月十六日子時年四十一歲合葬海
寧州許村千金橋
誥贈宜人
子三 上運 上綬 上錄
女二長適乾隆甲寅舉人刑部江西司主事同

張氏族譜中有關張東蓀的一支，載有第八代張之杲（號東甫）的生平資料

第十世

釆田

字幼航上繇嫡一子陳氏出生於同治
甲戌正月二十九日巳時
民國三十四年正月七日寅時歿
年七十二歲 葬北平西郊万安公墓
監生戶部主政議分刑部廣西司行走

娶陳氏同里人道光乙未翰林順天府丞諱寶
森號子嘉孫女同治庚午舉人戶部廣
西司郎中名惟號芝馨胞姪女山東候
補鹽大使名緯號少嘉長女生於同治
甲戌七月二十七日丑時歿於光緒戊
子十二月初六日申時年十五歲葬
繼娶潘氏江蘇東陽縣人直隸候補知縣諱冕書
之孫女順天宛平縣諱瀛號少南之次
女生於同治壬申十二月初十日 時

張氏族譜中所載第十世張爾田（張東蓀兄長，原名釆田）的資料。
可看出，爾田歿日是由東蓀書寫的。潘氏長嫂的歿日未書

第十世 萬田 字東蓀上鍁嫡四子陳氏出生於光緒丙戌十一月十四日酉時

第十一世 宗傳 字治孫號怡安大田嫡一子生於咸豐辛酉正月二十四日戌時歿於民國十二年癸亥九月二十日丑時葬于坟三台山晉坟人姓福堂住于坟街

錢塘府學附生遵籌餉例新海防報捐府經歷指分直隷

娶吳氏江蘇人吳蕙鶴孫振祐之孫女克善之女生於光緒乙未九月二十日未時

子 宗炳 宗燧 宗顥

女 宗燁 適浙江龍游縣余氏名友文

張氏族譜中所載張東蓀的資料，東蓀自己的一頁空着，而妻子的名字是由東蓀補填。女兒的名字由父親書寫，女婿的名字或許是張宗燁所填

這是張家現存時間最久的一張家族照，攝於1914年。當時家裏為張東蓀訂了親，他回杭州完婚。前排小藤桌兩邊坐着的，是張爾田夫婦。後排右邊第二是新郎張東蓀，當時二十八歲。張東蓀夫人吳紹鴻(後排右一)那時年僅十七歲。
坐在前排的婦人，是因喜事而趕回娘家的張家幾位老姑奶奶



上圖張東蓀部分的放大

第十一世 宗澤 字　文田嫡六子生於光緒庚寅十月十八日子時殤於光緒乙未十月初二日丑時年二歲葬秦州城西丁家庄墓前有碑

第十一世 宗炳 字蔚宗萬田嫡一子生於民國三年甲寅閏五月二十五日酉時
一九三四年北平燕京大学生物系畢業，一九三六年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畢業碩士学位，一九三八年美國康乃尔大学博士，同年返國任东吳大学教授，一九四二年入川任成都燕京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任北平師範大学教授，一九五〇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第十一世 宗燧 字次新萬田嫡二子生於民國四年乙卯六月初一日卯時
一九三四年北平清華大学畢業
一九三六年清華研究院畢業以碩士学位，一九三八年英國劍橋大学博士，一九四〇年返國任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二年再度出國，四八年返國，任北平師範大学教授
一九五五年任科学院学部委員

妻劉氏（名拙如）上海人
子三 銘慈 鶴慈 凱慈

張氏族譜中所載張東蓀的三個兒子張宗炳（本頁上下二圖）、張宗燧（本頁下圖和右頁上圖）和張宗熲（右頁上下二圖）的資料

妻繇氏（名坤鍈）浙江紹興人

子二 宏清

第十二世

宗頤 伊娥

字威彥，生于民国九年庚申四月二十九日

一九四〇年昆明清華大學畢業

一九四七年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碩士學位

妻呂氏（名乃權）山東掖縣人 清兵部尚書諱海寰嫡三子諱衛公之長女

子二 佑慈 繼慈

第十二世

中國說來如此致命的領域缺乏傾心甚至血肉相依的關注(張灝似應除外。當然這已是另外的故事了),雖然在下湖南那次,他曾斷言「中國除了開發實業以外無以自立」,但對「私有財產」,以及「恆產、恆心」與人格獨立,以及結社、組黨……之間的關係,有概念卻無徹心通骨之痛;對統領公民全部資財的大規模國有計劃經濟,有議論卻少切膚的警惕,[5]很難不讓後世論者為他們感到分外痛惜。

張家流傳着八世祖東甫公任泰州知府時候的故事:太平軍攻陷江寧之際,堅守泰州,病死任所。東蓀一生,既不曾大富也未大貴,對集聚財富幾乎沒有概念。他不喜歡按照「田」字排序而輪到自己的「萬田」,自作主張取了「東蓀」——「東甫公之孫」這樣一個名字,立志終生效仿先賢,以個人之學識操守,建功立業——或許也包含了對暴民革命的厭惡。這些,我們全都能從東蓀日後之悲劇人生中尋到蹤跡。

東蓀沒有進過新式小學,也沒有玩伴。不知父、兄以《詩》還是《書》為他開蒙。從他以近古稀之年一上手就顯出不同凡響的詩詞造詣,[6]可以看出長於文史的張爾田施之於幼弟的嚴格訓練。但兒童總是兒童。沒有鐵環、空竹、百草園,孤獨的孩子,身體並不強健,往往沉溺於遐想:

> 著者於幼年時候常常自己一個人在那裏懷疑,覺得天下最奇怪的事情莫過於有「我」:究竟「我」是哪裏來的呢?何以幾千幾萬幾億幾兆的人都不是我,而只我一個人是我;何以幾千幾百年無我,而忽然於此時有我?「我」就是一個什麼東西?真是不可解!天下最神秘的恐怕莫過於此吧。[7]

對於沒能受到普通中等教育,他的確有一份遺憾:

> 很慚愧,我就從來沒有受到很好的中等教育(新式教育)。現在大學教書,時時感覺到中學根基不夠。像哲學中,有許多地方要碰到物理化學的問題。因此我感覺到,在今天,中等教育的重要性,實在超過了大學教育。[8]

他對專業的興趣，在很早的時候就打下了：

著者有哲學興趣是在十六歲的時候。當時得讀佛書（《大乘起信論》與《楞嚴經》），不禁手舞足蹈。後來看了心理學書，反對於佛學大起懷疑。[9]

但有機會讀到非國學領域的現代社會科學著作，比如心理學方面的書，是到日本以後的事。在出洋之前，基於少年冥想的性格特點，依舊流連於佛理中：

我是十八歲讀《楞嚴經》便起了哲學的興味。平素嘗有一種癡心妄想：以為非窺探宇宙的秘密、萬物的根由不可。於是習作冥想。中間雖有幾年動了救國的念頭，從事研究政治，然而始終沒有拋棄這個癡心。[10]

他實際生活在中國由傳統開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這樣的時代，對勞作與悠游其中的自由人、知識分子、士，乃至操生殺大權的政客，究竟怎麼一種感覺？對他們由良臣、順民向現代社會公民（包括現代政治家）轉型，有什麼樣的基礎要求？

兩兄弟從此一直共同生活。夏循坩在〈張先生孟劬傳〉描述了長兄幼弟恂恂悦悦的情景，並不是一般作傳者的諛詞：

先生幼年失恃，介弟東蓀，年在齠齔，庭訓之餘，撫教並施。友於至篤。迨其授室，雍睦之稱，遍於戚黨。閫門內外，迄無間言。其刑之於化，孰能及之。至若接人以誠，苟屬知交，咸生敬慕。其啟迪後進，孜孜不倦。平生寡嗜欲，自奉約而與人厚。……

兩兄弟各自成家後，無遺訓、無宗族制約，不僅一直住在一起，錢糧上也沒有分開過。大奶奶（爾田夫人）任由弟媳當家，直到1950年去世，凡四十年。自立世起，兄弟二人對鰥寡戚屬的扶助，從來沒有停止過。宗燁的姑母、姨母，以及她們的孩子，都曾長期住在張家。孔孟之教對這兩兄弟而言，不是知識，而是精神、人格與日

常生活哲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都市，幾近碩果僅存。

對孔孟之學，及其在轉換時期的地位與作用，張東蓀其實有相當精到的解說：

> 我們若果把後世對於孔子的推崇（實即利用）一概不論，則必可看見孔子本身是人類中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至少可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相鼎足而立。[11]

在號稱民國，且鼓動「全盤西化」的「現代」中國，他不主張全面抨擊傳統（比如「打倒孔家店」），自己也不以儒家自居。對儒學，他認為：

> 所不幸的就是自漢朝以後，儒家獨尊，於是史家的思想格局乃只有一個了。以後便只是以儒家的「史眼」來編歷史。……漢朝對於秦朝可以說是一個反動，儒家又起來了。這個儒家卻和原始的儒家不盡相同。毋寧說是把道家法家都雜拼在內。[12]

> 孔子的真正主張只是一個政治理論。所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斷沒有不修身養性而能齊家的；斷沒有不誠意而能治國的；斷沒有不正心而能平天下的。梁任公先生名此為德治主義。[13]

這是他們兄弟終生遵循的原則。胡適在這裏稍不小心就顯得輕飄；少年即入清華的羅隆基則有「知識性功利主義」之嫌；至於終生包裹在線裝書裏的毛澤東，主要師承，應該說是法與術，外加江湖權詐，與孔孟一直格格不入——從這些典型的、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有着巨大影響的人物身上，我們或許可以品味出西學浸入傳統中華文明時候的非一律性。

1901年8月，清政府下令，自下年起，科舉考試不再用八股文。光緒也在他的「上諭」中明令各地興辦學堂：北京設京師大學堂、省書院改設大學堂、府廳設中學堂、州縣設小學堂和蒙養學堂。[14]

錢塘縣似應得風氣之先。張東蓀那時十五歲，卻沒有趕這個潮

流。兩年後，1903年，張之洞擬定《約束遊學生章程》及《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清末留日高潮開場。

這回，他趕上了。

其實清廷在這時候還成立了以載振為尚書的商部，頒佈了一系列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措施，如《獎勵公司章程》等。對此，張家好像沒什麼感覺。大批留學生到日本，首選近代軍事技術，他也沒有動心。

1904年，張東蓀十八歲，獲選清廷浙江省公派留日生，「去長髮，更服裝」，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與藍公武、馮心支一同擠住在本鄉丸山新町。

那時候，他還不認識梁任公。但梁對於留學生（「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的期望，則幾成為他們一批人的自許與自勵：

> 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
>
> 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15]

讀者此時是否注意到，任公也沒有一個字提到實業與實業家。沒有實業與實業家，沒有由此而帶來的工商業的繁榮、以及應時而生的交通、通訊、協議、合同……並由此生成的法律、中國努力推行現代化的學人終如浮萍——空懷一腔從外部世界學來的知識，往往難逃軍人政客的利用、撥弄。

但無論如何，當時的中國確實處於很有希望的轉折點。無論民間還是當政者，都有了一番新的氣象。1905年12月，清廷派五大臣到日、英、法、比、美、德、意、奧考察憲政並奏請立憲。他們帶回大量政治書籍，編成《列國政要》及《歐美政治要義》，供立憲參考。接着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頒佈「預備仿行憲政」諭旨——可惜實施之日一拖再拖。

留學域外的讀書人卻是竿頭日進。隨着眼界的拓展，張東蓀的研究領域已經從佛學進入西方社會科學，雖然主修哲學，但以二十歲的精力和敏銳的感知力，他實際上已經行動起來，意圖將一般性的

「學務」，提升到學術研究的層次，擔當起「天將降之大任」：

> 中國近來學務雖似發達，至於學術尚在幼稚，此俗之所以不治而無由進入文明之域也。

於是和他的同學發起「愛智會」——

> 專以提倡國人學問為務，並欲會合東西哲人，共研究宇宙究竟、人生究竟二大問題，以增進世運，劃除俗污，裨大地山河，得光明莊嚴。[16]

這是他們的成立宗旨，也是東蓀在當學生的時候，立下的志向。遣詞造句上，難免留有佛家典籍遺痕，文體也是文言向白話的過渡。這篇宣言草於1906年，整整一百年後，中華大地上二十歲年紀的人極少再關注這些「大問題」，而流行唱「我愛你愛着你，就像老鼠愛大米」。

不僅辦社團，三個年輕人還辦起了雜誌，即1906年創刊於東京的《教育》。錢從哪裏來？廣泛徵股。刊務等雜事誰承擔？就他們三個人。且看《教育》所闢欄目：社説、學説、科學、思潮、批評、記事、雜俎、文苑和問答。這份120頁的「大型綜合期刊」在東京出版印刷，由上海四馬路開明書店總經銷，國內、日本之外，居然遠銷至香港、南洋等地。當時他們有沒有想到，不過十多年後，三人中的兩人，正掌控着中國最有影響的報刊呢（《國民公報》、《晨報》、《時事新報》、《改造》）。

有趣的是，張東蓀致力於西方哲學的研究，是從佛學而心理學，進而由「唯用論」（今譯實用主義[17]）入手。當時他最為心儀的，莫過於在法國起步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了（當時的譯名為乾母斯）。青年東蓀接觸到他的學説，正值詹氏晚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一段時間。他的理論，估計對後來張氏最有創見的「認識論」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可惜無論詹姆斯、皮爾斯，還是張東蓀，都沒有對共產黨治下的新中國，在信仰—經驗—認識—政策相互砥礪的鏈條上發揮任何影響。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國思想界方「驚喜」地發

現，原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意即毛主席的話未經檢驗，不能一概當成真理）。這一其實相當粗淺的社會政治（而非哲學）命題，雖然在依舊將毛澤東思想奉為護法神祇（注意此處之「法」為合法性的意思）的中國，尚有其「先進性」，但只要想想，一百年前，二十歲的清廷留學生，就已經在思索：

> 實踐是生活之路，但通過實踐人未必即獲得客觀的真理。雖然每個人都是從生活的實踐中獲得他對世界的看法，但每個人從生活的實踐中獲得的看法各不相同，則是理所當然的。
>
> 要想真正地認識普遍存在的、被所有的實踐分享的、被歷史所證實的真理，一個人要獲取一個「超信仰」。這個超信仰是無法被實踐證實的，但它可以幫助一個人使他的生活變得更豐富和美好。[18]

也就是說，「真理」與「信仰」，是相當個人化的，不能由誰來指定。有趣的是，直到2007年，當一位據說富於「智慧與學問」的明星在官辦電視台脫口說「老百姓要信仰國家」，為學者指出其謬誤的時候，[19] 居然還引發一場口水戰。張東蓀說：

> 所以從社會觀點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會有理論，理學便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去問這是不是真理，那就麻煩了。真理是相對的，上帝並不像熱水瓶一樣，可以拿出來印證。理論的產生是基於文化要求，社會要求，時代一變，要求一變，真理也就跟着變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現在的真理。我對於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論」並不同意。他這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公婆都有理，豈不沒有是非了？相對不能是Relativism而應該是Relationism，就是說在這一環境中是有效的，在另一個環境中就沒有效了。理論是不能實驗的，科學才是能實驗的。我們可以根據這個來看看哲學是什麼與哲學家應當做什麼。[20]

後來，到了1947年，在他為《觀察》寫〈獄中生活簡記〉的時候，

談到「身體機構是一個獨立自成系統的東西，並不受心理指揮」的實際體驗，從而「平素所不歡喜的兩元論，便為不可逃避的結論」——「可見一切真理必由於實踐與親歷，專憑空論不能有所決定。」——著者將他的兩段話引在這裏，供長於思辨的朋友細細駁析。而對於另一條因為出自毛澤東之口而在當代中國幾成金科玉律的命題：「理論聯繫實際」，只有水利及氣象專家黃萬里給出公開批評：「世上沒有不聯繫實際的理論，只有上升不到理論的實際。」

學成回國之後，東蓀回憶起這段寫、譯、編，並且不時相駁辯的日子：

> 在日本留學時代就看馬克思主義的書，藍公武我們三個人住一間屋。從思想上講，(接觸)馬列主義在蘇聯大革命前。……後來我對馬克思以外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等都有點同情，凡是左的都好。[21]

> 我於宣統年間曾撰有一文，名曰〈真理篇〉(介紹西方各哲學流派)，載友人馮立德、藍公武氏合辦的《教育》雜誌，現早散失無存了。自撰那篇文章後，我自命為一個唯用論者。我十餘年來時時咀嚼，覺其滋味正如橄欖一樣，愈嚼愈有味了。[22]

有趣的是，後世主流史家在肯定這三位青年的努力以及所達到的學術水準時，給出的，居然是符合「主旋律」的讚揚：

> 《教育》……對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社會科學學說的傳播，對封建文化思想的衝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客觀上有利於正在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23]

這真是秦瓊誇關公了。他們對革命沒有興趣。排滿、罷絀學吏、種族革命、政治革命……，所有這些熱血賁張之舉，當時日本清廷留學生鬧得多麼起勁，這幾個青年都沒有投入。他們心繫於基本的社會改造：

> 當清末造，不佞與三數友人，聚談於東京，憤政治改革無術，乃

> 欲先從事於社會改良，即所謂者，以為預備焉。唯政治改革，為功也速；社會改革，為功也遲；二者雖相互為表裏，然其成事之遲速，固不可同日而語。須知改革當務其本，治國首在人心。人心為因，國治為果。改革人心之道，首在教育。[24]

雖然不如晚年感受那樣深切，他在當時已經模糊覺得，「為功也速」的政治改革，如果沒有「為功也遲」的社會改革為基礎與後盾，太容易為大、小政客所利用了——結果也只有一個：政治與社會的倒退。我們在後邊會看到，僅僅這細微的認識上的差別，造成他與陳獨秀、毛澤東怎樣不同的路。

這批1904年赴日學生，是在辛亥革命前夕，即宣統三年時回國的。六年苦讀，張東蓀獲得的，想來是東京大學哲學學士。這一學位，由清朝皇帝看來，就算是完成了會考，獲得貢士身份。一路公車回到故國京都，部試、保和殿復試（這是清室最後一次考試大典，想必盡量簡化，起碼「大卷子」是不必寫了，因為五歲的宣統絕無可能「朕將親覽焉」），鴻臚寺點唱之後，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即後人戲稱之「洋翰林」。

一同參加殿試的，還有一位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的江蘇生員張君勱。1907年，他們在日本就已經結識，在天台教觀第四十三世諦閑大師東遊講經那次，從此開始了他們延續近七十年、覆蓋中國三個朝代之終生友情。

殿試之後，清廷已經沒有設庶常館的規模，諸位海歸新進也無所謂到館。張君勱留在北京教書。張東蓀則首途上海拜望兄長，帶着幾箱子書和一肚子學問。雖說冠了一個「洋」，幼弟得授翰林，對張家不管怎麼說也是一樁大事，何況「功名」於張爾田，就算到了民國，也是有相當份量的。

東蓀這年回上海，成就一生中第一件大事情：他正碰上《東方雜誌》改版，結識了張元濟新啟用的主編杜亞泉，並且以「聖心」為筆名，發表了他「議政生涯」中第一篇政論文章：〈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

與長兄爾田差不多同齡的杜亞泉，也曾躋身功名。感受到世外吹來之疾風，毅然放棄「正途」，轉向自然科學。他自學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學、動物學，並以自己之大名，在上海創辦科學期刊《亞泉雜誌》。東蓀他們赴日本讀書的那幾年，亞泉加盟商務編譯所，任理化部主任。到他們回國的時候，除了理科的中小學課本，他的三部具有開創意義的自然科學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動物學大辭典》和《小學自然科學辭書》已告完成。那年，杜亞泉（筆名滄父）不過三十四歲，正在「應上蒼之命」，對《東方雜誌》大動手術，把原先的「選報」雜誌（其頭條當然是《宮門抄》與《奏摺》），變為具有現代風格、現代智慧，並立足現代知識前沿的大型綜合刊物。

「聖心」的〈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使用的依舊是半文半白體——東蓀以此文體寫作，又持續了七八年，直到主編《時事新報》。這篇文字，從踏上故土的直接感受開始，接着是在大量閱讀基礎上廣徵博引：

> 人民之弱益見，亡國之兆益深，欲從而興之，其誰是賴？
>
> 昔之怒罵政府，今則轉為苛責人民。向之希望人民者，今則對人民而悲涕矣！

放眼神州，昔日德教甚隆之文明古國，怎麼成了今天這個樣子？種種原因之中，張東蓀認為「政制」為首要：

> 專制之國，人民多恐懼忌避之心、偽詐卑賤之行；戰敗之邦，人民多利己苟安之想，無勇敢自尊之氣。
>
> 道德之墮落，靡不基於生計困難；生計困難，實由於政治不良。

而國門開啟、西風東漸，又是什麼結果呢？

> 西洋文明輸入，吾人未受其益，而已先受其害矣。……當西貨入口，無不爭購，人心之趨赴，實有不可制止之勢。不數年，吾民生計大易形狀：向之樸素者，今變為浮華；昔之儉省者，今易為奢侈。……種種不品之行，皆發源於此。

像不像已臨二十一世紀之今日中國？合不合余英時所說：「一種文化傳播，總是從最邊緣、最淺薄開始……」

如何救治？述說落到他堅持了一生，還為此發生過幾次大爭論的觀點上。除宗教、鴉片等等，最為緊要的，是由政制而導致的教育：

> 現今教育系統之不完備、制度之不良，稍有知識者，皆能道之。蓋教育之為事，貌似易而實乃艱。苟不計社會之狀態，而所教育之人皆不能應社會之要求，則社會必日漸衰微。教育之為害，實有不可言喻者也。

但教育狀況實際是社會的反映。他不可能預見到五十年代初那場將人工具化的教改；也無法估量將教育置於意識形態宣傳之下，對鞏固政權所具的功效。他呼喚的「未來」，在那時候，頗帶有社會轉型期「賢人政治」、「開明權威」之色彩：

> 改革人心，必自政治、經濟、教育始，而三者之中，尤推教育為先。革政之事至艱，非一二書生放言高論所能成事。必有過人之力，超人之識，剛毅中正，慎言篤行者，其使民也有方，其化民也以理，於是天下之人皆從而為其所使，固不必一一執人心而正之，否則抑亦迂矣。

篇末，這位學成歸國士子空懷一腔報國之心所發的感慨，幾成他自己日後奮爭與挫折的寫照：

> 嗟呼，今之國民道德如此，政治如此，經濟、教育又如此，吾欲託空言以濟世，得毋迂乎？然而自奮其力，不饒不屈，人人如此，則後之結果正未可知。固不待概世之雄出，而天下已將期於治。吾願普天下之人，咸矢斯志。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東蓀以一首譯詩作為文章的結尾——語出丁尼生。如此精彩的譯作，恐怕中國詩壇再也不會有了：

> 今吾子之沉迷兮，
> 正長夜之將來；

弗以吾言為謔兮，
豈盡謬而不然。[25]

東蓀在日本苦習六年，究竟能閱讀幾種文字？張家後代也百思不得其確證。這篇〈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相當自如地引用了英、法、德、俄、芬蘭等國十多位學者的原文著述：Westermarck（韋斯特馬克），Spencer（斯賓塞），Montesquieu（孟德斯鳩），Novicov（諾維科夫），Hill（希爾），Le Bon（勒龐，法國心理學家）……雖然不無青年學子大抖書袋之稚狂（那年他二十三歲），但也可以想見，他們那時蜷伏在丸山町埋頭啃大部頭的狂熱。

見過兄長後，他又返回北京。是否得到了什麼差事？未見文字記載。很快，革命爆發了：

我雖不敢居功說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一分子，但在革清朝的命的潮流裏也曾廁身其中。當時不知道成功與失敗的條件是什麼，就只知要革清朝的命。那時候有了一些民主主義的書像盧梭的《民約論》等對我影響很大，不過那時候我們不是說「民主」，而是說「共和」。[26]

由於清王室逾常的懦怯無能（政治制度改革當斷不斷；無力制止貪污；侵犯大眾利益的統制經濟），致使一生主張平緩過渡的「洋翰林」如張東蓀者，都跳過了在中國推進君主立憲這一可能的國運，直接進入由「革命」催生的「共和」。

辛亥那年八九月間我還在北平，一些主張革命的地下工作者一聽說武漢革命於是紛紛南下，我也坐船到了上海。到南方後，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我還在內務部當了一名小官。……當時我感到命是革了，這個國家從別人的手裏拿到了我們自己手裏，但不知怎麼辦才好。……我看了一下周圍的人都不像在作事情的，於是沒幾個月我就走了。我認為自己貢獻的道路不在這裏，還有其他的地方。[27]

所謂內務部小官，指的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張季鸞當時也在南京，任總統府秘書，大總統就任第一篇文告就出自他之手。「這個國家從別人的手裏拿到了我們自己手裏」，「我們」是誰？怎樣才算是「拿到了手裏」？代表前進方向的新的政治領袖人物，究竟該「怎麼辦才好」？

聲望最高的孫文，無奈之中，先是決定自己改行當實業家（修鐵路），後來在掌握着私兵的獨裁者之卑劣殘忍面前，以同樣獨斷和不堪的手法發動「二次革命」，然後從已經成長並日漸成熟的政黨退回到宣誓效忠個人的會黨。

最有資格的政黨領袖梁啟超（「人氣集於一身」），雖然有立憲運動、「政聞社」、《新民叢報》的廣泛基礎，但對於新出現的專權者袁世凱，潛意識中的「明君良相」意識，竟然在每個困難關頭成為其行為之主使。1912年回國之初，張君勱等曾百般勸說，勸他把自己的位置定在獨立的在野黨領袖位置上，任公偏偏選擇「拋卻宿怨、傾心輔佐」——看不到經清末新政，隨着經濟發展而出現的民間社會，也看不到他們要求自己政治上代言人的局面。對沿着現代政黨政治（批評與監督專權者）向民主與法制推進，梁啟超竟無由擺脫「以國師自居」之情結，甘居策士地位，被老袁玩弄於股掌。

張東蓀太清高耿介，有見識而無耐性。「解放腳」式的過渡期政黨政治，令他無法忍受——「自己貢獻的道路不在這裏」。在哪裏呢？

我本身雖始終是一個獨立思想者，但卻有一點特別的地方，就是從來不願在行為方面無故與人立異。所以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曾參加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南京政府，後來政府解散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參加袁世凱先生所組織的政府，我則不願參加。彼時孫中山先生組織國民黨，把凡在南京任過事的人一律作為黨員，我的名字也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認。後來我的朋友以進步黨人為多（藍公武、張君勱均為骨幹），且較密切，我卻從未正式加入該黨，也向不與聞他們的黨的活動。外間對我的這種不明白

我是知道的，但我亦不希望人知。我以為一個人只要行心之所安就夠了。急於向人表白是現代人的一種做法，中國儒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如此的。[28]

這裏說的國民黨，即是由同盟會等四個小組織在1912年8月間合併而成的新黨。其情勢可以從居正[29]的描述略見一二：「自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同盟會的聲光確是一躍千丈」，「自南都建立，一日附者率數千」；「然以現勢權位之所在，投機分子，均紛紛入會，同盟會固有之純潔性質，已漸變而進於複雜之途」。這樣的局勢下，張東蓀選擇大異於常人的抽身遠避——1949年9月30日那驚世駭俗之舉動，此時已略見端倪。

新老黨人湧向北京。他則返回上海，加入《大共和日報》擔任編輯。

這張報紙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創刊，章太炎任社長，馬敘倫任總編輯，對開兩張，有時還加出畫報一張——其規模已經超過八十年代改革前的《人民日報》。《大共和日報》除「社論」、「要聞」、「評論」等，還有「譯聞」和副刊。胡適譯作《割地》(即都德的《最後一課》)，就是寄自美國，發表於這年11月5日的。

這份報紙，一直生存到1915年。張東蓀沒有作得很久，也沒有特別突出的約稿組稿業績。據推測有兩個原因，一是家裏為他訂了親，他必須回杭州完婚。那年新郎二十八歲，新婦吳紹鴻女士出身於已趨衰敗的蘇州世家，年僅十七。這對因「包辦」而結成之伉儷，無人前之卿卿我我，卻一生情深意篤。張家孫輩記得，「奶奶說，跟他一輩子，始終擔驚受怕。成親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一天早晨出門，中午拍來電報，已到上海。」二是在《大共和日報》做編輯，他優於常人的撰述能力得不到發揮。事實上，到1913年，東蓀已經開始為梁啟超主編的《庸言》寫稿，〈余之民權觀〉、〈余之孔教觀〉就發表在那時。

近代中國，梁啟超本是政黨政治實踐的先鋒，也是提出「輿論監督」這一概念的第一人。在他的「輿論觀」中，言論與出版自由是基礎

和重心：西方文明日進月邁，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缺少這種打基礎的自由——這樣的見識，與東蓀自然「心有戚戚焉」。

《庸言》半月刊初創於天津（1912年底）：梁啟超剛從日本返回，「和袁慰革」之幻想還沒被現實所擊碎。「庸言」之取名，即循着他的理想，意味着平允之言，實用之言，獨立之言。至於如何實現，在梁的想像中，共和了，三大自由當不言而喻。直到1914年，在黃遠生接掌《庸言》報之後，方才在任公理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言論獨立的法律保障」。

有了法律就有了一切麼？三綱五常隨着政治制度消解之後，平民百姓還有沒有精神生活的主導？在「信仰大破，人欲橫流」的社會裏，「詩書傳家，忠厚繼世」傳統已不再，於是有了「定孔教為國教」的倡議——即使新派人物也知道，「富於科學的研究性」的美國人，卻同時保有「篤於宗教的信仰心」。

這前後，康有為在上海發起「孔教會」，立孔教為國教，梁啟超、藍公武都是發起人，張爾田也曾擔負重要角色。張東蓀對提倡孔學「踴躍三百者」，但對「立為國教」，外加祭孔等等，則有不同意見——「無足為孔子增光，追亦畫蛇添足之類」。他的〈余之孔教觀〉先在《庸言》1913年第7期發表，隨後又在當時儒學會的刊物《孔教會雜誌》轉載。

東蓀另有幾篇文字：〈中國之社會問題〉、〈論憲法之性質及其形式〉，也是在《庸言》上發的。比如他關於勞動／資本的一段議論：

> 中國今日正不患勞動者之多，但患工場之少爾。工場興，貧民得其生計，則盜賊自然減少。語云：衣食足然後知禮義，殆不刊之言也。……資本家立工廠必為勞動者所大歡迎，決無有反對資本主義者……。

對比1949年劉少奇到天津對實業家的鼓勵，恍如昨日。

屆時當政的袁世凱，雖然被後世譏為大奸雄，卻還沒有無所顧忌

到明言依靠「槍桿子、筆桿子」以維持其專權。他，還有後來的北洋派，在他們主政期間，對言論的干涉有限，加上新國民對新事物的期待，以及梁任公和其他撰述者在思想與遣詞造句上的個人魅力，《庸言》很顯活力。當時的大聞人、程硯秋的老師羅癭公[30]還在《庸言》包下一個專欄，專講近世掌故：〈庚子國變記〉、〈德宗承統私記〉、〈中日兵事本末〉、〈割台記〉、〈中俄伊犁交涉始末〉等，很攏人氣。這年年底，梁啟超在其家信中說：《庸言》第一號印一萬份，頃已罄，而續定者尚數千，大約明年二三月間，可望至二萬份，果爾則家計粗足自給矣。[31] 注意：當時中國人口不足四億，當局也還沒有許諾「普及中、小學教育」。

1914年，袁世凱包攬御用參政會，梁啟超受聘為參政員。這實在太過分了，當即遭到相當一批進步黨黨員和各界人士指責。張東蓀雖非該黨黨員，也決定不再為《庸言》撰稿。

估計梁是在他最高官位（司法總長）上悟出自己的被利用與耍弄的。他與袁的關係，最後只剩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則告別文告——但這只屬於學人心跡自剖，幾乎不具政治運作功能。其實，專制者的政治嗅覺和對於「孰個劣孰個不劣」的判斷，向來準確。對意志堅強、方法對頭，而且軟硬不吃的宋教仁、黃遠生、湯覺頓諸人，老袁終於拿出的，是肉體消滅一招。

可能因為家安在了上海，也可能因為專業領域與人脈聯繫之所在，到了1914年，東蓀開始為另一份新創的刊物《正誼》雜誌（編輯人谷鍾秀）撰稿——也有一說是「共同創辦」——他與沈鈞儒的交誼正始於這前後。[32]

谷鍾秀何許人？他與張爾田同齡，民國以來，一直是政學會要角。谷氏為直隸定州巨室，谷門「鍾」字輩兄弟早年赴日留學即加入同盟會，鍾秀更是一位長於權術的領袖。辛亥起義之初，十一省代表齊集武昌，鍾秀即以直隸諮議局代表參加，屬於創立民國之元勳。想來他與張東蓀結識，就在那前後。迨南京參院遷往北京，鍾秀當選為北京參議院議員。國會成立，改任眾議員，與議長張耀曾相交頗深。《正誼》創辦，正是孫文的以暴易暴、國會解散、制憲停頓之

時——民初以來對新共和、對政黨政治、對袁世凱所抱巨大期望已成泡影。

谷鍾秀在這樣的時刻編這份《正誼》雜誌——取漢代董仲舒所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從而「促進政治之改良，培育社會之道德」。[33]

張東蓀對「正誼」的解說，更是充滿激情：「正誼者，陰謀之降符也；法律之保障也；政治之救濟也；道德之淵源也。」[34]

說白了，他們感到，提倡國民經濟的同時，社會一般狀況已經變為「居上者以利誘威逼，在下者群投湯赴火日趨於末路而不自覺」。「振興社會刷新政治」已迫不及待——提倡正誼以招「將絕未絕之國魂」。

張東蓀更為細密的分析是：

第一，當時社會特色之一，是武力權力交相為用而陰謀迭生。新進人物不提倡正誼，而「以陰謀制陰謀，以手段制手段」。對於陰謀，作者認為唯正誼，亦即「圓滿一己之義務而不侵佔他人之權利」可以制之——依舊未脫儒家「正心誠意」的道德範疇。

第二，法律死物。法治之國不在於有法律條文，而在於國民有擔保法律之能力。此能力可體現在一國的社會和政治能力上。「社會上之保障為眾意，政治上之保障為自覺，法律上之保障為法力。眾意生正誼，自覺生責任，法力生效力，三者有循環之關係焉。」由此可見，在1946年底的「制憲國大」上，他與摯友的分道揚鑣，並非意氣用事或黨派情緒使然。讀者或許會聯想到，1954年以來的共和國憲法，因為眾意無由表達、處處依賴政府的「人民」缺乏公民自覺、黨委領導下的法院無獨立裁決資格，不恰如一沓廢紙？這局面在五十年代之後愈演愈烈。

第三，對趨於腐敗的政治，作者認為執政者的良心和自覺，以及由此而生的「個人責任」是良好的政治的擔保。他認為政治家良心首先體現於「去私欲；去私欲則一切陰險手段盡消滅矣」。對比四十年代末的黨國權貴，對比今日撈足了就往海外跑的貪官，一肚子書，且着迷於傳統德治的張東蓀顯得多麼呆氣。

有論者認為，「以谷鍾秀與楊永泰為代表的《正誼》派基本上照搬了儒學正宗的心性論，在學術與思想上皆無標新立異之處」，[35] 著者以為未必公正。1915年張東蓀發表於該刊的一篇長達萬言的〈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正可作為反駁之證據。

在他看來，「國之支柱」，既不在版圖人口，也不在GDP或者尖端武器，而在於「國民之人格」。中國國民人格的未發達，正緣於「政治之摧殘」。至於摧殘形態，則是我們中國人已經覺得如空氣陽光一般無任何不自然的「政府干涉」(或如今日更加朗朗上口的「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黨疼國愛」)。

但自由與競爭，對中國人，包括最優秀的人物而言，是不是太隔膜了些？與他們已經「融入血液」的揖讓、容諒、中庸……是否太衝突？張東蓀對此無絲毫迴避。他說：

> 捉摸近世文明國之根本意味者，有章君秋桐之調和論及不佞之對抗論。不佞非敢自慢，實以為苟不及。

他自己雖然遠離黨務活動，但在認識上，則堅信為抗衡強大之專權，「社會上必須有對抗」，而「細觀近日梁任公所言所行，似於對抗之理，尚不得其三味」：

> 第二次革命以前，即保持對抗之局，維繫至今，絕無今之黑暗可斷言也。吾民無識，一聞黨爭，輒為不愉。於政府初立之秋，黨爭固烈，而吾民之惡黨，亦同時增高。實則惡黨與黨爭同屬感情作用，絕無一分理由之可訴。吾人痛切言之，黨爭果僨事乎？黨爭果有損於國家之元氣乎？當彼沸騰之時，鮮不為答，然自今日已無黨爭之際觀之，則前次之黨爭實未僨事，且未嘗致絲毫損害於國家。苟有聞吾此語而驚者，其人必仍留有當時感情之遺影，為其所蒙不能自立也。……
>
> 自由競爭為一切進化之根源，無自由競爭則無發展，吾民而欲束手待斃也，則永永束縛於一樽可也。[36]

懷有「國師」情懷的梁氏在理論上固然「不得其三味」，在知識上

受足了西方教育的胡適又是如何對「蔣公」？費孝通等一干人對「偉大領袖」豈不更是惶恐趨附？1949年後，在「肝膽相照、同舟共濟」的粉飾聲中，「對抗」何曾體現過？東蓀所倡之對抗，不是一直到了蔣經國解除「戒嚴」後，才逐漸在台灣踐行的麼？

早在兩年前，在另一篇〈對抗之價值〉中，他更提出現代政治中的「有形之對抗」，即擺到桌面的政治鬥爭，必須遵循「三原則」：

相反二勢力，不使其中之一居於國家最高機關；
對抗二勢力和平競爭，不得動用武力；
二勢力之競爭應限制在憲法之下。[37]

可以說，近、現代中國，沒有一個殺向政壇的勢力（或個體），能夠遵循這些原則，包括如今的商場、職場。到二十一世紀，已然騰飛的中國，商場上最牛的一句話是「上頭有人」；平民抗議，動輒武警（包括正規軍）出場；而中共以紀委、政法委淩駕於各級法院之上，憲法還有尊嚴麼？

1918年前後他曾堅決反對組黨，箇中要害也在能否對抗：

近代各立憲國之政黨所以成立發達者，皆由於此也。返觀吾國之政黨為如何乎？除獻媚於政府之外，不能有自由之主張；除屢進屢退之外，不能有活動之餘地，此無他，對抗力不厚故耳。[38]

不僅當時的進步黨、國民黨，到後來蔣、毛時代，哪個非執政黨不是如此？但強大的民間社會、潔白無私之政壇人物，能由《正誼》之呼籲而生成麼？就算這樣的人物出現，就一定能讓以「起事」為上上手段的革命黨、以謀差事而吃國會飯的代表、議員們（如今是「被黨挑中進入人大、政協」），能在對抗中求協商，協商下互諒互讓，最終達成妥協，保障共和政體健康運轉？能讓現代民主政治基本觀念：自由、民主、法制、政黨，在濟濟一堂的政客中形成共識？

《正誼》出版了九期，到袁世凱在眾叛親離中「賓天」，即告停刊。

政治，凡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都知道，不過是利益與力量較量之

後的妥協。利益在哪裏？哪些力量可依仗？不僅《正誼》沒有回答，東蓀自己也已看到：「泛言對抗與調和，而不從社會活氣着想，終為無濟耳。」

那時《新青年》還沒有創刊，〈文學改良芻議〉也還沒有出籠——此二者，被此後的正統史家封為啟蒙運動之先聲，「吹響了文學革命的號角」。再加上1919年5月4日的街頭抗議，以及俄國人帶着錢來建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此四大件，套一句章士釗1962年說過的話：「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許。」

僅以在應用領域提倡白話文，〈文學改良芻議〉也算不上「號角」吧？且看這則京師自來水股份公司在1910年報紙上登的廣告：

我們公司辦這個自來水，是奉皇上旨意辦的，全集的是中國股，全用的是中國人，不是淨為圖利啊。只因水這個東西，是人人不可離的，一個不乾淨，就要鬧病，天氣暑熱，更是要緊。所以開市以後，凡是明白人，沒有不喜歡這個水的。

沒有一句違背胡博士的倡言吧？無論就遣詞達意、情感抒發還是流暢通順。

「溢量」，出於無知，還是政爭？

但中國正處在巨大的變革之中。政論家張東蓀的感受是：革命家、改革家、政客……，全都在「政治摧殘人物、社會淘汰優秀」的基底上忙亂，「政象停止、社會苟安」。以民國三年之經驗，他總覺「政治革命太速，社會革命太遲耳」；「政治革命若離開社會革命而獨立，則為全無意味」，[39]「必政治與社會分離，使政治之干涉範圍愈小，則社會之活動範圍愈大，於是社會以自由競爭而得自然發展也。」

有沒有一點像中國七十代末執政的共產黨決定給農民鬆綁的景象？至於中國「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在他看來，既不是外匯存底，也不是聯合國席位，更不是以遠遠超過唐代和清代的「官吏／納稅人」比例：

國之支柱也，恃國民之人格。……

中國國運之興也，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於有健全自由之社會。而健全自由之社會，唯由人民之人格優秀以成之。此優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壓制，使社會得以自由競爭，因而自然淘汰，則可養成也。易言之，中國之存亡，唯在人民人格之充實與健全，而此人格則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競爭，即得之矣。於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競爭為最也。[40]

這是從最最細微處來講「立國」了。這一觀點，通貫其一生。但他自己呢？他後來的思想及精神生活處於何種境地？張東蓀一生，沒有離開過他的故國。從二十七歲立身立言，到生命結束的八十七歲，政府的壓制，竟是一日甚於一日。我們今天講他的故事，正為述說中國達到「近世文明」之艱難。

好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討袁，以及後來廣東、廣西打的那幾仗，與鴉片戰爭以來六次內外戰爭相比，規模都不甚巨，平靜了幾年的民間，獲得休養生息。更因為自清末新政發佈，至此已經二十年，「生死存亡迫使這個專制政府不能不放鬆控制，讓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與此同時，北洋諸武人，不僅不怎麼干涉言論，對清末新政所奠定的自由經濟的制度基礎（人才成長、資金集聚），也未加觸動。[41]

從南到北，整個中國社會（特別是大都市、交通發達的城鎮），呈現久違了的活氣。

羽翼漸豐的工商階層和知識階層自行其是，公民社會的雛形已經形成——這是不是就是張東蓀寄予期望，看作一切變革之基礎的「社會活氣」？連他向來最不屑的「世風日下，淫邪奢靡之小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之代表《禮拜六》，也在「二十一條」面前表現出凜然的品格：發表「國恥專號」，搜集各報正義新聞。「哀情鉅子」周瘦鵑也專門創作了《亡國奴日記》，最後還在「反袁救國」的遊行示威中朝鼓吹帝制的《亞西亞日報》扔炸彈。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以不同的風

格，七手八腳地把老舊之中華拖向新時代。這難道不是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更新？不是開始了延續至今的艱難啟蒙？

這一年(1914年)，他還與丁佛言等創辦《中華雜誌》；與汪馥炎、楊端六等在上海創辦《新中華》雜誌；並開始在章士釗於東京主辦的《甲寅》雜誌上發表政治理論方面的文章：〈政制論〉、〈憲法與政治〉、〈吾人理想之制度與聯邦〉等。雖然不如他的摯友張君勱介入得那麼具體而深入，但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段時間，一直活躍地參與政治活動，「動了幾年救國念頭，從事研究政治」——以評議時局、研究政體、介紹西方政治理論和制度來介入。[42]

歸國四年，就個人而言，成效卓著。一是「洋翰林」已成就為民初著名的政論家；二是已然為夫為父——成家立業是也。1914、1915年，兩個兒子相繼在家鄉老宅出生，了卻張家自1886年即不見添男丁的焦慮。二十一年後，這兩青年同時考上全國每個學科只有一名的留美庚款名額，這就是後來相繼歸國服務的長子、著名昆蟲病毒學家張宗炳，和次子、著名物理學家張宗燧。

往後的兩年，未見東蓀有新作發表。不為別的，只因時局緊張起來。

1915年12月18日，梁啟超為「倒袁」到上海，這是張東蓀第一次見任公。同時會面的還有藍公武、黃炎培等。一週後，護國之役爆發。第二天春天，梁到廣西，東蓀沒有隨同前往，但也一度被袁世凱通緝，避入租界。用他自己的話說：

> 我認得他(梁任公)是在民國四五年，那時他到上海，我們大家共同反對洪憲帝制。自此以後，過從漸密。[43]

> 到後來袁世凱要做皇帝推翻共和，反對的我也是一個，不能說有功，但可以說，在反袁一幕中對得起自己的良心。[44]

他或許已經想到，扳掉一個顯形的皇帝，並不意味着搬掉梟雄們套上總裁、主席冠冕的皇帝夢；更無法把忠臣良相轉變為現代政治家：

倒袁的時候，我以為這是化除政爭的好機會。因為到了那時，無論緩進激進，無論極權分權，無論總統制內閣制，而共同的敵人只是帝制。既有共同的敵人必須有聯合的戰線。聯合戰線一經組成，則黨爭便可化除。久而久之，養成一種聯合的習慣或同盟的習慣。不料倒袁以後，各方面所得的教訓卻正是一個反面。他們不但不認與人合作為必要，卻反而以為以前的排斥人家沒有徹底。於是大家都想來一個徹底的排斥。[45]

1918年末，梁啟超同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等人以半官方身份考察歐洲。上船前夕，「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着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46]

「從思想界盡些微力」，張東蓀從此「誓不為政治性質的運動」，以「教育、著書、譯書」終其一生——多麼些微的願望。唯獨在二十世紀之中國，則幾近奢望。對日後時局之險惡，容不得他們從容辦教育和出版，顯然沒有足夠估計。

雖然應梁之請，慨然接手護國軍時期「唯一之言論機關」《時事新報》，但他自己的志向實不在此：

弟對於政治，厭惡已深，以後誓不為政治性質的運動。將以譯書著書報答與族眾。即雜誌與日報之言論事務亦頗思擺脫。將來如有教育事業可為者，弟願追逐於當世諸公之後。或兄等為社會活動，弟則以教育為助。兄等對於舊勢力為炮兵、騎兵以事攻擊，弟則願守輜重，或作農夫，為諸公製造糧食也。[47]

可能正是這則宣言，引出了陳獨秀在1920年9月出版的嶄新面貌之《新青年》八卷一號上對他的揶揄：

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48]

對此，張東蓀沒有回應。我們在後邊將會看到，無論談與不談，中國這方廣袤貧瘠的土壤，理想家灑下的血，有時候連痕跡都留不下。

註釋

1. 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頁450。
2. 《增訂張氏近世考》，為張家所藏家譜。
3. 張爾田：〈與人論昌明孔教以固道德書〉，轉引自左玉河：〈試論民國初期張東蓀政治思想的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01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4. 張爾田著作包《史微》、《槐後唱和》、《遁庵樂府》、《遁庵文集》、《蠻書校注》、《錢大昕學案》、《玉谿生年譜會箋》、《蒙古源流箋證》等。
5. 見他的封筆之作《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社，1948)。
6. 1952年代被「養起來」之後，東蓀即作「獨宜老人《草間人語》」：行年六十有七，始學為詩，繼而又勉為詞，乃竟忘老至，不自量力，妄欲與詩伯詞宗抗手，亦良堪發謔也。三年間積稿，詞得一百三十闋，詩七十首，錄而存之，以詩附詞後，共二百首……
7. 張東蓀：《人生觀ABC》(上海，世界書局，1928)。
8. 張東蓀：〈從事教育與問政治〉，《國訊周刊》，第427期，1947年。
9. 張東蓀：《理想與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序論〉。
10. 張東蓀：《新哲學論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自序〉。
11. 張東蓀：〈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正風》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年1月。
12. 張東蓀：〈現在與將來〉，《改造》，第3卷第4號，1920年2月。
13. 同註11。
14.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5. 梁啟超：〈敬告留學生諸君〉，轉引自李安山：〈中國華僑華人研究的歷

史與現狀概述〉，「中國新聞網」(2003年8月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3-08/08/content_253360.htm)。

16. 〈愛智會之成立〉，《教育》，第1卷第1號，1906年10月。
17. 即pragmatism，胡適曾為該詞的中譯大費躊躇。可惜的是，「實用主義」一詞在中國也快一百歲了，卻一直沒有將它原本所含的「講求實際、活躍執拗、實幹且重實效」等積極含義突出出來，在今日漢語裏變得相當負面，幾成無原則是非，一味取巧重實利。張東蓀譯的「唯用論」似比較中性。
18. 張東蓀：〈哲學家是什麼？哲學家應該做什麼？〉，《時與文》，第1卷第5期，1947年。
19. 黎鳴：「任何人信仰的對象都只應該是超越的、抽象的東西，例如上帝，真理，或在社會生活和國家中，至少也必須是類似真理的副本——憲法。」至於那位明星，大家都知道，北師大于丹是也。
20. 同註18。
21. 《新燕京》，1952年6月3日。
22. 張東蓀：〈唯用論在現代哲學上的真正地位〉，《東方雜誌》，第20卷第15、16期，1923年6月。
23. 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441。
24. 張東蓀：〈中國之社會問題〉，《庸言》，第1卷第16號，1913年7月。
25. 英國詩人丁尼孫(Alfred Tennyson，1809–1892)，今通譯丁尼生，名作如《海斯佩麗德絲之歌》。原詩為

    Thou art mazed, the night is long,
    And the longer night is near:
    What! I am not all as wrong,
    As a bitter jest is dear.

26. 張東蓀：〈論真革命與假革命〉，《展望》，第2卷第24期，1948年10月。
27. 同上註。
28.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序論〉。
29. 居正(1876–1951)，1900年中秀才，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學預備部。同盟會元老。1935年國民政府司法院正院長。1949年後任台灣國民黨監察院委員，潛心佛經研究。

30. 羅癭公(1872–1924)，名惇曧，字孝遹，癭公為其號，以號行。順德大良人。著名劇作家。與梁鼎芬、曾習經、黃節合稱「近代嶺南四大家」。曾官至郵傳部郎中(清代)與國務院參議(民國)。藏書繁富，特別留心當代史料的搜集輯存。
31.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661。
32. 陶菊隱《政海軼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有一則「辦共和」：「民國三、四年，袁氏每與人談辦共和之成績如何，對各省大吏來京請訓者亦以是為詢……選舉科主管幹事楊永泰，幹事張東蓀、沈鈞儒、徐傅霖、羅文幹、張耀曾、伍光建、仇鼇等。文事部主任幹事楊光湛。政務……。」
33. 谷鍾秀：〈發刊詞〉，《正誼》，第1卷第1號，1914年1月。
34. 張東蓀：〈正誼解〉，《正誼》，第1卷第1號，1914年1月。
35. 黃嶺峻等：〈民國初年：道德規範的尋求與傳統文化的回潮〉，《江漢論壇》，2005年第11期。
36. 張東蓀：〈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正誼》，第1卷第7號，1915年2月。
37. 張東蓀：〈對抗之價值〉，《庸言》，第1卷第24號，1913年11月。
38. 同註36。
39. 張東蓀曾記有一段趣聞：「我記得君勱與稚暉在德國的時候有一段趣話。那時正在推翻袁洪憲，張君勱說，我代表立憲黨，你代表國民黨，我要求國民黨先讓立憲黨執政五年。稚暉不答應。原來他們都沒有得國內的消息，哪裏曉得全沒有這麼一回事呢！」參見張東蓀：〈現在與將來〉，《改造》，第3卷第4號，1920年12月。
40. 同註36。
41. 袁偉時：〈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貴開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紀》(香港)，2001年2月號。
42. 同註9。
43. 張東蓀：〈我亦談談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論〉，《自由評論》，第19期，1936年。
44. 同註26。
45. 張東蓀：〈黨的問題〉，《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46.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47. 張東蓀：〈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4號，1920年7月。
48.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

二

現代學人

1　辦報

1917年，張東蓀接手《時事新報》。那時候，這份報紙不但已經有了近十年的歷史（如果從汪劍秋創《時事報》、狄葆豐創《輿論日報》的時候算起），其間在張君勱、黃群任事期間，即袁世凱稱帝前後，還相當火爆。那回，《時事新報》先是發表邵飄萍極力倡導新聞救國的〈論新聞學〉；接着，和北京《國民公報》呼應，公佈袁的復辟密電，在全國形成絕非老舊中華帝國所能有的「輿論」；緊接着，是流傳於後世的時評〈預吊登極〉：

> 京電傳來，所謂皇帝者，不久又將登極。嗚呼！皇帝而果登極，則國家命運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極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時日，各處反對之聲勢，再接再厲。所謂登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乎！記者是以預吊！[1]

張東蓀這回接手，算是真正有了自己的陣地。對他而言，最須恪守的，自然是言論的尊嚴和人格（報格）的獨立，誠如梁啟超（署名時事新報同人）在《時事新報》出滿五千號時候所寫：

> 吾儕從事報業者，其第一難關，則在經濟之不易獨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詡，但酷愛自由，習而成性，常覺得金錢之來，必自勢力，無論受何方面金錢之補助，自然要受該方面勢力

> 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牽掣。吾儕確認現在之中國，勢力即罪惡，任何方面勢力之支配或牽掣，即與罪惡為緣。吾儕不能革滌社會罪惡，既以滋愧，何忍更假言論機關，為罪惡播種；吾儕為欲保持發言之絕對的自由，以與各方面罪惡的勢力奮鬥，於是乎吾儕相與自矢：無論經濟若何困難，終不肯與勢力家發生一文錢之關係。[2]

而最拿手的，對東蓀而言，應是論説、時評與對西方學術文化的譯介了。這幾項，應該説是創造性繼承而非創新，因為《時事新報》從來就不是一份娛樂或商業性報紙。

1918年元旦，柏格森的《創化論》(張東蓀譯)開始在報上連載，共三個月。[3]這位曾因為「文筆優美，思想富於吸引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27年)的法國哲學家，歷來強調「創造與進化並不相悖，因為宇宙是一個『生命衝力』在運作，一切都是有活力的」。他反對科學上的機械論，心理學上的決定論與理想主義。頒獎的瑞典學院認為，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在批判傳統哲學的理性主義機械論和決定論，以及解放人類思想方面，具有巨大意義。

《創化論》是柏格森1907年前後在歐洲發表的，正是東蓀留學日本的時候。想來那時他們就讀到了這部著作。從他隨後動手翻譯，並介紹到中國，前後不過十年——那時柏氏還沒有獲獎。

接着，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影響深遠、並孕育出大批優秀文人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出籠：

> 方今社會為嫖賭之風所掩，政治為私欲之毒所中，吾儕幾無一席之地可以容身。與其與人角逐，毋寧自闢天地，此學燈一欄之由立也。[4]

開篇，即是一直困擾張東蓀，讓他時刻牽掛於心的主題：教育。

> 近來吾國教育弊端百出，如學制之荒謬，教員之墮落，學風之卑下，此外邪説披猖，道德陵夷，尤為傷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鑄鼎燃犀之筆，為之一一揭發，與紕繆之主義激戰，以其文字投

諸本報，當敬為披露，並願以優厚之酬資，為定交之紀念。[5]

可能覺得如此抽象的號召，在八股、制藝、策論依舊盤桓於文人（哪怕沒了辮子的）頭腦的時候，還不足以得到生動、活潑、具有戰鬥力的文字。幾週後，再發「啟事」：

本欄徵求全國中等以上學校調查報告（詳述歷史沿革及現在狀況，如能將校長照片及校舍攝影附寄，尤所歡迎）。諸君如以平日參觀所得，賜稿鄙報者，無任歡迎。[6]

光號召還不夠。他通過專欄設置，讓投稿者清楚明白自己議論的方向與方式。「教育研究」，「教育界消息」，「講壇」，「學校指南」，「青年俱樂部」……逐一開闢。《時事新報》的這個綜合性副刊，佔了整整兩版，隨報附送，也可單獨訂閱。因為初創，總主筆不得不親自撰文以打下根基。據研究者翻檢舊日報刊，在頭一年的前八個月裏，僅「講壇」一欄，張東蓀就為《學燈》寫了〈國人讀書力之缺乏〉、〈中西思想之絕對相反〉、〈說鬼〉、〈論譯書〉、〈論報紙〉、〈運命思想亡國論〉等十數篇論說。對「教育小言」欄目也是如此。

當時《新青年》雜誌創刊三年，正處於它聲譽最高峰：

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陳獨秀）

嗚呼！太西有馬丁．路德創新教，而數百年來宗教界遂闢一新國土；有培根、狄卡兒創新學說，而數百年學界遂開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已矣！（吳虞）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中國人要過「現代生活」，就必須與孔教決裂，與孔教為核心成分的整個舊文化、舊倫理、舊道德、舊思想，甚而舊風俗、舊習慣決裂。（胡適）。[7]

張東蓀沒有對陳、胡、魯迅、吳虞的言行做過抨擊。他對於所謂「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毛澤東語）看來並未認同。更為關鍵的是，他對口號式革命委實不敢恭維。有趣的是，在五四文化論戰中，他的對手是章行嚴和梁漱溟。他主持的《時事新報》明確提倡：

對於原有文化，主張尊重，而以科學解剖之；（讀者須知我是主張用科學，即民族心理學、人種學、地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等來研究東西文化的。）

對於西方文化，主張以科學與哲學調和而一併輸入，排斥現在流行之淺薄科學論。

他的根本觀念是：

我們若認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盡量充分的把它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因為他自然而然會消滅的。[8]

所謂「淺薄科學論」，以他們當時的見解，顯然指西方流行的「科學主義」或曰「科學萬能」論：

只講「德、賽」兩先生是不夠的，還當講「費先生」（哲學）。歐戰後西人想到了須請「費先生」出來，講個根本和平的辦法。因為費先生是很可以幫助賽先生達他的目的，並且人類應該有一種高尚的生活，是全靠費先生創造的。總之，前數十年是賽先生專權的時代，現在是賽先生和費先生共和的時代。這是歐美一般賽先生和費先生的門生所公認的。何以貴誌只擁護賽先生，而不提及費先生呢？[9]

張主筆親自編副刊。《時事新報．學燈》先是刊載外國文學譯著(1918年12月首發)，到1919年4月，開始發表國人的創作，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從第一年(1918年)3月創刊，《學燈》先是每週一期；兩個月之後每週二次，到年底已經是每週三次；第二年乾脆改為日刊，本來星期日休刊，後來為作者、讀者所鼓舞，終於逐日發行。

這年6月，新闢了「社會問題」、「婦女問題」、「勞動問題」等專欄。受歡迎的作品有介紹無政府主義、杜威實驗主義、新村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以及杜里舒、羅素、柏格森唯心主義哲學的譯著，也包括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在文學方面更是不拘一格，先後介紹托爾斯泰、安徒生、莫泊桑、哈代、屠格涅夫、魏爾蘭、波特萊爾、愛羅先珂、惠特曼、左拉等不同流派的作家，出版「歌德紀念」和「但丁六百年紀念」專號。

那時的「當代文學青年」，受到《學燈》熱情鼓勵。宗白華應張東蓀之聘，在《學燈》上增設「新文藝」專欄，開始刊載新詩。鄭振鐸徵得張東蓀的同意，在《時事新報》上開闢文學副刊《文學旬刊》。三次在他處投稿而遭拒的郭沫若，其「火山噴湧」般的詩作(〈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鷺鷥〉、〈死的誘惑〉、〈鳳凰涅槃〉)，就是從這裏突泄而出，從而「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10]——1919年夏天，這名正在海邊磨蹭着不想唸醫科的窮學生，接到主筆張東蓀的來信，請他將手邊零星翻譯的《浮士德》「整個兒譯出」。

沈雁冰的一系列白話翻譯小說《在家裏》(契訶夫)、《一段弦線》(莫泊桑)、《情人》(高爾基)……也是在《學燈》上發表的。日漸成熟之後，候補文化官員的演練也陸續出現：〈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

隨着一個又一個博學、熱誠、人脈廣闊的編輯[11]的引入，特別是主筆在選題、觀點、行文風格上開放，《時事新報．學燈》實在可稱為新鬥士、新文藝家的沃土。

蔡元培的〈國外勤工儉學會與國內工學互助團〉，發於1920年元旦的《時事新報》增刊。俞平伯讀了他的《石頭記索隱》之後所寫的批評文字〈對於《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也發表在這裏(1922

年)。郁達夫處女作〈銀灰色的死〉，發表於1921年。徐志摩的詩〈聽槐閣之訥樂劇〉和〈康橋再會罷〉，也在這裏連續推出。

還有張聞天的〈對於中華書局新思潮社管見〉也上了報。

在早期共產主義者中，最具學者氣質者屬張聞天。他在給張東蓀的信裏說：

> 吾們且看現在青年普遍的心理什(麼)樣？他們自己沒有對於各種學問做根本的研究。人家要研究問題，他也加入研究，全他的直覺寫出來。寫出直覺還不要緊，而心目中另抱出風頭的目的。……在思想改造的時代，此種事情當然免不了。但是此種現象，只能一現，長此以往，國家破產、思想破產。[12]

毛澤東1920年5月抵滬，繼續驅張(敬堯)，《時事新報》成了他的言論陣地。〈湘人為人格而戰〉刊於6月9日。待到驅張成功，又接着發了〈湖南人再進一步〉。他那篇「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胡適語)的〈民眾的大聯合〉經俞頌華之手，在該報全文轉載。後來，又為《時事新報》撰寫了〈反對統一〉，認為各省自決是改建真中國的唯一的法子：

> 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採省門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13]

出身清苦的潘漢年還只有十七歲，就已經是《時事新報》的訂閱者。他十四歲開始在家鄉當小先生，第一篇論述〈打破小學教科書之我見〉就發表在《時事新報．學燈》上。接着，又發表了〈致張東蓀先生的信〉(1923年10月20日)、〈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1924年6月7日)和〈到鄉間去——為暑假學校問題，敬和王平陵君討論〉(1924年8月26日)等。

「她」字的誕生和普及，《時事新報．學燈》功不可沒。劉半農的〈「她」字問題〉和相關爭論，1920年在這裏發表。聞一多的〈一個觀念〉那首詩(收於《死水》)也是該報首發。

魯迅無疑是《時事新報．學燈》的讀者。雖然沒有主動「賜稿」，但涉及了不只一次的論爭。如對大學生胡夢華批評《蕙的風》的批評；對駁吳宓〈新文化運動之反應〉的評論等等。[14] 為回應他在《新青年》發表的〈隨感錄〉對《時事新報．潑克》副刊諷刺畫的批評（「我輩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創作，也該當學習」），《時事新報》則發表署名「記者」的〈新教訓〉，罵魯迅「輕佻」、「狂妄」、「頭腦未免不清楚，可憐！」（1919年4月27日）

還有胡適痛批周作人「新村運動」的演講〈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1920年），質問他怎麼能用改良手段去「變舊社會為新社會，變舊村為新村」？

擔任主筆的張東蓀主要主持言論，在青年編輯眼中，很有老夫子派頭：

> （他）每天下午來館，處理論說文稿（自撰社論，審閱特約專論、來論、譯述文著）和《學燈》稿件，交排字房後即回家。有時社評回家去寫，則指定工役專人於晚間去他家取來。[15]

1920年五四運動周年紀念時候報紙所持姿態，很具東蓀特色。何思誠寫道：

> （屆時）從南到北，驟然煽動起一股破壞學生愛國運動的逆流，厚誣青年「曠課不讀書」，大叫大嚷「回課堂去」，氣焰甚為囂張。就中以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羅家倫之流，紛紛提出口號、發表文章，此唱彼和，最為賣力；而《時事新報》和《學燈》也大喊「學生上課」，遙相呼應。從這時起，《學燈》的報頭上（即刊名上）繪了一幅小圖案畫，排列着「哲學、文藝、科學」三本書，作為提倡讀書的標籤，藉以眩惑一些人的眼目。[16]

曾第任《時事新報》助理編輯、要聞編輯、編輯主任，最後擔任副主編（從1923至1931年）的何先生，在二十世紀末對自己報紙所作批評，特別具有舊文人接受黨改造的熱誠：

如問讀寫什麼樣的書呢？只要一看該刊爾後所端出來的一套「大雜燴」貨色，就可窺見一斑了。例如：哲學，把羅素、詹姆士、杜威、柏格森等的東西都搬動過，甚至對尼采的超人主義，叔本華的厭世主義，以及斯蒂納爾的極端個人主義，也無例外地吹噓。社會科學也一樣，趁羅素、杜威、孟祿、杜里舒等人來華講學時際，多方稗販他們的唯心主義觀點，連篇累牘地刊登他們的《教育哲學》、《社會結構論》等講稿，宣揚不遺餘力。[17]

梁實秋在回憶文章〈我的一位國文老師〉裏，寫到《時事新報》及其主筆，在那個新舊交錯時代的社會影響：

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有古文，有白話，油印分發給大家。〈林琴南致蔡孑民書〉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吳敬恆的《上下古今談》，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以及張東蓀的《時事新報》社論，他也選了不少。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我對於國文的興趣因此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講國文之前，先要介紹作者，而且介紹得很親切，例如他講張東蓀的文字時，便說：「張東蓀這個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過飯。……」這樣的話是相當地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吃驚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否則怎能夠和張東蓀一桌上吃過飯？[18]

《時事新報》首發作者茅盾，成名而後成官，即使晚年回憶也不失最後被追認為共產黨員的立場（望讀者特別注意此「人生之成功者」對分寸的拿捏）：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五四運動爆發了。在它的影響和推動下，我開始專注於文學，翻譯和介紹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學生雜誌》不適合刊登的，我就投稿給上海的《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由於我常在《學燈》上投稿，《時事新報》的主編張東蓀辦《解放與改造》時就約我寫文章。張東蓀屬於研究系。研究系在政治上屬於右翼，但在「五四」運動後，也偽裝進

步。張東蓀甚至還與陳獨秀他們共同商議發起上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解放與改造》刊登介紹外國各派社會主義運動的文章，《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登載擁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章。但當梁啟超（研究系首腦）從海外歸來，態度即變。張東蓀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社論〈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即為自己重復右傾找「理論根據」，以後就不談社會主義，且反社會主義了。……《解放與改造》上有一欄叫「讀書錄」。……我在這上面介紹的第一篇是張東蓀給我的材料，叫〈羅賽爾《到自由的幾條擬徑》〉（《解放與改造》一卷七號），小題目是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羅賽爾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也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那時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我覺得看看這些書也好，知道社會主義還有什麼學派。那個時候是一個學術思想非常活躍的時代，受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如飢似渴地吞咽外國傳來的各種新東西，紛紛介紹外國的各種主義、思想和學說。……

那是在1920年，商務印書館當局還沒有約我主編《小說月報》的時候，《時事新報》的主編張東蓀見我經常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投稿，認為發現了一個人材，有意要拉我到《時事新報》工作。大約是七八月份，他因事離開上海，把我請去代理了二三個星期《時事新報》的主筆。也就在那一段時間，我在《時事新報》上寫了一些短文。後來，我終於沒有被張東蓀拉過去，一則我要編《小說月報》了，二則，這也是主要的，因為我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張東蓀卻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了。[19]

至於後世論者所說「五四運動後，《學燈》益趨保守，逐漸淪為抵制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輿論陣地」。[20]這，我們知道，已經屬於宣傳官員的套話。

至於那個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得到史家注意的中國命運之關鍵轉折——陳炯明反對孫中山未成，《時事新報》或者就是主筆張東蓀，則對此見解鮮明。他堅決反對武力北上，主張各政治勢力合作妥

協。其反對革命的意向，直接表現在版面上。何先生記載：

> 3月12日孫中山在京逝世那一次，當電報傳到上海時，《民國日報》……進步人士……深表哀悼，但僅有幾步路相隔的《時事新報》，在接到京電之後，第二天就在刊登孫的逝世新聞的同時，發表了一篇題為〈孫文死矣〉的社評，態度之惡劣，達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在通篇充滿敵意的社評中，竟說「孫的精神，早已死於他和陳炯明破裂之日，今死者，僅其軀殼而已」(大意)。可謂極盡了惡毒誹謗放肆攻訐的能事。[21]

這樣的社評(〈孫文死矣〉)，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張東蓀等報政主持人看來，不過一己之言論，沒想到當天下午就「吃到了一枚炸彈」。而到1927年革命軍進佔上海之後，貴臨大員張靜江劈頭質問《時事新報》訪員的，竟是「為什麼一再譏諷我們，研究系真不是好東西」;「不要以為躲在租界裏就驚動你們不得，我還是可以封你們的門，試試看！」

在張東蓀主持報務時期，由於當局的壓迫(不允許到租界以外發行)、經費窘迫之陰霾從來不曾散去，有時候到了主筆須捐出自己薪水的地步。

《時事新報》對社會的覆蓋可說相當廣，但幾乎沒有農民和農村研究、也少見銀行、商會、企業家、金融家論說，雖然曾有一位應修人(1900–1933，湖畔詩人，烈士)，在給主持《時事新報．學燈》筆政的張東蓀的一封信裏，說他要痛下決心，投身農界，「改良農業，造福農民」。

接辦《時事新報》的同時，亦即梁出國前夕通宵暢談前後，他們一批人還成立了一個「新學會」——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的改造，以作為「新中國」的基礎。〈新學會宣言書〉由東蓀執筆起草：

> 我們現在創辦這個「新學會」，就是抱定……第一，我們現在承認國家的革新是沒有取巧的捷徑的，是必須經過那條思想革新的大路的。第二，我們承認學術思想的革新有一條捷徑，那條捷

> 徑就是研究歐美先進國幾百年來積聚所得的最後的結果。……我們的希望是研究世界最新的思潮、最新的學說，用來作為我們研究中國種種問題的參考材料，再盡我們的能力把這種學說傳播出去，使全國的人都添無數參考印證的材料，使中華民國的思想有一些革新的動機，使中華民國的新生命有一個堅固的基礎。[22]

「新學會」當然要有自己的會刊。《解放與改造》雜誌於1919年秋創刊。張東蓀的〈第三種文明〉就發在這期上。在這篇文章裏，作者從人類文明的分期談起：

> 人類的文明，自有歷史以來，可以分做三個時期，每一時期各有特徵，可以說第一種（習慣與迷信的文明）、第二種（自由與競爭的文明）和第三種（互助與協同的文明）。[23]

他認為，二十世紀前的數百年，是西方社會經歷「自由與競爭」，也即「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文明」的蓬勃期，而剛剛結束的世界大戰，把第二種文明的破綻一齊暴露了；也就是說，國家主義與資本主義已到了末日，不可再維持下去。

> 我們說大戰比如春雨，第三種文明的萌芽經了這春雨，自然茁壯起來。但是尚須吸取陽光，才能成熟。

那「互助與協同的文明」，是一個什麼樣的前景呢？張東蓀認為，

> 因為尚未成熟，不能詳細說明。然而也有幾點可以預言的：
>
> 一，思想上道德上必定以社會為本位。
>
> 二，經濟上必定以分配為本位。
>
> 三，制度上必定以世界為本位。
>
> 四，社會上必定沒有階級的等次，雖不能絕對，也須近於水平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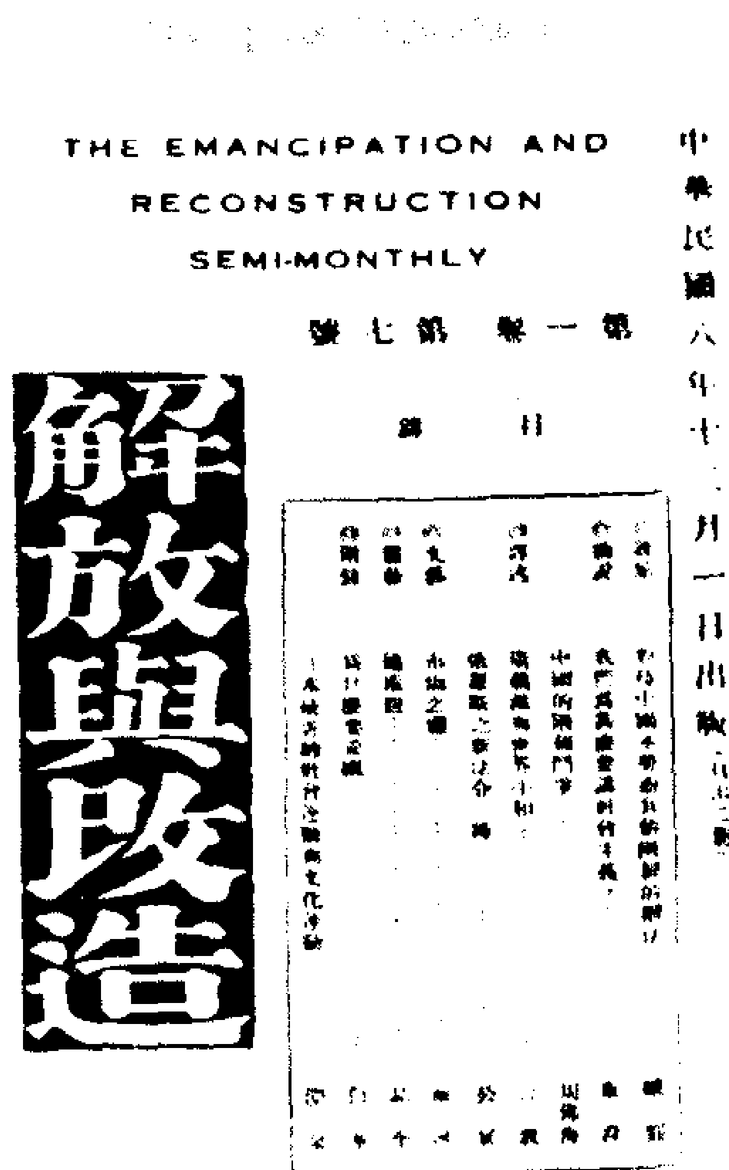
對照今日，不能不為他們當年敏銳、精當的思慮鼓掌。當然就分期而言，以我們今天對世界的有限觀察，有大約二十至三十年的誤差。[24]

中國能否跟上世界的步伐？

不過我們有一個最苦痛的地方，就是中國今天的現象是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人聚於一堂。雖則歐美先進國也是複雜的，他們的思想也有差池，但是新的究竟居多數，且相差也不甚遠。我們則不然，一則開化的很少，二則距離得太遠。大多數的人仍逗留在第一種文明與第二種文明之交。不但沒有第三種文明的資格，並且也沒有第二種文明的陶養。這個真是苦痛極了。

後進的先覺者之苦痛證之於李璜：

自五四以來，這十二三年間，我們真是受不了。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所有「人性」的要求，十七八世紀啟明（蒙）運動所有「個性」的要求，及十九世紀的「國性」的要求，三樣東西一齊來，怎不令青年朋友要發狂了呢！[25]


THE 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EMI-MONTHLY

第一卷第七號

目錄

解放與改造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張東蓀主編的《解放與改造》，1919年9月創刊於上海

但我們的主人公居然越過孫傳芳、蔣中正、毛澤東和鄧小平，直接預言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

世界改造以後，必定是取互助主義與勞動生活。互助主義不必說了。從勞動生活說來，我們人口很多，生活很低，自然能取得一個地位。不過大改造未成以前，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不能不有一個辦法。據我看來，第一是文化運動——廣義的教育；第二是設法變外貨為外資；第三是移民。

什麼樣的文化運動呢——

提倡互助的精神，培植協同的性格，養成自治的能力，促進合群的道德。

而「提倡」、「培植」、「養成」、「促進」，絕非革命性格，無不指向教育與漸進的改良。在這樣一個新陣地，當時的戰士，雖然在筆戰上火花迸濺，並沒有黨伐之戾氣。陶菊隱說：

五四運動的發祥地是北大，研究系與這股暗流早有合流共趨的跡象。張東蓀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藍公武在北平辦《國民公報》，陳博生辦《晨鐘報》（《晨報》前身），都是文化運動的前驅。[26]

雖然沒有隨梁啟超到歐洲「旁觀和會」，留在上海的張東蓀十分關注他們的行程，特別致書張君勱：

公等此行不可僅注視於和會上，宜廣考察戰後之精神上物質上一切變態。對於目前之國事不可太熱心，對於較遠之計劃不可不熱慮。[27]

1920年，梁啟超從法國回到上海，雄心勃勃，打算辦報、辦刊、辦大學，要推動留學、組織學術社團，還要辦貿易公司、輪船公司……但中心還是文化運動，一如艾愷所說，踐行他「不斷將西方思想對中國引介的事業的一個延長」。

當年5月，梁將《解放與改造》更名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學社」主辦)，將基爾特社會主義精神向「實際的方面」貫徹，宣傳溫和的社會主義，主張腳踏實地的社會改良。

除了作計劃，「以淺近簡明為主」系統編譯西方名著外，他們還打算專門聘請外國學者來華演說——「講學社」應運而生。經費哪裏來？董事捐款：當時中國社會已經有此能力。周佛海記得他從日本給《解放與改造》投稿的日子：

> 第一年除學校功課以外，專門只看社會主義的書籍，……當時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辦有《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刊載出來，稿費非常豐富。這種稿費，大部寄回家養母，一部拿來買書。
>
> 民國九年夏天，動身(到杭州)之前，到《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他是《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我因投稿的關係，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報館，他還沒有到。……後來東蓀來了，卻談得非常投機。他們當時組織「共學社」，翻譯名著，請我也來譯一本，我便擔任翻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去訪仲甫。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人吳庭斯基在座。……[28]

這次漁陽里會見，就其歷史份量與場面戲劇性而言，精彩之極——這我們在後邊還會說到。

除了辦刊，「共學社」還曾邀請國際大學者來中國講學，如英國哲學家羅素、印度詩人泰戈爾、德國哲學家杜里舒等。本來還要請經濟學家凱恩斯、哲學家柏格森等，因故未成。當然最大的成就還是編譯新書，僅1922年就出版了四十多種，總計大約有一百多冊，引入了許多社會學、哲學方面的書籍，涵蓋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各種不同的思潮。

在這期間，在這批政治、社會理想相近，但學理、見識尚有切磋餘地的夥伴間，還發生了一場後世稱為「科玄之爭」的辯論——今天

有論者認為是「中國現代哲學真正的邏輯起點」。[29] 雙方的言論陣地就是丁文江主持的《努力週刊》和張東蓀任主筆的《時事新報》。

事情的開場極為平常，但不可否認的是，其根源早在他們遊歐、在批評「淺薄的科學觀」的時候就埋下了。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人生觀」，認為人生的問題不能僅用科學來解決，「意志自由」就是一例：「人生觀為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人格各異而是單一性的」，「科學」則是「客觀的、為論理方法學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於因果律的，起於自然之齊一性的」，「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唯賴諸人類自身而已。」

地質學家丁文江（同時也是張君勱的至交）見文「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對科學的進攻。立即撰文回應，擁護胡適所提「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和需要，即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稱張君勱被歐洲來的「玄學鬼」附身。「科玄論戰」開場。

張東蓀是在「科學派」已經取得壓倒聲勢的時候才上陣的。他先是在《學燈》上發表梁啟超、孫伏園的答辯文章並加按語，接着，在刊出林宰平的重頭文字〈讀丁在君先生的「玄學與科學」〉以及陸志韋的〈「死狗」的心理學〉之後，終於按捺不住：

> 其事起於張君勱論人生觀而又輕蔑科學之言。丁在君起而維護之。一方以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故人生觀不能統一。他方以為凡人生無不可入科學，故終可得一定於一尊之科學的人生觀。丁在君之維護科學，是也；乃因維護科學之故而侵犯哲學，痛詆玄學為無賴鬼。於是愛哲學者，如屠孝實等，為之抱不平焉。余亦其中一人。[30]
>
> 只因為我有個脾氣是不喜歡錦上添花而只喜歡雪中送炭。在丁先生第一篇文章發表時，就有人來報告於我，說丁先生方面已預備有許多人對於張先生自己一個人來「群起而攻之」（這個話本是謠言，不過《努力週報》迄至今日除張先生自己的文章外，所有談到「科玄論戰」的無一不是反對張先生的）。我當時聽了這

個傳聞，雖明知不可靠，但卻預料丁先生方面（即攻擊張君勱的方面）總不會寂寞的，用不着我來湊熱鬧。於是我決定對於丁先生來燒一燒冷灶。[31]

張東蓀這篇〈科學與哲學——一名從我的觀點批評科玄論戰〉，為台灣學者葉其忠評為「對科玄論戰最有份量的論著」。[32]

不久，「唯物史觀派」參戰。現在尚不見有研究給出令人信服的論述，這一「參戰」行動，究竟是該黨早期的組織行動，還是他們自己的言論抒發。但「高瞻遠矚」淩駕一切、特別能扣帽子，以及「親不親，階級分」之特色，已躍然紙上。見共產黨人鄧中夏的評述：

東方文化派……他們真狡獪！他們知道光是攤出東方的舊古董來，恐怕不能博得青年們的叫好，於是乎不能不翻個花樣，好攪亂青年們的眼花，麻醉青年們的神經。「東方文化派」可分為三系：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等為一系……梁啟超一系，底子上雖然是中國思想，面子上卻塗滿着西洋的色彩。他們講玄學，卻把西洋的玄學鬼如柏格森的「直覺」，倭依鏗的「精神生活」，歐立克的「精神元素」都搬來作他們的幌子。這是他們的花樣了。

東方文化派可說代表農業手工業的封建思想（或稱宗法思想），科學方法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資產階級思想，唯物史觀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無產階級思想；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有他們的背景。[33]

我們應該結成聯合戰線，向哲學中之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傅侗包括在內）、梁漱溟，政治中的研究系，……教育中之黃炎培……等這些反動的思想勢力分頭迎擊，一致進攻。[34]

到了年底，東亞圖書館將雙方的文章歸併，編成《科學與人生觀》，由陳獨秀、胡適作序。

陳獨秀認為重要的是「歷史觀」，而非「人生觀」。個人之「情感」、「意志」、「信念」、「良知」，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蒼蠅嗡嗡叫而已：

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35]

胡適則斷言：

我們要知道，歐洲的科學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學鬼來攻擊了。幾個反動的哲學家，平素飽饜了科學的滋味，偶爾對科學發幾句牢騷話，就像富貴人家吃厭了魚肉，常想嚐嚐鹹菜豆腐的風味；這種反動並沒有什麼大危險。那光焰萬丈的科學，決不是這個玄學鬼搖撼得動的。[36]

胡適怎麼如此遣詞？無論從做人與問學，都顯得反常。不幸（或有幸）他當時不為人知的信函逐一發表。讀過這封致陳獨秀的信（1920年底），我們或許得以窺得胡「博士」更深的內心活動，比如說，好（此處須讀第四聲）名位？（信中之「他」為梁啟超）：

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但此事我倒很歡迎。因為他這樣做去，於我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你難道不知他們現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這三年中都討論過了，我很不願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表了。）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37]

張君勱二十多年後，在為張東蓀的《思想與社會》作序的時候，更透徹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吾輩當時提倡此派學說，初非由柏氏反對黑氏，乃由此派哲

學側重人生，尤好言人生之特點，為自由、為行動、為變化，正合於當時坐言不如起行，唯有努力奮鬥自能開出新局面之心理。

科學主義並非科學，只是一種幼稚淺薄的哲學，科學不能包籠一切。共產黨取此觀念時為努力抹殺科學之外的哲學、文學、藝術、宗教。這是典型的「五．四」之後的淺薄思想，最終為政黨所用。

決心以激進的革命改造中國，並且成功獲得政權的共產黨怎麼看待這批人的努力呢：

刊物發表了大量宣傳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文章，提出要「從唯物主義轉到精神主義」，「去馬克思而返於康德」，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反對俄國十月革命，強調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發展資本主義，企圖把革命高潮拉到改良主義道路上去。他們的言論受到了《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的批評，引起了關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論戰。[38]

然而自視為馬、恩嫡傳的共產黨人，無論在當時還是掌了權（包括絕對的話語權）之後，都不見提及恩格斯的這段話：

不管自然科學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39]

《解放與改造》雖於1919年9月創刊於上海，卻以北平新學會名義出版，一共出了兩卷共二十四期（主編張東蓀、俞頌華）。一年後，從第三卷開始，更名《改造》（主編梁啟超、蔣百里）。改版之前，也即該年7月，張東蓀把他和張君勱討論國事的三封往來信件發表了，標題是〈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主張中國只能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道路，而不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路。

《改造》出到1922年秋天的第四卷第四十六期，也告停刊。

1925年10月，徐志摩擔任《晨報》副刊主筆，發起了一場「對俄問題」大討論：中國對蘇俄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不曾開刀的一個毒瘤，裏面的膿水已經滿了，但是卻沒有獨立見解的人去觸動它——即日後著名的由「首都革命」好漢「火燒晨報」的直接動因。張東蓀發表〈甘地動機與馬克思動機〉參加辯駁。

1927年，北伐軍拿下上海。由張公權作伐，史量才購進《時事新報》。他的初衷當然是期望保住這份報紙在上海所具之影響力，但無論政局，還是勉為其難的留守人員，都已無法堅持原先風格與方針。

被革命軍作為「學閥」而通緝的前主筆，留在報社已沒有可能。用何思誠的話説，就是「迭經內部商討，對張東蓀言論失策嘖有煩言。張乃悻然引退，拒不到館」，「張東蓀的離職，在該報來說，雖移開了一大目標，但沉澱於某些人心胸中的不愉快，總不是一下子所能澄清冰釋得了的。」——這裏的「某些人」，指的應是剛剛端着槍、打進上海的權勢人物。待到蔣介石的「文膽」帶着國民黨的宣傳津貼費入駐，取悦當道、競逐獵官，已經成為這份曾經生機勃勃的報紙的基調——其生命自然也就終結了。

本來已經在中國公學以教務長代理校長職務的張東蓀，經此事變，「順理成章」地從辦報轉為辦學。

2 辦學

1920年，梁啟超從歐洲返國，應邀到中國公學演講。

清代規制，民間只許辦中學和小學，成立於1906年的中國公學，遂成為中國第一所民辦大學。百年過去，翻檢發黃的紙頁，品咂一撥又一撥人對它的描述，隨著述者的不同喜好與立場，只令讀者墮入五里雲霧之中——同盟會辦的？立憲派辦的？革命的大機關？現代學人的政治基地？比如先做學生（1906年）後來又做校長（1928年）的胡適的敘述，[40] 就並非無意地不提梁啟超在1915年和1920年間的努力。

最有意思的是，這所大學最初的籌辦者，竟是在讀的學生。

1905年，清廷駐日公使館與日本文部省共謀，頒佈《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目的當然是為剿滅留學生中的革命活動。那年，我們的主人公張東蓀正蜷伏在東京本鄉丸山新町的小屋裏如癡如醉地讀書；少年胡適剛到上海，嘗試着用白話文編小說。但同盟會那時在東京已經相當活躍。這年11月，先有八千多名留日生罷課抗議，接着江庸、汪精衛、許壽裳等人發起「維持留學界同志會」(復課派)，然後是「歸國派」和「復課派」口誅筆伐，互相拆台。這裏邊還摻雜了清廷在上海張開的準備兜捕的口袋，以及孫文為保護革命同志命令「歸國派」收斂等等。

但高潮中還是有三千多名學生退學回國。怎麼辦？留學生裏邊出現了自強的領袖人物。幾名剪了辮子並著洋裝的青年(絕對令當時上海人側目)奔走、籌募，最後在北四川路租了一所民房，義薄雲天地按照自己的理想，籌建了面向全國十三省的中國公學，並組建了體現民主與共和的執行、評議兩部(負責校務)。他們策劃了大學班、中學班、師範班、理化專修班等，聘請于右任、馬君武等教員。可惜萬難之中，原先的激憤與豪情多在冷眼與寒風中消逝，到1906年春天開班時候，只剩下318名前留日生。

骨幹之一、擔任最為艱巨的庶務的姚宏業，為喚起國人對公學的關注，憤而投黃浦江自盡；另一名骨幹張邦傑也在兩三年後，為校務盡瘁而死——都在二十上下的年紀。另一名從一開始就擔任執行部幹事的王敬芳同學堅持着，以無比的堅韌與見識，包括博大的心胸與靈活的姿態，混跡於高官、大賈、實業家與學界泰斗之間，終於撐到了1920年。

如果此時不是1920年，而是他們剛立住腳的1906年，激進學生領袖王敬芳或許不願拉攏在《新民叢報》上連載「開明專制論」，並與胡漢民、汪精衛拉開架勢辯論的梁任公。但此時公學已經走過了大佬提攜(鄭孝胥、熊希齡和兩江總督端方，他們都屬立憲派)、地方常款補助、民國政府財政撥款、大兵佔領校舍、實業公司助款等各個階段，它的創始人也一步步成熟——校長王敬芳已經是一名實業家，正擔任着中國公學最主要的注資機構河南福中煤礦公司的經理。

在他的堅邀之下，剛剛遊歐歸來，帶着滿腦子見解和一肚子計劃，而且在1915年曾經擔任過公學校董會董事長的梁任公決定接辦。他（以及校董會）的目標，是要把這所學校辦成「文化運動、社會事業、政治運動」的重要基地。

經過反覆衡量——特別考慮到辦學經費的籌措，任公請王敬芳繼續留任，而自己一定殫精竭慮，多方活動籌款。至於金錢之外最關鍵角色，他選擇了張東蓀：教務長（即代理校長）兼大學部主任。

這一年，王敬芳三十五歲上下，任公四十七歲，東蓀三十四歲，從一開始就事無巨細介入的蔣百里三十三歲。

平心而論，梁啟超這樣的招牌人物，本是應該出任校長的，但為蔣百里反對掉了。他還反對使用「大學」二字，主張把精力放在「精」上，創辦高深學問的學府。他認為梁啟超必須到校教書，把任公活潑人格的研究精神作基礎，採用中國古代書院和近代英國的講座制。對此，張東蓀是不贊成的，認為不僅近代教育與古代不盡相同，也不贊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為中心，而應依仗「一團人」（志趣相同者）之人格。東蓀最看重校中之教員——不僅為學生，更覺得「許多學者，非設法養之不可，不然其學者之地位失矣」——「以教員之方法而養人才，亦為辦學之目的也」。[41]

但一報一刊正入佳境，張東蓀難於割捨。對此，梁啟超的意見是：

> 公決任教務長，甚喜。唯同時擺脫報務，卻可不必。掛名主持，大事乃過問，不礙事也。改大學今年已來不及，須俟來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進之餘地，請示覆。[42]

東蓀將全副精力投入到學校的規模、建制、課程、教師……的運作中。他之所以甘心跳進這樣一所煉獄，當然主要出於對教育的理念。年輕的姚烈士十四年前遺囑中關於「中國公學不啻我中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者也」；中國的教育，「莫不有民立學堂與官立學堂相競爭、相補救……今我中國公學實為中國前途民立大學之基礎」，張東蓀肯定不僅同意，甚至願意為此獻身。

他投入運作。第一當然是選人——最先選定的是俞頌華,「應張東蓀邀請出任中國公學教授兼教務主任」。據這位教務主任回憶:

我在參加《東方雜誌》工作之前,曾與張東蓀先生同在中國公學服務並擔任些教科。他辦學的時候,據我所知道,有兩個特色:一是毫無黨派成見,專門聘請好的教授;一是積極充實圖書設備,提倡自由研究的學風。這話在那時中公畢業及讀過書的校友都能負責證明的。所可惜的,那時經費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時間亦不夠長。不然,我相信中公一定能如北大和燕大一樣有悠久的卓著的成績。[43]

關於延聘好教授,俞頌華說:

有一個時期,我曾主持過教務事宜,要物色一位法律系主任教授。我請錢先生[44]介紹,他經過考慮之後,鄭重提出謝冠生[45]先生,介紹我去和他先談談。那時東蓀求賢若渴,立刻同我去訪問謝先生。謝先生同我們彼此都陌生,從未見過面,不過我們邀聘之意甚誠,並且有錢先生介紹,他信任錢先生,就也與我披誠相見,最後他竟欣然允諾。謝先生國學極深,我們還請他出其餘緒,兼講過一學期「國學門徑」,全校選讀此學程者真是十分踴躍。我們法律系的人才,經謝先生造就的很多。全校同學當時但知謝先生是國內不可多得的名教授,卻沒有一個人知道,謝先生的執教「中公」是錢先生介紹的。[46]

東蓀自己在中國公學擔任「現代政治名著選讀」,選的是拉斯基的《政治典範》。這門課,原擬請張君勱來講授,後來雖然由張東蓀講授,用的卻是張士林(張君勱筆名)所譯的講義。

努力延聘的人裏邊還有劉秉麟、舒新城。

年齡少東蓀五歲的劉秉麟原曾是中國公學中學部及大學預科的學生(1909年至1912年)。後入北大經濟系,畢業後又回母校效力。在梁任公接管前,正擔任着公學大學部教務長。東蓀接掌後,他得以抽身到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班、德國柏林大學經濟系研究員

班進修。五年後回國，立聘為大學部教授兼商學院院長。

後來被冠名為「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和辭書編纂家」的舒新城，還不滿三十歲，即受聘為中國公學中學部主任。對這位精力無限的湖南人，東蓀可說相當不陌生。1918年10月，作為長老會基督徒，並任職教會學校，他就有一篇文字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我於教會學校的意見與希望〉)，不意引起長沙教會教育界的嚴重不滿，舒鬥士只好捲起鋪蓋走路。轉年秋，他又在長沙創辦了《湖南教育月刊》，自任總編輯，以「研究我國教育應採之宗旨，介紹世界教育之思潮，批評舊教育之弊端，商榷新教育之建設」為方針。

1920年，一種新的，注重「個別教學」，也即試圖將「關注個別差異」和「完成集體統一」融為一體的教學方法，所謂「道爾頓制」[47]傳到中國。不知舒新城通過何種渠道獲知這一成果，可以想像的是，滿腦子全是如何改革中國教育的這名革新家，在得到這一信息同時又獲得聘任時，有多麼興奮。這年秋天，「道爾頓制」開始在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實驗，並迅速得到全國教育聯合會的關注。與此同時，舒新城還在他的地盤上開男女同學之先河，並且把「選科制」和「能力分組制實驗」、課程結構以及學生自治會改革等等一齊推上日程。不僅如此，他還招朋引類地延聘了葉聖陶、朱自清、朱光潛、劉延陵、吳有訓等一批少年新進。有趣的是，他所作的一切，無論在北京的梁啟超，還是現場負責的張東蓀、王敬芳，包括身臨其境的或活潑或老成的學生，都樂觀其變；對他的大力革新難掩反感的，竟是他的同事，也即後世記錄者所說的「守舊派教師」(包括老派學生)。他們觀念雖老，方法卻時新：「煽動學生鬧事，排斥幾位新教員」，雙方都採取「強硬的辦法」，互不妥協，風潮延宕。用胡適的話說：「上海中國公學此次有風潮，趕去張東蓀。內容甚複雜；而舊人把持學校，攻擊新人，自是一個重要原因。」最後，張東蓀離開中國公學教務長職務。俞頌華、劉秉麟、金國寶等著名教授也相繼辭職。風潮結束。到了1924年夏，張東蓀曾再度受董事會推薦，主持中國公學。這回他辭去《時事新報》主編而專任。但很快就不再主持校務而專門教書了。

這不過是所有繁難事務中的一樁。

最讓張東蓀頭疼的，是幾乎所有學校都面臨的，一口氣都鬆不得的經費不繼……。對這類有良心的校長都鐵定面臨的「死的心都有了」之局面。張東蓀自己沒有留下文字，[48] 我們卻可以參照他的同齡卻不同經歷的老友蔣夢麟（他也是1886年生，但沒有在十八歲留日，而是在二十二歲上等到了庚款留美第一撥）就學潮和經費的記述。蔣夢麟提到，最大的困難是校方與政府之間的經濟糾紛，政府的校款總不能按時撥到，無法實行預算。政府只有偶爾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無法購置教學設備、擴充校舍，連教授們的工資都發不下去，真是傷透腦筋。學生要求更多的自由行動，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正迅速增加的白髮。[49]

蔣夢麟在寫給張東蓀的信中，比喻自己就像一隻飛蟲投到了蛛網裏，一不小心就有蜘蛛從屋角爬出來咬上一口，若無破釜沉舟的決心，早就被嚇退了。勞心至極也只有拿王守仁的四句話「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策驅虎如驅牛」來自嘲了。——人人說市中有虎，我說任憑虎吞了我就罷了，沒有吞我之前，我不妨做些做人應該做的事。[50]

具體到中國公學，那一團亂麻的日子怎麼過的？可見於1928年之後的校長胡適的描述：

> 十一年（1922），公學請張嘉森先生為籌辦大學主任，計劃改組大學事；次年（1923）張東蓀先生辭職，由陳築山先生代理校長，即將原有之商科專門提高程度，改升大學。十二年夏，因添辦高級中學，學舍不敷用，故將商科大學遷設上海。十三年夏（1924），董事會推張東蓀先生任商科學長，陳築山先生專辦高中。十三年之秋，江浙開戰，浙軍佔用吳淞校舍，高中遂停辦。十四年春間，商科大學遷回吳淞，同時籌劃添設哲學、政治、經濟諸學系，擬仿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制度，做成一個社會科學的大學。[51]

此時，中國實業尚未恢復，但大的文化環境，因為沒有拿槍和掌

控資源的「黨」所規定的一統天下，中國學界可說自由之風吹遍大地：博大、鎮定、自信。

1925年，與中國公學有着差不多的「一怒為自尊」經歷，而且一直被目為中國最好的民辦大學之一的光華大學，在一片反帝與自強的浪潮中創建。張君勱(接受五省聯防總督孫傳芳之資助所開辦)的政治大學(後改自治學院，吳淞政治學院，後為國民黨查封)也開課了。張東蓀在光華任哲學教授兼文學院長，講授「倫理學」，同事有潘光旦、容啟兆，王造時等。在政治大學，張東蓀任哲學講習，「張爾田、孫德謙等，任子史講席，海外歸來者，潘光旦、聞一多、吳經熊、吳國楨等，也各就所學講授，一時稱為得人，校聲鵲起。」[52] 此外還有張季直的吳淞政治大學(江蘇省公辦，講解英國的民主政治模式)。

但一流人才仍不敷分派。「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主張『自由講學』。延攬了國內外許多名流學者，不分黨派，利用這個最高學府講壇，充分發表個人的政治主張，讓學生也自由選擇自己的政治信仰。」1922年夏天，學校董事會決定仿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辦了暑期學校。擔任暑期學校課程的教師，除該校權威教授外，郭秉文還羅致了海內外知名之士：美國杜威博士講授「實驗教育哲學」；美國吳衛士博士講授「昆蟲學」；美國孟祿博士講授「教育學」；德國杜里舒博士講授「生機哲學」；胡適博士講授「實用主義」；梁啟超教授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江亢虎博士講授「勞動問題」；張東蓀教授講授「新聞學大意」，還有該校常務校董和工科教授楊杏佛的「政治改造思想」等，此外還延聘了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作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世人所必需」的講座。

南開大學的類似做法是在第二年：梁啟超應聘主講南開大學暑期學校，還代校方轉邀名學者羅素、杜里舒、泰戈爾以及張君勱、梁漱溟、蔣方震、張東蓀等來南開講學。

梁啟超的夢是「佔幾所大學為據點」，「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他與他的同志者自己辦學、在著名大學獲得教職、舉辦講座，佔為據點。所謂「要之清華、南開兩處必須收作吾輩

智力究竟是甚麼？

張東蓀

一

我主張理智的人生觀而當面的難題就是理智究竟是甚麼？若我對于理智是甚麼的詰問而沒有切實的答案則我的理智人生觀必就坍了。所以我于拙作宇宙觀與人生觀以後必須再作此篇。

理智是甚麼原不難答复。普通所謂理智是取廣義而言。在英文是intellect與intelligence。這兩個字原沒有甚麼不同，而都發原于拉丁文intelligo。不過一個是現在動詞變化而來一個由過去動詞變化而成罷了。因此遂有學者主張前一字指理智的能力而把後一字指理智的實現。于是乎間乃稍稍有了作用的分別，其實這兩個字仍大致相同。而拉丁文的intelligo乃是

張東蓀哲學論文〈智力究竟是什麼？〉手稿之一頁

之關中河內」。舒新城在致梁任公書中描繪說：若能張東蓀等掌中國公學，張君勱、徐志摩在南開講演，公及蔣百里往南京尤其是東南大學講座，「如此鼎足而三，舉足可以左右中國文化，五年後吾黨將遍中國，豈再如今日之長此無人也。」

這類生機勃勃的活潑局面，在後來的戰亂與「定於一尊」輪番戕賊的近百年中國裏，再沒有出現過。

其實，正是從這時候起，張東蓀的專業興趣慢慢回到求學年代的哲學思索與探究。《近代西洋哲學史綱要》[53] 就在那年出版，與自己的學生姚璋（又名姚舜欽）聯合署名。後來（1930年），到姚璋自己的專著《八大派人生哲學》出版的時候，在〈自序〉中，專門有一段對老師的回憶：

> （求學時）……幸而遇到哲學家張東蓀先生來光華大學教授哲學，於是得閒輒往請教。張先生非特給我許多鼓勵，並與我具體計劃以寫成此書。每草成一篇，即為我詳細校正。遇着光華圖書館裏的書不夠參考時，又把他家的藏的名貴書籍借我應用。書成之後，更為我作序文，與書局接洽印行的事情。總之，此書之成，最當感謝張先生。茲將此書謹獻給張先生，聊以做一個紀念罷了。[54]

張家兩兄弟都為這青年學子寫了序言。我們且看張東蓀序言中的一段，可知他當時備課和輔導學生的努力：

> 我們須知，不講 ethical theory 則已，苟要講便無法離開 types。我們試檢下列各書：（中文書名為著者試譯）
>
> Dewey and Tufts, *Ethics*.《倫理學》
>
> Mackenzie, *A Manual of Ethics*.《倫理學手冊》
>
> Martineau, *Elements of Ethics*.《倫理學原理》
>
> Muirhead, *Elements of Ethics*.《倫理學原理》
>
> Paulsen, *A System of Ethics*.《倫理學的一個體系》
>
> Seth, *A Study of Ethical Principles*.《倫理學原理研究實例》

Sidgwick, *The Methods of Ethics*.《倫理學方法論》
Thilly, *Introduction to Ethics*.《倫理學入門》
De Laguna,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Ethics*.《倫理科學入門》
Wright,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Ethics*.《倫理學撮述》
Broad, *Five Types of Ethical Theory*.《倫理學理論之五種範例》
Hyde, *Five Philosophies of Life*.《生活哲學之五種》
Riley, *Men and Morals*.《人與道德》
Dunham, *Principles of Ethics*.《倫理學原理》
Carritt, *Theory of Morals*.《道德倫理》

以上諸書還是我見及的為限，此外還不知更有多少。

還沒等到這本書的讀者一本本翻找教授指定的書，局面又變了——1927年，北伐軍攻佔上海。

後世讀「新中國」教科書長大的三代人（生於六十至八十年代），只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突然間翻臉大殺共產黨人。沒有人告訴他們翻臉前上海的情形，沒人告訴他們，那時候應「五省聯帥」孫傳芳之請，擔任淞滬商埠總辦（相當於上海市長）的，是最具緩進革新思想的丁文江。[55] 只要不開仗，社會總能休養生息。而剛剛有了點氣象的工商文教，統統為自命正統的軍事佔領當局所打斷。

丁文江首當其衝：改造大上海的計劃泡湯，先避走大連，後蝸居北京；一整批文化人也以「反動學閥」的罪名遭通緝：章太炎、張君勱、張東蓀、黃炎培、沈信卿、蔣維喬……連劉海粟都名列其中；《時事新報》被接管；中國公學由黨（國民黨）所信賴的人接辦；張君勱的政治大學遭封閉……青年黨李璜記載了當時「不革命即為反革命」的氣氛：

民國十七年左右，大家被國民革命統一了中國，其執政者，右如胡漢民，左如汪精衛，皆志得意滿，而瞧不起五四時代新起的這一班，年在三十餘歲，留學外國，而學識略有成就的知識分子，

一律認為是自由主義者，非排斥不可！……其時，清黨已了，中共之未被殺被囚者，不是遠走高飛，便是在國民黨內藏之深深，……柳河之役以後，胡漢民忽然唱出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斯大林式的一黨專政調子，不但思想與三民主義不合的國家主義派青年黨不許其並存於中國，就連同是國民黨而首倡反共抗俄的西山會議派，也一併在排出政壇之列。[56]

這是一陣相當了得的「革命風暴」。側身其間者，已能感到些許肅殺之戾氣。但平心而論，隨着國民政府在南京站穩了腳跟，那風麼，真是吹過就算了，與五十年代之後將文化人再度客氣地請到台上，由共和國總理帶着他們集體自辱相比，其兇險、緻密、絕無藏身之處與可遁之途，就對中國文化傳承與傳承者的傷害而言，只算是「小兒科」了。

如若不信，只看張東蓀隨後的經歷。作為叨陪末座的被通緝學閥，他沒有竄逃，僅避入租界數日。他不再辦報，用他的話說：

我之所以脫離報界就是因為民國十六年以後，報紙完全變為他人的喉舌不能說自己的話了。只在民元到民國五、六年之間短短時期中真有言論自由，這是我所親歷的。[57]

中國公學不能做了，李璜創辦的知行學院（1929年，上海英租界幹部訓練學校）開張。張東蓀義務教授「哲學概論」——對這門課，他底氣十足。因為這幾年間，他不但有〈柏格森哲學與羅素的批評〉、〈相對論的哲學和新倫理主義〉、〈休謨哲學與近代思潮〉等哲學專著在當時最重要的期刊上發表，《人生觀》、《精神分析說》、《新哲學論叢》等重要哲學普及讀物，也以單行本出版了。張君勱（歐洲政治思想史）、羅隆基（行政學）、梁實秋（英文文選）、左舜生（中國近代史）都前往捧場。李璜自己也教一門社會學。

張東蓀依舊在光華大學教書（想來儲安平此時正就讀於此）。由於校長張壽鏞無以倫比的理財能力，以及他與江浙財團的淵源，缺錢打仗的蔣介石，為籠絡他，對光華大學手下留情。黨治之下，張東

蓀等人得有一席喘息之地。此時雖然已不是「民元到民國五、六年之間」的景象,「反動學閥」們的精神並未遭到毀滅性摧折。俞頌華記得:

> 張東蓀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的時候,每次開教務會都要宣讀總理遺訓,張一聽就奪門而出,並說:「下次再讀遺訓,我就不來了。」在當時這是何等犯忌的事。[58]

到1930年,同在光華任教(政治系)的羅隆基,不過在《新月》上發了一篇維護人權、批評專制的文章,當時在教育部次長任上的陳布雷「以部令停止羅隆基在該校教授之聘」。應該說,就事情本身而言,與張教授並無干戈,但此情在他看來,實為「我國私立大學教育史上奉部令開除教授的首開記錄」。為對這種惡劣做法表示抗議,張東蓀教授、潘光旦教授亦隨之去職。[59]

後來,在民國和人民共和國,比這惡劣百倍的毆打暗殺員工、批判流放教授……一樁樁一件件在同儕們的注視(乃至幫從)下發生,大家多心懷揣揣而苟且——直到2006年。這回是北京——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為學術委員會對另一名教師的不公憤然辭職。中國學界再度回到它有些許正氣、些許不可犯的凜然之氣之起點?

從他自己的辦學經歷裏,張東蓀對國民黨的認識再度加深。民初時候的渾噩;「二次革命」時候的悖謬;北伐以後的殺戮和緊隨的「訓政」……弄得他不得不把自己稱作「是向來反對國民黨的一個人」,認為「國民黨之取北洋軍閥而代之,完全是換湯不換藥」:

> 就中國人民知識能力不及格來說,倘使為事實,則必是全國的人民都如此,決不能有一部分人民被訓,另一部分人民能訓。被訓的人民因為沒有畢業,所以必須被訓,試問能訓的人民又於何時畢業過呢?何時同一人民一入黨籍便顯分能訓與被訓呢?[60]

> 自治未辦,不能實行憲政,這是人人都承認的。那麼就趕辦自治好了,為什麼要反而取消已有的人民言論自由權呢?人民自由權既是憲政要素之一。國民黨最後的目的既在憲政,為什

麼現在必須先把這個已存在的要素的萌芽拔去呢？按理應該對於已有的萌芽加以培植。可見國民黨的訓政是等於斬了已生出來的樹苗而偏說另外可以種出新樹來。[61]

但萌芽——所有萌芽——上天所賦之生的願望，以及成長的意志力，是斫伐者無從估量的。他開始與瞿世英創辦《哲學評論》(1927)，擔任主撰述，並出版了《西洋哲學史》(上下)(1930)等教科書。

1930年秋，張府闔家遷居北平——他得到了司徒雷登的聘書，任職燕京大學哲學系，講授倫理學。北平對張東蓀，雖然算不上舊遊，也曾經幾度流連。只不過西郊來得不多——那年月到那地方，沒準還得僱騾車呢。

對燕京源於《聖經》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也就是司徒校長說的：「我們的目的，是以養成一種合作、建設、服務人群的精神以服務社會國家……我們不要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學校，也不要成為有史以來最有名的學校，而是要成為『現在中國』最有用的學校」，與張東蓀的理念無任何相悖。燕大主要通過美國教會籌資，[62] 屬於一般意義上的教會學校。但校長司徒作為一名教育家，卻明確提出「使燕大徹底中國化」。他認為，「燕大必須是一所經得起任何考驗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至於信仰什麼，則完全是個人的私事」。對於司徒所堅信的「任務，是讓老師盡可能自由地去從事他們的工作」，我們的主人公自然服膺，雖然據他自己說，並非事事與校長見解一致。

國學在燕大的課程安排上受到非同尋常的重視，不為別的，只因為前來就學的，都是中國學生。創始之初，教師陣容已經相當了得，劉廷芳、洪煨蓮、李榮芳、趙紫宸、簡又文、許地山、陳垣、吳雷川等，除了學術上的聲譽，他們同時又是教友或教會名人。北伐之後，「天上掉下了林妹妹」，一整批滿腹經綸卻不耐煩黨訓的長袍先生北上蒞臨燕大就職：顧頡剛、鄧之誠、容庚、錢穆、林宰平、郭紹虞……張東蓀的長兄、國學家張爾田同時獲邀，教授中國歷史。



張東蓀和燕京大學的同事。攝於1932年前後。張東蓀和鄧文如當時還屬小字輩（後排右一和右二）。洪煨蓮和趙紫宸也在後排（後排左一和左二）。前排正中長髯者為張爾田。前排左一唯一一位西裝小生是陳夢家

到校第二年，1931年，他開始出任哲學系主任；同時擔任燕京學社顧問(adviser)。那時馮友蘭雖然主要在清華，也曾在燕京兼課。也是在這年9月，由東蓀提議，司徒校長電邀兩年前因逃避國民黨通緝而第二次留德的張君勱回國，任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黑格爾小邏輯。

張東蓀走進燕大講堂——自從東京伏案苦讀以來，累積凡二十年的心得，終於有了發揮的平台。只看他在燕京開的課程：倫理學；西方思想史；Plato(柏拉圖)；Hobbes(霍布斯)；Locke(洛克)；Berkeley(伯克萊)；Schopenhauer(叔本華)；Bergson(伯格森)，以及其他當代哲學家。偶爾也涉及到唯物主義、語言、思想和歷史哲學諸方面。比如在那時候，他已經向學生介紹了Comte(孔德)，Hegel(黑格爾)，Mars(馬斯)，Croce(克羅齊)和Rickert(李凱爾特)……。這無疑是學人張東蓀一生當中最愜意的時光。據俞頌華描述：

(到了燕大之後)張東蓀氏所處的環境，我覺得有為許多文化工作者所羨慕的。……他在燕大講學，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學風，與他自己以前辦理中國公學所採的方針差不多一模一樣。不僅在講學上不受任何拘束，並且他可放言高論，無論在口頭上或文字上都可發表其獨特的見解，即使不為一部分人所諒解，但校長不但不加限制，且還予以相當保障。不說別的，他只要和潘光旦教授的退為圖書館主任一比，軒輊立見。他所處的講學環境，在今日的中國，可以說得是最優越了。[63]

東蓀自己並沒有辜負那段光陰——明知板結生地耕耘的艱難：

說起來，似乎太可憐了。中國不但是在哲學思想界上沒有創造，並且從來沒有忠實的介紹。本來我們東方要想對於西洋哲學上有一些貢獻，加入於他們的創造中，這是談何容易呢！例如日本，吸收西方思想起訖今五六十年，尚未曾出有特創的哲學家。……所以我們中國在今天實在是夠不上言創造，只要好好地介紹就行了。

> 我相信西方的科學要輸入中國，必須把西方的哲學也同時進來。因為在思想上，哲學始終站在與科學合作的地位。雖有時矯正科學而與科學家爭吵，卻並不想要打倒科學。至於有人主張中國現在可以只要科學而不要哲學，這未免太不知哲學的性質了。我們只須一讀科學史，便見有許多哲學家的姓名是見於科學史上的，可見哲學往往作科學的領導。
>
> 我以為居今天而介紹西方哲學思想，對於中國前途決不是無益的事。[64]

世界書局出版的《哲學叢書》是由他主編，上下兩卷共十六種。不僅《認識論》、《現代哲學》、《現代倫理學》等撰著收在裏邊，他在課堂上講授的「現代哲學」、「價值哲學」，也分別根據學生許寶騤、高名凱課堂筆記整理出版，[65] 其火爆情形可見一斑。

1935年10月，與瞿菊農一道，又創辦了《文哲月刊》。他撰寫了〈發刊詞〉，並發表了〈彭基相譯笛卡兒方法論序〉、〈關於宋明理學之性質〉、〈思想自由問題〉等文章。

後來晚些時候，牟宗三在他的專欄「哲學週刊」(《廣州民國日報》)撰文，以哲學家為對象對中國哲學界發表評論。牟認為，能稱得上哲學家的人，必須是確有見地能成系統的人。在他看來，這樣的人，中國不多，五四時期一個也沒有；五四以後有三位，熊十力先生、張東蓀先生、金岳霖先生。三位先生分別代表了三種學問：元學、知識論和邏輯。他認為，熊、張、金三先生，是現代中國哲學的三棟樑。若沒有這三個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這三個人，則中國哲學界不只可觀，而且還可以與西洋人抗衡，還可以獨立發展，自造文化。而後人認為，事實上，牟宗三本人在近現代世界哲學的宏大背景中，把熊、金、張的哲學同冶一爐，中西融通，創造性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為重建中國哲學提供了一個典範。

應該說，燕京大學的張東蓀教授已獲得公認，是五四以來第一個嘗試創建中國現代哲學體系者，和「中國新唯心論領袖」。徐道升說：

中國研究西洋哲學的人，不可謂不多，說到能由西洋哲學中引申出來新的意見，建設新的哲學，恐怕只有張東蓀先生一人。[66]

與他在有關辯證唯物論開戰的葉青則說：

中國在五四時代才開始其古代哲學底否定，現在固沒有堅強的近代體系，然而已在建設之中了。作這種企圖的，首先要算張東蓀。所讀歐洲過去和現在的哲學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適那樣只讀一點美國書，失之淺薄。如果我們說梁啟超和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哲學的啟蒙運動者，那末張東蓀就是中國近代哲學底系統建立人。[67]

對待同輩學人，他情誼真摯、期待熱切。以佛學為基底的北大教授熊十力，一般認為「建立了新儒家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體系」。在建構自己體系過程中，對西方哲學的了解，多通過東蓀轉介。二人在十年間，還曾有過反覆切磋、辨析。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寫道：

余其時又識張孟劬及東蓀兄弟，兩人皆在燕大任教，而其家則住馬大人胡同西口第一宅。時余亦住馬大人胡同，相距五宅之遙。十力常偕余與彼兄弟相晤，或在公園中，或在其家。十力好與東蓀相聚談哲理時事，余則與孟劬談經史舊學。在公園茶桌旁，則四人各移椅分坐兩處；在其家，則余坐孟劬書齋，而東蓀則邀十力更進至別院東蓀書齋中，如是以為常。[68]

在1934年7月，張教授借《哲學叢書》出刊「緣起」，再次談到為形成新文化而引介「西方文化泉淵」（哲學）的迫切：

我們相信中國必須衝鋒吸收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之總匯不能不推哲學。所以西方文化之輸入不能不以哲學為先導。因此我們主張在盛大歡迎西方科學的時候，決不能把哲學加以排斥或拒絕。

我們相信人而生於現在的世界必須大放目光，看一看各方面

的主張。哲學對於我們的貢獻，至少可使我們免去拘墟之見。在這一點上，正助以輔助科學。

我們又相信苟其對於任何問題要下一番研究工夫，必須先養成一種批判的精神。哲學對於這一點所能操練我們的腦筋的卻亦不下於科學。

我們又相信中華民族此後的生存就看能否創出一種新文化。但新文化的產生必有相當的醞釀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吸收的工夫居一半，消化的勾當亦必居一半。大家都知道不有吸收，不有消化，便不能有所創造。所以我們願在這個過渡時期內設法使人們的胃中裝得有些食料。他日消耗了，有所創造，便是今天的收功。

因此發刊這部哲學叢書，想把西方文化泉淵的哲學為真面目的介紹，同時對於將來的如何形成一個新文化亦想略略加以指示。這區區微意便是本書的緣起了。

自從因「沒有辦法說話」而離開報界，在大約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在稚幼荒蕪、須從概念從頭說起的哲學領域，總算提攜了一批人手、打出了一片天地。但就總體而言，雖然「不可完全付之闕如」，似乎並不樂觀：

在不得已之中，亦可尋出幾點來說一說。第一是對於西方哲學的介紹，在近幾年確比以前不同了。不復是「報告」(information)性質，乃兼有「研究」性質了。……就中符號邏輯的輸入中國亦是可紀念的一件事。(如沈有乾的《現代邏輯》與吳士棟的《論理學》)。第二，可以說是有獨立研究的趨勢，這一點在北平發刊的《哲學評論》雜誌上可以看得出。撰稿人中有金岳霖，黃子通，瞿世英等。他們好像有一個共同點，即是只知研究而不知派別。

此外亦還有可述的：以我所見，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不失為近年來的一部奇書。書內所主張亦許為我們所不贊同，然而其為好學深思的結果，則不容否認。[69]

對熊十力的成就，他填《金縷曲》，誠心盛讚「熊子今傳矣」，深深感慨「年來我亦求諸己。檢吾躬，屏除習氣，幸餘有幾？只愧二三知己者，世論悠悠安計？」最讓他欣喜並覺得安慰的，是攻哲學的同人「養活潑自家心地」，雖然對《新唯識論》這樣的大作，「初讀罷，雜悲喜」。

對於幾年來，本人著作頗豐，[70] 以及被時人看作是「中國新唯心論的領袖」，說起來倒是淡淡的幾句：

> 我個人亦曾提出一種認識論上的意見——就是認識的多元論。我不敢說有何創見，然而卻亦由多年思考而得。或許我此說未必能成立，然而把多元的解釋用於認識作用上，這一層我願意列為問題，請大家來討論。現在我提到自己，亦只是為此而已。[71]

他最為痛恨的，是專制者將哲學變為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

> 哲學本來是冷門，而在中國居然熱鬧了。其所以然不在於國人自動地喜歡哲學，乃在於有見於俄、意的情形。俄國的共產黨有他的「欽定哲學」；意大利的棒喝團亦有他的「御用哲學」，於是善於模仿的中國人便把哲學亦當作時髦東西了。但是據我看來，哲學與自由思想是分不開的。哲學而變為欽定的與御用的，這便是裝甲的哲學。哲學而變為武裝的，則必定不是哲學。這乃是哲學其名，而宗教其實。所以我在本篇中不願意提起俄羅斯與意大利的哲學。(德國國社黨亦有他的哲學，真是「哲學哲學，天下多少罪惡借汝之名以行」) [72]

俞頌華在四十年代對他的老友張東蓀有一番論說：

> 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學者，不是一個黨人，也不是一個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個黨人或黨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們只能期待他在立德與立言方面有不斷的貢獻。人不是萬能的，各有短處與長處。他能立德立言，並且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終能站在時代

前鋒，為青年學子所敬愛的導師。至於他參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範，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國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決不可能的。

他是徹頭徹尾的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有獨特的見解與主張，他喜歡獨往獨來，特立獨行，而不願受任何拘束的。對於什麼政黨的所謂鐵的紀律，他是感到頭痛的。[73]

註釋

1. 邵飄萍：〈預吊登極〉，《時事新報》，1915年12月。
2. 〈本報五千號紀念辭〉，《時事新報》，1921年12月10日。
3. 選擇柏格森為連載之首，不知與梁等人在歐洲與他的會面有否關聯。宗白華1919年發表〈談柏格森「創化論」雜感〉，應是閱讀《時事新報》之心得。
4. 張東蓀：〈學燈宣言〉，《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18年3月4日。
5. 張東蓀：〈學燈啟事〉，《學燈》，1918年4月。
6. 張東蓀：〈學燈啟事〉，《學燈》，1918年4月。
7. 這位新文化運動主將，晚年對自己的功績略作修正：我們打倒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以不足言罪也！
8. 張東蓀：〈新與舊〉，《學燈》，1918年12月14日。
9. 張東蓀：〈讀新青年雜誌第六卷一號雜評〉，1919年。
10. 郭沫若：《創造十年》(上海：現代書局，1933)
11. 自創刊至1928年4月4日改為《學燈教育界消息》的十年裏，先後任編輯的有張東蓀、匡僧、俞頌華、郭虞裳、宗白華、李石岑、鄭振鐸、柯一岑、朱隱青、潘光旦、錢滄碩等人。
12. 張聞天致張東蓀(1919年12月12日)，載《張聞天早期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37。
13. 毛澤東：〈反對統一〉，《學燈》，1920年10月10日。
14. 魯迅：〈反對「含淚」的批評家〉，載《熱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5. 何思誠：〈上海《時事新報》從研究系落入國民黨手中的演變概要〉，《文史資料選輯》，第136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頁133。
16. 同上註。
17. 同上註。
18. 梁實秋：〈我的一位國文老師〉，載《梁實秋散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197。
19.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115–116，213。
20. 宋原放等主編：《上海出版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頁684。
21. 同註15。
22. 張東蓀：〈新學會宣言書〉，《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
23. 張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
24. 具有第三種文明特色的環境保護運動興起、非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蓬勃，沒有發生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而是再遲些，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25. 李璜致胡適信（1931年），轉引自耿雲志：〈傅斯年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從傅斯年致袁同禮的信談起〉，《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26.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1948），頁77。
27. 張東蓀：〈與君勱、子楷、百里、振飛四兄書〉，載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893。
28.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頁28–32。
29. 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哲學問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0. 張東蓀：〈科學與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第2號，1925年1月。
31. 張東蓀：〈勞而無功〉，《學燈》，1923年6月9日。
32. 葉其忠：〈從張君勱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1923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1996年。
33. 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中國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
34. 鄧中夏：〈思想界聯合戰線問題〉，《中國青年》，第8期，1924年1月。
35.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載《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

36.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載《科學與人生觀》。
37. 轉引自陳文彬：〈五四時期知識界的「挾洋自重」〉，《書屋》，2006年第7期。
38. 張仲禮主編：《上海社會科學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39.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533。
40. 胡適：《中國公學校史》。
41. 張東蓀：〈覆百里書〉（1920年10月），載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初編》，頁926。
42. 梁啟超：〈致東蓀兄書〉（1920年9月10日），載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初編》，頁920。
43. 俞頌華：〈論張東蓀〉，《人物雜誌》（上海），第2卷6期，1947年6月20日。轉引自張耀傑：〈俞頌華：「大公至正」的新聞先驅〉，《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44. 錢智修，號經宇，古文學家、翻譯家，前清末年畢業於復旦公學，與于右任、陳寅恪是同窗，後任《東方雜誌》主編近二十年。編譯過林肯、達爾文、威爾遜等西方偉人傳記。1947年病故上海。
45. 謝冠生（1897–1971），名壽昌，浙江嵊縣人。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曾任商務印書館《辭源》與《中國地名大辭典》編輯，先後執教於震旦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公學及法政大學。1926年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旋即任職於南京政府外交部，兼任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及法學院代理院長，曾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及主席團主席。1971年病逝台北。著有《戰時司法紀要》、《法理學大綱》、《羅馬法大綱》、《中國法制史》等。擔任中國公學法律系主任時，應是二十五歲上下。
46. 俞頌華：〈憶錢經宇（智修）先生〉，載《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97–101。
47. 「道爾頓制」，由美國教育家柏克赫斯特所創，1920年2月在美國麻省道爾頓中學校實行此制，遂以校名而為其命名。
48. 在《梁啟超年譜長編》中，有「（時事新報）僅有三月之糧」（1922年）；「中國公學年息六萬」（1923年）等。參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

49. 趙柏田：《歷史碎影——日常視野中的現代知識分子》（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5。
50. 同上註。
51. 同註40。
52. 張君勱：〈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展望》，第172期，1969年4月。
53. 張東蓀、姚璋：《近代西洋哲學史綱要》（上海：中華書局，1925）。在此之前，張東蓀的作品以政論為主，西方哲學領域，他只有譯著出版：《創化論》、《社會論》（商務印書館，1922）；《物質與記憶》（商務印書館，1923）。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的《科學與哲學》，屬於他編輯的論爭集，不算專著。
54. 姚舜欽：《八大派人生哲學》（上海：中華書局，1931），頁240。
55. 地質學家丁在君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胡適）——雖然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為他覺得「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會一變」。
56. 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上），《傳記文學》（台灣），第39卷第2期。
57.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序論〉。
58. 同註43。
59.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頁409。
60. 張東蓀：〈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1932年5月。
61. 張東蓀：〈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再生》，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62. 學校的經費是教會出的。燕京大學在名義上是由美以美會、北長老會、倫敦會等教會團體合辦的。基督教教會的根據地主要是美國和加拿大，以美國為主，在紐約有「中國基督教大學董事會」，在上海有「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多的時候，支持着十六所大學，到1947年即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還保留幾所。燕京大學是其中之一，也是規模最大、辦得最好的一所，畢業的人也多，在政治上、國際文化上影響是最大的。
63. 同註43。
64. 張東蓀：〈現代哲學鳥瞰〉，《東方雜誌》，第26卷第17號，1929年6月。

65. 張東蓀：《哲學叢書・現代哲學》(上海，世界書局，1934)；《哲學叢書・價值哲學》(上海，世界書局，1934)。
66. 孫道升：〈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國聞週報》，第12卷第45期，1935年。
67. 葉青：〈張東蓀哲學批判〉，《二十世紀》，第1卷第3期，1931年。
68.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蘭臺出版社，2000)，頁170。
69. 張東蓀：〈十年來之哲學界〉，《光華大學》半月刊，第3卷第9–10期，1935年。
70. 1929年：《人生觀ABC》、《精神分析ABC》(世界書局)、《新哲學論叢》；1931年：《道德哲學》、《哲學與科學》(中華書局)、《哲學》(世界書局)；1932年：《現代倫理學》(上海新月)、《創化論》(譯著，上海商務)；1933年：《柏拉圖對話集六種》(上海商務)。我們可以看出，此時還是以譯介為主。到了1934年，具有創見的作品出現：《價值哲學》、《現代哲學》、《認識論》(世界書局)。
71. 同註69。
72. 同註69。
73. 同註43。

三

友情與論戰

在張家，有兩副僥倖逃過紅衛兵烈焰的條幅，分別出於康有為與梁啟超之手；[1] 除了這兩位，我們的主人公與孫逸仙、蔣中正，都有直接的交往，毛、劉、周等更不必說了。然而，據張家後人說，到了五十年代，爺爺「從不談跟孫中山的關係，倒常愛說他的舊交陳獨秀」。爺爺說他「與仲甫私交最好。在上海漁陽里，喊叫着進院，二人摔倒在雨地裏」(對張飴慈的採訪)。

這裏說的是1920年陳獨秀從北京脱險之後，他們在上海的第一次見面。在年序上，東蓀比這位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差了不到半代(七歲)。他們的友誼(或論戰)始於何年呢？

想來不會是陳總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的時候。因為，雖然同在一地，東蓀那時候年齡還太小(十一歲)。待到仲甫因為反清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悶頭用功的東蓀對他的激情澎湃，或許有所聞，但肯定沒有太在意，因為當時這樣的青年與類似的事件並不少。到了仲甫很快回國後1903年在上海協辦《國民日日報》、1904年在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張東蓀正準備赴東京。辛亥之後，兩人都當過一陣子小官，也都參加了1913年的討伐袁世凱。

估計兩人真正相互「拜識大作」，並且有了一些了解，是在陳獨秀反袁失敗、1914年出獄後到日本幫着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的時候。這時，人已在上海、且以撰述為主要謀生手段的張東蓀，正連續在《甲寅》上發表文章。

東蓀兄

側身天地更懷古

獨立蒼茫自詠詩

梁啟超

颯爽英姿舌粲蓮風流張緒又華年正揭更

聽漁陽摻擊鼓岑牟草百篇

東蓀仁兄

康有為

康有為及梁啟超分別贈張東蓀的條幅手跡

到了陳獨秀再回上海，並且開始編《青年》(一年後更名為《新青年》)的時候，想來二人已有相當機會晤面。張東蓀沒有為《青年》(和《新青年》)寫過文章，可能主要因為在那兩年裏，他正忙着自己的《大中華》。在激情(激進與速成)與詩意方面都內斂得多的東蓀，與這份雜誌在格調上的差異，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到1917年獨秀名聲大噪，受聘到北京任北大文科學長，並且以《新青年》、《每週評論》，外加紅樓這樣的陣地，與蔡元培、李大釗、胡適一道，提倡文學革命，介紹「德」、「賽」兩先生，並且激烈反對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時候，張東蓀和他有些漸行漸遠的味道——他那時候已經與梁啟超訂交，正忙着「憲法研究會」活動，[2] 並接手《時事新報》——以編輯、紹介中外報章、西方學術文化為主。

但畢竟他們都在為國運擔憂，為中國之未來找出路。到了1919年，對那場青年學生衝上街頭的「五四」抗議，兩人都曾為激情促使而行動。陳獨秀就不用說了，直到6月11日還單槍匹馬到街上散發自撰的《北京市民宣言》。一直對「激進」相當警惕甚至忌憚的張東蓀，也沒能冷眼旁觀。在後來的文章裏，他懷着欣慰招認說：

> 那年「五四」運動發動的當時，我正在上海的時事新報館任事，立刻我就作論說，為他們的後盾。一直鬧到六月三日，在上海居然又喚起一個運動，這就是所謂的「六三」運動。……我雖不是「五四」運動的當事人，然卻是「六三」運動的當事人。[3]

張東蓀「作論説」的時候，想來趙家樓已然起火，三名官員也或挨打、或逃竄。民族情緒如此賁張的當口，連東蓀先生這樣的人都已經忘記，現代法制國家基本秩序，起碼應該與「個性解放」並列，列入公民教育的基本教程。當然那時陳(獨秀)、胡(適)、吳(虞)諸位同志「打倒孔家店」狂瀾的諸般後續，[4] 還沒有陸續登場，以「目的正當」為大旗的諸般激進乃至殘忍的革命狂歡，也還沒有彰顯出對中國扎實緩進的致命性破壞。張先生1948年所說的上邊這番話，是否可以看作因憤恨當道而對(學生乃至盲眾)運動依舊抱有好感？

胡適直到晚年仍感遺憾，認為是五四運動打斷了新文化運動的正

常發展，「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無奈散傳單的前北大文科學長已經被捕。胡適四方尋求援助，曾有一信致上海《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

> 獨秀先生被捕事，警廳始終嚴守秘密，不把真相發表，也不宣佈態度，直到前日才始許一人前往見獨秀，他現在染時症發寒熱，他的朋友聽見很着急，現在有許多人想聯名保他出來養病，還不知能辦得到否？[5]

到13日，北京、上海等地報刊，都以顯著版面，就陳獨秀被捕、獄中遭虐等刊發消息評論。還沒等張東蓀動作，安徽名人胡適已得知北京的警察廳長吳炳湘屬皖籍，於是以「同鄉之誼」打通了關節。「思想界的明星」獲釋，並在次年隆冬時節化妝成廚子成功逃脫抵滬。

運動的激情過後，大家歸於冷靜。中國新知識界開始分化。

《新青年》暫停。《每週評論》由胡適接手。「杜威演講錄」專號之後，胡博士自己最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 少談些主義〉發表；李大釗以〈再論問題與主義〉回應；胡適繼續做「三論」、「四論」。張東蓀看重學理，對「渾樸的社會主義」的「鼓吹」、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自民國初年，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我們在上節已經講到，東蓀那時候正創辦《解放與改造》半月刊；發表〈第三種文明〉、〈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以及〈突變與潛變〉。他加入「五四」時期思想論戰，堅決不同意以黨派活動來代替思想界的自由探討。

比張東蓀又年輕了幾歲的毛澤東，那時候還沒有自己的陣地，正如飢似渴地攫取：1918–1919年間，毛澤東「每天不間斷地閱讀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的報紙，讀得十分認真仔細」，他的住所，「滿屋都是報紙」。[6]

這年盛夏，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表〈民眾的大聯合〉。對此，胡適給予極高評價：「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歡喜。」[7]

繼《湘江評論》之後，這不屈不撓的青年，不僅響應胡適「多研究

些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問題研究會章程》，開列了大小144項問題，並且北上京城，上書並登門拜望，爭取這位風頭最健的人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回到長沙後，毛立刻與舒新城一道發起創辦《湖南教育月刊》，再致信胡適請求支援。這封信是在胡適研究中發現的。[8]在信裏，舒新城(代表毛澤東)將觀念(以及後來的命運)完全不同的三個人並列為可對自己予以提攜的準師長。想來胡、陳二位因為太忙沒有回應，只有張東蓀作了簡單回覆——立即為他們列名為刊物發刊人。[9]

對於胡適，1936年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的時候，曾說在五四前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我們的楷模」。[10]對陳獨秀，毛在1945年七大預備會議上也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對張東蓀的評語，最早見於1921年。他當時認為，

> 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11]

理念上的分歧，並沒有影響仲甫與東蓀的私交。最有趣的是新漁陽里一幕。

新漁陽里六號，本來是李漢俊住所。後來他搬到哥哥李書城處，那裏遂轉給戴季陶。

常去談天的，是當時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後來的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而後憤而脫黨又慘遭軍閥殺害的李漢俊；正在上海編輯着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張東蓀；在「新中國」以茅盾之名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還有因為當漢奸而病死獄中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墳、至今仍是謎一樣的「大少爺」沈玄廬等。這一批後來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新漁陽里，正如中國任何時代(或許不包括中共治下？)具有使命感的一代新知識分子一樣，不過在熱切地討論問題：有爭論和分歧，但只限於思想和言論。

就在這時，俄國人維金斯基夫婦到來了。

他是拿了李大釗的介紹信去見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的，名義是蘇聯《生活報》記者。他先是一聲不吭地觀察，而後介入討論，繼而提出整合三大報刊，「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物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云云。[12] 當時沒有人特別注意，只是後來回想起來才弄清楚的是：這名蘇共黨員一直在作無形引導，並逐漸把「自己」的意見談了出來。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新思潮，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遂使思想界弄到如今這樣的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卻一點都沒有。這樣是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的。他的結論是：必須組黨，具體說，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想法一出，大家幾乎一致贊同。後來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當時很激動，說幹就幹，立即幫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他的這一態度事後被孫中山罵了一頓，戴只好表示以後「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贊助，現在暫時退出」）。張東蓀是當時唯一一名堅決反對者。他堅持認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學術研究；他反對組黨，更反對在工業落後的中國開展階級鬥爭。這種「消極撤火」的態度在當時的那個場合無疑於背叛，當然沒人理他。包惠僧這樣形容：「這樣一來，首先就嚇倒了張東蓀，他立即退出了這個運動。」[13]

茅盾對張東蓀的「打退堂鼓」，解釋說：「他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為這個組織是學術研究性質，現在說這就是共產黨，那他不能參加。因為他是研究系，他還不打算脫離研究系。」[14]

此說其實不確。第一，張與研究系的關係，無所謂「脫離」或是跨黨行動等。張東蓀自己就說過：

> ……後來我的朋友以進步黨人為多（藍公武、張君勱均為骨幹），且較密切，我卻從未正式加入該黨，也向不與聞他們的黨的活動。外間對我的這種不明白我是知道的，但我亦不希望人

知。我以為一個人只要行心之所安就夠了。急於向人表白是現代人的一種做法，中國儒家的精神根本不是如此的。[15]

到了五十年代他被迫檢討的時候，觀念並沒有變：

有的同志們希望知道一些我過去政治活動的事實。這太長，不容易講周全。我只想就重要的輪廓講一講。我從日本留學歸國後，認識梁啟超。他請我做過研究系主辦的《時事新報》主筆。但是，外傳我參加過他底進步黨與研究系，都是不確的。當時我沒有明確的政治思想，只是無原則的介紹一些新學說，提倡文化上的啟蒙運動。[16]

第二，研究系與陳獨秀，並非事事南轅北轍。比如講學社邀請羅素來華，梁啟超就力促「黃任之、陳仲甫」介入迎送。

第三，這是最根本的，張東蓀反對將思想與學術討論，變為政黨行為，反對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實行階級鬥爭……並非起自此時。他反對的不僅僅是由外國人跑來出錢、出指導員、出政策的黨，對於以黨來「統制」思想，他似乎有一種天生的憎惡與趣避：

民國十三年光景，我和陳獨秀先生來往甚多，彼時他們雖明知我是贊成社會主義，但在組織共產黨的時候卻不敢來約我。因為他們亦未嘗不知我反對在這樣工業未發達的中國鼓動階級鬥爭的罷工與怠工。所以我始終是一個「非黨派者」。[17]

新漁陽里六號這一聚談場所，從此讓給了堅定的激進分子，後來乾脆轉租給共產國際遠東部——這時大家才弄清維金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攜帶着第三國際的命令和經費，到中國來組建支部的。

這次聚會之後，《共產黨》月刊開始秘密發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成立，陳獨秀邀請老少人等正式成立黨。毛澤東等摸索改造舊中國的激進社會主義者，正式登上歷史舞台。

平心而論，那時候誰都沒閒着。

軍閥正準備開戰（4月至7月，直系五都督、奉系三都督成立「反

皖八省聯盟」；吳北上張南下倒段；直皖大戰，段祺瑞通電辭職），研究系和我們的主人公當然也正緊急籌劃。那是他們最奮發有為的一段時間——以全新的眼界和公民（並非良相、並非軍閥賞賜的官長）之身份，貫徹「救治中國」的全面主張。

而就在他忙碌着、對社會不停地觀察認識着、同時直率地發表自己見解的時候，竟引發了一場辯論，一場後世稱作由他「挑起」的與共產黨人的激烈辯論：「社會主義論戰」。

起因是講學社邀請羅素來華演講。當時正傾心於「同業公會社會主義」的張東蓀全程陪同。東蓀當時年屆三十五，除了幼年在河北窮困縣城父親任上看過幾次過堂、打板子，一直生活在相對富裕發達的江浙和南京、滬上、北京。待到他們一行人來到湖南（其實還沒有出長沙），張東蓀為當地的貧困、落後，以及官吏之橫行驚呆了。他立刻在自己的報紙上寫下觀感：

> 中國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國真是窮到極點了。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歐美現成的什麼……主義。
>
> 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18]

在這篇不足二百字的通訊裏，他列舉了種種「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多數派主義，實際是檢討自己，覺得過去太尚空談，「富民」的實際努力不夠——並沒一字提到馬克思、列寧，或者共產主義。沒想到第二天（11月7日），為當時的激進黨人所掌控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邵力子[19]主編）上連發兩文對之痛批。作者分別為望道（陳望道）和江春（李達），言辭空前尖銳激烈。陳望道[20]的〈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直指張東蓀的「轉向」：

> 東蓀君！你現在排斥一切社會主義……卻想「開發實業」，你所謂「開發實業」，難道想用「資本主義」嗎？你以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難道你居然認定「資本主義」作唯一的路嗎？

東蓀！你旅行了一番，看見社會沈〔沉〕靜，有些灰心，想要走舊路嗎？

我怕東蓀君轉向，社會更要沈〔沉〕靜，又怕東蓀君這時評就是轉向的宣言！

李達[21]的文章比陳望道的更為尖銳，筆下毫不留情，標題便是〈張東蓀現原形〉。李達雖然後來被尊為黨內理論權威，其署名江春的文章本身只是強詞奪理式胡罵：

張東蓀本來是一個無主義無定見的人，這幾年來，他所以能夠在文壇上沽名釣譽的，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特長，會學時髦，會說幾句言不由衷的滑頭話。他作文章，有一種人所不能的特長，就是前言不顧後語，自己反對自己。這時因為他善變，所以前一瞬間的東蓀與後一瞬間的東蓀是完全相反的。總之，張東蓀是文壇中一個「迎新送舊者」。

李達翻出張東蓀過去在《解放與改造》雜誌上寫的〈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與張東蓀的「新作」相對比，來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張東蓀的「前言不顧後語」。緊接着，11月8日，《覺悟》的主編邵力子也親自上陣，發表〈再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邵力子畢竟是報人，跟東蓀是同行，話說得溫和一些，但還是擺出一層層道理向「東蓀君」「請教」，「請東蓀君仔細想想」：「中國貧乏的原因在哪裏？談論什麼社會主義等，是否足為開發實業的障礙？」；「用什麼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

對這些「迎頭痛擊」，張東蓀沒有直接答覆，陳獨秀卻覺得問題非同小可。11月24日，在把蔡元培、張申府等一干赴法人士送上船之後，仲甫坐下來，提筆寫了兩封公開信：〈致羅素〉；〈致張東蓀〉。

羅素主張中國不必提倡社會主義，這不是誤中國人麼？……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是聲明一下，免得貽誤中國人，並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

如果說中國貧窮極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們不反對這話；

如果說增加富力非開發實業不可，我們也不反對這話：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不可，且非資本集中不可，我們不但不反對這話而且端端贊成；但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主義不可，集中資本非資本家不可，我們便未免發笑。

他問張東蓀：

同是中國人，何以政府及勞動階級都不可靠，只有資本家可靠呢？

由資本主義漸漸發展國民的經濟及改良勞動者的境遇，以達到社會主義，這種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經開發政治經濟獨立的國家或者可以這樣辦，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面的政治和經濟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革命，時間上是否允許我們漸進的改良呢？

既不贊成用革命的手段集中資本，而中國的資本家向有不願以財產充資本之習慣，而先生等又不歡迎外國資本主義，將以何法來開發中國底實業呢？

這兩封信沒有佔邵力子《民國日報》的版面，獨秀在自己的《新青年》上專門開闢「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專欄。《新青年》創刊近九十年後，陳獨秀研究者撰文稱：

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四號，彙集了張東蓀等人文章和陳獨秀給張東蓀的來往信件以及陳獨秀、陳望道等的批評文章，共十三篇，用「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的總標題發表出來，以便廣泛地發動大家開展辯論。在辯論中影響較大的文章如九卷一號上發表了李達寫的〈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文章，九卷三號上的陳獨秀的〈獨秀覆東蓀先生信〉、〈社會主義批評〉等。這場爭論，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堅持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社會革命，反對社會改良，深刻地批駁了張東蓀等的改良主義。[22]

在將近半個世紀後，張君勱的評說是：「五四前後，東蓀與陳獨秀之對立，儼如清末孫康之相冰炭其最著者也。」[23]

但張東蓀等的改良主義究竟是什麼呢？這年年底，他在自己的刊物《改造》發表了長文〈現在與將來〉——「做一個比較正式的說明」：

> 我作了一個小小的短評引起了無邊的風浪，在我卻是非常的榮幸，在社會上也成了一個懸案。當時和我駁論的人很多：有些是我所畏敬的師友，我無不答覆——如周佛海君就寫信數次討論此問題——有些我明知其為手指五弦目送飛鴻，所以我不屑和他們辯論(即有人罵我狂妄我也願受)，後來劉南陔君要求我做一個比較的正式說明，我遂作了〈現在與將來〉一篇。[24]

> 羅素先生說，「吾到俄國，即相信自己亦為一共產黨人；然與一班深信共產主義之人來往後，我之疑念轉加一千倍，不唯不信共產主義，即凡人類所最崇仰與冒苦而求之一切信條，吾亦不敢相信。……則吾深幸西方人之有懷疑態度。」我自聽了這些議論以後，本來潛伏在心中的懷疑態度便發了出來。我在《時事新報》上撰了一個時評，表示我的懷疑點，大旨和羅素先生在京的演說，說「我暫不以社會主義贈中國，因為中國現在即實行社會主義必沒有好結果」相同。於是許多朋友就寫信來問我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想一一答覆卻很麻煩，不如作一篇文章罷。
>
> 我這篇就是提出幾個問題而求其解答。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現狀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從現狀的潛伏趨勢裏推測未來呈何狀？第三個問題是我們的使命是什麼？[25]

在這篇文字裏，他特別提出「偽勞農革命」，認為「或可一度發生」，則「一個是破壞；一個是假借名義」。這兩點，不用說，已經由中共此後幾十年的「農民運動」、「農村包圍城市」、「土改」、「統購統銷」、大饑荒和如今城市化大潮中的農村廉價勞力、統一壓低農產品價格所證實。

第二年春，梁啟超為文呼應，做八千字〈覆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

運動〉。對達到社會主義這一理想的階段性、和對這一理想本身須作「信仰」和「學理」區分，都有了更明確的論述。他們認為當時諸般學理中，晚出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比較完滿、比較適合中國原有的「同業公會」制度。

隨後，更多學人介入辯論，緩進改良的一方有蔣百里、彭一湖[26]、藍公武等；激進革命的一方則又有李大釗、蔡和森、李漢俊等著名共產黨人加入。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中國社會黑暗到了極點，「除了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以後世讀史人的眼光看，雙方本有相通融、求共識的方面。獨秀等人雖然言辭激烈，也並沒有給誰扣政治帽子以懲處的意願和威權。

時年二十八歲的毛澤東也捲了進來，表現得比半年後的總書記還要氣勢磅礴——上述眾論者只局限於中國，他已經高瞻遠矚地思索世界革命了：

> 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東亞」無所取義。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着眼及於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於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係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27]

到了1921年9月，張東蓀乾脆在《時事新報》開闢副刊——《社會主義研究》。後來的事態發展，我們大家已經非常熟悉。激進者堅決地、義無反顧地「走俄國人的路」：工人夜校、農民運動、南昌起義、蘇維埃、長征……直到大躍進、文革和今天的權貴資本及「和諧共建」；緩進者除了辦報、辦學、組黨、介入「參政」、斡旋和平……一直未能對激進革命有任何制約。當然他們也無法阻止以槍桿子（配以扼殺思想自由的「筆桿子」）建立專制主義的一黨獨裁政權。

其中還想說一說的是，東蓀此時特別提到的「研究與認識社會主

義」，是否需要「宣傳」。他說：

> 民國元年的時候只輸入了「社會主義」四個大字，多一個字也沒有。這兩年來，卻有了Propaganda（此字譯為「宣傳」太輕，而譯為「煽惑」又似乎太重），而不像日本那樣真面目的介紹，與學理上的商榷。因為這種事業必須學者來幹，不單是熱心的青年所能濟事。所以我敢說中國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社會主義的Propaganda，一湖君雖然說盡量把社會主義不是搶產殺人的道理宣傳出來，然而我相信這種宣傳決不能減輕偽赤化的危險，因為這是一種消極作用，天下決沒有不與積極作用相連的消極作用而能生效力的。……公武君說真的決不能引起偽的，固然不差，但是種種Propaganda卻不能算真的。我並無絲毫權力能禁止他人做這種「煽動」事業，但我總以為中國現在絕對沒有煽動的必要。[28]

那時候，毛澤東「槍桿子 筆桿子 幹革命靠這兩桿子」說尚未被奉為真經，得以以壟斷性Propaganda而操生殺大權或令自家腰包鼓脹。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不僅為「偽赤化」成功立大功，且一直是維持該「偽」最重要的支柱。

對這場論爭，八十年後，有論者這樣評價道：

> 他既對袁世凱違反法制破壞共和的行為嚴辭抨擊，同時又指責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是「亂黨之罪」；既努力引進社會主義思潮，又強調「吾知過激主義不來中國則已，來則必無法救藥矣」，從而挑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關於社會主義的大論戰。[29]

到了二十世紀末，中共的史學家胡繩開始以個人身份反思馬克思主義。稍微不帶Propaganda地說到這一次討論：

> 「五四」以後，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梁啟超、張東蓀等人之間，有過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現在看來，梁、張等的觀點雖然有許多不對，但有一點不能說是錯的，那就是認為當時中

> 國的經濟很落後，還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陳獨秀等對他們的反駁，無非是説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中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去實現社會主義。怎樣跨越呢？陳等就回答不了，因而並沒有駁倒他們。[30]

梁任公的長文後來收入《飲冰室合集》。1959年，已經被趕出北大校園的張東蓀「借得梁任公近著第一輯，內有覆余書論社會主義運動者，重讀之，不勝感喟，賦七律一首」：

> 寒夜千披舊賜書，亂絲誰可共爬梳。
> 激風料定千波湧，邀局輸由一子疏。
> 昔日徒憂今日事，何方能按此方圖。
> 獨憐隔界難通語，欲問先生笑我無。

如果説，二十年代初的「社會主義論戰」，是李達等共產黨理論家就張東蓀的「感慨」發難，從而挑起了一場論爭的話，三十年代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論戰，實實在在地就因他而起。張東蓀那時已北上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在授課（現代哲學、知識學、康德哲學、中國哲學史等課程）、演講（應清華大學馮友蘭之邀）、出版專著（《現代哲學》、《認識論》，主編《哲學叢書》）的同時，正面地、毫不留情地、從刨老根到批評現實表現，尖鋭甚至尖刻地批評「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論」，以捍衛屬於學理範疇（而非黨派、非政治、非社會動員範疇）的純粹哲學的純正。

故事還要從他離開上海，北上就職開始。

1930年秋天，他受聘任職燕京而遷居北平。到校第二學期，即擔任哲學系主任和燕京學社顧問，開始了他學術生涯最具華彩的一章。當時中國的「哲學界」——如果有的話，用孫道升的話説，可分為「純宗西洋哲學的實用主義、新實在論、新唯物論和新唯心論」，以及「兼綜中西哲學的唯生主義、新法相宗、新陸王派和新程朱派」。[31] 在「新唯物論」條目下，孫道升説：

> 新唯物論亦稱辯證唯物論，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

導之哲學也。……平心而論，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臂的。……這一派哲學的哲學家為數最多，如陳獨秀、李大釗、李季、葉青、陳豹隱、李石岑、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諸先生都是。

這許多新唯物論者又因仁智見異而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輸入於新唯物論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襲俄國日本講馬克思學說的態度的。前者可稱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論中，可謂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展的。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先生可為代表。

張季同即張申府弟，是「很後悔多說了幾句話就陷進反右擴大化羅網」的北大教授張岱年。張教授1978年獲得改正，1984年入黨，青年時期「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義哲學的譯著，認識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當代最有價值的學說」，想將理想落到實處。可惜孫道升已不能為其「歸宗」而修正自己的論說。

張東蓀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非難，開始於1931年。鋒芒直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從此派生出的「存在決定意識」。他認為馬克思「以偷關漏税之法遂置人類之全部精神文化於物質的經濟構造上」。考慮到馬、恩同時還是社會活動家和革命鼓動家，他斷言所謂唯物史觀，不過是革命的「一種手段」，「與真理無絲毫關係」，「此種自相矛盾之談居然列為學說，誠人類之奇恥，思想史上之大污點也。」[32]

到了9月，他又在《大公報》副刊《現代思潮》上發了一篇〈我亦談談辯證法的唯物論〉，對當時正紅火的來自俄國、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潑涼水：

在我淺陋的腦中好像俄國最初根本上不要哲學，後來卻又想另外造出一個新哲學來。所以我今天說到「俄國哲學」這個名詞，似乎有些不妥，然而又似乎亦還得說下去。[33]

張東蓀寫給吳宓信件的手跡

接着直指「物質」及「物質之變化」這兩個馬克思主義哲學核心概念。1932年他發表了〈辯證法的各種問題〉，1933年1月寫〈動的邏輯是可能的麼？〉，從邏輯學角度非難辯證法；1934年6月在《新中華》上發表〈思想的論壇上幾個時髦問題〉，反對哲學具有黨派性的觀點。到1934年6月25日，則是三萬言的〈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

> 哲學是自由思想的產物。蘇格拉地為了哲學而被毒死，但他們卻造成了希臘的哲學。布魯諾（Bruno）為了哲學而受絞刑，但近世哲學卻由他們而開始。所以哲學之花，必須由自由思想之空氣方能培養。沒有自由思想亦就沒有哲學。……
>
> 如果哲學一詞是取廣義的，把歷史理論與社會理論包括在內，則這種學說當然亦是哲學之一種；倘使以為除了歷史理論與社會理論便沒有哲學，則事實確然顯示：哲學於歷史理論與社會理論以外，有其獨具的問題，這些問題乃是哲學之本有的範圍。
>
> 辯證法唯物論只是歷史理論與社會理論，而不是哲學；換言之，即決不能取哲學而代之。一切無聊的爭論都由於不明這個分別而起。一班辯證法唯物論的信徒總想打倒正式的哲學，其實只是糾擾不清罷了。他們始終不明白馬克思主義上所講的問題與哲學上所講的問題完全是不同的。可憐亦復可笑。[34]

不是有意遮掩，或者雲山霧罩，他所渴想，與中國背負的重擔，與中國學界須大步朝前趕的距離，委實太大：

> 說到可憐，我們中國人今天真是可憐！在思想上差不多一點兒自主性都沒有了，只知模仿，恰如鸚鵡學舌，猴孫弄棍。哲學本來是冷門，而在中國居然熱鬧了。其所以然不在於國人自動地喜歡哲學，乃在於有見於俄、意的情形。俄國的共產黨有他的「欽定哲學」；意大利的棒喝團亦有他的「御用哲學」，於是善於模仿的中國人便把哲學亦當作時髦東西了。但是據我看來，哲學與自由思想是分不開的。哲學而變為欽定的與御用的，這便是裝甲的哲學。哲學而變為武裝的，則必定不是哲

學。這乃是哲學其名，而宗教其實。所以我在本篇中不願意提起俄羅斯與意大利的哲學。(德國國社黨亦有他的哲學，真是「哲學哲學，天下多少罪惡借汝之名以行」)。

我以為今天中國所需要的不是哪一種哲學，而只是可以使哲學滋長與發展的空氣。用一個比喻來換言之，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樹上結的果子，乃只是一個很好的田地，可以容我們去努力耕種。倘使我們能努力，不愁沒有果子收穫。否則生在石田裏而希望果子，必不會成功。因此我以為中國研究哲學的人們不可僅急急於創造哲學系統，而同時亦應得注意於哲學空氣的造成。須知哲學只有在哲學的空氣中可以滋長，若在武裝中則決不能生存。英國的哲學家喬德(L. E. M. Joad)似乎亦看到這一點：他約了一班學者作了一個《宣言》，主張全世界上愛自由的人們聯合起來，以抗現在各處的這個「反自由主義」狂瀾。我認他不為無見。總之，中國今天的情形亦正和世界一樣，所以我說不需要某種哲學，而只需要可以使哲學發展的「思想自由」。[35]

出而應戰的，是1923年加入法國共產黨、1925年加入俄國共產黨，歸國後任中共區級或省級宣傳部長的葉青(即廣東區委宣傳部長、湖南省委書記任卓宣)。此公自視頗高，覺得中共黨內公認的理論家陳紹禹「只是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身後的『一個黃口小兒』」。葉青在後來的黨內紛爭中，被判為托派分子而遭關押、處決。國共分家且「虎口脫生」之後，感念蔣中正的不殺之恩，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中央宣傳副部長。在此任上，他接連寫出《中國政治問題》、《抗戰中的問題》、《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文章和小冊子，說「陝甘寧邊區是封建割據」，「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等等。為此，大陸這邊一直把他稱作托派、叛徒和戰犯。他為捍衛馬克思主義，而對張東蓀這個「中國近代哲學底系統建立人」[36]的窮追猛打，是在他被誣為托派之前。即使如此，他的奮而反擊，也未入後世官方史家之法眼：

張東蓀和托派分子葉青之間的論戰，其實質都是反對馬克思主義

> 哲學。這一論戰是國民黨政府實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一個組成部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營壘內部如何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場紛爭。[37]

後來，張東蓀把雙方的論爭集成一本小冊子《唯物辯證法論戰 —— Critical Essays on Red Philosophy》，副標題為「赤色哲學批判小輯」，僅收「純粹哲學」一方的言論。用東蓀自己的話來說：

> 本書既名曰論戰，則理應登載正反雙方的主張。無如贊成唯物辯證法的書籍現在大有滿坑滿谷之勢。而反對除散見於各雜誌外，從無專書。所以本書雖名曰論戰，而實際僅登載反對一方面之論著。
>
> 本書對唯物辯證法作反對的批評，乃只限於所謂赤色哲學，而絕非對於共產主義全體而言。

至於書中各篇章之作者，他說：

> 或許我們所見有相同的地方；然而亦儘管是各行其是 —— 因為只限於編成此書，我們是合作的。至於哲學上的主張與相信，我們仍本個人自由分歧發展的原則做去，決不有任何聯帶關係。

葉青在1935年也照此體例，編輯出版了《哲學論戰》，收入了論戰兩方面的四十篇文章。在這前後，按照後世史家的說法，「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艾思奇、鄧雲特（鄧拓）、李達等也參加了論戰，對先時的兩家：張東蓀和葉青，一併橫掃。」而在更詳盡的資料裏還列出了陳伯達、胡繩、弱纓、滄白等。其中滄白的文字〈《唯物辯證法論戰》讀後感〉，發表在1936年《清華週刊》（四十四卷二期），正是張岱年剛從師範大學畢業，前往擔任助教，「較詳地講述了辯證唯物論，稱之為『當代最偉大的哲學』」的時候：

> 單就導演而兼任主角的張東蓀來說，已經是個不稱職的演員。因為他自從開始反對辯證唯物論直到如今還是一個不知辯證唯物論為何物的聰明人。

對滄白的這個鏗鏘結論，張東蓀或許不大抵觸。因為在一年後創辦《文哲月刊》的時候，張本人已經覺悟到這場論爭的荒謬：

> 我自信我近來有一個發見：就是我發見馬克思派所用的名辭都與我們相同，而其意義都與我們不同。他們所謂哲學不是我們所謂哲學（亦許就正是打倒我們的哲學）。他們所謂唯物論不是我們所謂的唯物論，他們所謂辯證法不是我們所謂辯證法，他們所謂邏輯不是我們的邏輯。他們所謂認識論亦不是我們所說的認識論。我們駁他們，他們來罵我們，實在都是無的放矢，非常可笑。[38]

他堅持認為：

> 自從馬克思主義侵入了哲學界以來，不屑說玄學成了問題，即名學亦成了問題。於是整個兒的哲學都成了問題。
>
> 在以前哲學無論如何變化，而哲學自身終只是哲學。迨馬派一出，哲學卻變為社會思想的產物了，變為代表社會上階級利益的呼聲了，變為經濟的結構中自然而然所發出來的東西，好像膀胱分泌小便一樣了。
>
> 因此我個人以為馬克思主義之突起於人類思想界是一件絕應注意的事。質言之，即等於一個關。若是不能渡過，則不僅哲學從此葬送，即其他高深思想，亦同受影響。

他隨後還就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的核心，即「階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發表過一系列的抨擊。那時候，曾經擁抱過這一套理論的陳獨秀已經被關進監獄，而蘇聯（第三國際）指導中國革命之政策的轉變，包括南昌兵變、建立（而後撤出）蘇區、被迫「長征」……，共產黨已經無暇把力氣放在維護這一主義的光輝與純正之上。而這段時間以來的論爭，對哲學家張東蓀隨後觀察中國大局，分析各派政治力量，也未構成無可化解之芥蒂。隨着日本侵略勢力一步步擴張，在民族危亡大義面前，他與他的哲學論爭對手在政治層面的合作，隨着《八一宣言》的發表，進入第二階段。

註釋

1. 分別為：「颯爽英姿舌粲蓮 風流張緒又華年 三撾更聽漁陽摻 擊鼓岑年草百篇 東蓀仁兄 康有為」；「側身天地更懷古 獨立蒼茫自詠詩 梁啟超」。
2. 後稱「研究系」，以《晨報》、《時事新報》為機關報。張東蓀為該系成員，並曾任議會秘書長，後由於段祺瑞的無為，一批以學者而入仕者退出。
3. 張東蓀：〈中國民族的良心〉，《國訊》，1948年。
4. 如受業於北大的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宋還吾，常發動學生在孔廟牆上張貼「打倒孔家店」、「打倒舊道德」等標語，暗助師生在孔廟演出悲喜鬧劇《子見南子》(林語堂編劇《子見南子》，發表於魯迅、郁達夫主編的《奔流》月刊，1928年11月)。
5. 《時事新報》，1919年6月26日。
6. 方漢奇：《報史與報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頁227–228。
7. 適：〈介紹新出版物〉，《每週評論》，第36號，8月24日。
8. 「適之先生：前幾天我寫了一封信給先生，想已經收到了。現在《湖南教育月刊》已出版，特贈先生一本，並且要求先生三件事：一、請先生批評指教。二、請先生在各報紙雜誌上介紹。三、請先生做文章給本月刊。我們在湖南發行出版物，很不容易。自從去年大兵之後，人民生計，艱難異常。教育界奄奄無生氣。現在十月已經過完了，五月份的經費還沒有發下。原在教育界的人，因生活艱難，都往別處去了。所以我們組織《教育月刊》，除了錢的問題，還有人的問題。並且我們處在這塊地方，不比在別處，言論很難自由。從前的《湘江評論》與《新湖南》，先生都看見過的，都不能夠存在。我們現在「改弦更張」，組織《教育月刊》，意思是想把生命延長，但是結果如何，現在還沒有把握。我們抱定宗旨，只要一日不被高壓壓倒，我們總盡我們的力量，去作文章，去籌款。自己沒有錢，作起文章到外面去賣錢。前回我寫信給先生，要求先生介紹我們到別的雜誌報章上作撰述，一面雖是為自己，一面還是為《教育月刊》。以上所講的是我們的苦衷，除了先生與陳獨秀、張東蓀先生外，決沒有同別人說。因為這些話，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決不願意聽的。要引起他們的同情是更不容易的。先生呵！我們的情形，先生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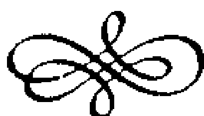
然曉得了，那前面所要求的三件事，總要請先生幫助指教才好！舒新城十一月四日」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135–136。

9. 《湖南教育月刊》(張東蓀，毛澤東，舒新城等)，1919年11月創刊於長沙。參見于平凡：《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頁72。該刊後來的命運未見記載，估計頂多出兩、三期。
10.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5。
11. 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1921年1月1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1。
12. 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載《「一大」回憶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頁25。
13. 同上註。
14.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175。
15.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序論〉。
16. 張東蓀：檢討草稿。
17. 同註15。
18. 張東蓀：〈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時事新報》，1920年11月6日。
19. 邵力子(1881–1967)，近代教育家、政治家。《民國日報》和《覺悟》副刊的創辦人，與陳獨秀共同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早期中共黨員。1927年因出席國際大會脫離中共；1949年4月，赴北平和談失敗後宣佈脫離國民黨。
20 陳望道(1891–1977)，中共一大的代表，日本留學生，《新青年》編輯，《共產黨宣言》譯者。1923年拒絕挽留堅決脫黨。後來在修辭、語言上多有建樹，《辭海》修訂第一任總主編，新式標點符號推行學者。
21. 李達(1890–1966)，中共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啟蒙思想家。他曾留學日本，撰寫介紹科學社會主義與歐洲工人運動的文章，歸國加入《新青年》編輯。1921年出席了中共一大，當選為中央宣傳主任。同年翻譯出版《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李達一直傾力彰顯毛澤東，著述有《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和主編《唯物辯證法大綱》。因為脫黨又入黨，雖歷任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校長、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這屆那屆的政協人大職務，還當了第一任中國哲學學會會長，最終在文革初期的連續批鬥中喪生。他當時曾經寫信向正在同一城

市「暢遊長江」的毛澤東求助。毛沒有理睬。

22. 帥文潔：〈《新青年》與陳獨秀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研究」網站（http://www.chenduxiu.net/ReadNews.asp?NewsID=403），2004年12月14日。
23. 張君勱：〈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展望》，第172期，1969年4月。
24. 張東蓀：〈一個申說〉，《改造》，第3卷第6號，1921年2月。
25. 張東蓀：〈現在與將來〉，《改造》，第3卷第4號，1920年12月。
26. 彭一湖（1887–1958），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建國後曾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民建中央常務委員。以直言多次遭毛澤東點名，成為「右派」代表人物。直到2007年，在中國歷經八十多年的共產革命，終於從專制帶來的極度貧困走入貧富分化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時候，還有左派學者在引述毛澤東1957年的斥罵：「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參見陽敏對王紹光博士的專訪，見《南風窗》雜誌。
27. 同註11。
28. 同註24。
29. 黃波：〈「書生謀國直堪笑」——關於張東蓀〉，《書屋》，2003年第7期。
30. 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創刊號，1997年1月。
31. 孫道升：〈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國聞周報》，第12卷第45期，1935年。
32. 張東蓀：《道德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33 張東蓀：〈我亦談談辯證法的唯物論〉，《大公報》副刊《現代思潮》，1931年9月。
34. 張東蓀：〈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載張東蓀編：《唯物辯證法論戰》（北平：民友書店，1934）。
35. 張東蓀：〈十年來之哲學界〉，《光華大學》半月刊，第3卷第9–10號，1935年6、7月。
36.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人文書店，1935）。
37. 楊春貴：〈「唯物辯證法」的論戰〉，載《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頁907。
38. 張東蓀：〈發刊詞〉，《文哲月刊》，創刊號，1935年10月。

第三章



國家藍圖

報國之攻，緩急有為。
入侵者鐵蹄下的拳拳抗爭，
一直為主旋律掌控者
以不屑而將其徹底邊緣化。

只為平虜兼反專制，
走出書齋的主人公，
終與理念上的論敵，
結為並肩作戰之盟友——
悲劇即始於此。

全副身心投入。
不見大王幡旗，
正忽遠忽近地飄啊飄。

一

組黨與國民參政會

1　國社黨與《再生》

中國的皇權統治結束於1911年。接着是十七年的軍閥混戰。國民政府1928年定於一統之後，直到七十年代，第一代專權者死掉後，才在其指定的第二代專權者（其實就是他的兒子）手上，開放了黨禁報禁，而到了由第二代指定的第三代專權者（他的權力漸漸「縮水」）主政之後，才見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大家都知道著者說的是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和民進黨。

從中間橫插一杠，奪得了大片江山，重新制定國號的共產黨中國，從一開始就宣稱自己崇奉「多黨合作制」。可惜直到今天，除了唯一一名真正的在野黨「中國民主黨」（雖然我們只能在概念而非別的一切上如是看，其領袖也不是在牢裏就是在海外），別的所有通過共產黨而吃國庫的「民主黨派」，沒一個不是低眉順眼、屏聲斂氣，乖乖地給有槍（從而也就有錢）的執政黨當花瓶。

但在這百年歷史上，有沒有過哪怕一絲一毫的可能，也曾有過算是有些氣概、有點規模、獨立於專權之外、能為國家做出些許貢獻、有組織、也有自己社會基礎的政治力量呢——即使以我們後人苛刻的眼光來評定？

大家會說北洋時期的國民黨和抗戰勝利後的民主政團同盟。不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活躍過。但平心而論，其功效，也

只在幾個關鍵「點」上的有限運作：發表議論、分配席位、制定和約、斡旋軍閥間錙銖必較的劍拔弩張……。從來沒見過廣鋪在民間，無日無時、全面鋪張的對專權的監督、限定與抗爭。

中國歷來重文輕商，背負了太重的農業/皇權傳統。因為戰亂(包括軍閥們的稱王和外族侵凌)，萌生中的實業總是遭遇一場接一場的摧殘。於是，獨立政黨的土壤，要麼被忽視，要麼無由養息。但活生生的人，說得更自詡一些，受了教育、有見識、有理想的人，或者按照張東蓀的觀念——「士」在新時代的變種——總要思索、要關注、要活動、要為國效力。所以，組黨之議論，時時騷擾着文人，特別是那些在英、美見識了民族國家與政黨政治的西化文人的心。

北洋時期為拉選票而兀然冒出的一堆大小黨就不去論它了。曾經有過的，或許會成點氣候的一次，是在大家過了「咸與共和」之熱鬧，又經歷了種種思潮之衝擊，領袖人物自然湧現出來之當口。據陶菊隱記載：

> 五四運動的大本營為北大。研究系為了配合這股新潮流，張東蓀在上海主持《時事新報》，藍公武在北京辦《國民公報》，陳博生在北京辦《晨鐘報》(《晨報》前身)，都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同路人。……梁啟超由歐洲回國後，有將研究系改組為黨的願望。丁文江、張君勱兩人極為贊成，想以胡適之為橋樑，打通北大路線，表面不擁戴一個黨魁，暗中則以梁與蔡元培為其領導人；並打算以文化運動為政治運動的前驅。由於張東蓀反對黨教合一，此議遂被擱置。此次組黨雖未成，卻未嘗不是張君勱辦政治大學的契機，也是成立民社黨的一個遠因。[1]

在這裏，我們看出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幾可以孿生兄弟視之、友誼之篤，無與倫比」(台灣學者張朋園語)的「二張」，在應否將思想啟蒙與組織政黨合在一起向前推進的分歧；也可知梁漱溟在1985年8月6日對艾愷所說顯然不確——

> 東蓀本人在燕京大學教書。他跟張君勱是好朋友。一般都說張

東蓀是張君勱的靈魂。張君勱在政治上的行動立場都是聽張東蓀的，人家說他是張君勱的靈魂。

博學、沉靜、堅韌如張君勱者，難道會以他人意志為靈魂？何況他們友誼雖篤，見識卻是獨立的。上引陶菊隱有關組黨一段即其一，應該說也絕對不是枝節、策略上的分歧。1920年在「別急着組黨」上，張君勱同意了張東蓀；1933年，在「太可恨了，組它一個黨」，張東蓀同意了張君勱；再後來，到1938年參政會期間，兩人心態已有很大差異；而到了1946年底的制憲國民大會，依舊友誼甚篤的「二張」，因見解（而非利益）的不同，已經在行動上徹底分道揚鑣——這我們將在下文詳述。

通觀二人之生命軌跡，情形似乎是，在對待西學、國學的引進或揚棄上，他們觀念十分接近；對抗專制，二人近乎完全一致；[2] 為此必須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包括物質生活與精神素養，二人也是一致的；接着的問題是如何達成，以及其間不可免的種種操作。

每每危機或者轉機出現，張君勱往往立即投入實際運作，張東蓀則看重自己對重大國是發言的權利——當然到了國勢危殆之關口，比如繼續內鬥還是一致抗日、北平能不能免於戰火……他也難免出頭。這也就是為什麼直到九十年代，從不見在重大決策上觸動當局，只在「文化」中徜徉的學者如張中行，還在刻薄他，說他「不忘朝市」。

讓我們回過頭來講文人組黨的故事。

三十年代前後，在一個久違的國家統一且無大戰事局面下，知識界自發地開展了一場關於「民族復興」的大辯論。雖說這場討論主要是在「人文精英」間展開，如胡適與張君勱，但已經在國民當中掀起熱潮與活氣。

民國之後，幾乎沒有一場論爭不征伐其間的張東蓀，這回沒有介入。不能說這次論爭的主題對他沒有觸動，恰恰相反，許多話題，如文化與社會組織結構的重新建造，國人身上的惡習慣、劣根性，文化王道氣象和霸道文化的侵略，民族主義思想淡薄……都是他在近

十年間多次提出的。只為，正是這時候，他剛剛北上入燕京，再不必為籌款、為學潮、為行政與人事發愁，得以完全專注於自己心愛的學問：授課、譯介、論説、創新。[3] 不錯，1931–1935年的「唯物辯證法」論戰，確是由他挑起並擔綱，但主要動力在哲學，而非政黨。

但是，如果把張東蓀看做一名書齋學者，哪怕一時一地，或者某個特別時期，也是不確的（這裏所謂書齋，是一個中性名詞，不具任何褒貶）。這是一批少年時代即浸泡於正宗國學的人，下意識裏難免有儒者的自我期許，不僅對周遭社會現實具有天然的敏感回應傾向——「先天下之憂而憂」，而且容易沉潛於「籠而統之」的國學思維定勢。恰如知曉「勾股弦」並用於構築營造，而不深究幾何學；恰如對「非典」採用強肺壯氣以抵「時疫」，而非取出切片、查到「冠狀病毒」。許紀霖認為他們太「現實」了，痛惜他們的思路過多地關注於社會公道的具體方案上，而缺乏從學理上深入地論證自由與公道之間的關係。但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回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回到他們當時所處的情境——

戰事漸息，長於軍事征伐的國民政府，還不大明瞭「自由」、「人權」、「法治」為何物；實業在中國正一步步生長，政府當局除了徵稅，並沒有看到重建現代社會秩序的迫切性——正如政治學教授張奚若所描述：「治理國家和建設國家方面卻一籌莫展」。當政的諸公欣欣於「國家終於到手」，宣稱秉承「國父遺訓」（即堅持社會須處於「訓政」期），施政手段卻是百孔千瘡，包括「黨的建設」——無論是在理想勸誘、利益推動，以及緻密的組織、鐵的紀律方面，根本無法與它打不死的政治對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相比。

那時候，黃河長江正一瀉千里，東北的密林綿延起伏，山西的煤也靜靜地睡在地下。清末官費和庚款派出的留學生，正一批批回來。他們在外邊開闊了眼界，裝了一肚子學問；他們忍下近百年來國家屢戰屢敗、割地賠款的屈辱，認定中國一定要復興，也一定能復興，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1929年春天，胡適一接手《新月》雜誌，就把這份純文學刊物轉為兼論時事政治的園地。待到羅隆基出任主編，《新月》已經成為文



張東蓀（左二）參加友人的婚禮・攝於三十年代初

人議政的戰場：針對國民黨的現實政治，高倡「人權」、「法治」。一時間，胡適、羅隆基變成人權派的代表人物，發表了大量文章——這不過其中一派。[4]

「九一八」前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聚集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大都市的一批新老朋友，用後世官方史家的話說，「研究系參與分子、信仰國家社會主義的教育界、學術界人士及青年學生，及少數失意政客、封建餘孽等」，大家議論國事，磨拳擦掌、義憤填膺。他們必須發言、必須有所作為——不說反蘇反共的「醒獅派」中國青年黨（他們由「少共」而「巴黎玫瑰村」而「野戰抗日」，1931年，終於由秘密轉為公開），以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的中華革命黨（後來的農工民主黨），就連「處於兩個高潮之間」（其實就是國民黨翻臉屠殺之後的低潮）的共產黨，就言論而言，也異常活躍——有中共介入暗中操作的「中國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等成立於1930年春天；共產黨內的「左派反對派」（托派）也在那兩年成形。

當時還不時興拿「綠卡」，也不大見成材學子千方百計獲取他國居留權。那時候，無論官派、庚款還是商會資助（外加勤工儉學）的留學生，一概蜂擁回國報效或者折騰。用張奚若的話說：「學些實在的學問，回來幫助建設革命後的新國家。」[5] 用曾琦的話說：「本國家主義之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用中共的話說是：「一聯國際無產階級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國主義的進攻；一聯國內被壓迫民眾作推翻帝國主義走狗之中國軍閥的革命。」[6]

從名義上看，國民（而非臣民）依舊處於「訓政」期。但那時候的「訓政」，若與1949年以來「人民當家作主」之後的「人民民主專政」相比，無論從對資源的控制、對傳媒的壟斷、對異議者的箝制，特別是文人學士的自我制約……都難於望其項背。當然，那個年代的知識人也不是經歷過肅反、鎮反、反右和文革，任由黨支部書記呼來喝去的「老九」，更不是權貴壟斷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智囊新寵。他們剛剛衝出異族、皇權窒息，通體的新學問、新氣概，一心渴望國家現代化、隨時準備對國是發言……。

人人理直氣壯、大家各有主張，政治氣氛一片活躍。其中最急

切、衝動、得風氣之先，且因為沒什麼可失去，從而逮住機會絕不放手的，還是以師範生、小知識分子為骨幹的共產黨——其理論和作風，多「短平快」地沿襲自俄國、日本。

牟宗三說：

> 民十八、十九、二十年左右，國民黨的統治正在蒸蒸日上，共產黨政治上失敗，但思想宣傳上卻取得了壓倒的優勢。知識分子一般意識上的傾向都為共產黨的思想所吸引。坊間書肆，滿坑滿谷，都是他們的小冊子。[7]

「訓政」麼？請問你蔣中正打算怎麼個訓法？

老實說，當局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在三十年代前後，「禁令」看上去聲色俱厲，但以「黨國」的理論體系與人員素質，還真拿不出什麼威逼性的有效約束。蔣中正曾明確宣稱：

> 法西斯主義……是衰退社會中的一服興奮劑：……
>
> 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8]

「訓政」文本和貫徹執行中的零散動作，反成為勇氣十足的教授們發言之靶的。

就在這時候，在「九一八」的前一天，張君勱從德國回來：1931年9月17日抵北平。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可以想見他們聚談時候的激憤。怎麼辦？大家都有話說。先創個社交換意見吧——「再生社」在北方成立。

如果說1920年陪伴梁啟超遊歐，思想上受到的主要衝擊是對資本主義的失望，這次張君勱回來，卻從歐洲人的反思，從他們着意尋求社會制度的整治上，見到自己祖國可以借鑒的曙光：不是階級鬥爭，不是蘇俄式的奪權而後專政，而是德國人的社會民主主義——通過民族國家的確立，提出「尊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通過「社會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經濟制度，解決私人資本的集中和壟斷問題。這與羅隆基的「實行專家政治」，「要求財政管理權」；

與張東蓀的「學術獨立與言論自由」、「基爾特社會主義」都沒有衝突。連湯薌銘、諸青來等民憲黨大佬，都覺得要放眼世界，並為國家做點什麼了。

有了「社」，當然是要發言了。第二年5月，再生社機關刊物《再生》月刊出版。創刊號上出現一篇宣言〈我們所要說的話〉，署名「記者」，實際上是經大家議論而由張東蓀執筆的創刊詞：言辭平樸，卻從容又堅決。作為後世讀史人，我們不難從中窺見他們一批人各抒己見之後的綜合——絕對的民族主義、修正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國家社會主義。二張之間，沒有衝突，也沒有爭論，但細細揣摩他們的立場，實已經出現細微差別：張君勱心儀國家之強大(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而東蓀更看重民眾和個體——眾人的利益不得以大口號、大名義剝奪。

1933年，想來當局在黨禁上收緊，「再生社」遂作出建黨的決定。他們把總部放在北平，天津則設特別區委，上海、武漢等地設分部。歸國即入燕大教書，旋即匆匆離開的張君勱，往來於平、津、魯、豫，指揮一切。十多年後，張東蓀對當時情景描述如下：

> 至於到九一八事變以後，忽然和張君勱先生組織國家社會黨，乃純是為了國民黨的「黨外無黨」一句話而激成。我既相信民主主義，當然是反對一黨專政，國民黨不許另外有黨存在，我們民主主義者便不能不另立一個黨，以表明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過如此。
>
> 當時張君勱先生與我明白相約，說他日如國民黨有一天放棄了一黨專政，我們的黨便自動宣言解散。我對於這個宣言是始終留在心上。張君勱先生以後的行為如何我不敢說，至於我自己卻早已自知是不適宜於黨派生活的一個人[9]

中國國家社會黨(國社黨)究竟如何作為呢？與一上手就抓軍隊的國、共、青三黨(包括後來有此意願的第三黨)相比，國社黨諸位，雖然奉上「冬烘先生」之名號有點過分，但文人、名士派頭卻是難免。即使這樣，「血薦軒轅」之豪情也難於掩抑：

> 憶國社黨創黨人宣誓成立時，亦極機密，即在舊國會議員胡石青先生的北京寓所。胡先生係創黨人之一，當天在他後院書房宣誓畢，他以主人身份，曾致互勉之詞。最使我銘心而永不能忘者：他說一黨專制之下，而組織反對黨，無論如何行動，總難免特工之追蹤。所以將來遭遇艱難，甚至被捕下獄，皆勢所難免。今天大家既下決心為國家犧牲、為民主鋪路，一切艱險危難，入監下獄，甚或犧牲生命，都應列在可能的預算中。今日如能如此預計，將來倘有不幸遭遇，始能臨難無苟免，而處之坦然。[10]

張東蓀曾著文回憶這位前北洋政府教育次長：

> 友人胡石青先生在二十餘年以前曾在著述中大倡「一度革命」之說，即革命只可限於一次；既不可再度三度接續不已，亦決不可使革命狀態延長。革命完成後即當走上建設之途，不復再是革命了。[11]

第二年(1934)七月，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天津召開。剛剛在南方的《新月》雜誌和北方的《益世報》都轟動了一番的羅隆基也參加了，還當選為中央總務委員兼宣傳部長。「二張」也被選為總務委員。中央總部設在北京西城石板房。

應該說，在動盪的三十和四十年代，處於全民抗日與推進憲政的大局下，當政的國民黨對他們還是相當禮遇的。當時「臨難無苟免」之精神準備，幾成過慮。待到共產黨拿了天下，「民社黨」(與民憲黨合併後的國社黨後身)隨政府遷到台灣，1989年在中國大陸編成的詞典，依舊將其列名為「民主黨派」，認可「中國國家社會黨，在抗戰時期和戰後，成了中國最成氣候的三個在野黨之一(另外兩個是青年黨和第三黨)」，並且客觀地轉述其理論基礎(以國家民族本位為中心的國家社會主義，即「絕對的愛國主義與漸進的社會主義」)和政治主張(「以民主政治為根本原則」，國民代表會議為最高權力機構，成立容納多黨派的聯合政府中央行政院。其經濟主張是實行國家社會主

義，使公營、私營和合作經濟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分部經營管理，反對生產工具國有和廢除私有制度，反對階級鬥爭理論，而主張漸進的社會主義)。[12]

撰寫詞條的人認為，在文化政策方面，國社黨主張學術自由獨立。黨員以張君勱、張東蓀的學生居多，缺乏群眾基礎和組織力量，影響很小。

說「影響很小」，不能看做有意貶抑，儘管在1945年國共和談期間，處於「言和」前沿的中共幹員(如周恩來、徐冰)，包括毛澤東本人，並沒有這樣看。[13]

從國社黨成立到《再生》發刊這兩年間，張東蓀再次擔起政論家之角色——這是自二十年代以來，在他把大量精力投入辦報、辦學、教書和撰述之後的「再出山」。考慮到他那時候在教育界、哲學界已經達到的聲望，以及本人呼之欲出的富於創建性的撰述，對他的這一姿態，同人當中，或擊賞推許、或惋歎譏諷，他自己倒是十分明確：

> 至於我亦偶爾作政治上的文章，這只是我以為一個公民總應當對於國事發言。我嘗對於現在大多數大學教授們的沉默認為奇怪。大學教授是一個資格，公民又是一個資格。正好像一個人在家庭是父親，在商店是伙計一樣。本來可以兼的。現在他們好像做了大學教授就不必做公民了那樣，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
> 並且須知以公民資格對國事發表意見，並不就是幹政治。貫徹政治上的主張必須看其性質。若是主張共產與法西斯，自然本人非去硬幹不可。但主張民主政治與自由主義卻不然。我是個民主政治的信徒又是個自由主義者。我希望民主政治實現即無異乎希望人人都取得自由權。並不是我有什麼固定的主義強使人家跟我走。所以民主自由主義者的政論，其性質與共產法西斯主義者的政論根本不同。而況在今天的中國，我們自由主義者的發言，與其說是進攻的，毋寧說是防禦的；與其說是積

極的，毋寧説是消極的；與其説是想有所取的，毋寧説是想有所恢復。質言之，即我們決不是想拿些什麼加於人，乃只是怕人家拿些什麼強加於我。因為倘使我的自由權不被侵犯，則民主政治也就可以説是成立過半了——我是人人中之一，我的自由權成立則大家的自由權亦同成立。

我之對於政治完全是一種打抱不平的態度。雖時時發表政論，然從來不計及本身。……我之好為政論不外乎想抵抗那個要毀滅文化的內外潮流。[14]

對於1931年頒佈的《訓政時期約法》(當局曾允諾六年訓政期限。在此期間，國民黨獨攬政治權，訓練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平民只有服從才可以享受公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權利)，他説：

就中國人民知識能力不及格來説，倘使為事實，則必是全國的人民都如此。決不能夠一部分人民被訓，另一部分人民能訓。被訓的人民因為沒有畢業，所以必須被訓；試問能訓的人民又於何時畢業過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黨籍便顯分出能訓與被訓呢？可見訓政之説真不值一駁。[15]

他不認為當政的國民黨，僅僅因為軍事征伐得手，就會出現質的變化。這是一個與「北洋」沒什麼兩樣的「特殊勢力」——「軍閥化、貪官化與坐地分贓土匪化」。他説自己是「向來反對國民黨的一個人」：

中國自辛亥以來始終未上政治軌道，並不是因為在人民方面有何不足，實在是只因為有了特殊的惡勢力不願意受憲法與法律的約束。……國民黨在野時，我們未曾表示過同情，亦就是因為早見到他們一旦秉政亦脱不了特殊勢力的惡習。我們當時寧願與國民黨為敵，就只在於此。到了今天，社會上一班人，當恍然明白了罷。國民黨之取北洋軍閥而代之，完全是換湯不換藥。[16]

這種直指痛處的抨擊，既非出於私仇，也非出於黨爭——

老實說，我們黨外的人，本來不能有所列論，並且亦不願管此閒事。無奈國民黨與國家的關係太密切了，他的一舉一動都足以使國家蒙極大的影響。我今天來說幾句話，原是想使國家的損失，少因國民黨而加重，人民痛苦少因國民黨而延長，如此罷了。[17]

令他最為憤怒的，是作為國家公器的政府只知道自肥自利，「把軍隊作為自家的工具，把國庫作為自家的私產，把人民當作奴隸。於是全國離心，已成分崩離析之象。」[18]

望讀者注意，這些言論都是在北伐勝利、張學良輸誠、共產黨被肅清，當政的國民黨正大權在握、意氣飛揚的時候發出的。他沒有噤口，對方也沒有封雜誌、派警察。不幸的是，沒過多久，這一批評立刻為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和隨後對「福建人民政府」的鎮壓所證實——為消滅異己，在當道眼裏，民族大義是可以讓路的。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國公民被侵犯的，已經不僅是言論思想了。《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淞滬停戰協定》、「冀察政務委員會」，包括對打了勝仗的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的鎮壓，對（後來也）主張抗日的工農紅軍的圍剿……，無論作為大學教授還是在野黨領袖，張東蓀更不能不發言了。

發在他們機關刊物《再生》創刊號上的那篇〈我們所要說的話〉，可看做憂心如焚的知識人對國事見解的公佈。老實說，從技術上看，這篇文字實在不像一個黨的綱領，只能算是一批在學養底色與知識源頭而言，並不盡相同的獨立思想者們針對執政黨之獨裁「所要說的話」。但七十年過去，這話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感到直指時弊、擲地有聲：

或有人以為思想與言論太開放了，勢必導致國議紛紜，使政治不能順利進行了。我們亦知國家的政治求其敏捷與效率高，只在於行政系統是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腕，而對於社會上的

我們所要說的話

記者

一

中國這個民族到了今天，在前途只有兩條路：一是真正的復興；一是真正的衰亡。 先就衰亡來說罷，自清末以至現在，在表面上好像在那里時時刻刻掙扎着以抵抗這個衰亡的趨勢；但實際上抵抗的動力卻遠不及下落的力量，所以到了今天，從國民經濟上看，從國際地位來看，從政治綱紀上看，從民衆道德上看，都未見得高出于四五十年以前。 我們固然知道一個大民族有他的悠久歷史，有廣大地域，決不會一旦即被滅亡。 但歷史上卻亦不乏這種先例，就是無論你民族如何大，只因你長久不能統一，長久在內戰之中，你就會逐漸為外族所吸收了。 中國這幾年而還毫不能振作，毫無覺悟。 我們且把這近三十年的歷

張東蓀執筆（署名「記者」）為國社黨起草的政治宣言〈我們所要說的話〉手跡，刊於1932年5月《再生》創刊號上

輿論並無關係。並且社會上輿論愈發達，行政反可得其助力。因為既許可言論自由以後，反對政府的思想固然可以發表，而贊助政府的言論更可以發表。因為真正民治的政府，他的基礎是坐在產生政府的大多數公民的同情上，其政治的設施又適合大多數人民生活實際的需要；所以言論愈自由，政府愈能得輿論的贊助。

要知道贊助政府的言論，這決不是專靠政府自己所製造的宣傳。倘使不許言論自由，而政府一味宣傳，決不會生何等效力。所以從這一點上可見政治上效率的提高，與社會上自由的開放，不但無抵觸與矛盾，並卻正相助相成。

因為我們雖則很愛護政治的效率，但我們卻更愛護思想的自由。以為無政治的效率，則行政失其意義；但倘無思想的自由，則國家失其靈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縱使兩者即有衝突，我們斷乎不可犧牲自由而遷就效率。像俄國那樣的辦法，必須先經過一個階級的專政，把人民所有的自由暫時犧牲，而以為將來或可有一個自由天國出現。

我們則以為國家是一個民族全體的公器，斷不容哪一個階級來據霸一時，而犧牲其他的自由。倘事實上有此，則宜努力打破。於理論上更不可認為應該。

所以我們主張為政治效率起見，針箍權力當然宜於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為界，斷不容侵犯到社會上去，把人民的自由亦受管轄。[19]

作為政治宣言，〈我們所要說的話〉明確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稱「科學的民主政治」）：

我們對於政治，是把根據效率的科學與個性差別的科學，以與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義調和為一；於經濟是把易於造產的集產主義與宜於分配的普產主義以及側重自治的行會主義調和為一；於教育是把淑世主義與自由主義調和為一；然後三方面再綜合之，成一整個兒的。[20]

同時列舉了關於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包括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九十八條政綱。非常突出的一點是：載明「不收現役軍人為黨員」——到了1945年9月，重慶談判期間，蔣匀田還就此正式向毛澤東解說——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與力量為基礎，不是單憑武力可以打出來。

以後的幾年裏，張東蓀的政論，在《再生》、《自由評論》等刊物上不停地出現。與前期在《東方雜誌》、《庸言》上刊發的文字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他論說的目標，已經從寬泛的社會分析，轉到剖析當政的獨裁者，如〈階級問題〉、〈為國家計與為國民黨計〉、〈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麼？〉、〈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等。這最後一篇，發表於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直指一黨專制和親日案，火力異乎尋常地猛烈。

那年頭的中國，僅就放言論政，包括具有針對性的努力，真可說是五色紛呈。而提着槍收税納糧的政治勢力：日本駐軍、偽滿政權和領地逐日縮小的國民政府，則各懷心思；在朝在野的各個黨派（包括掌控了軍隊的和沒有軍隊的），都各有盤算——沒人知道哪種勢力會在什麼時候作用，也沒人估量得出中國將如何前行。

就在這時候，世界政局出現了變化。

2 《八一宣言》與「一二・九」運動

1935年夏，德、意、日在東、西兩線瘋狂擴張。面臨着法西斯的進攻，蘇聯告急。以保衛蘇維埃聯邦為宗旨的共產國際，政策發生根本轉變。

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立即將這一新精神與國內華北事變的嚴重局勢聯繫起來。團長王明（其時正在基斯洛沃斯克療養）火速趕回莫斯科，與康生、吳玉章、林育英等代表團成員討論之後，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書成，王明將其譯成俄文，立即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得到讚許。

7月25日，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召開，正式確定了各國共產黨

聯手「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並對中共代表團那份緊跟形勢的宣言予以高度評價。

8月1日那天，莫斯科的中國代表團以神來之筆，給這份文件冠名為響亮上口的《八一宣言》，並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正式發表。其實，所謂正式發表，也就是陸續在幾份國際共運的刊物上刊登：俄文版《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機關刊物）；英文版的《共產國際通訊》；還有一份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中文）。那時候沒有互聯網。共產黨員再「氣沖雲霄」，也無法激勵莫爾斯電碼與活字排版。估計將原件傳送、翻譯、出版、發行等所需時間打進去，這份宣言面世，已經是秋末冬初了。

共產國際七大從7月25日開到8月20日，會還沒散，因為事關重大，大家覺得必須將此新精神盡快向國內的同志們通報。代表團裏邊參加起草的林育英（林彪堂兄）主動請纓，將3,500字的草案熟記於胸（真虧了這個曾受過日寇酷刑的「鋼人」！），於7月底，也就是《八一宣言》這個響亮標題還沒想出來的時候，繞中亞、穿新疆戈壁，駱駝不停蹄地往同志們身邊趕。這一趟走了三個半月，到這年初冬，即11月中旬，終於趕到了陝西的瓦窯堡。

從本著者讀書的五十年代起，中學歷史課本和有關宣教材料，關於這一重大事件，歷來有如此的表述：

> 1935年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5年底，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出當時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及民族矛盾為主要矛盾；中共的任務是建立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21]

從那時候到現在，不下五億人口，均須背下這段話，以應付升級、升學考試和時事測驗。直到2003年修訂課本時，《八一宣言》發表者才被改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真實情況如何呢？

1935年初夏，法西斯在歐洲發飆的時候，紅軍正困在兩河口；一、四方面軍正為北上還是南下爭論不休。共產國際七大開會的日子裏(7月25日至8月20日)，心神俱疲的周恩來(他是遵義會議後新「三人軍事組」領頭人)患了肝膿瘍，已經不能主事，毛澤東開始獨立負責軍事。在《八一宣言》的最後一稿經共產國際書記處成員表決通過的那天(9月10日)，毛澤東一派的中央紅軍，正以近乎奔命的方式逃脱張國燾的控制。而在林育英騎着駱駝往陝北趕的那段日子，紅軍打下了通渭縣的榜羅鎮(9月底)，並且終於可以在差不多一年之後，再次看到報紙——他們這才第一次從《大公報》上得知日寇鐵蹄對華北的踐踏，得知原來自己正奔命前往的陝北，不僅有紅軍，還有一個蘇區根據地！

這年10月，在「長征勝利結束」的吳起鎮，毛澤東在黨內的位置得到確認：負責軍事。待到背負了兩大任務(「傳達國際新精神和調解一、四方面軍關係」)的張浩(也就是林育英，這是他為這趟歷史性的「浩然前行」特別給自己取的一個新名字)趕到陝西瓦窯堡的時候(11月中)，「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那時候毛澤東、張國燾鬥法，互不承認，為避免僵局，只好採取沒有中央軍委這個變通方式)毛澤東正忙着打直羅鎮(對方是東北軍的牛元峰，並非日寇)。出面接待林育英的，是黨的負責人洛甫、博古。

張浩同志離開莫斯科的時候，無論《八一宣言》這個響亮標題，還是將其發佈地改放到長征路上這樣的主意，都還沒想出來，但主持大局的張聞天已經敏感到事關重大，果斷以「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工農紅軍軍委主席朱德」的名義(注意，並非由「中國共產黨」發佈。張聞天那時候多麼明白。共產黨宣教精英不知怎麼愈活愈糊塗)發佈了「蘇維埃和紅軍」的《抗日救國宣言》。[22] 至於這個宣言是如何發佈的，通過了哪家電台、報社，到目前為止，均未見披露[23]——可能根本就是一個草稿，或者哪位長官在什麼會上唸唸了事，自然不會有任何歷史影響。

只要比較一下兩個文本：陝西發佈的這個宣言與後來正式頒佈的《八一宣言》，第一讓我們驚歎的，是張浩同志驚人的記憶力；第二就

是官方史家靈活閃爍外加相當無恥的身段。歷史課本上那模棱兩可、還特別扯上毛澤東的「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多麼機巧，又多麼不誠實啊。

然而，到了1935年秋末冬初，俄文、英文和中文的《八一宣言》，還是從不同渠道、輾轉而艱難地傳到了中國[24]——其速度和林育英穿戈壁差不多(雖然林育英找到了紅軍，但莫斯科接通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直到1936年6月中旬才完成——否則西安事變要重寫了)。[25]

正「憋」在上海，只能動不動玩點兒犧牲巨大之「飛行集會」的周揚等零散黨員(注意，中共後來對那時候革命力量的評價是「白區損失100%，紅區損失90%」)興奮莫名。[26]可惜由於獲得信息的渠道的差異，對「精神」的領略難免各有千秋：「國防文學派」，即周揚等「四條漢子」，他們獲得宣言的渠道是《共產國際通訊》，心中的領袖是遙遠的莫斯科。因為不曾離開過城市，對能與政府合作抗戰(而不是拿命鬧着玩兒)，絕對「偷着樂」。而出自蘇聯作家之手的「國防文學」觀念，對他們而言，不僅具有天生的親和力，還特別給人壯膽兒。而到過蘇區、參加了長征、這回接受特別派遣從陝西回到上海的馮雪峰就不同了。他代表的是瓦窯堡的中共中央，對白區還有多少人在幹什麼不甚了了——或許說，也不甚放在心上。他沒有先聯絡「左聯黨團書記」周揚，而是登門拜望自己的「老師和戰友」魯迅，並在胡風的陪伴下，傳達了具有瓦窯堡特色的《抗日救國宣言》。雖然那時「國防文學」的口號已經在周揚他們的推動下有了成績，「左傾傾向」(或曰無產階級情感)鮮明的胡風，即使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局面，也覺得不舒服、不愜意——何況他根上看不起周揚等一干人。他們打出自己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並在魯迅彌留之際，相當率直兼倔強地(馮雪峰和胡風的性情)將分歧公開。

現任黨團書記的周揚和曾任書記、現任特派員的馮雪峰，誰都不服誰。大家在權力(「無產階級文藝第一旗手」)上較勁，祭出來的卻是冠冕堂皇的無產階級大話。「兩個口號」(「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從那時候一直爭了半個世紀，把後世既熱愛黨又崇敬魯迅的青年弄得一頭霧水——直到大家都死掉，直到「第

一旗手」的含金量逐日降低，直到毛澤東與魯迅都不再是神。

口號本身沒什麼了不得，對抗日、對反法西斯也沒有什麼促進或者促退。從1936年到1945年，沈從文該寫《湘西散記》還是寫；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徐悲鴻的《田橫五百壯士》也是照譜照畫；連郭沫若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和直到今天聽起來還挺像樣子的八路軍與新四軍軍歌，也沒因為這兩個口號有任何影響。

如果這樣的爭執發生在別的領域、別的人群中間也就罷了。無奈文學與藝術最大的特色就是與公眾見面——不僅作品，還有人物，更不要說解疙瘩的障礙還在毛本人。在對周、胡二人之經歷與作風大致瞭然情況下，毛其實樂得高高在上地看戲，有興致的時候也下場挑撥一把。他本與魯迅格格不入（即專制者與反專制鬥士的格格不入），卻不妨礙在他沒登上專制寶座之前的某一時刻、某一局面和某種情緒下，對此人破格垂青（兼利用），根本不顧與他更近的當道一派（「四條漢子」）的尷尬。

最為馮雪峰和胡風看不起的周揚，揣摩聖意的本領遠在他們之上，更遑論攀附與網羅。對左翼文藝及其人士比較熟悉的好幾代中國人，都清楚馮、胡黨羽個個恃才傲物，而周揚的嘍囉則成功霸住了幾乎所有的關鍵崗位——這也是爭執久拖不決的原因。

行文至此，著者禁不住說說半個世紀後的一樁同樣把大家弄得一頭霧水的公案。那是在文革之後思想解放發軔期（1983年），有所醒悟的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際，做了一個關於「異化」的報告——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恭奉馬列為鼻祖之立場絲毫未變，只不過以前光撿一條胳膊，如今往前邁了一小步，說還有條腿哪。不料依舊自詡為意識形態總管的胡喬木立刻發難，逼周揚檢討，直把這名前總管逼到「抑鬱而死」。官家及半官家思想宣傳界一個個大眼瞪小眼，只有「兩個口號之爭」的當年親歷者夏衍把迷局一句話點明：「這個報告讓喬木去做，就什麼事也沒有了。」[27]

說到這裏，著者再次禁不住向讀者詳述另一樁也是發生在1935這一年，同樣被教科書「忽悠」得莫衷一是的公案——「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

先看我們耳熟能詳的正統史家（共青團網）的敘述：

>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1935年，……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於8月1日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2月9日，北平學生六千餘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示威遊行，要求抗日，促進了中華民族新覺醒，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28]

讀者看出其中的要點了吧？第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第二，與《八一宣言》的關聯；第三，「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具體到那個年代，最主要的當然是掌握了資源的國府；第四，「掀起高潮」。1937年之後的全民抗日，黨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似乎是功不可沒。

事實果真如此麼？先說共產黨領導。

先說陝北。1936年6月，剛剛入黨的黃華陪斯諾訪問陝北，初次見到了毛澤東。毛高興地感謝黃華贈送的從西安帶來的託周恩來轉交的載有魯迅文章的雜誌，他高度評價了一二九運動，稱之為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群眾運動，只是因為消息閉塞，在一二九運動後好久才知道。毛說：北京的年輕人幹得好哇。[29]

可見與黨中央的領導無關。地方呢？比如華北局、河北省委等。

1927年至1935年，白區組織處於低潮時期。當局的鎮壓和自身「路線錯誤」，使得在各種身份掩護下的共產黨員，有如星星之火，時燃時熄；零散的黨員與組織的關係，也是時斷時續。

1935年1月，中共河北省委派人到北平恢復黨組織，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員會」。四年前到北平讀書（師大文學院）、日後成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和「彭德懷同黨」的周小舟，在這年春天入黨，並納入該工委，擔任「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北平分會」負責人，任務是「把北平各大、中學已經垮掉了的學生會恢復起來」。[30]

1935年6月，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前來建立「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是王學明，成員有彭濤、冷楚、谷景生。[31]

10月，山東發大水，北平各校成立「水災救濟聯合會」；11月18

日，北平學聯成立，女一中郭明秋為主席，清華大學姚依林為秘書，二人當時都還不是黨員。但學聯中有黨員谷景生、周小舟等——周到月底就從學聯撤出，轉到北方局聯絡部。

11月19日，國民黨舉行五大，宗旨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也不輕言犧牲」。北平各大學教授支持當局，抵制建立特殊政治機構的「自治運動」，[32] 12月2日聯合通電。

那麼，有沒有「地下黨領導機構」呢？王凡在2003年特別撰寫了將「（一二九）歷史真相逐漸廓清」的長文。據該文披露，谷景生等戰鬥在北平的「臨時工委」，根據國際新精神，領導了這場運動：

> 彭濤、谷景生、周小舟他們並沒有直接得到來自黨的上級機構的指示。他們只是通過各自的渠道，從外文報刊上看到了7、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33]

且不說這三名沒有受足夠教育就捲進革命大潮的青年，有怎樣的外文水準。我們姑且認為他們對國際精神的領略比張聞天（他到了1936年1月才派出到北方貫徹這一精神的劉少奇）、周揚（這年12月中才召開解散文委的第一次會議）都早都快，在這裏只問，發動學生上街抗議宋哲元當局，與國際新精神究竟相符還是相背？新機構「北平臨時工委」又有多大的發動能力？

據王凡的文章，谷和彭都是曾經「受黨派遣滲入同盟軍，於兵敗後和組織失去聯繫」的前中學生。到1935年12月，年齡最長的周小舟當時剛剛從北師大國文系畢業，[34] 其他幾位職業革命家的公開身份也都是學生。[35]

據臨委書記谷景生說，他們聽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將成立的消息，北平學聯開會，決定在12月9日舉行學生大請願。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機構呢？它成立於1935年12月，是中國政府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抵制了「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之後，經雙方談判而最後組建、由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任委員長的跨省行政機構。谷景生等青年愛國者最為憤恨的，當然是「日本軍事壓力」，

但在「當此國難深重之際」，除了學生，還有國民政府，還有民間各界——他們也是愛國者，也在為民族未來盡着自己一份努力。清華大學理學院與物理系創建人葉企孫的弟子虞昊，直到近年，才在他的文章〈「一二．九」運動與張申府〉中，披露出教授們如何防止「奸人」在極其複雜的局面下渾水摸魚：

> 約1990年左右，筆者在葉企孫的遺物中發現了一張葉企孫鉛筆寫的手稿，是「一二．九」遊行的前幾天，葉企孫、梅貽琦、陶孟和、胡適和張奚若等人聯名向全國各界發出的通電，全文如下：
>
> 「連日報載通電，有謂河北時局緊張，要求『自治』甚至有謂『危機四伏』，提議自保者。同人等生長河北，深知各縣並無此種情形，所謂自治諸要求，全係奸人所播弄、僱員所製造，絕非民意。當此國難深重之際，用全國統一力量尚虞不能挽救，欲求一省之自保，豈可得乎，深望鄉人切勿輕聽讕言，受人愚弄，迫切陳詞。」
>
> 很顯然，這個全國通電的矛頭直接針對當年11月25日漢奸殷汝耕在日寇頭目土肥原指使下，在北平附近通縣成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36]

他們那時沒有估計到激情賁張的學生可能有所動作——姚依林等人聯絡的是張申府那樣常在課堂上解說政治局勢的導師，而非他們一干行動多受制於大腦而非腎上腺之輩。

現在回過頭來說「一二．九」。谷景生書記說：作出關鍵決定的會議是在他的住處召開的。與會者裏邊，有一名在後來所有的史書裏都提到的關鍵人物、運動期間大家都看得見的「領袖」、「學聯」主席：郭明秋——北平女一中高二學生。

「領袖」郭明秋在回憶錄裏斷言「參加『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完全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並詳述了自己十幾歲的時候怎麼一步步靠攏共產黨：

日，北平學聯成立，女一中郭明秋為主席，清華大學姚依林為秘書；二人當時都還不是黨員。但學聯中有黨員谷景生、周小舟等——周到月底就從學聯撤出，轉到北方局聯絡部。

11月19日，國民黨舉行五大，宗旨是「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也不輕言犧牲」。北平各大學教授支持當局，抵制建立特殊政治機構的「自治運動」，[32] 12月2日聯合通電。

那麼，有沒有「地下黨領導機構」呢？王凡在2003年特別撰寫了將「（一二九）歷史真相逐漸廓清」的長文。據該文披露，谷景生等戰鬥在北平的「臨時工委」，根據國際新精神，領導了這場運動：

> 彭濤、谷景生、周小舟他們並沒有直接得到來自黨的上級機構的指示。他們只是通過各自的渠道，從外文報刊上看到了7、8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33]

且不說這三名沒有受足夠教育就捲進革命大潮的青年，有怎樣的外文水準。我們姑且認為他們對國際精神的領略比張聞天（他到了1936年1月才派出到北方貫徹這一精神的劉少奇）、周揚（這年12月中才召開解散文委的第一次會議）都早都快，在這裏只問，發動學生上街抗議宋哲元當局，與國際新精神究竟相符還是相背？新機構「北平臨時工委」又有多大的發動能力？

據王凡的文章，谷和彭都是曾經「受黨派遣滲入同盟軍，於兵敗後和組織失去聯繫」的前中學生。到1935年12月，年齡最長的周小舟當時剛剛從北師大國文系畢業，[34] 其他幾位職業革命家的公開身份也都是學生。[35]

據臨委書記谷景生說，他們聽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將成立的消息，北平學聯開會，決定在12月9日舉行學生大請願。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機構呢？它成立於1935年12月，是中國政府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抵制了「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之後，經雙方談判而最後組建、由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任委員長的跨省行政機構。谷景生等青年愛國者最為憤恨的，當然是「日本軍事壓力」，

但在「當此國難深重之際」，除了學生，還有國民政府，還有民間各界——他們也是愛國者，也在為民族未來盡着自己一份努力。清華大學理學院與物理系創建人葉企孫的弟子虞昊，直到近年，才在他的文章〈「一二．九」運動與張申府〉中，披露出教授們如何防止「奸人」在極其複雜的局面下渾水摸魚：

> 1990年左右，筆者在葉企孫的遺物中發現了一張葉企孫鉛筆寫的手稿，是「一二．九」遊行的前幾天，葉企孫、梅貽琦、陶孟和、胡適和張奚若等人聯名向全國各界發出的通電，全文如下：
>
> 「連日報載通電，有謂河北時局緊張，要求『自治』甚至有謂『危機四伏』，提議自保者。同人等生長河北，深知各縣並無此種情形，所謂自治諸要求，全係奸人所播弄、僱員所製造，絕非民意。當此國難深重之際，用全國統一力量尚虞不能挽救，欲求一省之自保，豈可得乎，深望鄉人切勿輕聽讕言，受人愚弄，迫切陳詞。」
>
> 很顯然，這個全國通電的矛頭直接針對當年11月25日漢奸殷汝耕在日寇頭目土肥原指使下，在北平附近通縣成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36]

他們那時沒有估計到激情賁張的學生可能有所動作——姚依林等人聯絡的是張申府那樣常在課堂上解說政治局勢的導師，而非他們一下行動多受制於大腦而非腎上腺之輩。

現在回過頭來說「一二．九」。谷景生書記說：作出關鍵決定的會議是在他的住處召開的。與會者裏邊，有一名在後來所有的史書裏都提到的關鍵人物、運動期間大家都看得見的「領袖」、「學聯」主席：郭明秋——北平女一中高二學生。

「領袖」郭明秋在回憶錄裏斷言「參加『一二．九』學生救亡運動，完全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並詳述了自己十幾歲的時候怎麼一步步靠攏共產黨：

> 一九三五年春(也可能是一九三四年秋),雖然北平黨組織已經被破壞了,但並不等於從此就沒有共產黨的力量了。
>
> 從「九一八」到「塘沽協定」,特別是到「何梅協定」,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也是處於一個大動盪的時期,階級關係有了重大變化。所以,大家都變得激進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擔任過校長的孫蓀荃(她聽過李大釗同志講的課,我聽說她加入過第三黨,在抗日的問題上,她是左派),就因為她積極支持「九一八」後的抗日救國學生運動,而被國民黨排擠掉了校長的職位。她是北平女師大畢業的,因為她有學問,在群眾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師大有些學生支持她,就連師大為謀職業——教書吃飯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擠後,改教高中語文和歷史,是我的班主任,一九三五年的下半年,孫蓀荃在我們班先後公開講李大釗同志的生平、《縱與橫》、《唯物史觀》;據她講,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長街,就是李大釗同志找的,而且創辦女一中,就是為了爭女權、反對北洋封建軍閥的統治。孫蓀荃雖然沒有進共產黨,但她對共產黨有過相當大的幫助,表現在對「九一八」以後和「一二・九」的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方面。孫蓀荃當時還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並且說「共產黨要和我們合作了」。學校中的進步教師還有譚丕模、梁亦然(當時就是共產黨員了)等。同學中也有黨員,我就是一九三五年春由黨員(同班同學)楊彤介紹入共青團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轉黨的。[37]

我們姑且忽略郭領袖敘述裏邊「階級關係有了重大變化」、「孫蓀荃當時還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並且說『共產黨要和我們合作了』」、「大家都變得激進了」等邏輯混亂之處,從她的文稿中可以比較準確地獲得的信息是,一批初中和高中的女孩子當時正充滿景仰地追隨着她們的班主任(前校長),一名激進的女革命家。

具體到「一二・九」,郭領袖說的是:

> 「一二・九」前幾天在我的教室裏開了一次會,討論「一二・

九」是否遊行。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張兆鏖的意見，他認為，是否遊行，要統計(估計)一下人數，夠八百人就上街遊行。一種是彭濤的意見。他最為活躍，他認為不需要統計人數，只要我們估計一下當前的形勢，是否需要來一個大行動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計能夠超過八百人，辦法是讓那些力量大的學校先出來，然後再到那些力量較小的學校去呼口號，這樣必有內應，八百人眾，超過無疑。例如清華大學進城之後……我贊成了……「一二・九」這天只請願，請願不成就改為示威。

「一二・九」之前彭濤、姚克廣(姚依林——著者按)等同志還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這樣，「一二・九」那天，學生就上街了。[38]

這裏邊沒有書記谷景生。王凡六十年之後說的是：

決定於12月9日舉行請願活動的會議，他(即谷)告訴我們是在他的住處……運動期間和谷景生保持密切單線聯繫的郭明秋天天和他見面，她對外假扮為谷景生的愛人，而實際上她也正是他的第一位戀人。因此，她成為運動期間大家都看得見的「領袖」。這也就是為什麼參加運動各校的黨組織負責人，都不清楚上層機構的運籌情況，也不清楚運動的領導人是誰的另一重要原因。[39]

原來「黨的領導」體現於由書記之戀人出頭這一事實中。
當時還不是黨員的清華大學學生姚依林[40]怎麼說呢？

那時河北省委書記是高文華，組織部長是柯慶施同志，宣傳部長是李大章同志。在一二九運動發動前，我沒有聽說他們表態支持。[41]

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有北平學聯黨團(或「臨時工委」)這麼一回事。當然也許後來做到副總理的姚依林遠比他們聰明(也更誠實)，清楚知道「一二・九」奉行的是什麼精神和「黨」最終對它的扭轉。

1935年5月正好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和北平中國大學教師的陳伯達（他在後來也一直被說成是「領袖之一」），則堅持「運動自發說」：

> 十二月九日當天的群眾遊行示威是……廣大愛國學生自發舉行的。其後，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
>
> 「一二．九」當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了《大公報》才知道發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當時白色恐怖非常嚴重，愛國學生們衝破了國民黨軍警的阻擋，舉行了如此英勇的示威遊行，我心情很激動，大哭了一通，立即買車票趕到北平。在北平我接見了一些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如蔣南翔等，起草了宣傳大綱，並參加組織第二步行動：一二．一六大示威。[42]

「其後，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後到多久？究竟什麼時候黨才開始根據《八一宣言》精神的切實領導？看來，最可信的，應該是劉少奇1937年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了：

> 我們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其他的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黨的組織是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干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數十個中下級幹部。

至於革命局面為什麼落到這樣的地步，他的意見很明白：

> 遵義會議以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此時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內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着。這種錯誤路線（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鬥爭到底，原則上否定策略路線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條件下防禦、退卻的必要性等等），是當時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很明白，不堅決肅清黨內的這種錯誤路線的影響，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執行，就是不可能的。[43]

但「一二．九」確實發生了，上街的中學生和大學生，有的說一千，有的說六千，有的說一萬。一週之後，因為覺得「沒參加上，要求學聯再來一次」（郭明秋回憶），又接着發生了「一二．一六」。這回

給的最多數目是三萬，黃靜和陸璀演講的照片就是這次拍的（攝影師是斯諾）。再後一些，就是次年的「三．三一抬棺遊行」了。至於抗議的對象，當然是「不抗日的華北當局」，具體說就是國民黨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和「賣國賊宋哲元」（駐北平二十九軍軍長）。這能說是新的國際（以及瓦窯堡）精神嗎？

其實，對於「一二．九」運動之領袖，還有另一個出自親歷者至親之口的版本：

> 吾兄申府……和李大釗、陳獨秀有較多聯繫，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建黨活動，曾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因參加「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而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後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44]

言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岱年，這段話發表在他為其兄張申府的傳記（作者為舒衡哲）所作的序言裏。其實除了張教授的這段話，大凡提起張申府，往往說得更確鑿：

> 「九一八」事變後，張申府參與領導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是「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並因此被捕，在監獄中被關七十天。[45]

對此，張申府自己怎麼看呢：

> （12月9日）那天上午，我同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學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飲茶，算是組成了一個臨時公開指揮部。我們看着遊行隊伍行進。隊伍走過西單又往東走時，有一個姓陳的清華學生騎着自行車跟着隊伍，並隨時把遊行的情況到樓上來告訴我們。[46]

四人臨時指揮部！在追隨者冒着大刀、棍棒遊行的時候，兩對男女在咖啡館啜飲！

但這四個人怎麼走到一起去了？原來作為姚依林就讀的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與這活躍的進步青年往來密切：

12月9日的下午，我和其他三個人在喝咖啡，其中有姚依林。我自從有一次協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拿一些錢給他後，便知他是中共地下黨員。另外兩人一個是郭明秋，她是新近成立的學生會的成員。還有一個是孫蓀荃。孫和我那時已經關係非常密切，難捨難分；我們的愛情已是人所共知，一如我們的政治傾向一樣。在「一二．九」學生大規模運動之前的幾個星期，她已積極發動學生抗議政府。

她是一個十分十分獨立的女人。我們在「一二．九」運動期間（1935年）變得親密起來。[47]

原來如此。

據張本人敘述，這對革命情侶從相識到相愛，確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1930年秋季，張申府受聘編輯《大公報》副刊《世界知識》，並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所書》。作為「標榜女權主義的風流人物」，作者收到一封署名「何必」的讀者來信：

如果你是女子，你會怎麼辦？你會不會紆尊降貴下嫁一個頭腦智慧皆不及你的人？你對像陸仙堡（Rosa Luxemberg）這樣的「狂野不羈」的女子有什麼意見呢？

長於「從一個女人跳到另一個女人，從一個政治活動跳到另一個政治活動」的張申府，聞此叩問不啻天降綸音。他委婉又坦誠地回答道：

我確實不能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我不是女性。我不能夠也沒有自稱能夠明白婦女的感覺。但我能夠說的是，我十分欣賞陸仙堡那樣的智勇雙全的女性。

幾個回合之後，雖然有清華校規、有劉清揚和兩個繞膝幼女，張教授還是難於自抑，與投書人「何必」，也即前女師大豪傑、如今北京女一中校長、當代「陸仙堡」（也即五年後的12月9日，與他在西單聯袂指揮運動的孫蓀荃）傾情相與（雖然不過數年前的風潮中，張申府堅決擁戴的，是章教育總長）。

依張申府的見解，革命，包括建黨，目的只為「促進個人內心的解放」，管你們什麼理論、運動，他「只對性特別有興趣」，堅信「革命，必須從最基本的男女關係開始」。

想來「政治上十分活躍，脾氣也很反覆」的孫蓀荃（張申府評語），那時正處於自己火一樣的色慾戀情和革命激情中。喝着咖啡聽彙報的兩人都不曾想到不過一年之後的冷冷分手，也未曾預料女方隨後成就的另一樁婚姻（嫁譚平山）。當然，更讓所有認識他們、關心他們的朋友大驚失色的，是日後這位「智勇雙全」的女性黨派領袖（九三學社、1949年之後的國務院參事）竟死得那麼淒涼驚怵。[48] 而張申府，作為「情不自禁地隨着自己的廣泛興趣走」的「濁世翩翩佳公子」（傳記作者舒衡哲語），會被共產黨和劉清揚前後相跟着各踹一腳，從此銷聲匿跡。

包括郭明秋在內的領袖都強調軍警的殘暴（「我和姚克廣在西單挨了打。軍警用槍把和皮鞭打了我們。」）。但「一二．九」運動之後，學生的抗日救亡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幾與二十九軍，包括學校當局，完全處於對立地位。

為防止進一步激化情緒，「一二．一六」後一週（1935年12月23日），北大、清華等六所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告同學書——

> 連日報紙關於學生的消息，不大登載，以致謠言百出，大家都感到不明真相之苦。我們經過幾天的實地調查，對於近數日來發生的事實，願意與諸位同學說一下：
>
> （一）九日北平學生遊行，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據協和醫院王院長報告，九日有一女生頭部受有微傷，經醫治後即出院。市立醫院，並無女生受傷死在該處；至於城內各校所傳清華有學生傷亡之謠言，查明亦非事實。
>
> （二）連日被捕學生，已完全釋放。九日北平學生遊行，因而被捕的，計北京大學三人，東北大學六人，北平大學二人，已由徐誦明校長于翌日保出……[49]

接着，「黨」也不再是那幾個學生了。瓦窯堡會議之後被派到華

北的劉少奇不許北平的愛國學生再喊「打倒賣國賊宋哲元」的口號，而是派人勸大家改喊「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其結果是：

> 據不完全統計，自「一二·九」運動以後，北平地下黨員由五十餘人增加到近五百人，天津地下黨員由幾十人增加到數百人，北平、天津兩個市委很快就健全了；河北省京東、津地、保屬、直南等地區的黨組織都恢復了；山東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也先後成立起來；……中央書記處在給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一封信上說：「我們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後，有了基本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足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着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50]

分析到此，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共黨史學界和教科書編纂部門一個建議：如果認為1948年不將「一二·九運動」列入辭條的《辭海》編者，是出於反動的政治偏見；那麼，在以上事實已經相當清楚的情況下，是不是應該把「一二·九」這個「在共產黨員參與下，由知識分子與學生出於愛國熱情而自發的街頭請願示威」，定位為「1930年代初左傾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統治在北方白區活動的尾聲」，而非大義凜然的「在《八一宣言》精神指導下，在中共組織領導下……促進了中華民族新覺醒，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至於領導「一二·九」運動的其他版本，比如1935年10月一個燕京新聞系學生怎麼激憤難平地到了斯諾的家，他的妻子海倫怎麼建議發起一場類似於五四運動那樣的學生運動，包括怎麼擬定計劃、起草一系列要求……。最後夫妻二人並排走在遊行隊伍中間……；[51] 又比如朱邵天（陳雲前秘書，後任廣東省外辦主任）等十個燕京、清華學生，在斯諾的鼓動之下，作為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學生代表怎麼去了延安，見了毛、朱等全體大人物……；[52] 以及《八一宣言》英文本如何由陳翰伯藏在美籍教授夏仁德家地毯底下；林楓如何在那裏與黃華、蔣南翔見面等等，正從另一面證明了這一場運動，實際上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導。至於「北方局支持並領導了這一愛國運動，

在黨內是趙升陽(即李葆華——著者按)等同志，還有柯慶施、陳伯達領導的；而直接出面領導運動的是李昌、蔣南翔、林楓、姚依林、徐冰、許德珩等同志」，只能看做是事後按照官職的拍馬貼金，因為有的人當時根本不在北平，有的是「一二．九」運動後才入黨。而那些拍馬貼金的寫手，對《八一宣言》到底怎麼回事，如果不說「懵嚓嚓」，只能歸入宣傳了。

寫到這裏，著者忍不住一定得跟讀者說說那則已經成為「一二．九」招牌的口號，以及這則口號的發明人、在清華校長任上實在是太有「作為」的蔣南翔。據虞昊撰文：

> 1995年出版的《清華人物志三》上有一篇蔣南翔的傳，傳記的開端抄錄了蔣南翔親自寫的一首自述詩，題目為《在「一二．九」運動中》，詩云：「奮力為前驅，開路披棘荊。……星星地下人，曾為舉火人。」這就是說，他才是「一二．九」運動真正策劃發動人。
>
> 傳記竭力描述蔣南翔詩的正確，其最重要事實是：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何鳳元從城裏趕回清華找蔣南翔，……蔣南翔立即躲到清華一院大樓地下室的印刷車間……寫出了著名的《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大聲疾呼：「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對喚起全國愛國學生奮起抗日救亡產生過重要作用……
>
> 可是，198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清華大學校書史稿》和1991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二卷均指出：這份《告全國民眾書》是刊登在1935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報《怒吼吧》第一期上，此時「一二．九」遊行早已結束。可知這句名言只是「馬後炮」，點燃不了12月9日幾千北平學生遊行的激情。[53]

就算這篇傳記蔣本人沒有讀過，但在自撰的詩作裏將自己奉為「前驅」、「披棘荊」、「舉火」，又是什麼意思呢？運動之後才入黨這一事實，為什麼不「老實向組織交代」？直到2001年清華大學九十周年

校慶，清華大學的領導方惠堅教授（曾任副校長和黨委書記、《蔣南翔傳》作者）對來訪同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解釋為什麼把蔣南翔稱為「光明磊落舉火人」時，還堅持說：

> 蔣南翔是中文系學生，也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在1935那一年，他在《一二．九宣言》中寫下「華北之大，已經……」這個名句，震動了當時中國千萬人心……[54]

算不算欺世盜名？如果一屆屆校長都這麼做，怎麼要求學生？

但清華並非歷來如此。

1936年春，當局開始大搜捕。學生裏邊上了「黑名單」的領袖人物，一律受到並不主張他們如此行事的校長、教授盡力保護。張申府沒有走脫，成了「一二．九」運動後唯一被捕的教授。他在牢房裏關愛學生，「每天在獄中為這一群學生開講唯物辯證法，結合牢獄之災講革命樂觀主義和革命人生觀」。[55] 大家出獄後，清華學生把其中四篇講話彙編成一本小冊子出版，書名為《人生的意義》，深受「進步學生」的歡迎。

1936年5月，張申府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正在他頗感自得之際，以張奚若為首的一批教授，聯名要求清華大學當局停發張申府的新學年聘書。梅貽琦校長採納了這個意見。

應該說，無論就學術水準、課堂發揮，還是受學生歡迎程度而言，張申府都是好教授；梅貽琦也是公認的惜才、公正、不畏權勢的好校長。而且，二張（張奚若、張申府）之間從無私仇。這類砸人飯碗之舉，究竟出於何種目的？

無獨有偶。與清華同步，1936年暑假，北大校長蔣夢麟也解聘了許德珩、馬敘倫、尚仲衣三教授。

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史上，這件本應大書特書的事件，卻一直無人論說：

> 清華為什麼會對張申府採取這一決策，所有涉及校史的書幾乎都對此未作解釋，也未見張申府本人對此提出質疑。[56]

這是為什麼？葉企孫的弟子虞昊認為：

這是張申府在「一二．九」運動的言行有違於老清華大學已形成的一種好傳統，不為老清華的主流所容。

老清華大學的這一好傳統的形成很不簡單，是老清華大學創建時，以葉企孫為首的一批「少壯派」名師們團結奮戰多年，終於形成穩定的「教授治校」體制之後建立起來的。首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被師生逐出清華園，與張申府之被停聘有些類似。在這一傳統看，大學是專門培養青年人才的地方，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好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日後以科學救國。校園裏應保證充分的學術民主，但不能允許搞政治、破壞學校的學習環境，損害學生的成才。[57]

這傳統，到了半壁江山已經淪亡的西南聯大時期，或許已成絕響，更遑論紛亂的國共內戰期間，和蔣南翔自己當上了校長的院校改革之後。

曾因為與左派同學打架而被記大過的何炳棣談到1935–36年清華的學生運動時說：

我當時毫無政黨背景，絕對不是國民黨或三青團員，親老家衰，課外自修猶恐不及，何暇參加政治鬥爭。最後參加鬥爭是因為學生會越來越不擇手段，不斷地醞釀製造反政府遊行示威，鼓動風潮，罷課罷考。雖然事後反思我們當時看不清國家的命運，但三十年代的清華教授和多數學生卻都認南京國民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抗日力量，而學生會和北平學聯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動，正是為了削弱和顛覆這個力量。[58]

我們的主人公那時節全副精力集中於教學和撰述——因為有燕京那樣的環境；因為有何炳棣那樣的學生。1935年11月，孫道生在〈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中對已見雛形之「八派」作出定義，[59] 其中張東蓀被認作「新唯心論」的代表：

> 中國新唯心論的領袖，無異議的當推張東蓀先生。中國研究西洋哲學的人，不可謂不多，說到能有西洋哲學中引申出來新的意見，建設新的哲學，恐怕只有張東蓀先生一人。……他的著作很多，總在120萬言以上。如《新哲學論叢》、《人生觀ABC》、《道德哲學》及《認識論》等，都是近二十年中國哲學出版物中第一流的著作。就中以《認識論》一書是他的精心傑作。著者認為張先生在這部傑作中有三點最大的貢獻：一是條理部分認識論；二是名理絕對獨立論；三是普泛架構主義。[60]

當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他不會放棄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1935年4月，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在北平召開，他提交論文的題目即為〈從我們所謂哲學看唯物辯證法〉。之所以單單挑選這樣一個題目，只為切實感到，面臨某種可能到來的變革（革命），哲學不僅在它的發源地，在包括中國的亞洲，都出了問題。這篇論文是作為「發刊詞」發表於《文史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0月10日）：

> 西洋哲學本以玄學（即形而上學）與名學為主幹。在哲學本身上，第一發生問題的就是玄學。其問題是：玄學研究竟能不能成立？這個問題久在爭論了的。但名學卻始終未成問題。換言之，即名學究竟能不能成立卻迄今尚未有人提出這個疑問。不幸的很，自從馬克思主義侵入了哲學界以來，不消說玄學成了問題，即名學亦成了問題。於是整個兒的哲學都成了問題。
>
> 詳言之，即在以前哲學是自足的。雖則科學從哲學分出來，搶了大部分哲學的題材，然而終承認科學有及不到的地方。這個及不到的地方便是哲學的領土。科學出來，即自然科學發達了，我們可以說哲學的領域漸漸縮小，卻不可以說因此把哲學的性質變化了。因為哲學雖縮小了，卻未嘗改易其性質。於是哲學與科學依然是對等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出來則不然。他不是把哲學縮小，從另一方面看，反可以說他把哲學擴大了。但他所擴大的卻不就是我們所謂的哲學。因為他把哲學的性質從

根本上改變了。雖則名稱未改，而實質卻與以前大不相同。這一點是一班講馬氏思想的人們所忽視的。

馬氏的前提是社會組織決定人們思想。即人們的意識形態完全是社會的經濟結構之反映。這樣的唯物史觀不但對於人們的具體意見從社會的階級分野求其所以然之故，並且對於人們思維時所用的範疇亦從經濟史來求其解釋。最顯著又最可笑的一個例，如陶希聖君說在人類沒有貨幣以前，只是物與物交換的時期沒有抽象的思想。好像是說抽象概念的名詞是由貨幣而生。陶君是不是嚴格的馬派，我不管。我於此不過因為此例太顯明，所以舉了出來而已。

總之，在以前哲學無論如何變化，而哲學自身終只是哲學。迨馬派一出，哲學卻變為社會思想的產物了；變為代表社會上階級利益的呼聲了；變為經濟的結構中自然而然所發出來的東西，好像膀胱分泌小便一樣了。我們對於一個人的哲學思想不必看他的傳授，但只須一查他在社會上居於何種階級，便可推定其為何種主張。這便是以社會的「關係」決定哲學的內容。所以這樣所謂哲學卻與我們普通所謂哲學不同，即名同而實不同。因此我以為這乃是把哲學的性質大改變了。在以前哲學好像裁判官，不論他管轄的地方大小，他總可以坐在堂上對於其下的人們宣判。現在卻一轉為當事人，須得聽從裁判官的判決。這個裁判官就是所謂社會學(或馬克思式的社會學更較得當)。

所以以前哲學是自己至高無上，換言之，即是自主的，自己可以當家。現在哲學變了留聲機器，人們唱什麼他方得收進什麼去。這個不同完全起於哲學本身。我實在不懂現在中國一班馬迷還要高談哲學，把哲學捧得高高兒的，而一班研究哲學的朋友亦因為他們重視哲學乃色然而喜。我自信我近來有一個發見：就是我發見馬克思派所用的名詞都與我們相同，而其意義都與我們不同。他們所謂哲學不是我們所謂哲學(亦許就正是打倒我們的哲學)；他們所謂唯物論不是我們所謂的唯物論；他們所謂辯證法決不是我們所謂的辯證法；他們所謂邏輯不是我們的邏

> 輯；他們所謂認識論亦不是我們及所說的認識論。我們來駁他們，他們來罵我們，實在都是無的放矢，非常可笑。
>
> 因此我個人以為馬克思主義之突起於人類思想界是一件絕應注意的事。質言之，即等於一個關。若是不能渡過，則不僅哲學從此葬送，即其他高深思想(如高等數學一類)亦同受影響。所以哲學到了今天卻是遇着了一個難關。

到11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他又在新創刊的《自由評論》上發表〈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猛烈抨擊一黨專政和親日案：

> 各方面的消息似乎證明結束訓政已成為「內定」的了。結束訓政既成為內定，則不久的將來便可變為事實。但我們必須對於結束訓政看一看其中有何種涵義。
>
> 在普通的涵義上來看，似乎可以說結束訓政即是取消黨治。
>
> 所謂取消黨治就是取消一黨專政。取消一黨專政就是同時允許他黨存在。這亦就是取消「黨外無黨」與「黨高於一切」的標語。同時亦就是取消「黨國」二字。因為黨國是「國為黨所有」的意思。……
>
> 我以為國民黨如果真心要結束訓政，最好是在這一次的五全代會以後，即把黨費由國庫支出者完全停止，同時須佈一道命令聲明所有民運必須的黨部指導的法令亦一律停止其效力。如此便可算訓政真正結束了。至於結束訓政以後的開始憲政，恐怕尚需時日。

我們今天已經比較容易判斷，究竟哪樣對中國的現代化更具推進力，是「一二·九」、「一二·一六」這樣的街頭抗議，包括事後歷七十多年而補綴不已的「偉大意義」，還是張教授這樣的言論，以及兩校長的處置原則。終其一生，張東蓀沒有提過他的燕京同事斯諾，也沒對「一二·九」做過任何評說。

至於其他「陳年的垃圾」，[61] 比如「一二·九」之前，北平學聯黨

團怎麼在國民黨北平社會局備案，取得了「黃河水災賑濟會」這一組織的註冊和公開活動的條件，卻在事後不另備案，即將「賑濟會」改為「北平大中學校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還將賑災款用到「一二．九」運動等(郭明秋回憶)。這類為了革命而不惜違法的行為，想來不會受到孫蓀荃、張申府、許德珩一類師長的阻攔，而張奚若、葉企孫等教授與校長們，也已無力追究。

此後，在革命的、享受黨的陽光雨露的中國，隨着「五四」、「三一八」、「一二．九」……等年復一年地坐享精神祀祭，群毆、焚燒、款項挪用、特權享受、率先逃命……只要「大方向正確，手段是可以不計的」——成了日後中國學運領袖在公德與私德領域我行我素之護符。

3　評共產黨「轉向」

1936年2月，幾乎就在劉少奇銜命抵達天津的同時，一篇文章出現在《自由評論》第10期上：〈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刊出時間為2月7日。

這是「清共」之後，國統區第一次公開發表的不以「共匪」對待共產黨的文字。

這麼早就公開(而且基本正面)評論《八一宣言》，瓦窯堡的共產黨沒有可能做；京、滬、平、津剛剛死而後生的地下黨尚沒氣力做；後來與共產黨生死難分的左派人士隊伍還沒有集結成功；對「共產」、「革命」懷有無從化解之警惕與反感的自由派人士不屑理會——但這篇文章出現了，而且出自對共產意識形態從無寬諒的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而這位教授，還是大家記憶猶新的與紅色寫家數次論爭的中流砥柱。

他從哪裏得到的消息——北方救國會？燕京同事斯諾或者林邁可？

國家政治經濟結構如此，教育程度如此，社會組織成熟程度如此，如何面對？拼命、造反、殺出一個新天地……激憤之情在人群

中湧動。他其實早在「火燒趙家樓」之前就有議論：「完全拒絕之，為勢既不能；完全承諾之，其果亦不良。則捨調和外無他策矣。」

至於如何調和，只有：

> 當採納其主義中之含有至理者，……然後對其過激之謬說提起正確之輿論以宰制之，則其勢必漸殺也。要之，一方面於經濟制度社會組織先自改良，此為釜底抽薪。他方面於思想研究，致其精微明辨，則人民有反覆之思維，能自辨是非，則感情之論不足以動之也。易言之，即過激主義之穩健化。[62]

這回，共產黨不再和當局搶地盤，而是要聯合抗日，自然屬於「其主義中之含有至理者」——至於究竟是主義中之至理，還是審時度勢的策略，張教授已經難於沉下心細細辨析。因為那時日本南侵之野心，已經無人不曉，而剛剛開過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以580多票的多數，通過「委員長所提的親日方案」，成為政府的「對日根本方針」——專權者又出此令人羞憤之下策，讓他傷心不已。

他的願望，或者說那時候有知識、有議政能力的人的共同願望，是「把全國有政治能力與主張的人們一齊拉在同一戰線下。倘能如此便是中國的一個大轉機。中國已經錯過了許多的機會，使我們一般老百姓失望又失望」。

張教授素以不苟言笑聞名於師生間。文章平實理智，從沒有過「哎喲喲」等興歎。北上燕京任教之後，所感受的，是難得的讀書人做學問的時光。課上課下，自信而自得。然而這回，《八一宣言》發表了。在張教授看來，該文不僅言辭至理至性，竟然出於整日叫嚷「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之「赤匪」之手——不能不令人動容。雖然沒如瀕臨危境的洛甫、博古，哪怕周揚、夏衍那樣，感到「如獲至寶」、「就像一盞明燈」，[63] 但作為愛國者，特別是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的批評者，張東蓀受到深深的震撼——他們變了，中國共產黨人，從根子上變了：

> 一個向來主張除私產的黨，現在居然說保護財產和營業的自由

了。以一個向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黨，現在居然說實行民主自由了。以一個向來主張完全世界革命的黨，現在居然說為國家獨立與祖國生命而戰了。以一個向來受命於第三國際的黨，現在居然說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了。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鬥爭為推動力對於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願意與各黨派不問以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於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64]

似乎是，曾經有過的論爭和論斷變得不再重要。他正要以前論敵的身份，力排眾議，向大家彰示，「全國大合作」抗擊敵寇的局面太值得珍惜，而為這一局面作出「轉向」的共產黨，多麼勇敢光明、意義重大：

我所以提出問題來討論是因為這件事在思想界有相當的關係，亦可以說，我認為共產黨的轉向，是最近中國思想界上一件大事。但各報雜誌上從無論到。這未免是一種卑劣心理的表現。我因為沒有人來說話，所以才特別多說幾句話。[65]

既然是「中國思想界上一件大事」，張教授為什麼把它發表於梁實秋的《自由評論》，而沒有作為自己黨派的發言，發表於《再生》？如果我們對張教授了解得更多一些，估計就不會以常人之邏輯衡量他的作為了。交發該文，從張、梁二人之友情而言，是對創刊不久的《自由評論》的支持（「還稿債」），而沒有看作是國社黨一次重大的行動——從而也反證了該黨的鬆散。或許，雖說被選做總務委員，張東蓀本人對黨務，似乎並不十分「上心」。從根子上，他只是一名關注時勢的學者，而非黨人。

但這些，都不影響他徑直說出自認為對局勢最中肯的建言。不錯，對於專制，他不僅有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的感受，更有學理層面的警惕。在理論上，他認為「過激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或馬列主義，是「產於俄，傳於德，今則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或稱「西班牙傷風症，流行於全球也」，而「在中國勉強實行，將貽害無窮」。行至

中國，比如北京爆發的所謂「首都革命」示威遊行（1925年底的火燒晨報館事件），「讓群眾運動演變成暴力事件，既是革命黨人的主張，也是近代中國的宿命。透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寬容的風氣，就會變得更加殘忍，更加可怕。」

對他而言，隨着整個自由世界的反省與探索，「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強國」則近於一個寄託了期待的模糊憧憬。雖然一批文人組黨又發政論，他從來沒有想過、也從來沒有在行動上把自己當成政壇人物。於是，對政客「怎麼有利於自己就怎麼説」（並不一定做）這一常態，他居然沒有絲毫警惕。這回也一樣。東蓀先生天真到無可救藥地在評説中指斥「唯黨是從」之要不得，並且死抓住人家共產黨「不過説説而已」的東西不放：

> 所謂黨團作用乃是隨着共產黨的潛伏運動而生的一件東西。即對於黨外的人只講利用，指認為工具。換言之，即對於黨外無真誠只有詐偽。在我們看來這種黨團作用實在是一個毀壞人類天真性情的東西。……
>
> 共產黨必須聲明在國難未度過時期中（至少十年內）放棄共產主義活動，以使一般怕社會主義革命的人們安心；共產黨必須把其軍隊集中在一個區域，以便萬一有事則可擔當一面；共產黨應在其統治區內實行「救災安定民生」、「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加薪加餉」、「實行免費教育」等政策，承認只有一個中央政府，蘇維埃政府應變為地方政府。……
>
> 我們歷來不反對國民黨與共產黨，而只反對一黨專政，以為一切罪惡皆由此而生。現在共產黨提議合作是顯然放棄了專政，這真是一件最可慶幸的事了。[66]

他的一個重要思索（起碼可以看成敝帚自珍的命題）——「中間性的政治路線」，雖然要到1946年才鄭重提出，但在此刻，從對共產黨轉向的讚揚中，已可見端倪：

> 大家須知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以外，實在有很多的人們，是於經

濟贊成社會主義、於政治相信民主主義的，這一類人們雖尚未形成具體的大規模組織卻是很有潛力。我相信有許多同情於共產黨的人卻其實只是這一類的信徒。[67]

他本意是對學界和公眾發言，沒有料到評論發出後，居然受到新到任的中共北方局書記(後來的共和國主席)的回應。劉少奇這封署名「陶尚行」的信，直接寄給了該文作者，即張東蓀本人，還着重說明是「明白公開的答覆」，並希望「將這封信在貴刊上發表，並在貴刊上答覆我」——特別具有「凡事長於自作主張」的「少奇同志」特色。

然而，儘管明知(在內部也如是說)自己黨過去沒少犯「鮮血和性命為代價」的錯誤，但陶尚行的這封信，依據「黨內黨外有別」之原則，仍是一套官話，見不到絲毫的誠懇：

中國共產黨向來沒有主張過：在中國立即要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立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的事不應由自己來解決、而應由他國人來解決，共產黨與中國不應為中國民族自由獨立與生存而戰。共產黨並沒有主張過無論什麼時候對於一切都不應妥協合作。

相反，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曾經長期合作過。共產黨歷來就號召全國人民為中國的完全自由獨立與領土完整而奮鬥到底！素來就反對他國人對於中國民族內部的事情橫加干涉。[68]

就算張教授對「國際」與中國支部幾乎是「父子黨」的關係知之不詳，對「中國支部」拿人家錢，放棄國格、緊跟蘇聯的一次次良知喪盡之舉，願意暫時放在一邊，但對這樣「沒理狡三分」、臉一抹即不認賬的官腔，一定已經相當厭倦。用現時的話說，就叫做「太沒勁了吧」！他把來信交給《自由評論》，表示本人「對於這個問題沒什麼話可說了」。

《自由評論》將轉來的文字以〈關於共產黨的一封信　致自由評論編者並轉張東蓀先生〉為題刊於4月號，相當平實地加了一段「編者的話」：

陶尚行是什麼人，我們不知道，很明顯地他是在替共產黨辯護，但是他是在用和平辯論的態度，不是一般共產黨常用的謾罵詛咒的態度。

文章發表後，一名許姓讀者又致信張東蓀，對陶信提出批評。5月17日，張東蓀再提筆，先在《自由評論》上發表〈關於陶許兩封信的感想〉，接着，也許對於共產國際的大會有了較多的了解，也許是對作者表現的「共產式的思維方式」深深惋惜，終於又提起筆，為自己的刊物《再生》寫了〈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69] 表達了對陶尚行站在本黨之立場上所作「辯護」的感受：

我們在局外認為共產黨轉向了，而共產黨的代言者偏要說是向來一貫的，不能不令人覺得這是一種怙惡。換言之，即這是由於一種「面子」作用在那裏作祟。……

我們未嘗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轉向又何嘗是中國共產黨單獨自主的行為呢？依然只是受了世界共產黨的轉向之波及罷了。

因為他們是習慣於生活在指導之下，只知奉令承教。他們對於上級所發互相衝突的兩個使命，只可一樣去服從，不知其中有矛盾。即使知道有些相反，亦必只好加以強辯，說明其可以聯接。這是他們的職務，恐怕亦就是唯一的職務罷。因為不如此，則鐵的紀律不能維持。[70]

行文到此，不得不佩服張東蓀、梁實秋，以及那位許姓投書人之目光銳利。因為幾乎半個世紀，三代中國人（無所謂共產黨員抑或並非該黨的人）都生活在「陶尚行」冠冕堂皇的模棱謊言裏。直到毛、劉離世，到部分歷史文檔可供專門研究者調閱發表，我們才知道，在他們這場文字交「不過一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期至1935年夏，翻檢中共蘇區的領導人與國際的請示與指導，還都是如何鞏固根據地、如何保住紅軍實力。在反圍剿的艱難環境下，腦子裏基本沒有『抗日』這一概念」，[71] 在知識界、輿論界，共產黨專注的，依舊是鄉下的農民運動和城市的集會鬥爭。

可能太着重自己的專業了(方法論與認識論),張東蓀覺得,共產黨這個黨,壞就壞在「思維方法不對頭」。而思想界的責任,則是「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反對共產黨就只是專在於其思維方法的態度」。不知是否出於教師的職業習慣,對於共產黨,他竟然鄭重發出經歷史證明,只可稱之為「滿擰」的呼籲:「這個轉向在政治上與結果上亦許不十分大,而在思想上與教育上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因此我覺得全國教育界對於共產黨的這個轉向應得重視。」[72]

如果從政治學原理出發,此番交手,其實屬於他最關心的權力制衡:抗擊專制的力量走上了正軌(民族聖戰)。對此,他立即反應,表示衷心歡迎。完全沒有想到,他的「以正視聽」的做法,正合了共產黨統戰的需要。

不知道劉少奇在他向中央的報告裏怎麼評說這幾篇「雞同鴨講」式的你來我去。目前查到與此有關的,只有1936年8月5日中央致信河北省委電:

> 我們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後,有了基本轉變。……能採取適當方式,直接影響全國統一戰線最有權威的刊物,努力擴大抗日戰線,……[73]

胡服即劉少奇;最有權威的刊物,應是《自由評論》和《再生》。在絲毫不客氣的批評面前,報以如此大度的回應,在共產黨,特別是執政後的共產黨,幾可告闕如——而這回的這個態度,是因為自身依舊處於艱難中,還是少奇同志正要得到重用?

其他愛國者呢?據新中國正史,國民黨左派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都得知了這份《八一宣言》,他們「表示衷心擁護。在上海從事救國運動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傳閱,奔走相告,一致認為《宣言》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反映了他們的願望和要求。『第三黨』根據《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黨綱,制定了同共產黨合作,實行聯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74]

張教授有關「政治上」和「教育上」的「意義」,錯在哪裏了?或者說,他的「滿擰」,到底擰在了什麼地方?

我們已經知道，由世界局勢引發、國際政策調整而導致的中共這回的「轉向」，在「政治上與結果上」效果鮮明：共產黨從此擺脫「赤匪」之惡名，在全民族抗戰中理直氣壯地壯大崛起，終於拿下全國。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和洛川會議之後所走的幾步毫無心肝卻極具成效的棋，連周恩來、彭德懷一時都看不出來，更不要說教授們了。好在《自由評論》的編者除了點出「陶先生似乎把共產黨說得太好了」之外，尚有下邊一段論說，不知是不是指毛澤東親自部署並親臨指揮的「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黃河東征」(1936年2月間)：

> 抗日救國的事業，必須以全國一致為先決條件。局部抗日，是於國家有害的，因為一部分鬧出亂子之後必至還有一部分來簽辱國條約。必需全國有力者都有死裏求生的決心：誰都不準備苟安偷生，然後始可以言戰。……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們以數萬飢餓之眾高揭抗日的旗幟渡河入晉，這樣能否收抗日之實，誰都不免要懷疑的。恐怕事實上只能糜爛地方、惹起敵人加速進攻吧？

這一步棋(紅軍抗日先鋒軍渡黃河東征)，正是瓦窯堡版《八一宣言》的具體落實。目標為「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聯繫起來，擴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紅軍」；具體步驟是「聯絡駐陝北綏德米脂的八十四師(高桂滋)，攻打賣國賊閻錫山」。行動結果，有學者作了具體敘述：

> 中央紅軍到陝北後，又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這樣貧困的地方，一下來了這麼多紅軍，當地農民根本無力供養。劉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錢來支援中央。錢的問題真是叫人頭疼。彭德懷、林彪電報告急。因為沒有棉衣，沒錢買柴火，戰士都凍壞了。毛澤東意識到紅軍生存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
>
> 1936年2月20日，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紅軍開始東渡黃河。三天的渡河很順利，只遇到閻錫山部隊的輕微抵抗。一進山西境內，紅軍就感到比陝北富裕得多。童小鵬隨中央直屬隊

> 到了石樓縣的下堡鎮，看到這個地方「雖然只二百餘人家，街上也不過幾十間舖子，但是它的建築，尤其是居民家中的佈置，排場得很」。王平帶着紅十團在洪洞縣東南的蘇堡鎮打土豪和籌款。一天，有個老長工報告，某地主家有個暗窖，裏面藏了不少東西。紅軍找到暗窖，打開一看，光皮襖就一百多件，還有不少古董字畫。有一個銅盆，用手在盆邊摩擦就會飛起水花，據說價值十幾萬元。但是這些文物字畫都不如現大洋對紅軍更有用處。僅在蘇堡鎮一地，紅軍就籌款上萬元。
>
> 紅軍進了山西，閻錫山急忙調兵加強太原以南的防禦。誰知紅軍卻掉頭向南，晉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區，紅軍所到，並不主動找晉軍作戰，而是打土豪、籌款擴軍。在山西邊打邊休整了兩個多月，毛澤東認為東征目的已經達到，不與敵人決戰，下令主動撤兵回陝北。在掩護紅軍渡河回陝北的戰鬥中，劉志丹軍長不幸中彈犧牲了。
>
> 紅軍東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短時期內紅軍擴充八千人，籌款五十多萬元（一說三十多萬）。對於貧困的紅軍來說，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75]

其實，就算紅軍手裏不是土造槍，而是大刀棍棒，石樓、洪洞那些富戶也絕不是對手。出發之前，偉大領袖已經估計到這一絕不僅僅是五十萬元的勝利。他氣勢雄偉的《沁園春．雪》就在這年2月寫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這是在「政治上與結果上」。東蓀先生期待的「思想上與教育上」呢？著者傾向於不在這裏浪費筆墨——我們每個人從自身經歷都能知道，如果從那時候起就發生令教育界和學界感到欣喜的轉變，還會有後來三十年從整風、搶救……直到文革，愈演愈烈的災難麼？

因為談到本書主人公「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很難不向讀者諸君介紹另一個很有人情味也很溫馨的故事——也發生在教授間，也在那個時候：

> 1936年毛主席到達陝北後，周炳琳先生、許德珩先生、周夫人

（新民學會早期會員魏璧女士）同許夫人（新民學會早期會員勞君展女士）一起商量給毛主席送些陝北急需的東西，並由魏璧女士和勞君展女士一起坐洋車（人力車）到東安市場選購了一批金華火腿、懷錶（當時那種只有會移動的阿拉伯數字而沒有時針和分針的懷錶）和布鞋，用周炳琳、許德珩、魏璧、勞君展等人的名義，委託在北京的中共地下黨人徐冰教授和夫人張曉梅女士送到陝北給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後，曾回信表示「衷心感謝」。[76]

毛的回信如下：

各位教授先生們：

收到惠贈各物（火腿、時錶等），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無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一切迅速地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為驅趕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謹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1936）十一月二號[77]

本節結束前，特別希望讀者還記得共產黨拿下天下之後的交椅分派。許姓作者不知何人；梁實秋已經遁走台灣；張東蓀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許德珩得到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水產部長；周炳琳辭北大法學院院長之職，專任經濟系教授——但那是在1949年。到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裏，周教授再也不能回到1936年時候的心情，即所謂表現「態度惡劣」是也。情況報上去。毛澤東怎麼批示的呢：

彭真同志：

送來關於學習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78] 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作法。[79]

周炳琳教授率直坦誠。他曾經真心喜歡的，是受專制欺壓的、走上團結抗日道路的毛澤東；厭惡的，是扼殺自由的專制者（1946年制憲國大由國民黨包辦舉行，周炳琳曾站在共產黨一邊，勸胡適不要出席，說：「此時赴會，是否為賢智之舉動，琳以為尚值得考慮一番。」）。除了1952年的「惡劣態度」，到反右期間，他更認為「紂之惡，不如斯之甚也！」

毛澤東放他一馬，出於念舊，抑或留下個把真性情人以粉飾場面？

4 國民參政會

局面膠着。

「不能把國家的命脈斷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不能為個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這是國家元首蔣介石強虜當前「隱忍退讓十年」（從濟南慘案到盧溝橋事變）為自己立的口訣。但是，沒有等他自己奮而迎戰，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生。國共合作、聯合抗戰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事變中，斯大林的親自介入搭救，使得「士官生＋青皮」出身的蔣介石，獲得一種受到頂級強人青睞而生發的自我期許。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看來須暫時讓位了，以回應朝野上下之一致呼聲「全民攜手、持久抗戰」——這不僅僅是向給錢給槍的斯大林作出的姿態，更是贏得人心的基調。因「獨裁」、「訓政」而挨的罵……全可以暫不計

較。除了富有道具效果的黑披風、白手套之外，蔣某還要在言辭、心胸上更像個元首、領袖。

「西安被難」驚魂初定，汪、蔣等人即定下了7月中之後（在他們避暑的地方）「廣泛聽取各界知名人士意見」。當局打算邀請二百餘人前來廬山，分三次舉行「談話會」，名單已經汪蔣親定，不計對元首曾經有過的態度；不計政治底色；唯一的標準是議政能力。來賓包括「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但大家都以個人身份出席，連入座都按姓氏筆劃，可見當局對「黨外有黨」的忌諱。更有甚於今日與共產黨共同議政的各民主黨派者，談話會還有「一批國民黨中央要員和政府各部門的高級官員作為陪客」，形影不離。

儘管如此，各黨各派紛紛從秘密狀態下浮出，致電國民政府，要求立即對日作戰。以個人身份應邀出席的國社黨張君勱、青年黨左舜生，以及農民黨、村治派的人，包括著名大學校長、實業巨頭等，都在廬山慷慨陳詞。

正在這當口，「七七事變」發生了。

經瓦窯堡會議、特別因西安事變而「挨了（蘇聯之）䟫兒」的共產黨，雖然一直與當局舉行秘密談判，而且周恩來等當時就在廬山，也沒有受到邀請。儘管如此，在「七七」第二天，共產黨還是發出「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的電報；身份依舊是「紅軍將領」的彭德懷、林彪等，也鄭重表示「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名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

張東蓀是廬山談話會受邀者之一，也前往並佩戴了圓形白底藍色「五老峰」會徽，[80]但幾乎沒有説話。與當時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精衛和副主席蔣介石（這次談話會主人），不僅毫無淵源，也沒有好印象——儘管蔣的此次演説幾乎立刻成了全體國人朗朗上口的誓言：「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81]

日本全面侵華所造成的民族危機，將中國的「第三勢力」（張東蓀在自己的文章中稱之為建設民主國家的「新勢力」，國社黨自然包括在內）正式推到前台。張東蓀沒有被「一個領袖、一個國家……」迷

住。對國共兩黨「曲不離口」的「總理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從被提出的二十年代中期,到共產黨得到全國政權之後,張東蓀無論是教學、演講還是著述,從來沒有提過。就算他在那時候對蔣介石的「抗戰到底」之「底」有比較樂觀的估計,但作為思想家,其心愛的命題依舊是對專權的制約:

> 沒有一個專制國遇着了外患,而能夠辦到舉國一致的。一個國家,政治愈專制,一旦有了外患,其政府想要舉國一致去對付,因人民平日不信任的緣故,決不會有結果。……我敢鄭重告訴大家說,以後的出路只看中國能不能有一個新勢力,這個新勢力出來必須把一切舊勢力惡勢力奮而廓清之。[82]

國民政府的諮詢機構於8月組成,其前身是國民政府的國防參議會。第二年3月,國民黨開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和《組織國民參政會案》(望讀者注意此處我們實在太熟悉的「黨說在先」與「唯黨說了算」),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

南京淪陷。

國民黨決定「國民參政會一屆一次會議」改在武漢舉行,參政員當然由執政黨(也就是國民黨)「遴選」,人數也以他們本黨黨員居多,但共產黨及其他當時最為活躍的黨派和團體,都有人入選。比如共產黨參政員的第一名就是毛澤東——雖然他一次會都沒有參加過。後來大家聯手反專制的民主政團聯盟(以及民盟)的骨幹人物,如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晏陽初、沈鈞儒、章伯鈞、張君勱、張東蓀、曾琦、李璜、左舜生等,悉數入圍。僅以當政者願意傾聽意見而言,不僅此前的國民黨,就是當下執政已然六十年的共產黨,都不曾有過。

甚為有趣的是,大會之前,國民黨決議恢復領袖制,推蔣中正為總裁——其聲望之隆,似已在當年孫中山之上。新任總裁再接再厲,推出「化多黨為一黨」計劃——哪怕這一黨的名稱換成別的,不再叫「國民黨」。雄心勃勃的中國青年黨表示接受,老成的國社黨僅答允「考慮」。曾經挺過1924年至1927年從熱戀到斷頭整個過程的中

共，給出的方案最老到，「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懇的態度，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奮鬥」，並再度建議「各黨黨員加入國民黨，仍自保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這不是老戲新演麼？老蔣再以民族領袖自我期許，也不敢冒這個險了。只表示，大家的努力，「國民黨願推誠接納」，只盼中共「履行諾言」。

1938年7月6日，戰時最高民意機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武漢成立，張東蓀作為國社黨代表[83]參加。當時的輿論認為，參政會的形成，是「向着政府方式的民主化記錄上一個真正的進步」；[84]當然也有人把它叫做「大規模的請客」，誰受到邀請，誰不在被邀之列，悉聽主人尊便。細細考察當時諸位參議員的行止，只能說，哪怕到了同仇敵愾的「最危險的時候」，哪怕每個個體的學識、品德均屬於一流，但距離現代社會議會民主、政黨政治，實在還遠得樂觀不起來呢。

只看本書主人公1938年5月的那次武漢赴會之行。

從淪陷的北平出發，張教授不僅須冒遭拘押的風險，還要千里繞道香港。身體從來不曾強健、對種種名分也相當不在意的張東蓀，為什麼汲汲於這麼一次聚會呢？原來他正為自己的一個夢想，或曰一個「設計」所迷，以為救中國於危亡，非此莫屬：

> 當時正是南京陷落以後，政府遷到漢口，我在燕京大學教書。燕京雖然在陷落的北平開了學，我卻潛赴漢口。我那時挾着滿腔熱血，希望將我所想到的這番意見直接向政府陳述。〔到武漢後〕我先把這個意見告訴友人，友人乃對我說，現在的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之上，這一番意見不見得會被採納。我於是大掃興而返。[85]

他想貢獻予當道的「這番意見」是什麼？在武漢見到的「友人」又是誰呢？

將張東蓀前前後後的撰述加以比較，這「意見」，或許就是他反覆掂掇、左思右想而設計出的「由新勢力所推動的中間性的政治路

線」，即「在政治方面比較上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而會面的友人，據已有證據推測，應是陳獨秀。

據當時正在燕京讀書，志願為這趟跋涉擔任教授助手的葉篤義[86]記載，他們是在1938年5月，與另一名國社黨人劉石蓀（秘密參加國民參政會）一同去武漢的。張東蓀曾在旅途中問葉篤義願不願意參加國社黨，葉說不願意，只願意與他個人合作。抵達後，三人住在武昌的徐家棚，張和劉參加了國社黨的會議。

在這前後，他們遇見了原燕大學生、「一二．九」前後非常活躍的共產黨員陳矩孫[87]（或許事先即有約定，否則怎麼會如此湊巧？），由這位前清帝師的嫡孫牽線，張東蓀與託「共同抗戰」之福剛剛獲釋的陳獨秀見了面。據葉篤義回憶：「約陳的信是我送去的，……事後張東蓀對我說，他們的談話沒什麼內容，不過彼此敘一敘近況，陳的情緒很低落等等。」[88]

怎麼會沒有內容的？張東蓀一定把自己希望向政府及諸方政要陳述的那番意見鄭重向老友解說了。這時候已經是1938年而非1919年和1924年，對自己所「創建」的黨和前同志都有了更深了解的仲甫，則為他點破「現在的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之上」。

張、陳會面其實還有另一番意思。據陳矩孫1986年告訴著者，在他的慫恿下，經張東蓀居中聯絡，已被開除出黨的前總書記與共產黨該屆政治局常委、長江局書記之一周恩來見了面。著者當時對中共黨史過於無知，竟然沒有就此窮詰猛追。現在才知道，這次見面，不但已在康生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89]之後，也在陳獨秀的朋友聯名為他辯誣加上陳自己的辯白、[90]包括葉劍英等三人再替黨張目的「覆函」[91]之後，更在張聞天和毛澤東願意考慮陳獨秀提出的「合作抗日三條」，而為處於托派清肅第一線、唯莫斯科馬首是瞻的王明嚴詞拒絕（1937年8月）[92]之後。

即使這樣，張、周、陳三位還是見面了。僅僅出於早年的情誼，還是為以後事情轉圜留出餘裕？不會因為周恩來已經得到指示，須特別敬重國社黨諸位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

(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對這一會見無隻字記載。

還沒等國民參政會開幕，陳獨秀就離開武漢到四川去了。

會議期間，張東蓀還正式與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見了面。當時，國社黨台柱張君勱的《清明正本以救危亡》建議案，因「言論過於激烈」而未能提出。對黨派政治失望之餘，君勱曾與東蓀商議，或許應着手文化改造？東蓀後來回憶：

> 原來在南京陷落後，政府移到漢口的時候，我在漢口與君勱先生商談，本有再辦一個書院的計劃。他託我到桂林去看地，以便造屋。迨我到了桂林，白鵬飛先生要請我在廣西大學任課。我以為燕京大學如能存在，不如在淪陷區多照顧幾個未能入內地的青年為宜，乃即潛歸北平。[93]

寫於1946年的這段話，完全沒有提周恩來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據葉篤義記載，還在武漢準備啟程北歸的時候，張東蓀就曾告訴他與周恩來的見面，以及「回到北平之後，同中共的地下人員繼續合作」[94]——想來延安/長江局/華北局都已經知道了北平一批愛國教授的「救國會」。他自己也覺得，「參政會諸君，沒有大作用，於是自己覺得還不如回燕京來做一些切實的工作好。」

這年的12月，張君勱在民社黨機關刊物《再生》雜誌上，發表〈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主張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我們知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強硬)路線」剛剛借「六六全會」確立，國民政府關於邊區行政的所有意圖，全被看作「意圖侵吞邊區」而立遭拒絕。更有甚者，張君勱的建議，居然越過有形之事務，涉及到形而上之領域：

> 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此，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矣。

對這封信，雖然官方研究(如《毛澤東年譜(1893–1949)》)以不置一詞表達了對它的蔑視，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確實提前十年確定了一生不曾碰過槍的這位作者，被毛澤東十分解恨地定為「一級戰犯」(1949年)的命運——雖然在抗戰勝利後短暫地用得着他那一段，毛還能表現出得體的克制與禮遇。

羅隆基曾表示，這封信不能代表國社黨立場(當時羅還是該黨總務委員)。張東蓀在私下對老友也有規勸。[95] 其實，從學理上對共產黨提出批評，張東蓀的言論並不在張君勱這封信之下。或許，救民族於危亡壓倒了一切——張君勱在對「民族國家」(蔣中正往往以此自詡)的鍾愛與信仰上，是超過張東蓀的。

曾有傳言，蔣中正為此給張君勱的書院撥了款。就算撥款屬實，張君勱的這封信，也絕不是為這區區饋贈所發出的。[96] 但是，二張分歧之「青萍之末」，終於在此時顯現。

註釋

1. 陶菊隱：《蔣百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51–52。
2. 其不一致之處不在理念而在做法，例如在對待共產黨和毛澤東方面。1938年，張君勱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1946年，張東蓀埋頭《理性與民主》並演講〈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文化上的自由主義〉。
3. 見侯祥麟的描述：「哲學教授張東蓀有句話給我印象至深，他說學哲學如同吸鴉片，會上癮，學了哲學就離不了，還想更深入地研究。當時我想，照他這麼說，哲學其實沒有什麼用處。……張東蓀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他拒絕為日本人工作，一直從事抗日的社會活動。」參見《我與石油有緣——侯祥麟自述》(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
4. 事情起源於1929年3月上海市教育局長陳德征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了一個議案〈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提議對「共產黨、國家主義者、第三黨、及一切違反三民主義之分子」，應不猶疑地予以嚴厲處置——法院不需審問，只憑黨部的一張證明便可定罪處刑。胡適先給司法院長王寵惠寫信，並抄送國聞通訊社(對方沒敢登)。接着寫了他

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羅隆基（《論人權》）、梁實秋、王造時等緊隨。當局以逼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拘留羅隆基、查禁《新月》雜誌等手段予以對付，一場保衛人權戰打響。令後世讀史人不解的是，何以共產黨在這場本應看做對自己聲援的論戰中所取的立場，比如大家已經十分熟悉的瞿秋白文章（以魯迅名字發表）〈王道詩話〉，就對胡適百般挖苦。

5. 智效民：〈張奚若：個人是最終的判斷者〉，載《胡適和他的朋友們》（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75。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68。
7.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鵝湖出版社，1989），頁64。
8. 蔣介石1935年在國民黨藍衣社集會上演講。
9.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10.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頁74。
11. 張東蓀：〈增產與革命——寫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後〉，《中建》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48年7月。
12. 楊親華等主編：《中國民主黨派詞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頁69–70，25–26。
13. 見當時國社黨駐民盟代表蔣勻田描述：這天是（1945年）9月25日，毛到重慶之後的一個月。在他的心目中，與國民黨內政學系有相當淵源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很有份量。毛澤東鄭重向蔣勻田通報說：「和國民黨的談判已經失敗了」。蔣勻田問他失敗在什麼地方，毛澤東回答說：「與國民黨相約彼此保守秘密，不過蔣先生既然代表一個有歷史的政黨，我不應當向你保守秘密，希望我們共同保守秘密。」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2。
14. 《自由評論》，第35–36期，1936年8月。
15. 張東蓀：〈黨的問題〉，《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
16. 張東蓀：〈國民無罪——評國民黨的憲政論〉，《再生》，第1卷第8期，1932年。
17. 張東蓀：〈為國家計與為國民黨計〉，《再生》，第1卷第6期，1932年。
18. 同上註。
19. 記者：〈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1932年。
20. 同上註。

21. 參見高中歷史課本《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核心知識點輔導材料（2006年版）。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91。
23. 有野史記載，《八一宣言》（估計是莫斯科版而非張浩背下來的）為「張沖屬下的『中統』南京香鋪營電台」收取，張「隨即將電文抄送蔣介石和其他要員」，到1936年春夏，《申報》刊登了一條「尋找武伍豪啟事」，要求被尋人於5月5日到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店某房間，與落款者一晤。中共派出了潘漢年作為中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與張沖、陳立夫在上海、香港、南京多次磋商。潘於是年8月8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彙報並傳達國際指示。三天後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建議將「抗日反蔣」口號放棄，此口號在9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中被改為「逼蔣抗日」。參見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4. 準確的關鍵日期，有正式記載：《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1935年7月14日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一致通過。王明譯成俄文後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的報告中明確贊同「中國共產黨的倡議」；9月10日，《八一宣言》經共產國際書記處成員表決通過並於9月24日獲得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會議批准。10月1日，《八一宣言》（中文版）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和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通訊》（英文版）刊登。1935年12月刊登於《共產國際》（俄文版）雜誌第33–34期。
25. 詳見李永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繫〉，《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26. 周揚「真是興奮得不得了」，用「如獲至寶」來表達當時「無法形容」的「內心的興奮」。夏衍也從史沫特萊那裏看到了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這是他們和黨失去聯繫後第一次得到黨中央的指示，第一次得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夏衍用「正像大旱遇到甘露」來形容自己的心情。參見徐慶全：《周揚與馮雪峰》（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7. 參見李銳2002年1月25日在北京大學知識分子問題研討會上的講話。
28. 參見「一二九運動」，載「中國共青團」網站（http://www.gqt.org.cn/695/gqt_tuanshi/gqt_ghlc/action/200704/t20070414_17987.htm）。
29. 黃華：《親歷與見聞》（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到了1939年，

毛澤東說的是「沒有共產黨作骨幹，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是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再次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參見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載《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256。

30. 《周小舟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31. 據1935年5月接替孔原、朱理治擔任河北省委書記的高文華回憶，北方局書記孔原，管轄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當時河北省委下轄北平、天津市委，及冀東、冀南、冀中、滄州、冀魯豫邊區、魯西、石家莊等特委，因為與中央失去聯繫，經費困難到賣掉自己兒子的地步。高在1982年的文章中說：「1935年底、1936年初，冀東二十二個縣偽化，形勢十分緊張。北平、天津的學生紛紛起來反對，還組織了『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隊長是李昌（當時不是黨員）。學生運動一直發展到後來的『一二．九運動』。我們北方局支持並領導這一愛國運動，在黨內是趙升陽同志，還有柯慶施、陳伯達領導的，而直接出面領導運動的是李昌、蔣南翔（清華大學支部書記）、林楓、姚依林、徐冰、許德珩等同志。『一二．九運動』的主要力量是學生、教員、教授等知識分子。」參見〈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32. 大部分湧上街頭的年輕人都沒有看到日人策動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與國府決定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為委員長）之間的區別。當時「不戰不降」的拒日局面由1933年長城戰役的英雄忍辱負重地維持着。

33. 王凡：〈一二九運動策劃發動真相是如何浮出水面的？〉，《黨史博採》，2003年8月。

34. 周小舟1935年8月畢業，11月底即調往北方局聯絡部工作，沒有參加「一二．九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參見《周小舟傳》。

35. 2004年易柯撰文，披露谷景生當時曾任北平「左聯」書記和「文化界的最高領導」、北平文化總同盟的書記。

36. 虞昊：〈「一二．九」運動與張申府〉，《傳記文學》，2005年3期。

37. 郭明秋：〈回憶「一二九運動」的黨的領導〉，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8. 同上註。

39. 王凡：〈「一二．九運動」策劃發動真相〉，《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4日。
40. 朱邵天（原廣東省外辦主任，延安時期和五十年代陳雲秘書）在2005年回答田炳信「什麼時候入黨」的提問時說：高中時就開始看英文版的《評論週報》，上面有關於紅軍的消息。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我就入黨了，但當時北平黨組織的關係和陝北延安是脫離的。……當時清華、燕京兩所學校是一個黨支部，蔣南翔、姚依林、黃華都是那時候入的黨，入黨時我們也要宣誓。
41. 王凡：〈「一二．九運動」策劃發動真相〉。
42.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修訂版）（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40。
43. 劉少奇：〈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載《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4. 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45. 雷永生：〈走近張申府〉，《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8期。
46. 張申府：〈「一二九」運動的點滴回憶〉，載《一二九回憶錄》，第一集，頁21。
47. 同註44。
48. 「她在50年代初期上吊自殺。她死時全身赤裸，旁邊一張字條寫着：『我這樣來，便這樣去。』」參見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頁98。
49.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07號，轉引自虞昊：〈「一二．九」運動與張申府〉。
50. 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
51. 李輝：《在歷史現場：換一個角度的敘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52. 〈朱邵天：陳雲三句真言伴百年〉，《新快報》，2005年7月6日。
53. 虞昊：〈「一二．九」運動與張申府〉。
54. 同上註。
55. 同上註。
56. 同上註。據張申府晚年對傳記作者舒衡哲說，他最介意的是「要被迫放棄在清華園優雅的屋子」。參見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

57. 同上註。
58.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89。
59. 八派為：實用主義——胡適；新實在論——金岳霖；新唯物論——張申府、葉青；新唯心論——張東蓀；唯生論——陳立夫；新法相宗——梁漱溟、熊十力；新陸王派——梁漱溟；新程朱派——馮友蘭。
60. 《國聞週報》，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
61. 引自已在美國安家立業的前天安門抗議學生領袖柴玲1999年質問《天安門有限公司》作者毅．布魯馬(Ian Buruma)的話：「你幹嗎還提這些陳年的垃圾？」
62. 張東蓀：〈世界共同之一問題〉，《時事新報》，1919年1月15日。
63. 連睨視一切的毛澤東這回都比較服氣(或者見到商機)。他當時主管軍事。國際代表張浩的到來(11月中)，和隨後以他的名義發表的《救國宣言》(11月底)，他並沒直接參與。直到12月17日瓦窯堡會議召開，聽了洛甫他們關於黨的政治路線的報告之後，一直忙着打仗籌款的他，對局勢才有初步了解。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關於這次會議開頭幾天的情況，毛澤東在12月19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政治局會議開了三天，關於總的政治問題(形勢及任務)討論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討論，可惜你沒有來參加。明後天討論軍事問題。』」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頁497。
64. 張東蓀：〈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自由評論》，第10期，1936年。
65. 同上註。
66. 同上註。
67. 同上註。
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49。
69. 金岳霖在《晚年回憶》裏說林宰平同他說過「張東蓀太愛變了，而且變動得可快」——不見上下文，也不見前因後果。本著者作為張東蓀文本與行狀的研究者，出於對林、張兩位前輩學人的尊敬，在此提出：或許這裏張東蓀先說「沒什麼話可說」緊接着又撰文，還連撰兩篇，即屬此「愛變」作為？

70. 張東蓀：〈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再生》，第3卷第10、11期合刊。
71. 具體見王新生(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共產國際與紅軍長征〉，《光明日報》，2006年10月23日。
72. 同註70。
73. 〈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轉引自馬輝之、李楚離：〈回憶劉少奇同志在北方局〉，《人民日報》，1980年5月14日。
74. 參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網站(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13.htm)。
75. 轉引自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
76. 張友仁：〈周炳琳先生二三事〉，《北大人》，2003年夏季號。
77. 《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84。
78. 指派周炳琳的老朋友，包括他的女兒去和他談話，做思想工作。同樣辦法，也用在了陸志韋等在共產黨眼中類似的人身上。
79. 毛澤東：〈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的簡報〉，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22。
80. 參見徐炳昇：〈1937年廬山談話會見聞〉，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1. 以抗日大義號召國人的同時，在武漢淪陷前兩個月，蔣、何的代表，還曾專程到香港向日求和，意圖回復「七七」之前狀況。基礎是「中日合作共同防共」——滿洲與蒙古都可以商量。參見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投降陰謀活動〉，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67。
82. 張東蓀1937年在青年會的演講〈思想自由與文化〉，發表於《文史月刊》。
83. 國家社會黨提名參政員共七人：張嘉森(君勱)、胡汝麟(石青)、羅文幹、張東蓀、羅隆基、梁實秋、徐傅霖。
84. 〈中國為民主奮鬥和目前政治危機〉，《亞美雜誌》，1943年10月。
85. 張東蓀：〈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
86. 這也是葉篤義(1909–1998)和張東蓀訂交的開始。從1938至1952，葉篤義多次以學生、助手、代表、盟內同志的身份，與張東蓀保持密切往

來，直到張以「叛國」定罪。在1952年的鬥爭、1968–1972年的審問與1994年出版的著作《雖九死其猶未悔》中，劫波渡盡且正在申請入黨的葉，也一概遵循旨意，未對張的為學、為人與境遇說過一句有違政策的話。然而，在他得知本著者將以獨立知識人的立場為東蓀先生作傳之後，終以病弱之軀，給予熱誠的鼓勵與切實的幫助。

87. 陳矩孫(1913–1987)，富家出身、學識豐富且執著於理想的共產主義者。他1935年在燕京讀書時加入中共，任中共燕大支部書記和北平市委秘書。後因「越軌」及反抗組織對他情感生活的干涉而遭開除，旋即為第三國際接納為直接黨員。1938年這回，他正以似非而是的共產黨員身份在武漢活動。陳矩孫1939年奔赴延安親自向劉少奇訴冤再度入黨，並接受派遣再回燕京大學讀研究生。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離北平時，組織關係丟失。1946年重新入黨。1949年後在福建師範學院任職，獲選為省政協委員。

88.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9。

89. 該文刊於《解放週刊》(1938年)，誣指陳於「九一八」接受日本偵探機關津貼。

90. 〈七人聯名公開信〉，《大公報》，1938年3月16日；《掃蕩報》，1938年3月20日。

91. 《解放日報》，1938年3月21日。

92. 據研究陳獨秀的學者表示：洛川會議(1937年8月22–25日)上，毛澤東和張聞天順便提出陳獨秀問題。毛澤東提出，中國托派與蘇聯托派不能相提並論，認為可以與仲甫達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日。王明一聽，便聲色俱厲地表示反對，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我們可以和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和陳獨秀合作，因為陳獨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當與會者表示疑義時，王明又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地反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參見徐光壽：〈陳獨秀「漢奸」事件始末〉，《黨史縱覽》，2007年第2期。

93. 張東蓀：〈士的使命與理學〉，《觀察》，1946年。

94.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9。

95. 許寶騤接受左玉河採訪時說：「張東蓀看到此公開信後，曾讓人轉告張君勱：不要過分批評共產黨，不能倒向國民黨懷抱。」參見左玉河：《張

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338。本著者認為飽經磨難的許先生記憶有誤。這不是張東蓀的語言！

96. 許紀霖：《無窮的困惑——近代中國兩個知識者的歷史旅程》(上海：三聯書店，1988)，頁162。

二

淪陷北平

1　在淪陷區

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和所有「被放到火上烤」的人一樣，燕大教授張東蓀也寫了自己的「檢討」。其中有關抗戰前後，也就是他正式與共產黨聯手、共赴國難的那段日子，教授作出如下交待：

> 抗戰前，和張申府、許德珩一些人組織了一個救國座談會，當時寫了一篇文章，主張聯共抗日（過幾天，姓陶的寫信贊成。解放後和劉少奇說起，他說是他），這是和中共關係的開始。
>
> 那時希望與中共取得聯繫，救國座談會派了一位叫彭澤湘的去延安，回來帶給我一封毛的親筆信。
>
> 華北區派一個叫王伯高的（與我直接）聯繫。

先說「救國座談會」。張申府記得的是：

> 「一二·九」運動開始於學生，轟動了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紛紛響應，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各地的救國組織紛紛成立，北平成立了「救國聯合會」。我記得有一些進步教授都參加了這一組織，其中有：吳覺先（武劍西）、潘懷素、程希孟、章友江、黃松齡、嚴景耀等（都已故），還有一些健在的，如楊秀峰、許德珩等和我；另外，一些進步的學生也積極參加了

這一組織。我們幾個教授經常在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解放後改名為文化俱樂部)聚會，討論當時的時局，研究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等問題。[1]

裏邊沒有張東蓀——是不是張東蓀説的那個「救國座談會」?許德珩怎麼説呢?

根據少奇同志的指示，北平學聯於(1936年)五月四日發表了爭取師生合作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學聯檢討了過去處理師生關係上的不當之處，……北平學聯改組成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從而取得了廣大師生的支持。一年多的時間裏(權且估計為1936年2月至1937年7月——著者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了。由華北的一些進步團體發起，又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2]

這裏的「北平學聯改組成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指的應是1936年10月北平學聯公開舉行第一屆成立大會。這次大會，「請許多教授參加，有張申府(左派)、馮友蘭、張東蓀……」;[3]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是不是張東蓀他們的「座談會」後來發展成的那個「北方救國會」呢?許德珩是一直自覺接受黨領導的。張東蓀呢?據他回憶:

抗戰前，和張申府、許德珩一些人組織了一個救國座談會，在北平成立「北方救國會」，有何其鞏(當時中國大學校長)、湯薌銘、許寶騤、姚曾廙等。同國民黨、共產黨都有聯繫。

而張申府説:

1936年我被釋後，住學院胡同甲二號，專門從事救國會活動。那時經楊秀峰、徐冰介紹，認識了彭真，他化名「高先生」，常到我家去。同時還認識林鐵、蕭明，當時北平共產黨的黨部在南新華街附近，我曾去過那裏。[4]

想來這個救國會，和何其鞏、張東蓀他們那個「北方救國會」，就算一開始曾經坐在一起，後來也分開活動了。張申府雖然人在北平，但他「專門從事」的「救國聯合會」，應該是上海「七君子」的那一個——因為此後他一直以這個救國會領導人的身份活動，包括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考慮到五十年代中期之後，大家寫文章都自覺不自覺地跟黨套近乎，對於為黨所不喜的人，比如張東蓀教授，則與自己瓜葛愈少愈好——就算率直的張申府如實寫出了，編輯恐怕也要嚴格把關。不過，考慮到共產黨在「顧順章事件」後所吸取的教訓，「單線聯絡」在白區工作中幾成鐵律——可能確是不同的共產黨聯絡不同的教授，哪怕在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所學校。

張東蓀他們的「北方救國會」，據趙乃基記載：

> 隨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德、日、意軸心國日漸衰微。何其鞏、張東蓀、張懋德、許寶騤、王伯高等人組織的北方救國會已覺察到勝利的曙光，經常齊集在北池子何其鞏寓所，討論以後的局勢。大家一致同意，今後仍必須佯同日偽拉攏，以便及時取得一些真實消息，防止其威脅。[5]

這時說的已經是四十年代初了。 一直沒斷了「佯同日偽拉攏」——如果不是底氣特別足，誰敢如此做並在日後如此說？堪稱忠貞英勇楷模，並且為共產黨得天下立下大功的潘漢年，性命不是就這麼丟了麼？

如此這般分析之後，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36年2月間，也即「一二·九」、「一二·一六」都已過去，「三三一」抬棺遊行還沒有發動，張申府、許德珩，包括張東蓀等教授，還都處於激憤澎湃的時候，北平文教界的一批人曾在一起「座談」過。不久，由於共產黨的實際介入，大家分開各自活動起來。「七君子」一派成了中間陣營中響噹噹的左派（共產黨最親密的戰友），活躍於戰時首都重慶和有租界的上海。鋒芒所向，多為共產黨的死對頭國民黨當局。留在北平的「救國會」，則艱難地在日據的抗日一線輾轉騰挪。他們與

中國抗日的兩股武裝力量(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有聯絡。不見激昂言辭，不見街頭濺血，只有拳拳忠貞和無法為外人道的良苦用心，[6]包括日後濃得化不開的幾乎遍於全社會的深深誤解。

再說由「救國座談會派到延安」去聯絡的彭澤湘。

我們從第一章已經知道，這是個厲害角色，厲害到要毛澤東親自出手悶殺。

作為1932年[7]為王明中央所開除的早期留蘇黨員，對《八一宣言》的領會，自是不同凡響。這一傾向，其實已經表現在他正活躍其間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的前身)的成立與新政綱的修訂上。[8]

他是在1937年春，也就是華北局勢相當緊迫的時候到達北平的。早年的同盟會員和共產黨員李錫九(李後來也被挑選列名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為他接通了延安，得以在6月成行。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此行頗得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歡迎。他們沒有強調他二、三十年代的經歷，只把這名前同志當作「解委」領導人[9]在延安接待——他們或許不知、或許根本不大看重他與(也是前同志的)章伯鈞的意見不和。待到這一「不和」已完全導致強大的共產黨對他的離棄，已經是1946年至1949年章與共產黨合作無間的時期。雖然張東蓀他們在北平一直以「救國座談會派遣」來形容岳漁先生之此行，對彭而言，為教授們帶個訊兒，顯然是順手之勞。

對北平的這個「座談會」(可能也包括國社黨)，毛那時候好像沒怎麼看重，否則怎麼在給當時中共北方局頭領王世英還有潘漢年的信[10]裏邊，連提都沒有提及。

至於毛親筆給張東蓀回信，據張家後人七拼八湊的回憶，是由彭本人或別的地下黨員帶到他們那時候借住的西郊王家花園的。他們記得，那信曾經夾在一本線裝書的雙頁間。到1941年12月張東蓀被捕入獄，燕東園成為日本兵營，燕京教工被悉數清出。張家後人回憶，這封信可能是在遷往城裏大覺胡同之前燒掉的。王家花園主人王世襄先生2008年3月11日告訴筆者，那花園不是借住，而是兩位張教授(東蓀和爾田先生)向他家租住的。陳夢家那時也住在那裏。

「爾田教授學問極好，正教我作詞。我那時候什麼都玩，太愛玩了，直到1939年從燕京畢業，母親去世，給了我巨大震撼，才知道唸書。」

估計原信已經在戰亂中銷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又未見提及，具體內容已無法知曉。據曾瞄過兩眼的張家親屬說，那是一封遵循老派文人交往之慣例而作的禮貌回覆。著者再三追問，信裏有沒有提1919年作者與舒新城為《湖南教育月刊》連袂向張東蓀、胡適等求援一節？有沒有提到《時事新報》發表他的作品？有沒有對兩年前收信人率先呼出的「何等轉向，何等光明」(包括與陶尚行的一番爭論)作些評述？張家人說「絕對沒有」。聯想毛對於細節所具有的令人吃驚的記憶力，比如一見到黃炎培即說「當年聽他演講」(1945年在延安)；見到張申府就說「早年當北大圖書館員時候的八塊錢薪水」(1948，西柏坡)；見到章士釗則表示絕對不忘赴法留學前的資助……為什麼這次如此之不「念舊」?「七七」前後，毛與外界交往漸漸多了，就算是禮節性往還，其尺牘風采，雖然不可能像當月感謝贈筆、贈畫的何香凝那樣文情並茂，[11] 總不致於不如給步兵學校教育長郭化若的那封吧。[12] 致張東蓀的這封信未能出現在1993年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裏，最大的可能是沒有徵集到。而不以私藏偉人手跡自炫，大概也屬於本書主人公不拘一格的風格。

雖然沒有在1937年6月間接到延安的特別指示，待到抗戰爆發，中共北方局還是派了當時正在北平特委工作(次年任特委書記)的王定南(即張東蓀「檢討」中的華北區王伯高)正式出面與張東蓀聯繫。

一直未能獲得「安排」，晚年才做到全國政協委員的王同志，其實在1929年中學畢業前就已經加入共青團。而一進入北京大學，就擔任了校團支部書記和學生會黨團書記。立三路線時期，應該說，他還真正浪漫了一把，[13] 不過很快又「回到黨的正確路線」。在他波瀾起伏的革命生涯裏，王定南用過不少名字：王作賓、王澤南、王正化等，當時使用(也是張東蓀唯一知道)的，是「王伯高」(有時為東蓀先生寫做「伯皐」)。

在五十年代初的政治運動中，張東蓀曾經對這段往來作過回憶：

> 當時我們通過王君（殘片原文在這裏刪去「伯高」兩字 —— 著者按）做了兩件事情。一是送學生去解放區；一是送醫藥去。當時燕京有好多進步同學通過團契和我聯繫。其中替我奔走最多的就是燕京畢業生趙令瑜，現在他改名趙明，是公安部第一處長。

想來北平解放之後，趙明還曾拜望過他的前教授，否則張也不會知道他在新政權的任職。隨後，到了五十年代初的運動滾運動，這名公安幹部順理成章地再也不露面了。

將淪陷區的學生送走，本是張東蓀在武漢的時候決定回北平的原因之一（「多照顧幾個淪陷區的學生」）。他觀察到，出於對中國政局的判斷，包括與蔣介石的友情，司徒校務長在「學生一層」，是有分別的。「凡是送到國民黨的，大部分由學校辦，送到八路區的，由我們自己辦，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14] 前提當然是學生自己的選擇。張宗燁記得，常常是一車年輕人到西山去郊遊，回來時候少了幾個 —— 投奔八路去了。

由於不是英美系留學生，也不是基督徒，張東蓀與司徒的關係其實相當疏遠。司徒對他的倚重，顯然出於他在知識界的人望和與中共的關係：

> 在抗戰開始時才有往來，最初是他來找我。他說各黨派應該聯合抗日，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派在淪陷區的地下人物，他都要求見面。
>
> 我常與他往來，是由那裏打聽一些後方消息。我在燕京協助送學生送醫藥到抗日區去，他也知道。

至於「送醫藥」，張家除了把自己在王家花園和後來城裏的房子給地下黨的交通人員當落腳點，還有一位「燕京校醫吳繼文大夫。他自己辦一個診所」，張宗燁覺得他其實是「以此為掩護」為八路購置醫藥。只是無法斷定，吳之所為，究竟出於同情，還是自己也是地下人員。[15] 五十年代的鬥爭之後，吳大夫依舊是張家常客，顯然不屬於尊奉「鐵的紀律」以自保或尋求進身者流。醫藥的受用者，在他眼

裏，一律為傷病患者，並非日後執政黨骨幹。這與具名給首領送手錶，顯然不一樣。

曾在武漢作戰略性穿針引線的陳矩孫，自1938年因不服北平那幫地方領導，直奔延安找劉少奇(劉1937年3月離開天津回延安的)，並在協助他工作了近兩年後，再度接受派遣，以回燕大讀研究生的身份，「配合北平特委負責人王定南」開展工作。很奇怪張東蓀被迫檢討的時候，沒有提到他。

有時候局面相當驚險。如後世研究者很少提及的「抗日殺奸團」(暗殺周作人即為他們所策動)。這是「七七」後活躍在京津一帶，以富家(包括漢奸)子弟為骨幹的小隊。1940年8月的一次大搜捕中，一名燕大成員李振英罹難，他的同志吳壽貞退回校園，最後在張東蓀和侯仁之兩教授的幫助下去了西山(吳後來在游擊戰鬥中犧牲)。

這些，在我們後世讀史人看來，全都屬於高尚的人之常情，提不到周恩來在武漢對他期望的「回到淪陷區作用更大」那樣的高度，更無法解釋數年後毛澤東對他出乎尋常的倚重。

莫非張東蓀教授還有些什麼非同尋常之舉？

對中共而言，最實際的期望自然是獲得情報。[16] 張東蓀並不是唐生明，也絕非熊向暉。與北平偽政權王克敏、劉玉書之間的交情，應該說，只能算是北洋時期的熟人。恰如他在檢討中說的，「王是老朋友，常來看望」；而劉玉書，「是我出獄時的保證人。他當時是偽市長，我被日軍判緩刑三年，他負責監視，所以時常來看我」。

對此，「中共地工」顯然非常看重——絕對超過對張教授自己心愛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命題。雖然絕非個中裏手，有心襄贊共產黨抗戰的張教授，還是勉為其難地作過一次「把蔣介石要與日寇媾和的條件交給中共地工人員」——引自張東蓀「交代殘片」。接受這一信息者，從時間講應該是王伯高。這裏說的「秘密媾和」，應該是從「七七事變」到汪精衛豔電之間的那一回。這樁「抗日戰爭期間最詭秘的事件」，直到二十一世紀才披露。[17] 有趣的是，這麼重大的一個隱情，不但中共的「白區工作總結」之類文件從來不提，共產黨也沒有用來攻擊或要挾蔣介石。

因為與當道人物曾經有過的私交，估計有不少請託，從而也有大量誤解。哪怕絲毫無傷氣節，且眾人受益——到了1952年，都成了必須交代的準罪行。比如與王克敏的「交情」。

「七七事變」後，經過艱難的抉擇，司徒雷登決定，燕京大學不南遷，依舊留在日據的北平。可以想像，佔領當局如何數度態度強硬地往派教官。在所有拒絕的藉口都用光之後，司徒決定通過哈佛燕京學社，聘任一名真正的日本學者。人類與考古學家鳥居龍藏(1870–1953)進入視野。怎麼才能讓佔領當局接受呢？想來想去，可行的便捷辦法，是轉請也還懂得尊重學問的王克敏向日軍疏通。張東蓀教授代替校長出面。在1952年的「檢討」中，他說：

> 關於王克敏。遠在他做漢奸前我就認識他，也就是普通認識，並無往來。以後為什麼在他做漢奸後反而有往來呢？當時因為日本人要送進日本教官教授數人到燕京來，破壞燕京抗日環境。司徒聽吳雷川先生說我認識王，就請我去找他，設法阻止。這事後來成功了。

「成功」，即如笑蜀所描寫：

> 鳥居龍藏不僅學問博大精深，而且宅心仁厚，一直堅定地反對侵華戰爭。到燕大後，他埋頭治學，絕不與佔領當局合作。而當燕大遭佔領當局查封時，他竟以七十多歲的高齡，站在校門邊，顫巍巍地向被捕的燕大師生深鞠一躬，似乎要代表有良知的日本人民向受害的中國人民致以沉痛歉意。[18]

到了度日艱難的1942年：

> 在北洋政府時代原來認識王克敏和劉玉書。我出獄時（原文在這裏刪去一句：是劉玉書出名保的），日軍判令緩刑三年。因為劉認識我，他當時是偽市長。所以叫他保證我不離開本市，而且負責監視、彙報我活動情況。因此，他常來我處。並不是我與他有什麼把兄弟的關係。這事藍公武先生可以證明，我只告他

做過一件事情，當時北京市府有些存糧，老玉米豆，準備散放給教育界人士，燕京方面，他託我替他通知，我不得不替他做了。（檢討殘片）

就在張東蓀等淪陷區教授一邊教書、寫作，一邊保護學生、運送物資——兼及相當外行地搜集情報、拉攏關係的時候，撤退到大後方的知識分子們，也正在此國事維艱的時刻，為國運籌劃。

1939年9月，政府在重慶大學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不開會則已，開會就得讓人說話。中國民主立憲運動由此發軔。共產黨雖然也在會上提出議案，[19] 當權的國民黨雖然也表現得「容納虛懷」，意圖經由憲政而從「武力奪權」變為合法執政，只因為手裏都握有軍隊，雖然強虜當前依舊摩擦不斷。[20] 讀書人焦急之餘，不覺走到一起，成立了一個互相激勵、互相聲援、俱樂部性質的「統一建國同志會」，[21] 竭力兩邊勸和，梁漱溟還曾帶《信約》見蔣介石——無奈成效甚微。

後來，局勢發展愈發不堪：放着日寇不打，「同室操戈」愈見熱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梁漱溟四人商量來商量去，覺得與其求人，不如求己：加強中間派的組織，以自己的實力來爭民主、求團結。這批絞盡腦汁的參政員，有的已有自己的政黨（國社黨、青年黨和第三黨）；有的雖然不叫「黨」，也建成了影響力相當大的組織（職教社、鄉建派、救國會）；還有的本人就已經是一面旗幟（張瀾、章乃器等）。「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遂秘密誕生。

雖然既不在重慶，也不在香港，張東蓀在淪陷區之燕京大學小環境裏實踐着的，恰是他二十年前向同儕所許諾——「兄等為社會活動，弟則以教育為助」。

四部真正在哲學的意義上屬於現代中國、並貢獻於肩千年之重負且屢試屢躓的現代化進程的著作陸續推出：《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是在深切的國學根基和到位的西學領悟力的基礎上，對可稱之為「中國哲學」的扎實貢獻。著者回答了「以哲學為代表的理論知識與有社會性的實際生活

理性與民主

目錄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文明與進步
第三章　人格與人性
第四章　理智與理性
第五章　自由與民主
第六章　中國之過去與未來
第七章　結論

張東蓀的代表著作《理性與民主》手跡

之關係究竟如何」：

> 一個文化要有自身的活力以從事於自身改造，則必在其內部常如火山一樣，能自己發火。這個火就是其活力，而代表這一活力的就是這個民族中（或這個文化中）的理想家，於此所謂理想家也就是哲學家。倘使哲學家而不能以理想提供於國家，則便失其為哲學家了。[21]

可惜，在那樣的年代，時代要求於學人的，已不僅僅做學問。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雖然有足夠的學理支撐，他們卻難於拒絕與一個幽靈，一個突起於二十世紀、具有中國千年「造反／坐龍庭」底色，卻撐着無產階級大旗的「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聯手。

在對《知識與文化》做編前改定時，作者對自己抗戰初起（1937年）在青年會的演講（〈思想自由與文化〉）作了大量刪節。不能說在這年（1941年），他對自由的見解已與1937年不同，只因大家共同抗日，過分刺激的話就不再重複。

比如「異說奇論」該不該提出和需要不需要禁止。演說當場，他曾舉「歐洲的例子」——「著書立説反對神權君權」，他說這在十八世紀會遭焚毀，但到了十九世紀就已被目為當然。接着舉出「今天俄國」：

> 蘇聯的出版物，一切書籍雜誌，以及戲院音樂會的秩序單，都要黏貼總檢查局所頒佈的印花票。總檢查局歸教育委員會管轄，不但監視蘇聯作家的出版品不帶「危險思想」，而且要阻止誘惑的見解由外國侵入。……至於音樂戲劇，另受腳本委員會節制。本國與外國的名作，有許多因為含有宗教意味，則被認為思想不健全而禁止公演。
>
> 如果我們認定十八世紀對於民權思想的禁止為不應當，則我們便應該同樣認為今天對於宗教思想的禁止亦是不應當的。十八世紀教廷的荒謬固然應該攻擊，難道紅色政權如此荒謬就不應該揭穿麼？

在談到教育時，他認為主辦者為了「適合造作者的目的」，就「隨便把人當作軟膏來捏」，不僅不該，也沒那麼容易——「俄國總算是一個大試驗場。試驗的結果知道有若干人性，還是不能一蹴而去掉的」——這些，在《知識與文化》定稿中，都刪去了。

在第五節，他曾着力講解「共產黨主張必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達到經濟平等之不通」，舉出「兩件最有力的事實以證明其妄」，即意識是由於階級利害所形成的：有產階級對於經濟革命一定全然不贊成，也即一定是反革命。他先舉俄國的遭到清洗的革命領袖，請問他們是無產階級還是反革命；他又舉法西斯，「德意法西斯並不完全由有產階級組成，無產階級反居大多數；這兩國中有產階級而愛自由的卻反不贊成此種舉動。」他的結論是：「則謂有產階級必全屬反動，只有恃無產階級專政以鎮壓之，豈非白晝見鬼之說耶？」

他接着以一名獨立學人的批判精神，指評「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22]

> 馬克思為偉大的思想家，則獨因此論，則因屢次企圖革命未成，由激憤而發，乃只是一時情感的衝動，並不含理性在內。最可憐的是一班馬氏徒黨，只知篤守其說，不敢變易一字一句，而俄國數千百萬生命遂斷送於此一言之中。

他那時並不知道，不過十五至二十年之後，中國留在自己家園（此時已是共產黨治下）的有產者，為了不成為反革命，已乾淨徹底地志願接受「剝奪」，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革命遂順利完成。而半個世紀之後，權力／資本轉換在紅旗的遮掩下發生：在崛起的中國，新的「有產者」，多有無產階級先鋒隊隊員之資格，與馬導師當時所說，已然滿擰。

那回，張東蓀還刪掉了一段，即「嘗說：共產主義在經濟方面是進步的而其在政治方面卻是退步的。」他當時給出的根據是，據他的觀察，共產黨「在經濟方面求自由，所以是進步的；在政治方面反而毀壞自由，所以是退步的」。1941年，他覺得共產黨最接受不了的，可能是他的這個看法：「以退步的政治方法而求進步的經濟狀態必是

增加許多麻煩。蒲君認為現在歐洲的法西斯狂潮是共產黨所激起的，這一點也與我所見相同。」張教授在這裏，真是以學究之心度泥腳桿之腹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是，從二十年代以來，共產黨之所以成為最後贏家，實在是打着經濟平等的招晃而求權力斷殺之全勝。至於「經濟方面求自由，所以是進步的」，所有經歷（或者研究）過各色土改、統購統銷、大躍進、公社化、超英趕美的中國人，都大概掂得出這謬誤的份量吧。

著者堅信在那時，並沒有三審把關，也沒有來自日據當局或者國民黨中宣部的電話通知。作出上述刪改，是張東蓀自己之所為。這是不是說，即使將言論的自由與獨立看得如性命一般，在某種局面下，也須主動妥協？

燕大再好（弦歌不輟的世外桃源），終不過小環境。引一段當時故事，一現一心「多照顧幾個學生」的淪陷區教授們所處環境：

> 1940年冬，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馮樹功騎自行車行經西直門外白石橋時，被一輛橫衝直撞的日本軍車軋死。燕京大學當即向佔領當局提出書面抗議，並在貝公樓禮堂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
>
> 追悼會由陸志韋主持，他緩緩走上講台，面色沉鬱。禮堂一片靜寂，使與會者倍感壓抑！突然，他用嘶啞的聲音說道：「我……我講不出話！因為我這裏，」這時他以拳捶胸，「我這裏好像有一塊大石頭，壓得我喘不過氣！」[23]

半個世紀後，當「子弟兵」的坦克，並非僅僅「橫衝直撞」，而是在距離當今衙門數百米的六部口，有意碾壓正在撤退的抗議學生的時候，北大校長的反應——這無疑應當作為不可忘記的恥辱而列入北大校史——是：主動將「涉嫌動亂」的助教，押送公安局。

2 監禁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宣戰。

張東蓀得到消息是在那天淩晨——他接到林嘉通（燕大教務主任，他的甥婿）的電話，說林邁可半夜從收音機裏聽到……。就在這位林賽爵士踩着腳踏車（有一說是開着司徒雷登的汽車）直奔西山（隨後成為八路軍無線電專家）的時候，張東蓀趕到教授們通常議事的燕京哈佛學社——日本憲兵隊已將「敵產」燕大校園包圍。

當晚，燕大中國籍教學及行政骨幹十六人，包括陸志韋、趙紫宸、鄧之誠、洪煨蓮、張東蓀、侯仁之等，以「抗日」罪名遭逮捕，先押往西苑日本憲兵隊，隨即轉到沙灘北大紅樓憲兵總隊部。美日終於開戰！大家總的感受，「想到國家民族的前途無不十二萬分的高興，想到個人卻都又知道有極大的危險在面前」。[24] 張東蓀想得更多些。他認為此次逮捕「雖在太平洋戰事發作的那一天，卻已早在九一八事變即就決定了的」，這恰與日本憲兵所公開揚言，要跟他們算「四五年來之賬」，「乘機作一總決算」相符。其實，早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大學商討時局的「緊急會議」上，張東蓀就主張不要等正式開戰，學校先行解散，根據個人志向，或到後方或向「八路軍區」疏散，目的是「避免到那時的逮捕」——不幸說歸說，誰都沒動。待到已經給圈在紅樓，他倒也沒特別後悔，「無論我離開燕大與否，日本憲兵早把我的行為記錄下來了。他們注意我恐怕有二三年之久」，未曾間斷地與國府及中共的合作，「要想作漏網之魚，那是決無可能的」。雖然這回屬於一攬子兜捕，他的身份並非如其他同事般僅是「日本敵對國之大學的教授」。「我所做的事卻只是一個人的，並不與他人相共」，「關鍵還在於他們究竟知道多少」。

一同關在「柙」（教授們見到監室木柵門所想到）中的，是趙院長紫宸。三週後第一次提審時，發現張東蓀竟然是上了日本人編的《中國現代名人大辭典》之「有名人物」。審訊之准尉原先薰天氣焰陡變，開始對他使用敬稱「阿拿大」（您）而非「奧麻伊」（你小子）。提審的第一個問題即是「講一講和陳獨秀組織共產黨的情形」。可惜他們依據的關於漁陽里組黨的那份雜誌裏，參加者還有個周佛海，遂無法據此入罪。在後來問到「燕京大學送畢業生到重慶」的時候，張東蓀承認「道理上贊成、行動上協助」——憲兵隊即認為已「取得足以判罪根

據」。緊接着想讓張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東蓀答以：本人一向反對國民黨，因汪精衛是該黨，所以不能合作。憲兵還曾讓他「勸誘」、「感化」一同關在獄中的共產黨。他答以：「你們日本軍何必來管中國的事，因為共產黨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

兩個月之後，日本憲兵作為原告，對他們提起訴訟，移送炮局胡同陸軍監獄。張教授獲冠513號，並立即上銬：兩人一銬，與他共一雙的，是洪煨蓮。這回關的是十一人的大監房，與陸志韋、林嘉通等人又到了一起。大家原已鄭重互相囑咐「不卑不亢、避重就輕」，「日本人的話沒有一句靠得住的」，但正式的審訊不僅毫無內容，十一人中只傳訊了張、林，就再無下文。不審理，卻將合押改為單獨關押：「忽然把我們十一人分為每人在一間小房內，這便真正入了地獄」，原先的凶狠、凌辱、寒冷、飢餓、穢臭……似都可忍，「移到每人一間，那才是真苦到極點，非人所能堪的了」。由此經驗，張東蓀悟到，人原是社會動物，使一個人孤立起來，就成一種精神上的罰，久而久之會使人發瘋。他望着牆壁上隱約可見的用血畫的人像和簽名，聽着間壁撕心裂肺的號叫，覺得像是「入以鬼的世界」。

因為身體素弱，擺脫不掉的念頭是，拿來槍斃也就罷了，最可怕的是長期禁錮——精神上發瘋、身體上生病。拿個體感受與全體民生做比，他切感「恰如長期內戰：如果在短期內，國民黨把共產黨剿平了，老百姓總可忍受；同樣，共產黨如能很快把國民黨推翻，我們亦決不反對。解決總是好的，不拘哪一途。」

他想到「受夠了苦痛與磨折，身心都經不住，最後還是不外乎一死」，開始籌思在監內了斷的各種可能的方法。他堅信，以拘禁把人弄得不死不活，無一刻不在受罪，乃是掌控他人命運者「最殘忍最下流最卑劣的心理」，於是，以一死而逃脫，使其計劃失敗，不失為一種抵抗：雖死而得勝。

想至此十分高興，此時心中沒有絲毫的悲觀。並且我更想到，一個哲學家對於人世的看法自與常人不同。哲學家不但不以死

為可怕或可厭，必定還樂於一嚐這個滋味。蘇格拉地就有 to practice dying 之說。

獄方既以折磨囚犯為職志，能令你輕易抵抗成功麼？張東蓀嘗試了吊頸、絕食、以手銬擊頭、塞息、撞鐵釘等等辦法——直弄得「皮膚撞爛，流血如注。滿身都是血，……地下亦有三四大灘血」……。獄方終於讓步，答應除去手銬，並叫一名燕京同難到房間陪伴，以「無論如何不再自殺」為交換。雖則如此，淤積於胸中之怒氣仍是愈積愈烈。他曾與關押對罵乃至對打，結果當然是被摜到地下且加倍受罰。

我同守兵吵鬧，不止這一次。所以我很感激洪煨蓮。有一次在一個大澡池，大家洗澡時，他低聲勸我千萬不要和他們鬧，不久必可出去。而趙紫宸勸我尤多。揭出八個字，是：在此忍耐，出後貢獻。他以為國家民族乃至於世界文化都待於我們作貢獻，萬不可輕生。

我自己知道性格偏於急躁，對於忍耐一層最不如人。不過我對於生死的觀念向來以為儒家最好。所謂大哉死也，小人休焉，君子息焉。又如張橫渠說，生，吾順事；歿，吾寧也。

「如是苦耐，直到天氣已大熱。……室內青蠅已成百成千……古人云死後青蠅為吊客，我對趙紫宸說：吊客已來，我輩其死矣乎？」教授們果然都感染赤痢：高燒不退、腹瀉不止。或許監獄當局已有察覺，發病翌日即送日本軍部，舉行軍事會審，在刑囚的病人們已然不能站立的情形下宣判，獲徒刑一年或一年半（張東蓀、蔡一諤），一律緩刑三年。卸下刑具，帶到會客室，在驚、懼、憂、喜無所適從的親人面前，張東蓀的感覺是，因為身體難過已極，精神上竟無一絲高興，「只是希望早些到家可以臥下」。

六個月零十天，諸苦備嚐，「在死生的邊緣上往返打了幾個轉身」。他最深的感受是：

監獄制度萬萬要不得，必須廢除。因為坐監決不能改變人們的

性格，而只有反把人性激成偏狹。世上有許多革命家都是坐過牢的，他們的性格反而比常人來得激烈。我願意把自己作一個有力的證明。我的性格本來是急躁與倔強。但經過了這樣牢獄生活六個月以後，我確自知我的性格有相當的變化。卻不是由急躁變為溫和，由倔強變為隨便；乃是更急躁更倔強，更是率性而行。平素對於不願看見的人尚能敷衍一下，現在不行了；平素對於不願意聽的話能忍受一下，現在亦不行了。因為在真理之前，不容有作偽，不能有屈服。於是我發見坐過監牢的人自會有「革命性」。

這番話，他是在1947年5月間說的。他不會料到，在不過兩年之後漫漫二十年的歲月裏，他的急躁、倔強與率性，要經受怎樣的磨礪；而不作偽、不屈服這類士之常行，將因為無人付得起的代價，在廣漠的中華大地上，幾告闕如。

3 黎明之前

燕京大學教授們遭逮捕後，校園也作為「敵產」被日軍霸佔——員工家屬一律限期出校。駐兵強佔的，不僅燕京校園，王家花園也落入敵手。老老小小一家人往哪裏去呢？張爾田憂憤交加，病勢愈加沉重。

這時，我家裏毫無辦法，城裏房子很難找。我太太去找梁秋水先生，他就說有個舊國社黨員劉敬堯，在山東作偽道尹，在北京有一所房子，他太太也在山東，房子空了。於是，梁秋水就介紹我太太去住。而我出獄後，因為沒有錢，也就沒有搬家。（張東蓀檢討殘片）

張宗燁還記得那住處：

爸爸被抓走，我們就全都躲到城裏去了，住在大覺胡同。那本是漢奸劉敬堯的房子，住在他的一個小跨院，裏邊有好幾個三間房，大伯父就是在那裏去世的（1945年1月）。

到1942年6月，遭抓捕的教授們一一宣判，張東蓀獲「徒刑一年半，緩刑三年」。作保的是他在北洋政府時代的老相識劉玉書，時任北平市長：不許離開本市，對「不法行動」監視、彙報。

除了劉玉書，緩刑執行期間，日本憲兵隊的安達也不斷來誘說，動員張東蓀出任教育督辦。結果當然是遭「峻拒」。以「士」自我期許的本書主人公，自律過苛，除了薪水和校方提供的住處，無任何資產。但日子總要過下去：

在太平洋戰爭後，我一無收入，生活主要靠賣東西過日子。賣掉一個漢玉璧和一幅戴文節公的中堂以及其他皮貨等，將換來的錢買了一些貨，如襪子等，以求保值，隨吃隨賣，這樣才過了幾年。[25]

張凱慈也聽家裏大人說過：

家裏原來有地，還不只一點，由二地主管的一大片，後來爺爺堅決主張賣掉。奶奶說，「大爺爺事事都聽爺爺的」，地就這麼賣了。……日本人來的時候，住在王家花園。聽奶奶說，那時候過日子靠賣東西。地賣了之後，換了點美元，還買了點股票——後來徹底光了。

這情景張宗燁也記得：

抗戰時候，爸爸沒有收入了，就靠這些美元和一點首飾什麼的貼着過日子。有好幾年呢。媽媽說，她本來不想動那點美元，打算以後分成四份給我們兄妹，後來差不多貼光了，一再說很對不起我們。我想幸虧沒了，否則還不定說我們什麼呢。沒有了倒消停。量不大，不過千把塊的樣子。

鄧雲鄉在他的晚年回憶裏，給出黎明之前古都學人處境：

中國大學在何其鞏氏主持之下，靠學生學費維持，因為人多，雖然困難，也維持下去了。有不少不願到日偽學校任教，又一時

張東蓀1942年左右寫給兒子張宗炳的信

去不了抗戰大後方的名教師，都到中國大學來教書了。俞平伯先生原在清華，淪陷時，擔任了中國大學中文系主任。待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被封門，有些名教授也到了中國大學，如著名的張東蓀先生、歷史學家齊思和先生，還有鄧以蟄（鄧稼先之父）、孫人和先生等位，一時都往來於二龍坑路上了。[26]

即使如此，張東蓀與共產黨的聯繫並未間斷：

我出獄後，中共地工隨即與我聯繫。他底意思想要利用王克敏準備為將來接收華北做佈置。我介紹他看過兩次王克敏。我個人與王克敏並沒有什麼來往。不久王伯高被捕，供出了許多材料。日軍憲兵部來我家搜查，好在沒發現什麼。（檢討殘片）

簡直與潘漢年案如出一轍！只是不知這個「他」是誰。

讀者一定記得潘漢年案件的要害：在法西斯敗局已見端倪的1942至1943年，不僅準備「下山摘桃子」（毛澤東語）的正規抗日武力，就連漢奸們也在找靠山、想退路。南京幾大漢奸，周佛海投靠了軍統，李士群一直明裏暗裏給共產黨、新四軍幫忙。口氣最硬（他自己才是領袖）的汪精衛，遂成周、李爭奪、拉攏的對象——都想把他拉到自己一邊，不僅增了實力，「後台老闆」面前也光彩。這就是正、野兩域史家所謂「1943年（潘漢年）被汪偽特務李士群做了手腳，一步步挾持着潘漢年與汪精衛見了面」的背景。

1955年，「大上海一線管家」潘漢年，僅為此節，就突然從飯店給抓進監獄，一關二十二年，直關到生命終結，根本不顧第一知情者李克農有力的辯解與質問。毛澤東死後，潘案一步步獲得「平反」——以他的大功、以他的高位、以他對他的事業的忠貞，抓起來關到死，其實就在毛澤東一句話：「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正式公佈的，只有對他的判詞，未見他的答辯。流傳出來的，只有他在「假釋」的有限自由境況下對「二流堂」友人說的一句話：「我是冤枉的。楊帆也是冤枉的。這些事一時說不清楚，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定論。」

回到1942、43年的北平。

兩次見王克敏，應屬北平地區地下黨的重大活動吧？有沒有向延安報告？可曾犯過誰的忌諱？所有這些，至今未見官方披露，但也未見有誰如潘漢年般遭誣陷——可見潘案要害不在見不見汪精衛。至於被捕的王伯高「供出許多材料」，顯然是後來不知哪位「地工」對他說的。張教授不僅當時（1943年）篤信不疑，還一直信到逼他交代的1952年。

出獄後即離開北平的王定南本人，對此沒作出辯解——估計也沒有人就「黨組織」已將他列入另冊一節正面告知，因為到了內戰初舋（1945年9月），他還曾以共黨身份成功地策動了高樹勳起義。令讀史人難於索解的是，從1929年就在北大鬧革命、1938年即代表黨與淪陷區頭面人物聯絡的王同志，在黨得到政權之後，只落得一個中央內務部秘書之職。由此，我們或可窺見那隻無所不能地操作他人命運的無形的手——中共組織與檔案系統。

不過，被日本憲兵逮捕之前，王伯高還是非常自信而活躍的。僅就與張東蓀的交往，他就曾把張的助手葉篤義，安排到唐山開灤礦務局，還在自己被捕後火速通知葉篤義撤出。在那起著名的、將周作人牽扯進「抵制死硬漢奸」的運作中，王也扮演了一定角色：

>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初，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病死，這個職位出了缺。我當時在偽組織的高層政治圈中活動，消息比較靈通，得知一些情況。有繆斌者，當時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牽線支持下，鑽營此缺甚力，頗有相當呼聲。另一方面，在偽政權中也有人（如王揖唐）屬意於周作人，這當是出於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在我們的一次「三人碰頭會」上（那時，王定南同志和我還有張東蓀約每半月總要聚會一次，多數在弘通觀四號我的家裏，彙集情報，研究工作），我報告了這些情況，提出問題並商討如何運用如何應付的對策。我們認為，繆斌這個國民黨黨棍、現新民會混混兒，若任其抓住華北教育肆行奴化，那毒害青年真不知伊於胡底，所以應該把他排掉，不能讓他得逞。[27]

在北京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中，許寶騤為這個問題給自己扣的帽是「曲線救國」。周作人為此而獲的「漢奸」罪，已是眾所周知。

當代讀者對西南聯大師生所經歷的艱難、困窘比較熟悉，而在淪區，因為半個世紀來話語的主動權一直在國共旗幟下的抗日鬥士手，不罵他們「腆顏留內地苟活」已經夠客氣了。[28] 他們的情形更為雜微妙，而不甘為奴者的努力，更是異常艱難。起碼，「堅守學術位」[29] 與效勞敵酋，就顯得界限模糊。拘禁期間，鄧文如曾有詩，中一句：

豈料貔貅三百萬，
居然重視幾書生。[30]

張東蓀在他的〈獄中生活簡記〉裏也說：

關於出獄後做事一層，我們在獄中時已早慮到。所最怕的是日本人將強迫我們教書。當時我有一個意念，就是出獄後立即逃上西山，因為王定南已將路徑全早告訴我了。孰知出獄時正大病，一病就有一個月之久。以後卻不見日本人來十分強迫去做事，所以也就無須如此了。

本著者在這裏特別援引一段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的鏗鏘論述。他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描述在1952年批鬥中受着煎熬的張東蓀：

張東蓀不得不承認他歷史上是反共的，但他認為自己至少是愛國的，並舉出在太平洋戰爭後，曾一度被日本憲兵司令部所逮捕以為佐證。他說抗戰期間他所以沒有去大後方，是由於自己留戀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怕吃苦。但燕大學生立刻有人揭發張東蓀在淪陷時期與敵偽勾結的事實。原來敵偽把張東蓀逮捕後要他出來當華北教育督辦（即周作人當過的腳色），張東蓀自己不出面，卻推薦了國社黨黨員王謨任華北偽組織的教育督辦。為了酬勞張東蓀的推薦，王每月叫兒子送米運煤給他，有時送晚了，還要挨張東蓀的罵。這是王的兒子揭發的。王謨於日本投降後

> 已經被中央法辦了，這都是上張東蓀的當。於是張東蓀愛國抗日的假面目也揭穿了。原來張東蓀不僅歷史上一貫反共，還當過漢奸，不過自己不出面，做漢奸的幕後牽線人而已。[31]

被網民敬冠以「終生憤青」的「千老」[32]究竟是不知，還是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放入權勢者「欲加之罪」的討伐大軍，不問當時一個處於地下、鬆散的國社黨組織，其權限究竟有多麼大。張東蓀只是幾年前當選的總委，那時候既無專款、也無辦事機構。他充其量能做到，只是不許黨員以黨的名義出任。至於以個人身份接受偽職（如楊毓洵、王謨之所為[33]），連蔣介石也無法阻止（如汪精衛「附逆」）。

現在回過頭來講1942年。張東蓀被保釋不久，王伯高也出來了。[34]雖然稱自己依舊代表組織，張東蓀卻是不敢盡信。他找到政團同盟代表，可信的、「為朋友兩肋插刀」[35]的張雲川，聯絡到一名「確實的」共產黨地下交通姚繼民（1949年後建工部部長助理），希望由他證實王定南「是否依舊代表共產黨組織」。姚說這事非同小可，但他答應設法為他們聯絡十八集團軍總部。[36]

這裏其實存在着一個疑問：請東蓀先生出面聯絡見王克敏（而佈置接收華北）的「中共地工」，此時到哪裏去了？考慮到敵後工作極為機密的頻繁調動，或許只有專業研究人員才有能力準確追蹤了。

但姚繼民從此與張家有了走動。據當時讀小學的張飴慈記憶，還有一個姚大嫂，一直留在北平，直到光復、直到「解放」。張飴慈說，姚大嫂在米市大街大華電影院旁，開了一家「群眾書店」，匾額竟然出自爹地（張宗炳）之手筆——可能「群眾書店」這名號也是他們一起商量的。張家當時住外交部街，離書店很近。他們兄弟還去買過小人書。到後來聽說，這書店是公安系統的[37]——那位姚大嫂應該也是一名地工吧？張飴慈還記得店裏一名姓李的員工，還曾到張宗熲家幫傭——是否屬於偵緝工作，他們就不得而知了。

從前線拐着彎兒找黨，或許不是一件易事。過了一年，到1943年6月，北平這邊才得到「已接上頭」確訊。張東蓀立即派葉篤義做代表前往。出發前，張對葉說，「此行的目的除了打聽王定南的關係

而外，還希望如有可能，要同中共建立一個（共同抗日）協定形式的書面關係。」[38] 如此機密（甚至可能掉腦袋）之情事，張東蓀並未死死瞞住，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不僅知情甚至參與其中。何校長也寫了一封信託葉篤義帶交——可見處於日據下的知識人對抗日武裝力量的期待。

葉由北平坐火車出發，從邯鄲進入了解放區（當然須有小姚一路關照）。先經過129師劉伯承駐地，然後到達左權縣，即當時十八集團軍總部所在地。在那裏，他見到了彭德懷司令員和滕代遠參謀長。估計彭大將軍此時已經通過延安與北方局取得了聯繫。他明確告訴葉篤義：王伯高的關係已斷，中共將派另一人同張東蓀接頭；至於教授所提出的「以書面形式確定合作關係」，十八集團軍很以為是。總部派朱早觀（後任軍委辦公廳副主任）和李綺（全國政協委員）與葉篤義共同擬定了一份「抗日建國同盟互助協定」，內容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只有原則性的三點意見：

1）在抗日戰爭中，十八集團軍方面努力向日軍進攻。
2）在抗日戰爭中，張東蓀方面努力做好瓦解偽軍、偽組織的工作。
3）在抗戰勝利後，雙方合作爭取和平民主建國。

7月7日，彭德懷和「葉茂蓀」（由葉篤義代表的張東蓀）在一式兩份的協議書上簽了字。葉篤義注意到，彭用的是刻有「衛立煌贈」的自來水筆。至於何其鞏校長，彭老總也託他帶回一封感謝信。

據葉篤義記載，這份協議書是寫在極薄的複寫紙上，裝在牙膏筒裏帶回來的。[39] 此節，無論八路軍軍史，還是彭總的傳記，以及對戲劇性細節文物本應感到興趣的軍事博物館，都沒有提及，雖然《彭德懷年譜》中有「7月4日，中央書記處覆電指示：可與張東蓀代表成立口頭約定，不立書面條約」。[40]

很快，一位名叫殷之鉞（1949年後任海關總署副署長）的上海青年開始頻頻登門。當時正讀小學的張宗𤇍記得：

> 抗戰的時候就有地下黨來，叫小殷，他跟崔月犁有接觸。我家那時借住在大覺胡同別人家的跨院裏，有好幾層，都是很破的小房，三間三間的，靠一個小過道連着。日本鬼子也經常來，名叫安達。爸爸放出來之後，常來看看你在家幹什麼。所以，如果小殷或是什麼人在我們家，我們得特別注意。有人拉鈴，要先從門縫裏看：如果是日本鬼子來了，就趕快讓他們到另一層去。至於他們來商量什麼，我不知道，估計運藥品什麼的。……也有不少人從北平往解放區送。小殷剛解放時來過一次，後來就沒有再來。

「第三方面」的青年黨也派林可璣到北平活動。林先生幾十年後回憶他抵平後的情景：

> ……立即馳訪張東蓀，見面時，張什麼話還沒說，先告訴我，前一天有日本特務機關工作人員訪他，謂青年黨有一重要人物，這兩天要到北京來，渠答稱不知道，故渠認為日本方面既已知道，此後我的行蹤不如公開，秘密反而不安。[41]

林隨後即在北平的日本溫和派中公開活動。想來除了殷（共產黨）、林（青年黨）之外，張東蓀與重慶「同盟」中其他黨還有另外的聯繫。林的回憶裏有：「一日，東蓀告訴我，左舜生、羅隆基二人因金錢小事鬧翻，甚不以為然。」

可見，在梁漱溟赴香港創辦《光明報》的前後，民主政團同盟淪陷區支部已經成立並活動起來。作為淪陷區支部主委的張教授，據重慶方面的估計，「暗中發展還順利」。

國府方面和他們也有聯絡。張卓然（當時化名張維平）本是抗戰開始那年陳立夫派到天津的地工，任「天津戰區教育督導員」。到抗戰後期，還開始兼負北平工作。張卓然在北平的活動，主要是通過袁賢能。1943年4月間，袁曾帶他分別到陸志韋、張東蓀、藍公武家拜望，其時也有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對此，葉篤義也有記錄，不過是以不屑的口氣。

除了已有記載的各種抗日力量，一些零星個體人物也出現了。

1941年12月那次燕京兜捕，張的學生，一直與他有聯絡的地下黨員姚克殷也未能免，難友中一人名王志奇。姚克殷出獄後即將王志奇介紹給自己的老師——此人在我們後邊要講到的故事裏，將扮演重頭角色。

1942年4月，身在病中的張東蓀「偶然在《大公報．史地週刊》」讀到一篇「借題發揮，頗具弦外之音」的文章（素癡：〈梁任公辛亥以前的政論與現在中國〉）。作者從梁任公「畢生惡俄」及「晚年過分怕紅」說起，談到梁「淋漓精核」的政論，聯繫到中國社會三十年似無進步，最後慨歎「蓋世雄文浪擲」。

張東蓀幾乎立即着手答素癡（「病中拉雜寫此」）。與其說為離世十多年的老友作辯護，毋寧更近於夫子自道：

> 我敢說梁任公當其下筆為文的時候，他腦子裏直不知道什麼叫「失望」，更不知道什麼叫「左右夾攻」，更更不知道什麼叫「浪擲」。他只知道當時的熱情使他不得不如此說。他說了以後就心裏很安。他若因為顧慮失望而不說，他的內心反而更痛苦。他為免除當下的痛苦，所以他不計將來的如何。即所謂行其心之所安是也。
>
> 因為梁任公這個人不是一個工心計的人。他有豐富的知識，但他更有充滿的熱情。他的知識（即理智）是隨着他的熱情而前衝的，不像那些冷靜的思想家以理智來左右感情。素癡先生太息他的蓋世雄文的浪擲，而在他卻不知道浪擲是怎樣一回事。

對於發了言論而未能左右歷史，張東蓀認為：

> 就歷史來看與就道德來看，便很有不同的觀點。就歷史來說，誠然是一個失敗，不必諱言。然就道德來說，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正是人格的表現。未可因其不濟事而短之。
>
> 假使梁任公預知革命之不能免，不作雙方勸告，而專向一方燒冷灶，則他即變為投機分子，不成其為梁任公了。[42]

「梁啟超研究」車載斗量。以著者之有限見識，對任公的理解，沒有超過他老友的這段敘述。

隨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北方救國會諸位已然覺察勝利的曙光，北池子何其鞏寓所成了大家經常聚會之地。大家都願為這或遲或早、但必然到來的新局面作貢獻——當然也不同程度地瞻顧自己在這局面中的位置，尤其覺着自己「身上或許有污點」者。

1943夏秋間，當時正在汪精衛家擔任家庭教師的龍沐勳，[43] 專門到北平找張東蓀，為偽淮海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郝鵬舉傳話：有意在時局變化時「帶起隊伍（當時有兩萬人），打出民主政團同盟的旗號，由民主政團同盟作保，歸民主政團同盟領導」。

天上掉餡餅？

軍隊，在近現代中國，簡直就是一切。維新的皇上擰不過太后，不就因為她調得動的軍隊比他多？孫中山為什麼將總統位置讓出？國民黨、共產黨怎麼絕處逢生的？以及，不論國家遭逢多大危難，有槍才能說話——固然是國家民族最大的災難，但身臨其境，很難不讓有心問政的人怦然心動。

國共怎麼發憤建黃埔、怎麼策動南昌暴動，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以二勃（朝氣蓬勃，野心勃勃）聞名於黨派間的青年黨，自二十年代就努力在軍中建立支部，七七事變後曾有「野戰抗日」的口號。

長袍先生佔主流的政團同盟呢？張瀾只以個人學問品德保持職業軍人中之人望，自己從不沾手軍隊。黃炎培、梁漱溟諸公也程度不同地如此。他們不沾，並不意味着所有盟員都「避庖廚遠腥膻」。而當他們偶然有所沾，並不知已臨深淵。據葉篤義文，他三哥之經歷，就是明證。

農業專家葉篤莊，是早期的民盟中委。1946年，當國軍高樹勳部在晉冀魯豫地區起義之際，民盟[44] 動念，想學國、共、青的樣子，在這支部隊裏建立支部。正好有一美國記者要到晉冀魯豫採訪，民盟以介紹翻譯的名義，派葉篤莊到高樹勳部去建立民盟支部（是否成功，未見披露）。葉氏兄弟沒有說清楚的是，為此事，民盟當時曾向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徐冰請示，並承蒙他給劉伯承、鄧小平發電報的

時候，不僅說了「做翻譯」，還不見外地提到了「到軍中建支部」。立志農學的葉篤莊毫無問政興趣，只因為自己組織所信賴，又不無能說幾句英文，竟為此「插手武裝」，兩次坐牢共十五年（1957至1962年；1968至1978年）。

有志（並且特別有資格）於現代政黨政治的章伯鈞，對類似情事難於忘情，見其女兒所述：

> 父親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隨鄧演達先生搞第三黨（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成為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間，他一方面明顯靠攏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堅持搞軍事活動。[45]

直接將「武力」上升到哲學層面（將軍隊與生存狀況聯繫起來）的，非毛澤東莫屬：

> 這些人們向共產黨人說：你交出軍隊，我給你自由。根據這個學說，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只有很少一點軍隊，國民黨政府的「清黨」政策和屠殺政策一來，自由也光了。現在的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國民黨的民主分子並沒有軍隊，同時也沒有自由。[46]

還不要說一個現今已經不大為人提起的「小民革」（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從1941年成立之時，就毫不隱諱其明確的策動軍隊意圖。

根據所能得到的記載，對龍榆生冒着性命危險所給出的建議，張東蓀當時的態度是：「民主政團同盟根本不搞武裝。搞上郝的這點軍隊，反而是個負擔；而且到時候也保障不了他的安全。」但餡餅總是誘人的。當時，一同見面的許寶騤（「小民革」成員許寶騄的兄弟），按照組織意圖（也許是中共，或許就是乃兄）提出建議：「勸告他再往前多走一步，到時起義，幹乾脆脆投靠中共武裝力量。」只要不打仗、少殺人，想來張教授都沒意見。只是他沒有深想，中共武力的迅速擴大，意味着什麼前景。

三人商定之後，由許寶騤在這年深秋到郝部談妥。郝請許寶騤

「回去後向東蓀先生深深致意」，並希望有一代表常駐，以便打通各方面關係。

回到北平，許寶騤「向東蓀先生報告了前情，都很高興」。本擬派許寶騤擔任常駐，但就在這時，上文說過的張雲川從重慶潛入北平。他帶來了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宣言》和《對時局主張的綱領》，並在燕京校長吳雷川家落腳。張雲川曾經就讀黃埔軍校，以熱情爽朗播名於友朋間。他本意原是拜望燕大校長，但傾談之後，覺得同盟一定要邀請東蓀先生——當時兩種議論流行：一曰「張先生混跡於左派人士中」；二曰「左派人士把他作為大牌人物撐門面」。對這些，張東蓀歷來如秋風過耳，只要宗旨相同就不拒絕。這回當然是慨允。

許寶騤幾十年後撰文回憶：張東蓀(在他從郝處回來後)高興地對他說：「告訴你一件事，太巧了，盟裏派了一個人名叫張雲川——他說在香港見過你——來搞盟裏的事。他是徐州人，看上去很老練，又熟悉那裏的情況，派到郝那裏，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我已經對他說了，他也欣然同意。」

張雲川此後即「往返奔走於城鄉，出入於日寇及蔣幫特務之間，是備極艱辛，也每歷危險」。當局的通緝，使他在徐州借住的一所藥店遭敲詐而告破產。在此前後，郝鵬舉曾有一封短信給張教授，有「決心一定，死生以之」之類的誓詞。民盟諸書生都很興奮。

順利完成這一策動之後，用許寶騤的話說：我們的「野心」有點發展了。正在這時，一名本黨(國社黨)同志楊琪山想活動山東偽省長。張、許決定順水推舟，促成此事。許遂出面向王克敏舉薦，楊如願以償。按照張東蓀、許寶騤的設想，楊到任之後抓緊練兵，掌握實力；時機一到即率部起義投歸八路軍。他們甚至在心裏還勾畫出一幅軍事地圖：郝在徐州、楊在濟南，兩方同時起義，連成一片，協助共軍阻擋蔣軍北上。

事實上，1945年日寇投降時，郝確曾履踐諾言，起義投共。[47] 但在收了蔣的大錢之後，又叛了過去，最後被新四軍滅掉。楊琪山到任之後，也練了小小一支隊伍。光復後，他選擇了投蔣，結果還是被逮捕，最後病死獄中。[48]

梳攏軍隊，這是學人應當(包括放膽)涉及的領域麼？出於道義、更出於友朋之慫恿，張東蓀違背自己關於現代社會軍隊組織之理念(軍隊國家化，絕對不屬於黨派與個人)，做出越出專業領域的第一件事——未見嚴重後果，也就沒有從中取得教訓，從而沒能阻止他第二次再犯……這就是我們後邊要講的重頭故事了。

1944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稱「民主同盟」，召開一大。張東蓀以民社黨代表身份自動成為民盟中常委。年底，民盟中委周鯨文抵達北平，「隨即同張東蓀、曾琦等人着手籌建民盟組織」。[49] 民盟華北總支部於1945年春末夏初在北平成立，張東蓀任主委，曾琦、林可璣負責組織；周鯨文、葉篤義主管宣傳。日軍投降前後，開始發展組織。由於曾、林的關係，新盟員大多為青年黨員。

在張東蓀的「交待」殘片裏，有一段沒有為後世研究者所注意的話：

>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殷先生叫我聯絡當時北平的一些民主人士佈置幫助中共受降。但等到日本正式宣佈投降時，國民黨即趕快令日軍保護北京，而使整個計劃全部失敗。

這其實是毛澤東當時對世界總體局勢「情況不明、頭腦發熱」而策動的一個未能付諸實施之大舉動的北平部分。[50] 平心而論，因勝利在望激動萬分而頭腦發熱的，並非毛澤東一人。中共中央北方局動員張東蓀開展活動，以敦促北平的日本人直接向中共投降，比延安更早一步。

張東蓀當時曾盡力配合。藍英年告訴著者，當時正讀中學的他，就曾聽到張先生來到家中，與他的父親(藍公武)說着說着就吵了起來。他只零星記得「漢奸」、「你還要不要命」等話語。

在這樣的危難與動盪之中，張東蓀居然迎來自己學術生涯的巔峰期。

1931到1941年，即日寇鐵蹄踐踏東北、華北，也即他從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這十年，雖然以極大精神痛苦，面對國家破碎山河，張東蓀自身卻有幸託庇於星條旗下，作為燕京大學教授，推出一本本

基於講義的哲學著述：《現代哲學》、《哲學》、《西洋哲學ABC》、《認識論》、《價值哲學》，以及《近代西洋哲學史綱要》，《唯物辯證法論戰》。並一再就社會重大問題發言：〈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黨派息爭是建設之先決問題〉、〈中國之過去和將來〉、〈知識分子與文化自由〉等。

他最重要的四部著作：《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也在黎明之前陸續截稿。張東蓀那年五十八歲，德行學問，都正處於人生最高峰。

註釋

1. 張申府：〈「一二九」運動的點滴回憶〉，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21。
2. 許德珩：〈「一二九」的片斷回憶〉，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頁218–219。
3. 何禮：〈我對「一二九」運動的回顧〉，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頁80。
4. 轉引至章立凡：〈歷史塵封的哲人——記張申府先生〉，載《君子之交如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5. 趙乃基：〈何其鞏與中國大學〉，「福田叢書網絡版」（http://www.futiancemetery.com.cn/ftcs/ftcsl/ftcs1-9.htm）。
6. 劉清揚的回憶或許可以作為以上分析的補充：「少數文化界座談會後來發展擴大改名為文化界救國會。先後參加文化界救國會的知識分子，就記憶所及有以下比較知名的人：北京大學：許德珩、尚仲依。北京法商學院：白鵬飛、程希孟。私立中國大學：齊燕銘、管桐（張致祥）。燕京大學：張東蓀、雷潔瓊。北京師範大學：楊秀峰（兼天津法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張申府、劉清揚（當時我已不是學生，所以參加座談會）。報界：張友漁（可能是《世界日報》）、羅隆基（天津《益世報》主編）。此外有時還有個東北人盧廣義（不是固定參加的），實驗中學（中山公園旁）梁實秋（是張東蓀介紹來的，並不固定參加座談）。以後由於許

德珩和程希孟的關係，我們得以認識邢西萍（徐冰）。據他說，他因在青島被捕受刑，腿被用杠子壓傷正在家養傷，並且已無黨的組織關係，因此，他不完全出面參加座談。」當時還有一個「南京救國會」，那是1936年千家駒憤然從北平跑到南京，和友人成立的。並立即與沈鈞儒、史良、章乃器他們的「上海救國會」取得聯繫。「南救」曾應聘在京城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上課，講「中國的財政問題」。

7. 這是中共歷史上最不堪的、給共產國際當尾巴的時期。王實味髮妻劉瑩（北大學生黨員、捐出嫁妝做黨的活動經費）對此所作之非官方闡述最為生動。已經接上關係的劉瑩，當時不時接到命令去參加的「飛行集會」，實在給嚇壞了。她並不怕死。對死，早在1926年入黨的時候就有了思想準備。她怕靈魂玷污——她親眼見到三名女同學，熊宗瑛、劉敏和劉中一，無一倖免地在「飛行集會」時被捕，繼而遭姦污，終於當了警官或特務的小老婆。她以為黨是可以暫時離開一下的，待鬥爭策略改變之後再回來。誰知一離就是半個世紀，劉瑩從此再也沒能進入共產黨的大門。參見戴晴：〈王實味與「野百合花」〉，載《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

8. 為團結更多人一致抗日反蔣，對第三黨原來黨綱進行修訂，突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主張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刪除其中批評中共的全部內容。彭澤湘承擔修訂黨的《臨時行動綱領》，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該黨的指導思想；響應中共《八一宣言》，同共產黨合作，實行聯俄、聯共、抗日、反蔣的總方針；把黨的名稱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

9. 彭在1935年11月香港召開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第二次全國幹部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組織委員會書記。1937年6月，「解委」組織委員會書記彭澤湘應中共中央之邀赴延安。毛澤東與彭澤湘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進行了長談，廣泛交換了意見。這次談話使兩黨之間有了更深人的了解。「解委」完全贊同中共關於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方針和政策。這次會談保證了兩黨在即將到來的全面抗戰中，實行密切合作。1937年6月15日，彭澤民代表解放行動委員會發表《致全國各界領袖書》。參見楊曉娟：〈淺析第三黨的歷史演變過程〉，《晉東南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1期。

10. 1937年6月12日，毛澤東致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已與彭澤湘在延安

談好我們同第三黨合作問題，他已同意我們的做法，並願回北平指示第三黨同我們合作。」當日毛澤東還致電潘漢年：「第三黨彭澤湘來延安談，尚好，表示同意我們主張並願合作。他明日離延安經北平約半月到上海，我囑他找你。」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680。

11. 同上註，頁682–683。
12. 同上註，頁679。
13. 1930年7月，中共發表宣言，決定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召開全國蘇維埃大會，成立全國蘇維埃政府。9月21日，北平蘇維埃準備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代表們一致要求盡快建立北平蘇維埃政權，認為中國工農群眾在國民黨統治下再無法生活，只有直接革命，武裝暴動，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王作賓(王定南)作為中共北平市委的代表，負責宣傳。
14. 摘自張東蓀「檢討」。
15. 據原燕京大學地下黨部分黨員：〈未名湖畔的風雲——記解放戰爭時期北平燕京大學地下黨的鬥爭〉(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十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及沈啓無回憶：吳繼文與黃家駟等本為協和醫預科同學，前三年在燕大，後來都在協和醫院做大夫，吳繼文曾在燕大本校做校醫。他們都曾參加校內地下黨外圍活動。吳解放後任北京市政協委員，於1980年3月病故。
16. 由於「共產主義」對心靈單純、衣食無憂、有勁沒地方使的富家子弟的誘惑，成功攫取敵方情報，對共產黨武裝奪取所做的貢獻，佔到比官家歷史述説大得多的比例，如紅軍的脱逃，如遼瀋戰役的勝利。中共以「階級路線」，成功打壓了這批烈士與功臣——當然這已經是另一個不能不説的故事。
17. 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18. 笑蜀：〈北中國的自由「孤島」——燕京大學抗戰寫實〉，《南方周末》，2005年9月29日。
19. 如陳紹禹、江恆源、張申府等領銜提出《請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合

法地位案》、《為決定立國大計解除根本糾紛謹提具五項意見建議政府請求採納施行案》等。

20. 1939年1月，國民黨通過《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隨即接連發生博山、平江、竹溝等一系列慘案。

21.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22. 毛澤東語。文革期間入「語錄歌」，童叟男女無人不曉。

23. 同註18。

24. 本節引號中文字，均引自張東蓀：〈獄中生活簡記〉，《觀察》，1947年7月。

25. 張東蓀1952年的檢討，載《新燕京》，1952年6月3日。

26.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北京：中華書局，1995)。

27. 許寶騤：〈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經過〉，《團結報》，1986年11月29日。

28. 需要以此進行整肅的時候，更是隨手拿來就用。以民盟中央1952年10月《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為例：「張東蓀不僅是供給美帝情報的特務分子，在解放前，早已甘心做了親日的賣國漢奸。他在日寇佔領北京的期間，領取汪逆偽組織津貼，策動所謂『全面和平』(即汪、日、蔣合流共同反共)，並與國社黨、漢奸頭子共提賣國提案。這一段事實由於當時敵戰區和大後方地域的阻隔及張東蓀一貫躲在幕後的作風，使民盟組織對他做漢奸的事實完全無知。但張東蓀對此種醜惡事實隻字不向組織上坦白交代。」

29. 許紀霖語，參見許紀霖：《曖昧的懷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0. 轉引自張東蓀：〈獄中生活簡記〉。

31. 千家駒：〈雜談歷史人物(二)〉，《傳記文學》(台灣)，1990年第2期。

32. 千家駒1989年7月赴美而後定居洛杉磯，11月皈依佛門。在以後幾年，《去國憂思錄》、《海外遊子聲》、《雜談歷史人物》、《逝者如斯夫》、《夕陽昏語》等相繼問世。九十歲前後再回中國，居深圳。逝世後新華社發電稱：「千家駒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領導，對鄧小平理論表示堅決擁護，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歡欣鼓舞。」此段經歷或可幫助讀者理解他對本書主人公所作的回憶。

33. 對於王謨案，由於其子一再「揭發」，以期將附逆罪責歸於國社黨及其領袖。張東蓀在接受鬥爭審查的1952年一再說「有人可以證明」，無奈民盟七人小組沒有就此嚴格取證；毛澤東對此則大而化之，致使此情至今未見權威機構定論。
34. 查王伯高本人公諸於世的傳記與自述，均未提到此節。
35. 張東蓀語。張雲川是梁漱溟的學生，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中委，當時與張東蓀同屬「民主政團同盟」。他性情耿直，愛說怪話。1957年被打成右派，致死未獲摘帽。
36.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10–11。
37. 該傳言屬實。據群眾出版社網站稱：該社是新中國公安文化事業的搖籃，它的前身是解放前中共黨組織為在北平開展秘密工作而開設的群眾書店，1956年9月根據公安文化建設的需要改建成群眾出版社。參見「群眾出版社」網站(http://www.qzcbs.com/xxzs/main/cbsjj.htm)。
38.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1。
39. 同上註，頁11–12。
40.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283–284。
41. 林可璣：〈從「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到「中國民主同盟」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台灣)，1984年第5期。
42. 張東蓀：〈討論道德根本問題答素癡先生〉，《再生》，1943年。
43. 龍沐勳(1902–1966)，字榆生，詞家。1940–1945年，歷任汪偽立法院委員、陳公博私人秘書等職，1956年上海市政協委員，離世時為改正右派、上海音樂學院教授。
44. 當時同盟秘書長李璜，組織部長章伯鈞。
45.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淚祭羅隆基〉，載《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180。
46.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072–1073。
47. 具體時間為1946年1月8日。據《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稱：「駐蘇魯交界之新編第六路軍總指揮郝鵬舉，自稱民主聯軍總司令，叛歸共軍(郝原為淮海省長，投降後曾受勒索)。」7月20日，蘇北共軍(偽軍郝鵬舉部)圍攻東海。參見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451、544。

48. 以上敘述參見許寶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一幕軍事活動〉，《盟訊》，1981年3月號。

49.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7。

50.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放原子彈，8日蘇聯對日宣戰，14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毛在延安公開號召：「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同時批准了一項華中局報來的「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在這項計劃裏，他提議「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策應，並調派新四軍部隊入城援助」。不僅如此，他還發電報到華北，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迅速佈置(北平、天津等)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配合軍隊奪取這些大城市——而當時美國正幫助國民黨運兵、運武器，打算搶先佔領。

三

民族解放事業

1　同志會 政團同盟 民主同盟

說起1944年秋天秘密成立的「中國民主同盟」，不能不說它的前身、更秘密地於1941年春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若要了解更為清晰的歷史軌跡，還須追述到更早一些，追到幾具「俱樂部」性質的「統一建國同志會」。

「俱樂部」——在那樣的年代？

1939年9月，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集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當時退到大後方的參政員們，相當一批眾目矚望的人物已經有了自己的政黨，比如幾乎死而後生的共產黨(毛澤東)，國社黨(張君勱、張東蓀)，青年黨(小曾左李)和第三黨(李濟深、章伯鈞)。有的雖然不稱「黨」，也已形成影響力相當大的組織，如職教社(黃炎培)、鄉建派(梁漱溟)、救國會(沈鈞儒)；還有的本人就已經是一面旗幟，比如張瀾、章乃器等。

參政員們踴躍提案。眾人最關注的，依舊是危難中國家盡早走上法制民主之途。《請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黨派合法地位案》(共產黨參政員陳紹禹、董必武)，《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青年黨左舜生、第三黨章伯鈞等人)……全部在政府相當頭疼的「黨治」、「憲政」上做文章。那時候的辯論可不像1949年之後，如果有誰邀寵輸忠，立遭千夫之所指。在道義與輿論壓力

下，會議最後通過了《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蔣介石手裏沒有可以擺弄的大花瓶，不敢不指定黃炎培、張君勱等十九名真正有人望的參政員（後又增加章伯鈞等六人）組成「憲政期成會」，協助政府促成憲政。

張君勱那篇〈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就是在上年12月發表的（《再生》）。羅隆基認為該信「不能代表國社黨立場」的鮮明表態，一定給中共留下深刻印象。他那時已從天津南下，脱去報人身份，受聘為西南聯大政治學系教授。在這回的國民參政會上，他風頭甚健，也受選為「憲政期成會」委員。

1940年4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草成，由黃炎培、張君勱、羅隆基等提交到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大會。蔣介石指示辦理。辦理歸辦理，當局有錢有槍，軍政、訓政的派頭並未稍假收斂。

「憲政期成」諸君「感到勢單力孤」，感到「無力促使國民黨實施憲政」，而國家的局面又弄得他們寢食難安。到10月間，黃炎培、梁漱溟連連開會，覺得必得做點事，而且頂好大家合在一塊兒做。當時國共對立火星四迸，用梁漱溟的話説，「若是兩大黨融洽無間，則形勢又自不同，亦許沒有此第三者之出現。反之，他們的尖鋭對立，恰便……」[1]——國共以外的有志之士，以「中間派」使命自賦，夾到了漢陽造和馬克西姆中間，力圖在「強虜當前、兄弟鬩於牆」的政治中，表達第三者的立場。

他們的《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統一建國同志會簡章》出台。應該説很像樣子。如果今天哪位志士（無論海峽對岸或大洋彼處）也想玩一把，簡直可以拿過來就用——除了多半個世紀來黨八股對漢文字的荼毒，當然也拜專權依舊之賜。那次，咱們中國志士之間最要命的交椅，一點不成問題。同志會規定了「設常務幹事五至七人，輪流當選」的原則。

這俱樂部式的同志會還沒達到預期之效，又出大事了：一是在1940年9月，國民黨中央宣佈，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的國民大會，因故（「交通不便」）改期——不僅今天讀史人，就是在當時，「同志會」對此也看得一清二楚：在當局眼裏，什麼國民大會，不就給你

們搭起罵人的台子，不讓我痛快？

到了10月，杜重遠被逮捕；馬寅初遭拘留；鄒韜奮的生活書店給查封[2]……憲政團體的活動太不愜意了。12月，在公佈國民參政會第二屆參政員名單時，沈鈞儒、鄒韜奮、史良、陶行知等奮勇幫助中共的左派均被除名，裏邊居然還捎帶着一個羅隆基。羅遂以他的率真性情，為我們留下一句至今尚堪玩味的名句：「不要我做參議員（原文如此，應為參政員，下同——著者按），這並不稀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袞袞參政，算什麼呢？如果參議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3]

到第二年（1941），光是捂住嘴、趕下台已經不夠，兵大爺（此處的「爺」須讀第二聲）的手段用上了——「皖南事變」。這一事件，除了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種種說項之外，對「第三力量」的形成，共產黨的說法是：

> 蔣（本來）認為圍擊新四軍、屠殺新四軍的指戰人員、並取消新四軍的番號，打擊了中共，其他黨派必然會低頭跟他走；而各個中間黨派卻認為，蔣既然敢打擊強有力的中共，那麼，小黨派只有團結起來，才不會被蔣介石吞吃。在皖南事變以前，不少民主黨派是站在中間，有時甚至傾向國民黨的；皖南事變以後，不少民主黨派感到國民黨的橫暴，感到自己生存的危機，它們雖然站在中間，但逐步同我黨靠攏。事變發生後，國共兩黨關係十分緊張，面臨着重開內戰的危機。各黨派對國民黨大為失望，對中共所持立場深表同情。[4]

雞們告猴不要吃「儆」。橫暴面前，大家不能引頸就戮。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他們起初只是想在國共之間勸和，制止雙方的衝突。後來「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梁漱溟等四人會商，決定加強中間的組織。因為想來想去，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強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5]「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開始秘密醞釀。

左舜生說得更為具體——依舊是道德判斷而非程序合理，其實已經蘊含了日後的分手：

它是一九四一年發動的，其直接的動機，是由於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議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抗戰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6]

為突出共產黨的領導，官方正史如此描述：

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聚談，各黨派「深感為民主與反內戰而團結之必要」……經過反覆討論，決定在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基礎上組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7]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特園秘密誕生。那是張瀾的學生鮮特生宅邸。毛澤東後來特別為該園題詞「民主之家」。與會十三人——自然成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

讀者諸君一定已經注意到，此時的着重點，已經由（大敵當前的）「統一」移到（意在分權的）「民主」。爭「民主」麼，第一須有聲音；第二須有組織。據後世記載，「曾琦、張君勱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民主政團同盟，首先決定兩件事」：創辦言論陣地《光明報》；在淪陷區成立支部。

第一件，梁漱溟自告奮勇到香港。而第二項，曾琦囑咐，「淪陷區民主政團同盟支部事，宜推張東蓀主持」。

另有一項不便大書特書的決定，是大家情合理順的擔心：別一上來就給滅掉。為求得委員長的諒解，須佯裝跟共產黨保持距離。他們於是敦請本屬「建國同志會」、但「太過左傾」的救國會暫時別露面，並且選擇在境外發表宣言，以期事實既成之後，爭取回來取得合法地位。5月，梁漱溟銜命赴港。5月20日到達後，即在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及救國會海外組織的具體幫助下，開始籌備出版報紙。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9月18日正式出版，發表了成立宣言和對時局的主張。《十大綱領》出於羅隆基之手，就是今天讀來，也很難不動容。可惜不僅籌辦費是中共出的（五千元，經范長江交社長梁漱溟），總經理（薩空了）也是奉周恩來之命前往的。

中共那時對這批先生們相當客氣(乃至倚重)。至於私底下，自詡為「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就沒那麼客氣了。包括處於聯絡第一線的李維漢都曾有過這樣輕佻的論説：「民社黨黨員一共二十四個人，張君勱，張排長。青年黨黨員不出一百人。」[8] 但周恩來肯定清楚，這個新政團雖然只有數千成員，大多數是各界頗有能量的頭面人物，在知識界和工商界的影響力非同小可。[9]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開始以獨立姿態，就重大國是發言，並實際切入國家政治生活。它要求當政的國民黨結束黨治，實現政治民主化，保障人民的自由；在主張軍隊國家化的同時，反對共產黨「武力割據」，要求其將軍隊交給政府。「政團同盟」對兩黨都進行了批評，也都提出了相應的要求，體現了秉公持中的「第三者」中間政治立場。《光明報》社論(就其文白參半的行文風格看，很像梁先生親筆)寫道：

> 大家都沒有武力作其政治要求的後盾。此為聯合內的各成員(各黨派或個人)之一共同點，而以與聯合外的兩個方面相較，則此為其一重大之不同點。他們的前途，只能以言論以理性去活動。

國府那邊拿不出辦法，只是一味地壓。比如孫科等魚腦子要員，就堅決否認「民主政團同盟」存在之合法。這不是時勢造英雄麼？政團同盟中央常委遂鄭重決定公開自己的組織。1941年11月16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借大家都聚集重慶之機，主席張瀾、總書記左舜生、組織部長章伯鈞、宣傳部長羅隆基，一本正經在俄國餐廳舉行茶會，邀請國共兩黨代表和國民參政員出席。左舜生報告了成立經過，公開宣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

第二天，參政會開幕。民主政團同盟發出重炮，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共產黨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等聯署)：[10]

> 立即結束訓政，實施憲政；
> 成立抗戰時期正式民意機關；

政府一切機關不得歧視無黨和異黨分子；

不得強迫公務人員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黨費不得由國庫開支；

保證人民各項自由，停止特務組織對內的一切活動；

嚴禁官吏壟斷企業，投機倒把。

公開之後，他們依舊沒能認識實業界和商界的重要，不知如何保護其切實利益。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開大會、發號召，影響輿論。比如張瀾紀念「九一八」的文章〈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等創辦《憲政》、《民憲》、《中華論壇》等雜誌，以及分別在不同城市成立「民主憲政促進會」、「民主憲政座談會」、「憲政研究會」等民意機構。還好除了比較原則的老生常談「切實實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論之自由和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會結社之自由」等，已經明確提出「給予各級民意機關以必要的權力；切實改革徵兵、徵糧、徵稅之弊端；嚴懲貪污，杜絕中飽，革除苛擾，以減輕人民痛苦；以及實施全國動員——組織人民、武裝人民」。

所有張瀾、左舜生等在前台之作為，都有共產黨暗中支撐與公開敲邊鼓。而共產黨有了什麼為難之處，他們當然義不容辭。如1941年4月中旬，何應欽在西安召集軍事會議，定計突襲延安。周將得到的情報遍告第三方面，大家立即往謁蔣介石。[11]

形勢發展太快，快到「政團同盟」若是再怕犯忌，而將「救國會」諸人排除在外，已經違背時代精神。更何況兩年來，讀書人都要為國家盡力，個人盟員的數目不僅大大超過了黨派數目，戰鬥意識更是無比旺盛。

「政團同盟」已經顯得帽子小腦袋大。曾經對盟務最具實際操作能力的青年黨左舜生記下了當時的勉為其難：

……因為救國會分子沈鈞儒、張申府、史良、劉清揚、鄧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動範圍加廣，盟員也逐漸加多，好奇者投機者，紛至沓來，盟員也一天天複雜，中共想利用民盟作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趨於明顯。這

黃炎培賀張東蓀六十壽辰的祝壽詩

晨披宿霧往暮帶斜陽歸林風[illegible]解主人家
入荆扉世尚日健步自適暮生涯[illegible]天藝兄
怪強就肩與空[illegible][illegible]、適復京晚陽息影[illegible]
調推究[illegible]懷萬不入[illegible]歎不作寬[illegible]戚[illegible][illegible]主
誰是知音人世弦調太古　右息江日課四首　說來豈
謾說不來讀自己風月與君同領君自領取[illegible]
同世乃法道一大地食慕說廿年事可對君分家
詩從之北蘇蕭陶淵[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塵勞寒以一
面耳禪且說世之於詩何足知此[illegible][illegible]北其
知音且暮遇　右讀息江日課四首　乙酉冬日[illegible]年
東蓀先生教　[illegible]如陳銘樞

陳銘樞賀張東蓀六十壽辰的題辭

> 時主持昆明支部的為羅隆基、聞一多、李公樸諸人，他們覺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團」兩字，對於以個人資格參加者頗感不便，因提議取消「政團」兩字，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後來民青兩黨退出後，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邊倒」……[12]

李璜也一步步看出，在重慶陪都時，第三勢力之集結成形，表面上是梁漱溟和左舜生，而骨子裏出計劃策，且用力最甚者，乃是黃炎培和羅隆基。後來由羅「勾結救國會」把第三勢力的民主同盟，引到傾向中共，於國民黨的損失甚大——也是黃羅兩人始終經手的。[13]

不管怎麼說，到1944年秋天，成立一個新的、更具代表意義的組織（民盟）已成定論。

不見有文字考證，那個搶着在9月19日召開的民盟全國代表會議（也即成立大會），與9月15日林伯渠在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的那個報告，有沒有直接聯繫。

在這個報告裏，在野方面已不僅僅只客氣地提提建議、要求參政等等，而是再度撿起放涼了的「聯合政府」的旗號：

> 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14]

隨後，中共又以書面形式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方案。在野力量改變了過去僅僅貢獻主張的姿態，決心具體介入國家政治生活、參與政治決策。

為迎接這一新的歷史使命，民盟成立大會在上清寺「特園」召開。雖然會議地點不過私邸，參加者不過五十四位，就其以救民族於水火之大任的自我期許而言，實在比得上五十年代以來任何一屆金碧輝煌之大會。

兩項議程，第一項改組（去掉「政團」二字）。幾年前藏着掖着的左派救國會，終於登堂入室；無黨派代表也大量湧入——這都使得「第三勢力」相當明顯地向左（或者換句話說，向在野的共產黨那邊）

擺。會議選出的領導機構，三十三名中央委員裏邊有了共產黨員（周新民）；十三名常委裏邊有了救國會領導人（終生左派、「比共產黨還共產黨」的沈鈞儒）。青年黨抓住了最具「顯性實權」的秘書長一職（左舜生）；而最具「隱性實權」的組織委員，落到名義上第三黨、實際上的前共產黨員和現共產黨密切合作者（章伯鈞）手裏。真正元老——雖然那時已脱離國社黨——羅隆基得了個響動大、實權小的宣傳委員。梁漱溟和張君勱分別為國內關係委員會和國際關係委員會的主任——需要主持人具有德望的輔助性位置。青年黨依舊雄心勃勃，不僅大量發展本黨民盟成員，對進入中央委員會決不禮讓（三十三名中佔九名）。可憐民盟新成立，一無經費、二無辦公地點，日常工作全由青年黨中央代辦。

後世議者多強調此次會議組織上的成就：由民主政團同盟而民主同盟，卻往往忽略奮鬥目標的變更。應該説，「聯合政府」的提出，對在野黨而言，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有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向當局叫板！權力再分配的制度性政治要求！

這一口號的提出並不簡單。它源於對外部形勢變化十分敏感的毛澤東。該年8月17日，毛在董必武請示周恩來的電報上批示：「應與張（瀾）、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聯合政府」四字七七事變以來第一次出現；半年後，登上（共產黨內）權力顛峰之際，又由他本人將其做成氣派雄偉、橫貫整個內戰、收攏國統區人心之大局：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當時沒有人對該報告字面上傳遞的信息有過懷疑，直到2008年李鋭在《炎黃春秋》撰文，才提到他1947年初由冀熱遼分局遷到林西時，聽分局負責人歐陽欽（楊清）所作的一個報告。那時，第三方面斡旋國共已然失敗，兩邊正準備大打，歐陽欽告訴與會者，原來在「七大」時，毛澤東的口頭報告裏就有這樣的話：我們戰勝蔣介石，革命成功之後，主要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黨派了。[15]

綜觀二十世紀在中土風詭雲譎之政治角鬥，真正稱得上毛澤東「你知我知」對手的，不過幾人。「聯合政府」的旗號，李濟深直到徹底投降（從香港到東北參加新政協籌備）前夕還在用（建議傅作義成立

國、共與他們的三家聯合政府)；章伯鈞則在聖人、學究們依舊大談自由、民主、民意的時候，一再強調「實行聯合政府」！[16]至於蔣介石，直到他留在大陸的最後一天，對這一叫板，也不曾有過絲毫苟且。他的信條是：「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17]

因為會期定在學校上課的日子，張東蓀教授指派葉篤義作為自己的代表赴重慶。作為國社黨元老，張東蓀自動成為盟員，並列名十三人常委。那時，他以知識論為根基的第四本著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結稿。他託葉篤義將自己的心愛命題帶到重慶，由張君勱作序之後交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出版；同時有簽名的稿本送周恩來、張聞天。

對張東蓀在北平與中共的聯手，張君勱很表贊成，說自己在重慶「同中共的關係也搞得很好」，「美國人對蔣介石很不滿意」，「將來可能成立聯合政府」。會後，葉篤義奉派回北平成立「民盟華北總支部」，委託張東蓀任主委。[18]

抗戰勝利前夕，醉心於「民主體制下的社會主義」之諸君，沒有人對「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新民主主義制度」懷抱絲毫警惕，也不知道「新民主主義制度」這一「期間」，能在一黨獨大的體系下延續多久。他們都覺得，毛公的講話，多麼真率、多麼氣勢磅礴啊——

>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19]

何謂「合作」？何謂「敵對」？第三方面諸君，還有沒有人記得

1913年底知識界那場關於「對抗論」的辨析。張東蓀那時在《庸言》、《正誼》連連發文，直指專制者的這一「偏好」：「國家社會之進步，在調劑，不在統一；在競爭，不在專制；在活動，不在一程而不變也。」[20]

到1949年秋天，各黨派、各人物雖然相互鬥爭得相當丟面子，但在與中共的合作上，都沒有採取「敵對的態度」。議論國名的時候，大家一致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麼聯合不聯合。官方也周到地對此作出說明：

> 新中國成立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儘管不叫「聯合政府」，但比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提出的「聯合政府」，代表性更為廣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包含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了全國人民空前的大團結」，是一次「準人民代表大會」。這次會議產生的「基於民主集中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府」，具有更大範圍的民主性。[21]

六十年來，這「更大範圍的民主性」如何在中國體現，想來讀者有自己的判斷。

2 老政協

(1) 之前

1945年8月6日，美軍投放原子彈。兩天後，本該在2月就出兵，卻遲遲不肯動作的蘇聯，終於對日宣戰，百萬部隊揮師中國東北，直如餓虎撲食。

毛澤東這回不認為他的「筆桿子」們（胡喬木等）是在「誇大原子彈的作用」了。在與朱德聯名發電祝賀並熱烈表態[22]的同時，極為高興地對他的班底（全體中央委員）說：蘇聯參戰了，這就使抗日戰爭

進入到最後階段。與蘇聯紅軍配合作戰，這太痛快了。原來以為要與美國配合，那才是麻煩呢。

他說這話的時候，宋子文還沒有趕到莫斯科去簽約；《雅爾塔協議》也還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弱國保密——料事如神如毛澤東者，也不可能知道在以後的半年裏，拜兩條約所賜，與為了自己實際利益而翻雲覆雨的蘇軍「配合作戰」，多麼痛快不起來。

朱德不失時機地連續兩天（8月10日、11日）對各解放區發佈反攻命令，「中國抗日力量」[23] 開始在東北與蘇軍並肩作戰——雖然美國全面支持國府，令日本不得向中共投降；蔣介石明令中共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毛才不管這些，他在延安公開號召：「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8月13日）——勇往直前（雖然頭腦略遜）的「先鋒官」曾克林正往山海關趕呢。

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24] 蘇軍保證將東北交給國府。得到美蘇兩大強權全面支持，蔣介石自該日連連發電，邀請潤之先生到重慶會談。對此，中共中央例行通告黨內：「完全是欺騙」。不料蘇聯開口了。一封發自「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而非如以前親切署名）的電報，要求毛澤東接受邀請前往，救世主般嚴峻又冷淡：「如果發生內戰的話，中華民族將有毀滅的危險。」[25]

怎麼辦？打下牙往肚裏咽……這也不是第一回了。8月23日，一肚子委屈的中共領導審時度勢，決定順勢「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當然，與法共不同，中共是不交槍的。毛的墊底主意：「只要把軍隊拿在手裏就有辦法。」

第三勢力當時能做的，也就是在重慶有聲勢、帶感情地開會慶祝了。對那兩件最關緊要的事：國共軍隊到處發生衝突；政府決定對日寬大，不索分文賠償；[26] 大家雖然內心焦急萬分，也是一籌莫展。

8月28日下午，毛抵達重慶，「整個山城為之歡騰」。雖然來自絕域窮邊，帽子手錶全是臨時抓來，但毛神采飛揚，舉止得體。一首十年前舊作（「江山如此多嬌」），以狂草筆勢書就之行草，把一大片良相特色尚未褪盡的新政治家一攬子拿下。

但縈繞在他心頭的，究竟是什麼？

一下飛機，歡迎人群中，毛一步跨過去熱情拉手的，是民盟主席張瀾。雖說屬於列寧式底層暴動、「農村包圍城市」創建人，毛深諳私兵制在中華本土葉茂根深。這一歷史性拉手，與其說為將來民盟與共產黨之珠聯璧合墊底，[27]不如說格外看好表老在地方軍人中的聲望。

除了禮儀性的應酬，從8月底到10月初，中共「僅與國民黨領袖們多日秘密商談」，[28]沒有會見在野黨，也沒有向社會公開商談內容——唯張瀾除外。據後人記載，此期間毛不止一次專門登門拜望。[29]有所求的毛話不多，張瀾反倒指點江山不已，即毛回到延安之後所說：「民主同盟說我們調子低。這樣，我們就開始攻勢。」[30]

小民革諸君（他們個人身份多為國民黨高層）不宜怠慢（抵渝第三天即見，緊隨國民黨當權派和「國母」之後）。對民盟實權人物青年黨左舜生，則只有過兩次禮節性宴請。比較不尋常的，倒是國社黨。當時，張君勱、張東蓀都不在重慶，毛竟然特別請徐冰將蔣勻田[31]（張君勱秘書、民盟中委）等幾名國社黨幹部約到自己在重慶下榻之處（桂園，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張治中家）。近三十年後，蔣勻田依據自己的筆記，對這次談話做了詳細披露。

毛告訴蔣勻田，與國民黨「商談了近二十日，時間白費，毫無結果，已面臨僵局了」。蔣勻田問僵在哪裏，毛回答說：「一個是軍隊分配的比例問題；一個是我們管理的地區自治問題。」

蔣勻田當時不過是無錢無槍、在野黨的一名中級幹部。受到了別的大佬不曾有的待遇，居然沒像我們所熟悉的民主人士那樣唯唯諾諾、感激涕零。他當時即直言：

> 你們所商談的問題失敗了，甚可惋惜！可是從人民的眼光看，即使如此商談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敗。……假使毛先生同國民黨的領袖討論此類問題，應讓其他少數黨領袖參與會談，不宜僅限於貴黨及國民黨。

毛沒有覺得冒犯，反倒補充說：

剛才在飛機上，赫爾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議說：「既然實質的問題談不通，最好再從民主政治的原則商談。」假使同國民黨商談此類問題，我們共產黨的代表一定主張邀請其他黨派參加。

據蔣勻田記載，毛澤東還對他說：

此次來訪重慶，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見到張君勱先生。我少年時候，即拜讀張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經久仰了。張先生多年來不計艱險，為民主政治奮鬥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給我的一封公開信，想你亦必閱過，在那封信裏，他主張要我們將軍隊交給蔣先生，老實說，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若教我將軍隊交給政府，理猶可說，教我交軍隊於蔣先生個人，更不可解。

對於百姓供養的軍隊應掌控在誰人手中，毛雖然有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等等不容置疑的宏論，[32] 但在當時，對蔣勻田說的是：

最近蔣先生曾對周恩來同志說：盼告訴潤之，要和，就照這條件和，不然，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我異日拜晤蔣先生，當面對他說，現在打，我實打不過你，但我可以對日敵之辦法對你，你佔點線，我佔面，以鄉村包圍城市。你看交軍隊於個人，能解決問題嗎？

老實說：當我們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苦鬥，甫抵延安之時，人只有一萬多，槍只有八千餘。蔣若再派一師兵追擊，則我當時的處境，誠難設想。幸他派張學良、楊虎城率兵圍攻，可說給我們大的幫助。因此演變，乃克逼成對日抗戰，而有今日的勝利。不知君勱先生發表那封信時，想到這個問題沒有？我想君勱先生是沒有機會練兵。若有機會練兵，他也必會練兵的。

蔣勻田答，對於(張君勱)那封信，他、梁、沈都有不同看法。

但是關於練兵一節，則追問毛有否看過國社黨創建時政綱，裏邊明確載有：「不收現役軍人為黨員」;「我們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與力量為基礎，不是單憑武力可以打出來的。……不願以武力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黨的組織行動，不計個人犧牲，反對一黨專政，啟發人民對民主制度的認識與信心，漸漸趨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至於「幾十萬條破槍」，蔣匀田也有「任人宰割」的同感。但他問毛：「假使有一天我們認為不需要槍桿護衛，可以自由活動，如歐美的民主國家一樣，用自由競選的方式取得政權，毛先生，你願否放棄所有的槍桿呢？」

毛很技巧地說：

> 在未答覆你的問題以前，我先請你答覆我的問題：你相信或不相信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技術，不在任何政黨之下呢？……你既相信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技術，不在任何政黨之下，則你已答覆你所提的問題一半了。你想，假使我能憑政治鬥爭技術，以取得政權，我為什麼要負養數十萬大軍的重擔呢？不過還須請你注意一點，軍隊國家化固好，所有特務人員，更須國家化。不然，我們在前頭走，特工人員在後面跟蹤，這樣威脅，那我們又如何受得了呢？

據蔣匀田記載，毛先生講到特工跟蹤時，即站起來，以行動表現，左右轉頭向後看，使在座的人為之驚笑不已。其實當時隨他一同見毛的三名隨行國社黨員裏邊，一位孫姓者，就是「國民黨指派滲入貴黨的情報人員」——這是盡職盡責的民盟組織部長章伯鈞，在審查參加「制憲國大」民社黨代表名單時候明告的。章的這條報告，直到1964年才從側面得到證實。那年，蔣匀田到香港，港大教授劉伯閔對他說：你當年與毛的暢談，經由隨行特工寫出報告，說「毛坦然表示，只要能有政治競爭的自由而取得政權，他不願意負養兵的重擔。」——真是一名學問良知俱佳的特工！但為什麼這一情報沒能使

國民黨相信中共在當時確實已經準備以在野身份加入政府了呢？「彼疑此譎，此疑彼詐」——中國千年政治文化傳統？[33]

不管怎麼樣，到10月10日，雖然在軍隊和解放區的問題上，誰都不做絲毫讓步，但蔣還是第一次以共產黨為平等對手，簽訂並公開發表了《雙十協議》。簽字當天，比誰都想得早一步的毛，登門拜會蘇聯大使，打探：如果美國出兵，蘇聯怎麼辦。彼得羅夫僅以官話應付。

《雙十協議》公佈當天，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抵達重慶，「建議」國民政府盡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各黨合議的方式，調解國共兩黨直接的衝突。特使身後就是美援，國府會違拗麼？召開政協的日子立刻定下來：就在下月，11月12日。

在這條戰線上，共產黨也有相當準備，立即提出「民盟須作為政協會議單位之一」。

回到延安的當天(10月11日)，毛即對中央政治局做了彙報。如果從日後中國人自己再度自相殘殺凡四年看，這次的兩對頭會面，只能算是留了些歷史遺痕，並無任何實質上(哪怕意念上)的進步——如果非說有，也只是負面：在一片讚許、歡呼聲中，歷史為毛澤東搭建了一個舞台，由他從劣勢起手，以開明、謙和之姿，玩弄民主高調以安撫輿論，同時忽悠有錢有槍的美國盟友，以爭取時間，完成「全贏」的軍事部署。

我們且不評說他在重慶怎麼力爭「言論、集會、出版自由」，怎麼建議「減輕人民負擔、改善人民生活」，不說他如何向產業界人士許諾「在國家獨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前途」，這些，敬請讀者自己對照他得到政權之後的作為。這裏只說他如何觀察、周旋於本書主人公所屬的「第三方面」的勳績。

在那四十多天裏，他發現「民主同盟的調子」(或稱代表民意的在野黨對專制當局的要價)，比共產黨還高，由此激發了他的靈感，開創出共產黨奪權取勝的「三大法寶」之一：統戰。[34] 那年秋天，毛澤東愈來愈明晰，拿下國統區，絕不僅攻城略地一招。借「民主人士」之力，實現自己最後勝利——多麼現成！他和他心領神會的屬下，

立刻捉住戰機。用他報告中的話說，就是「這樣，我們就開始攻勢。恩來十天之內向文化、婦女、產業、新聞、小黨派、國民黨民主派各界活動」。[35]

「被統戰者」那時候並不十分明確自己給共產黨捧為座上客的由來——像日後共產黨已大權在握，且「統戰工作」已經玩得相當圓熟的時候。他們那時還以為，大家正憑着良知為國家攜手奮鬥。令他們百思而不得其解、而且誰都沒有辦法的是，禮遇歸禮遇，說到唇焦舌敝，兩邊該打還是照打。

10月13日，蔣介石再次下頒「剿匪密令」——「努力進剿，迅速達成任務」。不幸國軍在上黨、平漢線連連失敗，中間還夾了個高樹勳起義。共產黨這邊，則已改變意圖，做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新戰略決策，從各解放區抽調十萬主力部隊和兩萬幹部趕往美麗富饒、有鐵路港口、有鋼鐵礦山的東北。毛澤東說得再直接沒有了：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丢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36]

但民眾渴望和平，反戰運動如火如荼，停戰已刻不容緩。怎麼停？只有兩途：外邊強人出面調停。外邊人又有國外國內之分。蘇聯堅決拒絕介入；「停戰調處執行部」由美、國、共三方組成。同時，各黨派和最具威望人士集合的「政治協商會議」開場——這時已是1946年1月13日。

(2) 開場

在1945年10月上旬，民盟抓緊時機，正式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東蓀獲選為共有十三人的民盟中委常委之一。

會後，張瀾主席和左舜生秘書長接到張東蓀發自北平的電報，要求在將來的政協會議上佔一席——這或許出於國社黨攻略，但也符合我們主人公「就重大國是發言」之本意。11月底，張教授向燕京大學請假一年，抵達重慶。征塵未洗，「陳立夫先生在其官邸設宴款

待，我亦被邀作陪。」(蔣勻田回憶)接着出席12月9日「昆明『一二一』反戰殉難烈士舉行追悼會」，與張瀾、梁漱溟合獻花圈。獻辭為：「為反內戰而犧牲，真成痛史；試思中國之命運，能勿憂心。」這無疑出於他們之本心，但確已納入共產黨之統戰。

12月15日，馬歇爾接受任命，銜「美國駐華特使」，接替蔣最愛而毛最恨的赫爾利。白宮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力主「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會議，以謀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以促成中國之統一」。中共政協代表團第二天即抵達重慶，全面同意美國意見之外，特別強調：一旦政府改組，即交出軍隊。

更有意思的是，馬特使在上海會過蔣介石、飛抵依舊是陪都的重慶的時候，飛機舷梯旁恭候的，竟是兩名帥呆酷斃的戎裝共產黨將軍：周恩來和葉劍英——宋子文等國府高官還沒趕到。馬帥吃一小驚，因為根據協議，美國立即向中國提供的三十九個師及八個空軍大隊的裝備，國府是唯一受者，共產黨一粒子彈都分不到……忙問臨時代辦是不是大使館通知錯了，羅伯遜也一頭霧水——其實哪裏用得着大使館？馬帥甫抵上海，中共外事組已經從駐重慶美軍總部得到他的準確行程。

這批武器曾經深深刺傷中共。唯其深刺，更激起志在必得的鬥志。美國朝野一直在質問：「制定這一政策的人，是否了解這些槍炮將派在什麼用場？」「蔣介石為什麼榮膺『運輸大隊長』之雅稱？」杜魯門也說過：「裝備國民黨，一個勝仗沒打；共軍繳獲之後，北平、西北幾天就打下來了。」[37]

本來一個多月前就應該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因為名額拉鋸一拖再拖。最後，有「統戰」在胸的共產黨，以其包容、大度及高超的政治智慧，終使各方達成妥協。

為什麼國府在捱延一個多月之後終於同意了？為什麼共產黨在這件事上表現得如此識大局、顧大體，令人感動地一次次讓步？表面看，是馬帥抵華、三國外長一致表態，以及國內高漲的反戰運動；更深的原因是，從光復(8月中旬)到年底，國軍場面上氣勢雖凶，實際攻城略地沒佔到多少便宜；而共軍在這四個半月，地盤與兵力(特別

在東北）的擴充，已達自建黨以來從未有過的局面。如果非言和不可，當然要在便宜佔得最大的時候——更何況局面是以「政協」之名目加以維持的。

望讀者諸君一定記住這個日期：「全面停戰生效的1月13日」。[38] 這是光復之後約半年間，兩邊靠着自己的名頭、實力與士氣，分別從日軍、偽軍手上拿下地盤之截止期。此日之後，在美蘇兩強權或光明或卑劣染指下所發生的一波接一波局面變更，再也沒有被兩邊同時認可過。

毛澤東那時正累得一病不起。在延安主持全局的，似乎是梟雄霸主之心略遜的劉少奇。戰場之外，政協會議遂成國共角鬥場。第三方面的政協代表，一時間身價陡升，成為兩邊着意拉攏的對象。

政協會議正式代表三十八位，[39] 由各黨派協商產生。不能說已將頂尖人物盡數網羅，但代表們在德望、參政議政能力上，尚得到整個社會的推許。至於傾向，總的說來，青年黨傾向國府已毋庸置疑；共產黨則拉住了民盟左派；立場持中的國社黨，顯得特別起來。羅隆基說：

> 在政協進行期間，國社黨的張君勱、張東蓀，居然成了賓客滿門、接應不暇的紅人。國民黨除經常派人個別地和他們保持接觸外，1月12日，蔣介石特別設宴款待二張。1月22日，張群、吳鐵城又設宴款待民社黨這兩個巨頭。據當時報紙報道，在這兩次宴會上，都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張君勱、張東蓀兩人在此以前並不是政治上的紅人，特別是張君勱，抗戰前在上海的時候，是被國民黨特務綁過票的。到了現在，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和中華民國主席的身份，居然躬親其事地設宴招待，豈是毫無目的的應酬嗎？[40]

目的歸目的，二張那麼容易入彀麼？席上談話，幸虧有零星記載留下。蔣勻田一年後對張群說：

> 勝利後初到重慶，蔣主席宴請你們三位張先生，（按即東蓀先生，君勱先生，及岳軍先生），暢談國事。（東蓀先生）曾建議不

必劃東北為九省，增加將來管制的複雜。同時最後派張學良回到東北，本過去的關係，較易收攬人心。萬一不能信任張學良，即派首義抗日的東北名將馬占山回去主管接收，或易為喪失多年的東北同胞所信託。此一遠見上策，當時不幸未蒙採納。可是現因東北局勢變亂，據聞已有悔不當初之意。[41]

政協會議在國府大禮堂正式開幕，是1946年1月10日。出席人三十六名（莫德惠、張君勱因參加制定聯合國憲章尚未返渝）。這是真正能展開討論的人數，而非動輒上千的光彩包裝表決機器。蔣介石作為「唯一主席」高調開場。[42] 接下來的周恩來的致辭，曾琦、沈鈞儒、無黨派的發言，都得體漂亮。用當時親聆者的話說：「上下中外欣喜若狂」。

在當天的會上，孫科以「政協協議之執行班底」身份發言，給出了政府的打算：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擴大基礎，確立「國府委員會」為決策機關，國民大會如期召開（制憲而不行憲）。這一天也是聯合國首屆大會開幕的日子：嚴正警告世界不得再有戰爭。

多麼重大的一天。然而，半個世紀過去，無論政協還是聯合國，對強人和強權究竟有多麼大的約束力，我輩納稅平民實在樂觀不起來——政協期間，東北已經開打；本書截稿的2008年，伊拉克正血肉橫飛。

接下來的三天（1月11至13日）是大會。在張群和周恩來分別報告了國共商談停戰和恢復交通等事宜之後，停戰令頒佈；調處執行部投入實際運作。

接着討論政府組織（即俗話交椅分配）：國民黨堅持共產黨先把軍隊交給政府，再逐步走上民主。共產黨則說沒有政治民主化，什麼都你說了算，我怎敢交軍隊？中間勢力力主軍隊立即脫離黨派而歸於國家，達到軍令、政令統一（漂亮空話）。爭到最後，在紙面上通過了軍隊屬於國家、軍黨分離、軍民分治等原則。

雖然主動要求參加政協會議，並且被推為最要命的軍事組主持人，張東蓀此時的態度，據他一年後回憶：

著者在政協會中除為人民爭自由外很少發言，後來亦非萬不得已不說話，不外乎總想不要因為個人言論而致民盟在國共橋樑的地位受影響。[43]

所謂「萬不得已」，第一次，是在國民黨代表王世杰提出政府改組的時候。方案強調「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及主席否決權」。中央社當時報道：

主席方面宣佈開始討論，民主同盟代表張東蓀忽然把問題扯過，說了一番「條件」的理論：「必要條件非足夠條件」！他說：「光討論政府組織是不夠的，必以先實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為條件。」

用中央社記者的話說：「政府不是已經宣佈要這樣做了嗎？但他(張東蓀代表)的條件來得厲害」，幾近「要挾」：

不行，政府一定要在三五日內做到，並報告實施情況。

據當時在場的蔣勻田所做的記錄，張東蓀發言的要點是：

在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之時，單談改組政府不夠。因為由一黨政府變為多黨政府，而不談人民自由，一般人民對多黨亦將失望。假如沒有人民自由，即使各黨加入政府，亦將無所施為。開幕時當局所宣佈之四項保障人民辦法，在討論改組政府以前應先做到。那麼進行政府改組時，才有很大的幫助。

如何做到保障人民的自由？照議事日程五天交換意見的結果，希望於星期六會議，政府即對此有具體的報告：何種條文已明令作廢？政治犯已釋放若干？有些法規，經立法院通過者，須經立法院廢除；而有經國民政府、中宣部、社會部頒佈者，一天內即可予以廢止。政治犯可分批釋放，特務機關即可明令裁撤。政府對以上應有明白報告。即使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也應做到百分之九十或八十。[44]

對張教授的立場，我們今天已經看得很明白：安全地陪着當局言

辭漂亮地玩開會，外加豐厚薪酬，就像二十世紀中國自有「共和」以來，林林總總的光鮮人物們之所為，為他所不取。有他挑頭兒，同道者即跟上。據當時記載，張東蓀話音剛落，梁漱溟即發言支持這一質詢，追問政府的諾言：請先告訴我們你們做了什麼？如得不到報告，不願談其他問題。

青年黨代表覺得「這樣打岔實在不好」；政府方面認為「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應有其特殊地位」；「先要政治休戰，方能保障人民自由」。國民黨代表陳布雷認為他們以「條件」來對政府說話是不對的：

本人非為執政黨辯護，政府近年法律與文告，確已向保障人民自由方向之路努力。事情必須慢慢來，如此催促緊急，以中國之大，將不能做到確實與徹底。

陳布雷與張東蓀同為世紀初留日生，個人的道德操守也都無可挑剔。他們在這裏所表達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我們後世讀史人，或可理解為：轉型期，張東蓀較接近西方意識形態；陳布雷更具中國傳統文人風格。

據蔣匀田記載，對陳氏的「慢慢來」，不苟言笑的張東蓀此時很動了感情——說到精神桎梏甚於身體刑拘：

「飽漢不知餓漢飢。」我坐過牢獄，我知道犯人的心理，一點鐘就等於一年。故對人民自由之保障，愈快愈好；而對政治事件，倒不妨慢慢的商量。

這番話，激動了周恩來，想到1936年底東北軍、西北軍義救共產黨於瀕死那一幕，他說自己「受着政治、道義、良心的責備，要求政府回答一句話」，能否盡先釋放張學良和楊虎城：

九年前為着挽救國家危機，他們雖然魯莽了一點；但這卻是驚天動地的事業，安慰了全國人民。蔣主席也應允要政府釋放。就是以法律來說，也已過期。希望政府不念舊惡，以慰東北、西北的父老。

所有的人都知道，當時身處重慶而對張、楊獲釋最為關注的，可說有二人：周恩來和周鯨文。前者是政治考量；後者是鄉誼。蔣匀田記錄了事情的緣由始末：

政協之前，……我曾在張標芳先生寓所的涼亭中，與周恩來先生談及此事。他當時對我說：現在國共和談演成僵局，假若此時提出釋放張的問題，恐怕不但無效，可能更加有損他的安全。時隔未久，周恩來先生在政協大會中，如彼慷慨發言，要求釋放張、楊，前後設想迥殊。所以我說係受東蓀先生那段釋放政治犯言論的激動。

蔣匀田認為，周恩來的放人，只有道義和政治運作的考慮。這就是為什麼在他執政的時候，不曾對「反革命宣傳罪」等限制思想自由的法令提出過異議。周算是現代中國第一大政治家了。在此就看出他們的局限。只有張東蓀主要出於政治理念，做法也是最根本的：廢除法令。

「無黨派賢達」郭沫若當場發言支持民盟立場。在提到政府可以「就容易的先作」的時候，他特別提到「如新聞檢查制度」為什麼不廢除？這本不錯。但他又說，「重慶的電影戲劇檢查，尚未廢除。假如邵立子、陳布雷來審查，將受益無窮；而偏偏審查的都是文字不通的人。」

怎麼能不為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崎嶇漫長哀歎：郭當時是九位賢達之一，後來又擔任共黨政權文化頭目凡二十年，在思想言論自由這一觀念上，竟發表如此外行之見。他本人，還有胡喬木，若嫌不夠再加上日後榮任社科院副院長的「一代才子」錢鍾書，都可算文字大通了吧，於轉型期中國之思想言論自由的制度性變革，有何建樹呢？

「慢慢來」——有些基礎建制或許須細磨深雕，但廢除明顯褫奪民眾權利的法令，也須「慢慢」麼？其實，對於「軍政」、「訓政」結束無時，張東蓀他們早在十多年前已有了堪稱「對當政者充分體諒」的評述：

或有人以為思想與言論太開放了，勢必導致國議紛紜，使政治不能順利進行了。我們亦知國家的政治求其敏捷與效率高，只在於行政系統是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腕。而對於社會上的輿論並無關係。並且社會上輿論愈發達，行政反可得其助力。因為既許可言論自由以後，反對政府的思想固然可以發表，而贊助政府的言論更可以發表。

因為真正民治的政府，他的基礎是坐在產生政府的大多數公民的同情上，其政治的設施又適合大多數人民生活實際的需要；所以言論愈自由，政府愈能得輿論的贊助。要在「贊助政府的言論」決不是專靠政府自己所製造的宣傳。倘使不許言論自由，而政府一味宣傳，決不會生何等效力。所以從這一點上可見政治上效率的提高，與社會上自由的開放，不但無抵觸與矛盾，並卻正相助相成。

因為我們雖則很愛護政治的效率，但我們卻更愛護思想的自由。以為無政治的效率則行政失其意義；但倘無思想的自由，則國家失其靈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縱使兩者即有衝突，我們斷乎不可犧牲自由而遷就效率。像俄國那樣的辦法，必須先經過一個階級的專政，把人民所有的自由暫時犧牲，而以為將來或可有一個自由天國出現。

我們則以為國家是一個民族全體的公器，斷不容哪一個階級來據霸一時，而犧牲其他的自由。倘事實上有此，則宜努力打破。於理論上更不可認為應該。

所以我們主張為政治效率起見，針箍權力當然宜於集中，但集中的限度是以行政為界，斷不容侵犯到社會上去，把人民的自由亦受管轄。[45]

與會代表們再度強烈表述，邵立子終於給出略有實質內容的回答：「國防委員會已通知有關機關在十天內檢討諸項有關人民自由法令」。

留學英國大才子羅隆基對當局的「七點質詢」，最為一言中的：

(一) 如何使一人政治走到民主政治?

(二) 如何使一黨政府走到舉國一致的政府?

(三) 如何使缺乏行政效率之制度走向現代化政治之制度?……

這時已是全場一片肅穆。羅之疾言厲色，蔣勻田曾對友人做過如下解釋:

自羅隆基聲明脱離國社黨後，我們已甚少交往。不過自張東蓀先生來渝後，又常晤談了。因此得悉他脱離國家社會黨時係受國民黨的朋友勸誘。他對東蓀先生曾說:他自昆明來渝，當時國民黨的大將張道藩先生請他吃飯，約有清華同學孫立人、吳國楨、浦薛鳳等作陪。席間張道藩用獎譽的方式，勸他脱離國社黨。獎譽他為不可多得的人才，尤其精通國際實況。若非有國社黨的身份，至少可被任為外交部次長，俾能多有貢獻於國家。同時又說國社黨黨魁張君勱先生已被軟禁，國社黨前途已渺茫了。羅在既獎又脅的誘導後，乃聲明脱黨，因此招致許多知識分子之白眼，可是外交部次長的許諾，終於石沉大海。這段插曲，當然成為羅隆基心中難忘的隱恨，所以乘此機會略予發洩。此即所謂逼友成敵之結果。[46]

到五十年代，羅本人曾有一篇憶舊的文字發表，對此節隻字未提。其實，就算是在老政協那樣的氣氛下，換了別人，這樣的經歷，一般也是千般委屈萬般怨，只悶在肚子裏。羅大才子對東蓀的坦言，反映出他們兩人不同之性格特色:努生的急功近利與胸無城府;東蓀的容諒與無是非。至於當權者的這類拉攏與丟棄，反倒是政客常態。

這裏值得一提的，還有被認為態度最溫和的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就政府改制所發表的「三同八異」。其中第八條為:「在訓政過渡到憲政時期，黨的費用不能由政府開支。」讀史人都知道這裏的「黨」，特指那時執政的國民黨。話音猶在耳，待到他的黨掌權(並且鄭重制定了憲法)之後，只因毛主席一句話，這一原則即完全扔到腦後。直到八

十年代，才有企業揣揣提出「公司能否不再為職工訂閱黨報？」到2004年，共產黨自稱憲政立國已經五十年，且正值人大就人權修憲，還不見一人提出「黨的費用不能由政府開支」。直到本文完成的2008年，執政黨，包括八個與它肝膽相照的小兄弟的費用——每年至少千億吧——還是天經地義地由納税人支付（政府撥款）。

1月13日，停戰協議生效。政協休會一天。也是在這一天，蔣經國自莫斯科返抵重慶，帶回來斯大林正告：美國如有一兵到中國，東北問題即難解決。美國如不在東北取得利益，俄可作必要讓步，並盼蔣主席訪俄。

1月14日之後，會議開始由大會轉入分專題會，連接開了六次，「爭論甚多，經過相當困難」（蔣勻田語）。會員分為四類五組，每組有各方推薦一至二人。張東蓀被推為軍事組召集人。

中國當時局勢，沒有比軍事更緊要的了。蔣介石的既定政策是「政治放寬，軍事從嚴」。[47] 毛澤東的底線是「只要把軍隊拿在手裏就有辦法」。政協軍事組召集人，竟然是一個對軍事無論述、與軍隊無瓜葛的哲學家——現在想來，當時數方協調，可能正在於他的哪邊都不是，才獲選定。如此弱勢的召集人，自然一籌莫展。張飴慈記得祖父後來對他説起當時會議情形：

> 當時作為「第三力量」，每次找蔣談話之前，都先要徵求共產黨意見。周恩來什麼主意都不拿，全是毛決定。在舊政協軍事組，本已談好的事，怎麼第二天全變了。後來才知道是延安來了電報，周作不了主。

16日，民盟九名代表聯名（青年黨附議）提出軍事問題提案，核心是「全國所有軍隊應即脱離任何黨派關係，而歸屬於國家」、要求「現役軍人脱離黨籍」——軍黨從此分離。國民黨代表提出「是否仿照國聯，將過於艱巨的問題不討論，放到將來的國民大會去；兩黨間的問題也不在此討論，由兩黨自己去解決」。張東蓀立即反對：「國共兩方的問題，不能只兩方談，不能只顧到兩方的利益，而不顧他方乃至全國的利益。」

對此議，梁漱溟、張申府贊同，別人未置可否。既是共產黨又是國民黨元老的邵力子就此發了等於沒發的言——不知屬於大奸還是大憨：

大家強調軍隊要脫離黨，我們已把軍隊黨部取消了。當然也有人會說，國民黨中委裏將領很多……他們雖有黨籍而不做黨的活動。我們對整編中共軍隊，第一步也並非要中共黨員都脫黨。

最後，兩項原則「軍黨分離」和「軍政分離」獲得通過：軍人可以有黨籍，但在軍內不得有黨團組織和黨派活動；軍隊在駐地不與當地政治發生任何關係，只能進行訓練，不負責地方防務。軍隊供給由中央統一籌劃。

當天，依照慣例，張東蓀、郭沫若到陪都各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第四次夜會對會議情況作報告。他不是官員，沒有說廢話套話的訓練。對剛剛完成的協議，這位軍事組召集人萬分感慨：

人民太苦了。抗戰結束了，要這些軍隊幹什麼，我們要大裁軍，全國軍隊同時公平整編，以後軍隊要成為國防軍，不能再有黨軍。

話還沒有完，「台下忽然跳出了十幾條壯漢」，齊聲抗辯：「政府軍隊是國軍，不是黨軍。」張先生當時肯定氣糊塗了，竟跟這幫人爭辯起來：「是國民黨的黨軍，不是國軍。」……據《新華日報》載，由於「國民黨特務的挑釁和有計劃的搗亂破壞」，報告會在混亂中結束。這次夜會，是在楊滄白紀念堂舉行的。後來類似「搗亂破壞」又發生過幾次，統稱「滄白堂事件」，和我們後邊還要細說的「較場口事件」可稱同曲同工。

1月17日，該討論國大問題了：政府認為原來的代表有效，民盟認為無效。中共的態度反而比較緩和。張東蓀此時大概又到「萬不得已」。據重慶媒體記載，「他站起身，發揮一番議論，主張國大代表重選」，說「重選以後國民黨仍佔多數，也是甘心的」；「他忽然提到了前天群眾大會的事，大概有什麼觸犯了他，他竟提高了他的聲音，對

着新聞記者席憤怒起來：『真理是真理，我要警告新聞記者，聽着，你們不要來破壞了我們會議的和諧空氣。』罵得記者們個個莫名其妙，不知前天出了什麼事。但他認為，從1927年起，已沒有了新聞自由。喉舌們所為，當然如此。」

終其一生，張東蓀對兩邊（特別中共方）氣焰薰天的意識形態／宣傳部門（"propaganda"），從未有過一絲好感。終其一生，不曾有過一個以「宣傳」為職志的朋友。

1月19日討論憲法草案。因為張君勱的威望，協商順利。周恩來一分鐘都沒有耽擱，立即告蔣匀田懇請張君勱，將來憲法正式起草，一定擔任執筆人。周認為，若由國民黨掌控，一定偏於一私。碰巧在第二天，王世杰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若由國民黨執筆，共產黨一定逐字推敲，肯定難於通過。

張東蓀和梁漱溟對此都沒有很大熱情。1947年10月張東蓀回憶道：

> 梁先生的結論似乎是中國不能走上英美式憲政之路，因而亦就不必勉強去走。所以在政協開會時對於憲法的修改最不感興趣。不過當時我亦是一個對憲法不感興趣的人。我早明白歷史決不會因一紙憲法而翻身，憲法的討論近於白廢光陰。[48]

憲草條款已經沒有問題，貫徹政協協議懸到「國府委員名額確定」。原先「國民政府委員會」，誰都知道，是一批「有薪可領無事可做」的「黨國元老」。國民黨代表（王世杰）這回提出「充實國民政府委員會案」：「增加委員名額，選任黨外人士，為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得討論立法、施政、軍政、財政，並得建議。主席得為緊急權宜措施。行政院置政務委員。」

羅隆基和王若飛看到了機會。他們擬定的計劃是：第一，轉變職能——接受王世杰的「擴大」計劃，但一定要使國府成為「有實際政治權力的最高國務機關」，即委員制的集體政府，具有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和各部長官的任免權；決算預算、施政方案、軍事大計，都必須經過該委員會討論決定。第二，以「三分之一否決權」（即四十名

中的十四名)過制專制，即「國民政府主席對政府委員會之決議，如認為執行有困難時，得提交復議。復議時，如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仍主張維持原案，該案應予執行」。

羅、王在「老政協政府改組組」的合作，一直傳為美談。試想羅的一生，曾經傾服過何人麼？但那時節，人前人後，王若飛在他口中成了「王司令官」。他們沒有料到，這則富於創意(從而也可稱之踩了專制者痛腳)的計劃，後來竟引發出國府委員名額分配的僵局，最後使得政協理想全部歸於失敗。

國民黨怎麼那麼死心眼？難道這點自信都沒有：十四席裏邊，不會個個都跟着共產黨指揮棒轉吧——起碼國社黨的兩位張先生，外加鄉村建設的梁先生。

1月26日，簽定協議似乎成定局。周準備回延安彙報之後回來簽字，臨行前，特到民盟總部看望，表示馬上要改組政府，希望大家一道努力。不料兩位張先生和梁漱溟都表示，「努力可告一段落，不願參加政府。」[49]

(3) 閉幕

1月31日下午政協閉幕。國民黨的蔣總裁再度致辭：

>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經過十餘天熱烈的討論，已經完成其應有的任務，今天宣告閉會了。……今後無謂的政爭，必可徹底化除；和平建國的目的，必可迅速達成；對於未來憲政實施的前途，也必能因此而愈顯光明。

會議通過了五項協議和四項「立即實施」，就等着三個月之後(5月5日)召開國大了：

五項協議：

《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

《和平建國綱領》

《關於國民大會的協議》

《關於憲章問題的協議》

《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

四項政府決定立即實施的事項：

一、保證人民自由；

二、各政黨一律平等；

三、實行地方自治和普選；

四、釋放政治犯。

2月1日，因「神經疲勞」而「一病數月」的毛澤東「修改審定」了一則發到全黨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

重慶政治協商會議，經激烈爭論之後，已獲得重大結果。……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雖然一定還要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但是這一新階段是已經到來了，……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國內問題由政治方式來解決。[50]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等八人參加改組後的國民政府委員會。[51]周恩來等四人參加行政院，力爭行政院副院長、兩個部及一個不管部部長。中共中央機關準備遷至江蘇淮陰地區，以靠近南京。當地解放區已着手安排中央機關的住房。

同一天，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軍隊國家化的指示。從2月1日到7日，《新華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讚揚蔣介石和國民黨在政協的態度，對「在蔣主席領導下」，國民黨能夠實行政協決議寄予希望，提出各黨派長期合作，民主協商解決中國問題。

我們後世讀史人不能不說，這是在中國國運關鍵時刻，在全世界(特別是民主陣營堡壘美國)的關注乃至親手下場操作下，就中國最急需的問題，由社會公認最受信賴的人物出場，經過論爭、理解、讓步，而達成的協議。

不可否認，整個過程中，確有由國、共分別代表的美、蘇戰略利益的較量，但在戰勝法西斯之後世界民主大潮中，在戰後民不聊生、

百廢待舉的中國，不可能有比實行政協協議更好的選擇了。

可惜不能光看會上。會下，在兩黨理性穩健派身後，全有「（獨大）立場」十分堅定的本黨同志。[52] 他們沒有立即鬧起來，只為等待最好的時機——斷殺而後的全贏！

對北洋時期國民黨與研究系勢同水火記憶猶新，張東蓀對中國政壇與政客之痼疾——全輸全贏的「黨爭」，有足夠認識，卻也一籌莫展：

倒袁的時候，我以為這是化除政爭的好機會。因為到了那時，無論緩進激進，無論集權分權，無論總統制內閣制，而共同的敵人只是帝制。既有共同的敵人，必須有聯合的戰線。聯合戰線一經組成，則黨爭便可化除。久而久之，養成一種聯合的習慣或同盟的習慣。不料倒袁以後，各方面所得的教訓卻正是一個反面。他們不但不認與人合作為必要，卻反而以為以前的排斥人家沒有徹底。於是大家都想來一個徹底的排斥。[53]

到1952年被逼檢討，再度提及：

我要回頭來說一說舊政協開始，直到民盟解散總部為止……。這一時期內，我……始終認為只有國共和談是中國的出路。談判斷了幾次，我還希望能夠恢復。對於中共，尤其……以為他可能變為像戰後法國共產黨一樣，在議會中做鬥爭，所以以為必須由談判來解決。但國民黨方面不肯讓步……，應要求美國去壓他。我在這時期做了幾篇文章，全是為此。……[54]

但梁漱溟還是寫了〈八年努力宣告結束〉，先在閉幕宴會上交周恩來、張群、張東蓀看，第二天即交《大公報》發表，決定「不在現實政治上努力，要站遠一步來說話」。他當時無論如何沒有料到，在接着的半年裏，他這位民盟秘書長根本沒有可能站遠一步，而是俯身前沿、殫精竭慮。無奈所做努力，竟然招致幾乎終生的羞辱，和當時曾審讀該文、並且在他之後接任民盟秘書長的張東蓀一樣，在曾經親密合作過的共產黨認為他們已不堪再用的時候，不用自己「站」，都

給遠遠摔出——想說話麼？說吧，只告訴你，看看頭頂上飄着什麼旗子，你那套老經文，沒有人聽了吧。

不管怎麼樣，這是中國文化人以獨立的姿態、全新的觀念，第一次出現在轉型期的中國政治舞台上。當時，司徒雷登也在重慶。校長找到他的哲學系主任，說自己即將出任大使，[55] 並說美國的政策是要調停中國內戰——想來在那一階段，張東蓀和第三方面諸位，不能不切切感到，國共之外，還正受着調停者美國的格外看重呢。

(4) 較場口

就在這時，發生了一樁影響到日後全局、乃至中國百年命運的大事——雖然那時候幾乎無人做出這樣的揣度。

我們知道，太平洋戰爭之後，蘇聯一直遲遲不發兵——直到原子彈爆炸、到他們的出兵已經有百分之百勝算的時候。8月9日，蘇軍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勢不可擋之勢，長驅直入。

國民政府擔心共產黨借勢搶佔地盤，爭分奪秒地派出宋子文，與蘇聯簽訂了出讓蒙古的《中蘇友好條約》，以換取受降後全部交付國府。還有，比方說，我們已經知道的逼毛赴重慶談判。

從蘇聯出兵到政協會議閉幕這半年間，中國新政治格局即將和平地完成，蘇聯是個什麼姿態呢？第一，它一直接受「友好條約」約束，盡量不讓中共依仗「大家都是鐮刀斧頭」而得到東北地盤；第二，簽約的時候可能沒料到東北如此富庶，但開眼之後，貪慾之心難於抑制，於是在《雅爾塔協議》、《中蘇友好條約》之外，同意(一時趕不到東北實施換防的)國府之要求延緩撤退。在幫他們接管了長春、瀋陽、哈爾濱等大城市和遼北、松江、嫩江各省行政之後，開始以當然的態度繼續向國府要價，聲稱日本在東北的資產(重工業設備)為蘇軍戰利品；還想得到鐵路、礦產等等更多利益。駐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已直接提出「中俄東北經濟合作問題」，望雙方以軍事風格迅速解決——不願第三者插足。至於誰是第三者，中共？美國？東北人民代表？沒提。

就在這當口，1946年2月10日，政協閉幕不過數日，在重慶發生了一個簡直如莊子所云「有數存焉於其間」的「較場口事件」。因為這次事件的發動者，萬萬沒有想到，爾後生發出來的一系列情事，與始作俑者的初始本意，已然偏謬到超乎任何政客想像（罔論設計）的地步。

時至1946年2月，對日作戰早已結束，佔領已屆期滿（規定拿下之後三個月）的俄軍，卻是怎麼也不撤出。而兩週前政府派往東北的調查人員張莘夫蹊蹺遭殺害，更令人對迷霧重重的東北局勢，再添憂懼。

事情起源於2月4日國府代表張公權和蔣經國回重慶的報告：接收全面受阻，原因是俄方「參加東北所有煤礦和鐵礦股本」之要求，沒有得到答覆。緊隨他們之後的，是蘇聯駐軍總司令一通接一通的電報，催促張、蔣速回東北，口氣已近於威脅：「拒簽將後悔不及」。斯大林也出面了，三次電邀蔣介石到莫斯科面談。

「後悔」什麼？這些，不能說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即中統）完全不明細，但當時讓他們更覺得有如芒刺在心頭的，是擔心一旦政協成功，其老對頭政學系將在黨內佔上峰。但鬧事總要有個由頭。正好，蘇聯在東北劣行為他們創下機會：發動較場口事件——「反對蘇俄插足東北經濟建設」，打擊「親蘇」的政學系。

更為湊巧（或許有意為之）的是，「較場口事件」第二天，2月11日，美、英、蘇三國披露了一年前為換取蘇聯東線出兵而秘密簽訂的《雅爾塔協議》，終極目的不言而喻，但直接導致了席捲全國各大城市（重慶、上海、南昌、北平、南京、青島、漢口、杭州等）的反俄示威大遊行，要求「赤色帝國主義」如約撤軍（本應在11月15日）。

周恩來一眼就看出門道。在駐地邀請民盟人士的晚宴上，他神情淒悶。因為他得到報告，昨日的遊行，警察、憲兵皆未干涉，因為陳立夫坐在社會部內親自指揮。他對來賓說：

昨天特工裝學生在較場口的遊行示威，口號雖反對蘇俄，其實對國民黨內部言，則係反對政學系；而真正的目的，則想破壞政治

協商會議的結果。所以我們今後雖不變更立場，但對政協的各項決議，很難持有樂觀的想像了。[56]

當晚，蔣匀田、羅隆基曾作徹夜長談。他們敏感到當前局面比「國府委員僵局」更為嚴峻。一直明確表態不介入中國事務(兩黨之爭)的蘇聯，將立即轉變態度，而蘇聯對中國轉變態度，直接影響美國對中共的態度。國民黨一定乘機以「反蘇」來「親美」，因一席國府委員之不讓已經開罪馬歇爾的蔣介石，將不再以「民主化」討好美國。

2月22日，重慶七千學生再度遊行反蘇——阻止張、蔣與蘇簽訂「合作」，徹底破壞國府與蘇聯的關係。第二天，23日，又舉行第二次遊行。這回是《新華日報》和《民主報》員工遭毆打、門市被搗毀。周恩來自此不再出席政協後續的憲草研討會——陳立夫目的達成：借學生之手實現國共徹底破裂。

這兩個破裂，最直接的影響是東北戰局。或者可以說，較場口事件遊行反蘇，導致中共軍隊在東北迅速發展。

(5) 宗炳冊頁

這期間還有一個小花絮：東蓀先生長子張宗炳(字蔚原)的冊頁。

十年前(1936)，二十歲的宗炳以燕京碩士資格考取美庚款，赴康乃爾大學。兩年後獲授生物學博士，旋即歸國，先在東南大學，接着到西遷的燕京任教。張家近年翻檢舊物，發現他的一個冊頁，很像是政協會議開始前後，在他到重慶民盟駐地探望父親的時候，請諸位參會「父執輩」(其實羅隆基不過長他十六歲，周鯨文長六歲)的題字——雖然寥寥數語，有的還是舊作，但大家當時的性情心緒，如DNA般躍然紙上。

張瀾的表達最顯「聖人」歷來風格：

仁者愛人
義者宜人

居仁由義
大人之事而士之所志也

蔚原先生

張瀾

沈鈞儒題寫的是他最擅長的七律，雖然他的一生並非如詩中所述。不過，詩言的是「志向」，與具體大醬缸裏的人生，是不該同日而語的：

半生不羡沐猴冠
數載賃廡趣自歡
潑案茶香留舌本
繞簷嵐翠壓眉端
笑談時具賓朋樂
俯仰深知宇宙寬
舉世囂囂我適靜
棕床趺坐作心觀

蔚原吾兄囑示近作
鈞儒（印章）

梁漱溟當時激蕩胸中的，自是會議中之自身角色：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況其邇者乎？
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
況其邇者乎？

蔚原兄索書

卅五年　梁漱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
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蔚原兄索書
卅五年 梁漱溟



「宗炳冊頁」上梁漱溟的題字

自由是位美麗的小姐
想得到他，就要努力追
逐，侍奉，溫存，爭取，
還要隨時防備被人奪
了去。

蔚原老兄

羅隆基

一九四六
一，十五

「宗炳冊頁」上羅隆基的題字

東蓀本人的「示兒」，字面平淡，意境……什麼意境呢？也正如他歷來身在此而心思已漫遊八荒的特色：

夕陽冥色來天地
人語雞聲共一邱。
　　遊灌縣歸途忽憶宋人句輒為
　　　　　　　　炳兒書之
　　　　　　　　　東蓀（印章）

彭一湖：

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
於張子勉之
　　蔚原世兄勒書
　　　　　　　　彭一湖　三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與民國同年的周鯨文，已頗具「辦報辦學人生、半文半白為文」之特色：

古人所謂智仁勇
以今語言之則為認清目標以樂觀態度勇敢作去
本此旨作人立業，庶幾有成。
　　　　蔚原兄囑書
　　　　　　　　周鯨文　卅五年一月十四

章伯鈞則是一貫的抱負遠大、道貌岸然：

意氣百年內
平生一寸心
欲交天下士

把晤自虛襟
君子重名義
直道冠衣簪
風雲行可託
懷抱自然深

蔚原世兄囑書

章伯鈞　卅五年一月十四

羅隆基那時正是會上縱橫馳騁、會下風光無限。不僅與共產黨代表珠聯璧合，陪都第一大美人王右家也正追求到手。聯想到日後與異性間最私密之隱情都任曝光、任糟踐、成為定罪證據，讀到這名率性而為之大才子在此地的輕飄道白，只倍覺淒涼：

自由是位美麗的小姐，想得到他，就要努力追逐、侍奉、溫存、爭取，還要隨時防備被人奪了去。

蔚原世兄

羅隆基　一九四六、一、十五

張伯駒和黃炎培的題詩是後來補入的：

□□蜀魂路難行，
解喻伯勞處吾情，
東□流人歸不得，
年年新篠為誰生。

謝稚柳君寓蜀種新竹一叢，飼伯勞一隻，寫圖為詠。潘伯鷹兄攜來索題率賦二詩，錄其一以應

蔚原世仁兄 雅命

己丑夏張伯駒（印章）

待到任之先生補題，好似已經換了天地：

莫道陰霾凍不開，
天心終盼一陽回。
閉門忍□千家哭，
袖手何曾萬念灰。
只□投鞭平黑水，
坐愁抱蔓到□□。
鄰翁走告軍符急，
夜半搜床里正來。

蔚原老兄　哂正
黃炎培寫二年前舊稿
一九四九年三月北平
時北平解放甫逾兩月　此詩乃作於國共和談破裂之時

(6) 離渝

4月1日，張東蓀應邀到成都，在南遷的燕大分校發表演講：談時局，談民主政治。當時正讀四年級主修新聞副修歷史的唐振常，在1993年，「懷着極為複雜感情」，寫了一篇「語焉不詳」的「記微」，談到張教授「絲毫沒有講哲學，也沒有發揮他研究有素的民主學說」，只「分析中國出路何在，中心不外反內戰、爭取民主」，其「躊躇滿志昂揚奮發之氣，我們學生聽了，深受鼓舞」。[57]

出面作邀請的燕大學生自治會，按照當時習俗，獻上一冊以毛筆書寫獻辭、有師生眾人親筆簽名的冊子《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歡迎張東蓀先生蒞蓉大會紀念冊》：

我們熱烈歡迎着你——張東蓀先生，我們虔誠地崇敬着你——張東蓀先生。無論作為你的學生的學生，或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員，我們都應獻出無比的熱情來接待你，像迎接太陽神阿波羅一樣。

因為你曾耗去了和中華民國一樣長的歲月在為民主奔走；因

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歡迎
張東蓀先生蒞蓉大會
紀念冊

時間：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一日

地點：成都燕京大學大禮堂

我們熱烈地歡迎着你
張東蓀先生我們虔誠地
崇敬着你 張東蓀先生
無論作為你的學生的學
生或作為中國人民的一
分我們都能獻出無比的
熱情來接待你像迎接太
陽神亞坡羅一樣
因為你已經過了和中華
民國一樣長的歲々左右

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為歡迎張東蓀蒞臨而製作的紀念冊

為你曾為中國思想界立下民主哲學的根基；因為你曾獨具慧眼地看出抗戰就是爭取民主這一條路線；因為你曾經領導着無數青年走上抗擊法西斯統治者的路途……而更因為你曾夜以繼日地呼籲國內民主和平，使政協會有着莫大的成就，把中國引上了一條和平建設的大道。

當有一天法西斯殘餘完全被消滅的時候，在我們念起奔走民主和平的戰士的名字時，第一個我們就要念起你。但我們從來不敢推委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永遠和你走在一起。你獻身民主，奮鬥三十五年，我們要和你一起延續下去，直到民主的大門為中國人民大大地打開。

我們和先生一樣地從不懼怕任何的污蔑，我們也有着追求真理的反抗精神，我們絕不受謠言陰謀的欺騙，我們只知道要爭取學術的自由，也就是要爭取中國的民主。……我們用着這一些誓詞來歡迎你——張東蓀先生。你的言行都是我們的示範，你老當益壯為民主的努力，使我們比以前更加振奮。因此，我們要和你緊緊拉在一起。

三十五年四月成都燕大

（唐振常等二百多名學生及教師簽名）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一日　成都燕京大學大禮堂

幾乎就在這前後，3月15日的延安，毛澤東以大病初癒之體，[58]出席政治局會議，為後世留下了〈政治局會議上的四條分析〉一文。在這篇分析中，出現一個歷史壽命頗為短暫的新概念「和蘇和共派」——不知是他自創還是從「遠方」躉來。其中第三條：

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有兩部分民主勢力，就是廣大的人民及資產階級內部的和蘇和共派。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廣大的人民極大地提高了覺悟，能夠積極地反對反蘇反共的反革命活動和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英、美、法、中的資產階級和德、意、日的資產階級正分裂為兩

大集團，今後還要繼續分裂，成為反蘇反共與和蘇和共兩大派。過去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曾經是打倒法西斯主力軍的重要條件(如果只有張伯倫沒有丘吉爾，只有汪精衛沒有蔣介石，就打倒不了法西斯)，現在的繼續分裂必將起着新的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促進他們的這種分裂。

資產階級和蘇和共派又包括兩部分人：資產階級的中派和左派，如蔣介石就是中派。他的主張有兩條：第一條是一切革命黨全部消滅之；第二條是如果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而左派則和蔣介石不同，如張東蓀等人。**

這則講話，引自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上文中之粗體部分已盡行刪去。在政協閉幕不久的1946年春，蔣中正榮獲「中派」，張東蓀則給派為「左派」——不提沈鈞儒、不提黃炎培，只提他一個人。這或許可視為兩年與四年後本書主人公大起大落命運之序曲？

但張東蓀究竟做了什麼，使得毛有這樣的講話？聯繫唐振常所記憶的東蓀先生「熱得很」；「慷慨激烈，多豪爽之語，滿鬥爭之詞」——估計是政協前後、內戰開打之際，他對專制政府的不假辭色和實際戰鬥力，給人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毛當時並不在重慶，此印象，應是出於時時向延安報告的與會共產黨代表，具體說，就是周恩來。望讀者記住這一被歷來研究者所忽視的細節，並對照總理周公到了1953年和1973年對張東蓀的「關照」(這我們在後邊要講到)。政治家的多重人格和他們內心的痛苦，或可瞥見一二。

如果將此與光未然光復之後回到北平的回憶對照着讀，幾可為毛的短命新概念作註腳：

我一見到徐冰，就說：「我好不容易逃出來了，我是投奔解放區的，你趕快派我到張家口去。」他說：「我可不能當家，你是歸恩來同志管的(1940年以來，我的組織關係一直與恩來聯繫。)」然後他馬上打電話給在重慶的周恩來。

第二天他來找我說：「不行，恩來同志說北平正缺人來打開

局面，讓你就留在這裏。」當時北平有張東蓀、張申府、吳晗、曾昭掄、張恨水、馬彥祥、盛家倫等一批黨外人士，但徐冰的身份不宜跟他們多接觸(他是中美調處執行部的中共代表，與美方、蔣方代表同住北京飯店)，我對文化界熟悉，正好開展這方面的工作，這樣我在北平就留下來了。[59]

快成自己同志了！作為後世讀史人，我們已經清楚，到此刻，毛看得很準。可惜他看到的，只是我們的主人公對專制的憤恨和鬥爭，而沒有悟出(或者說在政客層次上無由悟出)，這憤恨實出於法理，並不看那專制屬於袁記、蔣記抑或毛記——當然也低估了這名抗專鬥士對名利的抵禦力。

3 制憲國大

「制憲國大」——這一中國走出軍政、訓政，開始踏上憲政之途的標誌性成果，本應在政協閉幕的三個月後(1946年春)即召開，卻是一推再推，直推到深秋(1946年11月)。開雖開了，卻為共產黨和民盟冠以「偽」而峻拒。而我們今天可以看清楚的是，所有台面上的討價還價、成功失敗，全是戰局發展的反映。

從光復到再度大規模開打，國共間戰局大致經過了這麼幾個階段：

「8．15」至「1．13」(光復至停戰協議生效)

此階段，政府在道義和協議(雅爾塔、中蘇)上佔優勢，共產黨則依仗地利，搶佔了東北和華北不少地盤。

「1．13」至「3．12」(停戰至蘇軍撤離瀋陽)

大面上停戰，美軍介入調處。

獲得美國裝備的國軍，被運送到東北。

「3．12」至「10．11」(蘇軍撤離瀋陽至國軍攻下張家口)

蘇聯在「反蘇」聲浪中撤軍；將日軍物資留給共軍，允許並鼓勵它大打。

美援和軍事裝備到手。國軍一路進攻、全面收復。

看出來了吧？這就是全世界都在恢復，唯中國之內戰能以空前規模大打三年的秘密所在——處於同一時代，與這兩強完全相反的，則是王雲五的「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60]

前兩個階段，張東蓀都在重慶協商的第一線。到兩邊分別獲得美蘇支持，以必得之心再度大打之時，他已經回到北平——日後「第三方面」在南京、上海的努力與掙扎，他沒有參與。

張家此時已經遷回燕大燕東園。因為民盟屬於「過了明路」，華北總組主委張東蓀在北平與中共人士的交往，已經不必通過「地工」。當時「負責宣傳工作」的華北總支部委員葉篤義回憶，一次民盟幾個人在一個地方開會，徐冰走了進去。張東蓀把所有的人一一介紹給他。首席代表葉劍英也抓住時機，宴請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專家、知識分子，場上「氣氛熱烈」。[61]

政府那邊也沒閒着。與1949年以後當政者對「人大」的操作相類，那時候政府對國大代表的控制[62]也不手軟。4月中旬，北平市組成「國大代表選舉協進會」，連續舉行「北平市國大代表選舉問題座談會」，會員們分頭執函家訪，把社會名流聘為顧問。張東蓀自然難逃網羅。[63]

10月11日，國軍拿下張家口，也即我們後世熟知的、出自梁漱溟之口的「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國府隨即決定「如期召開」國大（即一個月後的11月12日），共產黨和民盟合起來究竟佔十三席還是十四席，依舊僵在那裏。

這局面，早在政協剛剛閉幕的時候，確曾打算參加政府的共產黨不僅料到，而且已經下手策應。據蔣勻田記載，2月初，陶行知請蔣勻田到他公館午飯。到達時，主人迎到門口說：周恩來、董必武兩先生有事與你面商，他們早已到了。周恩來對蔣勻田說：

政協前日已算圓滿閉幕，證明只要我們合作，總可闖過難關，以建國利民。現餘問題，為起草憲法，已由君勱先生執筆，我們兩方面每晚在民盟總部商妥，次日提交憲草審議會，諒無多大問題。其餘為改組政府問題、國府委員人數問題，尚待與國民黨

協商。唯對於我們兩方面言，人選問題，最為重要。我們兩方須多選敢言之人為國府委員。不然，對蔣主席不能當面直言、明辨是非利害，唯有一味奉承，有何用處呢？希望君勱先生與東蓀先生都能參加國府委員會。兩位張先生都可說是能言敢言之人，在蔣主席領導的國府委員會中，需要他們一同擔任國府委員。

蔣勻田感謝「恩來兄」的好意，「但恐敝黨攤不到兩席國府委員。」周恩來立即回答說：「假使兩位張先生均願意擔任國府委員，貴黨如分不到兩席，我們讓一席給你們。」

蔣勻田表示謝意，答允竭誠奉勸兩張，並問：「毛先生是否參加國府委員會呢？」周答：「只要君勱先生參加，他一定參加。」蔣問：「毛先生在延安，如何每週到南京出席會議呢？」周答：「待國府改組成功，毛先生即遷移住於揚州。該城為新四軍總部所在地，距南京甚近，開會即乘汽車赴會，會罷即返回揚州，想無不便。」蔣勻田接着問：「閣下與董必老參加國府否？」周說，董必老可能參加國府，他個人擬參加改組後的行政院，兼任農林部長。並勸蔣勻田最好也參加行政院，向國民黨索取教育部，因為據周估計，它是絕對不肯將教育部讓給共產黨人擔任的。

蔣勻田當時的感覺：中共不但決心參加改組後的政府，而且已定出深思遠慮的計劃，以除卻一黨訓政，造成多黨平衡的力量，走上和平民主建國的途徑。[64]

蔣勻田日後撰文說：

此一秘密，我當時除告之東蓀先生外，未向任何人言之。君勱先生之得任國府委員，似可預定，所以我也未向他報告周之建議與允諾。[65]

到3月間，周恩來與張瀾商定，十四個席位，民盟要幾個都可以商量，我們共產黨沒有問題，民盟的團結要緊。最後，經過討論，民盟提出國府委員七名：張瀾、黃炎培、張君勱、沈鈞儒、張東蓀、梁漱溟、章伯鈞。

然而不到半年，局勢已然大變。

武器和錢全部到手，地盤佔得愈來愈多，再用不着對動輒「民主」的老美陪小心——國府態度愈見強硬，「設十四席」絕無商量餘地，「一黨包辦」(中共中央發言人廖承志語)的制憲國大也不再延期：11月12日召開。

共產黨當然「堅決不參加」，但一直留在南京聯絡「第三方面」，謹防最壞的、也即國民黨最期望的局面發生：把別人都招過去，場外頭就剩共產黨一家。

這都是面上的，暗地裏，也可說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是密電來密電去的戰場指揮。半年來丟了不少地盤、暫時處於劣勢的共產黨正悶使勁：「只要能大量殲敵，先打九十四軍或五十二軍再打十六軍也好，你們應爭取每月殲敵兩個旅左右，三至四個月殲敵六個旅左右不是不可能的。……」[66] 另一邊呢？蔣介石已經制定了總兵力十五萬、飛機九十四架，直搗共產黨的老巢延安的作戰計劃。胡宗南和他的校長確信，區區延安指日可下——確實「下」了，一座空城而已。待到胡長官貼身副官、機要秘書熊向暉的故事可以公開講述，已是十多年之後。

美籍學者林毓生曾有過一個論斷：中國現代兩個大獨裁者雖然僅十多歲之差，文化底色與行事手段尚有區別。一屬極右集權，一是極左極權。前者手段有限，沒有能力如共產黨那樣鼓動理想與正義，只要有所需，任什麼組織、什麼黨，都鼓弄得出來，比如民建、民促、九三、小民革之類——用人家自己的話說，就是「中國民主黨派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領導下，在和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合作下產生、成長和發展起來的」。[67] 為避免美英等最反感的「一黨獨裁」局面，同時混個「輿論支持」，國府也在努力拉攏政協參政黨派。無奈交易所出身的委員長除送錢、許官以外，不大在行其他。在1946年底這關鍵時刻，面對着民間一流角色，派不上用場。

11月中旬，民盟秘書長梁漱溟召開記者招待會，為和平作出最後建議：他認為為達此目標所存最後的希望，是組建一個對國共雙方均有約束力的「八人委員會」。他提出一個他自認為立論比較公正的

人的名單：共產黨裏邊的周恩來和董必武；國民黨中的張群和邵力子；而張東蓀、張伯純、李璜、莫德惠代表第三方面。[68] 可惜此招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根本原因，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別說在南京、在中國，就是在全世界，難道有對「國共雙方」（更確切地說是蔣毛二人）有約束力的什麼機構或者人物嗎？

本來，青年黨與民社黨都曾表示與民盟一致行動，不料一封由李璜、張君勱牽頭爭取國大召開再延期（一個月）以換得政府改組、最後大家（起碼第三方面）都參加（而且鄭重簽了名）的「進呈蔣委員長」信，引起中共堅決反彈（未曾與之商議在先）。周恩來已然不顧言辭技巧：「現在國民黨要分化中共與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開。現在有人要去跳火坑、進『國大』。我們願意諒解各位的苦衷，但我們必須堅持政協決議。」[69] 與周公走得最近的沈、章、張（申府）立刻抹掉自己署在信上的名字。[70] 左舜生對此嗤之以鼻：「甚矣哉。尾巴之不能當也。」反促他斷然宣佈：「我們青年黨參加（國大），我自己也參加。」

雖然因為塗抹而沒有正式進呈，蔣介石答應延期「三天」（而非一個月）。

民盟在南京的諸位舉棋不定。共產黨再度動作，暫代梁漱溟為秘書長的周新民（中共黨員）請張瀾從四川打來長途：「參加不得呀！」「政協議程全部完成之後才能參加國大，否則，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場。」民盟遂作出決斷：「國大開會前應完成政協各項手續，未完成前，絕不參加。」

雖然愈來愈看不慣民盟事事與共產黨商量，對參加與否，張君勱仍說須待民社黨內部討論之後。而討論，誰都知道，是努力勸說北方諸「大佬」。

此情，當時即有人論說：

> 國共兩黨的爭衡，是棋逢對手不相上下。可是在他們爭衡的天平以外，依然堆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砝碼，即所謂第三方面，待他們爭取與運用。這一堆砝碼，愈拿愈小，而價值也愈大，最後最小的砝碼，必定是一個決定的砝碼。[71]

10月底，在民社黨參加與否的關鍵時刻，張東蓀、梁秋水曾飛上海，力阻剛剛完成(國社、民憲兩黨)合併的民社黨參加。主要理由是，對專制者的制衡，不在一紙憲法，而在社會對抗力量的存在。據蔣勻田回憶，張東蓀先生聽完他敘述君勱先生所面臨艱難後，甚慨然地說：

> 你所敘述的往事，我都知道，所以我對君勱現在所存之複雜心理設想，雖不敢苟同，然確能予以原諒。不過事關國家前途，不應只因困於個人成敗心理，以定最後之計。

蔣勻田又提起蔣介石已經認識到1945年底在重慶宴請他們三位張先生時，對張東蓀智慧的建議未予理會，而鑄成今日局面。他或許願意在這樣關頭再聽聽意見。蔣勻田說：「老師若肯赴寧與蔣面談，懇勸他緩開國大，因那節往事，或可幸邀其考慮，甚至接受，也未可知。」

這建議得到張東蓀首肯。張君勱也促他一定前去。蔣勻田立刻赴南京請雷震安排，又返回上海陪同張東蓀一同前往。歷史的巧合——或曰不巧——當他們到達時，原先安排好的「個人面談」變成了「茶話招待」。據蔣勻田等回憶：蔣主席雖親到現場與東蓀先生握話，並勸東蓀先生不必回北平，說將要改組政府，希望張能參加。張東蓀則表示：那樣一來，就要失去介入和談的身份，一再勸蔣「不忙改組政府，先恢復和談」。蔣勻田認為，「在會眾人多的場面，商談政事的機會實無，使東蓀先生甚為失意」[72]——他難道沒有參悟透，戰場上之全贏在即，蔣介石會聽人勸和麼？

張東蓀從南京直接回到北平，沒有再回上海。

11月15日，國大開幕(預備會議。第一次正式會議要到十天之後)。青年黨交出了參會一百人名單——就剩下民社黨了。

張君勱做出最後努力，派孫寶剛(民社黨中常委)專程帶信到北平，力促張東蓀到南京，召開民社黨會議，最後定盤。此情為周恩來得悉。他立刻通知同為民社黨的葉篤義。葉日後回憶周當時對他說：

你為什麼不去呢？假如你不去，叫孫寶剛一個人去，張東蓀就非常有可能來南京。張君勱的民社黨參加國大是肯定的了，何必再拖一個張東蓀下水呢？你去北平可以作一點張東蓀的工作嘛。

葉篤義當時雖為二張所在之民盟盟員，但心已經另有所屬。他回憶道：

我聽了這個話之後馬上去找張君勱，表示願意前往。張君勱非常高興，以為我轉變了立場，而沒有料到我去拆他的台。臨行前，蔣勻田對我說：「東蓀先生對參加政府作教育部長可能有興趣吧？」

葉、孫二人乘同一架機到北平，約定第二天一道去燕京大學見張東蓀。降落後，孫搭乘民航汽車進城，葉枉稱到附近看親戚，實則一個人先到了燕大。據葉披露，「我對他介紹了南京的局勢，叫他萬萬不能去南京」。葉篤義說：就這樣，我和孫寶剛第二天去見張東蓀的時候，張即表示不能去南京，並寫了一封回信叫我帶交張君勱。

在葉到北平的第二天，看到蔣介石直接打給張東蓀的一封電報，再約他往南京參加國大。張東蓀覆電推說有病不能離開，待到燕大放寒假可能到京滬去看他。據葉記載，覆電最後本有一句，說假如國大能通過一部比較民主的憲法，中共雖不參加亦必擁護。葉篤義提醒他絕不能這樣講，因為無論通過什麼，都是由「非法的、違反政協決議」的大會做出的。張東蓀恍然，馬上叫兒子乘汽車到電報局，把最後一句刪掉了。[73] 如果此段記憶屬實，只說明在那時節，張東蓀對雙方了解之淺——也可以看出，在許多場合，屬於人性之悲劇的「理性對情感讓步」。因為以他一貫的觀點，黨治之下行憲，原理邏輯上是說不通的。[74]

這局面，當時的燕大學生陳尉有如下記載：

……政府索性全盤露骨地破壞政協而在是年12月裏，召開請客式的國民大會了。在這個大會裏，青年黨當然是很樂意參加的，但民社黨卻不能這樣，因為有許多有眼光、有骨氣的人

在，張東蓀先生便是一個。當時民社黨在黨魁張君勱主持之下通過了《政府保證通過張君勱所體民主憲章》而有條件地參加「國大」的議決案後，就派孫寶剛專機去說動該黨的北方領袖張東蓀和梁秋水諸先生（因為他們實際還不知道民社黨已在張君勱主持下通過了有條件參加國大的議案這件事），要求他們親自出席「國大」，一方面蔣主席也在半夜裏打了一個電報給張先生等催駕，並且還派了專機去接他們。

對於這，是張先生立身處世得到北方青年的信仰的第二次的大考驗了。在一天早晨，張先生的房門口來了十幾個燕大的學生，他們特地來探問張先生要不要參加「國大」，他就給了他們這個肯定的回答：「你們放心，我絕不會使你們青年人失望的，我絕不參加『國大』，我很忙，有功夫再談吧。」

這時候，在這個哲學家的房裏正坐着民社黨派來的磋商出席「國大」的大員。而對於蔣主席的電催，他也給了「燕京課忙，不克分身」的電報回絕。[75]

化名陳尉的作者如果屬於北平地下黨學委系統，對親負恩來先生之託的葉篤義之行，顯然不知情。同樣，「得到北方青年同情與支持」的張東蓀也不知道，他對民生的關注、對專制的反抗，已然納入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戰略策劃之中。毛澤東在評價國統區學生運動時斷言：

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76]

對此，〈中共中央關於蔣管區群眾鬥爭方針的指示〉說得就更清楚了：

靈活地運用鬥爭策略，有時直進，有時迂迴，有時集中，有時分散，公開與秘密，合法與非法，既區別又結合，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77]

事實上，第三天，葉篤義已經帶着東蓀交君勱的信回南京。信裏有這樣決絕的話：「民社黨交出名單之日，即我事實上脱離民社黨之時。」據葉篤義記載，張還寫了一封信直接寄給張公權，提到「君勱四十年聲名不易得，望友以全之」。[78]

在這前後，回燕京過聖誕節的司徒雷登也是一下飛機就找張東蓀，説國大就要開了，要他參加。以司徒識人之本領，對他親自聘任的這位系主任，應該説有相當了解。他很詫異為什麼民盟會同共產黨這麼近；更替他的朋友蔣介石惋惜，認為蔣不懂得怎麼尊敬和聯絡這批人。

張家後人對這一時期的回憶要簡單得多：決定不出席國大後，曾有人在家裏的門上畫了一支手槍。

陳尉的文章寫到張教授的感受：

> 現在張東蓀先生仍舊以私人的資格參加在民主同盟裏，並且還擔任了重要的職務。他將不斷地為着中國的民主奮鬥，一直到中國實現了他的希望為止。那時候，他也許就會再回到書房裏去研究他的哲學和以全副精力負起教育青年的責任。因為他曾經説過：「今後士大夫的出路必須大改，我以為只有兩途。其一是教育為終身職業……另一個是與農打成一片……」(《理性與民主》)
>
> 他以後一定更全力以赴地走第一條路，因為他就是現在也還是不肯完全脱離燕大的教書工作。在學校裏，他與學生和同事們都相處的很好，但司徒雷登校長常説：「張東蓀什麼都好，教書教得好，同事間處得好，只是反對政府這一點有點……」。是的，誰叫這個國家弄得這個樣子的呢？否則張先生也許根本就不會走出書房一步的。[79]

大局已定。決定19日返回延安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最後在梅園新村招待民盟戰友(11月16日)。到場諸位共誓：「風雨同舟，並肩戰鬥，共進共退」——有如易水之畔的訣別。回到延安之後，周做了一個《一年來的談判及前途》之報告(12月18日)：

我們也料想到青年黨、民社黨一定要參加「國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參加，「國大」開了就很臭。這個目的達到了，這是八年抗戰和最近一年來談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於反對蔣記國大，跟着我們這條路走了。[80]

就在這天（11月19日），蔣介石在官邸設晚宴款待民社黨主席張君勱。君勱先生面帶倦容，杯盞之中，向蔣交出民社黨參加「制憲國大」的人員名單（共四十人，沒有他本人），以及一封「民主社會黨組織委員會主席張君勱致書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信，懇勸「徹底實行停戰命令，實現政協決議之精神」。據記載，蔣介石喜不自禁，命令立即交由各大報紙發表。蔣總裁也在第二天函覆民社黨主席張君勱：中共問題以政治方法解決，政協憲草各方應負責通過。

對此，據蔣勻田回憶，張東蓀認為：

中共不參加，縱能照政協憲草通過，未有制衡的政黨力量，亦未必能實行所通過之憲法，而有補於和平建國。況政協閉幕時，蔣主席對政協憲草之採仿內閣制，及對無形國大選舉總統之規定，皆極表不滿，此更不應忘懷。綜其過去往事，不知有多少諾言，皆未實行，一封交換保證信，[81]即可據以為憑嗎？未免太天真了！[82]

當時張東蓀先生這番爭論，無人可以據理反駁。

進入12月，張公權還曾親赴北平，苦勸張東蓀、胡海門、梁秋水等。到此時，堅持不可參加的，只剩下張教授一人。

有趣的是，對這一大家起哄、紛紛下場拉人的局面，與張東蓀共同見識者，居然只剩下政府陣營裏的張群一人。他曾經問范樸齋：

「民社黨在民盟裏有多少人？」

「只有二十個人，但很可能有一半人因為不同意參加國大而退出。」

「使得第三者都入混水，將來連一個轉圜的人都沒有，這是呆笨牛的做法。」[83]

「中間勢力」分別倒向極右與極左兩大集權集團。12月24日，對參加國大的民社黨，民盟發佈「難礙在盟內繼續合作」；民社黨遂於第二天宣佈退出，張東蓀以個人資格留在民盟。訂交四十年、情同兄弟的二張從此分道揚鑣，直到流寓海外的君勱，在七十九歲時，伏案書寫〈東蓀先生八十壽序〉。

「民盟跟着共產黨走」局面已成，東蓀歷史地廁身其間。欣欣然，憤憤然，抑或淒淒然？作為「最後的砝碼」，張東蓀的決定，更加深了他在毛心目中的定位：「資產階級和蘇和共左派」——形勢逼人，一線權勢人物只要行動。至於行動背後之哲理，或許不重要；或許到時候再說。

從此，在共產黨與民盟的話語裏，民國成來以來第一次有點樣子的國民大會，變成「偽國大」、「偽憲法」。民、青兩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則在罵聲和質疑聲，外加華北、淮北不曾斷過的槍炮聲中，「一讀」、「二讀」、「三讀」，切磋制憲。

平心而論，傳統專制千年的中國要麼別提憲法，若立志以憲法規範行為，這還真是歷來最好的一部——即使以今天的標準看。比如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以及第二十八條：「官吏不得當選為國大代表。」（後經蔣主席提請，修改為：「現任官吏不得在所在選舉區當選為國大代表。」）

但是，中國的事，一旦運行起來，不僅憲法莫奈何，新政府面對老權貴，也無法運轉。比如張群派蔣勻田查究「抗戰勝利後，國庫存有九億多美元，何以宋子文長行政院不過一年，交卸時只剩下一億掛零」——用到哪裏去了？政府接收十七萬棟「敵產房屋」，落到哪些人手裏？民眾不滿爆發的時候，當局拿出的辦法，也只是鎮壓——台灣「二二八慘案」（槍殺平民上萬人）就是在這時候發生的。

與當局決裂的共產黨，這階段也沒閒着。除了繼續擴大地盤，12月，延安決定「徹底複查土地改革」，將地主的田地、房舍、財產

等，分給「貧僱農」。接着頒佈《土地法大綱》——擴軍運動開始。否則，四平保衛戰這類仗可怎麼打？[84]

在近乎人格侮辱的「八上廬山」之後，馬歇爾宣佈退出國共調處，返國接任國務卿新任。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已不抱希望：讓其「自生自滅」吧——除非能按它自己的辦法解決共產黨。

什麼辦法？還能有什麼辦法麼？蔣介石告訴馬歇爾：共軍將在八至十個月內被殲。共產黨則宣佈：已在各處前線先發制人，六個月內粉碎政府軍事攻勢，武力恢復1月13日的地位——最為可恥復可悲的國人相殘陰雲，籠罩着飽受戰爭摧殘、等待喘息的大地。

民盟怎麼辦？

張東蓀、施復亮諸人堅持主張中國應有一個「第三方面力量」，包括所有中間階層和中間黨派，而「民盟應成為一切『第三方面』的黨派和人士協力推動民主運動的公共組織」、「居於國共之間」、「取得舉足輕重的獨立地位。」[85]

但馬敘倫認為，不應該再出現什麼「第三方面」：「爭取民主的眼前階段上，只有民主和反民主兩方面，不容許有第三方面」；「目前反民主的正在用巧妙的手段或硬或軟地欺騙或強制來和緩民主鬥爭，以維持獨裁政權。我們該堅定立場，明白沒有調停兩可的餘地……」；第三方面「或者是被人利用的，或者是幫助反民主的忙的奸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願意再有這種事實出現，而且不願意在民主鬥爭裏再聽到這個名詞」。[86] 馬敘倫日後榮任「新中國」教育部、高教部部長（讀者應記得這是國共兩邊多麼看重的位置），背書復背書，連走台階都曾榮經毛澤東攙扶，就很不偶然了。

年底，本書主人公從北平南下抵滬。1947年1月6日，大家聚到章伯鈞寓所，民盟一屆二中全會召開，作出左傾反蔣的重大決定（雖則語言仍是「堅持政協路線，調解國共衝突，恢復和談」），張東蓀當選為民盟中央秘書處主任（即秘書長）。

剛過去的、幾乎將處於一線之第三方面諸位的智慧、情感與精力用盡的「調停」，張東蓀並未親嚐。也就是說，在如此不堪之僵局下，還有膽氣再度領銜捲進和談的，也就剩他了。或許這就是「知其

馬敘倫1948年贈張東蓀的題詩

不可為為之」？半年前，就在他的諸老友幾近受辱般地苦旋於國共兩造間，他回想起一樁往事：

> 國民黨北伐以前的二三年，我曾訪梁任公於協和醫院。彼時他正要施行手術。我向之進言謂文化運動未有不含政治改革者，故僅文化運動是不夠的。他告訴我，他之所以不願再談政治就是對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來了。我聽了只好唯唯而退。到了今天回想起來，實在不能不引為中國之一大損失。
>
> 中國之始終未能走上民主軌道，可以說就因為沒有人肯作民主主義之殉道者。必須有人和迷信財神與送子觀音那樣，不恤徒步登山，數夜不睡，以迷信於民主主義，則民主方會發生力量。環顧海內，這個天賦的天命應該降在梁先生身上，他竟未曾擔起，豈不可惜。[87]

作為新晉的民盟秘書處主任，不得不與各方接納。他曾在上海見共產黨留下的代表董必武；又接受張君勱建議到南京去見蔣介石（作為國大之前那次推病拒絕邀請的回答）。他的這次南京行由張群安排，葉篤義陪同前往。

據葉篤義回憶，在與蔣的會面中，蔣告訴張教授說將要改組政府，希望張能參加。張東蓀回答說那樣一來，他就失去了參加和談的身份，並勸蔣不忙改組而是首先恢復和談。蔣介石沒有同意。也是這次，已經在南京大使位置上的司徒雷登曾邀請張東蓀午飯，葉篤義陪同前往。張首先向司徒介紹了與蔣見面的情況，並說在離開北平之前曾同北平的中共領導人見過面，已告訴他們將要到南京見蔣並盡力恢復和談。他說中共方面同意這樣，同時勸司徒也對蔣介石做同樣的勸告。司徒唯唯否否，說勸蔣不先改組政府而恢復和談，恐怕不大可能。說將來和談的時候，希望張再來南京繼續合作。[88]

南京勾留三四天後，東蓀回到上海，住在永嘉路集益里八號張瀾公館。即使在那樣的動盪中，還有由何公敢發起，張東蓀領銜創辦《展望》之舉。參加的人除張何二位，還有章乃器、施復亮、張雲

川、羅涵先、葉篤義等。章氏稱他們的立場為「左不盲從，右不落水」。該刊只出了兩期，因經費無着而停刊。

離南京前，沈鈞儒贈詩一首：

> 春光慘淡舊京城，
> 桃李無言缺舌鳴，
> 千百莘莘其仰首，
> 九天雲感見先生。
> 如此煙塵撥不開，
> 滿街緹騎向人埋，
> 有懷諸友多珍重，
> 清議今朝在草萊。
>
> 東蓀先生將返平索書賦贈三十六年二月鈞儒

回到北平，因為和談即將破裂，調處執行部北京小組也決定撤離了。葉劍英、徐冰請民盟人員參加「座談會」（孟用潛語），談局勢，和告別酒會。張東蓀參加並講話。[89]

這年7月，在魏德邁到中國「調查」的時候，他第三次南下赴寧，見這人見那人，斡旋這、呼籲那，在近乎絕望之下，竭力避免可恥的國人自相殘殺。這局面，張教授自己回憶說：

> 即在政協失敗以後，我一個人還奔走寧滬幾次，想謀挽回，不外乎想忠告國民黨把這個幻想收起來吧，拿出真正的良心來以謀合作，因為破裂的結果，我們早知道國民黨並不能得到便宜。幾次談話的結果使我知道他們永遠不會有覺悟，於是我乃認定中國非經過一個最悲慘的時期不可了。[90]

他沒有提到在這前後還曾捲進過一場可謂空耗精神的無謂之爭：遭民社黨開除，被革新派慫恿另組獨立民社黨之類。雖然作為民社黨顧問，他也說過諸如「應把握政治路線，不能見異思遷，投機取巧。……此時代之誘惑性大，尤須注意。黨員應對黨盡義務，而不

春光慘澹舊京城桃李無言鴃舌鳴千百羣羣齊仰首九天雲啟見先生北此煙塵撲不開滿街緹騎向人埋有懷諸友多珍重清議今朝在艸萊

東蓀先生將返平爰書賦贈 三十六年二月 鈞儒

張東蓀1947年2月從南京返北平前，沈鈞儒的贈詩

能希望由黨而獵取地位。應避免黨內有派，此乃政黨擴大常有之病象，應慎之於始創立民主作風」等等，[91] 但總顯得十分隔膜，乃至痛苦。

這境況，也部分反映在民盟遭政府查禁而被迫宣佈自動解散之時。儘管北平盟員討論對策的會是在張家開的，他卻怎麼都打不起精神。振衣投袂的吳晗堅決反對解散，責無旁貸地領導北平委員會轉入了地下，還通過徐冰撤離之前提供的收聽機，收聽解放區廣播、油印散發。

局勢如此，人們心底尚存的一息熱氣總難消逝殆盡。從春到夏，作為當時「無人不識」的「革命學者」東蓀先生，頻頻撰文，並一次次受平、津、滬學生邀請，談南行見聞，談世界政局，談哲學家職責，論政治鬥爭，談中國民族的良心。

這期間，曾有一名軍人帶來一幅圖卷《林屋山民送米圖》到燕東園拜望並索題。來人即是圖卷所述故事主角太湖林屋山暴方子之孫暴春霆。那圖卷麼，則不僅有清末俞樾、吳昌碩等題詠，更有今人胡適、俞平伯、馮友蘭、徐悲鴻等題記（包括重繪）。據其時正服役於傅作義部隊暴春霆君本人對他這次的往訪記述：

> 張在全國解放前是燕京大學教授，民盟華北的負責人。他當時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孤行，殘酷壓榨，因而招致蔣在北平的特務組織的迫害。特務曾數次糾集人眾到燕京大學附近遊行示威，高喊「打倒張東蓀」口號。有一次在遊行時把張先生住宅的玻璃全砸破了。
>
> 我對張先生能站在民眾立場與強權鬥爭的精神異常欽佩，於是帶着這卷《送米圖》前往燕京大學，請他題詞。和他見了面，才知道他是位五十多歲的瘦弱學者。我到了他的會客室，他讓我坐在沙發上和他談話。室內還有幾把沙發他偏不坐，卻雙手拿着《送米圖》坐在地下，倚着牆壁，仔細觀看。他的夫人也不坐沙發，偏坐在樓梯的最上層，拿着一杆水煙袋，吸得咕嚕咕嚕，還能從鼻孔內冒煙。此情此景好似一幅幽默圖畫。

當時《送米圖》中還夾着俞曲園在我祖父撤職後給他的一封信，其中有「今之官場無是非可言」。這句話引起了張先生大發議論。他拿起筆來就寫：

暴君春霆以友人朱孟實之介，訪余於燕園，出示秦散之所繪饋米圖囑題。饋米圖者，紀春霆先人暴方子先生卻職甪頭巡檢後，貧不能舉炊，村民集米饋贈之事也。余既不能詩，頻年以來又習為語體文，顧春霆盛意則亦不敢卻，不得已書讀後感，固知不足以當跋也。

方子先生在吳縣甪頭時，常與曲園老人往還。其去官後猶得曲園函札，謂今之官場無是非可言。其時距清之亡不過十餘年，然即此一語已足證清之必亡矣。竊嘗讀史，每當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時期，無是非，無賞罰，固不僅貪婪無能而已。方子先生清廉自守，宜其被劾。語云：「禮失求諸野。」黑暗時代，是非美惡之辨，只在人民。故一人倡議饋米，各村皆起應之，是公理猶在人心也。此饋米圖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為大有歷史價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證清室之必亡。蓋未有貪污橫行，是非不辨，賞罰不明，而能永臨民上者也。

春霆以是圖遍索人題，余披覽之餘，感慨或與人不同。當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猶欲竭智盡忠以謀挽救，顧終無濟，豈非以病已深入膏肓耶？則今日讀此圖，能不令人感慨繫之。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七日，張東蓀[92]

「竊嘗讀史，每當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時期，無是非，無賞罰，固不僅貪婪無能而已。……未有貪污橫行，是非不辨，賞罰不明，而能永臨民上者也。」書於1948年，似已預言了國民黨政府的垮台——當鍾叔河再度發掘並出版此送米圖卷子，已是2002年，難

道俞樾在辛卯(1891)、東蓀在戊子(1948)所感慨之國勢危殆，又見端倪？

此時已是1948年暮春。

註釋

1.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596。
2. 「當時無統一檢查機關，各自為戰。憲兵、警察、圖書檢查會、市黨部、便衣密探等都可以突然檢查。」參見王大煜：〈生活書店見聞〉，載《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2期。
3. 轉引自溫梓川：〈「世人皆欲殺」的羅隆基〉，載《文人的另一面——民國風景之一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123。
4. 孫曉華文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
5. 同註1，頁598。
6. 原載《蕉風》(馬來西亞)，1967年第174期，轉引自溫梓川：〈「世人皆欲殺」的羅隆基〉，頁123。
7.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頁137。
8. 《中國社會團體與政治黨派的調查與分析》，1938。
9. 馮崇義：〈第三道路世紀夢——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回顧〉，《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2年10月號，總第7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7033.htm)。
10. 由於國軍接防陝甘寧邊區，中共本以作出「七參政員不出席」的決定。頃接國際(崔可夫)電報，希望中共出席，遂形成兩個在渝參政員參會的局面。
11. 蔣匀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頁83。
12. 同註6。
13. 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下)，《傳記文學》，1981年，第39卷第3期。
14. 引自《解放日報》，1944年9月22日。轉引自王漁：《林伯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
15. 李銳：〈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

16.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頁383。
17. 轉引自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60。
18.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16–17。
19.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061–1062。
20. 張東蓀：〈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正誼》，第1卷第7號，1915年2月。
21. 張樹桐：〈新中國成立時的中央政府為什麼叫人民政府，而不叫「聯合政府」？〉，《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頁24–26。
22. 電文：「中國解放區的一萬萬人民及其軍隊，將全力配合紅軍及其他盟國軍隊消滅萬惡的日本侵略者。」這一意思，公開公佈的，是〈對日寇的最後一戰〉一文（8月9日）：「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面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頁1119。
23.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國共兩軍形勢：國軍遠在千里之外，中共與東北地區的武裝力量則近在咫尺。從1941年即拉到蘇聯整訓（間或回來游擊一番）的原東北抗聯，此時也隨蘇軍進入。關內的中共軍隊，準確知道的，是1945年8月14日「分三路急進東北」（冀熱遼軍區的三個軍分區：十四、十五、十六軍分區）。據青石：20日，毛根據蘇軍進展情況，決定從華北各根據地抽調九個團，連同已在熱河邊境的幾個團，配備相當數量的地方工作幹部，限期開赴東北，並明確宣佈部隊的任務是：「乘紅軍佔領東北期間和國民黨爭奪東北」。中央甚至批准了華中局奪取上海的起義計劃，並提議組織各大城市武裝起義。毛澤東當天接連數電華中局，要求他們堅決徹底地執行起義方針，除發動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內數百萬農民武裝起義策應以外，還應迅速調派新四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他並且電示華北各區局，要他們效仿華中局的作法，對於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也「迅速佈置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以便不失時機配合攻城我軍實行起義，奪取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參見青石：〈東北決戰幕後〉，《百年潮》，1998年第4期。

24. 1945年8月14日，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托洛夫在莫斯科簽署。蘇聯保證在出兵三個月內將東北歸還國民政府。代價是蒙古獨立、中長鐵路和大連港。
25. 此即後來有名的「不許革命」：「一九四五年當我們正在準備推翻蔣介石，奪取政權的時候，斯大林用他們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們，指示我們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參見青石：〈斯大林「不許革命」!?〉，《百年潮》，1998年第3期——而不過數月後，它已經從物質到精神，一個勁鼓動共產黨大打：原來發現國民黨已經一心投靠美國，已經不再似簽約前那樣低聲下氣的時候。
26. 「時隔三日，國民政府宣佈對日寬大，不索分文賠償。如此要事，事前未與任何在野黨領袖商議，未免使人驚異。」參見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
27. 8月30日民盟即發佈與中共配合無間的《緊急呼籲》：「由政府召集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治會議，解決當前一切緊急和重大的問題，包括產生在憲法政府成立以前的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
28.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
29. 呂光光：〈毛主席同張瀾的會見〉，載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等編：《重慶談判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頁444。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33。
31. 蔣勻田，民盟「一大」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擔任大會聯絡秘書。到台灣後，依舊任民社黨領袖。七十年代在香港《中華月報》發表一系列參與國共和談的文章，後由香港友聯出版社結集成書，名為《中國近代史轉捩點》。書中對當時人物如章伯鈞、羅隆基、梁漱溟、黃炎培、毛澤東、周恩來、孫科等，以親歷者身份描述。同為親歷者的葉劍英讀後，囑人傳話蔣勻田，謂該書：「所言皆真」。1979年，「總統府國策顧問」、民社黨主席蔣勻田和夫人到北京訪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會見時表示歡迎他們回大陸探親和參觀訪問。蔣回台灣後被民社黨開除黨籍、解除職務，史稱「蔣勻田事件」。
32. 參見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頁541–557。
33. 以上蔣勻田的回憶，引自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2–5。

34. 「統戰」這一觀念正式進入毛澤東運籌帷幄之八卦陣，正是始於這時。在共產黨二十多年掙扎存活的歷史中，與敵對者及中間地帶力量的聯合，開始於1935至1937年的「聯蔣抗日」。在毛澤東取得黨內絕對勝利之前，這一方面（包括城市工作——其實早期統戰部與城工部沒什麼區別，1948年9月24日和26日，中共中央正式發電，「將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一直由王明、劉少奇、周恩來掌控。正宗黨史曾將「軍隊、群眾工作、統一戰線」列為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
3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33。
36. 毛澤東：〈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1945年6月10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426。
37. 引自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6。
38. 雙方同時下達停戰令，並規定至遲在13日午夜，雙方軍隊要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39. 國民黨八人（九減一），中共七人（九減二），青年黨五人，民主同盟九人（無黨派二人，民社黨二人，救國會二人，職教社一人，村治派一人，第三黨一人）；其他無黨派代表（社會賢達）九人——由兩黨推選。
40. 羅隆基：〈從參加舊政協到參加南京和談的一些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頁193。
41.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
42. 蔣介石致開幕詞：三原則（真誠坦白，樹立民主楷模；大公無我，顧全國家利益；高瞻遠矚，正視國家前途）、四諾言（給人民自由權利；各黨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釋放政治犯）。
43. 張東蓀：〈和平何以會死了〉，《時與文》，第3期，1947年3月。
44.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9–20。
45. 此段引自國社黨宣言〈我們所要説的話〉。此宣言為集體討論，張東蓀執筆，刊於《再生》創刊號，1932年。
46.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23。
47. 也即「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似乎體現在他對思想與言論的容納，否則國民政府時期就不會有有理論、有著作而無行動的學者。但他所謂「政治」似乎並不包括「集會結社自由」。1946年政協國民黨代表雷震，到台灣之後，辦《自由中國》是可以的，但是，當雷先生「有意與台籍政治人物聯合組織反對黨的

時候，蔣氏政權便立刻以執行戒嚴的手法把他抓起來，以叛亂罪處刑」。參見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台北：遠流出版社，1984)。

48. 張東蓀：〈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觀察》，第3卷第7期，1947年10月。

49. 見馬勇：《梁漱溟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頁296。該著述接着寫到被中共政權定為敵人的二張：「張君勱、張東蓀二人只是口頭説説，作個姿態而已……」——不知該書作者作此斷語的依據。

50.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頁62–63。

51. 這就是在後來幾個月裏爭論不休，最後成為爆發點的「交不交(國府委員黨派任選)名單)。四十天後，毛通知重慶中共代表團協調民盟，一致「不交名單」——如果蔣介石「執意修改憲法原則」。

52. 3月7日，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檢討孫科之政治協商會議報告，發言熱烈，反對「憲草修改原則」；認為國民大會權力不應受到約束；還有主張懲處國民黨八代表者。散會後一小時，就在距離會場僅一里之遙的黨部辦公地，國民黨中央立即開會，開了三個小時。會上數人大哭，説政協協議(接受張君勱設計的內閣責任制)，使國民黨「什麼都沒了」。蔣介石説：「姑且讓它通過，將來(等開國民大會時)再説。」

53. 張東蓀：〈黨的問題〉，《再生》，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

54. 這裏「……」為屬於自辱的檢討套話。事實上，在1952年，六十七歲的檢討者自己已經沒有能力跟上新時代步伐寫出套話。那些麻木自辱，原本就是他的子女為應付過關而替老父親填上的(見手稿，以及著者對傳主親屬的採訪)。

55. 此時是1946年2月。但正式「應馬歇爾之請」出任，是在過完生日(6月24日)之後的十天。之前連傅涇波都不知道。參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第二章。

56. 轉引自蔣匀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66。

57. 唐振常：〈張東蓀先生記微〉，載《半拙齋古今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199。

58. 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1945年「11月中旬–12月中旬因疲勞過度，患病住院。」1月7日，毛岸英與兩名蘇聯醫生抵達延安；1月28日覆信柳亞子：「一病數月……」；3月14日覆洪禹信：「……我

這幾個月來都在病中」。

59. 張光年：《光未然脫險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60. 《紐約時報》報道王雲五訪美標題，轉引自王雲五著，王學哲編：《岫廬八十自述(節錄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

61.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27。

62. 「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控制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給他們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蓋上合法的印章，他們就在蔣管區各地大搞一黨包辦的國大代表選舉。同時強制推行其『公民宣誓』。北平的六十名國大代表候選人，就是由社會局召集十六個區的區長開會派定的。他們並派出敵偽時期強令老百姓向敵人獻銅獻鐵、尅扣配給物品，壓迫人民的坊長們，拿着名冊到處督催市民去履行『公民宣誓』。」參見沈勃等：〈中山公園音樂堂事件的前前後後〉，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十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頁306。

63. 此外還有曾昭掄、周鯨文、胡海門、何其鞏等共十人。參見沈勃等：〈中山公園音樂堂事件的前前後後〉，頁310。

64.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50–51。

65. 蔣勻田：〈張君勱先生一生大事記〉，《傳記文學》(台灣)，1969年第4期。

66. 毛澤東1946年11月9日對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的指示。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頁149。

67. 廖蓋隆：〈序言〉，載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68. 轉引自艾愷著，鄭大華等譯：《梁漱溟傳》(長沙：湖南出版社，1988)，頁330。

6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文獻出版社、中央人民出版社，1990)，頁722。

70. 張申府對此舉的解釋是：「簽名之後我們三人去見周恩來，他不同意這一舉動，因而我們轉回來把名字塗掉。」參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39。

71. 〈記民社黨南北內訌〉，載林天行編：《中國政治內幕》，第一輯(上海：南華出版社，1948)，頁33。

72.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70。

73.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41–42。
74. 張東蓀：〈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自由評論》，第1期，1935年11月。
75. 陳尉：〈革命學者張東蓀〉，《現代新聞》，1947年6月，第5期。
76. 毛澤東：〈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1947年5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224–1225。
77. 〈中央關於蔣管區群眾鬥爭方針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頁454。
78.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41–42。
79. 同註75。
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710。
81. 指張君勱與蔣介石互換保證信。為之奮鬥多年，且親自起草，張君勱、伍憲子等實在不願失去這部憲法獲得通過之大好機會，更不希望民社黨就此分裂。張君勱為此與蔣介石交換「必令其通過」之私人信件，前者保證民社黨出席國大；後者保證張「頓挫草成」的憲法獲得通過。
82.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頁169。
83. 同註71。
84. 参見張正隆：《雪白血紅》(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85. 〈所望第三方面者〉；〈第三方面的組織問題〉，《文匯報》。
86.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宣傳部編：《馬敘倫政論文選》(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299–301。
87.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88.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43。對此，張東蓀在檢討時候説的與葉略有不同：在南京時，司徒請我去美國大使館吃了一次飯。司徒告訴我説，美方態度，還是堅持和談。當時我就不大相信。我在南京住了兩天就回上海了。
89. 《北京盟訊》，1981年第3期。
90. 張東蓀：〈日本投降三周年感言〉，《中建》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48年9月。
91. 轉引自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374。
92. 〈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圖〉，《文史資料選輯》，總121輯。

第四章



獵獵紅旗下

獵獵紅旗下
草間做人語
如來佛掌中
鵑血變湖煙

一

翻臉

究竟為什麼，在建政初始，在治安、市政、民生……都還沒有走入正軌的時候，毛澤東就急不及待地發動文藝批判和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這幾項運動，比如院校改革跟抗美援朝；歷史電影《武訓傳》跟大學教授的思想；還有涉及的完全是另一人群的「三反」、「五反」之間，又有什麼交錯、糾結的關係？

圖1是這幾件事情在時間上大致的錯疊。

最早起步的是院校改革。這一決定，在毛澤東1950年初匆匆赴蘇，為「繁榮強大的新中國」尋求支援的時候就已經定下。他懷着同志間的至誠，向斯大林彙報說：

> 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國人佔主要地位。……在軍事和政治領域，我們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於文化和經濟，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擺脫外國的影響。[1]

既然經濟制度全盤學習蘇聯，新的「社會主義大廈」所需的零件，當然也得按蘇聯模式車銑，即「按行業、按單一學科，大規模組建學院、培養人才，適應計劃經濟的要求」。[2] 以此為目標，北京十多所名聲卓著的綜合大學開始一鍋燴：北大和燕大的工科併入清華；清華和燕大的文、法、理及輔仁、浙大的人文學科併入北大；北大遷入燕京校園，成立文理科綜合大學，清華變成多科系的工學院；輔仁、人大和燕京的教育專業併入北師大，輔仁大學取消……真乃史無前例

圖 1：建國初期政治運動時間段

院校改革

朝鮮戰爭

批判《武訓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949 年　9　10　11　12
1950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1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2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3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954 年　1　2

的無產階級氣派！能不如此麼——從今以後，在貫徹中央決策的流水線上，效率與服從已經無障礙地擺到了第一位。[3] 至於人文精神和突破思想窠臼的創新能力——這種讓組織為難、給領導添亂的自由化行為，將毫不留情地丟進陰溝！

在這人心無日不怦怦然的1950年年初，張東蓀怎麼想呢？為適應經濟形勢而改革教育，他認為勢在必行。早在1948年，他就曾力排眾議，闡揚他對「計劃經濟」的期許——包括準備做出的奉獻與犧牲：

> 中國為了增產必須採取計劃經濟，尤其必須採取進步的計劃經濟。但經濟方面一有計劃，勢必不能讓其他方面仍留為無政府狀態的絕對自由。就中以教育一項而論，就不能不大加改變以與計劃相配合。政治經濟教育等全體如有了計劃性，則我們今天放任慣了的人必會感到很不便。這一點恐怕我們在心理上應得準備自願犧牲一些不入格的自由方好。……須知在計劃社會中，政治經濟等是沒有絕對自由了，但我們還不能不要絕對的自由。這個絕對的自由應該在文化與思想方面。如果社會因具有計劃性而有些呆板，則我們尚留一個絕對活潑的田地在其旁邊。[4]

我們在後邊會看到，統籌全部資財的政府，包括重新裝配的大學，以及其教程、教材、黨委和黨支部，再加上隨時派下的工作組甚至工宣隊、軍宣隊……等等，留給期望文化自由的人，什麼樣「活潑的田地」。

就是這時候，1950年6月，「心比天高」的金日成，以其手中僅有的三個勉強拼湊的步兵師，揮戈南下，解放「被壓迫同胞」。他的後盾斯大林在自己的冷戰部署之下，為「避免蘇聯直接與美國衝突」，自然把「中國同志」推到前邊。

6月以來，中蘇之間、中共高層之間的緊急磋商，雖然身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卻沒有可能與聞。他依舊住在燕東園三十四號那座小樓裏——這不是因為他任職政府而得的賞賜，從1937年燕

東園教授區興建，依照燕大當時的規定，他即以教授、系主任的資格入住。

畢竟沒有了戰火。春天，熊十力應邀「北上議事」，「到京後聯絡了一些老朋友，也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在後人為他作的傳裏，列舉了十多人，其中並無張東蓀。[5]該書成於八十年代，可能作者還把「張東蓀」三個字當作禁忌。當然也可能張家在西郊，有點兒遠。著者不相信此時熊十力已經世故到故意不與自己撰寫《新唯識論》時候的知交見面。這種「識時務」的政治姿態要到1957年之後才流行起來——一直流行到今天。更況且，在1950年，當東蓀先生的長嫂爾田夫人仙逝時，對政壇人事最敏銳的郭沫若還曾登門弔唁。

暮春，張東蓀投稿最多的《觀察》雜誌，興沖沖地在「新中國」復刊之後，辦到第十三期，不得不收刊了。在這十三期裏，沒有他一篇文字——而不過一兩年前，在1947、1948年，他曾多麼活躍！作為政論家、獨立立場的民間發言人，雖然列居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之高位，他已經沒有了自己的言論陣地。

當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都等着他們的稿子，只不過沒有了當初儲安平將他列為特約撰稿人時候的倚重。這年頭的發言，作者寫的都是光榮地以喉舌自詡的報紙所需要的稿件，比如朱光潛的〈自我檢討〉(1949年11月27日)；費孝通的〈我這一年〉(1950年1月3日)；馮友蘭的〈一年學習的總結〉(1950年1月22日)⋯⋯。張東蓀一個字沒有。

1950年夏天，金日成氣沖牛斗，發佈「八月底將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的命令。中國也在邊境「集中十二個軍以便機動」。剛從連續十二年戰禍中喘過一口氣的中國，又要把自己的子弟往戰場上送了——只為了老大哥心儀的「冷戰」(我們現在已經清楚知道，這場戰爭，斯大林是非打不可，而且非由別人出面打不可)。

據葉篤義記憶，6月底美國剛一介入，梁漱溟就對他說：「東蓀先生準備面見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進言。」葉覺得事關重大，連忙跑去問，張說：「我現在還不準備去見他，等到打一個時期打不下去的時候，我才去說。」[6]——想來他們「英美自由主義背景」一批人，

還不大知道自己在「打了天下」的老革命眼中的可憎地位。而對重大國策之制定，更沒把共產黨品透，還想着有可能據實力爭，以說服當局放棄災難性的「一面倒」。

他們沒有看到這場戰爭所具有的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為了「主義」，為了「大家庭」團結，區區平民百姓，軍裝一裹，發到戰壕裏，算什麼？而更深的、不可明言、卻實實在在起着作用的那層意思，則是「自己家裏」(也就是「新中國」國內)的博弈：政務院委員十五名——民主人士九名，佔60%；政務院所轄機構負責人九十三名——民主人士四十二名，佔45%。好嘛。但誰當家？誰說了算？誰左右民意(即如今所謂的「掌握話語權」)？是你英美背景的資產階級，還是我們人民大眾？

9月初，匪夷所思的「炮轟天安門案件」偵破，在「美帝發動侵朝戰爭的嚴重形勢」面前，曾經吃美國飯、與美國交好的大教授、大買辦、大名流，隨着民族戰爭的聖火升騰，再沒了往日的神氣。「美國」二字，從此從漢語裏消失。提起太平洋對岸那個大國，無人不用「美帝」——而美國究竟有沒有殖民地、有幾個、佔據了多久、其間有過多麼大的爭論和掂量，沒人問，也沒人敢問。

到了10月，要不要為蘇聯火中取栗，已經擺到每個為中國命運之決策「說得上話」的人的面前。在1950年10月2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吃驚地發現，幾乎所有的領導人——他的前袍澤與戰友——都對立刻出兵持懷疑和反對的態度。軍方一致表示「對美作戰沒有把握」。此後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故事了：彭德懷被緊急從西北召回，在北京飯店的席夢思床(後來轉到地毯)上輾轉反側一夜，最後「同意了老毛」。靠着他「不計戰場傷亡」的一貫氣魄，大度地承擔起北方那個冷戰主策劃本該承擔的責任。

五十多年後，楊奎松在他扎實研究的基礎上，點到了這一決策之要害：

> 1950年6月(在鎮反問題上——著者按)毛澤東還極力勸告黨內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擊。然而，幾個月後，隨着朝鮮戰

爭爆發，北朝鮮人民軍很快失利，中國方面不得不準備出兵，他馬上就改變了此前對鎮壓反革命問題不甚積極的態度。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徹底清除國內反革命分子的「千載一時之機」。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後就親自主持通過了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7]

這是他登基前屢屢提及的「打掃房子」——抓住最有利時機，收拾內部「敵人」，雖然僅只「敵人」中的一部分。

這步棋，有幾個人能看得出來？

我們的主人公在這前後專門見了一次周恩來。

為避免捲入這場戰禍，從一開始，共和國大管家即艱難地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或阻止、或權變，對此，張東蓀在尚許他們參加的會上，或許有所察覺。當然也可能僅憑直覺：一個明智的政治家此時應該有的最基本的判斷。

周恩來最後的努力是在10月10日。當時趕往莫斯科的周報告毛，蘇聯不可能提供空軍，只能提供飛機。周為此決定放棄直接出兵援助北朝鮮，僅接納金日成到東北來成立流亡政府。不過三天後(10月13、14日)毛從北京電周，同意參戰。「斯大林感動得掉下了眼淚。」[8]

10月21、23日兩天，按照官方記載，周「邀請郭沫若、馬敘倫、章伯鈞、王昆侖座談抗美援朝問題，聽取意見、回答問題。」記錄中明確說總理「指出一部分人中存在着親美、崇美、恐美和對中朝兩國力量估計不足的錯誤思想」。[9] 多麼微妙嫺熟的運作！最期望「直諫」的「一部分人」不僅未蒙受邀，還明白地在黨的好朋友面前獲冠「錯誤思想」。想來周將這幾位請來指出決策者最為討嫌的張東蓀一干人的「錯誤」，恐怕不僅僅依據中共歷來習慣，以「聽取意見」而實施「通報」。他須明確給出自己姿態，拉開與有美國背景的人的距離。為消解毛對自己的忌諱，還須如何在別的地方找補——比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與東蓀先生有十多年交往(如果從1938年武漢一面算起)的

周公，從此刻（包括後來）表現得超乎尋常的峻刻外加鮮有的輕飄（這我們在後邊將細細道來），與他歷來為人有悖。暴露出的，正是他機敏政客而非誠樸學人的品質。

1950年秋天，隨着百萬中華男兒（「最可愛的人」）投入戰場，「將美軍趕回三八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年底公佈了「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存款的命令」，以及「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決定」，燕京大學已然不保。這些「決定」所涉及的人群，那些曾在燕園享受了自由的學術空氣，以及優裕的生活待遇，包括對司徒校長及其辦學方針由衷感佩的前師生員工，立即「致電總理、發表宣言」，表態「堅決擁護支持」。[10]

張東蓀應該已經察覺，此時的燕園，已經不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大學。前地下黨員一一冒出地面，擔任種種要職……當然已經不是當年懷着信賴與託付，與他秘密聯絡的那批團契青年。有理想而不諳權謀的一批人，到此刻使命已經完結，該有新面孔接手了。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對此，有人跟得上，有人跟不上。張東蓀倒要看看，政府指令，能否把過去歲月全部印記，一瞬間抹去。

此時，外籍教授正一家一家地撤走，包括司徒曾經倚為左右手的愛將、包括那些以全部熱誠支援、掩護進步學生的教授們。夏仁德是在1950年8月離開的——背負着「特嫌」的惡名。

不僅圖書館再不購進喬特的《復返於哲學》（C. E. M. Joad, *Return to Philosophy*）等大部圖書，張教授也已經沒有可能自己訂閱英國的《哲學季刊》（*Philosophy*）。中國對西方前沿學科的了解，到他的孫輩讀書時，只限於《偉大的自然改造者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故事》了。現代西方哲學從此進入封凍期，進入人為的「強迫遺忘」。[11] 到了九十年代中，大陸哲學專業的學生驚奇地發現，原來他們的太老師輩，早在二十年代就知道了柏格森、詹姆斯，還有倭伊鏗、杜里舒。

1951年春天，電影《武訓傳》上映。

這是一部策劃於戰亂的四十年代，完成於建國之始的左翼電影。

雖說編導和主演都來自國統區，但對共產黨絕對衷心佩服。到製作的後期，政權已經易主。接到諸如「片尾須貼革命口號」之類命令，也勉為其難地順從了。不料公演之後，如潮之好評還沒推到高峰，毛澤東已經生氣了——生了很大的氣。

他親自動筆寫社論：這是「歌頌」麼？看「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12] 社論下面，赫然開列着「有問題」文章和作者名號——黑壓壓的一片。江青憋了那麼多年，終於乘此大好形勢走出居室，為英明領袖已經作出的結論前往一線搜尋證據。《武訓歷史調查記》經主席刪定後公開發表，在「中國革命究竟靠武裝鬥爭還是靠知識文化」這樣重大的課題上，作出了不容置辯的結論。

這又為什麼——不過一部電影嘛！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對這個問題給出回答：「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13]

張東蓀不怎麼看電影。對這場討論，他可能相當不以為然。這幫「罵人黨」在幹什麼？就算是一部壞電影，一部具有惡劣的思想傾向的作品，也有它或生或滅的權利。因為他堅信：

> 沒有一個學說或思想不可以忍容。只要言之成理都應得加以承認；只講正統派的思想而置其他思想於不顧，這不是文化的自由主義之精神。[14]

在文化自由上，根本無所謂「邪說」，亦不能有「一尊」，這都是屬於常識範圍的東西，也是他們經常在著述、在課堂、在講演裏邊公開發佈的觀點。《武訓傳》究竟有多麼荒謬與反動，是否如胡繩所說——《武訓傳》作者及其歌頌者，不過是借《武訓傳》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即與「武裝起義的群眾」爭功，把自己擺在和「武裝起義的群眾並駕齊驅的位置上」，[15] 也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當然已經不可能著文細細駁析。但他沒有感到什麼嗎，比如

對打下了天下的共產黨人？以前將他們僅僅看作奉「共產」為一種主義的民族戰士，是不是過於樂觀了？要知道，共產黨如今擺出的這樣一副面孔，以前大家一起反獨裁、反內戰的時候，可是不曾有過。那麼，毛公究竟什麼意思呢——嫌知識人對中共歸附得不夠徹底？

到了5月，梁漱溟頂不住了，寫了一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全文十五節，對於自己1938年與毛的爭論，作了一個檢討性結語。完稿之後請林伯渠轉毛指教。毛6月5日在文章底稿的末頁寫道：

> 此文最大缺點即在自己今天批判的話，還沒有自己講明過去如何用心思的話多。屬文之時未嘗不一再刪節，而刪節下來猶且如是，可見胸中求為人知之念，多於其自慚自悔之念。慚悔之心不切，檢討文字是不可能寫得好的，容當另寫一文發表，此稿只留存備查。[16]

沒通過！不知這霸道的、一點面子不留的重磅批語，有沒有在他們老朋友之間傳閱。可惜梁漱溟不是馮友蘭，也不是曹禺。毛再不滿意，他自有他的原則：「不能向不通處變」；不能「自昧其所知而從他人」——這樣的態度，可能就是兩年後那場著名公案的前奏了。

張東蓀還是一個字不寫。不僅檢討與「自斥」不寫，讚揚偉大時代(如1951年7月黨的三十周年大慶)的好話也一句沒有，還說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葉篤義着急了，「怕他消極態度惹起黨的不滿」：批《武訓傳》，假裝不懂電影也罷了，別的表態文章怎麼也得有些吧？經不住「自己人」一再苦勸，[17]張東蓀終於為「黨的生日」「隨便湊了一首(類似打油詩的)七絕交差」——依舊留着尾巴，不肯作出令權勢者滿意的低眉順眼：

> 卅年艱苦憶長征，抗暴援鄰舉世驚。
> 今日萬方齊頌禱，獻詞我亦為蒼生。[18]

翻檢張家舊紙片，應該說，也不是一篇自我批判都沒有：



張東蓀五十年代初攝於北京大學朗潤園家中

> 寫過一文……請周恩來、李維漢兩同志看過。他們大概認為還可以，也許認為這是我學習上的一個進步，所以交給《光明日報》發表。發表以後，隨即有人提出批評，我才感到自己真是不行了。[19]

出面批評他的是黎澍，說他「從本質上看改良主義」云云，說這是「調和階級」、「軟化階級鬥爭」。黎澍先生已經離世，無法向他求證，此文究竟是有人特別佈置(甚至代筆)，還是前戰鬥的《文萃》主編那時候確實對他的唯心主義看不慣。

在被迫做檢討的時候，張東蓀還「暴露」過自己的「一件事實」：「有一次看《參考消息》時，看見美帝的輿論在批評毛主席的人民民主專政，說民主就不能專政，專政就不能民主。我當時竟然覺得很有道理。」他還深挖了自己「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中不積極」之根源，「感到言論不自由，感到學術不自由，而不認識反動的書籍及學說，加害革命的嚴重性。」[20]

《武訓傳》批判，聲勢雖大，但幾乎所有的人，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都已經看出：這實在是壓服而非人人心悅誠服。而「壓服，就是壓而不服」——對此，毛知道得比誰都清楚，自然不肯罷手。而曾被看作《武訓傳》後台、對毛的心思又比誰都摸得透的周恩來，也看到了這一層。再加上他與國統區文化人，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們的淵源——毛對他們，敬歟？忌歟？憚歟？沒人說得清——當總理的(他的政務院裏，60%的副職和49%的部長屬非黨高幹)，不得不有所表示了。

這邊廂《武訓傳》批判剛落幕，1951年9月，周恩來應馬寅初之請，親手啟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他敢不如此麼？要知道，毛打算收拾的人，哪怕功比天高(如潘漢年)，哪怕情深意篤(如孫維世)，周從來沒敢護過。至於馬寅初此時突發的一唱一合，怕不是因為「老天真」不諳政壇招式吧？只看他為造勢而開口請的「教師」——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多麼明細！而

膽敢如此放膽點名，難道不是已然看透共產黨對這場即將到來的運動有多麼重視？[21]

這封信由周立刻直接轉毛。毛也立刻轉批：「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22]

周隨後親自部署，並在定下「防止無限擴大」的戒條之後親自登台。9月底，一場足令秦始皇（他只知道坑儒）蒙羞的靈魂攫獲在北大開場。他的表率作用，他的溫和懇切，他將國家民族置於一切之上的無私無畏，着實感動了一屋子的聽講者。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由此全面鋪開。一個月後，在毛的表揚和鼓勵下，文藝界跟了上來，科學界、學術界、民主黨派（依舊民建打頭、民盟緊跟）……開始了聲勢浩大的「集體貶責」、「集體自辱」。[23]

前往北大聽周恩來五個小時報告的達1,700多人。張東蓀去了麼？當他聽到周的講話之要害，即知識分子須通過改造，逐漸「從民族的立場進一步到人民立場，更進一步到工人階級立場」，有沒有感覺？對此，從理論上講，他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雖然在那時，對於「人民」、「工人階級」等等，將在未來的歲月裏，為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用到何等匪夷所思的地步，還沒有充分的估計。

運動持續了沒多久，三反、五反插了進來——別光懺悔、認罪，逗知識分子們玩兒了。仗已經打了一年，還一天天捱着，怎麼支撐？打仗就是燒錢，這誰都知道。從百萬志願軍赴朝，局面就沒有緩解過。窮啊，中國。這是農民連乾飯都吃不上的五十年代初啊。[24] 錢從哪裏來？中國沒有殖民地，也不像今天這樣能大把大把找洋人貸款，只有勒緊褲帶一着：增產節約。這一勒不要緊，毛澤東發現，他忠實的部下——那些爬山涉水、最後進城迎戰「糖彈」的幹部們，竟如此奢侈、揮霍，還無師自通地立刻就學會了損公肥私。「增產節約運動的最大敵人，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不進行三反，共產黨就會變成國民黨」。對經濟無法像對軍事那樣無師自通的老毛，能不發狠麼？黨員幹部老虎，殺了一批。接着，順藤摸瓜，很快又發現了腐蝕他們的奸商：逃稅、行賄……總之「資本家、工商業者」身上大有

油水，於是開始了五反。

三反、五反，就理念而言，張東蓀不會有抵觸。他一直反對「經濟方面的放任」，而且以「替人民訴苦」為職志，對奢靡貪贖向來深惡痛絕。雖然兩年前受邀到西柏坡，對「解放區」有非常好的印象，但有幼年在縣衙「實地考察」、觀摩「打板子」的經歷，加上長於思索而短於激情澎湃的學人特色，對登上廟堂的「泥腳桿子」（共產黨基層人員），張教授早有估量：

> 不過中國還有一個特別情形：即除上述兩種人（官僚資本和地主，張東蓀認為他們是妨礙「增產」的主因——著者按）以外尚有一種人，即流氓是也。普通所謂無產者是指無財產而從事於生產之人，如佃農與傭工之類。中國的流氓確是無產者，[25] 但卻不從事於生產，以敲詐為生。這些人只要求在享用上得平等，其實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26]

誰都沒有想到的是，這場本打算清理政權內部貪污分子的鬥爭，並未有效地控制在財經紀律領域——如擔任上海常務副市長兼財經委主任的潘漢年所做的那樣——卻在法律與制度缺失的局面下，以毛澤東心愛的群眾運動方式，演成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發端於1932年的清肅AB團、1943年延安「搶救」……種種手法，這回再度顯靈。逼供、誘供、寧左勿右、車輪戰、達標、挑唆「狗咬狗」、肉刑和變相肉刑……直至「將鬥爭開展到家庭，瓦解最後精神堡壘」。這一整套閃爍着毛澤東思想光輝的當權者寶典，開了無需實證、無需司法程序，任何「單位」、「街道」或「工作組」，只要有黨的號令，即可拘捕並刑訊公民之先河。該手段此後一次次發威，知識分子改造、反右、反右傾、四清……直到他老人家偉大事業之巔峰——文革。

1952年2月7日，統戰部召開座談會，為五反造勢。據章乃器日記，張東蓀出席並第一個發言，說「商人到社會主義都要發財。……非有徹底覺悟，資產階級即不夠朋友」——言語間透着無能為力的譏諷，對共產黨發動運動之初衷有沒有看透？而實業救國航運鉅子盧作

乎已於第二天自殺。[27]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燕大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場。

與北大、清華和所有當時的高校不同，領導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不是「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馬敘倫為主任委員)，而是市委派的工作組。組長蔣南翔、副組長張大中[28]，負責聯繫文、法學院的，是燕京大學當時的黨總支統戰委員兼教職工支部書記張世龍[29]；協助他的，是市委統戰部另派的一名幹部，原清華大學圖書館職員(地下黨員)王志誠。從時間上，也比各大學(以及文藝、學術機構)稍稍滯後。

看張世龍回憶：

> 對不沾經濟的大學教師，無法用三反、五反的帽子扣下　於是就借其名搞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大運動、具體作法是按系劃分，由青年助教開始，逐漸上升到老教授，人人「洗澡」。就是每人講自己的基本經歷和思想歷程，並作自我批判。被稱為「自我教育」。同時還有學生參加，幫助分析，其實就是批判。直到大家沒有多少意見，算是「通過」了。事實上一切「幫助」批判都已由單位領導事先安排好了。對於進步教師或民主人士的幫助實以表揚為主，很快就過關。而對「落後」者則「組織火力」大加鞭笞，並且總「不滿意」，多方刁難，不予「通過」。直至最後還可以「掛起來」。

但如何界定「進步教師、民主人士」和「落後者」呢？有沒有法律的、或者類似《戰時動員令》之類的依據，哪怕自己制定但對所有人一律看待的標準？若從毛澤東起家的「搶救運動」看，結論是絕對沒有。因為那場運動最要肅清的「叛徒」和「自首者」、江青真憑實據俱在，而執掌大權的康生，直到三十多年後他自己快死的時候，才以只有他才想得出來的曖昧方式，輾轉向毛澤東揭發。[30]那麼，打擊的標準又是什麼呢？只能說，從後來長達半個世紀的苦難中，我們「被運動」的中國人，確切但顯然不夠精確地品出的，怕只有一條，就是「對黨組織」(而非共產主義理想)的熱愛和忠誠程度。且看張世龍回憶：

一般說，當時法學院教授多為民主人士、進步分子，如嚴景耀、雷潔瓊夫婦、趙承信教授、林耀華教授、鄭林莊教授等。文學院新聞系蔣蔭恩教授，中文系林庚教授等是進步分子，而中文系主任高名凱教授以及教育系廖泰初、胡夢玉夫婦屬中間。文學院重點是歷史系聶崇岐、齊思和二教授，他們曾參加1946年《華北日報》公開發表的所謂十八教授的反共聲明，聶還是發起人之一。因此在運動中經工作組批准（以三五反委員會名義）都曾被隔離寫檢查。心理系沈迺璋教授因被人檢舉，罵過共產黨，所以也被短期隔離寫檢查。

這些都屬於運動初起，為「造聲勢」而作的「排隊」。真正的目標，工作組早已得到上頭指令：

這次運動真正要「整」的對象卻是著名學者、校長陸志韋教授和著名民主人士（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哲學系張東蓀教授。

參照另一位台面上的運動領導人張大中和別人的回憶，應該是三人，即「重點批判陸志韋、張東蓀和趙紫宸」。為什麼單選他們三人？是不是針對燕京普遍的「崇美、親美、恐美」思想，從而針鋒相對地搞「抗美、反美、蔑美」？是不是因為抗美援朝，「戰士們在前線作戰，我們要把後方搞得乾淨一點」，必須把「所有跟美國有關係的人都清理了一遍」？[31]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是面上的宣傳。至於真正的目標——

「批倒、批臭」陸校長和張東蓀教授，是由工作組組長蔣南翔傳達的黨中央的決定。我們只是聽了傳達，按工作組提的要求組織實施。（張世龍）

黨中央！

蔣南翔當時是青年團系統的人（籌委會副主任、團中央書記處副書記）。此人是左傾學生出身，曾就讀清華中文系，是「一二．九」時候的骨幹，親歷過延安的整風與搶救，還極為可貴地直接上書，從馬

列主義信仰者的角度，對這一方式提出質疑。[32] 目前尚不清楚那次「上書」給了他什麼樣的經驗或教訓，總之到了1951年，他作為直接接收中央指令的工作組組長給派到重鎮燕京（注意，並非他的母校清華），忠實執行與「搶救」沒什麼本質區別的逼供。從最好的方面估計，「上頭」向他交代任務的時候，曾有驚心動魄的敵情陳述，使得這名年屆三十九歲的前左傾青年，硬生生地當了回「槍」；但更大的可能是誰都不必明說的事成之後的重賞——運動剛一結束（1952年11月），他就得到了清華大學校長兼北京市高等學校黨委第一書記的任命；接着創下毫不留情地整肅錢偉長、黃萬里、袁永熙等真正有資格擔任清華校長的優良人才之赫然紀錄——這已是另外的故事了。[33]

接着看張世龍回憶，看看為把這場戰鬥打得起伏跌宕，「進步教授」怎麼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中：

> 為了形成「對比」，組織全校師生大會聽取某些教授的典型「自我思想檢查」。先有著名民主教授雷潔瓊（民進中委）、翁獨健教授，以及1949年由英國回國的侯仁之教授作「檢查」。這些發言事先都由工作組幫助，主要是王志誠同志和我直接與他們談話。我們並與學生幹部聯繫，讓他們在大會期間組織學生向大會主持人傳遞「表揚」、「滿意」的紙條，由主持會者宣讀。在一片掌聲中結束大會。

這類串演，雷潔瓊等知道麼？知道而心甘情願為之，是出於對黨的忠誠，抑或恐懼？他們有沒有想過，也許日後某一天，當專權者的罪孽被清算時，他們算是「受了蒙蔽」，還是「參與共謀」？如果學歷如雷潔瓊、趙承信這樣的法學家都被蒙蔽了，師範生毛澤東欺蒙智者的手段，也太不可思議了吧？

> 但對陸校長和張東蓀教授卻完全是另一景象。事先由王志誠和我分別向學生幹部報告「批判」他們的要點，其實是組織學生（主要是黨、團員）向大會主持人傳遞「不滿意」、「不通過」的紙條，以及對某些問題的「質問」。最後「轟」下台來不予「通過」，掛了起來。

主持者張大中目前正平靜地安享晚年。他的回憶遠不如張世龍誠實，但也披露了一些實情：

當時很多燕京人說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學的地方，你怎麼不理解這些人？」這些人過去都做過我的老師，老師們的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麼樣，我心裏也沒有底。[34]

什麼叫「政治上」？是不是上面說的「對黨的熱愛與忠誠」？但作為非黨的共和國公民，憑什麼要對一個黨輸誠——只為它握有生殺予奪大權？

讓張東蓀「作第一次自我批判」，是在1952年2月8日，在小文學院師生大會上。這時候，他還什麼都不知道。在他眼裏，張大中、張世龍這些青年，不過是如今多擔負些行政責任的老燕京學生。政治大流如此，他們，包括他都不得不跟着走。張教授就三方面作出自己的檢討：一是哲學系沒有辦好（有做客思想）；第二是對校務不太關心（開會不到；對「罵人團」讓他們鬧，想看他們自己翻船。對此他上綱為「卑鄙下流」）；接着，用剛學的新名詞，給自己定位為「文人型的小資產階級」（急公好義、好打不平）；屬於「改良主義者」（沒來燕京前，就已經受到了資產階級學說的影響）；是贊成多元論的「唯心主義的俘虜」，雖然「喜歡馬克思，但反對辯證法」。

共產黨眼裏的檢討不能是這樣的吧？看看別人，別的「可挽救者」——人家還沒有「被黨中央列入『不予通過』名單」呢：

當時馮友蘭在清華文學院範圍內做思想檢查，幾次下來，群眾「反映很好」，領導認為「問題嚴重」、「不老實交代」。一天，金岳霖去看他，安慰鼓勵之後突然很激動地對馮先生說：「芝生，你問題嚴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着說：「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金先生上前幾步，抱住馮先生，兩顆白髮蒼蒼的老人的頭緊緊地偎依在一起，眼淚和鼻涕齊下。下午，馮繼續檢查，文學院全體參加，燕京大學有些教師也來「取經」。馮先生剛開始說話，就泣不成聲。以後

> 約兩個小時的檢查都是在極其沉痛的情緒下做出的。這次檢查，獲得全場多次熱烈的掌聲。[35]

做戲麼？通觀馮、金二人一生的為學與為人，應該不是，只能說，製造這場面的共產黨，實在太厲害了。

雖然張東蓀的檢討不像樣子，掌握着火候的領導還是很沉得住氣：讓他充分表演，且聽他的「自我批判」——為什麼如此，我們將在下邊說到。

當然還是不通過。一周後，2月15日，終於到了張世龍說的「組織火力、大加鞭笞，總不滿意，多方刁難」時候。小文學院「揭穿（他檢討的）欺騙性」，勸他「洗澡」。賈淑英、翦伯贊上場。[36] 吳偉東（學生）拿出《觀察》文章批他「親美反共」。幾天後是小文學院的第二次檢討會。三個學生上陣，吳小美發言「揭穿」他；林振民專批「第三種力量」；王元敬乾脆點出他「不擁護政府」。

你們今天還在嗎，吳偉東、吳小美、林振民、王元敬？當時情景和自己的發言，都還記得麼？待到後來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再掀起，特別是文革時候，你們有沒有受過同樣磨難，或者從此就成了光榮的黨玩運動的骨幹？

有了黨中央「批倒、批臭」原則，燕京師生不可能不認為他們三人「檢討不老實」、「對群眾的批評置之不顧」。但老在小文學院容易疲沓，燕大遂再以「節約檢查委員會」（注意，這就挾了三反五反之威）的名義，舉行全校師生員工批評張東蓀大會（2月29日）。這回是算總賬，討論他的三次檢討——大會長達五個小時，共有二十五人發言。

根據工作組「事先向學生幹部交待的要點」，這次會上，要重點清算歷史。據章詒和文章：

> 在這個大會上，有兩個人的發言引人注目。一是擔任燕大教務長的無黨派人士翁獨健，……另一個就是已經調到歷史系並有權代表歷史系教師發言的翦伯贊。[37]

這時，進步教授們已經洗淨了自己，躍過龍門，站到了人民一邊，從運動的對象轉變為運動的動力了。翁獨健是燕京台柱洪煨蓮先生高足，學問人品，在校有口皆碑。由他開炮，威力不問而知。但不知是工作組沒交待清楚，還是這大才子陽奉陰違，總之：

> 這個哈佛畢業的大蒙古史專家的發言，太令官方失望。總共不到二百字，講了不足五分鐘，只是希望張東蓀「真誠向人民低頭認罪」。[38]

翦伯贊呢，這名後來被尊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的北伐戰士、共產黨員？他曾在美國加州大學唸過一年多經濟學（1924年），回國後有感於革命失敗，開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歷史」，寫過一些戰鬥檄文和貽笑大方的史論文字（如《杜甫研究》）。以這樣的資歷得以出長燕大（其實就是北大）歷史系，不是因為他的學養、著述，而是他和當權者的關係，這在當時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對此，機警如翦伯贊者，能不心知肚明麼？好，看不起是不是，那就讓你們看看。據章詒和文：

> 他的講話辭鋒凌厲，暗含殺機，指認張東蓀所謂的「中間路線」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貫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張東蓀敵視馬克思主義的言行，是他發言的中心主題。為此，翦伯贊列舉了以下事實作例證：
>
> 1）張東蓀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學》一書裏，就說「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就會餓死。」又說「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
>
> 2）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裏，張東蓀說「馬克思派的企圖不但不會成功，其結果只弄成既非科學又非哲學的東西，終謂四不像而已。」
>
> 3）1946年出版的《思想與社會》一書裏，張東蓀說「無產階

> 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39]

除此以外，翦伯贊還揭發了張東蓀私下裏講「解放三年來一直覺得不自由」等言論。

翦伯贊的發言，為張東蓀的「歷史問題」定下了「四反」基調——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隨着這樣系統、有力的揭批，會場上不斷響起「徹底肅清反動親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的口號。幸好當時還不盛行革命群眾「氣炸了肺」，跳上台揮拳頭。張東蓀靜靜地呆在他的座位上，沒什麼大觸動。不錯，這些他都說過，而且至今觀點不變。翦先生如果不同意，儘管撰文為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正名，更況且，歷史將證明……。

工作組覺得火候已到，該把批判推向高潮了：一名揭發者[40]走上前，向與會群眾當場出示了一本小冊子：1934年版《唯物辯證法論戰》(張東蓀編輯)。在這本小書的封面上，赫然有一行編者的親筆題辭：

> 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二者當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

與工作組的預計絲毫不爽，一顆重磅炸彈在會場上空開爆：全場譁然！廣大師生無不義憤填膺！連張東蓀也忍不住朝那邊看了一眼。十幾年了啊！對，他想起來了……。

其實這段話不是他的發明，本出自英國政治理論家柯亨。當然他絕不想就此作任何申辯。引用了，就是同意，就是鍾愛……。他記起把這本書贈給那人的時候，怎麼順手將這兩句湧現在腦際的話題到上邊。

對柯亨的這句話，他可能並不十分欣賞，因為在《唯物辯證法論戰》出版的1934年，他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還停留在「美好理想，唯不敢深信」階段；羅素的《蘇聯訪問記》和奧維爾的《1984》那時候也還沒有出版。就是在批判大會的1952年，蘇共的內部清肅、中共的鎮

反、肅反和大饑荒，以及東共的異己滅絕，有的沒有充分揭露，有的還沒有發生。但無論柯亨的述説，還是他的引用，都屬於思想和言論，而思想言論，無論其多麼荒誕不經，不僅談不到罪與非罪，甚至無所謂對錯。他可能相當後悔被「請」到這裏來「接受思想改造」。思想是能改造的麼，遑論以這種方式？更況且，《唯物辯證法論戰》是一本對戰鬥的、政治化的馬克思主義(左右兩派，托洛斯基派和斯大林派)加以揭露和批駁的結集，有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旁人的。他根本不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屬於哲學，而是政治運動失敗後，馬克思「為堅其黨徒之迷信計，不得不擅作預言，謂資本制度將自行潰滅。而為證明此預言計，又不得不創有此種史觀」。其實論戰到後來，當他發現人家拿來作為鬥爭工具的馬列主義，和他力圖捍衛的純粹哲學並沒什麼關係，對這場論爭已經沒什麼興趣了：

> 我自信我近來有一個發見，就是我發見馬克思派所用的名詞都與我們相同，而其意義都與我們不同。……我們來駁他們，他們來罵我們，實在都是無的放矢，非常可笑。

3月6日，《新燕京》第二期「張東蓀專號」出版，共八版。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八號不准轉載」。「專號」沒有説到這「十惡不赦的引語」被揭發出來之後，張東蓀的驚恐或懊悔。事實上，當天回到家裏，家人問起的時候，他只平靜地述説了原委，連這位接受贈書的友人是誰都沒提。至於這本書怎麼到了大會會場，也未見記者對持有者(揭發者)的採訪：覺悟有所提高？熬不住了？賣友求顯、求榮或僅求自保？

但是，不過兩三年呀。這些學生，他們怎麼了？1996年，張東蓀的小女兒張宗燁告訴著者，1948、1949年，解放前夕，她正上高中——

> 那時候鬧學生運動，我們家天天開會。進步學生，燕京的、清華的……，有時候用我們家地方他們自己開，有時候是爸爸跟着他們開，幾乎沒空過。前不久，燕京當時學生會主

席、地下黨員陳樹楪找到我，[41] 還來看了我一次，送我一本《無影子文集》，跟我說了半天，態度挺友好，就是特別正統。說起父親，「是好人啊，你也得理解，我們那個時候不敢來看他。」春節前他還打電話來，讓我給他寄一套書。他說他還是信奉共產主義的，但同時又信奉康德，所以叫康奉。

當時（1952年）怕我惹事，（父親挨鬥等）不讓我知道。所以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思想總是轉不過來。因為當時那些進步學生若是不靠着進步教授、包括美國教授的話，都讓國民黨給宰了——他們都是藏在美國教授家裏呀。一位叫夏仁德，Dr. Celer，真的是就藏在他家，從他家化了裝一個一個逃走的。後來說這是文化侵略，都是特務，老天爺，嚇死我們了。現在當然又好了，把人家請回來了。可當時大會上誰要是說Dr. Celer幫助過進步學生，那可就完蛋了。

對燕京的另外兩個重點對象的轟擊，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范興國寫道：

趙紫宸被迫在學生群眾大會上，自我否定燕大過去的校史，並對司徒雷登加以辱罵，斥司徒是美國的間諜，為一反共、反蘇、反華的反動派，為中國人民的死敵，並且是一粒裹着糖衣的毒藥，也是裹着棉花的一把刺刀，這就是所謂美國對華傳統友誼的象徵。他自稱是一年邁的老人，願意改造思想，學習前進，不願落後，雖不能如野馬奔馳，但能像駱駝一樣步步前進。這是趙紫宸在中共極權下的悲哀，他業已丟棄了他昔日最熱愛的基督世界主義的理想價值。

陸志韋更是一再的被中共洗腦，檢討過去的思想，不斷舉行會議，否定司徒雷登過去創校建校的價值，向北大、清華、南開等大學看齊，一如他們盲目檢討其過去的校長胡適、梅貽琦、張伯苓等人的錯誤。最令陸志韋難堪的，是中共唆使他的親生女兒陸瑤華，幫助她的父親進行「思想改造」。一再的坦白悔過，還是無濟於事。最後還要陸瑤華出面控訴陸志韋的罪惡，說他

是帝國主義的爪牙，一個對共黨無政治同情心的基督徒，毒害青年，為人民唾棄，長期潛伏親美意識，渴望美帝國主義重返北平，重溫燕大校長舊夢。[42]

翁獨健在批判大會上，第二次作出讓歷史難於忘記的表現：

有一次燕京開批判會，批判校長陸志韋，陸先生急得要撞牆，被翁獨健一把抱住了。

如何處置張東蓀呢？大會之後，造聲勢的工作組交差，民盟接手組織處理——它此時已接到命令，由基層提出申請，召開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解決。我們今天已經能比較清楚地看出此中門道：對一些註定要載入史冊的糗事，有時候共產黨不願意沾手——既然有那些或嚇破了膽、或品出玄機的民盟頭目們正一旁伺候着「為黨分憂」。

3月4日，中國民主同盟燕京大學分部全體盟員，報請北京市支部，「要求撤消張東蓀民盟內外一切職務」，市支部接到文件後，立即函給了中央章秘書長。

沈鈞儒此時正式介入。從他的回憶裏，我們簡直如臨其境——盟裏出了大事，大佬們如熱鍋上之螞蟻：

昨天看到有封信給張主席，昨天下午我在政務院會上黃任老給我一個條子，這件事情是十分嚴重。(4月)5號我(沈)和章到表老家，東蓀也去了，李徐兩部長也去了，一道談。李部長與張談，張表示深自悔悟，他說燕大發表的也有不是事實，如單獨見魏德邁。其餘是對的。李部長同意我的意見，要他回家請假反省。我說，張再作一次反省。李部長說，多反省一下是好的。張即退出。[43]

雖然在盟內分屬兩派，沈鈞儒這時候沒有落井下石。同樣摸不着頭腦的他勸東蓀「不妨不動，請假反省」，張接受了。

到了4月，毛出場。看過「猴戲」之後，他找到了下手點。4月21日，毛在北京市市長彭真的信上批示：

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對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44]

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後，4月22日，周炳琳教授在民主廣場舉行的全校大會上作思想總結和檢討，終獲通過。朱光潛也隨着過了關。

5月1日，馬寅初校長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慶祝偉大的五一節〉。他在文章中寫道：「在運動中批判了違反共同綱領的封建、買辦、法西斯反動思想，全校空前大團結，一片新氣象。今年的五一節是北京大學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聖旨」中成了不宜幫助過關的「個別的人」，我們主人公的「假」不能無限期請下去。從6月到8月，新一輪的盟內鬥爭開始。從民盟的文件裏，我們讀到這一次次的「檢討」——所幸「自辱」高潮已過，我們的主人公做的，主要是「事實交待」——雖然讀着也難免令人心酸。

後來，張家後代翻檢遺物，發現了這一次次「檢討」的手稿——原來多出於子女之手。張宗燁這時候才想起來，當時還不到十九歲的她，雖然沒有像陸瑤華那樣在組織的軟硬兼施下，跳到台上劃清界限，但她和她的大哥（生物學家張宗炳）確實比父親「活絡」些，覺得不就是檢討麼，誰躲得過？況且，大家不都寫了麼？他們開始代父捉刀代筆：

那時我在城裏唸高中，住大哥家（外交部街），一週回家一次（朗潤園）。我的印象是，一回家就讓我幫着抄檢查。父親很亂地寫在草稿上，改來改去。每過一段時間都要交一回。

當時讀小學的張飴慈也記得一些：

手稿裏邊一部分是姑姑抄的，一部分是爹的（宗炳）的，也有他自己的，還有不認識是誰的。爹的告訴他怎麼寫。還有的是姑

張東蓀的「檢討」手稿之一，以不同字體添加於文字中的段落，出於子女之手。
紙頭拼接，想來是由補充者所為

我在第三次檢討中曾說，我曾以爲要使中共產黨和民主黨的合作發生障礙，必須在國際上爭取張君勱先生。我又進一步想到要吸收資本主義式的經濟建設，中國沒有資本，只有在美英要協助的前提下利用美國借款。我就指摘我這種借款主張寫了很多文章。我這種思想錯在什麼地方呢？我在檢討起來，我首次由于是我立誌在資產階級立場說話，可是要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因之必然會陷入帝國主義的懷抱。由借英美帝力量來取得政治上平衡，一再由借美國資本來發展資本主義，勢必成爲美帝的殖民地。因之要喪失民族立場。解放後我已看到這個錯誤，是我內心的一個創痕，因爲在主觀上我是不願意喪失民族立場的。因此我對這個創痕一直不敢正視，也沒有公開的檢討。這次三反運動教育了我，只有公開檢討，承認錯誤，才能真正的把這種錯誤思想挖出來，割斷根源。

張東蓀的「檢討」手稿之二·由長子張宗炳代筆

姑幫着寫，反過來爺爺抄的。他們那時候年輕，嫌他寫的不好，給他改兩句，即所謂「認識不上去幫着認識」。

雖然有真心愛他的親人的簇擁，從精神生命而言，自由主義者東蓀已如行屍走肉，因為他背叛了自己的原則——「必須說自己的話，也只能說自己的話」：

所謂說自己的話就是自己覺得非如此說不可。這是由於自己對於真理有切實感，因對於真理愈切實，則對於言論便愈尊嚴。於是覺得污辱言論即等於自墮人格。所以讀書人之人格就看其對於本人的言論自己有無尊嚴的保持。[45]

不過話說回來，和翁獨健、周炳琳比——這兩位的「態度」也都不及格，只因為沒在毛那裏掛號，僥倖被放過了——張東蓀此時只剩下半條命。

夏天到了，運動已近尾聲。

如果說運動之初，大家看在總理面子上，有節制、有尊嚴地勉力投入．現在已是面目全非。以後世研究者的眼光，官方認為：

1952年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基本結束。經過這次學習運動，廣大知識分子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學習時事政治和社會發展史，通過參觀或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思想政治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初步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基本上劃清了敵我界線，《共同綱領》成為大家思想認識和行動的準則。[46]

「帝國主義」怎麼看呢？《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這樣寫道：

1951至1952年三個互相有關的運動（鎮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著者按），對到那時為止一直受到中共溫和對待、甚至優遇的集團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喝。……雖然思想改造主要針對被斷言是幫助「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離中共式馬列主義的思潮的影響。……這三個運動的總的結果是使這些成分就範。[47]

就總體而言，說得不錯。但裏邊更深的機鋒，恐怕不是大洋那邊的學者所能品得出來的了——或者說，在陰風嗖嗖的1952年，大洋這邊的也一樣。

別的學校、機關都在「收」了，對東蓀先生，上邊究竟什麼意思？民盟中央一直得不到個準話兒。問統戰部、問李維漢，全都不得要領。

毛澤東究竟要幹什麼——八十歲的張瀾不得不親自出場了。張宗燁記得那天，媽媽對她說，張瀾來過電話了，約媽媽在頤和園見面……。

註釋

1. 轉引自沈志華：〈關於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談：俄國檔案文獻〉，《國外當代中國研究動態》，1997年第1期。
2. 院系調整以培養工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組建專門學院。如北大法律系和清華政治系等組建了北京政法學院，清華石油系發展為北京石油學院，通訊專業匯總發展為郵電學院，冶金鋼鐵專業組建為鋼鐵學院……北京有名的八大學院，即從那時發展起來。
3. 清華大學新任校長蔣南翔（對畢業生講話）名言：今後要想上進，就兩條，一是聽話；二是出活。
4. 張東蓀：〈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觀察》，第4卷第1期，1948年2月。
5. 宋志明：《熊十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1935年，張東蓀在〈十年來之哲學界〉中說：「以我所見，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不失為近來的一部奇書。書內所主張亦許為我們所不贊同，然而其為好學深思的結果，則不容否認。」
6.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82–83。
7. 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

8. 青石：〈斯大林力主中國出兵援朝〉，《百年潮》，1997年第2期。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87–88。
10. 「特別感到高興。因為他們覺得不但從此肅清了美帝對我的文化侵略，丟掉了『司徒雷登』這個大包袱，並且學校可以從此由中國人自辦了。」參見〈燕大師生一致擁護政務院決定〉，《人民日報》，1951年1月15日。
11. 錢理群：〈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讀書》，1998年第8期。
12. 毛澤東：〈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46–47。原載《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
13.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3。
14. 同註4。
15. 轉引自笑蜀：〈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41)。
16. 李淵庭、閻秉華編：《梁漱溟年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204。據查此說另有評述，引文為梁漱溟為其檢討〈我的努力與反省〉所寫跋語。
17.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83。
18. 《光明日報》，1951年6月26日。
19. 張東蓀：《檢討殘片》。
20. 同上註。
21. 運動開始後，馬寅初以口頭和書面形式，代表北大「有新思想」的教授，正式邀請中共中央領導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參見李揚：〈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院系調整研究之一〉，《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2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448。

23. 同註15。
24. 參見張愛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
25. 張東蓀撰文的時候，還沒有意識到，流氓從發跡時候，就是毛澤東主要依靠的社會力量。余英時認為，實際上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裏所謂的「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參見余英時：〈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載《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43–62。
26. 同註4。
27. 章立凡：〈腐敗成因難探討——章乃器與梁漱溟往事之一〉，《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
28. 張大中，1920年生於河北景縣。1938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41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入學不久即發生太平洋戰爭，隨後進入晉察冀地區進行地下黨活動。1946年重新返回燕京，領導燕京以及北京各高校的學生運動。後任共青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秘書長、北京日報社社長、市委黨校校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9. 張世龍應該是燕京工學院的學生，中國計算機開創者之一。1958年，任北京大學計算機系教授，王選和許卓群都曾是他的學生，設計研製了數字電子計算機「北京一號」（交付空軍使用）和「紅旗」。只不知為什麼他在當時會擔任「中共黨總支專職委員及政治大課講員」。本書有關他的文字，均出自〈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紀實〉，載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
30. 章立凡：〈解讀喬冠華晚年際遇的一封信〉，《文史博覽》，2007年第6期。
31. 張大中語，轉引自陳遠：〈燕京大學地下黨與工作隊負責人回憶與反思燕大「思想改造運動」〉，《新京報》，2005年6月9日。
32. 韋君宜：「直到1988年，我們又經過了無數冤苦，我才從蔣南翔臨終的遺稿上，知道他早在當年（就在經歷過執行错誤政策之後）就提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而且此意見劉少奇知道。但是這個反對搶救的意見送到了毛澤東手裏，結果卻是『留中不發』，並且給提意見者以批判，認為错誤。」參見韋君宜：《思痛錄》（香港：天地圖書，2000），頁24

33. 錢偉長是反右運動受害人，但1979年獲得改正後，因告密「反右三十周年紀念會」(可能還有支持三峽工程)而獲重用，並光榮入住新街口外大街甲15號(部級待遇)。
34. 同註31。
35. 周禮全：〈懷念金岳霖師〉，《人物》，1995年第6期。
36. 翦伯贊難道出場兩次？如果張世龍記憶無誤，這回定是稍稍示威，卻引而未發。
37. 章詒和：〈心坎裏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載章立凡主編：《記憶——往事未付紅塵》(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38. 同上註。
39. 同上註。
40. 《新燕京》或當時工作隊辦的《燕京快報》的人。這份報紙的主編是彭珮雲，編輯吳玉寧。
41. 即康奉，五十年代後任職北京市科委。
42. 范興國：〈燕京大學與中美文化關係〉，《傳記文學》(台灣)，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43. 摘自沈鈞儒在民盟中央1952年批張會議上的發言。
4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22。
45.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結論。
46. 參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網站(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55.htm)。
47. 費正清等著，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92。

二

落幕：如來佛手掌中

……張夫人吳紹鴻神色不寧地從頤和園回來。張東蓀終於知道，「檢討」一次次通不過，原來「上頭」認為有一個「重大情節」他還沒有交代：王志奇，美國間諜王志奇，以及他與這個間諜的全部往來。

這是個什麼人呢？

王志奇，又名王正伯，估計是東北或京津一帶的人，大約出生在1910年間。半個世紀過去，關於他的出身、經歷、事業、社會交往，除了在「張東蓀案」中斷續出現，未見任何文字記載。

他是共產黨麼？

張東蓀與共產黨確有組織上的聯繫，開端於《八一宣言》之後的三十年代中期：他在北平與諸位教授一起，發起成立「北方救國會」，託前往延安的彭澤湘向毛澤東致意，並收到了毛的親筆回信。

王志奇與此無關。

王的出現，是在太平洋戰爭之後。與他結識，確是出於共產黨員——不過不是共產黨組織。

「七七事變」之後，中共華北局派了王伯高（又名王定南）和他直接聯繫；燕京大學的地下黨同時派學生姚克殷做張教授和司徒雷登之間的聯絡人。

所謂「聯絡」，當時還是小姑娘的張宗燁並不十分了解。在她的印象裏，「常有教授帶着學生到西郊郊遊，去時四、五人，回來二、

三個——革命去了。」1941年12月那次燕京兜捕，姚克殷也未能倖免。與他同坐憲兵隊監獄的，就有這個王志奇。他告訴姚克殷，自己是因為和瀋陽蘇聯領事關係不一般，才被日寇逮捕的。估計除此之外還說了一大通別的，比如有錢、有人脈之類，這才有了出獄之後，姚克殷將這個「不凡之材」介紹給自己的老師、「進步教授」張東蓀之舉。姚當時對張教授說的是「可以與他合作」。

從這裏可看出王志奇好吹並且能吹的特性；也看出張教授對「進步學生」——特別如果還是共產黨員——的信賴。

不過這王某人確實是個人物。光復後，張東蓀與姚克殷決定在北平發起出版一張小型報紙《正報》，由許寶騤[1]出任主編。王志奇聞風而動，不僅慷慨解囊，還擔任副社長兼經理。張東蓀為這張報紙寫了〈發刊詞〉和〈一個提供大家參考的建國方案〉。葉篤義也拿起筆來寫社論，談到中共應該有受降的同等權利。不幸幾個月後因經費不繼而關門了。張隨後赴重慶參加政協會議。

這裏可以看出王志奇資財投向的不穩定性——不像有根基、重然諾的實業家，倒頗有些「說幹就幹，不成拉倒」的江湖人物特色。

政協會議之後，國內局勢不僅沒有緩和，反倒緊張起來。王現身北平，前往張府拜望東蓀教授。據他說，自己本來只和蘇聯方面有聯絡，現在經他妻弟的介紹，與美國也取得了「關係」。為什麼要這樣？他的解釋是「出於安全」——因為國民黨要捉他。

這樣的解釋，張東蓀居然相信了！面子如許了得的「妻弟」是什麼人，張教授竟然沒有深問。國民黨要捉的人，美國官方肯去保麼？就算想保，保得了麼？羅隆基給軟禁在虹橋醫院的時候，美國領館的人也只能送點藥、送點花，張東蓀這點判斷都沒有麼？

1948年，王再度登門，說自己仍覺得不安全，想逃到石家莊去，請張介紹中共方面的朋友。雖然張教授那時候正得到毛澤東非同尋常的信賴，畢竟這回守住底線，鄭重拒絕了他。後來，有傳言說，王志奇自己想辦法「逃」了過去了。估計就是這次，他於蘇、美之外（如果有的話），又搭上了中共的關係，比方說，答應做公安的「朋友」——即那種不在編的非正式特工。他們的服務是「志願」的，

只通過特別渠道與「組織」保持聯絡。「組織」則以其掌控的特權，在生意、出入境特許，以及權力所能觸及到的諸方面給以照顧。被延攬為「朋友」的，有的出於理想，有的出於實際利益，也有的是給「拿住小辮子」不得不幹。他們的身份也大異：有名聲赫赫的聞人，也有底層人渣。

再見到王志奇，已是1949年。他回到解放不久的北平，四處走動。沒過多久，有一個姓鮑的找到張家，說王突然被捕，託他懇請張教授和劉清揚設法保釋(可知除了張東蓀，他還混跡於別的文化名人之中)。張當時種種事務纏身，還沒來得及和劉清揚商量，王志奇已經放出來了——沒有解釋被抓的原因，估計是1949年7月軍委公安部成立之始的那次大動作。

同時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的羅瑞卿「率領公安隊伍在首都，並指導全國開展蕩滌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的那場鬥爭。正史對此的描述是：

> 在北京，他直接領導對全市反動黨團的登記工作，嚴密組織對警、憲、特等敵偽人員的查處。到1949年9月底，共清查登記敵特、反動黨團骨幹七千餘人，繳獲各類槍械近一百枝，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潛伏在北平的反動力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稱讚。[2]

行文到此，著者不得不引入一則刊佈於《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引起史學界特別注意的短文：〈張東蓀出賣情報案〉。[3]

該文作者朱振才供職於北京市公安局，屬於文壇與學術界為數甚微的有一定渠道、得以閱讀一般人不得接觸的公安檔案的研究人員。不僅研究，朱先生還有文章得以在本單位的網站發表、有專著在市面上發行。[4] 在這篇短文裏，作者明確提出「美國間諜王正伯」(即王志奇)：

>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舉報，說張東蓀有電台一部，正謀求和美國通報。

1950年9月，又發現張東蓀出賣情報的第二件線索，即張東蓀為付梓出版數十萬字的反動手稿給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對其反動觀點大加讚賞，並對美國大加吹捧。

這兩件線索反映了張東蓀與美國的關係可疑。偵訊處1949年初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時，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進一步證實了張東蓀出賣情報的事實。

第一段，讓人立刻聯想起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崔月犁所撰那篇〈文革風雨磨練〉(回憶他秦城經歷)。在這篇文字裏，1949年初受組織指派，與張東蓀有相當密切往來的「同仁醫院李大夫」寫到1950年秋天的一個場面：

當時北京市委在德國使館。我當時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書，羅瑞卿兼北京公安局局長。有一次我們正在打枱球，羅瑞卿一拉我的胳膊：「老崔，張東蓀有個電台，他說是你讓他安的。」

「你去調查好了，調查是，就是我安的，調查不是，就不是我安的。」

我不知道張東蓀有電台，那跟美國人有關係。他一說是我給他安的，等於是共產黨讓他安的，為自己開脫罪責，可是卻把我牽扯進去了，我連知道都不知道。

他們把這件事提出來，又突擊審訊了兩次，六天六夜。[5]

這與朱文所說，應該是同一件事。那麼，到底有沒有這部電台？屬於何人？是否正在某個案件裏起着作用？對此，無論是羅瑞卿、崔月犁還是撰文的朱振才，都言之不詳——只不明不白地存在於北京市公安局的檔案中。

其實，「電台」於張家，是一個老故事了。

如果1941年「姑父林嘉通」用來「通內地的無線電台」[6]不算，這裏說的或許就是老三張宗熲那台了。那是他的法國老闆1949年底離



1946年在香山公園一小石橋上的合照。照片中人包括張宗炳夫婦(後排左一、左二)和兩個兒子張飴慈(六歲，前排左四)、張鶴慈(四歲，前排左二)；張宗燧(後排中間的男士)；斜坐橋欄之男士是王志奇。
餘下的是王志奇公司中的人員及眷屬

開北平的時候留下的——究竟做什麼用？誰都説不清。有人説不過一台普通收音機；有人説那東西沒人敢碰，一直埋在院子裏。一個篤定的事實是，在公安局前往查抄當口，張宗熲家的女傭人居然懸樑自盡了——無論父母還是兄嫂都弄不清怎麼回事，只知道目睹這一場面的孩子(老三的兒子繼慈，時年七歲)精神受到極大創傷。

生於1920年的張家老三，聰明機敏，處置事情卻常常出於情緒而非冷靜的權衡。1937年剛入燕京大學，就差點跟進佔北平的日本人拼命。做父親的覺得太危險，遂託潘光旦把他帶到昆明去讀聯大，並在那裏被吳文藻看中，跟着研究社會學。去昆明的路上，張宗熲結識了一個小美人兒，不到二十歲就結婚了。後來這張家老三也曾考上留美獎學金，只因為已經有了家小，就沒有去。但維持一個家不容易，幸虧人機靈外語又「來得」，畢業後回北平找了四份工，包括法國通訊社、開灤煤礦等。當婆母的張夫人認為「全怪他的老婆，總嫌他掙錢少」。從此家裏立了規矩：第一只許學自然科學；第二不許早結婚。

1949年法國人離開時，將原住所後椅子胡同一號的房子包括其中不便搬動的設施、狗等等都留給了他。所謂「電台」、「法國情報機關」等等，1949年10月間，已在一定範圍傳開。也就是説，阿三這事，已然嚴重地、政治性地、並且不顧事實地按到父親頭上。比如與張東蓀關係最親密的葉篤義已經嚇得失態：

> 當年春天，報上登出在他兒子張宗熲天津的家裏搜出美國遺留下來的電台，我當着羅隆基的面問他知不知道這個事情的內幕。他堅決否認同這件事情有任何關係。我當時引用了一句美國人在法庭作證時常用到話追問他。我説：「你敢賭咒你説的句句是實話，並且除了實話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嗎？」他當時回答説：「我敢。」我叫他在報上或者在盟的會上公開表示一下態度。他拒絕了。他這樣説：「反正共產黨是知道我的。至於盟裏的人懷疑不懷疑由他們去好了。」事後羅隆基對我説，我當時逼張東蓀太過分了。[7]

我們已經知道葉篤義這則晚年所述事實錯亂的程度，如並未登過報、電台不是美國人的，也根本不在天津等。葉之不問情由向長輩發威，席捲社會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已歷歷在目。張東蓀遂親自帶了兒子到公安部，直接見羅瑞卿。做父親的當天就回家了，張宗熲在那裏給留了一個星期。

沒有人知道這期間發生了什麼。後來，張宗熲給安置到天津，在文化用品採購站任文書，用英文寫一些出口產品說明等。每月工資區區幾十元，卻事事都要直接向市委一級的官員匯報。也有一說他被逼做了線人。但家裏人覺得這與他的精神狀態不合：線人怎麼會在採購站那種與重大社情不沾邊的地方工作？而且多年來一直那麼沉寂？六十年代初，陳毅向科學大會代表脱帽致歉，做學問的人鬆了一口氣。在北大任職的大哥（生物系教授張宗炳），曾動念把三弟調到北大英語系當講師，最後沒辦成。妹妹張宗燁還記得當年的情景：三哥那時不過三十多歲，從此換了個人，不常來北京，跟家裏幾乎斷了來往——與作為國家貴賓歸來的二哥無法相比。

現在回過頭來看朱文。在分析該文第二段之前，先對已知細節作一撮述：

1949年初，公安部門捉到過一個在北平四處走動、到過石家莊、自稱認識不少名人、跟蘇聯、美國有着特別關係的人。在他大量的交代裏，有一條後來被歸納為「張東蓀向司徒雷登出賣情報」。這人雖然隨後就給放了，但他的案子看來沒有結案歸檔、束之高閣，而是又給翻檢出來，推動了「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隨後「一年多的偵察」，結果「進一步證實了（王所供述的）張東蓀出賣情報的事實」。

為了什麼給翻檢出來？在什麼時候？

讓我們看朱文的第三段：

「1949年初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時，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如此案情重大，犯人怎麼說放就放？更遑論已經有證據捏在公安部門手裏的出賣情報的罪犯（張東蓀），還能參加新政協，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為此，著者傾向認為這裏的定性用語，屬於事後追加。這就是，1949年初，在

王正伯（王志奇）的供詞裏邊，確實有他認識或拜望過的「張東蓀」、「司徒雷登」等「交代」，但「出賣情報」一節，如果不是審案者後來有目的放進去的，恐怕就是朱振才撰寫這篇短文時候自己的創作了。

到1949年10月，「電台舉報」線索出現。朱文明確標出的是，電台的主人「正謀求和美國通報」——如此重大罪行，本應立即逮捕才是，但公安局沒有動。是不是羅瑞卿問了崔月犁、並且見過了張氏父子之後，覺得電台一節「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也就放過了？讀者注意，張東蓀此時在羅眼裏，還是經毛主席挑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好人」——直到又一新的「出賣情報」線索出現，即文中所說：1950年9月，「張東蓀為付梓出版數十萬字的反動手稿給某人的一封信」。

這就是說，「王正伯／張東蓀出賣情報案」自1949年初立案後，不結案、不實施逮捕，「電台」的事也放過，直等到1950年9月「第二件線索」（反動書稿）出現。難道一部書稿，就算「觀點反動，並對美國大加吹捧」，在公安人員眼中，比出賣情報還重？還不要說已經幹着出賣情報勾當，幹嗎要付梓出版反動書稿張揚暴露自己？

讓我們接着細讀朱文，看作者如何給出他的分析，以及案件的後續進展：

> 張東蓀在民國時期曾供職南京政府內政部任秘書，後任北京政府元老院秘書長。1934年任燕京大學教授、主任等職，與當時擔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關係甚密。鑒於張東蓀為和平解放北平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後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等職。
>
> 但張東蓀從來不是共產黨的真正朋友，卻喜歡西方的所謂的「文明」，他屈從於司徒雷登的壓力，竟不顧人格國格，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派人送到香港，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此案發生後，黨中央很重視，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這起案件。
>
> 本來，張東蓀罪行嚴重，證據確鑿，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

到懲處，但是，黨中央、毛主席沒有這麼辦，而是採取了一種全新的辦法，即對其教育，通過這起案件不但教育張東蓀本人，而且也教育其他人。尤其知識界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

精彩啊！

考慮到該文作者「自1970年代從部隊轉業到公安部門以來，一直從事黨史、公安史的徵集和研究工作，特別側重於對北京反間諜鬥爭史料的徵集和研究」，對於絕對看不到公安原始檔案、卻特別想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的我輩寫書人，怎麼能不將此文字斟句酌、認真考證呢？

先說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1949年初到1950年中），「情報」的買主（司徒雷登）與賣主（張東蓀）的身份處境。

按照朱文所說，在王犯交待出賣情報的1949年初，應是這名燕京大學教授從西柏坡回來，住在校園，偶爾也到城裏辦事、會友，包括多次與司徒雷登書信來往，並會見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的那段時間。

那段日子，我們知道，正是黃華給派到南京，司徒和傅涇波也正急切地與學校各方人物聯繫，希望促成老校長返北平「過生日」，謀求與新政權的領導人見面的幾個月。對於包括張東蓀在內的燕京（及民盟）一干人，與曾為舊友、上司，而眼下正在駐華大使任上的外交官的直接聯絡，無論決策中心西柏坡，還是處於外交與統戰前沿的周恩來，不僅清楚，還有意「倚重」，似乎沒有（也根本用不着）一個不通英文的王志奇側身其間。

或許有讀者說，這都是大面上的活動，你怎麼知道私底下沒有情報買賣交易？好，就算有，賣什麼呢？

據朱文披露，是「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派人送到香港，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司徒大使1949年8月歸國之後，正逢美國國內麥卡錫運動猖獗，他處境艱難，領取賴以存活大使薪酬之局面幾不

保。在對華關係上，早已不具任何影響力——這情形一直沒緩和過，直到他1962年去世。[8] 如果我們暫時不去計較處境已到如此地步的司徒前大使還要買情報，只說賣給他的「抗美援朝核心機密」：不知朱作家說的是金日成突破三八線（1950年6月），周恩來召開歷次會議（1950年7至8月），還是志願軍開過鴨綠江（1950年9月）。但這三個重大關頭，不僅張東蓀絕無消息來源，也都發生在將王逮捕（1949年初）乃至「經過一年多的偵察」之後——難道王志奇又跑回偵緝處作了補充供述？

著者在這裏特別提請讀者注意朱文（或者說公安局文件）下邊給出的這個十分重要的信息：

> 1950年9月，又發現張東蓀出賣情報的第二件線索（對美國大加吹捧的反動書稿）……這兩件線索反映了張東蓀與美國的關係可疑。

「數十萬字的反動手稿」，不知是張東蓀向出版社推薦的他人作品，還是就是他本人的。事實上，1949年至1950年，作為新政協籌備會議成員、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張東蓀不僅沒有時間撰寫數十萬字的書，對自己的作品能否出版，已完全不抱希望——除了兩篇發表在燕京校刊上關於佛學研究的舊作。估計這封「為付梓」而發出的關於「反動手稿」的信，寫於1948年或更早，只是到了1950年秋中美已成交戰國那凜凜的大氣候下，[9] 持稿人膽戰心驚地或自己上交，或遭他人揭發。

雖說「反動觀點」與「出賣情報」沒什麼相干，然而，在1950年秋，當「張東蓀」三個字突然出現於新的揭發中，一定讓辦案人員興奮不已。「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撿起舊案：王志奇的交待裏，書稿主人張東蓀直接聯着司徒雷登——這可是毛主席重點抨擊的敵人呀。

這裏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張東蓀」三字，在此時，即1949年秋到1950年秋，已經極不尋常地進入公安局的視野，否則不會有這樣的聯想——這我們在後邊要說到。

讓我們回過頭看看王志奇在這階段的行動。

沒等張東蓀、劉清揚等想辦法撈他，「美國間諜王正伯」不久又出獄了（估計此時是1949年夏），說決心從此專做買賣，隨後即在天津成立了一間進出口公司。

這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經公安、安全部門招攬，而最終成為其「朋友」的常態：突然被捕、突然獲釋、突然之間有了錢，並且經當局安排，毫不費事地註冊了便於和外界往來的公司。

張東蓀記得，1949年的一天，王從天津來，到張府拜望，說自己因為要作「特貨」，也就是禁運品進出口的買賣，又和美國發生了關係。他還告訴東蓀先生，自己常和公安局二處狄處長往來，而他的「特貨」，也是由經濟保衛局直接批准的。

「特貨」是一般人說做就做的嗎？他憑什麼拿到這種好處？但王也不是全在胡吹：「狄處長」狄飛是也；「公安局二處」指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偵查處（或預審處），當時的負責人正是馮基平、狄飛。至於「經濟保衛局」為了各種需要，特別是政治需要，為其「朋友」特批「特貨」，就算我們認為霍英東等人的發跡史過於遙遠，近年高瞻、陳文英等案件，都可引為此等手法的註腳。[10]

張記得，這以後，王跑北京的時間多了起來。1949年秋冬的一天，他對張東蓀說，美國已有佈置，決心打第三次大戰，麥克阿瑟總部已在那裏計劃。他還說，張過去的朋友包觀澄，還有孫連仲、張念清都去了。這件事，觸到張東蓀心上一直緊繃着的那根弦。據教授對二戰後局勢的分析，最怕的就是中國成為兩大陣營冷戰的犧牲品。但那時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世界已無交往，而準確分析局勢是要資訊的。張教授於是告訴王志奇，如有重大的消息，請他一定前來告知。

後來，王志奇一次次與憂心忡忡的教授見面，大談形勢，似乎大戰的前景更為緊迫：美國正在加緊準備，半年後隨時可以發動。不知道王志奇有多麼大的游說本事，總之聽他一說，使得中美斷交之後對自己祖國既灰心又擔心的張東蓀，對這人愈來愈信任，乃至覺得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從聊勝於無的角度——可以倚重。

也就在這前後，張將他帶到民盟總部見了張瀾（葉篤義在座）。

這時新中國已經宣告成立。

當時，張東蓀對王志奇已信賴至此，居然和他商量：能不能把「一個意見」傳達給美國，即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美國應該把蔣匪阻住，不要它進來，留着中國，且看將來。

那時候，王每次求見，張都答應。並一再問他，他的那個意見，究竟傳達過去沒有。王發誓都已經傳達了，但他不肯說傳達到了美國的哪家——國務院？還是別的機構。張東蓀居然也不深究。

只要讀過張東蓀的作品，沒有人會把這名苦學深思的哲學家歸到「弱智」一流。對他這時候明顯屬於弱智的表現，只能說，通往外界的大門砰地關上，對那些將資訊當作空氣、當作水一樣不可離之須臾的知識分子，如果不說給憋傻了，也真給逼急了。

接着，王志奇把話題轉到當時最為敏感，也是美國、中共和所謂民主人士正在較勁的「中間路線」，特別是「第三勢力」上。王主動問張，下一步會是個什麼局面呀？民主有沒有可能恢復？以及，比方說，民主人士裏，都有誰和他一樣想法呀？

真是句句打到張教授痛處。

張東蓀也真願意給他交底。他告訴王志奇，自己現在和他們很少談話，不過將來情形一變，共產黨是現實的，民主人士必有見重的地方，張接着拿出一個政協名單，把其中若干人用筆勾出。據當時負責整理資料，從而見過這張紙片的千家駒後來揭秘說，「有雙圈」、「有單圈」，說將來可以找他們談合作。[11]

這時，已經是1950年深秋。當上了委員、部長的民主人士們，已經咂摸出什麼叫「寄人籬下」、「有職無權」，什麼叫戴着腳鐐跳舞；不知究竟迫於什麼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其實已經進行了將近一年。而公安部門對他們的監督摸底，按照我們已然知道的共產黨行事準則，也一直沒有停止過。

有一次，他們談到國家建設發展，張告訴他：在國家預算的收入總數中，工商稅所佔不過百分之三十幾，你們商業還有前途（估計指的是王志奇與美國之間的商貿往來，但也可能是美國人直接到中國經商賺錢）。農業稅佔了百分之四十幾，可見國營企業還不行。對此，

王聽了以後還細問了兩次。張於是把收入總數與商、農兩筆收入轉成大略的小米斤數告訴了他。此外未提起其他項數字。

王志奇是不是在套他的話，張東蓀一點都沒有察覺麼？也並不是。可惜，第一，他太希望王志奇傳達出去的「意見」和信息有可能打動對方（美國）了；第二，儘管這些數字來自他參加的一些政府會議，但依照一般民主國家的標準，張教授並不覺得屬於國家機密。

何雨文在《中共財政解剖》中提到：

> 關於財政洩密：國家預算和決算，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本來民主制中的代議制，源出於限制徵稅。所以一般國家，把預、決算的權力放在民意機構。……薄一波的報告，公開了預、決算數字，但除了1953年還公佈了一個財政收支的數字外，此外就只有一、二個竭盡平衡或盈餘的百分比數字。此外我們就沒有見到公佈的決算。[12]

蕭濟容在《中共的財政收支》說：

> 必須着重指出，中共所公開發表的財政收入支出數字及百分比，絕非完全真確的。中共鐵幕深垂，普通小消息也動輒列為「國家機密」，絕不肯如民主國家一樣，坦然據實公佈，讓全國人民檢討。[13]

楊奎松的研究更告訴我們，當時中國的「經濟機密」，根本談不到所謂「為敵人所掌握」：

> 與此前的報告相比，情報局的這份報告開始高度關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的狀況。但情報局由於無法獲取重要的情報信息，因而其對經濟問題的分析同樣不可能很具體準確。經過了將近兩年時間，它對從1952年就已經開始實施的中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內容卻無從了解，它所知道的僅僅是五年計劃完成後，1957年國家經濟生產的總量將超過1952年的20%至25%。對幾乎有關中國經濟狀況及其到1957年計劃完成過程中可能遇到的

> 問題等等，報告都是憑藉這一極其粗略的數字推導和分析出來的。雖然其分析有一定的邏輯力量，並在總體上不失正確，但是，如同情報局此前的其他報告一樣，這時的報告在許多問題上還是含混其辭、模棱兩可的，它們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方面似乎還是起不到重要的參考作用。[14]

至於此時在王的身上、或者在他們談話的房子裏，有沒有公安特別放置的技術器材，則直到二十一世紀直接辦案人回憶錄發表，才有可能窺見一二。這我們到後邊還要具體說。

再回到王志奇的故事 。

在這前後，張申府突然收到王志奇一封信，說他因為欠款被押在法院，必須於若干日交出款項，才能放出。張東蓀立即叫長子張宗炳出面做保，王遂獲自由（北京市局在背後有沒有什麼動作？）。這時候，張東蓀已經有些不安，擔心王會以自己叫他轉達意見而要挾。

不久，王志奇前來致謝，還給張家送上四噸煤。剛剛獲釋，氣氛比較輕鬆，王說起他是天主教徒，雖然與輔仁並無關係，但還是希望輔仁大學保持私立，問張能不能從旁幫忙。當時張正打算從符定一之請，考慮掛名擔任輔仁大學的董事——且即將到教育部討論此事。送王出門的時候，教授忽見這個自稱與輔仁沒關係的人，坐的卻是該大學的汽車。張警覺起來。天主教、美國政府、情治系統——這裏邊有太多他們這般文人無能力把握的東西。張東蓀找到潘光旦，兩人商定，輔仁的事情不能管了。

輔仁大學的去留是當時教育部接管中最敏感的一樁，幾乎到了中共所謂「敵我矛盾」邊緣。這，從1950年教育部部長馬敘倫給政務院的報告即可見一斑。馬敘倫的報告指出，天主教駐北京私立輔仁大學代表將該校作為反動據點，6月策動反對我國教育政策事件；7月又提出五項要求，聲稱「不照辦將減少、停發經費」；到8月真的決定停發，並揚言將學校遷到菲律賓。9月，談判破裂，教育部建議對輔仁大學收回自辦。[15]

如果當時王志奇是奉公安局之命前來，看起來很像是打算再給張

多加一個罪名——「勾結反動的天主教會」。

1950年秋天，中國政府決定出兵朝鮮。張從會上得知，各黨派將於11月3日發表宣言，支持政府抗美援朝。2日晚上，他主動約見王志奇，勸他趕快離開北京，因為中美即將成為交戰國，沒有了私下傳達信息、交流意見的可能。張鼓勵他繼續在政治方面（而非情報方面）努力，設法使美國不把中國看作敵人。王志奇一點不緊張，他對東蓀說，在前幾個禮拜，他還曾派人到東北暗中查探有沒有這一軍事行動呢。臨別時，王還對張東蓀說，他將邀張申府同走。

此後一段時間王果然沒有露面。張夫人一次在東安市場遇到他家僕人，才知王家已經闔宅遷往香港。

這前後王志奇曾希望張替他找一個人，能在香港幫他翻譯文件。後來張將上海的朱高融——他當時正在求職，也想到香港看看——介紹給他。後來朱到北京，對張說，與王在上海見面之後，他就去了香港。到任後王不給他待遇，只叫他翻譯情報。他說他不願作這種下流工作，並且斷定王是一個到處騙錢的流氓。他告訴東蓀先生，因無法在香港另謀生活，所以回來了——這時應是1950年底了。

沒想到的是，1951年春，王又出現在北京。他說剛從香港來，住在張申府家裏，接洽某種貨品出口——也是得到黨的特許。張東蓀鬆了一口氣，以為他又專做買賣了。沒想到幾句話後，就開始探詢張對朝鮮戰爭的看法。似乎是，他仍有關係把民主人士的意見轉達到正想結束這場戰爭的美國。張東蓀此時對他已經有所警惕，覺得這人可能根本就是個騙子，只敷衍幾句，即催他快走——這是他們最後一面。

這次，王志奇是不是沒有走成就再次落入公安之手，從此沒再出來？兩個張家（張東蓀、張申府）都再沒有得到消息。著者傾向認為，他這次特地從香港回來登門打問朝鮮戰爭事，是帶有公安局的任務的。

這就是張東蓀「出賣情報案」全部「叛國罪行」了。[16]

本著者在這裏，就案情提出以下疑點：

「出賣」一節，全部通過「美國間諜」王志奇。王志奇做間諜，除了他自己的口供，辦案人(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負責人彭真，以及1978年進行複審的人員)有沒有掌握可以出具的證據，證明他已列入美方情報三大系統(國務院、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中任何一個部門之名冊上——哪怕其下屬或分支機構？

如果美方名冊因拼寫等技術原因有可能出現紕漏，從這三大機構已然解密的報告，包括美國、中國的專家對此段歷史的研究中，有沒有哪一條、哪一款，可以證明「張東蓀情報」已經經由王志奇做了轉交？

說張東蓀「出賣」，辦案人能否出具賣方獲得利益的證據？如果為不留痕跡而沒有保留證據，辦案人能否出示對賣者當時窘迫經濟狀況的分析，以給出「出賣行為」事出有因的旁證？

細究張東蓀對王志奇所說的「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民主人士裏誰、誰、誰將來必有見重的地方」、「國家預算收入和商、農所佔比例」，以及張得知「各黨派將於11月3日發宣言，支持抗美援朝」從而勸這個與交戰國有聯繫的朋友趕快離開北京，究竟哪一條超出了文人議政、親朋間交流時局信息的範圍而屬於叛國？況且到了此時，美軍已經越過三八線，佔領了平壤；志願軍已經過江，第一次戰役已經打過，還有什麼情報可出賣？

而所有這些，終生為國運焦心的張東蓀從來沒有打算隱瞞。與此相反，他最擔心的反倒是自己的意見或不能發表，或為決策者所忽視。不僅對自稱有能力「傳達意見」的王志奇，在新政權建立的前後幾年，他對公眾、對共產黨、對同儕(如羅隆基、梁漱溟)、對美國外交官(領事柯樂伯)，差不多說了同樣的話。[17]

這些觀點與活動，包括他與美國駐華大使及駐北平總領事的交往，共產黨(統戰部)知道得一清二楚——無論在挑選北平和平解放「解鈕人」的時候、在帶人到西柏坡面見毛主席的時候、在為政協挑選民盟正式代表，以及最後鄭重確定中央政府的委員的時候。怎麼到了1950年收到一封關於書稿的「反動信」，就決定立案偵查了？更為令人不解的是，這封至關重要的「反動信」，在1952年大會小會逼



張東蓀和家人五十年代中期攝於北京大學朗潤園家中。
前排左起：佑慈、鶴慈、爺爺、繼慈、凱慈、奶奶；
後排左起：宗燧夫婦、宗炳夫婦、飴慈、宗熚夫婦

他交待，以至最後民盟中央形成「處理文件」的時候，竟然都忘了提。

事實上，在1949年夏天和深秋，張東蓀等人與尚未從北平撤離的美國總領館，一直有處於當局掌控下的、無須隱瞞的接觸。僅引當時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報告：

7月17日，柯受邀請到張宗炳(Joseph，民盟成員)家。在座的有張東蓀、羅隆基、周鯨文。談了很多，很直率(對毛澤東和中共的認識；對馬歇爾使命的評價；對中美未來關係的考慮)。柯樂博認為此次會面毛澤東是事先知情的，並立即向華府報告。

司徒離南京返美遇到一些手續上的麻煩。柯樂博在此聚會上要求張向當局轉達。7月18日再向宗炳送備忘錄，宗炳說其父會轉達——柯就此向國務卿報告。

7月29日，司徒致電國務院：「今晨上海總領館被一些前海軍僱員所闖入，……我建議你盡快與張宗炳或他的父親聯繫，請求他將此肆無忌憚之事態向周或毛報告。」

11月23日和張東蓀見面時，他說原計劃之函件，已於「數天之前」送交周恩來。張沒有給我函件之文本。我告訴張目前(美國)對瀋陽之譴責以及表達我對他給與的幫助的讚賞。

11月23日和張東蓀進行交談過程中，張表達了對最近政治局勢的嚴重關注。我說看來目前經濟問題可能更為迫切，張同意近來經濟形勢之嚴重性，但回到政治方面時，他表示恐怕國際政治問題在某種情況下，會對中國的領導人構成沉重的國內問題。……他說最重要之問題是中國究竟是自己解決問題和處理事務，抑或僅僅聽從外面的指揮。

12月1日與張東蓀見面，他說他在11月30日的會議上見到周恩來。周告知已收到函件(瀋陽領館)，但沒有提及瀋陽事件。張仍未收到對該函件的回覆。張對瀋陽事件感興趣，認為問題的解決會有進展。[18]

這些公安機關一定清楚知道的事，在猛烈批判張東蓀的時候(大學和民盟)，也沒有人提。

最後，也是最有意思的：這樣一個重大的叛國案，竟是「根據他自己已經供認的材料」而「撮述」的。至於結案——大造聲勢的批判之後，是由民盟（而非法院或檢察院）的審查小組（而非專業人員）進行「審查」最後定奪。[19] 為公民量刑定罪的公、檢、法機關，居然自始至終沒露面——雖然審查小組中有一位現職司法部長。

審查小組第一成員章伯鈞一直隨着黨中央的部署行事，直到當了右派之後，才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這個事情一定非常複雜。我看民盟中央沒有一個人知道真相。」

第二成員羅隆基為此而叫屈：「不知道真相，可一直受他牽連」，

都說我和張東蓀是一個小集團的人，可是，他的叛國案子出來，連我都嚇了一跳。49年的他，還在游說傅作義放下武器，讓共產黨兵不血刃佔領紫禁城。到了50年底，他就樂意讓美國人收拾毛澤東？這從邏輯上就講不通嘛！他和我都不希望中共外交倒向蘇聯、去做斯大林的附庸。但我決不相信張東蓀為了這樣一個政治見解，就甘願充當什麼特務或間諜，儘管他和美國領事有些往來。我和他在一起經常議論國事，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戰，抗美援朝。看法有時一致，有時也不一致。難道這就是集團性質的秘密活動？什麼叫共和國的公民？毛公知道不知道？[20]

對於「共和國的公民」，自詡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公或許不屑於理論，但張東蓀「這個事情」，顯然沒人比他更清楚了。為講清他怎麼知道，先要說說背景。

從上邊的講述，我們已經清楚王志奇闔家遷到香港後，又於1951年春末在北京露了個面（住在張申府家[21]）——做生意的同時，繼續打探政壇大事。這時候，如果按照朱文，他的「間諜」罪名，經「一年多的偵察」（即1950年9月至1951年秋冬），已經得到「證實」。

從這時候到1952年2月的燕京大學批鬥三巨頭大會，大約有三四個月的時間。由工作組張世龍的回憶文章，我們知道，在那時候，「黨中央」已經通過北京市委和蔣南翔，向他們處於一線的共產黨員「通氣、透底」：

但真正的「新賬」，也就是真正批他的根據，卻是「向美帝國主義提供情報」。傳達他曾拜訪了還滯留在天津的美國駐津領事，向美方介紹了中央政府剛通過的國家預算案和外交政策的討論和抗美援朝的情報（因為張的英文口語不佳，故攜其子為譯員，後來又聽到不同版本的說法，這裏只記當時傳達，是否真情則不得而知）。但此事嚴格保密，不談出賣國家機密，只是組織學生「轟」了三次，「掛了起來」。[22]

也就是說，到這時候，「黨中央」已經定案，並做了批鬥部署，只是案情中要害的「叛國與出賣情報」，對外還須嚴格保密。

1952年4月，在懷着義憤的「民盟北京市支部、燕京大學區分部全體盟員」，已經奉命將檢討通不過的張東蓀上繳到民盟中央的時候，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等還不知「底」在哪裏。李維漢和徐冰或許已經知道，但對他們（包括對張東蓀本人），還堅持打太極拳。到揉搓、耍弄知識人的「思想改造運動」大獲全勝、運動接近尾聲、彭真正式向當道報告的時候，毛澤東才正式給出他的意見，就是那則有名的饒了周炳琳但不饒張東蓀的批示（4月21日）。注意此時毛的用語：張屬於「個別人」，雖然已經歸到「嚴重的敵特分子」一類，帽子還沒有正式按到他的頭上。

此批示之後，「學習思想檢討」運動推向對「敵」鬥爭的新階段。究竟什麼情況出現，使得毛澤東下了登上新台階的決心？

2007年，當時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之秘書邢俊生回憶錄發表，終於將重重帷幕撥開一角。邢在回憶了毛對徐副部長做過第一次批示後，不無驕傲地談到又有的一次：

毛主席給徐子榮的第二次批示也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抓階級鬥爭的時期，由公安部某局負責偵控的一個政治案件，通過採用技術手段，查獲了被偵察對象的一些可疑活動。因為該對象是個社會名人，須及時向中央報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進展情況公安部只報周總理和毛主席。上報材料不打印，由專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簽名後，以絕密件報周總

理辦公室。幾天後，原件退回，上面有毛主席親筆批示：「在如來佛手掌之中。」[23]

「只報周總理和毛主席」，正合朱振才文章〈張東蓀出賣情報案〉所說「黨中央很重視，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這起案件」。作者邢俊生沒有提那位「社會名人」的名字。但如此鄭重其事，圈子也就相當小了。讀者或許記得張東蓀在檢討中所敘述的與王志奇一次次交往，特別是1951年春他從香港再回北京，頻頻探詢張對朝鮮戰爭看法那次，或許「技術手段」此時已然登台？眼下知道的，處於類似「社會名人」檔次，而確實給裝了竊聽器的，是黃炎培家。但黃之失寵於毛，要到1953年秋冬的統購統銷之後。更何況，在1950年10月立案以前，並不見任何值得毛、周如此鄭重對待的社會名人膽敢與當局鬥法。

1952年6月6日，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一批處於前台，被黨派出去和資產階級「交朋友」的統戰幹部，在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究竟是否仍舊屬於『中間階級』」這一要害問題上，接受了毛澤東的「糾錯」——階級鬥爭升溫：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24]

周恩來也指出：

當着我們反對三大敵人的時候，說民族資產階級跟小資產階級是中間力量，那是恰當的，但是，現在不能再這樣說了。[25]

兩個月後，1952年8月，我們從上文已經知道，張東蓀在民盟總部做了第四次檢查。不敢不秉承統戰部旨意的盟領導，和燕京鬥爭會時候的張世龍一樣，須繼續維持「通不過」。張瀾不得不問個究竟了。他約上李維漢、徐冰，一同去見毛澤東。這回，毛說的是：

這樣的人，壞分子張東蓀，我們不能坐在一起開會了。

張瀾做最後努力，說：

東蓀先生的問題，還是從緩處理為是。

李維漢代毛澤東講出要害：

我們不能和這樣的壞人合作。他出賣了國家情報。[26]

讀者注意，張東蓀這時候還沒有在民盟的會上作「供認」，而結論已由李維漢給出。

想來張瀾大吃一驚之餘，一定又請李維漢做了具體說明。據張家家人回憶，就在炎炎夏日，在怎麼檢討都通不過的時候，一天，接到表老的電話，邀東蓀的夫人到頤和園一晤（本節開頭）。張宗燁記得母親回來之後家中陰雲密佈的氣氛。父親沒對家人說什麼，只開始準備新一輪的檢討。

張東蓀這時候已經相當清楚，批判等等都是面子上的事，不放過他的，就是毛本人。他想到了什麼——早年的學術論辯？西柏坡時候的「一面倒」？新政協籌備會議的缺席（執意不去東北）？抑或1949年9月30日的那次投票？但對別的人，包括親近的朋友和家人，他什麼都沒說。

梁漱溟說他本人「曾受張東蓀之託」，在9月間（即張在民盟總部做出第五次檢討，「交代」了與王志奇往來之後）與毛有一次談話：

臨末，在承認張已經犯了叛國罪的前提下，（梁）說自己對張「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毛回答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們作檢討的，且看他的檢討如何吧！」[27]

「秀才文人造反」——什麼意思？梁漱溟那時候無論如何想不到，不過十個月之後，在毛的口中，他自己已經被作了如此歸類，還扯上了我們的主人公：

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台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你究竟有沒有「骨氣」？如果你是一個有「骨氣」的人，那就把你的歷史，過去怎樣反共反人民，怎樣用筆桿子殺人，跟韓復榘、張東蓀、陳立夫、張群究竟是什麼關係，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們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沒有這麼多朋友。他們那樣高興你，罵我是「土匪」，稱你是先生！我就懷疑，你這個人是那一黨那一派！不僅我懷疑，還有許多人懷疑。[28]

張東蓀的檢討一直持續到12月底。民盟左右兩派聯手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了張東蓀的叛國罪，作出最後結論——張被開除盟籍。審查組建議「提請政府依法辦理」，未見下文。帷幕重重的歷史，只為後世留下了始作俑者（毛澤東）的定案結語：

辭職，既往不咎，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29]

從9月到12月，當年切磋學問、抗擊日寇、反對獨裁的老相識大家齊上陣，友情、自尊、容諒、揖讓……遙遠得像是另一個世界。張東蓀怎麼熬過的？1937年剛剛與共產黨聯手時候所著之文字，有沒有時時縈繞耳邊：

……所以我說獨裁國家不是人格者的集團，乃是奴隸的集團。因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只有獨裁的首腦是有獨立的人格，能自由發揮其意志，得運用自己的判斷，其餘一切人民只能奉令承旨，亦步亦趨，人云亦云而已。[30]

到最後，調整新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性格和生存狀態」的最後一顆重磅炸彈，必須由他們這批人曾經最心儀、最信賴，並且曾經共同戰鬥過的總理拋出。而在對「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作戰」這樣的大是大非中，周某人是不能不有自己明確的態度的。

1953年3月1日，在招待民革三中全會代表的時候，周恩來說起「民主黨派的工作」如何「同國家的中心任務相配合」。他特別提到「分清敵我」：

我們的敵人首先是美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不是孤立的，是同國內的敵人有聯繫的。我們不應麻痺，要互相提醒，以先覺覺後覺。……(此間插了些歷史上大家都曾麻痺上當的例子——著者按)公開的戰爭，志願軍在朝鮮打得很好；隱蔽的戰爭，要大家來打，不參加這個戰爭就不是愛國分子，不是革命黨員。

民盟出了個張東蓀，他在解放後還供給美國情報，這件事是不可饒恕的。任潮先生曾寫信給毛主席要求嚴辦，這是正氣。張東蓀在解放前與美、日、蔣、共四方面都有聯繫，有人說他是「押四寶」。

過去的事情以一九四九年為限，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就不追究了，以後仍在搞這些活動就不可饒恕了。說毛主席厚道，共產黨寬大，這是對好人、對能改過自新的人而言的，如果對敵人寬大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張東蓀事件應引起嚴重注意。[31]

毛澤東大獲全勝。

周在這裏沒有提起民盟中央在其《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裏鄭重放到第一位的「漢奸歷史」，特別強調「以1949年為限」。他當然要劃出這條「界限」。毛同意他如此劃「限」，也是對他所持態度的獎賞。

張東蓀與延安(1935)、長江局(1938)、北方局(1935–1941)、十八集團軍總部(1943)、南方局(1945–1946)、調處執行部(1946)、北平地下黨(1931–1949，不同時段不同部分)、老政協中共代表團(1946)、中共中央統戰部(1946–)、西柏坡中央局(1948)等等中共機構，直接聯絡、共同戰鬥凡十八年。一個受了十八年倚重與尊敬的人，有可能突然間「叛國」、「出賣情報」、「打算造反」麼？

但他必須是壞人。那麼，是個什麼樣的壞人呢？誰在這中間擔關係？

伴君如伴虎。難啊。掂來掂去，十八年間，只有一個1949年之後的王志奇，是跟大家都沒有瓜葛的。

非將張東蓀定為「美國間諜」(或別的什麼壞人)不可，還有一個

插曲，即「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批美籍間諜案」當中的「李克、李又安」(Allyn & Adele Ricketts) 案。

這對青年夫婦於1948年10月從美國來到北平，在燕京大學進修古代思想史與文學。1951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突然將他們逮捕，經過十多天鬥智鬥勇、軟硬兼施的突擊審訊，李克終於承認受美國情報部門的派遣，極力搜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政治、文化情報，而且還有一個特殊使命，那就是在中國國內尋找和培植「第三勢力」，妄圖待時機成熟後，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推下台；並特別交代了「北京一所大學的張教授，已經和我聯繫過，他自稱是『第三勢力』的代表。他原來是司徒雷登的密友」。[32]

這位「北京一所大學的張教授」，是朱作家筆下，這對「美國間諜」全部交代裏邊提到的唯一一個名字。其實這對夫妻當時交往的，遠不止張東蓀教授一人。作為渡洋求學的青年學子，他們雖然拿到一筆獎學金，仍須教教英文以補充生活不足——更何況有機會直接聆教於泰斗級文化人。二人於是周旋於北平/北京教授、文人圈。從後來周一良、錢鍾書等人的回憶文字裏，都能尋出這兩個青年與這批人的往來。對此，李克自己當時也一一「交代」了。只因為對突擊抓他的公安局而言，一時沒用，就一直睡在檔案裏，直到文革時候該整肅周一良「特務間諜」了，才再度由紅衛兵小將淘出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的是，在1951年夏天，在反覆訊問之下，在他已經供出的教授中，有了張東蓀——可以結案了。

有趣的是，羅瑞卿、彭真(也許還有周恩來和毛澤東本人)出於什麼考慮，竟未將機智的預審員好不容易「擠」出來的真正美國人的「間諜事實」，加進張東蓀案，也就是說，在燕大和民盟中央逼他檢討時，並沒佈置人將他向這裏引。不知因為實在說不過去，[33] 還是覺得有一個王志奇已經夠了。

更有趣的是，被突擊審訊了一週，接着又經歷了幾樁只有好萊塢電影裏才有的驚險(遭投毒、強姦，接着又都獲救)，這對傾慕中國文化的年輕夫妻被釋放之後，直到寫書、並再度回中國做生意，直到他們最後的日子，都把自己定位為欣然接受洗腦的典型，做夢都沒有

想到當局躊躇再三的本想由他們擔負、最後又放棄了的陷罪於張東蓀的打算。

東蓀先生本人呢？在盟內的檢討之外……

從張家親屬的述說裏，包括零星文章提及，似乎到了最後（民盟「幫助」階段），他先是給張瀾、沈鈞儒寫了信，[34] 最後終於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據葉篤義生前告訴著者）。這種寫於「黑雲壓城」政治氣氛中的東西，採信程度大大降低，但也不失為研究那個時代的珍貴證據。比如張東蓀對抗美援朝的總評價，雖然用的是自我批判的口吻，但幾乎已經透視當時的政治交易，並預見了幾十年之後的事態發展：

……正值朝鮮事情發生，我當時很荒謬，誤認為此事是北朝鮮先發動，並且推測是蘇聯事前同意的。我認為這樣做就把朝鮮給犧牲掉了，恐怕第二個犧牲者將要是中國（對美國必勝的估計）。我就焦急起來，這是資產階級狹小的民族觀點在我身上作祟。同時又因為我迷戀原子彈一類武器，以至害怕起來。

遺憾的是，這幾封信，都沒能在毛澤東研究、民盟中央的檔案夾、或者同時代人的回憶錄裏見到。但民盟中央、中共中央統戰部和中共中央檔案館一定有。我們等着普通研究者可以依法調閱的那一天。

關於此案，所能得到的最後的公開定案文字，除了徐子榮的秘書所憶「在如來佛手掌之中」，就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書，對「北京高等學校三反簡報的批語」所做的註解了：

張東蓀，原為燕京大學教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抗美援朝時，因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委員職務，但從寬處理，不逮捕法辦，並照發工資。隨後民盟中央決定開除他的盟籍。[35]

1978年，因為「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服過十年後獲得平反的張家二孫（張宗潁的長子張佑慈），在天津通過和平區人民法院，對張家三代一系列冤案錯案，包括祖父張東蓀的「叛國」案，向當局提出申述。

法院很快就收到了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的答覆（1979年1月4日）：

> 我部關於從寬處理張東蓀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對張東蓀問題的結論部分如下：
>
> > 張東蓀是特務分子，叛國罪證確鑿，罪行嚴重。但對他的問題，1951年中央已經作了處理，即「不予法律處分，養起來」，此後並未發現其有特務活動。他的兩本反動作品，沒有公開散佈，屬於思想反動。現張本人已死，為使其子孫後代免背政治包袱，建議仍照中央1951年原對他的處理，按人民內部矛盾，不給戴特務反革命帽子。以上意見，已經鄧副主席批示同意。

1951年！怎麼會是1951年？而且作出處理的，是「中央」——在中國，無人會誤會這是除了「中共中央」以外的別的「中央」。但此前，無論是張家，還是民盟，以至整個對張東蓀案關注的學術文化界（包括耄耋之年還著文言之鑿鑿的千家駒），都認為定性結論（至今唯一一份公諸於眾的結案文字）是在1952年12月由民盟中央作出的呀！

如果早在1951年就已經結案並處理了，燕大和民盟中央1952年一本正經地開鬥爭會、成立審查組、撤銷職務、開除盟籍、提請政府依法處置等等，又算什麼？是不是這個「罪證確鑿，罪行嚴重」的叛國案，「處理」權本在執政黨，但須髒別人的手、須由一個聽招呼的在野黨去頂杠，擔起製造這檔本來應提起公訴並且由法院宣判的叛國案？

1951年！難道「處理」之後可以不向當事人和他的家屬宣佈？

王志奇是在1951年春末再度回北京之後消失的，在1950年9月「又發現張東蓀出賣情報的第二件線索」之後的幾個月。這件1949年10月還在羅瑞卿手裏的「叛國」案，在什麼時候、出於什麼考慮，移

交到彭真手上了？一部早年的「反動書稿」，算不上什麼「第二件線索」吧，怎麼竟然驚動了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黨組書記，作為「重大敵情」直接向周、毛報告？這是不是我們前邊說的，張東蓀在那時候，已然先被看成「壞人」、「敵人」，彭真的政法委要做的，不過是為這個新名頭收集證據。

但——為什麼？也就是說，到底憑什麼，突然讓從毛到周到彭真到李維漢到羅瑞卿到徐子榮，一下子把這名與共產黨有着幾十年淵源，曾在一個個關鍵時刻為抗日的、反抗專制的、愛惜百姓的共產黨順利得到政權出過大力的哲學教授當壞人了？

不知道讀者還記不記得，我們在本書的開頭，曾經引用過的一名前中宣部幹部、後來在科學院尖端科學研究所負責黨的工作的何祚庥的那句話：「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敵人這麼快就鑽到這麼小的圈子裏邊來了。」

他們沒想到什麼？或者說，「敵人」究竟幹下了什麼冒天下之大不韙之大惡？用何同志的話說，那就是，居然在1949年，就「會有人投（毛主席）反對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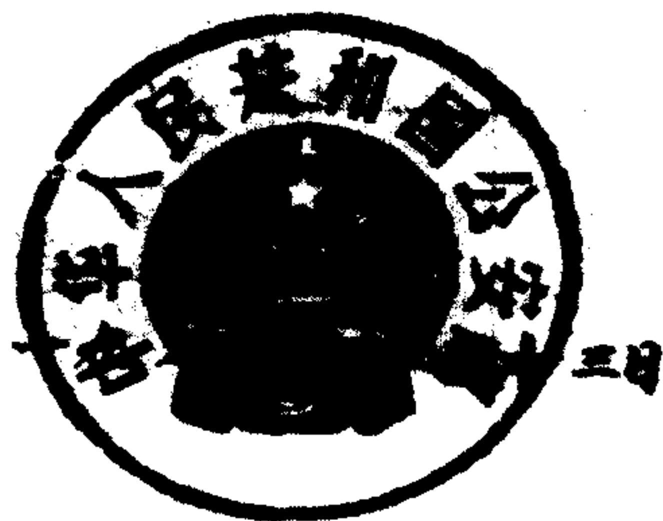
1982年，在全國上下掙脫「凡是」桎梏、反思歷史功過的大潮中，張東蓀長子、北京大學教授張宗炳直接致信鄧小平，歷數父親勞蹟，要求對他的一生做詳細的調查，給出一個公正的評定——不見答覆。他只好不停地致信白紙黑字地製造了這起案件的民盟大小領導，最後直接寫信給當時的公安部長。三年後，得到公安部回覆：

> 張宗炳同志：
>
> 你於今年九月寫給阮崇武部長的信已收悉。關於你父親張東蓀的問題，我們查閱了歷史檔案，作了認真地研究，認為公安部一九七八年十月進行復查後，[36] 決定仍維持一九五一年結論，即「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特務、反革命帽子」，是正確的。既尊重了歷史事實，又體現了黨的寬大政策，希望你能夠正確對待。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用箋

張宗炳同志：

你于今年九月写給阮崇武部長的信已收悉。关于你父親張東蓀的问题，我们查阅了历史档案，作了认真地研究，认為公安部一九七八年十月进行复查後，决定仍維持一九五一年結論，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特务、反革命帽子"，是正确的。既遵重了历史事实，又体现了党的寬大政策，希望你能夠正确对待。



公安部1985年就張東蓀的問題給張宗炳的回覆信

原來，1979年法院和統戰部答覆張佑慈的時候，用的是公安部的復查結論，不過沒有明確告知而已。

專政機關終於正式出面。

回覆中關鍵的是「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特務、反革命帽子」。如果說在1951年（或民盟中央定案的1952年），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尚未制定，權且如此定論；到公安部1978年「復查」和1985年「認真的研究」，審查對象究竟是不是「特務、反革命」，總該有法律依據（包括規定）了吧？

在這則答覆中，涉案公民應該享受的基本權利（比如知情權、名譽權、復議與上訴權、行政訴訟權等）都不見出示，只讓子女「正確對待」。正確對待什麼？對待一個從未向本人宣判過的「特務、反革命」案麼？對待給一個公民、一個家庭、幾代成員造成長達數十年的沒人說得清、也沒人敢問的政治案件麼？是不是到了今天，還要共和國公民不問條款、不問程序，只一味遵循專制古國馴民良臣的規矩——體恤上意？

讀者一定已經注意到公安部批覆的時間：1985年12月。這是「新中國」少有的開明時光，是當政的共產黨第一次對自己錯誤做有限反思、力主平反冤假錯案的年代，總書記胡耀邦並以此非同尋常地大得民心。不僅當年一同被逼着承認「美國特務」的陸志韋校長在三年前就獲得「徹底平反」，幾十年眾人噤若寒蟬的「汪偽奸細」潘漢年案，也在重新評價全部歷史案卷後於1982年見了天日——這可是毛、康昧着良心栽贓自己出生入死戰友最為駭人聽聞冤案！更不要說五十五萬右派，以及著名的三大黨內文化人（胡風、馮雪峰、丁玲），連時間更為久遠的王實味案，和涉及苦主不那麼赫赫的《武訓傳》案、俞平伯案、張志新案……，都有執掌大權的人在過問——出頭見天，指日可待。就連當初處置「張東蓀叛國案」的彭真、羅瑞卿、徐子榮、崔月犁、北京市公安局的馮基平、邢相生、狄飛、齊超……，以及民盟的諸位（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葉篤義），都已在政治上恢復了名譽。

張佑慈、張宗炳這時候怎麼能不寫信申訴呢[37]——向他們認為

有頭腦、有良知、有歷史見識的權勢人物？而中共中央統戰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答覆，不僅張家人萬難料到，就是費孝通、龔篤義和後來注意到張東蓀的學術地位、從而介紹他的觀念、研究他哲學的一代又一代學人，也弄不懂吧？

著者再次在這裏作出推測，就教於五十年代的定案人員、公安部1978年和1985年對原案作出復查和研究的人員、彭真和李維漢的傳記作者，以及就復查研究結果作出「維持原結論」的決策人（比方說，阮崇武前部長，鄧小平前軍委主席）。

在1985年那樣的大背景下，對一個從表面看、不過經大批判（燕京批鬥）哄起，靠一級準行政機關（民盟）審查，最後由毛澤東口頭定罪的案子，三十三年之後，在改革、平反與加強法制建設的熱潮中，經專業人員復查、鄧小平批准而依舊「維持原結論」，實在太特別了。那緣由，是不是只有一個，就是如今還在台上，並且努力維持毛澤東光輝形象的共產黨，特別不願提起這個案子。而以這樣的態度對待此案，並不是第一回，1957年就曾有過。當時，民盟正在大造革命聲勢，大殺「章羅聯盟」右派威風，面對強詞奪理、拒不認錯的羅隆基——

> 民盟中央吸取教訓，秣馬厲兵整十日。這其間於（1957年）8月28日下午三時，在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報告：（一）羅隆基交代與張東蓀的關係問題的這部分，因涉及張東蓀叛國案，《人民日報》未予發表。這是中共全面考慮問題，是正確的。……[38]

中共全面考慮的是什麼——哪怕犧牲批判的力度，也不要再提這案子？讀者切記這是在1957年和1985年。那時候，中共最討厭的國際特赦組織的名單裏並沒有張東蓀，世界銀行也不會以此在貸款上要挾。

那麼，究竟為什麼呢？

1949年9月30日開箱唱票之後，還有第二天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個一個地唸着五十六名中央政府委員的名字的時候，承受着全部光

榮的毛澤東心裏總像梗着一塊什麼東西：對投了自己一票，他是知道的。那麼，那唯一的反對票是誰投的呢——所有代表都經過精心挑選啊！就算這一票對他當選主席、對他接受獻祭、對他日後發動鎮反肅反、大躍進文革、包括清肅自己前戰友……都不會有任何影響，但是這麼大一個國家都拿下來了，這時候跳出來找彆扭……誰呢？他感到某種潛在的挑戰，感到專制者精神征服的不愜意、不圓滿——太想知道這人是誰了。

其實，在9月30日政協大會選舉之前，周恩來、林伯渠還曾發出〈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協黨組關於選舉問題的緊急通知〉，要求全體黨員代表負責保證選舉獲得成功，特別要保證投黨外人士的票。毛澤東特意提醒黨內：我們要有精神準備，即使有幾十票不選我們，也一點不要難過，不要表示不滿，而要看作是全體代表中真實情況的反映。[39]

真實情況幾小時後浮出：不是幾十票而是只有一票。他高興抑或不高興？

我們知道的是，到1999年，在何祚庥與其部下(張宗燁)私下談話之外，又一名前公安部辦公廳幹部寫出了自己和同志們對這一票的見識：

> 還有一件意外的事。會議最後，全體代表投票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我負責選舉全過程。在選出的監票人監督下，打開票箱計票，突然發現毛澤東少了一票。再反覆計算，仍然是少了一票。大出我們的意外，大家認為選舉毛澤東做新中國主席，不僅是全體代表，也是全國軍民眾望所歸，絕對一致的。缺一票，太不應該，太遺憾了。於是我去報告周恩來同志，並反映選舉工作人員意見，這一票可能是寫票人一時疏忽，可作為廢票處理。周恩來馬上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從容地說，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麼人，都有選不選毛澤東的權利，要尊重事實。這項表決結果就這樣記入史冊。它反映的不是缺一票的遺憾，而是反映了毛澤東尊重事實的態度。這是極其珍

貴的時刻，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不僅如釋重負，而且為之感動，留下了深刻的回憶。[40]

奇怪的是，怎麼周恩來和文章作者王仲方在當時都不認為可能是毛澤東沒有投自己的票？而毛從容地說的那番話，代表他的本意麼？對此作出回答，絕不是王仲方輩可望可及。更何況，那時候，他們做夢都想不到毛多年後，會借「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對自己有如此招供式的描述：「我是不看話劇的，因為我天天都在演話劇。」[41]

還有他那一套又一套生動、形象、令人難忘的台詞：

人人都犯錯誤，只有高崗除外。

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

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

毛澤東就是毛澤東，「原則」於他，總是隨着形勢、隨着對象、包括隨着他自己的心境，想怎麼變就怎麼變。對此，周恩來了解最透。否則，這則報給他的「少一票」本屬常識的事，還須馬上向毛澤東報告？

況且，就算毛1949年「十一」前後表現得不怎麼在意，一年後呢？美帝逞兇狂、資產階級翹尾巴[42]的1950年呢？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從所有可以收集到的資料，在這宗「叛國」案中，毛澤東從來沒親口說過「叛國」、「間諜」等有實質內容的定性之語——對王實味他還說過「叛徒、內奸、托派」——對張東蓀，他只說「壞人」、「再不要見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

毛澤東作惡不少。眼下世人所知，多數屬於秦始皇、張獻忠者流所造之大惡。如此狹隘刻毒、睚眥必報，非但不能令專制者增加威勢，只顯示其心理陰暗——還是不提也罷。

毛從來沒有服膺過誰，對他而言，不管你強盜、和尚、教授、戲子，對於只問「誰主沉浮」的強虜大梟，此時彼時、「有用」「沒用」而已。就算看上了什麼人，也極少慷慨施恩；而獲得點滴甘霖者，無不感激零涕。給一個人那麼大的恩惠（讀者還記得本書第一章第一節

「軍委來電」麼?),不肝腦塗地而反咬的,非張某捨其誰?捂不熱麼,那你就等着……(讀者在這裏或許記得毛澤東當年說「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彭德懷給他回信,説改成「唯我英勇紅軍」為好。此時距1959年廬山會議有二十多年呢!)但這事怎麼看怎麼有點下作。雖然出了氣,很容易讓人瞧不起。所以,在硬撐着共產法統的尷尬時代,事情幹過,人也滅了,頂好不要再提。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在1978年至1985年間,有一位當年直接插手者,不僅在世,還絕對不可無視地「在位」——彭真。是不是鄧辦、阮崇武等,或問到、或用不着問,就已經周到地顧及到了這一點。

但是,就算那些圍在毛的身邊,以窺探「當今」心思為自己終生職志的佞徒,能把檢過的不記名票再檢個遍,他們又怎麼知道這張不可饒恕的叛逆之票出自誰人之手?

讓我們試着想像當時的情景:

票箱開出來了,票數統計出來了,點票的人驚慌發現,五百多投票者裏有「誰」(僅一人)不擁戴毛——經上報,大家接受了「情況正常,不去管它」的處置。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仗還在打,土改、鎮反、肅反、工商業調整……毛多麼忙啊,但這個「誰」,有如芒刺,不時在他心上不輕不重地刺一下。

他觀察着他們,近臣、僚屬、馬屁客、得意的和失意的……五百多人哪!

1950年是否入朝作戰,那麼多老戰友不同意他。帶兵打仗、籌備糧草的也就罷了,竟然還有人想翻老賬:翻出已經成為過去的「一面倒」——梁漱溟、李維漢、周恩來當中的誰,還告訴他,東蓀先生意有所進言。他的不快加甚……他搜尋那根芒刺的範圍在縮小……

1950年,1951年,向他輸忠,多少機會啊,該有「態度」的都有了。他倒要看看這「打算進言的」有什麼要說。當年華北政府請他請不到;東北政協籌備會也不去;「和平解放」那麼大榮譽單給了他;一次次問他職務安排……幾個人攀得上?政府委員/政協委員雙待遇,他居然讓出去一個……好嘛。

估計就在這時候，他發下話——可能在談笑中，可能在會議上，也可能只有身邊人在場……，總之，一定是他本人而絕對不會是第二個人——讓同志們注意一下那個曾經跟咱們走得很近，但與美、蔣有太深淵源的燕京教授。他可能只淡淡地說，甚至笑着說，但跟了他幾十年的聽者什麼人？非要發文件才掂得出斤兩？羅瑞卿開始動作，讓他的手下「翻翻舊箱子底」；當然新線索也別放過。劃拉一陣之後，得到了張某在1949年初和一個混混的往來：那年秋天的電台就算沒掛上，到1950年9月，又來了一份「反動書稿」。不大夠份量。這人和美國北平領館往來頻繁，要不然像瀋陽領館案那樣來一下子？估計這主意一定為周恩來所堅決反對。那麼折衷一下，把曾經往他家裏跑的美國人李克抓起來？

羅瑞卿如何敬業、如何忠於毛，只要領袖發了話絕不問為什麼，望讀者參閱楊奎松關於鎮反的研究。羅的夫人郝治平1966年3月間（文革前羅突然遭拘捕的「三月會議」）曾說過一段話：「最讓瑞卿受不了的是說他反對毛主席……說得多麼刺耳，他還是聽，還是每天都去。而且堅持不能說的話就是不說。有一些公安方面的事情就更不能說了。」[43]——這樁「特務叛國」案屬不屬於她說的不能說的「公安方面的事情」？

問題是，那張選票的事，毛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麼告訴他們的。或許就在他得知「東蓀先生意有所進言」之後？

終其一生，關於這張選票，張東蓀沒說過一個字，無論對他的摯友、兒孫、他以沫相濡的老妻，以及在最後時刻到頤和園向他「交底」的「聖人」張瀾。他不說，因為投票，這是屬於他個人的神聖權利；他不說，是因為突然明白，原來這樣一件普通的事情裏，竟蘊含着毀滅性危險——他不想給他已經掙扎在生活邊緣的親人再增加無以抒解的驚懼；他不說，可能根本就沒有想到這一層：不就是投票麼，怎麼了？他自己還丟了幾十、上百張呢（張東蓀是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獲選委員中得票倒數第二者）。他是一個思維縝密但心地單純的學者，沒有能力揣度當了皇上的農民，對「冒犯」懷有的切齒之恨。

毛呢，他說不說？從白紙黑字的資料看，他也沒正式說。但

是，且慢，他不説，自有他的嘍囉替他説。不僅敘事性地説，還要上綱上線地説；不僅私下裏説，還要堂堂正正地、充滿階級感情地説；不僅小範圍説，還要讓同志們都知道，從此提高革命警惕，鞏固無産階級大好江山——這就是我們在本書開篇的時候提到的那個黨內傳達：從中央直到地方，直到支部書記，就黨和它的領袖所面臨的嚴重挑戰發出的層層告誡，同仇敵愾力剿那個劃了十惡不赦的「×」人（或者沒有劃「*」的人）。

我們知道，何祚庥對張宗燁談起，已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改革開放時代；他作為黨的基層幹部得到傳達，估計是在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報告）、匈牙利事件和八屆二中全會那段時間。[44] 想來正是在那樣的「大氣候」下，高瞻遠矚者作出決策，將反對毛主席這一「現行」（「那麼早，在那麼小的範圍內」）提供給同志們，以證明階級敵人就在身邊。

老共產黨員、中宣部優秀幹員、中國科學院和工程學院雙院士、反「偽科學」與「偽環保」的堅強鬥士何祚庥，就是這一毛式「大説」真心誠意的接受者和擁戴者。雖然對他頗能幹活的下屬（張宗燁）心存愛護，但對「這麼快就鑽到這麼小的圈子裏邊來」的敵人，絕不能有絲毫憐憫。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欲加之罪」已經成了層層權勢者常規殺具。李維漢在1957年夏天如何佈局，江青和葉群如何幫對方滅掉仇人，已經是大家熟知的史實。張東蓀案呢，滅掉他一個，大家就平安了麼？

1968年4月4日，葉篤義被投入秦城監獄，接受當時最高當局中央專案小組審查，凡四年四個月。最後結論十條，三條涉及司徒雷登，七條關聯張東蓀，包括：1938年同張東蓀一道去漢口，陰謀向蔣介石建議割讓東三省，承認滿洲國同日本媾和；1943年代表與王克敏早有勾結的張東蓀，到解放區同十八集團軍領導人簽訂「七七協定」；1946年由張東蓀介紹認識徐冰，將徐冰交給他的情報報告張東蓀和司徒雷登；1948年夥同張東蓀介紹彭澤湘給司徒雷登，陰謀搞「二李合作」，阻撓解放軍攻勢；1947至1948年，接受張東蓀按月接

濟；1949年與張東蓀一同見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伯；1951年得知張東蓀見過傅涇波派來接他老婆的朋友姓陶的，卻隱瞞未報（全部十條，均於1984年9月8日的中央統戰部致民盟中央的覆函中獲徹底平反）。

恐怕沒人認為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中央專案組，在文革期間會有調閱不到的資料。但在葉篤義間諜案中，少了一則重大定罪證據：王志奇。1952年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定罪的特務王志奇（「與美帝英帝都有聯繫、把國家重要機密供給美帝」），到審問葉篤義的時候，什麼都能硬編，連「姓陶的」、「劉進忠」（葉從未聽説）、「盧廣聲」（僅知他常到民盟閒談）都問到，唯獨這個與他曾有正式交往的王志奇（1945年王為《正報》社長，張、葉為撰述人），反倒一字不提。負責葉案（以及張東蓀案）的一撥又一撥「解放軍」提審人，不可能忽略這份最現成、也最扎眼的案卷。究竟是誰，又為了什麼阻攔他們使用？彭真、羅瑞卿當時已成階下囚。莫非周恩來、乃至毛親自過問的這一栽贓，已如封住的糞缸，再去翻它反添噁心？

諸位想知道進入「和平解放」了的五代國都，從雙清別墅移駕中南海之後，無產階級戰士毛澤東如何看待自己麼——在1950年五一節口號裏，本沒有「毛主席萬歲」，後來大家振臂高呼、而且從此高呼了幾十年的這句緊隨「大清皇帝萬歲 萬歲 萬萬歲」之後的諛詞，是他自己親手加上！[45]

也許有讀者會説，這張選票或許有，但未必出自張東蓀。毛，還有彭真、周恩來他們猜錯了。有可能。這樣，我們上邊講的故事，就是一個被錯疑了的人的慘烈經歷——這樣的人和事，在中共和蘇共歷史上，還少麼？

我們等着這一天：公安部1951年定案、1978年復查的卷宗對公眾開放。

張家從此再也沒有給當局寫信。張東蓀，與他的老友章伯鈞、羅隆基，還有主持《觀察》、發表他文章的儲安平等人一道，成了為維持毛澤東的偉大、光榮、正確的祭品。所幸共產黨已經不能一手

遮天——神壇不再，將祭品撤下，還原成活生生的、不肯馴順地匍匐在專制者腳底下的人的一天，已經到來。

至於王志奇，如果沒有毛澤東經手的張東蓀「叛國案」，這個小商人、小說客，以及公安小朋友，可能像其他成千上萬這類人一樣，早就給趕到國外，或發配到什麼地方去了。不幸牽涉到這樣重大的政治策劃中，估計只有庾死獄中一個結局了。

他可能到死都沒參透自己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扮演的角色。他的後人呢，他們在哪裏？

在一個繼承了《資治通鑒》、《三國》和《水滸》全部政治智慧，在一個以「大同」、「共產」、「民族復興」為招晃而誘騙理想者，在一個依靠強奪農民、工人、商人和職員的膏血而張起來的「如來佛手掌」裏，無人得以逃遁——可惜，這命題只彰顯於最終以「鬥戰勝佛」而修成正果的孫猴子身上。

專制者剿殺思想者獨立精神的戰役中，「如來佛手掌」或許沒那麼神力無邊，因為肉體可以蹂躪，精神與理念卻是無形的。對憲法、公民等等，毛公或許不屑一顧，但他難道忘記，在中華民族精神遺產中，還有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與富貴不淫……，更何況，隨技術進步，「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正逐日裏享受着現代社會的淘洗？

註釋

---

1. 許寶騤，1909年生，1932年燕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廣州、北京多所大學任教，「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發起人之一。1949年後任民革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7年至1966年，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負責審稿工作，後任《團結報》總編輯、社長等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第二、五屆全國政協委員。著者1995年就東蓀先生生平事蹟上門叩問的時候，除了一句「不同意君勱先生那樣寫呀」（指〈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當年叱吒風雲的許先生已不能思索。
2. 于長治：〈共和國的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四川黨史》，1999年第4期。

3. 自九十年代中、晚期以來，有關張東蓀的著述、生平研究時有出版，凡涉及主人公的「叛國案」，或言辭閃爍，或諱莫如深。這則短文，可看做半個世紀以來，有關「張東蓀案」信息提供最具體，描述也最為「板上釘釘」的一篇——而且出自內部專業人士之手。

4. 朱振才，河北景縣人。現供職於北京市公安局，從事黨史、公安史的徵集和研究工作，側重於對北京反間諜鬥爭史料的徵集和研究。1984年開始發表文章、紀實文學。《保密局等待的第215次發報》、《張蔭梧案件》、《一起驚動了李克農將軍的特務案》等引起關注。史料專題《北京解放初期的反間諜鬥爭》榮獲1994年北京市第二屆黨史徵研優秀成果二等獎。2003年擔任《北京技防工作室》一書的副主編，並親自撰寫了該書的重要篇章。《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是一本頗有影響的文集，共收錄二十一個案例，包括多年前（網上發表）舊作〈張東蓀出賣情報案〉。

5. 徐書麟主編：《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紀念文章》（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頁66。

6. 語出張鶴慈。林嘉通，1940年代燕京大學教務主任，張東蓀之甥婿，林巧稚之侄。那台無線電台，參見張東蓀：〈獄中生活簡記〉，《觀察》，1947年7月。

7.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83。

8. 司徒雷登1949年末應美國國務院所召，返回美國。隨行的還有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一家。司徒雷登當時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了，麥卡錫分子盯上了他。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凡是與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國家有過關係的人都受到監控和盤查，像有名的中國通費正清都受到圍攻。司徒雷登是從中國回去的大使，當然也不能例外。國務院中國處的人專門向司徒雷登傳口風：不要亂說話。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採訪。剛回美國後，採納了傅涇波的主意，沒有辭去大使職務。當時他們有兩個考慮，一是擔心美國派新的大使去台灣，給美中關係造成麻煩；二是從現實着想，不辭職就可繼續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一千多美元。但兩三年後，美國國務院還是從多方面施加影響，司徒雷登不得不辭職。辭職後就沒了薪水，美國的一家慈善性機構「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委員會」每月

給司徒雷登六百多美元的生活費。參見王如君：〈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環球時報》，2002年8月12日。

9. 1950年7月中旬，全國開展了以仇視、鄙視、蔑視美帝為主要內容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教育，同時組成東北邊防軍。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專題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10. 霍英東一直謙虛地表示：抗美援朝聯合國禁運期間作特貨，並不緣於政治覺悟特高，而是「一盤生意，一百萬貨品可獲利二十萬」。高瞻「2001年接受台灣間諜組織的任務，為其收集情報，犯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經美國和國際人權組織出面抗議，中國政府在宣判之後就把她驅逐出境。後來美國發現她在出售給中國的商品中含有禁售給中國的軍事物資，又反過來將她當作中國間諜抓起來。涉及雙重間諜案的美籍華人陳文英，曾於2005年12月就兩項罪名與聯邦檢方達成協議，獲判緩刑三年，另加一百個小時社區服務。

11.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86)，頁213。

12. 何雨文：《中共財政解剖》(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頁26。

13. 蕭濟容：《中共的財政收支》(香港：友聯出版社，1954)，頁8。

14. 楊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和預測〉，《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5. 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5。

16. 以上對張、王交往過程的敘述，全部來自張東蓀1952年9月至12月在民盟中央的擴大會議上所做的《第五次檢討》、《補充檢討》、《補充檢討再補充》、《補充檢討事實部分再補充交代一個事實》。民盟就此案的調查並定性，源於同一批資料。有興趣的研究者可前往調閱。

17. 張東蓀在民盟會議檢討：一、陳錦坤去延安的時候，曾有信給毛主席，希望對美態度緩和。二、我曾在《觀察》雜誌上發表數篇文章，指出我希望中共與美帝緩和的思想，目的是給美帝看的，使美帝不偏面援蔣。三、民盟約魏德邁談話後，又在南京民盟總部由羅、黃、章和我四人，邀他的隨員司布勞司來談。我們主張美帝使用壓力使蔣下野，使戰爭早停，恢復談判，並且希望美帝不與中共對立。四、我在重慶時候也曾將

這樣的緩和美帝與共產黨的、與民盟和中共的想法與小民盟的一些朋友談過。

18. 柯樂博致電國務卿，轉引自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頁168–175。
19. 審查小組由章伯鈞、羅隆基、史良、胡愈之、許廣平、曾昭掄、吳晗七同志組成。盟內右左兩派領袖人物張瀾和沈鈞儒未列名。他們審查唯一的依據是被整肅者的「口供」（或曰「檢討」）。同案犯王志奇的供詞既沒在會上，也沒在結論中提到。參見民盟中央「關於張東蓀叛國罪行的報告」。
20. 轉引自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333–334。
21. 就友朋間交往而言，王志奇與張申府、劉清揚的關係並不在張東蓀之下。但如此一樁間諜案，既沒有要求他們出面作證，對如何安置他們，也看不出任何直接影響（張申府到北京圖書館；劉清揚到全國政協）。
22. 張世龍：〈燕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紀實〉，載《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
23. 邢俊生：〈我給徐子榮當秘書〉（2007年11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網站（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93/1468478.html）。
24. 毛澤東：〈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是國內的主要矛盾〉，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65。
25.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6. 以上對話，見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香港：時代批評社，1959），頁232。
27. 李淵庭、閻秉華編：《梁漱溟年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206。
28. 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1953年9月1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07。
29. 周鯨文：《風暴十年》。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有一份薪水，隨時可以要車。結論一出，這兩項停了，仍享受教授待遇，直到反右運動。
30. 張東蓀：〈思想自由問題〉，《文哲月刊》，第1卷第10期，1937年。

31. 周恩來：〈民主黨派的工作要同國家的中心任務相配合〉，載《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頁242。
32. 朱振才：〈新中國「大牆」內的一對美國間諜〉，載《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頁162。
33. 這個案子也是只有口供而無旁證。間諜李克的派出機構、聯絡人、經費、情報去處……無一落實，案件的「成功破獲」，只有罪犯本人的「認罪態度」——那時節已經好到成了「紅色中國宣傳家」。和張東蓀案一樣，李克、李又安案件，在美國外交、情報部門公佈的檔案裏，至今未見令人信服的記載。
34. 同註11，頁214。
3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422。
36. 即上文1978年東蓀二孫（第三子張宗熲之子）在天津通過和平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述，轉到北京後，公安部的復查工作。最後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於1979年1月4日函覆天津和平區人民法院。
37. 張家孫輩張佑慈1979年申訴後，子輩張宗炳1985年2月直接就父親張東蓀案致信鄧小平。不見回覆。3月，他將原信轉致當時的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不見回覆。4月，再寫信給民盟秘書長高天（共產黨員）；月底再致信與父親有將近五十年交情的民盟副主席葉篤義。終於，到了6月底，一名名叫金若年的民盟中央工作人員，「到北大找了」盟員張宗炳，再次傳達統戰部給他的侄子的覆信，並強調「鄧副主席的批示」。本來在勸說下答應不再申訴的張宗炳，想想實在鬱憤難平，又在9月間直接致信公安部長，於是有了文中12月13日的回覆。
38.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頁349。
39. 郝在今：《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356–357。
40. 王仲方：〈我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
41. 1962年陳毅在廣州文藝工作會議上的傳達。
42. 望讀者注意笑蜀著作中對毛心目中「資產階級」的界定：經濟層面、思想層面與政治層面。此時最讓他不快、也最具挑戰性的，應是思想層面的資產階級。參見笑蜀：〈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

hk/wk_wzdetails.asp?id=141）。

43.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頁206。

44. 1956年11月，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認定，「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23。

45. 朱德秘書告訴李鋭。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CP出版社，2004），頁45。

三

囚人·思想者

大會鬥爭、小會批判、呼口號、流眼淚……終於留在了1952年。1953春天，黨覺得「虛」已經「務」得足夠，該「落實到組織上」了。

這年春天，民主人士們——他們對「如來佛掌心」這一概念還不大明細，但終於從「功臣心態」中覺醒，開始懂得什麼叫「夾起尾巴」——紛紛開會，向共產黨亮出自己的新姿態。共產黨則一一撫慰，指明前程。

周恩來對張東蓀案正式發表意見(「押四寶」)，就是在這年的3月1日。

總理講話是在民革做的，但民盟能沒有個「態度」麼？6月，民盟一屆七中全會(擴大)會議閉幕，主題就是對張東蓀的揭露和處理。雖然沈鈞儒在報告的時候，綱上得很嚇人，諸如「一貫仇視馬克思主義、仇視蘇聯、仇視共產黨的思想，出賣祖國、勾結帝國主義……，中國人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派在我們新中國的特務」等等，但最後落到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決議，倒也還注意到自己的權限：「開除盟籍，提請政府依法處理。」

「政府」是誰——公安部門還是檢察部門？宣判應由誰和通過怎樣的程序作出？而且，一個在野政黨(權且認為得到正式註冊)，有沒有權力和資格對自己成員的「叛國罪」(而非「叛盟行為」)作組織審查？審查之後，究竟應依照哪部法律的哪些條款，通過怎樣的程序予以舉報？所有這些，恐怕不僅當時的報告人、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

長沈鈞儒不知道，審查小組成員、司法部長史良也「懵嚓嚓」。或者說，他們什麼都清楚，[1] 但更清楚的，則是怎樣在共產黨手下行事說話。就當時和後來公開的文字證據，[2] 似乎是，對於這樁「叛國案」，到民盟的會議開完，主角張東蓀的盟籍被開除掉，廣大盟員受足了警戒與驚嚇，就沒人接茬兒了。「政府」不知該怎麼「依法處理」，只好按照毛主席「養起來」的指示執行——「叛國案」就這麼無人能知深淺、無人敢置一詞地放在那兒了。

燕京大學已然撤銷。北京大學全體和清華大學一部分，加上燕京的可留人馬，都集合到未名湖畔，合併成「新北大」。

他回到已經更了名的校園。

沒有片言隻字留下來，昭示張東蓀在此時，對自己這番「天上地下」的遭際，有過什麼樣的分析。不錯，1948年的時候，對這即將來臨的新紀元，他曾引莊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牟宗三對此的解說是：這確是一新時代，你們或者完全相信，或者完全不信。一點一滴的贊成與不贊成完全是無用的。不但無用，也象徵你完全不解。你不解這新紀元的全幅來歷與全幅內蘊。[3]

張東蓀應該知道，一句「不能坐在一起開會」所具的份量，但作出解說——「亦覺人生百可疑，堪憐唯識此幾希」了。[4]

他有沒有想過那張選票——可能根本沒有。除了魯迅所說的「光明心地對陰暗、卑劣無法揣測」——所有1949年後堂而皇之的政治運動，與毛得票575張看不出絲毫聯繫。況且，直到參加第一屆新政協的籌備會議，他對共產黨將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府，尚有比較樂觀的估計：

> 革命只有在變更政府現狀的那個短期內才是革命，過此即不能算革命，而應立刻即當走上建設之途，不復再是革命了。革命不能曠日持久的延續下來。[5]

而倡導民主、獲得擁戴，對已經取得成功的領袖，哪怕僅就個人素養而言，自應是民主社會的典範。也就是說，他與他們應具有：

自由討論的習慣，有肯與他人調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讓步的氣量，有據理力爭而不傷和氣的胸襟。[6]

當然那時候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向毛澤東要求「雅量」的場面還沒有發生。也許此後他才會想到，容忍治下草民(包括下屬)本屬於公民天然權利的「獨立判斷與自主意志」，對獨裁者而言，是怎樣的苛求。他還記得那回麼？一次毛請張瀾吃飯，張瀾事前問他們大家有什麼意見要他吃飯時向毛提。他說了關於大學改革以及工商業調整。過兩天，毛見到他，徑直問道：「表方那天提的意見，是你讓他提的吧？」(張飴慈述)他和表方哪裏知道，這時已不是1946年。毛肚子裏打的，已經完全是另外的主意。比如「加快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裏，而在我們手裏。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7]

燕東園34號早在鬥爭會之前即已調整給其他人，張家從那棟住了將近十年(日據時候被大兵佔據)的小樓，搬到校園內靠近未名湖的朗潤園178號。當時給出的理由是為「車」的緣故——那部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配給他的車須放在校園圍牆內。可發表於2008年的周啟博回憶[8]講得再明白不過，共產黨員、歷史系主任翦伯贊不僅一家一棟住在燕東園，他的專車曾在燕東園過橋時碾死另一位教授樊弘的外孫。1953年以後，張的車沒了，作為委員的一份薪俸也同時撤銷——未見任何程序，比如第一屆全國政協的哪次全會或常務會、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哪次會議做出正式的委員資格撤銷決議。

這是一棟朝南帶暖閣的中式平房，先是一家一棟，後來兩家合

住，鄰居是懂哲學的英文名師胡稼胎。五十年代初，趙蘿蕤博士（即前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女公子）被任命為燕大的西語系主任。她以為戰爭過去，國家安定，燕京將大發展，遂努力以她個人的關係與魅力網羅人才。1949年前後，與胡先生一同被她「挖來」的還有俞大絪，以及趙系主任在芝加哥大學時候的學弟、「不遠萬里」越洋而歸的巫寧坤。

當時，張爾田夫婦（孫輩們稱「大爺爺」、「大奶奶」）均已過世。東蓀長年來謹奉兄長為人處事風格，「寡嗜欲，自奉約而與人厚」，在燕東園，寄住在張家的親戚沒有斷過。但到了這時候，只剩下一位孫輩們的「姨婆」——東蓀夫人吳紹鴻之妹。

「姨婆」嫁到藍家（藍公武的兄弟）未久夫婿棄世。青年守寡的藍吳氏一直隨姐姐住。她正讀大學的獨子藍文謹（張宗燁的表哥）住在學校。那段日子，唯一一樁讓東蓀先生表現一點生之樂趣的，就是這青年的婚禮。他畢業並且成家了，喜事由藍家操辦。宗燁記得：

> 那次，我們全家都去了。特別記得爸爸說：「儘管我這個人現在是受批判的，還是要講幾句話。」1950年以來就這麼一次，他自己說想講幾句話。

課，當然不會再安排。東蓀先生有時候還到系裏走走，但也不過兩三次——想來場面相當尷尬。

他終於有了閉門讀書的時間。讀什麼呢？從後來的詩作裏，知道他那時候曾再讀《南華經》（「金風拂地已添寒，一卷南華到夜闌。」）。但專業研究，特別是追索西方哲學前沿進展的舊習難改。對此，我們的主人公頗覺痛苦（「久恨乏書堪供覽，倘逢舊友勸加餐。」《答謝戟門》）。與別的同樣處境的人不同的是，淡巴菰，與之相伴已經半個世紀的香煙，居然戒掉了——雖然顯得頗為失落、孤單：

> 憂患相依淡巴菰，一朝輕別亦何辜。
> 倘能健飯初堪償，況是幽居更覺孤。

留眼看雲猶昨日，迴腸盪氣失前吾。
海濱舊侶書來問，卻報詩思近漸無。

沒有報刊供瀏覽，他開始動手翻譯休謨的《人類理解力》，那首「人生可疑，識此幾希」的《浣溪沙》就寫於此時。

這本譯著未見出版，手稿也已不知去向。

一幅加框的字依舊掛在壁間。那是一通暫可稱作「橫聯」的信箋裱糊集合，是北平圍城解鈕一年之後，他的一批老朋友興奮感念之餘，專門寫給他的。第一封是鄧文如的《圍城四章並序》：

戊子之冬，幽都罹兵。城守二十萬人，攻者或三倍之。生靈百萬，不自意能全，將與宮室文物同燼矣。東蓀先生奭然傷之，徒步兩軍間剖陳利害，釋兵解大難。萬姓歡呼，出於意外。

東蓀儒者也。儒者濟物仁民其功偉矣。三十年來競言愛國愛民者，不能與之比量也。既許為文辭以稱美之，越歲成此詩。慚□荒率奈何？

常山東走氣縱橫，
渤海灣環擁舊京，
閱世□□知古樹，
有人留□夢春明。
千門尚聳凌霄闕，
萬户曾輝不夜城。
說着兵戈頻太息，
露盤多少淚珠瑩。

寸憂鼙鼓遍諸方，
一夕郊原赤幟張，
倦眼嫩舒唐社稷，
禦溝還繞漢宮牆。
道民淚共圍城□，
匹練光搖北斗長，

不道回天真有術，
春風拂面柳輕揚。

不識青鞋竹杖藜，
沖寒冒雪走東西，
軍中刁鬥容長揖，
席上瓊瑤勸短提。
一語解紛歡玉貌，
萬家賒死頌金泥。
輸□虎帳歸來日，
細與蒙莊論物齊。

老病常□九轉丹，
養生爭似有生難。
愁來紙筆妨人識，
亂後鶯花帶淚看。
大好心期聊□遠，
無多酒力勉加餐。
詩成已是隔年事，
回首驚魂總未安。

庚寅元宵節文如居士鄧之誠書於成府村居之五石齋（鄧之誠印）（文如）

第二封信出自時任燕京大學藝術史導師，名列「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詞寄《滿庭芳》，外加對當時情勢的描述：

萬姓生靈，五朝都會，千年文物風流。
重樓連榭，歌舞不知愁。
一旦風雲變色，覆巢下，完卵難留。
堪憐見，銅駝荊棘，灑淚對神州。

書生憑舌戰，折沖杯酒，慷慨陳謀。

頓日消霧瘴，浪散浮漚。
尚有東園桃李，春風待，還自歸休。
何須論，名山青史，一笑付陽秋。

日敵降後，瘡痍未復。蔣氏重為內戰，不惜民命，人所共憤，眾以違離，不旋踵一敗塗地，兵火迫於燕郊，兩軍角抵，玉碎堪虞。

東蓀先生倡議和平，乃冒險入城奔走斡旋，以為保全。予則追步驥尾，聊效贊襄議定。君更犯風雪、衝鋒鏑，以至薊東。杯酒之間，化霧瘴為光明。閭□無擾，萬姓騰歡。功既告竣，君乃歸去，重執教鞭，予亦埋首窗幾，更理舊業。書生之事，不過如此。從茲干戈永寧，車書混一，得為太平之民，何幸如之。南宋徐君寶妻，有滿庭芳詞，膾炙人口。因效其體為贈，惟哀樂迴異而工拙不同耳。

庚寅上元後二日 中州 張伯駒（叢碧）（張伯駒印）

對於自己當時的努力，叢碧自謙為「追步驥尾，聊效贊襄」；而大事過後，「君乃歸去，重執教鞭，予亦埋首窗幾，更理舊業」——多麼可敬可愛的書生本色。

此外還有林宰平的五言長歌，以及當代人已經相當陌生的西洋史專家傅嶽棻（《望海潮》著者，時年已逾耳順）；及齒序更長的國文系教授、中山公園董事長夏仁虎（1874–1963）及巢雲的詩、詞。橫聯的最後，是東蓀自己的補敘：

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厚同、侯少伯、彭岳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慄慄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誦。余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冊，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 東蓀自識

讀者或許記得「補敘」中開列出的四位，正是本書第一章第一節

「軍委來電」中提到的傅作義的老師和知交(劉厚同);李濟深代表(彭澤湘);以及平日散淡、有了大事卻不讓人後的侯少白和張伯駒。東蓀在這裏沒有提到其實也相當關鍵的何其鞏(克之),想來沒有把這位前市長看作是民間人物。符定一他也沒有提。箇中緣故只有留給國史家了。

後來,還有一詩記敘此事,但已是從朗潤園再遭驅趕,遷到校園外之後——而文如也已在嚴寒中遁世的1960年了:

追題文如圍城四章詩後

深感清詩記我狂,夢回猶自對蒼茫。
書生謀國直堪笑,總為初心誤魯陽。
月明猶見舊山河,搔首何堪問逝波。
我感微生君辱筆,人間熱淚已無多。

懸於牆上的另一幅是宗炳的朋友蔣兆和為東蓀先生作的水墨速寫(與他為司徒雷登作的那一幅在尺幅、筆法上逼肖,估計出於同一時期),上有梁秋水的題詞:

其清如梅,其瘦如鶴,
所操者堅,所學者博。
此書生之本色,
乃吾儕之表率。

這幅畫已於1966年焚於紅衛兵在當院點起的革命烈火中——我們在後面還會講到。

他有了足夠時間思索往事,評判自己的一生。平直的自傳難於落筆,從幼年時候即澱積於思緒中的詩詞工夫抬頭。獨宜老人《草間人語》——詞一百三十闋,詩七十首,就開始在這時候。用他完稿後的話説,就是「從1952年冬天開始寫(虛歲六十七),至1955年冬至(虛歲七十)完成」。

行年六十有七,始學為詩,繼而又勉為詞,乃竟忘老至,不自量

力，妄欲與詩伯詞宗抗手，亦良堪發謔也。三年間積稿，詞得一百三十闋，詩七十首，錄而存之，以詩附詞後，共二百首，顏曰草間人語，僅為自覽之便而已。今七十已屆，遂不復再作矣。雖不必如彊村所云理屈詞窮，然亦精力就衰，宜不再有所作也。

自題此集

搜玄闡理只虛陳，報國孤懷似溷茵。
一事謝天多難後，餘年猶許作詩人。

百年豪氣向誰傾，倒海空尊亦數擎。
厭世攀天無一可，但將詩境慰今生。

萬象繽紛默坐時，虛廊淡月耐長思。
人天戡破心何寄，餘□難除遣入詩。

本來萬物俱潛遷，煩惱只因道未堅。
寂寞料知千古笑，詩成卻作自家禪。

□□人間久已□，不鞏孤鏡亦陰陰。
殘年何恤逢奇事，甘把孤吟換陸沉。

用夷變夏各攀轅，我語天心不叩□。
世有烏台休再作，但留辛苦夢中痕。

寂寞千秋豈自哀，高歌神鬼莫須猜。
世間黃鵠蒼鷹事，不向詩中點筆來。

靜中天地自紛紜，身臥禪床眼透雲。
萬語蒼生今已贅，小詩留待後人焚。

讀者或許記得，民盟中央常委第四十一次會議「開除張東蓀盟籍，並提請政府依法處理」的決議在1952年10月底作出。也就是說，從鬥爭會回來沒多久，他就開始動筆，而第一首，不見自身命運之憤懣哀痛，竟是憶往昔之「三事歎」——歎洪憲廢、對德宣戰和對日作戰的關鍵時刻，未能把握國運轉折的機遇：

憶昔有三事，曾博亡友歎。俱言事倘成，當時糜後患。
不忍驟回思，徒使孱顏汗。胡為今述之，自傳補斷片。

「補斷片」，自傳已經有了麼？何時動筆的？有記載的，只在給龍榆生的信裏說：詩寫不好，只填詞。而詞，他自我評價，六十七歲開始學，只幾首得意之作：《八十自壽》、《夢辛棄疾》。張鶴慈清楚記得爺爺怎麼抄錄好鄭重送給他，並一一為他講解辛詞。

雖說「靜中天地」，尚有些人氣。

除了家人，對他「身份」的改變，對他實際所處「軟禁」狀態完全不去理會，從而走得最近的，是所謂一月一次進城下小館的「三人幫」：東蓀以外，一為原美國總領館翻譯，北平英文《時事日報》總編，後入燕京任新聞系教授的孫瑞芹；還有曾留學法、德的錢公武。早在三十年代上海時候，錢公武準備拿日本人的錢辦報。張東蓀知道後嚴誡不可，並替他還了錢，二人從此成至交。到了五十年代，不拘小節的錢公武，居然成了京城鳳毛麟角的獨行俠，絕不在乎當局的態度，照樣跟被黨「滅」了的一個個前名人往來。張家的人都記得，他怎麼從城裏風塵僕僕到燕園，傳播種種小道消息。

在1952年至1955年間，即《草間人語》成書前後，與東蓀詩詞和唱最多的，則屬老友、正無官一身輕地「隱居」北池子家中的何其鞏[9]。讀者一定記得1949年北平和平移交時候那次何府的「四人家宴」。正是在那天（1月2日），而非傅作義將張教授請到居仁堂的1月5日，決定了奠定大局的「第二次出城談判」。至於後來傅作義發帖宴請二十位文教界名流（徐悲鴻、許德珩等），是天津已經丟失、不和已無任何出路的1月16日下午；而何思源、康同璧等「北平市民和談代表團」出場（1月18日），已屬於大局已定之後政治家的「作秀」了。

令人難於索解的是，以何其鞏這樣出類拔萃的人物，加之與共產黨的合作中的屢建功勳，怎麼到了人民共和國，竟沒有任何安排——因為沒有安排，到如今幾乎沒有人知道了。僅有的述說出自何家後人之筆：

> 北平和平解放後，新政協籌備期間，齊燕銘（畢業於中國大學並在該校任教，時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主任——著者按）、史立德（畢業於中國大學，曾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著者按）曾向周總理彙報了何其鞏的工作情況及安排問題，沒想到總理了解的情況比他們還多。按照總理的要求，何其鞏書寫了「自述」，他在這篇三千餘字文篇的末尾寫道：「只求稍能裨益於人群，一息尚存、永矢不渝。」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觀；（此件）1950年4月10日「交周新民同志轉翔宇同志」，又按中央意見，寫「自傳」呈毛主席。1954年秋，齊燕銘和中央統戰部同志傳達總理意見，希望何其鞏參加第二屆政協工作。父親告訴齊燕銘自己已身患重病，不能出來工作了。1955年秋，父親因肝病不治在京病逝。[10]

時年五十六歲。而病逝前，家中竟然「不能舉火」——這裏邊埋藏着什麼隱秘呢？東蓀「和克之何其鞏寒食感事詩」（估計作於1953年初春）中說：

> 何郎奮筆詠春寒，夢入江南隔歲闌。
> 萬事悲歡身外過，一枰黑白局中觀。
> 放懷不作呵天語，緘口方能謀睡安。
> 他日西山結遊侶，相攜霜後看楓丹。

「不作呵天語 緘口謀睡安」，這就是連閒職都不予安排的要害了吧。

吟詩讀書，並不意味着晚年安度。當時，東蓀心裏最難過的一件事，是孩子們的事業受到的牽連。

雖然自己的國學學業，是在兄長的嚴格督責下完成的，張東蓀對

自己的孩子，則給以充分自主與自由。張宗燁告訴著者：

> 爸爸這個人，除了他的學問，還有和別人談論時政，別的事一概都可以不要。他平常很少理我們，但對我們很好。吃飯時候聊天兒，也是他的那些天兒，腦子裏一天到晚，就是那點東西。人是特別好說話：請小朋友到家裏來了，鬧得一塌糊塗，翻了天，吵得他不能睡覺，「你們玩吧。」他就走了。好脾氣，輕易不發火。從小長大，沒有對我發過一兩次火。但也很少引導子女。
>
> 他天天忙他的事，跟我們沒有太多的接觸。我們家比較自由開放，愛學什麼就學什麼，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沒有指導。上中學想多唸就多唸，唸完了想考什麼大學、什麼專業，爸爸從來不干預。婚姻也不管，自己決定。

1952至1953年，在這屈辱、困惑的一年裏，他的長子與次子、1938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昆蟲學博士的張宗炳，和同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統計物理博士的張宗燧，碰巧都與他在同一所大學。張宗炳是因為「師範生用不着生物學」而從北師大「合併」過來；張宗燧則還沒有給排斥到北師大去。

三十年代張東蓀受聘到燕京大學任教時，他的兩名處於少年期的兒子，一個十五歲，一個十四歲，因為在家庭教師的輔導下不停地跳級，此時不僅都從中學畢了業，還都通過了燕京的入學考試。到了北平西郊，在充滿浪漫情調的未名湖畔，這兩個個子還沒有長足的新生，沒少被女同學捉弄。宗燧很快轉學了——他非唸清華不可，因為清華是國立大學，是得到國家認定的最重要的高等學府。到1936年，已然獲碩士學位的兩兄弟，又同時考上每科全國只有一個名額的庚款留美名額：哥哥宗炳生物；弟弟宗燧天文。按照規定，習天文的學生必先到紫金山天文台實習。張宗燧去了半年就毅然放棄了(1936年美庚)：第一他不大喜歡天文學；第二他覺得，科學重鎮還是在歐洲。第二年，他再考庚款留英，這回拿到全國共有兩個名額的數學。

兩兄弟學成之後都是立即歸國報效。獲康乃爾大學昆蟲學系博士學位的張宗炳，1938至1941年在東吳大學任講師、教授。張宗燧則於劍橋畢業後去丹麥、瑞士等國，隨量子物理的創始人尼·玻爾工作。1940年春，他接受了中央大學之聘，回到戰時陪都重慶，任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1945年，抗戰勝利，應李約瑟推薦，張宗燧再次赴英，並在1946至1947一年間，在劍橋完成四篇高水準論文——年齡不過三十出頭。他知道自己的份量，提出在劍橋開課，獲得屆時任「魯卡辛(Lucasian)講學教授」狄拉克的支持，並安排講授場論——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登上劍橋講壇。

國家的寶貝啊——在那樣紛亂的年月！儘管政權歸屬尚不明朗，北大校長胡適[11]還是親自出面，安排這「難得的人才」回國任教——雖然故土正是戰火紛飛、民不聊生，張宗燧說回來就回來了，好像什麼都沒想。

1952年的思想教育運動，因為父親，也因為他們自己，這兩名冰雪聰明、滿腹最前沿科學知識，卻又簡單得連世俗人情都沒概念的青年教授(他們一個三十八歲，一個三十七歲)，都沒少「經受考驗」。

1951年，宗燧即成北大的批判重點。當時，大家都滿懷新生國家主人翁的驕傲，學習毛主席的論述「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對此，在普林斯頓和費城做過研究的宗燧有不同意見。在批判會上，他堅持稱美國的科學研究「很厲害」，「斷然不可能是紙老虎」。毛主席都作結論了，你還起什麼哄呀？在與會同事經黨指引一陣劈頭蓋臉批駁之後，張教授無奈地辯解：「非要說美帝是紙老虎，那起碼也是厚紙的」——全場哄然。更讓他不明白的是，在美國發表學術論文，為什麼就成了「不愛國」。他不斷地檢討，總不能過關。第二年，即被排擠到北京師範大學。

宗炳1951年從師大隨生物系調整到北大。和弟弟比，他其實隨和得多，在學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學而且性格開朗」的老師。但當時環境，據他的學生回憶：

我和所有的同學們一樣，都與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何

事？因為同學們都模糊地知道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有着複雜的政治背景，但具體的事情大家又說不清。他的父親張東蓀在那時被認為是出名的「反動政客」。……

我那時不關心政治，因此無心知道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只聽同學說，他曾向毛澤東提議，如果建設國家需要財務支援的話，他可以和美國接觸並洽談由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在那時節，真不理解他怎會如此想，而竟然荒唐地去向毛澤東如此建言。1952年年中燕京大學被撤銷，北京大學全校和清華大學的部分院系及燕京的原班人馬都在燕京的校址合併成為了「新北大」。一位高班同學帶着我到附近郊區走走，在校址西北側看到了一座孤零零的房舍，那位同學悄悄告訴我，張東蓀就被軟禁在那棟房舍裏。[12]

這其實是不確的，張東蓀並沒有過這樣的軟禁經歷。然而，從于宗瀚同學的敘述，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對中國社會予以重塑的偉力：連果敢率真的大學生都在無以名狀的壓力下變得畏畏縮縮。所幸，同情心還沒有完全泯滅，雖然只能深藏着：

我所知道的有關張師、其父、其弟的事情全是和要好同學們私下悄悄交談而獲悉的。在北京大學內部大家對所有有問題人物的事情都是避免公開談論的。為了撰寫此文，我問訊過在北大工作了數十年之久的老同學可否知道有關張家的更多的事情，回答是關於張家的事情幾十年來大家都不便於多問。[13]

燕京大學哲學系馬士沂（張東蓀的學生，留北大任教直到八十年代）屬於對該案前後了解比較多的人。他一直心存疑竇，認為「雖然證據確鑿，但張從未表示悔意與自責，反而理直氣壯宣稱自己愛國。莫非背後另有內幕？」據與林孟熹八十年代交談，他「深信這是一件內情複雜的冤案，終有大白之日」。

到1953年，新整頓好的共和國還有另一項「任務」：通過普選，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對此，周恩來曾對民革的代表解說道：

> 人民代表大會制屬於蘇維埃工農代表大會制的體系，完全不同於資產階級的議會制。議會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假民主，而人民代表大會，是經由人民選舉出來的，是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各黨派的成員怎樣才能被選為人民代表？……對民主黨派的要求，當然不能像對共產黨員那樣嚴格。……但原則是一致的，要選出肯為人民服務的人。只要真心為人民服務，民主黨派朋友是可以得到照顧和安排的。[14]

從第一屆普選開始，讀漢字的中國人須一步步明瞭何謂「為人民服務」，何謂黨的「照顧和安排」。

「養起來」的張東蓀已經失去了民盟的盟籍，「照顧和安排」本落不到他頭上，但當局和「革命群眾」(讀者一定記得前文，開鬥爭會的時候，「積極學生」怎麼接受組織部署)並沒有忘記他。據後來零星材料拼湊出來的場面，似乎是，政府須依法公告具有選舉權的居民(公民)名單，方式是由戶籍警按冊抄到彩色(一般是紅色)紙上張貼於牆。張東蓀在燕京校園已經住了二十多年，作為居民，自然紙上有名。這名字被「革命群眾」看到了——究竟是特別有心、特別覺悟高的「群眾」，還是接受了什麼人的部署，不詳。總之，發現了「張東蓀」三個字的幾位，大義凜然地向公安當局表達了不可與這樣的人並列為公民的憤怒。如果此情出現在1966年，他們一定自己上門極具戲劇效果地怒吼撕扯。但那時是1953年，未名湖學子表面上尚存斯文。我們只知道，那最後的結果是：被開除盟籍的張東蓀自己走到海淀法院，「交」出了自己的選舉和被選舉權。

所謂「交」，也總要走個過場。澳門哲學會會長岑慶棋記得：一天他遇一熟人(原燕大工會主席)，他告訴岑，1953年普選時，他路過海淀，見有一佈告，是關於撤消張東蓀公民權的公訴大會之類，發起人中竟有自己的名字！

當時作為代表，到海淀法院表達義憤的華海峰對張家後人說，他是院系調整以後到北大的，所以不了解什麼情況。他曾作為學生代表，按照組織的安排，為張東蓀的選舉權到法院走過一次形式。其

他的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不見法庭量刑定罪，公民權經「群眾反應」和隨後的「公訴大會」即予以剝奪，在現代法制社會似乎「匪夷所思」，但在無產階級鐵拳下，卻無人不「視為當然」——張東蓀本人似乎都沒有為此受到很大觸動。

之後呢？

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個學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他，只見他身穿陳舊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蒼老，低着頭混在人群中，像是怕被熟人認出的樣子。那學生不禁驚呼：愛國志士、學術泰斗竟潦倒至此。

1955年，張東蓀境況依舊——值得欣慰的是，被忘掉，也並非壞事。只看批胡風開場時，因為1948年「呼籲和平」，已從中共元老變成「叛徒」、七年不見文字發表的張申府，區區一個「北京圖書館研究員」，還須按照當局所定的腔調說話：〈必須嚴懲胡風這群萬惡劣徒〉。東蓀躲過了這一劫，免掉充當搖旗吶喊小丑的恥辱。

政治上的朋友一個都不來了。張宗燁觀察到：

> 藍公武絕對不敢來。私下其實他挺想和爸爸來往。凱慈記得奶奶對他說過，藍公武早就勸爺爺（估計1949年春北平剛剛解放的時候）：「已經登峰造極，什麼都別幹了，你弄不過共產黨！」

當時還「敢」跟他來往的，據家人記憶，第一屬朗潤園近鄰胡稼胎——住在同一棟房子的張、胡兩家近到什麼程度呢：共用正房客廳，連隔牆都沒有，只擺一排書櫃為分界。胡教授成了東蓀作詩、聊天，還一同在校園散散步的朋友（1–14 和稼胎用秋水詩韻）：

> 結鄰卻喜共詩書，同歎長安不易居。
> 未許耳談飛室外，幸能目笑在茶餘。
> 忘機何日心徒壯，毀馬今生願恐虛。
> 每苦宵吟翻擾睡，失靈文字喚何如。

此外還有北大醫務室的楊大夫。即使張家沒有「告病」，他也常

過來看看。晚輩學生也有人來。宗燁還記得父親的學生：吳允增(數理邏輯)、汪毅(可惜英年早逝)、沈有鼎(腦子裏只有哲學，蓄一部大鬍子，不洗澡，襪子破了不理會)。他的正宗同事，哲學系教授、外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洪謙，也不時過來「一起談談哲學」，並且一直到最後還來看望。

這前後，爾田先生忘年詞友、曾共同策反郝鵬舉的龍榆生，因為陳毅市長的關照，在上海終於得以「專心撰述」，來函告東蓀先生「將修訂舊輯宋詞選」。東蓀「閒中頗多雜想」，回了一封近二千字長信——以今日愛宋詞之讀者角度看，實不乏真知灼見：

1. 原書三百餘頁，即增至六百頁亦不為過多；
2. 每一人增加公曆紀元生卒年月；
3. 不必限於詞家，如岳武穆之《滿江紅》，王荊公之《桂枝香》似宜選入。二人非詞家而詞亦絕佳；
4. 女性作家之朱淑真宜選數闋；
5. 重刻時似詞之本文可用較大之字模，而註及其他皆用較小字；
6. 於比較最為初學者不易解之典，宜仿箋註東坡樂府之例，略加註釋，但不必過多；
7. 所選之詞仍可略加增益，如辛詞所選似偏於沉痛一路，他如「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爾」之曠達一路，似可再增一二闋。[15]

在這封信裏，東蓀還就「比興之說」，以辛詞《摸魚兒》「算只有」三句究竟指張浚還是秦檜，「請詳言之」。僅此，著者即對張家後人所說「大爺爺讀史，爺爺只對詩詞有興趣」存疑。當然，此情此景也可理解為，東蓀不大讀史，只因愛辛詞，有宋南渡前後一段，已是熟諳貫通。

他自己最喜歡的《喜讀蘇辛詞欲效之，不能得似萬一，賦四律自嘲》就寫於這前後：

獨宜吟

詞

浣溪沙 二闋

吊影空江一鶴過。無邊荒水去來波。月華入地奈寒何。　宿露殘風都是夢，醺餘閒雁亦當歌。不妨衣上酒痕多。

楢樹疏枝映晚霞。忍寒霜坐數[illegible][illegible]聲來何處似恆沙。　樵徑風雲迷遠岫，忽吹落葉打殘花。誰驅倦夢到天涯。

張東蓀詩詞手跡，這是沒有編進《草間人語》的「散篇及未定稿」中的一首詞《獨宜吟》中的《浣溪沙》二闋

蘇辛讀罷思如潮，搖斷吟鞭不自聊。
東去大江收眼底，幾番風雨臥終宵。
小舟滄海難為寄，卯酒騷魂或可招。
獨立愴神更懷古，白雲渺渺暮迢迢。

蒼茫百感集今朝，拍遍欄杆意未消。
缺月疏桐雲淡淡，野棠花落雨蕭蕭。
埋荒匣底千年劍，吹裂人間一尺簫。
太息共誰歌水調，暮煙衰柳自飄搖。

天高難問意難支，獨抱蘇辛自養癡。
風雨幾番人醉後，大江東去我何之。
腸中冰炭今方盡，夢裏茗柯老不知。
偏是吟來無限感，黃樓夜景最堪思。

浩蕩閒心枕上馳，乾坤縮入宋人詞。
杯邀明月知何夕，腸斷斜陽奈此時。
飛絮簾前春去早，亂山橫處鳥歸遲。
遙知千載沙汀上，總有孤鴻冷自持。

盟內的前戰友呢，還有人記得東蓀先生麼？據葉篤義回憶：

等到張東蓀勾結美國特務叛國事件揭露出來之後，大家都害怕了。羅隆基曾對我說：「張東蓀真不夠朋友了，瞞着人做那樣的事。幸虧李維漢保我過了關，不然我是跳進黃河洗不清了。」[16]

到九十年代後期，著者前往葉家問教。篤義先生的心情已經平靜了許多。他懷着無限感慨，全力扶助後輩學人弄清真相。雖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模糊記得的，已經全是後來栽到張東蓀頭上的「罪行」：

當時民盟的人，忽然發現張東蓀不見了，怎麼回事？後來見到他寫給毛主席的檢討。現在模糊記得的是：那時他和中共的

關係已不像當初那麼好，主要他反對「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所以關於中國決心抗美援朝一事，張是有意告訴王志奇的。

他還告訴王舊政協的人裏有哪些能影響。他並非一味親美，只覺得應「兩面倒」。為什麼要通過特務？那時和國外的一切來往都斷了。後來民盟將他開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了。那時候，共產黨臉一變，民主黨派都不敢說話。過了相當久（大約1954年），李濟深還找毛：「東蓀先生，可不可以請他參加一些會議？」毛回答：「他的情況不一樣，不處理他，就算寬大了。」[17]

當著者將留在張家後人手中《獨宜老人：草間人語》殘箋鋪開給他看的時候，這位他早年的親密助手相當吃驚：

完全不知他能詩，因為在此之前，從未見他寫詩或與人唱和。當然他的兄長是大詞家。

1956年，不知為什麼，哲學界突然熱鬧起來。所謂熱鬧，也不過開始「打死老虎」。好像是，山東大學哲學系接到指令，大學《學報》開始連續數期對「張東蓀的主觀唯心主義不可知論及其反動的階級本質進行揭露和批判」。[18] 上陣諸作者，後來均已成為學界重鎮。雖然當年戰鬥檄文，全部白紙黑字的留在母校正規期刊中，卻未見其中一人，將這些文字作為學術成果而收入自己文集中。

東蓀本愛詩，從青年時候起，與文友，包括兄長，都有唱和，但幾乎從不發表。五十年代後，郭沫若諸人的主題詩，如版面作料般日日見報——對此，他相當不以為然。但對毛澤東，則能以開闊心胸以詩論詩。《送瘟神》在報上發表後，對這個他認為不合格的政治領袖，東蓀對孫兒張飴慈說：「這才是詩！」

到了1956、1957年「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有文章說，《文匯報》復刊，自我定位為「高級知識分子的陣地」，華羅庚、向達、潘光旦、張東蓀、吳晗、費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裏的常客。[19] 其實不確。那些日子，用宗燁的話說，「全家特別老實」：媽媽一再發令「誰

都不要說話，什麼都不能說，一句都不許說」。

但並不是每家都能攤上一個吳紹鴻女士（奶奶）。在那段日子裏，風頭正健的《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曾來拜望。張鶴慈撰文說：

> 我記得，在我向爺爺報告了儲安平來我們家並且問候祖父以後，父親也興沖沖而來。當時談話主要在父親和祖母之間，祖父說得很少。
>
> 儲安平當年真是意氣風發，雖然他不可能有取共產黨而代之的想法，但想作為一個認真的反對黨和反對派，和共產黨分庭抗禮的想法肯定有。父親感慨說，自己身在北大，對北大的鳴放情況的了解，還不如儲安平。這位儲兄對每天北大大字報的數目都很清楚，而一些有份量、有見解的大字報，談起來如數家珍。當父親談到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時候，我記得祖父的回答是：人家已經談到了天下，下面還能再談嗎？
>
> 我當時感到吃驚，是因為爺爺剛剛不久前在和奶奶聊天時，談到黨天下，對儲安平是十分讚歎。幾年後，我才明白祖父為什麼會同時對黨天下，有兩種似乎相反的評價。
>
> 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記得祖父引用了兩句黃巢的菊花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
> 另一個是談到整風，談到不能相信毛澤東的話。後來，祖父也和我談起毛澤東之「不可信」。我寫在這裏，作為參考和補充。祖父說：看毛澤東絕對不能看他寫的。他是從來說話不算數的。看他的文章，會讓你覺得是那麼一回事。

到了1957年，他的兩名老友，向來冰炭不同器的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和羅隆基，在反右鬥爭的開場鑼鼓裏，成了「聯盟」兼「政權的頭號敵人」。那年7月上旬，章伯鈞從統戰部談話回家，對秘書說：「李維漢對我還是很客氣，當年對張東蓀可不是這樣。」按照「政治地位與公費享用掛鈎」原則，這兩位入閣不過五六年的前交通部長和森林部長，如毫毛一般給拔掉之後，過着怎麼樣的日子呢？章詒和在她的書裏說，章伯鈞是三級降到八級，住房、專車、《大參考》和全套司

機保姆保留，口腹供應上屬於「肉蛋」級別。羅隆基四級降到九級，上邊的那些都沒有了，口腹上屬於「糖豆」級。[20]張東蓀住北大教工宿舍，沒有額外享受，也就不必受這遭「主子」撥弄的屈辱了。

對張東蓀的敘述，應該說，部分確切——那是在反右之前。到政治形勢陡變之後，也就是說，北大已經不再由教育家，而要由無產階級政治家掌管的時候，張東蓀連做「北大教工」的資格都沒有了。據歷史系57級學生王曾瑜回憶：

> 大約是彭真嫌原來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領導反右不力，由陸平前來加強領導。加強的結果當然是在處理右派的階段，增劃了大量新右派。[21]江隆基在黨內挨了批判，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工作做得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謀害。鄧廣銘先生曾對我說，江隆基無論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陸平那樣不學無術。陸平指揮了批判馬校長後，就取而代之，正式當上北大校長。[22]

當時還在讀小學的張凱慈記得這次變故。家裏人（父親和祖父）輾轉聽到傳言：陸平到職之後即說，「咱們的大學裏怎麼能有（張東蓀）這樣的人？」這回，既用不着民盟出來擺樣子開會，也不用發動「革命群眾」抗議。一紙行政文書，張教授三十年教職說沒就沒了。他的「關係」被轉到北京市文史館——開始，僅僅是工資關係，人還能住在校園，但反右運動一結束，隨着將「反動學生、教師」徹底清出北大，他也不得在校園容身。遷到哪裏去呢？與朗潤園一牆之隔的北大東門外，有一處雜役人員居住區大城坊，張家給搬到三十七號。那是個標準的大雜院，住戶共用茅廁，水要從胡同裏提。凱慈記得張家當時只提了一個條件：要有自來水。後來北大行政在院子裏給裝了一個水龍頭。

院裏住有三、四家人。凱慈記得，東房是海淀供銷社老許；還有和丈夫老打架的姓金的；西房老呂家也是供銷社的。還有一個孤老太太。門外還有一排房，住着一個鞋匠。直到文革後鄰里紛爭，那鞋匠才亮出他高張家一等的身份：「你們別橫（讀作hèng），早就讓

我們看（讀作kān）着你們了。」（屬於街道治安）

分到他們名下的，有四間小北房。宗燁記得，房子「很老也很差，地上的磚都化成泥團了，東西搬過去都得長毛、爛掉。借着這機會，都處理掉了」。這是張東蓀夫婦最後的家。他在這裏住了十年，直到給抓進秦城監獄。張夫人則住了三十年——她一生最艱難的歲月。

所謂「處理掉」的，也就是書。難道除了書沒別的「資財」了？用東蓀自己的話：

著者沒有一畝田，一間屋，一張股票，所以常常對於論壇上的左派提出異議。[23]

宗燁說：

自我懂事，就從沒聽他們說過買房買地，那時已經在燕京了。

父親幾乎不用錢，發的工資全交給母親，他自己唯一的一點開銷，就是買點書，抽點煙——紙煙，普通的，但也不是最蹩腳的。我幾乎沒有見過爸爸花錢，煙也是媽媽給他買好了的。吃的東西，家裏知道他喜歡吃點清淡的，都是媽媽安排，穿的也是媽媽給他弄好，從裏到外。我們家是進來的工資，月月花光，沒有積蓄。這錢是絕對不夠買首飾古董的。家裏唯一的幾幅畫，都是祖父留下的。不過日子過得也不扣兒，我從小過得挺好，家裏請着保姆，還有一部人力車，爸爸坐車去上課。有時候下雪了，那車也到學校去接我。……還有廚子——燕京教授的那份錢，養這麼一個家是夠的。一般教授大概都是這樣的水平。[24]

日本人來了以後，家裏沒了收入。那時候靠賣東西貼着過日子——賣地錢換的美元，還有一點首飾什麼的。後來媽媽說，她本來不想動那點美元，打算以後分成四份給我們兄妹，後來差不多貼光了，一再說很對不起我們。我想幸虧沒有了，否



張東蓀六十年代初期攝於大城坊三十七號家中

則還不定說我們什麼呢。沒有了倒消停。量都不大，美元不過千把塊的樣子。

至於書籍，凱慈記得：

家裏的書是陸陸續續丟的。爺爺剛搬到大城坊的時候，我們家在中關園153號，從爺爺那裏搬來好多書，《諸子集成》、《全唐詩》等，都是成套成套的，我那時候沒事就翻《韓非子》。這些書一直到文化革命後才沒的。記得奶奶說過，大爺爺的書都是史書，爺爺不看。爺爺就看詩詞，所以都是全的。剩下的書大部分都送給北大了。全套哲學書賣給了社科院哲學所。奶奶說，爺爺的書，就這一套還算落個好下場。大爺爺的書最慘：全是線裝書，都爛了。[25]

宗燁記得：

> 爸爸的書確實是那次搬家沒了的。因為老早就想書怎麼處置——家裏情況愈來愈緊：一份份的錢沒有了（先是政府那份，後來北大）……書，我想起來了，是賣掉了，千把塊錢吧。

鶴慈也記得：

> 如果這批書沒有毀掉，每本扉頁上都有爺爺的章。會不會撕掉，或者加蓋上別的什麼？爺爺愛書，但不收版本。他也沒有那麼多錢做這個。我們一直不是一家過，養着很多親戚。搬到大城坊再也沒有了，就剩下爺爺奶奶他們倆了。

大約在1959年底或1960年剛過，忽有一人跑到大城坊三十七號，説文如先生請東蓀先生過去一趟，有話要説（現在尚未弄清這人是鄧先生的學生、晚輩、抑或鄰居）。那年，他們倆人，一位七十三，一位七十四。儘管從張家住着的大雜院到鄧家老宅（成府桑樹園蔣家胡同街北偏東那「古槐陰森」的院落）不過數百米，在捲着塵埃的北風中一步步挨過去，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如果再考慮到那年月糧食、副食品和取暖煤的定量供應……東蓀大意了，以為依舊不過談詩論文，回答説「待到春天，天氣暖和些」——沒想到竟……再也沒有機會。

鄧文如原籍江蘇，鄧廷楨曾孫。因為在四川出生，説的是一口儒雅成都官話。在年齡上，他其實還少東蓀一歲，但因同在史學界，與爾田反倒過從更密。[26] 三十年代初，他們三人一同受聘燕京大學，1941年同入虜獄（日軍當時放過了年已六十七歲的張爾田）。1945年復校後，又一同返回燕京。1952年院校調整（特別是運動）之後，作為燕大歷史系當家台柱，和極受學生愛戴的師長，六十五歲的鄧之誠「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深切關懷和照顧」，特准他冠名「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而全薪退休。聽到這一安排，有人立刻聯想到給他當學生還未必夠格的新任歷史系主任（翦伯贊）；有人則為他慶幸，覺得

這回「黨和人民政府」對他的「關懷和照顧」真是太慷慨了，他從此免了「以馬列主義」指導而到會上去背書的災難。

老友在冷徹骨髓的1月離世。東蓀作《揚州慢》紀之——

文如病逝後多日始知並聞無人往唁賦此哭之

絕筆詩成，登樓眼瞑，聞耗老淚頻彈。怕騎鯨□去，亦世外同寒。卻猶有青蠅吊客，未須含恨，寂寞人間。欲招魂，憐才孤憤，翻在無言。

憶曾唱和借飛箋，絮語纏綿。奈松崩鶴瘞，吟情已冷，獨倚霜天。有□言留耳，蒼茫裏，徵驗應難。共瘦燈昏影，遺篇重讀千番。

又《挽文如鄧之誠》一首：

翰海淒音一夕聞，
不留老眼看風雲。
預期巽語無緣聽，文如忽遣人來邀，余覆以春暖面談，而今已矣。
但許秋衾有夢溫。
史鑒亦將同寂寞，
詩壇誰與話繽紛。聞有清詩紀事稿待刊。
北江異地遺何憾，指洪君煨蓮
遁叟殘箋賴孰存。先兄遁庵有詩在文如處，聞有八十首之多，今不知落何人手
贈句蒼涼重識我，
刊書徵幸莫憐君。
閉門自飲西州恨，
已悟人生欠鼓盆。

其中「贈句蒼涼重識我」一句，指的是鄧的學生陳樹普在回憶文章[27]中說的那首贈東蓀的五言律詩：

明哲張夫子，竹林早預流。
玄談驚四座，讜論動諸侯。

老去名心澹，書成眾望收。

羨君雙鬢綠，愧我雪盈頭。

陳樹普說，鄧之誠「不求名利窮居獨處時以詩文相唱和」，但通過往事談論，了解到他少懷修齊治平之大志，壯遊四方，存濟世匡時之宏圖，而不能遂所願。又嫉惡如仇誓不為浼……。在他逝世前的那個嚴冬，切切帶話想見一面，文如先生要對東蓀先生說什麼呢？直到八十年代末，陳樹普在鄧之誠先生紀念會上發言，還不方便提「張東蓀」三字，只以「贈一位從事哲學的朋友張教授」代之。但他認為：

這雖屬贈友之作，但其中也隱約看出文如先生自己的意願和感慨。在先生示我以此詩時，我講「先生的詩很好，學生不敢讚一辭，但我感覺您不止是在講張先生，實際上可說是夫子自道也」。當時先生對此笑而未答，但我卻謬許自己可算是先生的一位知音。

也是在這年，不知通過什麼渠道，張東蓀知道雷震在台灣「出了事」。想到這位同學兼老友的遭際，對比自己，東蓀不免思緒聯翩。當時正讀高中的孫子鶴慈最愛往大城坊跑，做爺爺的遂拿出一把支架質地為黃銅、看上去已經很有年歲、但保養得相當精心的刮鬍刀。祖父告訴鶴慈，這是雷震送給他的，並講了1947年南京旅途混亂中丟了行李的故事。

在大城坊住定之後，1959年的時候，東蓀寫了一首《賀新郎》。詞前一段前言：

曩者曾有人兩度以北京大學校長向余游說，一在虜獄中，一則在石家莊旅居時。又一九五二年陳某欲余自白，以不得部長為憾，當時引為侮辱。嗣知人之自視與他人之相視，實有千里相隔，亦不足怪，但可一笑置之耳。偶然憶及，紀之以詞。

亦但捫方寸，算天涯誰知我者，莫須置問。

在世是非依勢轉，死後屢翻更紊。

已慣看劇場打諢，豈謂梟鸞從古判，只掉頭一嘯余何恨。
惟兩耳，欠全順。

故吾未益今吾損，任吹唇名牛名馬，自來無惱。
俗眼視人皆類己，安敢吠堯同論。
固不比佛頭着糞，本似□螟集虱睫，有浮思應向虛空隕。
題往事，亦隨泯。

看來對這樣的侮辱，實難「一笑置之耳」。雖痛覺「天涯誰知我」，對於他「只許學科學」(奶奶家訓)的晚輩，竟然什麼都不提。但這並非他的信條，因為他深信「歷史知識對於國民性之鑄成」之功效，事關重大：

不但一個民族總是要獎勵其後裔必須知道其以往的歷史，即一個家族總是要使其子孫能記得祖先的前言往行，這樣便把後世人們的性格加以陶冶了。[28]

然而，宗熚記得的是，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他只希望我們業務長進、生活安定，不願以自己的思想來影響我們——沒有讓我們讀他的書，也不提他與共產黨在思想體系上有什麼不同。似乎是隨我們跟共產黨走，他有不同意見是他自己的事。張飴慈也對著者說：「在家中，祖父從來不向我們灌輸他的思想。」

但目睹了反右、大躍進和大饑荒，還能眼睛一閉一心跟黨走麼？1962年，他的三孫，生於1943年的張鶴慈，開始與他的同齡朋友結社作詩[29]，並「叩問歷史」。他們拼命找書，生存活剝而後激揚文字，發掘離經叛道的精神資源：他們覺得1959年的廬山會議實在是豈有此理，曾經爬過達園的高牆，打算會會裏邊的彭大將軍……。對於身邊的爺爺，不知郭世英有沒有問過他的父親，但開始接觸《通向奴役之路》和《資本家宣言》的鶴慈，一再敦勸爺爺動筆寫下他所經歷的一切。

據張鶴慈告訴著者，祖父已經答應寫一部自傳體小說；動筆自撰家譜也是在這時候。孫子對社會現實的追問，是不是讓他想起了為

《東方雜誌》、為《甲寅》撰寫意氣風發之雄文的早年?但他依舊什麼也不說,只為這個聞雞起舞的愛孫起了表字:仲昂。據張鶴慈字仲昂從旁觀察,祖父的《自傳》已經動筆,起碼〈序〉已完成。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在《草間人語》結束後,再度拿起筆的1959至1960年。在他《試作六言詩·三首》中,有自註「近擬撰章回體說部名曰《夢遊野語》,以代自傳,故及之」。

或許就是這部《夢遊野語》?

他們記得,一本或自傳、或說部,公安部的人、錢公武和三叔都讀過。不知是他們之中的誰,拿走之後沒有還回來,或許抄家抄走了?但是,無論希望讀到這段歷史的人多麼迫切,靜坐在大雜院破爛屋簷下的「囚人」,卻是百感交集、難於下筆:

無端握管復凝思,正是荒雞喚夢時。
留得是非身後論,且屏辛苦眼前癡。
茫茫濁世歸何所,歷歷浮生只自知。
寫罷他年與誰看,一燈相對雨如絲。

不關積毀失心期,早識天涯路本歧。
自得自危因自述,無恩無怨更無奇。
今生飽領人間味,此世常存萬古疑。
擲筆廢然推牖望,琅華一月漸西移。(1–30)

1964年暮春,張東蓀曾有一封信給老友龍榆生[30]。從問安中,我們可以窺見他依舊難於平定的心緒(「否則竟日無事,未免有其乃親筆硯也」),以及日漸消耗的體力(「然已骨瘦如柴,攬鏡自驚矣」)。

榆生吾兄惠覽

久不得書,方正馳念,乃獲十七日手示,藉悉曾抱清恙,亦為之怏怏。心機硬化似不宜忽視,恐於腦力體力,皆有非宜。課事據弟所知,此間老教授多不授課,且有十之二三,終年養病在家,此實新社會之優點也。整錄積稿何如徐徐為之。如稍習



張東蓀六十年代初期與孫子張鶴慈攝於大城坊

氣功，目的不在治療，而在藉此靜坐以消永日，否則竟日無事，未免有其乃親筆硯也。弟亦自陰曆元旦，偶感寒疾，傷及胃腸，服藥累月，近始稍□，然已骨瘦如柴，攬鏡自驚矣。亦曾彙集舊作，奈每有檢閱，輙作改篡，改後亦不恰意，有時又復改回，如是迄無定稿，奈何奈何。好在他日存留與否，本非所計。近數年來，益感詩之難工，因是於詩獨少，即偶爾動興，亦只詞而已。錄數闋，為 公病中消遣之助，倘蒙刪正，固所願也。此請大安

東叩

二十二

6月3日，又有回憶舊時事的詞給龍榆生：「得讀新制，勉為步韻。聊藉舊事，且舒胸臆，亦遵來示勿尚雕琢之旨耳。(記倭氛，腥染遍幽燕，血喋雨花台……)。病仍未癒，家人告誡。以後不敢再擾公也。又及。」以後果然再無筆墨往來——而龍榆生兩年後的文革中心肌梗死發作離世。

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鬥爭，沒讓東蓀特別意外。對政客毛澤東的「八億人口，不鬥行麼？」「階級鬥爭，七、八年一次」——他早在二十年前已經有所論述：

> 永久鬥爭……就是無論如何必須立一個對象以引起內部人們之向外敵愾心，藉以團結內部、增加服從，便利指揮……。一個對象消滅後，不恤再尋另一個對象，總使永久在鬥爭中，庶可內部不致渙散。[31]

不覺間，1965年(乙未)到了。按照中國老規矩，到第二年(丙申)，他已屆八十。東蓀在這年作了一首《沁園春·預作明年八十自壽詞》，概述自己一生經歷，豎寫在一張橫格紙上：

> 彈指光陰，八旬將屆，愧此昂藏。
> 歎早年失怙，壯年遊學，晚年錮黨，幾度閱炎涼。
> 虜獄刑還，圍城勸解，應笑書生不自量。
> 休回首，似泥中曳尾，亦曰荒唐。
> 彷徨。更異尋常。問何事洪爐冶我狂。
> 喜今方拋卻，耗神理窟，早曾毀棄，憎命文章。
> 去日空過(平聲)，來朝且樂，有酒聊澆鐵石腸。
> 知衰矣，顧天留老眼，猶見和祥。
>
> 太沖道兄吟正 獨宜老人稿

「太沖道兄」至今未能確切查找出名姓。據張家孫輩模糊記憶，似是同遭驅趕而住在大城坊的一位北大教師。想來東蓀先生在他的新居所也有了可以談談的鄰居。

那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留眼猶見和祥——難道指六年後的美中和解？

就在一陣緊似一陣的文化整肅中，張東蓀怎麼也沒有想到，萬里之外，與他一別二十年的摯友，正殷切地惦念着他。張君勱〈東蓀先生八十壽序〉在美洲《展望》雜誌發表——受主到死都沒有見到：

……又其後，大陸淪陷，極權虐政，毒流人神。而余顛沛海外，皤然已老。既傷祖國，復念故人。緬懷昔遊，都如隔世。是為余與東蓀一散而不可復聚，將且人天永隔，長無見期，黯然喟歎之始。

嘗聞之北來友人，東蓀初曾以調停傅作義功，得為中共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乃不知何故，不旋踵亟解其教職，又不旋踵復撤其委員。今則軟禁寓中，並行動自由而亦喪失。酷已！《易》曰，「履虎尾，咥人凶」。東蓀固視自由民主過生命者，而乃獨欲周旋極權淫威之下斯冀或遂願生平，何殊與虎謀皮？幾何不與格羅彩受制於墨索里尼，愛因斯坦之見逐於希特勒同其命運耶？……

對於「視自由民主過生命者」，而「獨欲周旋極權淫威之下」，希冀理想實現——無疑張東蓀政治生涯的寫照。但在中國，不僅時時主導着統治者，且浸潤於全民心靈深處的集權乃至極權傳統，令他老友所遭受的挫折與磨難，實數倍於格羅彩、愛因斯坦。

文革開始了！

衝到大城坊抄家的，不下數回。一直沒有弄清楚究竟屬哪路人馬，一般的紅衛兵？哲學系學生？民盟或者文史館的小幹部？周圍胡同的孩子？

最先打上門來的，是要張家「交出電台」。這是當時最具刺激的推動力。可惜老三的事五十年代就有了結論；而親戚林嘉通那部收聽新華社消息的電台，早在當時查抄的日本兵進門之前，已經由林太太親手毀掉了。

消息很快傳來，沒等肆虐降臨，天津的老三夫婦——張宗潁和他的妻子呂乃樸——雙雙自盡，時年四十六歲。

北大抄家團的出動，已經比較有組織有綱領。因為，撲向本與「四舊」無緣之平民區大城坊的，是生物系63級的學生——顯然有人告訴他們，你們教授（張東蓀長子張宗炳）的老太爺，更值得一抄。

當時正在北大讀一年級的凱慈記得：

> 抄家是在66年6月。從我們物理系開始，先抄了黃昆、沈克綺（系副主任）的家。下午全校效仿，轟轟烈烈的大抄家開始。
>
> 那天，我家和我爺爺家同時被北大生物系63級的學生抄了個底兒朝天。家裏的書、畫、雜誌、故紙和其他東西撒滿一地。撕碎的紙有半尺厚；牆上的畫也全到了地上。
>
> 大城坊抄家時，我不在，是後來才去的。到底是大學生抄家，所以比起其他人要文明一點，只是把牆上的畫扯到地上，抽屜裏的東西全翻出來，由紅衛兵一一過目，分別處理。有價值的拿走，比如周總理的信；封、資、修的統統放到院子裏架起火來燒掉。書、畫、對聯、相冊全燒了，家裏的相片都是在那時候燒的。

飴慈當時也到過爺爺家。他說：

> 兇徒前來翻抄的時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動不動。罵他反共、反革命，他任憑他們罵去。唯當那些人開口罵他「漢奸」，八十一歲的老人，猛撲過去，用頭撞他們，要和他們拼命。

讀者一定記得，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親筆給東蓀回信。張家認為正常通信而已，並沒怎麼深藏。文革一起，和林彪當時送的皮袍子一道，奶奶立刻把它們全燒了。只有一封周恩來的親筆信，因為夾在一本書裏沒注意，被抄家的翻了出來帶走了。還有一張譚嗣同的簽名照片，也是這個命運。

他自己的手稿呢——自傳、詩詞、友人來函……都燒掉了。

圍城解鈕橫聯呢，鄧文如、張伯駒他們的信？

那回抄家只倒櫃沒翻箱。家裏有些東西，凡是放在舊式的衣箱裏的，就成了漏網之魚。也就是，外面的(書架上、書櫃裏、抽屜裏、牆上)都查了一遍，大概紅衛兵沒有書箱的概念——這幅橫聯沒掛在牆上，也沒有玻璃框，和其他一些對聯、畫放在一起，保存了下來。爺爺家1958年搬到大城坊時，因為地方小，處理了很多東西，有些東西就放到箱子裏存放在我們家。當時家裏有兩個書桌，不過沒我的份兒，所以我用這些箱子和一塊木板搭了一個小桌，上面全是我的物理書。抄家時，這些箱子也沒有動。後來又來抄過幾次，但箱子裏的東西還是沒動。

凱慈自己也不知道給他當書桌的老式箱子裏有什麼東西。

67年，我們家從中關園搬到七公寓。因為搬家，所有的封條都撕開了，直到68年1月再次查封。那次所有的東西都被封了，只給我母親留下一張床，一把椅子。1967年3月一打三反，母親也進了公安局，家就徹底被封了。7月，北大為了騰房子，把我們家所有的東西都放到北大的倉庫。而爺爺家，66年紅衛兵抄家之後，三間房之中的兩間也封了門。到68年，公安部來人的時候，重新開封，仔仔細細搜了一遍，臨走留下一句話：「沒有公安部的允許，任何人不得動。」就這樣，一直到1976年平反。

前兩、三次抄家破壞比較大。那天，燒的東西真不少，原來滿滿的抽屜差不多都空了。

在1966年和1967年的紅海洋和武鬥高潮裏，兩老人怎麼蜷縮在大城坊那一間平房(另外三間已查封)，沒有文字留下。

1968年1月，好幾個軍人，突然由戶籍警帶着來到大城坊。來人搜查了近兩個小時，抽屜裏的東西都扔到地下，牆壁上下左右敲個遍。不見任何法律手續，八十二歲的張東蓀給帶走了。那批人走後，家人突然發現一批他文革抄家後新寫的詩詞散篇夾在舊報紙裏沒給搜走——奶奶當天夜裏全給燒了。

依舊在北大任課的張宗炳，也在同一天從生物系直接帶走。那晚張飴慈和母親在家等父親回來吃飯，在大約七點多樣子，系裏負責人帶着兩名軍人還有學生，再次上門抄家。和抄大城坊一樣，所有東西都到了地上，一片狼藉。

至於張家在天津的另一個孫輩、「全讓奶奶給慣壞了的」三房長子張佑慈，也是在這一年（1968），因「為父報仇」，給抓了起來（判刑十五年。1978年獲平反）。

張家的人不知道，幾乎就在同時，1968年1月初，他從前的學生、助手、老搭擋，摘帽右派葉篤義，也正在民盟機關，受到「中央統戰部」的調查。來人最感興趣的是：

> 張東蓀1946年底到1947年初由北平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南京去見蔣介石，見了蔣介石之後又到美國大使館同司徒雷登談過一次話——談了些什麼？有沒有提到在北平同軍調部中共方面的人接頭的情況？有沒有談過徐冰？[32]

調查人就這幾個問題反覆追問，並說「如果其他單位的人來問這事，不要答覆，讓他們直接到中央專案小組去問」。——原來如此！

直到吳法憲回憶錄出版，對那個具有無上權威、動輒置人於生死的中央專案小組，世人才有粗略了解：

> 中央專案組具體工作人員和負責人，由軍委辦事組根據中央碰頭會的決定從軍隊選派，前後大約三次，一共約五百多人，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他們開會，講話，說明任務的重要性，佈置工作。周恩來每半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主持專案組全體工作人員會議，由每個專案組彙報工作，會議常常是從晚上八、九點鐘一直到第二天拂曉，每次會議都是如此。[33]

到2月底，審問的人裏，多了一個「解放軍」。到4月，在他們對調查的拉鋸戰也感到膩煩的時候，只逼葉篤義寫下：

> 我同司徒雷登是特務關係。

> 張東蓀是一個美國特務，我在解放前曾長期為他服務，因此我同張東蓀也是一種特務關係。

中央專案小組的人對葉篤義說：「張東蓀已經逮捕入獄，對你進行了揭發。從你同他的關係來看，他對你的揭發應當認為是有份量的。」

月底，葉篤義被正式逮捕，押到秦城監獄（當時已由軍隊接管，稱「衛戍區監獄」）。專案組放出其最常用手段，對他說，他的罪行主要在1938、1945年這一段時間，張東蓀關於這一點有大量的交代和揭發。「張東蓀今年八十多歲了，你還不到六十歲。你連張東蓀都不如。」「你不要抗拒交代來企圖為徐冰翻案了。徐冰自己都已經交代出來了。」

到了夏天，再追問特務經費。葉篤義「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不能不按照他們所要的全部予以招認」：

> 我同徐冰之間的特務關係是張東蓀介紹的：我把徐冰提供的情報轉報給司徒雷登和張東蓀，我們四人之間形成了一條特務線。張東蓀把我的政治身份告訴了徐冰，接頭後我和徐冰發生了特務關係。[34]

到此已經可以知道，有軍人參加的中央專案小組，鎖定的目標是徐冰[35]。至於徐冰之後還打算怎樣，要等辦案人員自己出來說話了。

著者在這裏忍不住請問同為中共的1951與1968年辦案人員：張東蓀既然已經有了直通中共中央統戰部（徐冰）、直通美國國務院（司徒雷登）的特務聯絡渠道，幹嗎要費勁巴拉地去找王志奇那樣的小人物？

秦城監獄當時關押的，幾乎全是中央專案組的犯人（調查對象）。秦城什麼地方？那是蘇聯援建的第157個項目，不具法律依據的政治鬥爭拘留所。[36] 哪怕關上十年二十年，也沒人知道自己的隔鄰難友是誰。張家父子和葉篤義三人分別關押。他們窮追不捨的那點子事，在1950年至1952年，只為讓「討嫌」的（偉大領袖常用語）張東蓀長長

見識，並沒有牽進張宗炳（雖然父親和「美帝」的每一次見面他都在場）。所以這回，張東蓀不知道、也絕對沒有想到，自己的長子也給關進來了。不僅關進來，逼供之下，這位聰慧、達觀、興趣廣泛、愛交朋友的昆蟲學家已經瘋了。

他同樣不知道的是，1969年6月底，監獄外的次子宗燧，因不堪凌辱，服用安眠藥自盡，終年五十四歲。晚輩同事陸啟鏗回憶：

>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紅衛兵莫明其妙地（我不知道什麼原因），把張宗燧揪出來，在身上掛上牌子（或者是戴高帽子，或者兩者兼有，我記不清楚了），在從前的計算所與數學所的大樓前面開了一個鬥爭會，然後由紅衛兵押送他在中關村遊街示眾。第二年的夏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見他穿了一件冬天的大衣也是上班去勞動（打掃衛生）。我很奇怪，我說「張先生，天氣那麼熱，為什麼還穿大衣？」他說「陸啟（鏗）啊陸啟（鏗），我快要死了！」我大吃一驚，正想問他「你得了什麼病如此嚴重？」但後面來了一些小孩，向他投擲小石頭，口裏還罵着難聽的話，有的石頭落在我身上。我趕快離開他。以後我上班總繞路而走，避免和他相遇以免受襲。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數學所造反派宣佈「張宗燧畏罪自殺」。我聽了後心情十分沉重。當我在聽到他對我講「快要死」的話時，應該意識到，他受到極大的人格污辱，為了人的尊嚴，已萌發一死的念頭，可是我為了躲避幾個小石頭的攻擊，不敢和他多談。他的話明顯有訣別的意思，如果我當時能和他多談一會兒，了解他的話的真實意思，並且加以勸導，比方說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之類的話，也許悲劇不致於發生……。[37]

痛苦自責的陸啟鏗想得簡單了。研究本是宗燧的命。王元院士曾回憶：張宗燧幾乎從一開始就挨鬥。討論到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時，他還提出不同看法：「工人階級也有不能領導的東西。」有人憤怒地質問他「什麼不能領導」，張宗燧答：「科學研究。」[38]

記錄了多年積累的研究筆記被抄走，而且丟了，張宗燧傷心欲絕，夜裏無法入睡，身體逐漸衰弱。無休止的鬥爭折磨，更使他難以忍耐。他被關在數學研究所「牛棚」裏的時候，他的學生還動手打他。他的慘叫，「像老牛的聲音一樣，十分可憐」——數學家熊慶來家的保姆說。

他服安眠藥的那天是週末。妻子包坤鐸下班回家，趕快把人送到合同醫院北醫三院。三院的領導說，要搶救須有科學院的領導批准。數學所將情況報到科學院院部；院部已歸「工宣隊」領導，沒有人。拖到下週一上班時間，人早已經死了。

家裏別的人呢？凱慈記得：

那年一打三反，母親奉命在大字報給「劉少奇」三個字上畫叉，不小心畫到「毛澤東」三個字上，成了「現行」，單位批鬥，還被「扭送」海淀公安局關押了一年。

家裏一個人都沒有了，正逢北大教師沒有宿舍，又開始攆。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因為武鬥繞着走，見一輛三輪車駛過。裝在車上的傢具……怎麼這麼眼熟？趕緊往家裏騎，原來有人正給我們「搬家」——怎麼搬？很簡單，不管什麼東西都從三樓往下扔，所有的書都下來了，塵土飛揚。……東西扔出來之後，往北大倉庫裏邊一放，就完了。出面執行搬家作業的，全都是「黑幫」：教授們、系主任們、支部書記們……。我趕緊跑到奶奶家，說那邊（即父母家）什麼都搬光了。所以後來他們（哥哥們）回來，包括母親放出來，都住到奶奶處。

1972年春天，張宗燁從湖北幹校回來。父親已不在——糧票布票留了四年。老人八十多歲了啊！給帶到哪裏去了？九十年代中期，在她的大哥家，宗燁對著者說：

我爸爸和他爸爸給抓去之後，一點消息沒有。不知上哪兒去了，不敢問，也沒處去問。全家一直在等，希望有朝一日誰能告訴我們人在哪兒。後來實在等不下去了：從1968年1月，好

幾年過去了啊……1972年初我回來，先是去衛戍區，說不知道。「九一三」之後，飴慈、凱慈陸續回北京，萌生追問下落的念頭。

飴慈記得：

一次次寫信，都如石沉大海，後來想到姑姑的一個同事認識一位叫方明謙的老中醫，據說常給中央領導看病，與葉帥相熟。於是以沒有工作單位的奶奶的名義，通過方醫生致信葉帥，問周總理地址，說有一封信給總理。葉辦告訴我們一個辦法：別寫國務院，就寄中南海西門，能直接送到。

在給總理的信裏，沒敢提祖父，只以母親的名義問兒子下落。總理不到一週就回信了，批准見面（在這年的12月）。文史館、北大、公安部三方面都來了人，接奶奶（吳紹鴻）與母親（劉拙如）二人先去公安部，再到秦城監獄。到了部裏，頭頭差不多全都出來了，說「以後可以隨時來探視，不要再給總理寫信啦」。想來周的批覆可能有很重的批評。

婆媳二人先到秦城，見到瘋了的宗炳——無論母親還是妻子，他都不認識了。東蓀已經不在那裏。車開回北京，經李震特批，說可以到復興醫院見祖父——屬於家屬探監。

張宗燁說：

第一次到復興醫院，是我和媽媽一起去的。當時父親在一個大病房，不是單間，但沒有別的人，床都空着。他正在打點滴，看到我們去，很激動。告訴我們，在那裏，他們照顧他照顧得很好。我們也告訴他「家裏最艱難的一段已經過去，我已經可以見外國人，[39]都沒事了」。

張家的人清楚記得那次奶奶回來之後的複述：

爺爺說「林彪出事了」。奶奶說「別瞎說，好好的」。「你不用騙我，我看得出來」。……他們還談到張申府、劉清揚……說起中

美建交，爺爺說「還是我對。」

宗燁記得那次父親一直和媽媽說話，沒怎麼和我們子女說。她清楚記得：

帶我們來的人說不能讓老太太在這裏呆着，怕她出事。媽媽不肯走，一定要留下來陪。最後經過商量，還是把媽媽送回家，讓我和張飴慈兩個人留下來照顧。可能他們當時已經覺得 父親到了病危階段了。但我們去的時候爸爸神志完全清醒，什麼話都能說。

這時是1973年3月。林彪墮機已一年多，中美《上海公報》也已發表一年——當局正密鑼緊鼓地籌備互設聯絡處。就在這年春夏之交，有人來到大城坊，東看看西看看，說「房裏怎麼這麼潮、地板都沒有」；還說「老人將來回來也不會住這兒了」。

到1973年6月，有關部門向總理辦公室打報告，總理於該月5日，對「張東蓀病危情況的簡報」做了批示：應盡力搶救。[40] 搶救的同時，家屬獲准探望。

張宗燁記得：

父親病重之後，北京市文史館一個姓孫的[41]，領着公安部的人到家裏來，說接到總理辦公室通知，接我們去醫院，我、媽媽、還有張飴慈。當時父親已經從復興醫院轉到北新橋第六醫院，一棟小樓，頂層，一道樓梯上去之後，通向一間間病房。走廊的另一頭堵着，站了兩個兵。這層住的全是秦城監獄的犯人。如果有人出來如廁，都要把別的病房的門從外邊鎖住。

張東蓀的病房裏，一直有一個年輕的穿軍裝的人。張宗燁清楚記得：

他一再跟我們說他們照顧父親很好，要吃什麼都滿足，每個星期給他洗澡，還配了新的眼鏡。聽他的意思，只要這次病好，沒有多久就可以回家了。他還說問題會很好地解決，也不

會讓你們再住在大城坊那個破地方了，要在城裏給你們安個家。他說：「話說到這個程度，你們就該清楚了。」還告訴我們，他「代表黨中央、公安部，有什麼要求儘管提出」。

我們知道那時候中美剛剛接觸，我們的理解也就到那裏：是不是希望爸爸在對美國的交往上作點什麼事情？不懂。也不敢問。他說我們就聽着。

這些話都是當着爸爸說的。看他的表情，都呼應，也覺得他們對他好，自己快要回家了。

前前後後大約也就呆了三四天。

第二天就換了一個單獨病房，旁邊專門支了一張床：我們陪着的人可以在那裏吃、住，不舒服還有藥。但到了第二天爸爸就昏迷不醒了。大哥的事他不知道。我們沒有告訴他二哥去世的事，也沒說三哥。

張飴慈說：

爺爺對奶奶說：「對不起。」奶奶說，「一輩子也沒聽他說過這句話。」知道自己時辰快到了，他對奶奶說：「我死不了。」

奶奶回來大哭，簡直崩潰了——因為能見面挑起了希望，現在希望一下子又沒了。回來之後，她一個人到頤和園坐着，覺得從來沒有過的孤單。但是想到爺爺最後總算和家人見了一面，也是一個安慰。

就在這前後，已經在團河農場「勞教」了十多年的張鶴慈，突然宣佈「解除」——意味着可以探親了。他趕着辦手續，回到了北京，祖孫二人在第六醫院見面。望着炯炯眼神依舊，卻已瘦成一把骨頭的愛孫，東蓀只說了一句：「健健[42]你受苦了……」

張鶴慈還聽見他和奶奶說「回家要和阿三算賬」。他不知道幼子夫妻已然仙去，腦子裏存着的還是審訊員對他的誘、詐。

張家人心頭憂憤無以紓解：人都到了這份兒上，到底為什麼給抓進去，竟然一無所知。他們再託方醫生找葉辦，問1968年進監獄到

底為什麼。方醫生轉告了自己子女也都無由入監的老帥的回答：「同情，但無能為力。」

張東蓀的病勢一天天沉重。張宗燁記得：

> 迷糊的時候就叫媽媽。我告訴他：「媽媽累了，回去了。我和康康留下來陪你也一樣。」
>
> 爸爸和媽媽感情特別好，相愛終生。媽媽沒進過學校，只粗通文字，一生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務。爸爸很願意和媽媽談天，什麼都和她談。在那樣的年代裏，我之所以老是「和家裏劃不清界限」，就因為非常愛媽媽。

他對她說，「還是我對」——指的什麼？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剛剛解決，中國即將從扼悶、匱乏的鐵幕之下走向開放世界。所有的人都認為，「我對」指的是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絕對不能「一邊倒」；但有誰知道，在這「我對」之中，說的不是投票者對共和國首腦的選擇？1949年，那人正「如日中天」，而他自己也正當着「上賓」。他覺得名實不符，行使自己的權利，不肯再擁戴這人。

「還是我對」，這是他最後說的。其實早在1915年，在他剛屆而立、剛做父親的時候，就明確宣稱：

> 吾平生所最深惡而痛絕者，莫過於惡質而居美名，則其惡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見，乃為其所欺也。[43]

崇尚自由主義的張東蓀，最不樂意的，就是「為人所欺」——不管什麼人，不管如何欺。

張東蓀對了。以他的哲理、以他的深思、以他遍閱大小政客的經驗，他在明知沒有實際效用的時候，選擇反對毛澤東。他的行為不可能為自己帶來絲毫實利，唯有的，是對精神獨立與民主原則的維護。

>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44]

離世的一瞬，東蓀口中頻頻呼着「姆媽⋯姆媽⋯」——他在呼他

的妻，以孩子們小時候的口吻。自1914年他們的長子誕生以來，他這樣呼她已有六十年。

當時在身邊的，有女兒和孫子。斷氣的一瞬，守在一邊的青年軍人脱帽肅立。

他怎麼走的？張凱慈記得：

火葬是我和姑姑、康康一起去的。那天正好來一位哪國元首，長安街淨街，爺爺裝在一輛卡車裏開過去，化名張得勝。

死亡證明還在我那裏。就那麼一張小條。第六醫院的死亡證明書，只有號碼，連代用名都沒有。[45]

張宗燁説：

他（那青年軍人）陪着去的，説我們想買什麼樣的骨灰盒都可以，他付錢。説放照片、寫名字都可以，都是他管。當時我們還挺害怕，不知到頭再給我們套上什麼罪名。他倒反過來説我們：政治問題是政治問題，親屬還是親屬。

他穿軍裝。年齡和我差不多。不敢打聽是哪裏的（中央三辦？公安部？）。他也不肯寫個東西讓我們帶回去請假（因為會有落款和簽名）。他只肯打電話。

張夫人吳紹鴻女士沒有去——難道去與一個號碼最後訣別？

就在這一天，1973年6月2日，長子張宗炳從秦城監獄給送回家。他的牙齒全掉光了，一句話也不説。張飴慈記得：

爸是1973年出獄的，已給整成精神病。發病的時候，同時裝成兩個人：一會兒是審判員，橫眉怒目；一會兒是犯人，可憐又無奈。那時候家裏已經沒了房子，他回來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親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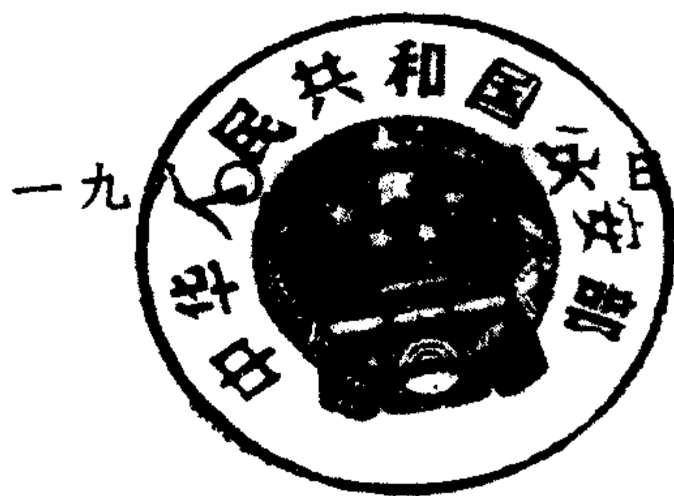
在東蓀的檢討中，屢屢説及自己的戀家（「革命性不足」）。1957年之後，雖然住在與校園只有一牆之隔的大城坊，卻極少踏進校門。家人記得，十數年間，對這個給他榮耀、令他受辱的燕園，東蓀只進

对张宗炳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

张宗炳，男，1914年生，浙江杭州人，现任北京大学教授。1968年1月因潜伏特务嫌疑问题被拘留审查，1975年4月予以释放。经审查，张宗炳的潜特嫌疑问题予以否定。张历史上曾参加过美特组织的活动，在忠诚老实运动和肃反运动中已经作过交代，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再追究。为此撤销1975年8月对张宗炳的审查结论和1979年1月对张宗炳问题的决定。

张宗炳在押期间的工资已予补发。

一九



同　意

张宗炳

1981年1月21日

公安部1980年對張宗炳問題審查的結論

過一次——陪着他的妻到禮堂聽蘇州評彈。

沒有一封他們的通信留於世。在他承蒙「養起來」而後的二十年間所寫的百首詩詞中，也未見一首專門為她。只是他最後留在世上的語言是「姆媽…姆媽…」。

「攜子之手，與子偕老」——與這為他生兒育女，並共享人生顛躓與苦難的忠誠伴侶。

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個夏天，張東蓀的中、英文傳記作者，本著者與美國布朗大學的P. J. Cowan，與宗燁、飴慈一道，在北京大學大興土木的隆隆聲中，最後憑弔東蓀先生在西郊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達園（1931–34年）；大東地（1934–37年）；燕東園23號（1946–49年）；朗潤園178號（1949–58年），最後來到大城坊（1958–68年）。

宗燁說，父親走後，鄰居對母親很好。1968年宗燁在幹校的時候，每月只能給母親三十元生活費。西院老呂家的三個女兒輪流陪她。後來奶奶做主，與這家結了親。

在大城坊的這個院子，鄰居們還照拂着張家當年種下的花，一株芍藥，一株月季。那月季已經長到了一人多高。鄰居們問：老太太好麼？「母親已經去世多年了。」宗燁答。著者問那些老鄰居是否記得張教授：

> 老先生好着呢，笑咪咪的，常在這兒（大約三平方米左右的院子）遛彎兒。

「遛彎兒」之餘，他返身回到那間小屋，提起毛筆——

> 無端握管復凝思，正是荒雞喚夢時。
> 留得是非身後論，且屏辛苦眼前癡。
> 茫茫濁世歸何所，歷歷浮生只自知。
> 寫罷他年與誰看，一燈相對雨如絲。
>
> 不關績毀失心期，早識天涯路本歧。
> 自得自危因自述，無恩無怨更無奇。

今生飽領人間味，此世常存萬古疑。

擲筆廢然推牖望，琅華一月漸西移。

(擬寫自傳先題二律)

七年前，他的老友君勱先生在大洋彼岸呼喊的，不正是這樣：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乃吾人今日破國亡家之餘，並欲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一二素心人亦不可得！則余之念東蓀，寧有盡耶？

昔老杜送孔巢父詩有曰：「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今日誰復能為余之巢父，足任問訊之勞者耶！而余與東蓀當年攜手一堂，上下議論之樂，寧可再得於今生耶！抑余與東蓀者，皆使命失敗之人也！則於茲東蓀覽揆之辰，安忍復辭文正之誚，不一吐余二人生平之素，失敗之哀，與夫東蓀今者荊天棘地無所告訴之苦，於以訴之人類理性，訴之正義公道，訴之後世史家，一共評其是非曲直耶！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46]

註釋

1. 沈鈞儒1913年即參與起草「天壇憲法」，1928年任上海法科大學教務長，同時執行律師業務；史良自1927年入法科讀書，1931年為執業律師。
2. 「中央1951年」的定案，直到1978年才通過天津市和平區法院轉張東蓀親屬。
3. 牟宗三：〈自由與理想〉，載《道德的理想主義》(台灣：學生書局，1978)，頁135。
4. 張東蓀：獨宜老人《草間人語·續作補錄》休謨《人類理解力》譯後。
5.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6. 同上註。

7.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337。
8. 周啟博：〈鄰家小兒話「翦老」〉，《開放》，2008年8月。
9. 何其鞏(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人，曾經任記者、西北軍文書，1924年留學蘇聯，北伐時期任國民聯軍司令部秘書長。1928年國民黨定於一尊並遷都南京後，北平特別市政府成立，為首任市長。任職期間主張「財政公開， 造成廉潔政府」、 增加教育經費(佔市政經費29.5%)、成立「貧民救濟總會」(北京歷史上第一個貧民救濟機構)等。1936接受任命為中國大學代理校長。北平淪陷期間，參加「北方救國會」活動，堅決不任偽職。他與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合稱為在北平堅持辦學的三位著名大學校長。
10. 何嗣珌：〈何其鞏：北平第一任市長〉，「千龍網」(http://www.21dnn.com/)。
11. 張東蓀所作文字中，沒少對胡博士適之直言抨擊，1947、1948年尤其多。對「研究系」不存好感的胡適不可能讀不到。這些均未影響他對張宗燧的評價與重用——可見當時學人風采。
12. 于宗瀚：〈懷念恩師張宗炳〉，「新語絲」網站(2003年)(http://www.xys.org/xys/netters/psi4/yuzonghan.txt)。
13. 同上註。
14. 周恩來：〈民主黨派的工作要同國家的中心任務相配合〉，載《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 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176。
16.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頁83–84。
17. 著者1996年5月17日對葉篤義的採訪。
18. 計有蔣捷夫(山東社科院院長)、葛懋春(山東省哲學學會副會長)的〈批判張東蓀的主觀唯心論和不可知論〉(《山東大學學報》，1956年第1期)；朱作雲、龐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張東蓀——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代言人〉(同上刊，1956年第2期)；葛懋春的〈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張東蓀的反動哲學的批判〉(同上刊，1961年第4期)等。
19. 參見浦熙修女兒袁冬林：〈女兒回憶——浦熙修在文革期間〉，「博訊新

聞網」(2005年1月10日)(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5/01/200501100255.shtml)。

20.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330。

21. 2008年，陸平之女陸瑩(「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老總」)接受採訪，對此節的敘述是：「我父親進北大時，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經劃完了」。對於自己在北大的經歷作為，陸平認為「不能寫，寫了也沒法發表」；「一個人默默來到人世間，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也就夠了。」陸總說：「父親文革後很多年不能去北大，見到未名湖就難受，是挨打挨批鬥的地方。受不了這刺激。」在接受採訪中，陸總表示「一定要給父親寫一篇文章，把父親在北大的事寫出來」。著者在此提醒陸瑩女士，落筆時萬望不要忽略掉江隆基和張東蓀。這篇採訪發表於《中華讀書報》，2008年3月12日，題為〈父親是知識分子〉。

22. 王曾瑜：〈敬愛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學術交流網」(2007年9月30日)(http://www.annian.net/show.aspx?cid=18&id=21720)。

23. 張東蓀：〈告知識分子〉《展望》，第2卷第4卷；《觀察》，第4卷第14期全文轉載，1948年。

24. 當時燕京大學不僅住宿好，師資待遇也是相當豐厚。教授級職員的月薪在三百元以上，約等於平民四十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而外籍教受則更是從美國教會領取美鈔工資，更為「富庶」。參見梁茜：〈不改丹青色 不減菊蘭香〉，《南方都市日報》，「人物觀察」，2004年。

25. 主人公與書的關係，這裏插入一段別人對他的描述：張東蓀當時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沒有像胡適等那樣搭乘南京派往北平接人的飛機，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張東蓀離不開他在北平執教二十九年所收藏的中外書籍。參見謝扶雅：〈懷念張東蓀先生〉，《傳記文學》(台灣)，第26卷第6期，1976年12月。至於胡適舊居和他的書房，藏書，包括日記、草稿，全部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

26. 鄧之誠曾作〈張君孟劬別傳〉，載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27. 陳樹普：〈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憶先師鄧文如教授一些純德懿行〉，載鄧珂編：《鄧之誠學術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27。

28. *張東蓀：〈現在與將來〉，《改造》，第3卷第4號，1920年。*

29. 即有名的X詩社。成員除張鶴慈外，有郭世英、孫經武、葉青。
30. 龍榆生(1902–1966)，詞學大師，編《詞學季刊》，並著有《唐宋名家詞選》。因毛澤東好詞，本人與陳毅又有師生之誼，所以曾是毛風雅消閒時候的座上客。可喜的事，他並未以此患上政治敏感病，一直是東蓀被拋出現世的淳厚友人。
31.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32.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42–143。
33.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34.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頁147–150。
35. 據《吳法憲回憶錄》揭露，中央專案小組下設辦公室(主任謝富治)，下屬四個專案組：五．一六專案組、抓叛徒專案組、葉向真專案組、其他一些人的專案組。吳認為，專案組辦案最關鍵的要害在於，受專案審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據當權者的政治需要來製造的。估計對張家父子和葉篤義審問，屬於「中央三辦」中的「其他」，當然也可能歸「葉向真專案組」，因為對此女學生和徐冰的定罪，最終都指向葉劍英。
36. 依照《刑法》，只有法院有下設監獄。
37. 陸啓鏗：〈一位誠實的科學家——懷念張宗燧先生〉，《科學時報》，2005年12月6日。
38. 王元：《華羅庚》(上海：開明書店，1994)。
39. 能否見外國人，是當時「是否得到黨的信任」的標誌。張宗燁工作的高能物理所電子對撞機項目，最早與國外合作。
4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598。
41. 讀者或許記得，自「反右鬥爭」之後，張東蓀已經失去北大教職。自此，他的「單位」已是北京文史館。
42. 愛孫鶴慈乳名。另兩個是康康(飴慈)和凱凱(凱慈)。
43. 張東蓀：〈名實與帝制〉，《正誼》，第1卷第9號，1915年6月。
44. 語出《莊子．逍遙遊》。
45. 張家的人沒有記住那號碼。著者根據自己的經歷，推斷應是「68X」，即1968年第X個關進秦城的犯人。
46. 張君勱：〈張東蓀先生八十壽序〉，《展望》，172期，1969年。

後記

如果不是在異國他鄉遇見張鶴慈——僅因求知之渴望即遭十數年囚禁的「X案主兇」——傳主於我，恐怕只是一個飄散在舊籍陳檔中的杳渺魂靈。但東蓀先生以及他的同儕們，曾經多麼生動、有骨氣地生活過——哪裏像我們，逃出口號即陷進廣告——但為什麼誰都不敢、不願(間或也做出不屑)說他？更何況，又有誰有本事在官員當道的中國，調出他的卷宗、追蹤案件經手人、遍訪他的故舊，呈上一部信史？

澳洲國立大學的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立刻捉住這中國近現代絕對不可無視的人物。十多年來，只要碰面或通信，一定是：「動筆了麼？寫到哪兒了？什麼時候完成？」他推薦我到大洋彼岸的Woodrow Wilson Center(著者獲1999–2000年研究基金)，未能完成；又將我捉至南半球，關在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著者獲2007年研究基金)，生怕旁騖連連的著者在北京浪擲光陰。

掙扎着熬過艱難歲月的張家後人，打開塵封的寶庫：記憶中的；僥倖逃過劫難之舊箱子裏的。已經不再是燕京學生、早期民盟幹員、後期民盟副主席的葉篤義，也在離世前，出於對傳主(以及施虐者)的認識、再認識、再再認識，傾力幫助在中國近乎「路路不通」的著者。

書稿草成。如果沒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鼓勵性接納，以及只有嚴格的學術出版機構才肯投入的上乘後期編輯：李大興、胡泊、黎耀強，以著者資歷及所受訓練，恐怕只能出手一個記者寫的大故事。也要感謝另兩本《張東蓀傳》的作者，著者得益於他們對傳主著作所

下的工夫。

另有一事，難於啟齒卻又不得不老實招認：張家親屬萬難之中保存下的文字、詩詞手跡，工科出身、僅描過幾天紅模子的著者，竟不全認得——查書法字典、叨擾古文家也未盡全功。書內引文中留下之「口」，切望學富五車的讀者百忙之中慷慨出手友情辨析。

著者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欺蒙與箝制下度過的。隨着已然敞開的國門和高效的信息互聯，前天、昨天和今天被掩蓋的樁樁件件將一一大白：它們不僅直接關涉國運，更是成千上萬，乃至上十萬、上百萬、上千萬及上億家庭或生或死（或者生不如死）的直接動因。

二十多年前，中國詩人北島呼喊「我不相信」；中國歌者崔健嘶叫「我們一無所有」。本書即將付梓，著者也想說我不相信，不相信中國百姓會永遠苟安於欺蒙中。本書即將付梓，曾經一無所有的我們，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並不能體現完整的人類尊嚴，拼死也要爭回本屬於自己的東西：思想獨立，言論自由。

戴晴
2008年10月

參考文獻

書籍類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于平凡：《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

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86。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六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黨的文獻》編輯部：《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專題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員會編：《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合編：《毛澤東軍事文

集》，第五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宣傳部編：《馬敘倫政論文選》。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張瀾》。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方漢奇：《報史與報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

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毛澤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王元：《華羅庚》。上海：開明書店，1994。

王雲五著，王學哲編：《岫廬八十自述(節錄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司徒雷登著，閻人俊譯：《在中國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香港：求精出版社，1955。

左玉河：《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朱振才：《建國初期北京反間諜大案紀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牟宗三：《五十自述》。台北：鵝湖出版社，1989。

艾愷著，鄭大華等譯：《梁漱溟傳》。長沙：湖南出版社，1988。

何雨文：《中共財政解剖》。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灣：東大圖書公司，1995。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吳黔生等：《肝膽相照》。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宋志明：《熊十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宋原放等主編：《上海出版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宋雲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

民出版社，2002。
李淵庭、閻秉華編：《梁漱溟年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李輝：《在歷史現場——換一個角度的敘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沈雲龍：《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亞東圖書館編：《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
周小舟傳記編寫組：《周小舟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
周恩來：《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周鯨文：《中國大陸自由化運動——救中國、救亞洲、救世界的鑰匙》。香港：時代批評社，1982。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香港：時代批評社，1959。
林天行編：《中國政治內幕》，第一輯。上海：南華出版社，1948。
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台北：遠流出版社，1984。
侯祥麟：《我與石油有緣——侯祥麟自述》。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
姚舜欽：《八大派人生哲學》。上海：中華書局，1931。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韋君宜：《思痛錄》。香港：天地圖書，2000。
唐振常：《半拙齋古今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孫曉華主編：《中國民主黨派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
徐慶全：《周揚與馮雪峰》。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郝在今：《協商建國——1948–1949中國黨派政治日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馬永順：《周恩來組建與管理政府實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馬勇：《梁漱溟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
張正隆：《雪白血紅》。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張仲禮主編：《上海社會科學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張光年：《光未然脫險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張東蓀、姚璋：《近代西洋哲學史綱要》。上海：中華書局，1925。

張東蓀譯著：《社會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
張東蓀譯著：《創化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
張東蓀：《人生觀ABC》。上海：世界書局，1928。
張東蓀：《精神分析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
張東蓀：《哲學》。上海：世界書局，1931。
張東蓀：《哲學與科學》。上海：世界書局，1931。
張東蓀：《道德哲學》。上海：中華書局，1931。
張東蓀：《現代倫理學》。上海：新月書店，1932。
張東蓀：《哲學叢書．現代哲學》。上海：世界書局，1934。
張東蓀：《哲學叢書．價值哲學》。上海：世界書局，1934。
張東蓀：《認識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
張東蓀：《知識與文化》。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張東蓀：《思想與社會》。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上海：觀察社，1948。
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張愛玲：《秧歌》。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
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等編：《張聞天早期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張耀傑：《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
許紀霖：《曖昧的懷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京：人文書店，1935。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修訂版。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陶菊隱：《政海軼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1948。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費正清等著，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的哲學問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黃華：《親歷與見聞》。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親華等主編：《中國民主黨派詞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CP出版社，2004。
溫梓川：《文人的另一面——民國風景之一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
董世桂、張彥之：《北平和談紀實》。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
趙柏田：《歷史碎影——日常視野中的現代知識分子》。北京：中華書局，2006。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
蔣勻田：《中國近代史轉捩點》。香港：友聯出版社，1976。
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北京：中華書局，1995。
蕭濟容：《中共的財政收支》。香港：友聯出版社，1954。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台北：蘭臺出版社，2000。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鍾叔河編訂：《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長沙：嶽麓書社，2002
龐松：《共和國年輪·1949》。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文章類

A. 列多夫斯基編，馬貴凡譯：〈毛澤東同斯大林往來書信中的兩份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丁石孫：〈「他有很高尚的精神」——紀念張瀾先生誕辰130周年〉，《中國統一戰線》，2002年第8期。

于宗瀚：〈懷念恩師張宗炳〉，「新語絲」網站（2003年），http://www.xys.org/xys/netters/psi4/yuzonghan.txt。

于長治：〈共和國的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四川黨史》，1999年第4期。

王凡：〈「一二．九運動」策劃發動真相〉，《中華讀書報》，2002年12月4日。

王凡：〈一二九運動策劃發動真相是如何浮出水面的？〉，《黨史博採》，2003年8月號。

王大煜：〈生活書店見聞〉，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二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王立新：〈意識形態與美國對華政策——以艾奇遜和「承認問題」為中心的再研究〉，《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王仲方：〈我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人民公安》，1999年第1期。

王如君：〈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環球時報》，2002年8月12日。

王紅雲：〈北平和平解放和談記〉，《縱橫》，2002年第1期。

王曾瑜：〈敬愛的馬校長和可悲的陸平〉，「學術交流網」（2007年9月30日），http://www.annian.net/show.aspx?cid=18&id=21720。

王新生：〈共產國際與紅軍長征〉，《光明日報》，2006年10月23日。

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載知識出版社編：《「一大」回憶錄》。北京：知識出版社，1980。

朱作雲、龐樸：〈張東蓀——封建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代言人〉，《山東大學學報》，1956年第2期。

朱學勤：〈費孝通先生訪談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何思誠：〈上海《時事新報》從研究系落入國民黨手中的演變概要〉，載《文史資料選輯》，第136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何嗣珌：〈何其鞏：北平第一任市長〉。千龍新聞網，http://www.21dnn.com/。

何禮：〈我對「一二九」運動的回顧〉，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呂光光：〈毛主席同張瀾的會見〉，載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等編：《重慶談判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李永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繫〉，《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李揚：〈五十年代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院系調整研究之一〉，《開放時代》，2004年第5期。
李維漢：〈真假和談的鬥爭——記北平和談〉，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6期。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
李銳：〈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
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上），《傳記文學》（台灣），1981年第2期，第39卷。
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下）。《傳記文學》（台灣），1981年第3期，第39卷。
沈志華：〈關於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談：俄國檔案文獻〉，《國外當代中國研究動態》，1997年第1期。
沈勃等：〈中山公園音樂堂事件的前前後後〉，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二十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沈譜口述：〈沈鈞儒：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中國政協新聞網」（2005年4月18日），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61/3328444.html。
邢俊生：〈我給徐子榮當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網站（2007年11月21日），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93/1468478.html。
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周啟博：〈鄰家小兒話「翦老」〉，《開放》，2008年8月。
周禮全：〈懷念金岳霖師〉，《人物》，1995年第6期。
武宜三：〈千家駒們的悔恨與徐四民的明白〉，「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2005年10月27日。
青石：〈斯大林「不許革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青石：〈斯大林力主中國出兵援朝〉，《百年潮》，1997年第2期。

帥文潔：〈《新青年》與陳獨秀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研究」網站（2004年12月14日），http://www.chenduxiu.net/ReadNews.asp?NewsID=403。

施樂渠：〈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的一件投降陰謀活動〉，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

范興國：〈燕京大學與中美文化關係〉，《傳記文學》（台灣），1979年第6期，第35卷。

徐光壽：〈陳獨秀「漢奸」事件始末〉，《黨史縱覽》，2007年第2期。

徐炳昇：〈1937年廬山談話會見聞〉，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徐書麟主編：《月犁——崔月犁自述及紀念文章》。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2。

笑蜀：〈天馬的終結——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41。

笑蜀：〈北中國的自由「孤島」——燕京大學抗戰寫實〉，《南方周末》，2005年9月29日。

耿雲志：〈傅斯年對五四運動的反思——從傅斯年致袁同禮的信談起〉，《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袁偉時：〈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可貴開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紀》（香港），2001年2月號。

馬連儒：〈彭澤湘：輝煌與坎坷伴隨一生〉，《人物》，2001年第7期。

馬逢華：〈懷念沈從文教授〉，《傳記文學》（台北），1963年第1期。

馬輝之、李楚離：〈回憶劉少奇同志在北方局〉，《人民日報》，1980年5月14日。

高文華：〈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張友仁：〈周炳琳先生二三事〉，《北大人》，2003年夏季號。

張申府：〈「一二九」運動的點滴回憶〉，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張偉：〈1949年，司徒雷登差點到北京〉，《環球時報》，2002年7月8日，第十九版。

張業賞：〈毛澤東為何寫《別了，司徒雷登》〉，「大眾網」(2006年5月24日)，http://dzrb.dzwww.com/dazk/ws/200403/t20040324_638947.htm。

張樹桐：〈新中國成立時的中央政府為什麼叫人民政府，而不叫「聯合政府」?〉，《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梁實秋：〈我的一位國文老師〉，載《梁實秋散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梁曉聲：〈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紀念張瀾先生〉，《出版參考》，2006年第17期。

許德珩：〈「一二九」的片斷回憶〉，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許寶騤：〈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一幕軍事活動〉，《盟訊》，1981年3月號。

許寶騤：〈周作人出任華北教育督辦偽職的經過〉，《團結報》，1986年11月29日。

郭明秋：〈回憶「一二九運動」的黨的領導〉，載《一二九運動回憶錄》，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陳文彬：〈五四時期知識界的「挾洋自重」〉，《書屋》，2006年第7期。

陳伯鈞：〈兵臨城下——回憶解放北平〉，載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第十四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

陳遠：〈燕京大學地下黨與工作隊負責人回憶與反思燕大「思想改造運動」〉，《新京報》，2005年6月9日。

陳樹普：〈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憶先師鄧文如教授一些懿德景行〉，載鄧珂編：《鄧之誠學術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陸啟鏗：〈一位誠實的科學家——懷念張宗燧先生〉，《科學時報》，2005年12月6日。

章立凡：〈腐敗成因難探討——章乃器與梁漱溟往事之一〉，《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

章立凡：〈解讀喬冠華晚年際遇的一封信〉，《文史博覽》，2007年第6期。

章立凡：〈歷史塵封的哲人——記張申府先生〉，載《君子之交如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章詒和：〈心坎裏別是一般疼痛——憶父親與翦伯贊的交往〉，載章立凡主編：《記憶——往事未付紅塵》。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馮崇義：〈第三道路世紀夢——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回顧〉，《二十一

世紀》網絡版，總第7期，2002年10月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7033.htm。
黃波：〈「書生謀國直堪笑」——關於張東蓀〉，《書屋》，2003年第7期。
楊天石：〈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載《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楊奎松：〈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六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局勢的評估和預測〉，《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6期。
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
楊曉娟：〈淺析第三黨的歷史演變過程〉，《晉東南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1期。
葉其忠：〈從張君勱和丁文江兩人和《人生觀》一文看1923年「科玄論戰」的爆發與擴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25期。
葛懋春：〈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張東蓀的反動哲學的批判〉，《山東大學學報》，1961年第4期。
虞昊：〈「一二・九」運動與張申府〉，《傳記文學》，2005年第3期。
雷永生：〈走近張申府〉，《社會科學論壇》，2005年第8期。
雷潔瓊：〈一次難忘的幸福會見〉，載邵康主編：《毛澤東和黨外朋友們》。北京：團結出版社，1993。
雷潔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真理〉，《光明日報》，2001年6月12日。
廖蓋隆：〈序言〉，載張軍民：《中國民主黨派史》。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趙錫驊：〈張瀾在開國大典前夕〉，《紅岩春秋》，2004年第5期。
劉白羽：〈難忘那一天〉，《光明日報》，2004年11月1日。
蔣匀田：〈張君勱先生一生大事記〉，《傳記文學》(台灣)，1969年第4期。
蔣捷夫、葛懋春：〈批判張東蓀的主觀唯心論和不可知論〉，《山東大學學報》，1956年第1期。
鄭惠：〈胡繩訪談錄〉，《百年潮》，創刊號，1997年1月。
錢理群：〈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讀書》，1998年第8期。
錢鋼：〈紅心的故事〉，「民間歷史」網站，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

aspx?cid=4&tid=86。
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
薛瑞漢：〈1949年司徒雷登滯留南京與中美和解問題淺析〉，《世紀週刊》，2004年8月27日。
謝扶雅：〈懷念張東蓀先生〉，《傳記文學》（台灣），1976年第6期。
謝泳：〈政治與學術之間——羅隆基的命運〉，載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羅隆基：〈從參加舊政協到參加南京和談的一些回憶〉，載《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報章、期刊類

《二十世紀》，1931年。
《人民日報》，1949年，1951年，1957年。
《大公報》，1937年。
《中建》，1948年。
《中國青年》，1923年，1924年。
《中國建設》，1949年。
《文哲月刊》，1935年。
《北京盟訊》，1981年。
《正風》，1935年。
《正誼》，1914年，1915年。
《光明日報》，1951年。
《光華大學》半月刊，1935年。
《再生》，1932年，1946年。
《自由評論》，1936年。
《改造》，1920年、1921年。
《亞美雜誌》，1943年。
《奔流》，1928年。
《東方雜誌》，1923年，1925年，1929年。
《展望》，1969年
《時事新報》，1919年，1920年，1921年。

《時與文》，1947年。
《國訊》，1948年。
《國聞週報》，1935年。
《庸言》，1913年。
《教育》，1906年。
《掃蕩報》，1937年。
《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
《傳記文學》(台灣)，1956年。
《新中國日報》，1945年。
《新青年》，1920年。
《新燕京》，1952年。
《解放日報》，1937年。
《解放與改造》，1919年，1920年。
《觀察》，1946年，1947年，1948年。

人名索引

二 畫

三 畫

四 畫

五 畫

六 畫

七 畫

八畫

九 畫

十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八畫及以上